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1)

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十一卷说明	XI—X X X III
卡·马克思。议会常会开幕	3—6
卡·马克思。论内阁的危机	7—8
卡·马克思。议会状况	9—13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	14—1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议会新闻。——战区消息	29—2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上一届英国政府	25—32
卡·马克思。论内阁危机	33—37
卡·马克思。阿伯丁内阁的倒台	38—45
卡·马克思。被推翻的内阁	46—49
卡·马克思。政党和集团	50—52
卡·马克思。两种危机	53—56
弗·恩格斯。克里木的斗争	57—6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帕麦斯顿。——军队	62—65
卡·马克思。 [*] 议会新闻：格莱斯顿的发言	66—67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	68—75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编者注

一	68—71
二	71—75
卡·马克思。赫伯特的重新当选。——新内阁的最初 措施。——东印度的消息	76—78
卡·马克思。议会	79—83
卡·马克思。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	84—86
弗·恩格斯。欧洲面临的战争	87—9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议会和军事问题	95—97
卡·马克思。论新的内阁危机	98—101
卡·马克思。休谟	102—103
卡·马克思。 [*] 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	104—107
卡·马克思。不列颠宪法	108—111
卡·马克思。累亚德	112—113
卡·马克思。英国的危机	114—117
卡·马克思。军衔买卖。——澳大利亚消息	118—121
卡·马克思。英国报刊论沙皇逝世	122—123
一	122—123
二	123
卡·马克思。论法国联盟的历史	124—127
卡·马克思。调查委员会	128—131
卡·马克思。布鲁塞尔回忆录	132—133
卡·马克思。爱尔兰的复仇	134—137
弗·恩格斯。克里木事件	138—141
弗·恩格斯。大冒险家的命运	142—14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	146—149

卡·马克思。* 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 斋戒日。——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150—153
卡·马克思。* 伦敦饭店中的群众大会	154—157
卡·马克思。英国报刊的消息	158—159
卡·马克思。* 议会新闻：上院关于普鲁士的辩论	160—165
弗·恩格斯。拿破仑最近的诡计	166—169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会战	170—174
卡·马克思。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175—178
卡·马克思。拿破仑和巴尔贝斯。—— 报纸印花税	179—181
卡·马克思。* 调查委员会的揭露	182—185
卡·马克思。不列颠军队	186—190
弗·恩格斯。战争的进程	191—195
弗·恩格斯。论克里木局势	196—199
卡·马克思。法国立法团的丑事。—— 德鲁安·德· 路易斯的影响。—— 民军的现状	200—202
卡·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	203—208
弗·恩格斯。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	209—213
弗·恩格斯。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	214—217
弗·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	218—225
一	218—220
二	221—225
卡·马克思。论鼓动运动的历史	226—229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230—236
卡·马克思。皮阿诺里。—— 对奥地利的不满	237—239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局	240—243

卡·马克思。“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	244—246
卡·马克思。上院会议	247—251
卡·马克思。* 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	252—255
卡·马克思。金融市场	256—258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争	259—266
卡·马克思。关于改革运动	267—269
卡·马克思。评克里木局势。——议会新闻	270—27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帕麦斯顿勋爵官邸演出的 喜剧序幕。——克里木最近事件的经过	274—277
卡·马克思。议会改革。——维也纳会议的中断和恢复。——所谓歼灭性战争	278—282
卡·马克思。迪斯累里的提案	283—287
卡·马克思。* 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	288—294
卡·马克思。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	295—297
卡·马克思。* 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	298—302
卡·马克思。* 议会关于战争的辩论	303—307
弗·恩格斯。克里木的消息	308—311
弗·恩格斯。评克里木事件	312—315
卡·马克思。* 英国议会中的辩论	316—319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	320—325
弗·恩格斯。拿破仑的军事计划	326—332
卡·马克思。纳皮尔的信。——罗巴克委员会	333—33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下院的事件。——克里木 战争	337—339

卡·马克思。阿尔伯特亲王的祝词。—— 报纸印花税 ……	340—342
卡·马克思。奇怪的政策 ……	343—34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局部战争。—— 关于行政 改革的辩论。—— 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 ……	348—352
卡·马克思。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巴 黎交易所新闻。—— 上院关于汉格暴行的辩论 ……	353—357
卡·马克思。六月十八日的失利。—— 增援部队 ……	358—362
卡·马克思。* 反教会运动。—— 海德公园的示威 ……	363—369
卡·马克思。消息数则 ……	370—374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	375—381
卡·马克思。消息数则 ……	382—384
卡·马克思。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法案 所引起的风潮 ……	385—38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人民同警察的冲突。—— 论克里木事件 ……	390—393
弗·恩格斯。六月十八日的强攻 ……	394—397
卡·马克思。* 议会新闻：罗巴克和布尔韦尔的提案 ……	398—400
卡·马克思。* 议会新闻：布尔韦尔提案，爱尔兰问题 ……	401—40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罗素的辞职。—— 克里木 事件 ……	405—408
卡·马克思。罗素的辞职 ……	409—411
卡·马克思。在议会内 ……	412—414
弗·恩格斯。战争的前景 ……	415—41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议会新闻。—— 战区消息 ……	420—423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 大不列颠统治阶级的生	

理现象	424—428
卡·马克思。约翰·罗素勋爵	429—455
一	431—434
二	435—438
三	439—442
四	443—446
五	447—451
六	452—455
卡·马克思。北明翰代表会议：丹麦王位继承问题和 四项保证问题	456—462
一	456—460
二	460—462
弗·恩格斯。欧洲军队	463—538
第一部分	465—492
一 法国军队	471—480
二 英国军队	480—488
三 奥地利军队	488—492
第二部分	493—516
一 普鲁士军队	493—501
二 俄国军队	501—514
三 德意志各小邦的军队	514—516
第三部分	517—538
一 土耳其军队	517—523
二 撒丁军队	523—527
三 意大利各小国的军队	527—528
四 瑞士军队	529—530

五 斯基的那维亚各国的军队	530—538
六 荷兰军队	533—534
七 比利时军队	534
八 葡萄牙军队	534—535
九 西班牙军队	535—538
卡·马克思。辛普森将军的辞职。——议会新闻	539—540
卡·马克思。评议会的辩论	541—544
卡·马克思。反对俄国的兵力	545
卡·马克思。波兰集会	546—550
卡·马克思。对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的批判 ..	551—55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英法对俄战争	555—560
一	555—557
二	557—560
卡·马克思。论战区事件	561—563
卡·马克思。纳皮尔的信	564—565
卡·马克思。奥地利和战争	566—57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英国兵士的惩罚办法	572—574
弗·恩格斯。黑河会战	575—581
卡·马克思。英国的新揭露材料	582—588
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	589—593
卡·马克思。奥康瑙尔的葬礼	594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争的前景	595—60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克里木事件	601—603
卡·马克思。贸易和财政状况	604—606
弗·恩格斯。俄国的抵抗力量	607—60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将军们的报告。——英 国的法庭。——来自法国的消息	610—613
弗·恩格斯。战争的决定性事件	614—623
卡·马克思。官方财政报告	624—626
卡·马克思。法兰西银行。——克里木的增援部队。 ——新元帅	627—629
弗·恩格斯。军事行动的进程	630—635
弗·恩格斯。俄国军队	636—641
卡·马克思。传统的英国政策	642—645
弗·恩格斯。亚洲战争	646—652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	653—657
卡·马克思。英美冲突。——法国的局势	658—664
卡·马克思。小波拿巴法国	665—671
卡·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	673—712
一	675—683
二	684—694
三	695—704
四	705—712
卡·马克思。普鲁士	713—718
注释	721—77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79—796
人名索引	797—833
期刊索引	834—836
地名索引	837—846

插 图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战区图	262—263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时期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图	396—397
弗·恩格斯绘制的1855年8月16日（4日）黑河会战略图	576—577
弗·恩格斯所写的克里木战争大事记	621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总进程图	656—657

第十一卷说明

第十一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收集了他们在 1855 年 1 月底至 1856 年 4 月这一时期的论文和通讯。这些作品大部分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上发表过。马克思从 1854 年 12 月底起就是该报的撰稿人。同时，他继续给当时进步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和前几年一样，马克思的某些著作是在厄·琼斯主编的、1852 年 5 月创刊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的。

在政治反动的条件下，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利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来联系群众并促成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舆论，来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马克思为“新奥得报”撰稿使他有可能与德国保持更紧密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有可能对德国读者阐明国际政治、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状况方面最重要的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问题。

因为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几乎要占去他的全部时间并使他中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一部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根据马克思的请求是

由恩格斯写的。这些文章主要是军事评论。马克思也时常把这些军事评论译成德文，送到“新奥得报”去发表。在个别情况下，马克思由于考虑到为德国写通讯稿的特殊条件，于是用自己的文字把恩格斯的军事论文的内容表达出来，或者对这些论文作某些改动、缩减，有时他自己又写一些对议会辩论和国际事件的评论补充进去。这些文章实际上是两位作者的劳动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创造性合作的范例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政论文章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在五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同他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工作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马克思在这个时期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外，还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问题。恩格斯继续研究军事科学，首先是军事学术史，他研究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历史，研究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一部分反映在他们的论文和通讯中。同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写稿过程中收集了新的实际资料，后来他们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利用了这些资料。例如，在给“新奥得报”写的论文中所引用的关于爱尔兰土地关系的某些材料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后来都被马克思用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革命的政论文章对于五十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利用在普鲁士反动的条件下出版的“新奥得报”的篇幅来进行革命宣传有困难，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们有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能够在他们的政论文章中贯彻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他们揭露了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脓疮，抨击了被统治阶级用来为这个制度作思想辩护的反动理论。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中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欧洲各国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策略问题。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当时的事件，并且通过具体的实例说明了他们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继续具体化了并发展了他们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本卷文章所谈到的很多问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国际关系和当时进入结束阶段的克里木战争。本卷中有关这些题目的文章，就其内容来说是全集第九卷和第十卷所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论文的继续。在这一卷里占很大篇幅的是评述欧洲各国首先是英国的经济和内部政治状况的文章以及专门论述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来分析所有这些问题，来评价历史事件的，他们首先注意到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高潮的前景，他们坚信这种新高潮的到来。正如弗·伊·列宁所指出的，他们在决定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时，是从1789—1871年这一时期的客观条件出发的，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斗争还未结束。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就是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也还未解决，摆在日程上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8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欧洲彻底革命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策略，即由无产阶级革命者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也曾面临的那些基本任务所决定的策略，基本上是“新莱茵报”在1848—1849

年的革命策略的继续，不过它采取了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况的新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的危机”、“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指示工人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要利用国际冲突，即克里木战争来发展反对现存反革命制度的欧洲革命。他们着重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使统治阶级发动的以反人民为目的的克里木战争成为爆发大规模革命事件的推动力。马克思希望这些事件“将使无产阶级能够重新取得它在法国 1848 年六月战斗中所失去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法国，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中欧，包括英国在内。”（见本卷第 208 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上。恩格斯在“大冒险家的命运”一文中谈到“第四次并且是最伟大的一次法国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这次革命能引起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震荡。“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就将摆脱硬把他们拴在一起的锁链，而重新形成旗帜不同、目标各异的两大阵营，以代替欧洲今日不稳定的偶然的联合和敌对。那时斗争将只在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和另一方面是君主反革命之间进行。”（见本卷第 145 页）

像在 1848—1849 年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他们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揭露了在沙皇俄国占统治地位的农奴制度，揭穿了沙皇政府的掠夺计划和沙皇政府的外交活动，揭示了沙皇政府和欧洲其他反革命势力一道在镇压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警察角色。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欧洲列强的统治阶级竭力保全和利用沙皇制度作为反对革命的工具的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摧毁沙皇制度、消除它

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使欧洲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

恩格斯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中，揭示了沙皇专制政府企图利用欧洲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反革命性质，揭示了沙皇政府要把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号召变为自己掠夺政策的手段之一的意图。恩格斯在说明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反动实质时指出，散布这些思想的一些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君主派分子，在1848—1849年在客观上起了支持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等。他们强调指出，这种思想体系会造成各民族之间的民族纠纷，它是同各个民族（包括斯拉夫民族）的民主发展、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的。

恩格斯支持南方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独立要求，但是，他并不把这种要求推广到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其他一些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中，恩格斯谈到这些民族和它们的前途，他是从他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两著作中就已经提出的错误论点出发的，即认为这些民族似乎已失去了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能力，因而必定要为较强的邻族吞并（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和第8卷的说明）。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恩格斯认为集中、建立大国和大民族吞并小民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趋向，而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另一种趋向，即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努力争取民族独立的趋向。历史经验表明，以前曾加入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不仅显示出它们有能力作为独立的民族

而发展,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且能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民族一道成为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者。

为了民主地改造欧洲、解放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革命的民主道路联合德国和意大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必须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战争,他们揭穿了英法统治阶级为了侵略目的、为了巩固欧洲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寡头政治制度而发动战争的政策。

在本卷的许多论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详尽地分析历史事实、外交文件包括1855年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和议会辩论等材料的基础上,揭露了克里木战争发生的原因和真正的性质。他们揭穿了国家活动家们和西欧官方报刊的虚伪的声明,这些声明把英法对俄战争描绘成是“保卫”土耳其独立、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和“文明”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中证明,克里木战争的爆发首先是参战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这个战争的性质是由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己政策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列强在近东的矛盾,说明了这些列强为了分割土耳其帝国、争夺在巴尔干和黑海海峡的霸权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它们在中亚细亚的竞争。

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大不列颠统治阶级的生理现象”和其他文章中,揭露了西方列强对待它们的“盟国”土耳其的政策。他揭穿了欧洲列强对落后的土耳其实行殖民奴役的掠夺手段,其中包括在援助的幌子下强迫土耳其接受财政上的奴役。马克思指出,西方列强把土耳其的外交部和内政部置于它们的监督之下,掌握着它的军队并“正把手伸向土耳其的财政”。(见本卷第425页)

在“奇怪的政策”一文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

法统治阶级在克里木战争中所追求的真正的政治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寡头政体的英国和波拿巴法国力求除掉俄国这个在近东和中东的对手，力图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夺得俄国的高加索，消灭俄国舰队从而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但是它们根本不关心摧毁作为反革命势力的沙皇制度。西方列强决不是要动摇欧洲反动的、旨在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基础早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就已奠定了，它的支柱之一就是俄国沙皇制度。相反地，在西方列强的当权者的计划中却要巩固这个制度。马克思在揭露英法统治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时着重指出，克里木战争的“目的不是废除维也纳条约，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1815年的议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约。有人希望，从这时起保守主义的千年王国就会开始，各国政府将能够仅仅为了使欧洲思想界‘平静’而作共同的努力”。（见本卷第34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拿破仑的军事计划”、“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和其他的文章中证明，英法统治集团害怕东方冲突变成大陆上普遍的革命烈火，这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军事计划和作战方法有很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西方列强的统治集团在法国和英国煽起沙文主义的情绪，同时努力使战争局部化，不让它变成欧洲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猛烈地抨击了法国政府所提出的并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的计划，指出这一计划反映了波拿巴集团和英国寡头政治对于全欧洲同沙皇俄国作战将招致革命的后果而产生的恐惧，指出这个计划是根据法国和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

的反革命的、王朝的以及类似的打算而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要是不揭穿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政策，不坚决反对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根本改变战争的性质，不可能使它变成争取民主改造欧洲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力量和革命民主力量积极开展活动。马克思写道，“在舞台上应该出现另一种力量”（见本卷第 350 页）来代替英法反革命政府。

在一些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西欧各国对俄国作战的联合是不巩固的，这些盟国之间的矛盾在战争过程中经常暴露出来。在论述英法联盟的几篇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法统治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竞争的历史根源，这种竞争必不可免地引起了它们之间的一切新的冲突。

马克思把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迫近的经济危机（它本来就会引起所有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联系起来，他特别注意资本主义的英国，因为当时英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最尖锐的国家。

在载入本卷的许多论文中，马克思阐述了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统治阶级和执政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揭示了这些政策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在“传统的英国政策”、“帕麦斯顿勋爵”、“英国的新揭露材料”、“波兰集会”以及“卡尔斯的陷落”和其他几篇文章中，追溯了英国数百年来对外政策，指出英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外交手腕的一贯特点是背信弃义、假仁假义以及在各种各样骗人的幌子下干涉他国内政，并且指出英国在许多冲突中，特别是在近东和中东，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马克思以帕麦斯顿、罗素和其他国家活动家对波兰、爱尔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态度

为例子，揭露了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指出了英国统治阶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仇视，而这种仇视又往往用同情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假话来加以掩盖。

在“金融市场”、“贸易和财政状况”、“英国的危机”等文章中，马克思阐述了英国的经济状况，描述了工业生产、国内外贸易、市场价格、汇率等情况。他根据具体的实例考察了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性的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的发展，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断时续的性质。他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出现的经济繁荣时期，已经被英国一些工商业部门、首先是纺织工业部门中出现的萧条时期所代替。马克思在1855年也看出了曾在1853年底和1854年初出现过的经济衰退现象。他在文章中指出，这种经济衰退现象表现为某些工业品生产缩减、失业现象增长、许多企业实行不完全工作周制、大的贸易公司破产。马克思曾经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将经受比过去严重得多的经济危机；危机的严重程度将因英国经济依赖世界市场状况的这种特点而加深。马克思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的新的经济危机在1857年到来了。

马克思在文章中分析英国经济状况时，尖锐地批评了以自由贸易派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个自由贸易派散布关于推行贸易自由的原则经济危机就会消失的幻想。马克思指出这些幻想是要破产的，指出自由贸易派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地发展的可能性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他揭穿了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科布顿、布莱特和其他作为资本主义辩护者、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的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撕下了自由贸易派的“自由的捍卫者”、反对贵族

而捍卫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的假面具。他指出，自由贸易派反对国家干涉经济生活，但是每当雇佣工人阶级的运动开始公开威胁剥削制度时，他们就要恳求议会和政府进行干涉。马克思在文章中严厉斥责自由贸易派侵犯工厂视察制度，企图废除限制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日的法律。

马克思为了揭穿自由贸易派关于英国劳动人民是“幸福”的谎言，他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材料描述了英国工人群众特别是妇女和童工遭受剥削的触目惊心的景象。他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恶劣的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几乎完全没有，因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经常遭受威胁。马克思写道：“工厂视察员的这份工业通报比关于克里木战役的任何一份通报都更可怕、更吓人。妇女和儿童不断地为伤亡者名单提供大量名额。”（见本卷第 427 页）

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猛烈谴责曼彻斯特学派的首领们在克里木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场，揭露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保卫和平”的言论和他们的“无论如何要和平”的口号的真正含义。马克思着重指出，曼彻斯特学派要和平是为了“有可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工业战争”。（见本卷第 317 页）他指出，自由贸易派的假爱和平的词句掩盖着英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企图，掩盖着它的争夺世界市场霸权的斗争。

在“上一届英国政府”、“被推翻的内阁”、“论内阁危机”、“两种危机”、“不列颠宪法”、“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等文章中，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说明。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寡头政治制度的反人民性时写道：“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

腐的妥协。”（见本卷第 108 页）马克思着重指出，贵族保持对国家最重要的职位的垄断，是英国发展道路上主要的障碍之一，是寡头政治制度的柱石之一，这使贵族能够对英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指出，寡头政治制度给官方英国的全部政治生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它反映在议会的活动、政府的构成和政策中，反映在国家和军事管理的组织上以及各主要政党的立场上。马克思在说明英国政府（阿伯丁联合内阁和 1855 年 2 月接替它的帕麦斯顿的辉格党内阁）活动的特点时指出，在这两届政府的活动中体现了寡头政治制度的所有缺陷，这两届政府的目的是千方百计地阻碍推行任何威胁英国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垄断的进步改革。

马克思在“论内阁的危机”、“政党和集团”、“‘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等文章中，大大地补充了他在前几年的文章中对于英国官方政党、对于由托利党保守派和辉格党自由派轮流执政的传统两党制所作的经典性的描绘。他着重指出托利党落后的保守主义，托利党是“教会和国家、保护关税政策和反天主教问题上的一切旧英国偏见的”热烈捍卫者。（见本卷第 245 页）同时他揭穿了辉格党人这些资产阶级贵族代表的装装样子的自由主义，他们和托利党人一样，竭力巩固寡头政治制度，不过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狡猾，更能随机应变罢了。马克思指出，辉格党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些妨碍他们实现操纵国家职位的世袭权利的偏见”，他们“根据不同情况”更换“自己的常礼服和观点”。（见本卷第 245、246 页）

载入本卷的“约翰·罗素勋爵”这篇抨击文是为揭穿辉格党的政策而写的，它抨击的是这个“追求名位者的政党”（按照马克

思的说法)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一个多次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著名的国家活动家。马克思在这篇抨击文以及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指出,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斗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争吵,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剥削者的各个派别也日益团结起来,因此这两党在政策上的分歧也就日益消失。在野的这个或那个政党对政府的猛烈攻击只不过是排挤对手下台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在揭穿英国两党制这种结构时指出,这个或那个政党执政时,它仍然是继续奉行它的前任者的政治方针。这两个政党都同样致力于使资产阶级和贵族上层分子保持对国家政权的垄断。

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英国寡头政治制度所固有的深刻矛盾,指出陈旧的政治制度不适合英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的议会政党已经蜕化。马克思写道:“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垄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见本卷第51页)马克思阐述英国政治制度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发生的旧贵族政党解体并演变为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过程,它反映了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反映了这个阶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地位的巩固。

马克思在论英国的那些文章中非常注意英国工人阶级。在“伦敦饭店中的群众大会”、“论鼓动运动的历史”、“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关于改革运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论克里木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认定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活跃。马克思在指出资产阶级

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西蒂区商业金融集团反对派更加努力地企图使英国工人阶级屈从于他们的影响的同时，总是不断地强调宪章派对资产阶级分子类似的企图进行反击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介绍了厄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活动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内容，这些活动家指出资产阶级反对派反对寡头政治的言论是温和的和不彻底的，指出资产阶级反对派害怕工人运动并准备和贵族妥协，而且还揭穿资产阶级领袖们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行政改革这种温和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要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获取国家职位开辟更广阔的途径，而宪章派则与此相反，他们要求以人民宪章的六项条目为基础进行广泛的民主选举改革。马克思认为宪章派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竭力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保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地位，保证它在争取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

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的“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引起了很大注意。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历史意义，这一纲领的中心就是要求普选权。马克思着重指出，在五十年代的英国条件下实现这一纲领就能够为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利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道路。马克思指出：“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见本卷第301页）这篇文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要求具体地历史地对待政治口号，包括对待普选权的口号。他们教导说，普选权这个口号的内容和意义是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说在法国以及整个大陆普选权口号的内容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范围，那末在英国的条件下，这个要求和宪章派纲领的其他条

目一样，具有另外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大陆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们认为英国是例外。他们估计到当时英国的一些特点，例如英国同法国和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相反，没有发达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关，并且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英国居民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其办法就是实行普选权，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改造议会制度和使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个前景出发而对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作了评价，但是他们认为英国无产阶级还有通过非和平的道路来夺取政权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是它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的提高以及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争取恢复宪章运动的斗争能促使这个任务得到解决，但是这个希望没有实现。宪章派在五十年代想掀起群众性的争取宪章的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宪章运动本身不久便完全退出了舞台。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英国工人中间机会主义倾向的加剧，而机会主义倾向的加剧则是由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取得巨大超额利润收买了英国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工人贵族”而造成的。

本卷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阐述了法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大冒险家的命运”、“拿破仑的军事计划”、“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拿破仑最近的诡计”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波拿巴法国在战争中的真正目的——力图进行掠夺和巩固波拿巴政体。恩格斯在强调指出波拿巴法国是发动克里

木战争的主要国家之一和揭露拿破仑第三的阴谋时指出，军事冒险是波拿巴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掠夺和侵略是波拿巴集团的政治统治和波拿巴王朝执政本身所依据的原则之一。他指出，对于路易·波拿巴说来，“不能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便等于失去法国”。（见本卷第 16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揭露波拿巴政体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军警专政的政体，并且严厉批评了波拿巴法国的头子——无耻的篡夺者和冒险家拿破仑第三皇帝本人以及他最亲近的娄罗圣阿尔诺元帅、埃斯潘纳斯将军、福雷将军、康罗贝尔将军和其他贪得无厌出卖灵魂追求名位的人，这些人在战场上表现得庸碌无能而在镇压革命运动时则以野蛮残酷见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了法国内部的政治状况。他们在“将军们的报告。——英国的法庭。——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兰西银行。——克里木的增援部队。——新元帅”、“英美冲突。——法国的局势”等文中，指出法国政局由于物价高涨、其他经济困难增多以及狂热的投机活动扩大等等的的影响而严重起来。人民群众显露出不满的迹象，在工人阶级、大学生、一部分资产阶级中间，甚至在直到现在还是波拿巴政体的支柱的军队中间出现了革命的情绪，——这一切都表明第二帝国并不巩固，证明马克思所写的“波拿巴主义的繁荣时代已经过去了”。（见本卷第 664 页）

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小波拿巴法国”一文明确地反对了波拿巴主义。这篇文章是马克思所写的战斗的革命的政论文章中的杰作之一。它准确地和生动地揭穿了第二帝国制度的反人民本质。马克思向英国工人报纸的读者指出官方的波拿巴法国与人民群众的法国之间的鲜明对照：前者大肆挥霍本国的国民财富，后者则只有波拿巴集团的统治所带来的苦痛和贫穷、警察迫

害和血腥镇压。马克思着重指出，在这个人民法国的深处，反对路易·波拿巴制度的革命风潮正在成熟起来，预示着“进行证券投机交易的帝国即将垮台了”（见本卷第 671 页）的征兆正在出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中，继续阐明了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他们考察了奥地利政府在战争过程中的活动、英法和俄国之间在奥地利立场问题上所展开的外交斗争，也分析了奥地利帝国的内部状况，同时揭露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东方危机时期执行两面的摇摆的政策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反动的奥地利君主国是一个以压迫国内各民族并在它们之间煽起民族纠纷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它的内部蕴藏着许多易燃物。奥地利统治集团害怕革命，需要沙皇制度作为支柱，以便在新的革命浪潮爆发时向它求助。同时，奥地利在巴尔干追求掠夺的目的，觊觎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希望俄国被削弱；因此，奥地利在多瑙河集中了大量军队，同西方列强订立条约并与这些国家进行关于财政援助的谈判。因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意向而苦恼的奥地利采取了与俄国敌对的立场，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前并不敢公开地起来反对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奥地利政府害怕一旦对俄作战，在隶属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中间将展开解放运动，这一点对奥地利政府的这种摇摆不定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分析奥地利立场的同时，马克思也考察了普鲁士的政策。他认为，普鲁士统治集团宣布中立也是由于害怕会产生把对沙皇俄国作战的战场移到中欧来的革命后果。普鲁士参加战争就可能推动用革命民主的方法开展争取德国民族统一的斗争，这就会威胁普鲁士和奥地利君主制本身的存在。马克思在“普鲁士”一文中，说明了普鲁士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指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与

此相联系的普鲁士有产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空前富有。在涉及到资产阶级时，马克思再一次强调指出他和恩格斯还在1848—1849年就已表明思想：德国资产阶级在争取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斗争中没有能力起领导的作用。马克思揭穿了普鲁士君主制的政治制度的反动本质，认为这个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官僚政治万能、毫无民主自由和大部分居民处于无权地位。马克思指出普鲁士农民的困苦状况，他们仍然像过去一样“无论在行政方面或司法方面都直接隶属于贵族”。（见本卷第717页）

恩格斯关于分析克里木和高加索战场的军事行动进程、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某些军事行动的论文在本卷中占相当大的份量。这些军事评论对于研究军事历史科学是很重要的。它们提供了考察克里木战争的一切最重要阶段的可能性。在这些文章中，包括了许多有关军事学术史和军事战略战术问题的宝贵结论和原理，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恩格斯那个时代的战争经验。

在许多文章中，恩格斯批评了英法的统帅部，批评了它的战略和西方列强的代表们对军事行动缺乏干练领导。在提到联军统帅部的失算和失策、提到它缺乏深谋远虑的战略计划和主动精神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和墨守陈规的习气时，恩格斯指出，英国和法国的有许多显著缺陷的作战方法，是完全符合英法统治集团在战争中所追求的那种极为自私的、反人民的目的的。在“克里木的斗争”、“调查委员会的揭露”、“不列颠军队”、“对英国兵士的惩罚办法”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英国军事制度的保守性，英国军队组织的守旧性，指出英国军官理论素养和军事素养水平的低下，统帅部和军需部（军需部虽然有比较有利的条件，但还是不能保证供应英国军队以武器和装备）领导者的庸

碌无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关于揭露波拿巴主义的文章中，评述了波拿巴集团在法国军队中所推行的反革命制度，以及第二帝国许多军事活动家的丑恶面貌。

恩格斯的绝大部分军事评论都是谈论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和防御情况的。俄国军队保卫这个城市的 11 个月的英雄历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自然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的中心。恩格斯把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和防御看做是克里木战争的新阶段，他详细地分析了英法军队所采用的围攻方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防御方法。在研究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经验时，恩格斯对于要塞在当时战争条件下的作用以及野战军与要塞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了重要的总结。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塞瓦斯托波尔会战”和其他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联军围攻的方法。他指出，“像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这样没有系统、不可理解和不光彩的围攻战例，在特洛伊围攻以来的战史中却是一个也找不出来的”。（见本卷第 217 页）恩格斯着重指出，在筑城工事方面，俄国人大大胜过英国人和法国人。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组织、保卫者的军事工程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了俄国要塞保卫者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在“战争的进程”、“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和其他文章中，恩格斯指出塞瓦斯托波尔守备部队的军事工程师，包括工程长官托特列本的技艺、他们迅速而正确地了解情况的能力、善于组织火力和防御工程的本领都是联军的榜样。按照恩格斯的评论，俄国人在防御过程中修筑新的工事是“被围守军以往从未采取过的一种最大胆最巧妙的措施”。（见本卷第 193 页）恩格斯指出，俄国人采用把火炮层层排列的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形的优越条

件。他指出，俄国人顺利的出击是他们整个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手段，在出击中，他们“以固有的顽强精神很巧妙地”作战。（见本卷第172页）最后恩格斯得出结论说，“整个这一防御的组织堪称典范”。（见本卷第194页）

这些评价表明恩格斯充分估计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英雄气概和军事艺术，表明他在评述军事事件时善于找到客观的标准，虽然他掌握的甚至只是英法新闻报道中关于军事行动进程的片面的、往往大受歪曲的消息，而当时对这些报道，他又往往无法去核实。后来经过更详细更全面的研究，恩格斯又多次地谈到英勇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经验，把这次防御战看成是积极防御的杰出榜样，看成是保卫者的军事技艺和英雄气概的典范（参看恩格斯专门论述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文章以及他在普法战争时期所写的“战争简评”）。

反映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对军事发展的研究的是收入本卷的他的一部总结性著作——“欧洲军队”。这一著作，像军事评论一样表明恩格斯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专家，是精通军事历史和当时各国武装力量的状况的人。在这一著作中，他详细地评述了欧洲各国的军队，说明了每个国家军队和它的组织、编制、训练制度、官兵的战斗素质的特点。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在各国军队发展中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意义，同时强调指出，军事技术的普遍进步和军事方面的改善使得每个国家的军队必须考虑并利用所有其他国家军队的经验。恩格斯批判了统治阶级的军事历史著作所特有的唯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其中包括流行的关于某国军队永远不可战胜的“理论”。在恩格斯的整部著作中贯串着一条极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即某个国家军队的状况和战斗力首先决

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个原理，后来他在“反杜林论”一书里作了详尽的发挥。例如，恩格斯在说明普鲁士军队时指出，由于普鲁士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编制原则和先进的对全体能够服兵役的居民进行短期军事训练的原则没有彻底实行，而且这些原则由于统治集团渴望“有一支驯服可靠的军队，在必要时可以用来镇压国内的骚乱”（见本卷第 497 页）而被歪曲了。恩格斯指出，实行民族压迫和煽动民族仇视是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些现象也反映在奥地利的军队中，并且对奥地利军队的战斗力发生了不良的影响。恩格斯在“土耳其军队”一节里指出，土耳其落后的封建制度、帕沙们的横行霸道和舞弊分子阻碍了必要的军事改革。恩格斯指出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中也有封建残余的影响。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以及在“俄国军队”的专论中，在描述当时俄国军队的状况时指出，俄国军队的落后的技术、陈旧的编制方法和军队训练方法，“阅兵式教练”和盗窃公款等的风行，都是沙皇俄国经济落后、封建农奴制关系的统治、反动的政治制度的结果。恩格斯同时强调指出了俄国兵士的高度战斗素质，“射死”他们“比迫使他们退却要容易一些”。（见本卷第 510 页）

但是应当估计到，恩格斯在描述农奴制俄国的军队的落后状况时有某些夸大的地方。因此，关于俄国兵士似乎总是消极被动、俄国军队中外国人起了特殊作用、俄军中极少有才能的人以及在相同条件下似乎俄国人总是被西欧军队打败的说法，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恩格斯所以产生这些不准确的说法（他在较后的著作“波河和莱茵河”以及其他著作中作了某些修正），是因为他根据了西欧军事史学家对俄国过去的军事情况所作的歪曲论述，而

当时，由于没有别的史料根据，恩格斯只能从这些军事学家的著作中寻找史实材料。恩格斯在论文中反对作为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的俄国沙皇制度的这种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俄国军队的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实质上已成定局的时候所写的“英法对俄战争”、“欧洲战争”等等一些文章中，对克里木战争作了一些总结。“英法对俄战争毫无疑问将作为‘不可理解的战争’而载入战史。言语夸大而行动却微不足道；准备的规模巨大而成果却小得可怜……将军们出奇地平庸而军队却出奇地勇敢……这是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合逻辑的现象的交错。而所有这一切是俄军的特点，正像是他们的敌人的特点一样。”（见本卷第 555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克里木战争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愿望，即把这一战争变为争取民主的和革命的原则的战争，并没有使欧洲实行根本改革，使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垮台。此外，它也没有解决欧洲各国在东方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马克思在上面提到的“卡尔斯的陷落”一文中谈到参战各国在巴黎举行的和平谈判时认为，巴黎的和平谈判是假谈判，而巴黎和约则是暂时的条约。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着重指出，克里木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巴黎和约不仅不意味着争端得到调解，而且一开始就表明欧洲列强之间孕育着新的、更尖锐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指出：克里木战争并没有使欧洲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根本改变，但是认为这次战争对许多国家的内部发展包括对俄国的发展有所影响。例如，1871 年马克思重新评价克里木战争时，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初稿中写了下面一段话：“虽然俄国通过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或许挽回了自己的荣誉并通过

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使外国人迷惑不清,但是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以后(这次失败暴露了俄国国内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性),俄国政府仍然解放了农奴,改革了整个行政制度和审判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8)卷第281页)马克思看出了沙皇政府本身为了避免来自下面的革命而被迫从上面即从沙皇宝座上实行的改革是和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受的失败相联系的,弗·伊·列宁后来深刻而全面地阐明了这种联系,他写道:“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03页)

* * *

本卷包括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36篇文章。185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文章同时在“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在把这些文章收入本卷时,我们主要是采用较为完整的和报纸编辑部改动较少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在注释中就注明未收入本卷的不同版本。两种版本间有些出入的地方我们就用脚注表明。本版中有些文章在全集第一版中未曾发表(这些文章同样在篇末注明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版本变动的地方则在注释中予以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文章的两种版本都收入本卷,因为这两种版本都有其独立的意义,这一点是和全集第一版不同的。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所未收入的不同版本的文章共10篇。第一版中发表的“战争的总结”和“欧洲的和平”两篇文章,因为没有充分根据证明其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没有收入本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书信中一再指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改动他们文章的原稿。编辑部力图使恩格斯所写的许多通讯,特别是军事评论成为在纽约写的文章,因此它常常

增添一些字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还作了补充；本版中对于编辑部改动过的地方都在有关句子的注释中予以注明。

在研究本卷各篇文章所引用的具体的历史材料时，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当时事件的很大一部分文章中，能够利用的材料主要是资产阶级报刊——“泰晤士报”、“总汇通报”、“经济学家”杂志等等的报道。他们通常是从这里取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作战双方军队的数量、财政贸易的状况等消息的。在某些场合下，这些消息同后来经过研究所确定的事实是有出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和其他机关报上原文中专有名词、地名、数字、日期等等印错的地方，经过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利用的资料核对以及把文章的几种版本加以比较后都更正过来了。

本版和全集第一版不同的地方是第一版中编者把某些文章按题目性质编在一起，而本版则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文章按照当时在报上发表的形式刊印。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加的文章标题，都在标题前面加一星花。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 · 马克思

和

弗 · 恩格斯

1855年1月—1856年4月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议会常会开幕¹

伦敦 1 月 24 日。议会常会于昨日复会²。埃伦伯勒伯爵在上院宣称，下星期四，2 月 1 日，他将建议向议会提交一份关于派往克里木的军队（步兵、骑兵和水兵）人数以及伤亡、病号和一般离队人员的数目的官方材料。里士满公爵质问陆军大臣说，为什么在颁发奖章时不发给曾在巴拉克拉瓦作战³的人。不仅巴拉克拉瓦会战的参加者，而且所有驻在黑海的水兵，甚至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都应当得到奖章——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就这样吃掉了里士满公爵的一张牌。里士满公爵为了反驳这种说法，便与埃伦伯勒伯爵和哈德威克一起利用了亚当·斯密的旧论点：“奢侈品”的价值，因此也包括奖章的价值同其数量成反比例。经过大约半小时非常激烈的争辩，贵族们就走散了。

下院的会议厅挤满了人。但是与会者的希望没有实现。迪斯累里缺席，发言的是本杰明·霍尔爵士。会议在 3 点 3 刻开始，还不到 6 点就结束了。罗马元老院接到在坎纳吃了败仗⁴的消息时所表现的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通常使人感到吃惊。但是英国 *commoners*（下院议员）现在已胜过了罗马 *patres conscripti*（元

老)。仅看他们的脸色决不会相信英国的军队在克里木复灭。看来，克里木军队的卫生状况促使本杰明·霍尔爵士提出关于改善英国卫生警察组织的两个法案。本杰明·霍尔爵士是一个像威廉·摩耳斯沃思、奥斯本之流的那种所谓激进派分子。这帮先生的激进主义表现在他们为自己谋求内阁职位，虽然他们不是寡头政治家，也不具有平民的才能。但是单是他们进入内阁，就已经是一个激进的事实。他们的朋友这样说道。因此，当 1854 年夏季霍乱在英国十分猖獗，在这以前一直受内务大臣帕麦斯顿监督的“保健委员会”像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里的医务部门一样显得束手无策的时候，联合内阁认为设置一个新的内阁职位——保健委员会主席这个独立的职位——并用吸收“激进的”本杰明·霍尔爵士参加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时机到来了。于是本杰明·霍尔爵士就成了保健大臣。虽然在“官报”上报道他上任的消息之后霍乱在伦敦并没有绝迹，但是曾经在“笨拙”杂志⁵上嘲笑过联合内阁和俄国沙皇的一个叫泰勒的人却在这本杂志上消失了。本杰明·霍尔爵士任命他为保健委员会秘书，薪俸 1000 英镑。作为激进派的本杰明·霍尔爵士认为进行激进治疗比较好。关于他的法案的优点，等法案提出来以后我们还来得及谈。而昨天法案只是为他作为大臣 *entrée*（进入）下院提供了理由。

关于累亚德的质问，

“内阁是否同意向议院提交在 1854 年 12 月 2 日的条约问题上与外国的通信，特别是英法方面转交给俄国政府的不是为了进行谈判而是为了要它接受的某些有关说明四项条款的文件”，

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他不知道是否可以把所质问的某些文件提交议院。这不符合议会的惯例。至于谈到有关四项条款⁶的谈判

经过，他可以向自己值得尊敬的朋友概述如下：11月底，俄国通过哥尔查科夫通知说，俄国愿意接受所谓的四项条款；后来紧接着缔结了12月2日的条约⁷；此后，12月28日，哥尔查科夫同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大使在维也纳会晤。法国大使代表盟国宣读了说明四项条款的文件。这一说明也应当被认为是谈判的基础。在第三项条款中提出要结束俄国在黑海的优势地位。哥尔查科夫不同意这种解释，但说准备请示自己的政府。10天后，哥尔查科夫通知布奥尔伯爵说，他已接到有关的指示。1月7日或8日，在奥地利外交大臣的办公室又举行了会晤。哥尔查科夫宣读了阐明他的政府的观点的备忘录。布奥尔伯爵、威斯特摩兰勋爵和布尔克奈男爵宣称，他们没有被授权接受备忘录。谈判的出发点应当是同意对四项条款所作的说明。这时哥尔查科夫便收起备忘录，同意把这一说明作为谈判的基础。罗素补充说，俄国虽然接受了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以条文正式确定下来以后（现在它的条文是初步的），对它的“每一项条款”保留有提出异议的权利。英国政府宣称，它打算在上述基础上参加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授予它的大使谈判的全权”。后面这句话也就是罗素告诉《commoners》（“下院议员”）的唯一新闻。

会议上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罗巴克提出以下声明：

“下星期四，他将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查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军队的人数和状况，以及调查负责满足军队需要的政府各部门的活动。”

“泰晤士报”⁸“恳求”罗巴克“大声疾呼，不要有任何顾惜”。“泰晤士报”的央求和罗巴克先生的往事都使人们认为，他会大叫大嚷，或者确切些说，他将说丧气话，以便妨碍别人议论。据我

们所知，乌利斯从来没有利用过瑟息替斯；但是同乌利斯一样机灵的辉格党人却在利用罗巴克。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1 月 27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45 号

卡·马克思 论内阁的危机

伦敦 1 月 26 日。当苏丹梅利克—沙赫的急使到阿拉木特要求哈桑—卡—萨巴赫投降的时候，“山上来的长老”吩咐一个殉道派教徒⁹自杀以代替回答。这个青年立即用匕首刺入自己的胸膛，倒在石板地上咽了气。联合内阁的“长老”^①也要求约翰·罗素勋爵为他牺牲，在下院自杀。但是罗素这位老牌的议会仁人君子，在他解释“爱别人如爱自己”这一戒条时，总是说这意味着“人莫不先爱其身”，因而他宁愿杀死“长老”本人。罗巴克没有使我们失望。他按照同罗素的协议提出了自己的提案，以便在联合内阁垮台时保全内阁的“精华”——辉格党人。

果真如此！罗巴克的提案并不是反对整个内阁，而是反对直接负责进行战争的那些“主管部门”，也就是反对皮尔派¹⁰。此外，罗素在议会开幕时的声明显然决不是偶然的，他说：谈判的基础完全不是基础，因为俄国保持了对四项条款中的每一项提出异议的权利；谈判实质上不成其为谈判，因为英国内阁尚未授权任何人去进行谈判。罗巴克一提出关于自己的提案的声明（这是在星期二），罗素当天晚上就写信给“长老”说，这个提案的目的是表示不信任军事主管部门（皮尔派），因此他不得不递交辞呈。阿伯丁前往温莎城

^① 阿伯丁。——编者注

堡去觐见女王，劝她接受辞呈，结果事情也就这样办了。“长老”的勇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明显，帕麦斯顿没有呈请辞职。

下院在星期四的会议上知道了这些重要的事件。下院把会议推迟到今晚举行，罗巴克也把自己的提案推迟到今晚提出讨论。所有的下院议员都奔到上院去，因为阿伯丁将在那里作解释。但是阿伯丁非常狡猾，又借口到温莎去了而没有出席会议，纽卡斯尔公爵则在上院重复帕麦斯顿在下院说的那一套不可相信的话。这时候，下院的辉格党议员在上院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被识破并且后退的路也被切断了，他们非常惊惶。托利党人决没有靠牺牲皮尔派来重新保证辉格党人旧有的“不列颠帝国天生的包税者”的特权的热望。他们怂恿林德赫斯特勋爵提出一项提案，这项提案与罗巴克的提案不同，即不是反对个别的部，而是反对整个政府，不是像罗巴克那样仅仅指责一番，而是直接把政府置于被告的地位。林德赫斯特声明的原话是这样的：

“2月2日，星期五，我将提出一项提案，提案将说明：下院认为，克里木远征是女王陛下各部大臣在极端缺乏物资、对可能遭到的敌人反抗的性质和力量的问题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和充分的研究的情况下进行的，政府在指导战局上所表现的失职和无能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

用不着怀疑，林德赫斯特的提案反对辉格党人的程度，就像罗巴克的提案反对阿伯丁的拥护者的程度一样。顺便提一下：约翰·罗素勋爵通过海特尔告诉下院，一有机会（也就是在今晚），他将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无所指望的人也就不会失望”。¹¹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26日
载于1855年1月29日
“新奥得报”第4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议会状况

伦敦 1 月 27 日。昨天下院会议的风貌和基调使人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的英国议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在会议开始前，约摸下午 4 点，会议厅挤得满满的，因为大家都在等着看一个丑恶的场面——罗素勋爵解释他辞职的原因。但是当私人性质的辩论刚一结束、开始对问题的实质——罗巴克的提案进行辩论的时候，激愤的爱国者都匆匆忙忙地去吃饭了；会议厅空下来了，有些地方发出了喊声：“表决！表决！”开始了令人难受的间歇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长到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站起来对代表的空席位作冗长的、详细的报告时为止。随后，吃饱了的议员们一个个慢吞吞地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在晚上 9 点半左右累亚德开始讲说，到会的约有 150 名议员；在他结束讲话时，大约在会议结束前一小时，会议厅又挤满了人。但是会议快结束时却又很像是议会的午休时间。

约翰·罗素勋爵的全部优点在于维持了议会策略的老规矩这一点上，他讲话时不是像在这种场合下通常所做的那样，站在议长席上，而是站在大臣席后面的第三排上即坐着不满意的辉格党人的那一排座位上。他用低沉的、嘶哑的声音说话，语调拖得很长，像平时一样，英语发音很蹩脚，并且常常严重地违反句法规则。（顺便

说说，决不能把报上发表的讲演稿同口头讲话混淆起来。)一般的演说家是用漂亮的叙述形式来掩饰糟糕的内容，罗素却试图用恶劣的叙述来抵补糟糕的内容。他似乎用自己说话的方式来请求别人原谅他所说的话。

而事实上确实有请人原谅的地方！据说上星期一他还没有想到要辞职，而在星期二，当罗巴克一提出关于自己的提案的声明时，他就认为辞职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使人想起那种丝毫不反对撒谎而当谎言被戳穿时良心才发现了的奴才。他说，他能够根据什么理由来反对下院领袖的职责要求于他的那种由议会进行调查的提案！难道是以祸害并未大到非要求调查不可的地步作为理由吗？但是议会否认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军队的悲惨处境呢？这种处境不单是痛苦的，而且是可怕的、不堪忍受的。莫非他应当使议会确信，议会调查委员会是没有用的，因为为了消灭祸害已经采用了各种最好的办法？这里，罗素碰到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他不仅是内阁的成员，而且 Privy Council (枢密院) 院长，他要对采取这些措施直接负责。罗素承认，他曾同意委任纽卡斯尔公爵为陆军“首席”大臣。他不能否认，最晚在 8、9 月必须采取供应军队粮食、军服以及医疗方面的措施。根据罗素自己承认的，他在如此紧急的时期做了些什么呢？他跑遍全国，在《literary institutions》(“文学协会”)发表无关紧要的演说，并且从事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的通信集¹²的出版工作。当他在英国游历时，阿伯丁在苏格兰游历，内阁从 8 月到 10 月 17 日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在这次内阁会议上，用约翰勋爵自己的话来说，他没有提出任何值得议会注意的东西。此后，约翰勋爵又思考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 11 月 27 日寄给阿伯丁一封信，建议把陆军大臣的职务同 secretary at war (军务大臣)

的职务合并，并且让帕麦斯顿勋爵去担任这两个职务，换句话说，就是免去纽卡斯尔公爵的职务。阿伯丁没有接受这个建议。11月28日，罗素又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给阿伯丁。阿伯丁于11月30日具有充分根据地回答他说，他的整个建议的目的仅仅在于以一个人代替另一个人，以帕麦斯顿代替纽卡斯尔公爵。其实当殖民部同陆军部分开时，罗素曾欣然建议把后者交给纽卡斯尔公爵，以便把自己辉格党的一名成员——乔治·格雷爵士安插到殖民部去。后来，阿伯丁私下问罗素是否打算向内阁提出自己的建议。罗素放弃了这个念头，用他的话说，为的是“不搞垮内阁”。可见首要的是内阁，其次才是克里木的军队。

罗素承认没有采取任何消除祸害的措施。军事管理机关的一切改革只限于使军需部隶属于陆军部。不仅如此，罗素虽然没有采取任何改善状况的措施，但是他还是满不在乎地呆在内阁里，而且从1854年11月30日到1855年1月20日再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在上星期六这一天，阿伯丁转给罗素一些关于改革军事管理机关的建议，但是罗素认为这些建议是不够完备的，因此用书面形式提出了自己的响应建议。仅仅过了三天，他认为必须呈请辞职，因为罗巴克发表了声明，而罗素不打算同他在其中任职并且直接参与其事的内阁分担责任。罗素解释说，他听说阿伯丁无论如何不愿任命帕麦斯顿为陆军部独揽大权的人，既然如此，他，库尔威乌斯只能庆幸自己不是白白地离开内阁和投到反对派的深渊里去。这样，我们的约翰勋爵就愈来愈往下滚，把他能够提出来为自己的辞职辩护的最后一个借口也推翻了，他说：（1）战争的前途根本不是引起盛行的绝望情绪的理由；（2）阿伯丁是伟大的首相，克拉伦登是伟大的外交家，格莱斯顿是伟大的财政家；

(3) 辉格党不是由追求名位者而是由爱国的幻想家组成的，最后，他罗素在表决罗巴克的提案时弃权，虽然他退出内阁似乎是因为一个爱国者**丝毫**不能反对这个提案。罗素发言时态度冷淡，而听众对他的发言则更冷淡。

帕麦斯顿代表内阁发言。他的地位很尴尬。库尔威乌斯—罗素辞职是因为阿伯丁不想任命帕麦斯顿为军事独裁者。布鲁土斯—帕麦斯顿猛烈攻击罗素，说他在危急关头离开了阿伯丁。在这种尴尬的地位上，帕麦斯顿却感到很舒服。他利用它来引人发笑，把严肃的局面变成一幕闹剧，像他通常在紧急关头所做的那样。当帕麦斯顿指责罗素，说他在12月还没有作出自己英勇的决定的时候，迪斯累里——他至少没有掩饰住因威尼斯宪法破产而引起的喜悦，——大声笑了起来，而擅长于摆出一副严肃面孔的格莱斯顿大约在暗自念皮由兹教派¹³的祈祷文以免哈哈大笑出来。帕麦斯顿声称，通过罗巴克的提案就意味着内阁倒台。如果提案被否决，那内阁将讨论它本身的改组问题（其中也包括让帕麦斯顿独揽大权的问题）。

帕麦斯顿真是一位伟大的魔术师！他一只脚虽已跨进棺材，但仍能使英国相信他是一个 homo novus（新人），他的官运还刚刚开始！这个在20年内担任军务大臣的职务，并在这个职位上仅仅以一贯维护体罚和出卖军队中的官衔¹⁴著名的人，现在居然能伪装成单靠他的名字就足以消灭整个制度的缺点的人！在所有的英国大臣当中，他是唯一在议会中屡次被揭露（特别是在1848年）为俄国代理人的人，他居然能伪装成靠自己一个人就能使英国同俄国作战的人，帕麦斯顿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对罗巴克的提案的辩论改到星期一晚间会议上进行，关于这

个问题留待下次再谈。这个提案写得如此巧妙，连内阁的反对者都宣称将投票赞成它，虽然他们认为它是荒谬的，而内阁的拥护者则打算赞成这项提案，虽然他们将投票反对。上院的会议没有令人感到特别的兴趣。阿伯丁对罗素的声明没有作任何补充，除了对下面这一点表示惊讶：罗素使整个内阁大吃一惊。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 月 2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1 月 30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49 号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¹⁵

随着新的维也纳会议¹⁶开幕日期的接近，俄国方面作出某些让步的希望已日益暗淡，而且是极端靠不住了。沙皇出色的外交 coup (步骤) 的辉煌胜利——迅速同意所提出的谈判基础——使他至少在最近时期处于很有利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沙皇已同意和谈建议，但实质上他在目前同意调解的唯一现实基础是维持 status quo (现状)。沙皇以接受四项条款¹⁷的手段重新使奥地利处于十分摇摆的地位，同时继续控制普鲁士，并且还赢得了时间，以便在军事行动开始前把所有的预备部队和新编的部队调往边境。

同意谈判这件事本身，就使沙皇能够从俄国在奥地利边境的监视军中，立即抽调出他在两个月或十周内可以补充上的这样数量的部队，即至少 6—8 万人。由于原来的整个多瑙河军团作为一个军团而论已不存在，——第四军从 10 月底起调到了克里木，第三军在 12 月底也到了那里，而第五军的剩余部分连同骑兵和预备部队正在开赴克里木——为了替换这些部队，就必须从驻在波兰、沃伦和波多利亚的西方军团中抽出生力军，将它们配置在布格河和德涅斯特尔河地区。可见，如果战争转移到大陆中部，那末两

三个月的时间对俄国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在俄军在卡利希到伊兹马伊耳的一线上拉得太长，没有增援部队便不能继续与数量日渐增加的奥军相对峙。现在俄国赢得了这段时间，下面我们将说明俄国的军事准备目前正处于什么阶段。

俄国军队的组织情况我们以前已经作了概述¹⁸。用于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庞大的作战部队，最初是由 6 个基干军（每军有 48 个营）、精锐部队 2 个军（每军有 36 个营）以及相当多的正规骑兵、非正规骑兵和炮兵组成的。我们以前曾经报道过，沙皇政府不仅召集预备兵员，在精锐部队中编成第四、第五、第六营和在其余 6 个基干军中编成第五、第六营，而且还利用新兵在每个团内编成第七、第八营。这样，6 个基干军内营的总数就增加了一倍，而精锐部队（近卫军和掷弹兵）内营的总数则增加了一倍多。现在俄国军队的数量大致如下：

近卫军和掷弹兵(按每团的前 4 个营计算)	共 96 个营, 每营 900 人, 共 86400 人
近卫军和掷弹兵(按每团的后 4 个营计算)	共 96 个营, 每营 700 人, 共 67200 人
第一、第二军(尚未参加战斗, 按每团的前 4 个营即基干营计算)	共 96 个营, 每营 900 人, 共 86400 人
第一、第二军(按每团的后 4 个营计算)	共 96 个营, 每营 700 人, 共 67200 人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按基干营计算)	共 192 个营, 每营 500 人, 共 96000 人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按每团的后 4 个营计算)	共 192 个营, 每营 700 人, 共 134400 人
芬兰军	共 16 个营, 每营 900 人, 共 14400 人
合 计.....	784 个营 552000 人
另有: 正规骑兵	80000 人
非正规骑兵	46000 人
炮兵	80000 人
总 计	758000 人

我们列举的数字中有些可能使人觉得过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尽管俄军遭受损失，但是受到损失的只是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的 96 个基干营，所以自战争开始以来所征召的大量新兵仍应使军队的人数更大于这个数字，但新兵在开往自己团队途中常常大量死亡，因此我们打了折扣。此外，骑兵的计算数字是大大压缩了的。

上述数字中有 8000 人（第五军的 1 个师）驻高加索，这部分军队应当除外，因为这里我们不谈用于欧洲地区以外的军队。其余 75 万人的配置情况大致如下：驻波罗的海沿岸的是西韦尔斯将军指挥的波罗的海军团，由芬兰军以及近卫军、掷弹兵和第六军的预备部队组成，连同骑兵和炮兵共约 135000 人，其中一部分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和仓卒编成的营。驻波兰和加里西亚边境自卡利希至卡麦涅茨一线的是近卫军、掷弹兵、第一军、第六军 1 个师以及掷弹兵和第一军的部分预备部队，连同骑兵和炮兵共约 235000 人，这是俄国武装力量的精华，它由精锐部队和优良的预备部队编成。在贝萨拉比亚以及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有第二军的 2 个师和它们的部分预备部队，总共约 6 万人。这些部队本属西方军团，但自多瑙河军团开往克里木后，就被调往多瑙河军团的原来驻地。现在，他们同驻多瑙河各公国的奥军对峙，由帕纽亭将军指挥。用于防守克里木的是已开到的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 1 个师、第六军 2 个师、部分预备部队以及尚在途中的第二、第五军的各 1 个师；这些部队连同骑兵和炮兵总共 17 万人，由缅施科夫指挥。其余的预备部队和新编部队，其中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军的这些部队，现在正由切奥达也夫将军组成一个庞大的预备军团；这个军团集中在俄国内地，共约 15 万

人。至于这个军团的哪一部分正开赴波兰或南方，自然无法说出。

这样算来，尼古拉皇帝在其帝国西部自芬兰起到克里木止的边境上，去年夏季有不到 50 万人，而现在已有 60 万人，另外还有在内地编成的为数 15 万人的预备军团。尽管如此，同奥地利相比，它现有兵力仍比过去的少。去年 8、9 月间，在波兰和波多利亚的俄军为 27 万人，而且在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地区还驻有约 8 万人的多瑙河军团，这个军团驻在那里主要是防范奥地利人。因此，当时可以动用 35 万人的军队对付奥地利。现在，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里仅有沿奥地利前哨线配置的 295000 人，而对峙的奥军却已有 32 万人，而且奥军还可以把驻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 7—8 万人调来支援。现在，俄军在数量上处于相对劣势，而且没有把握指望援军在这种季节能及时地由贪污成风的本国内地开到，这些原因就足以使俄国政府要力求赢得更多的时间。敌人数量上的优势阻碍着俄军采取进攻行动，这意味着在波兰境内的开阔地形上、在两军之间又无大江河的这种条件下作战时，俄军只要一与敌人接触，就只好向可以扼守的阵地退却。这时俄军就可能被割裂为两部分，一部分退向华沙，另一部分退向基辅，而且这两部分之间还隔着不能通行的、起于布格河（不是南布格河，而是维斯拉河支流）止于德涅泊河的波列西耶沼泽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量的俄国兵没有被赶进沼泽地带，那真是俄军破例的、在这种场合下罕见的成功。这样一来，甚至不得不放弃波兰南部的大部分、沃伦、波多利亚和贝萨拉比亚，也就是从华沙到基辅和赫尔松的整片土地。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俄军在数量上占优势，那末它在奥军冒险进行决战之前，也能同样容易地把奥军赶出加里西亚和莫尔达维亚，并占领去匈牙利的通路；其

结果是不难想像的。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这种战争中，首次进攻的胜利，确实对任何一方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交战双方都将竭尽全力，以求最先在对方的领土上站住脚。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奥地利不同俄国交战，现在的战争，从军事学术的观点来看，便不会像所有的欧洲战争那样引人注意。甚至克里木的战事也不过是一场小范围的大战争而已。俄军的不可思议的长途行军以及联军所遭到的灾难，到目前已使双方军队减员，以致使他们不能进行一次真正大规模的会战。如果交战双方都只使用 15000—25000 人，那还称得上什么会战！在赫尔松涅斯与巴赫契萨赖之间的小块土地上，又能够进行什么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战略行动！甚至在这里，不论进行过什么样的会战，兵士的数量都少得无法占据整个战线。所以，引人注意的，与其说是正在进行的事情，倒不如说是还没有进行的事情。而在其他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具有历史意义，只不过是趣闻而已。

如果目前在加里西亚边境上对峙的两支大军都行动起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指挥官的意图和能力如何，大量军队的本身，再加上地形性质，将使有名无实的战争和优柔寡断的现象不再存在。迅速集中，强行军，军事智谋，大量兵力对敌人翼侧的迂回，作战基地和作战方向的变换，简单地说，符合真正军事学术原则的大规模的机动和会战，这时就成为完全必要和理所当然的了。在这种条件下，根据政治上的理由行事的或行动不够果断的统帅，不可避免地会葬送自己的军队。在这种地形上展开的这样规模的战争，将立刻具有严重的和认真的性质。正因为如此，俄奥战争一旦爆发，就将成为 1815 年以来最令人注意的事件之一。

至于缔结和约的前途，目前已不如数星期前那么明确了。如

果同盟国愿意在基本上维持 status quo (现状) 的条件下结束斗争, 那末战争就可能停止。但读者不需要解释便可明白, 这种希望是多么微小。事实上, 在目前情况下, 当俄国能得到半个德国至少在精神上的支援, 并且它已动员了如前面所说的大量兵力的时候, 它未必肯接受法国和英国可能向它提出的或为英法所能够同意的条件。俄国从彼得大帝时起到阿德里安堡和约¹⁹时止缔结了几乎一连串的有利的和约, 现在, 当塞瓦斯托波尔还没有陷落, 俄军还只动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的时候, 想要它缔结意味着放弃黑海霸权的和约, 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如果说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命运和联军远征的前途尚未最后明确以前和约不可能签订, 那末当克里木战局的胜负决定后, 就更不可能签订了。如果塞瓦斯托波尔陷落, 或者联军被击败并被赶入海中, 那末, 俄国的荣誉, 或者同盟国的荣誉都不允许它们在没有取得更重大的战果之前签订和约。如果在会议准备期间订立停战协定, ——我们在得知沙皇接受四项条款时, 曾推测有这种可能, ——那末还有根据期望和平; 而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却不得不设想, 可能性更大得多的是发生大规模的欧洲战争。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 月 29 日
左右

作为社编载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1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议会新闻。——战区消息

伦敦 1 月 29 日。今天的英国报纸证实了我们对英国议会的判断。

“晨报”²⁰说：“英国议会又开会了，并且第一个晚上就在一阵笑声中散了会，这种笑声比痴子对着自己父亲的棺材开的玩笑还令人作呕。”

“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指出：

“当然，只有少数人在读过星期五举行的会议的报道后才能够克服阴暗的情绪。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能发现这种情绪是由这样的看法引起的，即认为我们的在非常情况下为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而召开的立法会议宁愿谈些次要的问题而不愿谈极重要的事情，并且把本来应当完全用来讨论我军在克里木的悲惨处境的时间都浪费在涉及个人利益或狭隘党派利益的问题上。”

根据这种情况，“泰晤士报”建议任命帕麦斯顿为首相，因为担任陆军大臣，他是“太老”了。这家报纸建议进行克里木远征，而它为远征所选择的季节和使用的兵力，据英国的最大的军事评论家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证明，几乎担保远征失败。

谈到星期五举行的会议的特点，还可以作一点补充。虽然早就患慢性病的罗巴克在开始发言 10 分钟以后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发言而直截了当地谈自己的提案，但是他还是有充分的时间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派到东方去的是一支总共有 54000 人的装

备精良的部队；现在只剩下 14000 人了；所差的这 4 万人到哪里去了呢？英国虔诚派和论著派²¹的伟大的保护人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又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说，制度不合适。但是几个月以前，当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的时候，是谁反对对这个制度进行任何根本的改革的呢？是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悉尼·赫伯特不仅拿“制度”当救命符，而且还责备旅长和团长毫不中用。但是熟悉这个制度的人都知道，这些指挥官同管理制度毫不相干，因而同坏的管理制度也毫不相干。大家都认为成了这种制度的牺牲品的是一支模范的军队。但是虔诚的赫伯特觉得，他还没有完全把别人的罪过说出来。据他说，英国兵士不灵活，不机智。虽然他们很勇敢，但是很愚蠢。

“他们打起来是好汉，
但在动脑筋上是笨蛋。”^①

而他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是未经公认的天才。赫伯特的说教使德拉蒙德这个怪人激动起来，并促使他提出是否到了暂时停止宪法生效和任命英国独裁者的时候的问题，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最后，辉格党的前大臣维农·史密斯用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说明了普遍的混乱状态，他说，他不知道提案人要求什么，也不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不知道新内阁是否已经组成，旧内阁是否存在过，因此他不打算投票赞成提案。但是，“泰晤士报”认为，今晚提案将被通过。大家知道，1810年1月26日，波尔切斯特勋爵的关于成立伐耳赫伦乌远征²²调查委员会的提案曾经遭到英国议会的反对。1855年1月26日又看到了类似的反对情况。

^① 引自歌德“名诗选”。句子换了说法。——编者注

但是，1810年1月29日通过了提案，而英国成了一个有历史先例可援的国家。

俄国单是同意和平谈判，就足以使它有可能从驻在奥国边境的监视军中调走在2个月或10星期内可以重新补充上的这样数量的部队，即至少6—8万人。现在我们知道，原来的整个多瑙河军团（俄国的）作为一个军团而论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第四军从10月底起就已经在克里木，第三军在12月底也到了那里，而第五军的剩余部分连同骑兵和预备部队正在开赴克里木。在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一带应该由西方军团（驻扎在波兰、沃伦和波多利亚）中的部队接替的这些军队所进行的新的部署，以及第二军和骑兵预备部队的一部分也在向克里木进发这一事实，其本身就足以说明——不问一切其他外交上的考虑如何——为什么俄国一分钟也不迟疑就又同意在所谓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两三个月的时间对俄国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俄军在卡利希到伊兹马伊耳的一线上拉得太长，没有增援部队便不能继续与数量日渐增加的奥军相对峙。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证明这一点，我们引用以下关于用在欧洲南部和西部战场上的庞大的俄国作战军队的人数和布防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极可靠的地方搜集来的，与其说它们对俄国兵力估计不足，倒不如说对它估计过高。这支军队起初有：6个基干军，每军有48个营；精锐部队（近卫军和掷弹兵）2个军，每军有36个营；相当多的骑兵（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和炮兵。后来俄国政府召集了预备兵员，编成了精锐部队的第四、第五和第六营，以及其他基干军的第五和第六营。此后，它又通过招募新兵的办法，为每团增加了第七和第八营，这样一来，基干军的营的数目就增加了一倍，而精锐部队的营的数目则增加了一倍多。

这些武装力量的人数大致如下：**近卫军和掷弹兵**——每团的前4个营，共96个营，每营900人，共86400人；每团的后4个营，共96个营，每营700人，共67200人；**第一和第二军**（尚未参加战斗）——每团的前4个营，共96个营，每营900人，共86400人；每团的后4个营，共96个营，每营700人，共67200人；**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每团的前4个营，共192个营，每营500人，共96000人；每团的后4个营，共192个营，每营700人，共134400人；**芬兰军**——14400人。合计784个营，552000人；**骑兵**（正规的）——80000人，**骑兵**（非正规的）——46000人；**炮兵**——80000人。总计758000人。到目前为止，只有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的96个基干营有伤亡。

除了驻在高加索的第五军第一师以外，还剩下75万人，现在他们是这样布置的：驻波罗的海沿岸的是西韦尔斯将军指挥的波罗的海军团，由芬兰军以及近卫军、掷弹兵和第六军的预备部队组成；连同骑兵等等，共约135000人，其中一部分是由未经训练的新兵和仓卒编成的营组成的。驻波兰和加里西亚边境自卡利希到卡麦涅茨一线的是近卫军、掷弹兵、第一军、第六军第二师，以及掷弹兵和第一军的部分预备部队，连同骑兵和炮兵共约235000人。俄国军队的这支精锐部队由哥尔查科夫指挥。在贝萨拉比亚以及在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有第二军的2个师和它们的部分预备部队，总共约6万人。这些部队本属西方军团，但自多瑙河军团开往克里木后，就被调到多瑙河军团的原来驻地。现在，他们同驻多瑙河各公国的奥军对峙，由帕纽亭将军指挥。用于防守克里木的是第三和第四军、第六军的2个师和预备部队以及在途中的第二和第五军的各1个师，连同骑兵总共17万人，由緬

施科夫指挥。其余的预备部队和新成立的营（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军的）正由切奥达也夫将军重新组成一个庞大的预备军团。这个军团集中在俄国内地，共约 15 万人。至于这个军团的哪一部分正开赴波兰或南方，还不清楚。

这样算来，去年夏末，在从芬兰到克里木的西部边境上的俄国军队还不到 50 万人，现在在那里的俄军除了 15 万人的预备军团外，还有 60 万人。尽管如此，同奥地利相比，俄国现在还是比过去削弱了。在 8、9 月那个时候，在波兰和波多尼亚驻有俄军 27 万人，而在普鲁特河、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一带则驻有俄军约 8 万人——加在一起是一支 35 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可以动用来对付奥地利。现在那里只有 295000 人，而奥地利则直接派出了 32 万人来对付他们，而且它还可以把驻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 7—8 万人调来支援。因此，俄国目前没有能力采取进攻行动，这意味着在波兰境内的开阔地形上、在两军之间又无大江河这种条件下，俄国部队将被迫退到可以扼守的阵地上去。如果奥地利现在开始进攻，那末俄国军队将被切成两部分，一部分只得向华沙撤退，另一部分只得向基辅撤退，而且这两部分之间还隔着不能通行的、起于布格河止于德涅泊河的波列西耶沼泽地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目前赢得时间对俄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俄国有那些“外交上的考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 月 29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1 日

“新奥得报”第 5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上一届英国政府²³

在谈到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我们以为，这届政府的寿命是不长的，前途是不太光明的）上台执政的时候，简单地谈一谈上一届政府的历史，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很难讲，在将来进行历史研究时，这届政府历史中的哪一点将受到特别注意：是它的原有的野心呢，还是它所参加的一些事件的重要性；是它的极端无能呢，还是伴随着它的倒台而来的耻辱。

应当记住，阿伯丁勋爵及其联合内阁是在 1852 年 12 月 16 日的表决推翻了得比政府以后上台执政的。迪斯累里在表决他所提出的预算时居于少数地位。预算被 19 票的多数否决了，理由是他提出的扩大房屋税和直接税的主张是同辉格党和皮尔派所宣布的明智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完全抵触的。实际上决定表决结果的是爱尔兰旅²⁴（大家知道，他们所根据的理由完全不带理论性质），甚至所谓自由派和自由派保守党人言行也不一致，因为他们自己的预算也是迪斯累里的许多主张的翻版，而且他们借用了迪斯累里的大部分论据。不管怎样，托利党是被推翻了，在经过几次搏斗和作了一些毫无结果的尝试之后，建立了联合内阁，由于这个内阁，照伦敦“泰晤士报”的说法，英国现在正面临着“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但这个千年王国刚刚延续了两年零一个月，就在英

国人民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以彻底的失败和崩溃而告终了。正是那个宣称“群贤”的即位意味着千年王国的开端的“泰晤士报”，对促使这届内阁的倒台起了比其他任何报纸更大的作用。

“贤人们”在1853年2月10日出现于议会。他们重新宣布的也就是约翰·罗素勋爵早在1850年就提出的、并且很快使内阁辞职的那个辉格党的纲领。至于议会改革这个主要问题，看来在“下次常会”以前是不能进行讨论的。暂时国家只得满足于进行一些次要的但是数量比较大的和比较实际的行政改革，如司法改革，实行铁路新规章和改进国民教育事业。约翰·罗素勋爵辞去外交大臣后，接任的是克拉伦登勋爵，这是这个贤人政府所喜欢作的那许许多多的人事更动中的头一个更动，这些更动的结果总是设置新的职位，加添薪高事少的职位，规定政府的忠实信徒的新的薪额。罗素曾经当过一个时期这样的阁员，即除了行使下院领袖的职权外，没有其他职权，也没有薪金；但是很快他就开始在这方面钻营，终于荣获枢密院院长的官级和称号，享有相当可观的一笔年薪。

2月24日，约翰勋爵向议会提出了他的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上院把这个法案束之高阁了。4月4日他提出了教育改革法案。对于懒汉内阁也只能期望这种平淡而可怜的法案。就在这个时候，帕麦斯顿以内务大臣的身分揭露了一个新的火药阴谋，这就是有名的科苏特—黑耳火箭案件。我们要提醒一下，根据帕麦斯顿的指令，对黑耳先生的火箭工厂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很多火箭和爆炸物；案情本来就够夸大的了，而4月15日在议会讨论这个案件时，帕麦斯顿作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暗示而使案情更加严重。但帕麦斯顿毕竟在一

个问题上说出了真情：他宣布自己是大陆警察局对付流亡者的主要情报员，而且是彰明较著地干，就像詹姆斯·格莱安先生 1844 年在暗中检查马志尼书信这件事上所作的一样²⁵。这位高尚的情报员终于不得不在实际上停止审理这个案件，因为所能加于黑耳先生的唯一罪名就是他的炸药工厂离伦敦市郊太近，违反了法律规定。这个好像是以炸毁整个欧洲为目的的大阴谋原来不过是违背了警察条例，处以罚金就行了！

现在再来谈谈罗素。5 月 31 日他在议院所作的发言中对曾经帮助他获得职位的天主教派横加侮辱²⁶，以致政府的成员爱尔兰旅立即呈请辞职。这是对“巩固的政府”的一个很沉重的打击。爱尔兰旅的支持是它存在的首要条件，因此，阿伯丁在给爱尔兰旅的一个成员的信中不得不同自己的同僚划清界限，而罗素也只好在议会中收回自己的话。

议会的这次常会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东印度的法案。内阁提出把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再延长 20 年，并且对管理印度的制度不作任何重大改变。这个建议连本届议会也不能接受，因此只得放弃。常会决定授予议会废除特许状的权利，但须在一年之内预先通知该公司。前罗素内阁的一位庸碌无能的财政大臣查理·伍德爵士，现在在督察委员会即印度事务委员会里却显示了自己的才能。所有提出的改革不过是在诉讼程序方面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效果不大的改变，以及自由地代理需要有专业知识的民事职务和军事职务。但是这些改革无非是一种借口；法案的实质则是：督察委员会主席查理·伍德爵士的薪俸从 1200 英镑增加到 5000 英镑；由公司选出的 24 个董事，只剩下了 18 个，而其中 6 个董事由政府任命；这种加强政府监督的作法丝毫也没有降低

他们的身份，因为董事们的薪俸从 300 英镑增加到了 900 英镑，而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每人要得到 1000 英镑。这样挥霍国家资金，他们还感到不满足，于是决定把印度总督的职位同孟加拉省省长的职位分开（这两个职位原来由一人兼任），并再设置一个由总督管辖的印度河本区的省长职位。在每个这样的省长下面不用说都要有一个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中的职务都是待遇很高、大有油水可捞、只拿钱不做事的差事。印度到头来还是要按照辉格党的真正原则来管理，这是印度的多么大的幸福呵！

随后讨论了预算。这个令人吃惊的财政计划同格莱斯顿先生提出的清理国债的计划一样，在“论坛报”上分析得极其详尽，因此没有必要再来谈它的一切细节。格莱斯顿的预算草案中有很多地方是从迪斯累里的预算中照抄下来的，而迪斯累里的预算当时曾经使有德行的格莱斯顿大为愤怒；这两个预算都规定要降低茶叶税和扩大直接税。预算中某些最重要的项目，如关于取消报纸广告税的项目，关于增设地产遗产税的项目，都是这个大财政家在他的反提案被议会不止一次地否决以后不得已而接受的。关于专利制度的改革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经过几次反复审查后而不得不放弃了。他自以为编制得天衣无缝的预算，在辩论过程中变成了一种由一些互不相关的、意义不大的项目所凑成的无定形的 *mixtum compositum*（混合物），而对这些项目恐怕根本不值得花费为讨论它们所用去的百分之十的时间。

至于减少国债，格莱斯顿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了更加惨重的失败。他的那个自以为编制得比预算更好的计划，就是要发行利率二厘五的国库债券来代替利率一厘的国库期票，这使公众损失了利息总额的 1.5%；由于实行这个计划，就不得不收回全部正在流通

的国库期票和 800 万英镑的南海公司²⁷的债券，这就给公众造成了最大的不便；这个计划还使谁也不愿意要的国库债券完全破产。由于实行了这些高明的措施，格莱斯顿先生能够满意地确信：到 1854 年 4 月 1 日，国库的现金在一年之内就从 780 万英镑减少到了 280 万英镑，换句话说，正是在战争前夕，国库的现金减少了 500 万英镑。其实，从西摩尔爵士的秘密通信中就可以看出，政府还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已经知道同俄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托利党人纳皮尔早在得比勋爵内阁时期就提出讨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新法案²⁸在下院通过了，看来至少得到了内阁的同意，但是上院却把它否决了，而阿伯丁在 8 月 9 日竟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流放法案²⁹、航海法案以及其他一些已经成为法律的法案，都是从得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议会改革法案、国民教育改革法案以及几乎所有有关司法改革的法案，都被搁到一边了。如果英国辉格党的措施中有某一个措施避免了这样的命运，看来他们会认为是自己的不幸。唯一被通过的、并且完全可以认为是属于这届内阁的法案，就是关于马车夫的伟大法令，但是，就连这个法令也不得不在它通过以后的第二天加以修改，因为它激起了马车夫的公愤。“群贤”甚至连马车夫守则也不能付诸实行。

1853 年 8 月 20 日帕麦斯顿宣布议会常会闭会，并向议会保证，人民对于东方的困难情况是会保持镇静的；多瑙河各公国的驻军是会撤走的，而对这一点的担保则是：“他相信俄国皇帝的诚实和个人品质，这些东西会促使他从多瑙河各公国撤走自己的军队！”12 月 3 日，大家已经知道俄国人消灭了在西诺普的土耳其舰队。12 月 12 日，四大国向君士坦丁堡发出一份照会，实际上要求土耳其政府作出甚至比先前维也纳会议的照会所提出的更大的让

步³⁰。12月14日英国政府打电报到维也纳,说它并不认为西诺普事件是继续谈判的障碍。帕麦斯顿是完全同意这一点的,但第二天他却提出了辞呈,表面上似乎是因为他对罗素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有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是为了向舆论界表明,他的辞职是由于对外政策和战争问题上的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过了几天他又回到了内阁,这样他就避开了在议会里的一切不愉快的解释。

在1854年,事情是由一个财政副大臣、前爱尔兰旅的政府捐容萨德勒先生的辞职引起的。在爱尔兰法庭上对丑事的揭露使政府失去了一个贤人。随后又暴露了一些新的丑事。格莱斯顿先生,有德行的格莱斯顿,企图把他的一位姓劳勒的亲戚安插到澳大利亚总督的职位上,此人是他的私人秘书,只是以赛马迷和证券投机商而闻名,不过幸而这个打算很快就破产了。就是这位格莱斯顿,还由于一个在他手下工作、靠他得到自己职位的姓奥弗拉赫蒂的人携带不少公款潜逃而受牵连。另一个姓海华德的人曾经因写了一长篇毫无文学和科学价值的抨击迪斯累里的文章而得到了格莱斯顿赏赐给他的济贫委员会中的职位。

2月初议会恢复了工作。2月6日帕麦斯顿发表声明说,他要提出关于建立爱尔兰和苏格兰民军的法案,但是当3月27日真的宣战时,他却认为他的责任是在6月底以前不提出法案。2月13日罗素提出他的议会改革法案,不过是为了在10个星期之后也因为宣战而“含着眼泪”撤回法案。3月间,格莱斯顿提出了自己的预算,他要求的仅仅是“把目前准备离开不列颠海岸的25000名兵士弄回来所需要的那笔款项”。靠了他的同僚的帮助,他已经不用操这份心了。就在这时候,沙皇公开了秘密通信³¹,使英法两国内阁不得不宣战。1853年1月11日给罗素的急电开始的这

一秘密通信表明，英国的大臣们在当时就完全知道俄国的侵略意图。他们所作的关于尼古拉的诚实和个人品质，关于俄国的爱好和平和温和的立场的一切论断，现在看来都只是企图把约翰牛引入迷途的无耻的谎言。

4月7日，格雷勋爵发言猛烈抨击目前的军事管理组织，因为他渴求得到陆军大臣的职位，以便破坏军队的纪律，就像他在领导对殖民地的管理时使不列颠帝国的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不再服从一样。他要求把一切军事部门统一在陆军大臣一人的领导之下。这篇发言使得内阁能够把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在6月间另设一个新职位即陆军大臣的职位。这样一来，一切都照旧很糟，只不过多了一个职位，多付了一份薪俸。考察一下议会在这次常会期间的全部活动，就可以作出以下的总结：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其中三个法案即修改贫民迁移法法案³²、苏格兰国民教育法案和修改议会誓词法案³³（关于犹太人权利的变相法案）被否决了；另外三个法案即防止贿买选民法案、改变文职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被撤回了；只有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通过了，但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这里没有必要来谈作战情况和联合内阁在外交上的努力，因为所有这一切每一个人都还记忆犹新。议会的工作是在去年8月12日中断的，在12月间再召集开会，以便赶快通过两个急不容缓的措施：外籍军团法案和以自愿方式利用民军在国外担任军事勤务法案。这两个法案直到今天还是一纸空文。而同时却传来了在克里木的不列颠军队处于苦难境地的消息。这使舆论界大为愤慨；事实是令人震惊的，也是不容争辩的；于是大臣们不得不考虑辞职了。议会在1月间开会，罗巴克发表了关于自己的提案的声明，

约翰·罗素勋爵马上就不见了，只经过了几天辩论，“群贤”就遭到了议会史上空前的失败，于是他们被推翻了。

大不列颠可以吹嘘的不只是一个无能的政府，但是，像“群贤”内阁这样无能、可怜、贪婪、同时又这样刚愎自用的内阁还是从未有过的。这个内阁以滔滔不绝的胡吹开场，满足于一些小事的争论，不断遭到失败，最后则以蒙受人世间最大的耻辱而告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2月1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2月23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论内阁危机

伦敦 2 月 2 日。昨天晚上，在帕麦斯顿发表关于内阁辞职的正式声明以后，下院会议又延期了。

在上院，阿伯丁勋爵发表了给“群贤内阁”送葬的悼词。据他说，他反对罗巴克的提案，并不是因为他的政府害怕调查，而是因为这个提案违反宪法。然而，阿伯丁没有像自己的朋友悉尼·赫伯特那样，举出历史上的例子来证实这种说法，赫伯特则曾经质问下院，它是不是有意仿效法国执政内阁（成立于 1795 年），派委员去逮捕杜木里埃，而大家知道，杜木里埃把这些委员引渡给奥地利是在 1793 年³⁴。苏格兰贵族不想显露这样渊博的学识。他保证说，他的内阁只会因任命调查委员会而得到好处。他继续往下说。他预先肯定了调查的结果，大肆吹捧自己和自己的同僚——首先是陆军大臣，然后是财政大臣，再就是海军首席大臣，最后是外交大臣。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伟大的，每一个人都是贤人。至于英国的军事情况，克里木军队的处境的确是困难的，但是波拿巴向欧洲宣布过，法国军队共有 581000 人，此外他还下令再招募 14 万人。撒丁交给腊格伦勋爵指挥的有 15000 名优秀的兵士。如果维也纳和平谈判失败，他说，我们可以得到拥有 50 万大军的军事强国的帮助。

无论如何，苏格兰贵族没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西斯蒙第身上的那种缺点，西斯蒙第自己承认，他用一只眼睛把一切看得一团漆黑。阿伯丁用两只眼睛把一切看得都很美好。例如，商人、工厂主和工人都肯定地说他们经受着严重的商业危机，阿伯丁却发现目前国内各地区都是一片繁荣景象。阿伯丁用了一些俏皮话（拜伦勋爵还赞扬过苏格兰贵族的这番话³⁵）来攻击自己的对手得比勋爵：

“尊敬的议员们！国家现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用什么方法才能建立这个政府，这不该由我来说。盛传得比勋爵奉女王陛下之命负责组织。但是看到得比勋爵在自己的普通的岗位上，我就想，事情不是这样，流传的谣言是不可相信的。”

为了理解这段话的俏皮之处，有必要引证一下得比勋爵的回答。

“高贵的阿伯丁伯爵过低估计他获得消息的来源。不是从谣传中知道，而是他自己（得比）在去上院之前，曾亲自告诉阿伯丁关于他所接到的女王的建议。因此，说什么谣言迫使高贵的伯爵相信他（得比）曾经谒见过女王陛下，这只是高贵的伯爵由于天生害怕夸大并希望公正地阐明他所维护的事情的每一细节而使用的生动的说法。”

同时，得比趁机声明，在目前各政党和下院的情况下，他没有负责组阁的可能。

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的解释和他所描绘的在“和睦家庭”中的相互关系的情景，转移了上院与会公众和高贵的贵族本身对克里木军队和内阁危机的注意力。纽卡斯尔公爵说，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的解释使他不得不说明他自己在垮台的内阁中所处的地位。罗素的陈述既不全面又不真实。罗素把情况说成这样，似乎

在把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的时候，他同意把陆军部交给纽卡斯尔公爵是非常勉强的，完全是对公爵的“强烈的愿望”的让步。实际上，当内阁决定把两个部分开的时候，他（纽卡斯尔）就曾声明：“至于我个人，我准备负责这两个部中的任何一个部，或者什么都不负责。”他不记得罗素曾经表示愿意把陆军部交给帕麦斯顿勋爵，但是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时期，罗素打算自己来主持这个部。他（纽卡斯尔）根本不想在这方面挡着罗素的路，并且他在接受陆军部时就充分意识到，事情如果顺利，功劳不会记在他账上，事情如果不顺利，各种各样的责难却会落到他头上。但是，他认为自己的义务是不要逃避这个有危险有困难的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有些人说这是“自命不凡”，罗素勋爵用一种显然庇护的口吻称这种行为是“值得称赞的功名心”。罗素勋爵故意把阿伯丁给高贵的勋爵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话对下院隐瞒起来：

“我把您的来信的内容告诉了纽卡斯尔公爵和悉尼·赫伯特。果不出所料，他们两人都极力坚持要在他们担负职务的问题上通过一项将被认为是最符合社会利益的决定。”

他（纽卡斯尔）还就这点向阿伯丁伯爵作了口头声明：

“不要给罗素勋爵有退出内阁的借口。不要违反他想使我离开这个岗位的愿望。请您像社会利益所要求的那样来处理我的问题。”

纽卡斯尔说，在下院，罗素勋爵隐约地暗示了他在给阿伯丁的信中所提到的错误，但是又留神不说出这封信中有关的话。第一个暗示是关于为什么第九十七团没有从雅典调到克里木的问题，但是要知道，外交大臣认为英国军队从雅典调出来是不能容许的和危险的。至于他谈的第二个错误，即拒绝派遣 3000 名新兵，则是因为腊格伦勋爵反对今后把那些年轻的和没有养成守纪律的

习惯的兵士派到他那里去。况且当时运输船只根本不够。这两个所谓的错误就是罗素所能想出来的一切，罗素和自己的同僚常常在海滨疗养地休养，而他（纽卡斯尔）在1854年整整一年中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辛辛苦苦地工作。不过，罗素在10月8日给纽卡斯尔本人的信中关于这些“错误”是这样说的：“您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我满心欢喜地希望您获得成功。”

纽卡斯尔说，阿伯丁毕竟向内阁提出了罗素关于更换人员的建议。但是建议被一致否决了。12月13日，他（纽卡斯尔）在上院作了维护自己的管理机关的详尽发言；12月16日，罗素对阿伯丁说，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放弃了更换人员的打算。罗素除了下面两次以外，从来没有提出过关于改革军事管理机关的具体建议。在他提出辞呈在罗巴克发表声明的前三天，举行了内阁会议。罗素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把从某一时期以来即由陆军大臣办公厅召开的各军事部门的首长的会议肯定为正式的和合法的。他的建议被通过了。此后不久，罗素提出了一份书面草案，其中除了已经由内阁赞同的新措施以外，还包括两点建议：（1）设立一个由陆军大臣为首的、包括军械部在内的并且监督军队的一切非军事管理机关的最高委员会；（2）除了过去已经吸收进来的军事部门的首长以外，这个最高委员会还应当有两个高级军官加入。罗素在下院说，他有一切根据认定他的“书面建议”将被否决。但这不正确。第一个建议被纽卡斯尔公爵采纳了；第二个建议被否决了，顺便说说，这所以被否决是因为罗素想拉进来的“总军需官”多年来已经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英国军队中再没有这种人了。可见，罗素从来没有提出过不会被采纳的建议。不过他（纽卡斯尔）在1月23日就对阿伯丁伯爵说，不管议会的决议如何——支

持或者反对内阁——他都要退出内阁。他只是不希望别人把他看成是在议会作出决断以前就逃跑了。

约翰·罗素勋爵的一生，用老科贝特的话来说，就是一连串“对待生活的骗人的幌子”，现在，正像纽卡斯尔公爵的发言所表明的，他也是在骗人的幌子下完结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2 月 5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59 号

卡·马克思 阿伯丁内阁的倒台

1855年2月2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代议制的全部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届内阁像英国著名的“群贤”内阁那样在辞职时蒙受那样大的耻辱。任何一届内阁都可能成为少数派，但是，被 305 票对 148 票的多数即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击败的，并且是在大不列颠下院这样的议会里被击败的，就只能是以 ce cher (这位可爱的) 阿伯丁为首的一代杰出的天才人物。

无疑地，议会刚一开会，内阁就明白它的寿命不长了。在克里木干了丑事，全军复没，参与指挥战争的一切机关和人员束手无策，由于“泰晤士报”的抨击而使全国更加愤慨，以及约翰牛断然决定要查明谁是事件的罪魁祸首，或者至少要拿谁来出出自己的气——所有这一切都向内阁表明，死期已到，它该准备后事了。

关于提出威胁政府的质询和提案的声明一下子就大量出现；特别危险的是罗巴克关于成立一个委员会的提案，这个委员会要查明作战情况和调查所有对指挥战争负有一定责任的人的活动。这马上得出了结局。政治敏感立刻使约翰·罗素勋爵意识到，不管少数派³⁶是否投票赞成，罗巴克的提案总会被通过，而像他这样一个可以以他的年岁还没有他成为少数派的次数那么多而自豪的

国家活动家，不能容忍多数票在现在又来反对他。因此，生来就胆小怕事和卑鄙无耻的他（这些品质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常常从他那煞有介事的夸夸其谈和维护宪法的装腔作势的假面具下暴露出来）认为，“明智是勇敢的最好表现”^①，于是没有预先告诉自己的同僚便从自己的岗位上逃跑了。虽然罗素是一个平常的人，没有他，人们也能很好地过下去，但是看来“群贤”都由于他的突然弃职而大为震惊。英国报刊一致谴责这个矮小的国家活动家，但是这能起什么作用呢？所有报刊和它们的所有谴责都不能消除内阁的混乱现象。正是在这种紊乱的时刻，即纽卡斯尔公爵放弃陆军部，而帕麦斯顿勋爵还没有把它接管过来的时候，内阁接到了罗巴克的可怕的提案。

罗巴克先生是个小律师，假如他在议会生涯里比较一帆风顺的话，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像约翰·罗素勋爵一样有风趣而不得罪人的小辉格党人。但是，这位 *ci-devant*（过去的）未开业的律师，现在的议会饶舌家，尽管使出了全部精力，善于随机应变，也不能捞到什么显著的政治资本。他在任何一届辉格党内阁中总是扮演一种受委托的秘密代表的角色，但他始终没有取得可以保证他得到“官职”的地位，而这乃是一切不列颠自由党人的最高目的。我们可爱的罗巴克被自己的美好希望所迷惑，他遭到自己党的轻视和自己的反对者的嘲笑，他意识到他的心已经变得冷酷了，而且充满了悲哀，于是他渐渐变成了一只不定在什么时候就要在议会里尖吠一通的最贪婪、最凶恶、最讨厌、最惹人生气的劣种狗。他以这种身分来轮流为所有善于利用他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服务，

^① 这一句话已经成为成语了，原出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甚至不希望得到任何方面的感激或尊重。但是，谁也没有做我们的老朋友帕麦斯顿那样能够高明地利用他，他在1月26日又充当了帕麦斯顿的工具。

罗巴克的提案本身在英国下院这样的议会里未必能有什么意义。大家知道，下院各个委员会工作得很差劲，拖拖拉拉，简直慢得要命；而由这样的委员会来调查目前战争的领导问题，即使能够一般地提供出一些东西，实际上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它的结果大概要比应该做到的晚许多个月才能揭晓。只有在像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那样的革命专政的议会里，这种委员会才能带来良好结果。但是在同样的情况下，政府本身也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它的受托人就是议会本身的代表，因此，在这样的议会里这类提案就是多余的了。悉尼·赫伯特先生毕竟没有完全错，他曾指出过，这个提案（当然，罗巴克完全没有这种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宪法的，他还以他特有的对历史事实的精确知识询问说，下院是不是有意像**执政内阁**（原来如此！）对付杜木里埃将军那样派委员到克里木去。我们要指出，正是这个最确切的年表载明派委员到杜木里埃将军那里去的是**执政内阁**（成立于1795年），而这些委员早在1793年就被这位将军逮捕并被引渡给奥地利，——正是这个年表清楚地证明在悉尼·赫伯特和他的同僚们的全部活动中所常见的那种把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弄乱的情形。至于罗巴克的提案，那末他的上述违宪行为就使许许多多有可能取得官职的候选人有理由对这个提案不投赞成票，从而为自己参加任何一个可能拼凑起来的内阁留下一条广阔的道路。然而，反对内阁的多数竟占了如此压倒的优势！

各主管部门之间的争吵是辩论的特色。每一个主管部门都企

图把过错推在别的主管部门身上。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断言，一切都要怪运输部门；海军部秘书长贝尔纳·奥斯本声称，全部祸害的原因仅仅在于伦敦最高统帅所习惯了的那种有缺陷的、不合适的制度。海军部部务委员之一的贝克莱海军上将相当明白地向赫伯特示意，他应当首先引咎自责，等等。同时，在上院，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和总司令哈丁子爵之间也在彼此交换这一类的恭维话。由于约翰·罗素勋爵的发言，赫伯特的处境的确非常困难，因为约翰·罗素在说明他辞职的原因时承认，报刊上关于克里木军队的状况的所有报道实质上都是正确的，军队的情况“很糟糕，简直不能令人容忍”。因此，悉尼·赫伯特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事实，最多只能用一些极不妥当的、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理由来辩护。他不得不承认，甚至是比较明确地承认，军事管理机关完全不行，而且非常紊乱。赫伯特说，我们比较顺利地吧 24 万吨各种储备品和大批军队调到了 3000 英里以外的巴拉克拉瓦（接着就很快地列举了充分供应军队的各种服装、帐篷、食物、甚至奢侈品）。但是，唉！需要所有这一切的不是巴拉克拉瓦，而是离岸 6 英里的地点。把所有的储备品运送到 3000 英里以外是可能的，而运送到 3006 英里以外却不可能了！必须把储备品再往前运送 6 英里的事实毁了一切！

假如不是累亚德、斯泰福和他的同僚格莱斯顿发言，赫伯特苦苦哀求宽大的表示也许终于会引起对他的某种怜悯。前两位议员刚刚从东方旅行归来；他们是大家谈论的全部事情的目击者。他们不只是重复报纸上已经谈过的东西，他们还举出了玩忽职守、无能和管理不善的事例；他们所描述的阴暗情景远远超出了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切。用帆船把马匹从瓦尔那运到巴拉克拉瓦去，却

不带任何饲料。行囊从克里木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回运送了五六次，而饥寒交迫的兵士都因穿不上这些行囊里的衣服而冻僵了，湿透了。“初愈的病号”被遣回克里木担任队列勤务，但他们还很虚弱，连站也站不稳；被抛弃在斯库塔里、巴拉克拉瓦和运输船只上的听天由命的伤病员得不到任何照顾，脏得怕人。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幅使“本报通讯员”的描述或来自克里木的私人消息全都黯然失色的图景。

为了消除这些描述所造成的沉重印象，不得不求助于自负的、英明的格莱斯顿，但是，对于悉尼·赫伯特来说，不幸的是格莱斯顿否认了他的同僚们在辩论的第一个晚上所承认的一切。罗巴克直截了当地向赫伯特提出一个问题：你从英国派出了 54000 名兵士，现在处于战斗状态的只有 14000 名，其余 4 万名到哪里去了呢？赫伯特对罗巴克回答得很干脆，他提示说，其中一部分还在加利波利和瓦尔那就死亡了；他绝不怀疑关于死亡和离队人员的总的统计数字的正确性。然而现在看来，格莱斯顿比军务大臣消息还要灵通，他说：“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最新统计数字”，军队的实际人数不是 14000 名，而是 28200 名，其中不包括担任岸防勤务的 3000—4000 名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在内。当然，格莱斯顿很谨慎，没有说出他所指的是哪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但是，如果注意到各级机关特别是旅部、师部和总参谋部在编制伤亡名单时常有的那种拖拉现象，我们有权推定，格莱斯顿的表报大概是 1854 年 12 月 1 日以前的，而且还把在最近 6 个星期内由于气候恶劣和过度疲劳而完全离队的大批兵士也计算在内。然而看来格莱斯顿现在还像他曾经指望舆论界对待他的财政草案那样，盲目地相信官方文件。

没有必要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些辩论。除了许多出 *dii minorum gentium* (小神)^①以外,发言的还有迪斯累里,其次是托利党的最后一任内务大臣沃尔波尔,最后是“慷慨地”为自己的受到抨击的同僚们辩护的帕麦斯顿。在辩论过程中,帕麦斯顿在没有最后确信辩论会得出怎样的结果以前一句话也不说。在他确信以后,仅仅是在这以后,他说话了。通过大臣们的官员传到大臣席上的流言,议院的一般情绪——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内阁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失败必将使他的同僚们完蛋,但未必会牵涉他本人。虽然帕麦斯顿看来也将同所有其余的人一起离职,但他是这样地确信他的地位的巩固,这样地确信他的同僚们的离职会给他带来好处,以致他几乎认为尊敬地把他们请走是他讲究礼貌必尽的职责。这个职责他履行了,因为他恰恰在投票表决以前作了发言。

帕麦斯顿实际上也的确非常精明。他由于帕西菲科事件而博得“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³⁷以后,非常善于保持自己的这种声誉,尽管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揭露,但是,当帕麦斯顿一离开外交部,约翰牛总是认为自己被出卖给了某一个外国。帕麦斯顿被约翰·罗素非常不礼貌地赶出这个部以后,便用威胁的办法迫使这个矮小人物不谈他被赶出的原因,从这时起,对“真正的英国大臣”就更加关心了:他成了功名心重而又没有才能的同僚们的无辜牺牲品,成了一个被辉格党人出卖的人。在得比内阁倒台后,帕麦斯顿被安置在内务部的一个职位上,在这里他仍然被看做是牺牲品。他们没有这个他们大家都憎恨的大人物是不行的,但是他们又不希望让他担任应该由他担任的职务,于是就用一个辜负这

① 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种天才的职务来敷衍他。约翰牛就是这样议论的，它越来越以自己的帕麦斯顿而自豪，因为它看到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在自己的次要职位上忙个不停：干预治安法院的案件，折磨马车夫，申斥主管下水道的机关，就专利制度问题作娓娓动听的发言，为煤烟这样重要的问题而恼火，硬要把警察集中起来，反对在市内埋葬。好一个真正的英国大臣！对于他来说，“泰晤士报”上发表的《Paterfamilias》（“家长”）的接连不断的来信就是情报的样本和来源，就是新的措施和改革的宝库。自然，谁也没有像这位同英国的大多数资产阶级选民一模一样的 Paterfamilias 那样以此感到满足，对于资产阶级选民说来，帕麦斯顿已成了一尊偶像。“瞧吧，大人物在小职位上可以干些什么！历任内务大臣有谁曾经关心要消除所有这些紊乱现象！”诚然，马车夫那里依然如故，煤烟并没有消除，墓地也没有在市内消失，警察也没有被集中，一句话，这些伟大改革当中的任何一件都没有付诸实现，但据说这不怪帕麦斯顿，而要怪他的贪婪的、愚钝的同僚们！帕麦斯顿的忙碌和缠扰行为则渐渐地被看做是他的旺盛的精力和积极性的证明。而这位最反复无常的英国国家活动家从来没有能够使议会里的任何一次商议，任何一个法案得到善终，这位政客只是为了自我满足而忙个不停，他的一切措施到头来仍然是一纸空文——就是这位帕麦斯顿被推崇为国家在危急关头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应该说，帕麦斯顿本人为颂扬自己是出了不少力气的。他不满足于作“晨邮报”³⁸（这家报纸每天都把他吹嘘成国家未来的救星）的共有主，于是他雇佣了像魏科夫那样的一定会在美国和法国颂扬他一番的花花公子；几个月以前，他收买了“每日新闻”³⁹，他把某些电讯和其他重要消息告诉了它；他几乎对所有的伦敦报纸的编辑部都有影响。对战争的拙劣指挥导致了帕

麦斯顿所期望的那种危急局面，这就使他在联合内阁的废墟上扶摇直上，使他高升到别人所不可企及的高度。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他得到了“泰晤士报”的无条件的支持。他怎样争得这一点，他同德兰恩订立了什么契约，自然很难说，但是在投票后的第二天，所有伦敦的日报，只是“先驱报”⁴⁰除外，都异口同声地一致拥护帕麦斯顿担任首相，应当说，他认为自己竭力追求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说来，不幸的是他常常使女王烦恼，因此女王尽一切可能来打乱他的计划。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316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被推翻的内阁

伦敦 2 月 3 日。1852 年 12 月 16 日，迪斯累里预算的第一项即规定扩大直接税首先是扩大一切房屋税的项目被 19 票的多数否决了。托利党人内阁呈请辞职。经过 10 天的幕后斗争，联合内阁组成了。这个内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辉格党的一部分寡头政治家（格雷氏族这次被排挤掉了）；皮尔分子的官僚集团；所谓梅费尔激进派⁴¹的某些混杂物，如摩耳斯沃思、奥斯本；以及萨德勒、克奥、蒙塞耳等爱尔兰旅的掇客——他们在 12 月 16 日决定了事情的结局，同时也得到了次要的内阁职位。新内阁自称为“群贤内阁”，它也真的几乎收罗了三十多年来在政府中互相轮换的所有贤人。“泰晤士报”在宣布“群贤内阁”上台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的确，在执政集团看来，自从他们发现他们的党派组织已经瓦解，他们的内部矛盾只是产生于个人的怪癖和虚荣心，他们彼此间的摩擦再也不能引起全国的注意的时候起，“政治千年王国”就已开始了。联合内阁并不代表某个特殊的派别。它代表的是到目前为止治理着英国的阶级的“群贤”。因此，回顾一下这个内阁的活动是很重要的。

得比内阁倒台以后，议会放了圣诞节假。后来议会又放了复活节假。只是在这以后，1853 年的正式常会才开会，这次常会几

乎完全是讨论格莱斯顿的预算、查理·伍德关于印度的法案和杨格关于调整爱尔兰的大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的法案。

格莱斯顿在把自己的预算提交议院审议之前，宣布了实行减少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的重要措施。在短期国债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他把国库期票的日息从 1.5 辨士降低到 1 辨士，并且正好是在市场利率提高的时候降低的。由于实行这项措施，格莱斯顿不得不先收回 300 万国库期票，然后再按更高的利率发放出去。他在大量长期国债方面的试验更有意思。他的冠冕堂皇的目的是减少国债。格莱斯顿搞得那样巧妙，以致在财政年度终结时不得不 at par (按票面价值) 收回 800 万英镑南海公司债券，这些债券按当时交易所的牌价只值票面价值的 85%。同时，格莱斯顿把他新发明的有价证券——国库债券抛到交易所去。他争取到议会准许发行为数 3000 万英镑的这种证券。但是他费尽气力才把 40 万英镑的这种债券推销出去。一句话，实行格莱斯顿的减少国债的措施的结果是：长期国债的基本数额增加了，短期国债的利率提高了。

联合内阁引以自豪的格莱斯顿**预算**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的。像降低茶叶税、降低消费税（固然，格莱斯顿谈的是降低肥皂消费税，而迪斯累里谈的则是降低麦芽消费税）和提高直接税这些项目，是格莱斯顿从他的前人的预算中照抄下来的。其他一些最重要的项目，例如对地产征收遗产税和废除报纸广告税等等，都是格莱斯顿在议院两次否决他的反提案以后不得已而接受的。对自己预算中的某些项目，例如关于专利制度的改革，他只得完全放弃了。他向议院提出的那种作为无所不包的制度的东西，经讨论后成了五花八门的互相矛盾的项目的大杂烩。只有预算中关于废除报纸附刊的印花税这一项是他自己提出的；由于这一项，所

有报纸中唯一出附刊的“泰晤士报”得到了每年 3—4 万英镑的好处。但是格莱斯顿更积极地坚持保存报纸正刊的印花税，这样一来，他博得了“泰晤士报”的特别好感，当然，这家报纸现在希望在新的内阁里面也能看到他。这就是联合内阁在 1853 年整个常会期间借以维生的格莱斯顿的伟大创作。

1854 年 4 月 30 日，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有效期满。因此，应当重新调整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联合内阁力图把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再延长 20 年，结果没有成功。印度没有再被“租给”东印度公司几十年。特许状只是在停止特许状生效的“通知”发出前还有效，而议会随时都可以向公司发出停止特许状生效的通知。关于印度的法案中的这项唯一重要的条款，在违反内阁愿望的情况下被通过了。如果不把在印度的诉讼程序方面的某些不大的改变和准许一切具有必要能力的人代理需要专业知识的民事职务和军事职务这种情况算在内，那末，有关印度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不过是以下一点：住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ntrol (督察委员会主席)) 的薪俸从每年 1200 英镑增加到 5000 英镑。东印度公司的 18 个董事中有 6 个今后由内阁任命，只有 12 个由公司的股东会选出。这些董事的薪俸由 300 英镑增加到 900 英镑，而两位董事长的薪俸则由 400 英镑增加到 1000 英镑。此外，孟加拉省省长的职位 (以及他下面的委员会) 以后同印度总督的职位分开；同时，在印度河本区设置一个新的省长职位 (以及他下面的委员会)。“群贤内阁”在印度方面的改革仅仅是提高薪俸和设立新的薪高事少的职位。

联合内阁的关于爱尔兰的大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的法案，是从自己的前任托利党人那里接受过来的。联合内阁不应该落后

于他们。它提出了这些法案，并在常会闭幕以前不久，经过长达10个月的辩论之后，在下院通过了这些法案，或者更确切些说，让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但是在上院，阿伯丁同意，以这些法案必须仔细加以研究并在下次常会上再提出为借口而否决这些法案。

关于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司法改革等等的内阁法案，根据内阁的要求，被推迟到下次常会讨论。“群贤”的伟大创作——关于伦敦马车夫守则的法案固然成了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刚出议会的大门就送回来修改了。它是行不通的。

议会常会终于在8月20日结束了。帕麦斯顿用他在议会常会闭幕时说的一句话概括了这次常会期间内阁的对外政策：议会可以安心地散会了。“我完全相信俄国皇帝的诚实和个人品质”，他将自愿地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

帕麦斯顿公开过问1853年常会期间的对外政策，还只限于上述言论；其次就是在下院闭会前几天在议会发表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把俄国人对多瑙河苏利纳河口的封锁说成是不成功的玩笑；再有就是在1853年4月15日的会议上——有关所谓科苏特火药阴谋的问题——被迫承认，他奉欧洲各宫廷之命，利用英国警察来监视政治流亡者。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2月7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63号

卡·马克思 政党和集团

伦敦 2 月 5 日。目前的内阁危机的延长，多少可以说是正常的，因为在英国，这样的危机平均要持续 9—10 天。凯特勒在他的名著“论人的能力”⁴²中证明，在文明的国家里，每年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犯罪行为等等的数字可以几乎像数学般准确地预先计算出来，这使人大为惊奇。相反地，十九世纪各个不同时期英国内阁危机有一定的持续时间，却毫不令人奇怪，因为大家知道，这里总是要经过一定的拼凑过程，总是要瓜分一定数量的职位和发生一定数量勾心斗角的事。只有这次由旧政党的瓦解所决定的拼凑的性质才是不寻常的。这种瓦解的事实曾使得目前被推翻的联合内阁有成立的可能和必要。执政集团（这帮人在英国同统治阶级极不相称）在它还没有最后丧失治国能力的时候，不得不忽而进行这种联合，忽而进行那种联合。大家知道，得比的拥护者曾拚命反对任何联合。在得比勋爵奉女王之命组织新内阁之后，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企图不仅同帕麦斯顿（迪斯累里在讨论罗巴克提案时直截了当地向帕麦斯顿说过，要求对谴责进行表决，这既是反对纽卡斯尔公爵和阿伯丁，也是反对他本人）进行联合，而且同格莱斯顿和悉尼·赫伯特即被托利党人当做瓦解自己政党的直接祸首而深恶痛绝地加以迫害的皮尔分子进行联合。当罗素受

命组阁的时候，他也想同皮尔分子进行联合，但正是这些皮尔分子参加上届内阁才使他有了辞职的借口，正是他们在议会会议的严肃场合下揭穿了他的谎话。最后，如果帕麦斯顿能组成内阁，那也只会是改变很小的旧联合内阁的再版。很可能是辉格党人格雷之流的氏族来代替辉格党人罗素的氏族等等。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垄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但是，促使这些集团削弱并让它们没有可能建立政党、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因，也促使这些集团失去了联合的能力。因此，在英国议会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像联合内阁时期那样的分裂成许多人数很少、偶然拼凑起来的集团的情况。在这些集团中，人多势众的只有两个集团，这就是得比派和罗素派。在他们的拥护者中，有一个由势力雄厚的古老世家及人数众多的被保护者组成的支线散布得很广的集团。但是人数众多恰恰是得比派和罗素派软弱的根源。要组成独立的议会多数，他们的人数太少，但同时他们的人又太多，其中有不少追求名位的人，必须满足这些人的野心，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用分配重要职位为代价来取得外界的充分支持。因此，人数较少的皮尔分子集团、格雷集团、帕麦斯顿的拥护者等等就比较适合于组织联合内阁。但是，使他们适合于组织这种内阁的原因，即其中每一集团都较弱，也使得他们的议会多数带有偶然性，在任何时候，只要得比派同罗素派或得比派同曼彻斯特学派⁴³等等勾结起来，这个多数都可能瓦解。

最近这次组织新政府的尝试，在另一方面也是有趣的。在所有这样拼凑成的政府中，都有旧内阁的成员。后一届内阁的首脑是前一届内阁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但是，难道下院在接受罗巴克提案之后，没有像帕麦斯顿本人在答复迪斯累里时所说的那样，表

明不仅赞成对谴责旧内阁全体成员进行表决，而且赞成任命委员会来调查他们的活动吗？委员会还没有任命，调查还未开始，而被告却又执掌权柄了。如果议会有权推翻内阁，那末内阁也有权解散议会。而解散的前景会怎样地影响目前的议会，从约翰·特罗洛普爵士于 1853 年 3 月 1 日在下院所作的声明中可以看出。

他说：“现在已经有 14 个由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在开会，这些委员会是议院为了调查在最近议会选举期间发生的购买事件而成立的。如果我们让这种风气继续存在下去，那整个议会很快就会变成调查贿选行为的各种委员会。不仅如此，被控告的议员会非常之多，以致剩下的没有嫌疑的议员会少到不可能去审讯他们或者哪怕是调查他们的案件。”

出于爱国主义精神，在议会第三次常会开始时就失掉用高价买来的职位，那是会很难受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2 月 8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65 号

卡·马克思 两种危机

伦敦 2 月 6 日。舆论界目前正专心致志地谈论着两种危机：克里木军队所遭受的危机和内阁危机。前一种是人民谈论的，后一种则是俱乐部和沙龙谈论的。据最近来自克里木的笔调非常低沉的报道，英国军队的人数已经从 14000 人减少到 12000 人，撤除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同时下院正在讨论沙龙阴谋。罗素勋爵和格莱斯顿占用了会议的全部时间，他们滔滔不绝地陈述着赞成或者反对伟大的罗素退出再也不存在的内阁的意见。哪一方也没有举出新的事实，只是对旧的事实争个不休。约翰勋爵是他自己的辩护人，格莱斯顿则担任纽卡斯尔公爵的辩护人。关于纽卡斯尔是否适合担任陆军大臣职务的问题所提出的深谋远虑的意见，在本来应当加以管理的军队不再存在的时候，听起来特别可笑。格莱斯顿在结束他的冗长的发言时说，“他希望一切误会（罗素和纽卡斯尔之间的）都被遗忘”，这时甚至连现在的下院也终于以著名的传统的发牢骚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了。

因而，不是议院的不信任投票，更不是英国军队的复没，而纯粹是年老的勋爵和年轻的公爵之间的“误会”——这才是造成内阁危机的基础。克里木不过是沙龙阴谋的借口。内阁和下院之

间的误会甚至不值一提。甚至对目前的下院来说，这已经太严重了。罗素垮台了，格莱斯顿垮台了，整个会议都垮台了。

两院都得到通知，已授命帕麦斯顿勋爵组阁。但是他意外地遇到了障碍。格雷勋爵拒绝担任指挥战争的职务，他一开始就不同意战争，现在也不同意战争。这对军队倒是件幸事，因为否则他一定会像过去破坏殖民地的纪律一样破坏军队的纪律。然而格莱斯顿、悉尼·赫伯特和格莱安也很难说通。他们要求让所有的皮尔分子都回到政府中来。这些大政治家意识到，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在议院中只有大约 32 票的无足轻重的集团。只有把自己的“伟大的”贤人团结起来，他们的小集团才有希望保持独立。如果皮尔分子的一部分领导人加入内阁，而另一部分留在内阁外面，这就等于值得尊敬的大政治家的俱乐部消失。这时帕麦斯顿采取了极端手段，企图像强使女王服从自己一样，强使议会服从自己，因为在这里，他没有自己的政党。他的内阁还没有组成，他就在“晨邮报”上威胁说，他将不求助于议会而求助于人民。他威胁说，如果议院胆敢“不给予他那种他在韦斯明斯特宫以外、在人民中所受到的尊敬”，他就要解散议会。他的“人民”——这只不过是完全属于他或一半属于他的报纸而已。在最近发出人民呼声的地方，例如太恩河畔新堡的群众大会（从那里给议会送来了请愿书要求使内阁受到法律制裁），正是人们最坚决地揭露帕麦斯顿是倒台的联合内阁的幕后领导人的地方。

为了使“群贤内阁”的行状更完全，还要指出几点。1853 年 11 月 30 日发生了西诺普事件；12 月 3 日，关于这个事件在君士坦丁堡已经尽人皆知了；12 月 12 日，四国代表交给土耳其政府一份照会，要求对俄国作出比臭名远扬的维也纳照会更大的让步；12

月14日英国内阁打电报到维也纳，说西诺普事件不应该使维也纳的和平谈判中断。帕麦斯顿勋爵出席了那次通过这个决定的内阁会议。他同意这个决定，但是第二天就借口罗素起草的议会改革法案似乎同他的保守见解相抵触而退出了内阁。帕麦斯顿的真正目的是，他想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推掉自己在公众面前对西诺普事件所应负的责任。这个目的一达到，他马上就回到了内阁。

1854年2月初，议会恢复了工作。关于东方纠纷的外交文件似乎都提交给了议会。没有最重要的文件了。议会是 via (通过) 彼得堡从尼古拉皇帝那里得到这些文件的，而不是从英国内阁得到的。在彼得堡公布的“秘密的和机密的通信”⁴⁴十分清楚地向吃惊的议会表明，在过去的1853年的整个常会期间以及1854年的常会期间，内阁蓄意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欺骗它。这个公布出去的通信迫使内阁于3月27日宣战。2月6日，帕麦斯顿声称，他要提出关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征集民军的法案。但是，刚一宣战，他就把自己的法案搁置起来，并且一直到6月底还没有提出来。2月13日，罗素提出他的议会改革法案，他把法案的二读延迟到4月底，但是在3月，他就动人情感地、呜咽啜泣地把法案收回去了，他的同僚们为他所作的牺牲给他一个奖赏：授予他这位过去一直是无职无薪的所谓额外大臣以内阁中一个薪高事少的枢密院院长的职位。3月6日，伟大的财政家格莱斯顿提出了自己的预算。他只要求把所得税提高一倍，期限为六个月。他所要求的“仅仅是把目前准备离开英国的25000名兵士弄回来所需要的那笔款项”。现在，他的同僚纽卡斯尔使他用不着操这份心了。5月8日格莱斯顿已经不得不提出第二个预算草案。4月12日他表示反对发行任何公债，而4月21日却建议议会同意发行600万英镑的公债来抵

偿他用在转换国债的不成功的试验上的费用。4月7日，格雷勋爵作了关于英国军事管理机关的缺点的发言。6月2日，内阁利用他关于改革的提案——正像利用关于印度管理制度的改革和与霍乱流行病有关的改革一样——设立新的职位。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了。其他一切照旧。⁴⁵在这次常会期间，内阁在立法方面的成就可归纳为：它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其中三个即修改贫民迁移法法案、苏格兰国民教育改革法案和修改议会誓词法案被否决。另外三个即防止购买选民法案、完全改变文职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被撤回。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通过，但是作了无数的修改，以致面目全非了。政府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丰功伟绩，我们还记忆犹新。“群贤内阁”就是如此。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2 月 9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67 号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斗争

阿尔马河会战和联军向巴拉克拉瓦的进军刚一结束，我们就曾说过，克里木战局的最终结局，将取决于哪一方能最先调来足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造成优势的生力军。⁴⁶从那时起，战况有了很大变化，许多幻想都破灭了。但在这整个时期内，俄国与同盟国之间展开了一种调动增援部队的竞赛，而且我们应当承认，俄国人在这一竞赛中领先了。尽管在技术和运输工具方面有了值得称赞的各种改进，但是野蛮的俄军在陆上行走 300—500 英里，比高度文明的法军和英军在海上航行 2000 英里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当英军和法军似乎故意轻视高度文明所给予他们的一切优越性时更是如此，而野蛮的俄军可以让自己比联军多丧失一倍的兵士，却不担心自己在最后失去优势。

现在，联军中的不列颠军队，连到俄国人面前去送死的希望都没有了，他们开始不断地起劲地做着有意自己消灭自己的事情，而且做得如此努力，如此有效，以致过去的一切成就都被掩盖了。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同盟国还能指望什么呢？然而事情确是这样。据我们所知，不列颠军队作为一支军队来说已不复存在了。原有的 54000 名兵士只剩下数千人，而这数千人之所以还被认为“能够服役”，只是因为医院容纳不下他们，否则他们也可能死在那里。

在法军中执行勤务的可能还有 5 万名左右的兵士，但是过去他们比这个数目要多一倍。不管怎样，他们总算保存了至少比英军多四倍的具有战斗力的兵士。可是，既然整个冬季要扼守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要继续从南面封锁塞瓦斯托波尔，要防守堑壕，而春天还要用剩下的兵力转入进攻，那末，这 5—6 万人又能抵什么用呢？

现在英国人已停止派遣增援部队。问题在于腊格伦在失去挽救军队的希望后，看来他自己也不想获得新的补充兵员了，因为就连剩下的军队，他都不知道拿什么来供养，配置在哪里以及怎样使用。法国人可能正在准备新的师，以便在 3 月间由水路运往克里木，但他们也正在花许多力量准备应付大陆上的春季大战，因此十有八九他们派去的增援部队或者过弱，或者过迟。为了改善当前的处境，同盟国曾采取了两项措施，而这两项措施正好证明同盟国已完全无力防止灾难的发生，这场灾难正缓慢地但却肯定地向克里木的联军逼近。首先，为了改正因克里木远征迟了 4 个月而铸成的大错，他们又犯了不可估量的更大的错误：正值严冬的时候，在他们自己的军队到达克里木后过了 4 个月，又把土耳其的唯一可用的残余部队派到那里。这支军队的兵力和战斗力，由于土耳其政府的玩忽职守、无能和投靠外国，已经在苏姆拉受到摧残，因此一当他们在克里木登陆就会因饥寒而迅速瓦解，其瓦解之快甚至会使英国陆军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显得逊色。如果俄军聪明一些，暂时不去打扰土军，不去进攻他们，情况就会是这样。如果天气条件允许俄军发动攻击，土军便会立即被消灭，虽然这将使俄军付出较高的代价，而且除了振奋士气之外不会给他们任何好处。

其次，同盟国雇佣（只能用这个词）了 15000—20000 皮蒙特

人，用以补充缺额的英军，他们的给养由不列颠军需部供给。在1848和1849年，皮蒙特人曾表现出他们是勇敢善战的兵士。他们大都是山民，他们的步兵就其本身条件来说甚至比法国人更适于在起伏地上和散开队形内作战；而波河平原提供的骑兵，身材高大、体格匀称，就像英国精锐的骑兵团一样。同时他们在革命时期的严酷战争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两个皮蒙特师，无疑是当前战争中不坏的“外籍军团”。但是在一个根本不懂机动而且只要求兵士具有高度顽强性（这种顽强性是英国兵的荣誉，也是他们唯一的军事素质）的英国老顽固^①的指挥下，这些动作灵巧迅速、个子不高的年轻人又能干出些什么呢？他们会被配置在不适于他们所习惯的作战方法的阵地上，不能干他们所擅长的事，并被派去完成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所不会下达的任务。像在阿尔马河所作过的那样，把不列颠军队无意义地、轻率地、愚蠢地赶到屠场去的这种作法，也许就是完成任务的捷径了。而老公爵^②通常也是轻率地对待这类事情的。德意志军队也许可能被迫这样做，虽然他们的军官因有较好的军事素养而不会长久地容忍这种拙劣的指挥。但是，要对法国军队、意大利军队或西班牙军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是不可能的。这些军队训练出来主要是为了担任轻步兵、进行机动和利用有利的地形，也就是说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兵士的运动性和灵活性。那科笨拙的作战方法对于这些军队是绝对不适用的。然而，可怜的皮蒙特军队或许能避免按英国方式作战这一严重的考验。要知道皮蒙特军队的给养是由不列颠军需部供给的，而这个名声很坏的机关直到现在只能

① 腊格伦。——编者注

② 威灵顿。——编者注

自己供应自己。因而，皮蒙特军队将遭到与新补充的不列颠部队同样的命运。他们会像这些不列颠部队一样，每周死亡 100 人，而送进医院的人数将比不列颠的多两倍。但如果腊格伦勋爵以为皮蒙特军队会同不列颠部队一样驯服地容忍他的低能和他的军需官的无用，那末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是大错特错了。在这种情况下肯俯首听命的，恐怕只有英国人和俄国人，而且应当承认，这并不能为他们的民族性格增添光彩。

这个凄凉阴沉得像遍地污泥的塞瓦斯托波尔台地一样的战局的以后进程可以描述如下：一旦俄军把兵力集中完毕而天气又许可作战，他们大概就会首先攻击奥美尔—帕沙的土耳其军队。英国人、法国人和土耳其人都预料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给土军指定的阵地是非常不利的。总之，这一点正是说明，把土军派到北面完全是有意意识的，很难有比联军将领的这种被迫的供认更能证明联军已陷入绝境的了。土军将被击溃，这是不用怀疑的。但联军和应蒙特军队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再吹嘘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了。伦敦“泰晤士报”就这个题目发表了爱·纳皮尔上校 2 月 3 日的一封信，信中断言，如果联军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南区，那末他们突入城内的可能性极大，但他们将被北区的俄国堡垒和炮台的优势火力彻底消灭，同时也将被俄国的野战部队围困住。他说，应当首先打败这支部队，然后从北面和南面围攻城市。他举出威灵顿公爵曾两次由巴达霍斯撤围去迎击被围者的援军的例子⁴⁷。纳皮尔上校说的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有名的巴拉克拉瓦侧敌行军时，本报也曾发表过几乎相同的意见。⁴⁸但是，这位上校在说联军能够突入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显然没有估计到俄国防御工事的特点，而正由于这种特点，要想一举攻下城市是

不可能的。那里最外面有外围工事，往里有主墙，主墙内有改建成多面堡的城市建筑物；街道上设有街垒，整个街区的房屋都凿有射孔，岸防炮台的后墙上也凿有射孔，要想夺取每个炮台都需要进行单独的攻击，可能还需要进行单独的围攻，甚至还需要进行地道爆破。除这一切以外，俄军最近几次胜利的出击，还充分证明围攻部队已经向城市推进到这样的距离，以致双方势均力敌，并使攻击的一方除炮兵占优势外别无任何优势。只要俄军的出击还不能被制止，任何强攻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假如围攻者无力把被围者逼困在要塞的围墙内，那就更不可能指望以白刃战攻下要塞了。

这样一来，围攻部队今后仍将毫无作为地呆在自己的兵营内。他们将由于自己兵力的薄弱和俄国野战部队的威胁而被困于兵营内，同从前一样逐渐瓦解，而这时俄军将调来生力军；只要英国新政府不投入任何新的兵力（关于这些兵力到现在还一无所知），那末总有一天，英军、法军、皮蒙特军和土军都将被赶出克里木。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2 月 9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2 月 2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2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帕麦斯顿。——军队

伦敦 2 月 9 日。由于帕麦斯顿和悉尼·赫伯特担任了新的内阁职务，所以必须履行把他们重新选入议会的手续。由于这个原因，两院在昨天都把会议延长一周。得比勋爵和兰斯唐侯爵在上院报告内阁危机的幕后经过时，只是重复了已经说过不止一次的东西。重要的仅仅是得比揭露帕麦斯顿勋爵处境的秘密的一番话。大家知道，帕麦斯顿在议会中没有任何政党或者冒充为政党的集团。辉格党人、托利党人、皮尔分子都同样地对他不信任。曼彻斯特学派公开反对他。在梅费尔激进派（不同于曼彻斯特激进派）中，他的亲信总共不超过一打人。既然如此，那末究竟是谁和什么东西使他有可能把自己强加给女王和议会呢？是他的名声吗？他的名声很少能够有助于这一点，正像格莱斯顿、赫伯特、格莱安和克拉伦登的坏名声只能妨碍他们重新执政一样。或许，一个从来不属于任何政党、轮流为各个政党效劳、轮流离开各个政党并且经常在各个政党之间保持平衡的人，是企图组织联合内阁来阻止历史进程的那些瓦解了的政党的天生领袖吧？目前这种情况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它不足以使帕麦斯顿还在 1852 年就代替阿伯丁担任联合内阁的首脑。

得比提供了一把揭开谜底的钥匙。帕麦斯顿是波拿巴的公开

的朋友。他的过于仓卒地承认 1851 年 12 月的政变，当时被当做他退出辉格党内阁的原因。⁴⁹所以他是一个《persona grata》——得到波拿巴信任的人。而同波拿巴结成联盟在目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帕麦斯顿就借助于对外政策的因素来拼凑内阁，——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只要进一步了解 1830 年到 1852 年期间英国内阁的历史就很容易相信这一点。

由于克里木军队的状况现时已经不可能被利用来进行内阁的阴谋活动，约翰·罗素勋爵在昨天下院会议上放弃了自己对情况所作的阴暗估计，准许不列颠军队再增加两三万人，并且为此同有正统信仰的格莱斯顿互相庆贺。尽管“议会使”不列颠军队“复活”，但是毫无疑问，现在不列颠军队作为一支军队来说已不复存在了。有数千人还被认为“能够服役”，因为医院里没有他们的床位。10 万名法国军队还剩下 5 万来人。可是，既然整个冬季要扼守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要从南面封锁塞瓦斯托波尔，要防守堑壕，而春天还要用剩下的兵力转入进攻，那末，这 5 万或 6 万人又能抵什么用呢？可能法国人会准备好新的师，在 3 月间把他们由水路运去，但是他们正在花许多力量准备应付大陆上的春季大战。而且从一切迹象看来，他们派去的增援部队或者过弱，或者过迟。

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所采取的两个救急措施，证明它们无能为力，也证明它们让军队到克里木去听天由命。

它们希望纠正对克里木的远征迟了 4 个月的错误，但同时却犯了一个不可估量的更大的错误：正值严冬的时候，在它们自己的军队到达克里木后过了 4 个月，又把土耳其的唯一可用的残余部队派到那里去。这支军队的兵力和战斗力，由于土耳其政府的

玩忽职守、无能和投靠外国，已经在苏姆拉受到摧残，因此一旦他们在克里木登陆就会因饥寒而迅速瓦解，其瓦解之快甚至会使英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都显得逊色。

只要俄国人把自己的兵力完全集中起来，天气条件又允许他们采取野战行动，俄国人大概会首先攻击奥美尔—帕沙的土耳其军队。英国人和法国人预料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指定给土耳其人的阵地是多么不利。因此，联军清楚地表明，他们现在把土耳其人调往北方，是有意识地犯这个战略性错误的。只有当俄国人犯下难以置信的错误时，土耳其人才能免遭必不可免的复没。

其次，英国人和法国人雇佣了 15000 个皮蒙特人，用以补充缺额的英军，他们的给养由不列颠军需部供给。在 1848—1849 年，皮蒙特人曾表现出他们是优秀的和勇敢的兵士。他们大都是山民，他们的步兵在起伏地的军事行动中，在成散开队形作战和在互射方面甚至都超过法国人。另一方面，波河平原提供的骑兵可以同英国的近卫骑兵媲美。最后，他们在革命时期的最后几次战局中经过了严酷的锻炼。这些活泼、伶俐、敏捷、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干什么都行，就是不适合当要他们当的英国兵，不适合采取腊格伦的全部战术——通常的笨拙的正面攻击。此外，他们将由不列颠军需部供应给养，而到目前为止英国的军需部只能自己供应自己！因此，雇佣 15000 个皮蒙特人可能又是一次新的失策。

目前已暂时停止派遣英国增援部队了。看来是腊格伦本人禁止派遣的，因为他连现有的残余部队都对付不了。谁能相信，在不列颠的兵营内患病的、过度疲劳的和精力衰竭的现象愈是普遍，惊人的鞭笞制度采用的就愈是广泛呢？有些人早该送进医院了，却接连好几周地执行着勤务，穿着湿衣服睡在潮湿的土地上，以几乎是

非人的坚毅精神来忍受这一切，如果发现他们在堑壕里睡着了，他们就要受到“九尾皮鞭”和棍棒的款待。“给懒汉五十大板！”——这就是腊格伦勋爵常常下达的唯一的战略性命令。如果著名的向巴拉克拉瓦“侧敌行军”的创造者所指挥的兵士摹仿他同样向俄国人方面“侧敌行军”来逃避棍棒，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正像“泰晤士报”的记者所报道的，开小差跑到俄国兵营里去的现象日益严重。

关于强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话自然收起来了。据说首先应当粉碎在开阔地上的俄国军队。要知道威灵顿两次撤除对巴达霍斯的包围，为的是对付前来援助被围者的军队。此外，已经讲过，俄国人重新修筑起来的防御工事使得用强攻夺取城市成为不可能⁵⁰。最后，俄国人最近的出击证明，联军对俄军的优势只是在炮兵方面。因此，在不能制止俄军出击以前，关于强攻的任何想法都是荒谬的。如果围攻者不能把被围者封锁在要塞内，那就更不用指望在白刃战中拿下这个要塞。因此，被本身的弱点和俄国的野战军困在自己营地上的围攻者今后也只好在营地上偷安下去。他们的兵员依旧会减少，而同时俄国人却会调来生力军。如果联军仍找不到直到现在还完全不知道的、而过去又没有估计到的新的资源，那末在克里木演出的欧洲战争的序幕将以联军的复没而结束。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2月9日

载于1855年2月12日

“新奥得报”第7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 议会新闻：格莱斯顿的发言

伦敦 2 月 10 日。格莱斯顿——阐述教义的财政大臣和财务上的邓斯·司各脱——对一句旧俗语“信仰创造奇迹”作了新的论证。他依靠信仰使死人复活，并且依靠信仰使克里木的英国军队从 11000 人增加到 3 万人。他要求议会也依靠这种信仰。但不幸得很，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的医务主任霍尔医生的报告恰巧寄来了。根据这份报告，不仅第六十三团全团复没，就连去年 11 月离开英国的由 1000 人组成的第四十六团也只剩下 30 名具有战斗力的人员了；霍尔医生说，还在担任勤务的人中有一半是应该送进医院的，在兵营里顶多只剩下 5000—6000 名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兵士。凡是了解笃信宗教的保护者的勾当的人都不会怀疑，格莱斯顿像福斯泰夫一样，能把 6000 个“穿麻衣的人”^①变成 3 万人。难道在星期四举行的议院的最近一次会议上他不曾对我们说过，那些作过粗略计算的人都是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出发的；例如，惯于低估克里木军队数量的人计算骑兵就不是像他本人所计算的那样——似乎在巴拉克拉瓦会战后一般还存在着值得一提的骑兵！在进行统计时，对于格莱斯顿来说是丝毫不值得把“失踪的人”算

①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

入的。他在星期四的会议上就自己军队的“预算”所作的宣传——其中把每个借方都当做了贷方，把每个赤字都当做了余额，并且最后说他“原谅反对政府的人所作的夸大”——是绝妙无比的。他在劝说议员不要“感情”用事时的腔调和姿态也是绝妙无比的。应当温存地体谅别人的痛苦——这就是有正统信仰的格莱斯顿的座右铭。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1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2 月 13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3 号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勋爵⁵¹

—

伦敦 2 月 12 日。帕麦斯顿勋爵毫无疑问是官方英国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非凡人物。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老头子，并且从 1807 年起几乎一直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但是他总能想出办法使自己具有新奇的吸引力，唤起人们通常对大有前途的和经验不足的青年人所抱的一切希望。而且虽然他一只脚已经跨进坟墓，但是人们仍然认为他的真正的官运还在前面。假如帕麦斯顿明天逝世，那末，知道他整整半辈子都担任大臣的整个英国将为之震惊。他并不是一个全能的国家活动家，但无疑是一位全能的演员；他同样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英勇的气派和喜剧的作风；既能装出神色激动的样子，又能用亲昵的口吻说话；既能演悲剧，又能演滑稽剧；不过演滑稽剧也许更适合他的性格。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但却是一位十足的辩论家。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无与伦比的机智、上流社会的人物所贯有的机巧和灵活，他谙熟议会内的一切诡计、阴谋、政党和活动家，因而能从容不迫地判断最复杂的事务，每一次都能够迎合任何一个听众的偏见。他的 nonchalance（粗枝大叶）使他避免了任何意外的事故，他的利己主义和圆滑机巧使他防止自己公开暴露，而他的极度的轻率和贵族式的

冷淡又使他不致急躁。他善于用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博得一切人的好感。他从不失去自制力，从而使他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对他表示敬仰。如果他也找不到共同的见解，那他总是打算从大家所讲的话中织出优美的花纹。如果他也没有能力控制某个对象，那他还是能够玩弄它。他善于哆嗦着躲开同强敌作斗争，而使弱者成为自己的敌人。

他事实上屈从外国的势力，但在口头上却反对它。帕麦斯顿继承了坎宁的衣钵，仿制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传播立宪主义的使命的理论（顺便说一下，坎宁在临终时曾警告要预防他），因此，不用说，他任何时候都不会没有理由来向民族偏见谄媚，同时又去支持外国列强怀有妒意的怀疑态度。当他用这种恰当的方法使自己变成大陆各宫廷的 *bête noire*（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和憎恨的东西）^①以后，他就毫不费力地在国内赢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虽然帕麦斯顿最初是托利党人，但是他善于在执掌外交政策时玩弄《shams》（“骗术”）和制造矛盾，而这些正是辉格主义的实质。帕麦斯顿善于借用过去贵族的英国的傲慢语言，把民主的空话同寡头政治的观点结合起来，袒护鼓吹和平的资产阶级。他善于在自己同意的时候装成一个攻击者，而在自己叛卖的时候装成一个保卫者；他善于宽恕表面上的敌人和使假装的盟友凶横起来；在争论的决定性关头，他善于站在比较强的一边去反对弱者，大胆地发言，然后溜之大吉。

一些人指责他领取俄国的津贴，另一些人怀疑他是烧炭党人。1848年当他有被控告同俄国订有秘密协议而有受法律制裁的危

^① 直译是：“凶猛的野兽”。——编者注

险时，他不得不在议会内为自己辩护。后来在 1850 年，他成了外国大使馆的迫害对象（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满意），因为外国大使馆制造了一个反对他的阴谋，这个阴谋在上院获得了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破产⁵²。如果说帕麦斯顿出卖了别国人民，那末他是非常有礼貌地干这个勾当的。如果说压迫者总是能够指望得到他的真正的帮助，那末对于被压迫者他总是慷慨地赐予他那雄辩家的虚夸的宽大。波兰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各国人民运动的被镇压，恰巧都是在他执政期间，镇压这些人民运动的胜利者总是怀疑他同牺牲者有秘密来往，而他们对牺牲者的迫害却又是得到他的允许的。到目前为止，凡是有他这样一个敌人的，总能指望获得胜利；凡是有他这样一个朋友的，则必定要遭到失败。但是如果帕麦斯顿的外交艺术并没有使他同外国的谈判取得多少还良好的结果，那末这种艺术也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在：他善于迫使英国人民把空话当作事实，把幻想当作现实，而看不见在高尚的借口后面所掩藏的卑劣的动机。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在 1807 年波特兰公爵政府成立时被任命为海军副大臣。1809 年他开始担任 secretary atwar（军务大臣），在 1828 年 5 月以前他在派西沃、利物浦、坎宁、葛德里奇、威灵顿的内阁里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如何，把这个“自由制度”的唐·吉诃德，这位“光荣的立宪制度”的品得看做托利党内阁的著名的常任阁员是令人奇怪的，因为托利党内阁曾颁布谷物法⁵³，允许外国雇佣兵驻在英国土地上，经常给人民“放血”（西德默思勋爵的说法），堵塞报刊喉舌，禁止集会，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一度废除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时还剥夺个人自由——总之，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处于戒严状态！1829 年，帕麦斯顿投奔辉

格党,于1830年11月被该党任命为外交大臣。如果不把托利党执政的几段时间即1834年11月—1835年4月和1841—1846年计算在内,那末帕麦斯顿从1830年革命时起到1851年政变时止一直执掌英国的外交政策。下一次的通讯将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作一概述。

二

伦敦2月14日。最近几星期内“笨拙”不止一次地把帕麦斯顿描述成傀儡戏中的彼特鲁什卡。大家知道,彼特鲁什卡是一个专门破坏社会安宁的人,是吵闹打架的爱好者,是引起有害的误会的祸首,是干丑事的能手。他只有在自己所引起的普遍不安的环境中才觉得自由自在,他利用这种普遍的不安把妻子、儿女以及警察扔向窗口,以便最后制造无谓的骚扰,使自己几乎摆脱得一干二净,并且挑衅性地对发生的丑事幸灾乐祸。因此,帕麦斯顿勋爵是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不知疲倦的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至少在艺术形象中是如此),他寻找各种困难、阴谋和复杂问题来作为他从事活动的必要材料,因此他在没有发现冲突的地方制造冲突。从来没有一个英国外交大臣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里发挥过这样的积极性。封锁些耳德河、塔霍河、杜罗河,封锁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⁵⁴,远征那不勒斯,因帕西菲科事件而引起的远征和对波斯湾的远征⁵⁵,在西班牙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和在中国为输入鸦片而进行的战争⁵⁶,制造北美边境事件,向阿富汗进军,轰击圣让得阿克⁵⁷,在西非因陪审权问题而干丑事,甚至在《Pacific》(“太平洋”)制造纠纷,——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和附带着不可胜数的带有威胁性的

照会，一捆一捆的记录和外交抗议书。所有这些纷扰通常总是以保证高贵的勋爵获得短暂的胜利的激烈的议会辩论而告终。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帕麦斯顿像一个演员那样来对待外交上的冲突，到一定的时候他使冲突尖锐化，但只要冲突一有可能引起过于严重的后果或者已经引起他所需要的那种戏剧性的激动时，他就立刻让步。世界历史本身就好像是一种专门为了使帕麦斯顿一族中的这位高贵的帕麦斯顿子爵得到满足而臆想出来的消遣品。这就是帕麦斯顿的光怪陆离的外交所给予经验不足的人们的第一个印象。然而，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从他的一切外交措施中得到惊人的好处的只是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不是英国而是俄国。帕麦斯顿的朋友休谟在 1841 年曾经说道：

“即使俄国皇帝在英国内阁中有他的代理人，那末这个代理人也未必能比高贵的勋爵更好地保卫俄皇的利益。”

帕麦斯顿的一个最热烈的崇拜者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在 1837 年曾对他说过以下的话：

“高贵的勋爵还打算让俄国侮辱大不列颠和损害不列颠的贸易多久？高贵的勋爵在全世界面前损伤英国的尊严，把英国打扮成一个对弱者傲慢无礼和残酷无情、对强者俯首恭顺和奴颜婢膝的爱吹牛的寻衅者的角色。”

不管怎样，决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所有对俄国有利的条约，从阿德里安堡条约到巴尔塔利曼尼条约⁵⁸和关于丹麦王位继承权的条约⁵⁹都是在帕麦斯顿的庇护下签订的；诚然，在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时，帕麦斯顿并没有参加政府，而是在反对派内，但是这项条约正是在他的密谋策划下得到承认的。另一方面，他当时领导辉格党反对派，攻击阿伯丁倒向奥土一边的方针，他曾经说过，俄国是文明的捍卫者（参看 1829 年 6 月 1 日、1829 年 6 月 11 日、

1830年2月16日等的下院会议记录)。罗伯特·皮尔爵士关于这一点曾经在下院说过：“他弄不清帕麦斯顿究竟是谁的代表。”1830年11月帕麦斯顿担任了外交大臣。他不但拒绝法国提出的鉴于“圣詹姆斯和圣彼得堡内阁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进行有利于波兰的共同干涉的建议，而且还禁止瑞典把自己武装起来，对已派兵去俄国边境的波斯进行威胁说，如果它不把军队撤回，将诉诸战争。帕麦斯顿甚至清偿了俄国的部分军事费用，没有得到议会的授权仍继续按照所谓俄荷贷款协定支付主要款项和利息，尽管关于这项贷款的协定已被比利时的革命所废除。⁶⁰1832年，他准许放弃希腊国民议会作为1824年希英贷款的保证而给英国契约一方的以领土所作的抵押，并把它移作在俄国帮助下签订的另一项贷款的保证。在帕麦斯顿给英国驻希腊的驻办公使道金斯先生的急电中经常指出：“你应该在俄国代表的同意下进行活动。”1833年7月8日，俄国迫使土耳其政府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不让欧洲各国船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保证俄国在土耳其实行八年的专横统治（见条约的第二条）。⁶¹苏丹^①被迫签订了这项条约，因为俄国舰队已停泊在波斯普鲁斯，而俄国军队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门口，似乎是为了防御伊布拉希姆—帕沙。帕麦斯顿一再拒绝土耳其提出的从它的利益考虑而加以干预的坚决请求，这样来迫使土耳其同意帮助俄国。（这从帕麦斯顿在下院1833年7月11日、8月24日和其他日期的会议上以及1834年3月17日的会议上的声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到帕麦斯顿勋爵出任外交大臣的时候，英国在波斯的势力显然已占优势。英国代表经常得

^①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到他的指示：他们“在一切场合下都应该在俄国大使的同意下进行活动”。依靠帕麦斯顿的帮助，俄国才能使它的一个王位追求者^①登上了波斯的宝座。帕麦斯顿勋爵赞许俄波向赫拉特远征。这次远征失败之后，帕麦斯顿发出英印向波斯湾远征的命令，这是促使俄国在波斯的势力加强的一种虚张声势的做法。1836年，英国在高贵的勋爵的政府领导下第一次承认俄国在多瑙河口的侵占，承认由它实施检疫和关税条例⁶²等等。同年帕麦斯顿利用英国商船“雌狐号”被驻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卡列湾的俄国军舰没收的机会（“雌狐号”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要求而被派往该地），正式承认俄国对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贪求。同时又发现，帕麦斯顿早在六年前就已秘密承认俄国对高加索的贪求。当时这位高贵的子爵仅靠16票的多数在下院避免了对他的谴责。当时对帕麦斯顿最激烈的指责者之一是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即现在的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雷德克利夫勋爵。1836年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英国代表^②同土耳其签订了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协定。帕麦斯顿拖延批准这项条约，而在1838年却偷偷摸摸地签订了一项对俄国十分有利而对英国十分不利的条约，以致使某些在近东各国的英国商人决定今后在俄国商行的保护下来进行贸易。由于国王威廉四世的逝世，发生了一件与“公文集”⁶³有关的恶名四播的丑事。在华沙革命期间，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宫中保藏的俄国外交官员和大臣们的全部秘密通信和急电等都落到了波兰人手里。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侄子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运到了英国。在这里，根据国王的命令，这些文件由乌尔卡尔特编辑并在

① 穆罕默德—沙赫。——编者注

② 乌尔卡尔特。——编者注

帕麦斯顿总的监督下在“公文集”上发表。国王一死，帕麦斯顿就马上否认他曾参与在“公文集”上发表这些文件的工作，拒绝付给印刷厂主费用等等。当时乌尔卡尔特公布了他同帕麦斯顿的助手巴克豪斯先生的通信。“泰晤士报”（1839年1月26日）就这件事评论道：

“我们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十分清楚，任何一个自命为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在这些通信公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12 和 14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16 和 19 日
“新奥得报”第 79 和 8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 1854—1855 年论
文书信集”（1924 年版）

卡·马克思
赫伯特的重新当选。——新内阁的
最初措施。——东印度的消息

伦敦 2 月 16 日。昨天在萨里斯柏雷市政大厅里演了一出把悉尼·赫伯特重选为威尔特郡南部地区的议员的滑稽剧。威尔特郡甚至在英国各郡中也以地产集中而著名，因此，那里的全部土地成了不到一打家族的财产。除了苏格兰北部的某些地区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威尔特郡那样大量地把居民从土地上“清扫”出去，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威尔特郡那样彻底地实行现代农业制度。要不是为数不多的领主之间有时爆发家族纷争，威尔特郡就不会有什么选举的斗争。

除了悉尼·赫伯特以外，没有提出任何候选人。因此，主持选举大会的郡长在会议一开始就马上对赫伯特说，他按照一切法规重新当选了。于是悉尼·赫伯特站了起来，向自己的佃农和仆从说了几句应景的话。这时，市民们渐渐聚集在大厅里了，他们没有选举权，但是英国宪法赋予他们一种特权，即在 *hustings*（选举大会）上可以提出问题来麻烦候选人。悉尼·赫伯特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各种各样的问题像冰雹一样打在他神圣的头上：“给我们兵士吃生咖啡豆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军队在哪里？”“昨天‘泰晤士报’上是怎样谈论您的？”“为什么您要放过敖德萨？”“您

的舅舅俄国沃龙佐夫公爵有没有霸占敖德萨的宫殿？”等等。当然，对这些非议会公众和他们所提的问题，谁都没有去理睬。相反地，悉尼·赫伯特却利用了喧嚷声稍微静一些的时机，提议向如此“公正地”主持了“讨论”的郡长表示感谢。这个提议在议会公众的掌声中和非议会公众的嘘声和怨声中被通过了。接着又是一连串毁灭性的问题：“谁使我们的兵士挨饿？”——“送他自己去打仗吧！”等等。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此后，郡长宣布持续了半小时多一点的演出结束，于是闭幕了。

新改组的内阁的最初一些措施决没有受到称赞。新任陆军大臣潘缪尔勋爵是个残废人，因此他的职务的主要重担都落在陆军副大臣的肩上。任命已故的皮尔的小儿子弗雷德里克·皮尔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引起了很大的愤怒，因为弗雷德里克·皮尔是一个公认的庸碌无能的人。虽然他很年轻，但他却是陈规陋习的活的化身。别人都是逐渐变成官僚的，而他生来就是一个官僚。弗雷德里克·皮尔是靠皮尔派的势力得到职位的。因此应当使辉格党人也起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弗兰西斯·贝林爵士也被任命为朗卡斯特公国的大公。他曾经在墨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中担任过财政大臣，当时得到了“赤字先生”这个非常合适的绰号。在军队中完全是按元老制度来任命官职的。这样，80岁的西顿勋爵被任命为爱尔兰军队的司令。年迈耳聋患痛风病的罗克比勋爵被派到克里木去当近卫旅的指挥官。驻克里木的第二师原先由雷希·伊文思爵士指挥，现由丝毫不像参孙的辛普森将军指挥；相反地，朴次茅斯市长的悠闲职位对这位高龄的将军倒是十分合适的。1811年的准将萨美塞特将军到东印度去担任总司令。最后，被“泰晤士报”称之为老“无政府主义者”的、曾在君士坦丁堡把一

切运输工具等等弄得杂乱无章的海军上将博克塞，现在被派到巴拉克拉瓦去整顿那里的港湾“秩序”。

“泰晤士报”说道：“我们怕不得不要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寻找内阁力量的源泉了。向那些大手大脚和不加考虑地浪费国家最好的资源的人去控诉这种浪费行为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他们没有被长期执掌政权（政权经常由他们阶级的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冲昏头脑，他们至少在目前不会让那种固执的和浅薄的利己主义暴露出来。自卫的本能看来应当教会他们某些东西，而我们要郑重地问一问英国人民：他们能容许他们的同胞去作冷酷无情或庸碌无能的牺牲品吗？”“泰晤士报”威胁地宣称：“不是内阁，甚至不是下院，而是不列颠宪法在受审判。”

最近来自东印度的消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证明了加尔各答和孟买的不景气状况。在纺织工业区，危机缓慢地但是不可避免地临近了。曼彻斯特细纱工厂的厂主在前天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从2月26日起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四日工作周制，并在此期间号召附近的工厂主也采取这个办法。在布莱克本、普雷斯顿和波尔顿的工厂中，工人们已经预先得到通知：往后他们按“不完全的工作周”工作。破产的事例将特别多和严重，原因是去年有许多工厂主为了影响市场，不通过商行而把出口贸易掌握在自己手里。上星期三“曼彻斯特卫报”⁶⁴承认，不仅工厂制品，而且工厂本身都发生了过剩现象。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2月1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2月20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85号

卡·马克思 议 会

伦敦 2 月 17 日。昨天议会又开会了。下院充满了颓丧情绪。它似乎沮丧地意识到最近三个星期政治上的勾结使它的威信完全扫地了。执政的依旧是以前的内阁，只是稍加刷新而已。两个不能和睦共处的老勋爵在内阁中消失了，但是同他们一起得不到信任的第三个老勋爵，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升到最高的一级。帕麦斯顿勋爵受到了庄重的冷遇。没有任何《cheers》（“欢呼声”），没有任何热情。人们破例地用极其冷淡和怀着敌意的怀疑态度对待他的演说。同时，他的记忆力也反常地不听使唤了，茫然若失地翻着放在他面前的笔记本，最后还是查理·伍德爵士悄悄地提醒他应该继续说什么。看来，听众并不相信，换一块招牌就能使老商行免遭破产。帕麦斯顿的全部神态令人回想起红衣主教阿尔贝罗尼谈奥伦治的威廉的一番话：

“当这个人握住天平的时候，他是强有力的；但从他把自己投到天平的一端的时候起，他就软弱无力了。”

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无可争辩地出现了反对改组过的旧联合的新联合——以迪斯累里为首的托利党人同激进派中最坚定的人物累亚德、邓科布、霍斯曼以及其他等人的新联合。正是在激进派中，在梅费尔激进派中，帕麦斯顿一直有着自己最忠实的

拥护者。一家内阁的报纸低声地说：累亚德要得到陆军部的一个职位的希望落空了。另一家报纸则暗示说：随便给他一个职位吧！

帕麦斯顿勋爵在介绍自己的新内阁以前，简略地叙述了内阁危机的经过情形。然后他就开始吹嘘自己的货色：他组织的内阁

“具有足够的行政管理能力，足够的政治洞察力，高度的自由主义原则，充分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履行自己职责的决心”。

克拉伦登勋爵、潘缪尔勋爵、格莱斯顿先生、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恭维。但是，他说这个出色的内阁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出席这次会议的罗巴克先生坚持下星期四要任命调查委员会。议院干吗需要委员会呢？请回忆一下理查二世时代瓦特·泰勒暴动时期的一件可笑的事。年轻的帝王遇到了一群暴动者，他们的首领刚刚在他们的眼前死去。帝王就勇敢地走到他们面前大声地说：“你们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朋友们，我来当你们的领袖吧。”“而我（年轻的（！）独裁者帕麦斯顿）这样说：如果你们，下院，同意不要这个委员会，那末政府本身就充当你们的委员会吧。”

这样不恭敬地把议院比作一群“暴动者”和毫不客气地要求把内阁变成自己本身的审判官，受到了讥笑。你们究竟想要什么，——帕麦斯顿提高了嗓门，用爱尔兰的挑衅方式仰起了头大声地说——调查委员会追求的是什么目的？管理方面的改善。那很好！请听一下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过去你们有两个陆军大臣：secretary at war（军务大臣）和陆军大臣。今后你们只会有一个，即陆军大臣。至于军械部，则总的军事领导归最高统帅（Horseguards），非军事领导归陆军大臣。运输部门将要扩大。按照 1847 年的法律，过去服兵役的期限是 10 年；今后可以

在任何期限——从1年到10年雇人入伍。不得雇佣小于24岁、大于32岁的人入伍。现在谈战区情况！为了在作战方面和战区的管理方面做到步调一致、坚强有力和有条不紊，帕麦斯顿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办法：在每一个职位上增设一个具有不定权力的监督员。腊格伦勋爵仍任总司令，但是辛普森将军将担任总参谋长，腊格伦应当“认为自己有义务执行他的建议”。约翰·伯戈因爵士将被召回，而哈利·琼斯爵士则被任命为军需部的总全权代表，具有无一定限制的独断权力。但是同时将派一个文职人员——约翰·麦克尼耳爵士（著名的小册子“俄国在东方的进展”⁶⁵的作者）到克里木去调查军需部的侵占行为、无能和失职的问题。在士麦那和斯库塔里将建立新的医院，在克里木和英国本土将实行医务部门的改革；在克里木和英国之间运送伤病员的运输船只每10天往返一次。但是，除此以外，陆军大臣还要求保健委员会主席派3名文职人员到克里木去，以便在春季到来的时候在那里采取预防鼠疫的必要的卫生措施，并对全体医务人员的活动和医务工作的安排进行检查。由此可见，在职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而腊格伦勋爵由于现在他的“最高指挥受到了合法的制度的限制”而得到一种补偿，即有权进行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支由300名土耳其的街道清洁工人和掘坟工人组成的队伍的谈判。这些工人应当在解冻天气来临时把死亡的兵士、倒毙的马匹以及所有的垃圾抛到海里去。在战区将建立专门的陆上运输。可见一方面将准备今后的军事行动，同时约翰·罗素勋爵又将准备在维也纳签订和约（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迪斯累里。——听了高贵的勋爵对自己的同僚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政治洞察力”的赞语，很难相信他说的就是议院在19天以

前所谴责的那些“无与伦比的犯错误的能手”！姑且认为约许的改进办法会付诸实现并将产生预期的效果。但是这些改进办法难道不是对唯一反对实现它们并把下院关于调查过去管理不当的原因的决定解释为对自己投不信任票的内阁的最恶毒的讽刺吗？就连约翰·罗素勋爵也说，军队无声无息地消失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调查造成这种情况的难以猜测的原因是必要的。议院本身是否一定要把自己置于愚蠢的境地，重新撤销它刚在 10 天以前通过的决定呢？如果那样，它就会长时期完全丧失它对社会的影响。高贵的勋爵和他的焕然一新的同僚举出了什么样的论据说服下院去任人愚弄呢？这就是一些诺言，而这些诺言，如果没有建立调查委员会的威胁，是决不会提出的。迪斯累里坚持议会进行调查。帕麦斯顿担任了崇高的职务之后，就开始威胁议会的独立活动。还从来没有一届内阁像阿伯丁勋爵的内阁——“上一届”内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样得到反对派这样的支持和这样的愿意为它效劳！迪斯累里说，这两个特洛来奥完全把他搞糊涂了；因此，最好是说：“上一届内阁和它目前忠实的继承者——它在内阁席位上的孪生兄弟。”

罗巴克声称，下星期四，他将提出由议院批准成立的委员会的候选人。政府仍旧是老政府，只不过把牌重洗了一下，但是这些牌又落入了过去那些人的手中。只有下院直接干预才能打破陈规陋习的束缚，消除使政府甚至在愿意改革的情况下也不能进行必需的改革的那些障碍。

托·邓科布。——高贵的勋爵向我们声明说，他和政府同意自己来充当我们的委员会！我们万分感激！议院想要调查的正是高贵的勋爵和他的同僚们的活动！勋爵答应改革，但是谁来实行

呢？就是那些管理不当而使改革成为必要的人。在管理方面丝毫没有改变。在罗巴克提案提出 *status quo ante* (以前的状况) 仍旧保持着。约翰·罗素勋爵胆怯地从自己的岗位溜走了。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是从利物浦勋爵的内阁开始到目前的内阁为止的 13 届已经死亡的内阁的一朵“枯萎的花”。所以他应当无可争辩地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行政管理才能”。他的潘缪尔勋爵甚至不能与纽卡斯尔公爵相比。任命委员会究竟还不是谴责，而只是说要进行调查。谴责大概接着就会来的。至于维也纳的谈判，那末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和人民对立的。人民希望对 1815 年的维也纳条约作有利于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修改。而且人民把反对俄国的战争理解为真正摧毁俄国的优势。

可见，帕麦斯顿内阁的开场和阿伯丁内阁的收场一样，就是反对罗巴克提案。下星期四以前将会施展一切手段来拼凑反对调查委员会的内阁多数。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1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2 月 22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88 号

卡·马克思 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

伦敦 2 月 19 日。我们在上篇报道^①中谈到的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现在已被伦敦所有的日报视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 了。内阁的“纪事晨报”⁶⁶就这一点指出：

“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不是由于那些注定要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而自己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的激动、受伤害的虚荣心、虚伪的功名心或者十足的愚蠢而加速到来的。得比派和自由派的联合是杂凑起来的，他们同罗巴克先生一道步法国众议院议员的后尘，这些议员发动 1848 年有利于改革的宴会运动，只想除掉内阁，而结果却推翻了王位。”

人们断言，罗巴克打算扮演罗伯斯比尔或者（十分值得注意的“或者”！）赖德律—洛兰的角色。他企图组织“社会拯救委员会”。他不怕推举以下的人作为他提出的调查委员会的候选人：罗巴克、德拉蒙德、累亚德、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世界工业展览会的大厦建筑师）、斯坦利勋爵（得比的儿子）、爱里斯、怀特塞德、迪斯累里、巴特、娄（“泰晤士报”秘密委员会委员）和迈尔斯。

“纪事晨报”继续写道：“我们面临着向我国贵族进行革命的十字军讨伐的公开威胁，对这一点避而不谈是无益的。蛊惑家们力图推翻帕克斯顿勋爵

^① 见本卷第 79—80 页。——编者注

的内阁，巧妙地利用迪斯累里和罗巴克的联合起来但又没有统一起来的战斗力量来反对它。民主派企图引起革命，有步骤地把内阁一个接着一个地推翻。”

最后，一家政府的机关报以解散议会，“向人民呼吁”相威胁，正像波拿巴在政变前几个月所做的那样。

财政部秘书长威尔逊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⁶⁷宣称，“代议制”和进行战争是不相容的。因此，过去的制帽工人威尔逊建议，担任国家职务的议员不必经过重选，可以 *ex officio*（根据职位）把下院的席位和投票权给予大臣——内阁阁员。这样，内阁就不依赖于选民和下院，而下院却要依赖于内阁。就此，“每日新闻”警告说：

“英国人民应当警惕起来，并准备保卫自己的代议机关。应当料到，有人企图减轻政府对下院的依赖程度。这也许会造成政府和议院之间的冲突。结果可能发生革命。”

事实上，下星期三，在被认为是伦敦最激进的一个区的梅里勒榜区，将举行群众大会，会上必将作出反对“政府企图抗拒议会调查”的决议。

在“纪事晨报”这样预告革命的同时，“每日新闻”却预告反革命的企图，“泰晤士报”也暗示二月革命，虽然它指的不是有利于改革的宴会运动，而是普拉兰谋杀案。刚好在前几天，爱尔兰大法官法庭审理了一起遗产案，在这个案件中，英国贵族克兰里卡德侯爵——墨尔本内阁时期的驻彼得堡大使和罗素执政时期的邮政主管部门的首长扮演了完全和巴尔扎克描写谋杀、通奸、欺骗和非法占有遗产的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一模一样的主角。

“泰晤士报”指出：“在 1847 年阴郁的秋天，当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惶惶不

安的预感激动着法国舆论界的时候，在巴黎社会的上层集团里发生了一件大丑事，这件事引起了本来就已受刺激的广大社会阶层的愤怒，并且大大加速了灾难的来临。凡是细心观察到目前舆论界极端激动的状况的人，就不能不同样激动地去注视在爱尔兰大法官法庭大厅里揭露出来的轰动一时的丑事。”

执政集团内部的犯罪行为，它的狂妄无能和软弱，英国精锐部队的复没，旧政党的瓦解，下院中没有紧密团结的多数，在早已过时的传统基础上建立的联合内阁，在极端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存在的情况下进行欧洲战争的开支——所有这一切都是充分说明大不列颠面临着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征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在政治幻想破灭的同时，自由贸易的幻想也在破灭。前者保证了贵族对行政权的垄断，而后者则保障了资产阶级对立法权的垄断。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92 号

弗·恩格斯 欧洲面临的战争⁶⁸

假如最近期间在维也纳不签订和约（目前在欧洲似乎没有人相信会签订和约），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将亲眼看到战争在欧洲大陆爆发；同这一战争相比，克里木战局只将起到它在世界三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所应起的无关轻重的作用。那时，直到目前还互不联系的在黑海和波罗的海上的军事行动，将被一条横贯这两大内海之间的整个大陆的战线联结起来，在人数上与萨尔马特平原^①的辽阔无垠相适应的双方军队，将为争夺这一片平原而战。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可以说，战争成为真正的欧洲战争了。

至于克里木战局，我们只需要作一些简要的补充说明。我们曾多次详尽地描述过它的性质，谈论过它可能的结局，因此现在只列举几个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论点。一星期以前我们曾说过^②，这一战局已变成增调援军的竞赛，并且俄国人可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现在已无须怀疑，到天气允许按原定计划开始长期的军事行动时，俄军在克里木半岛上的兵力将为 12—15 万人，而联

① 萨尔马特平原是古罗马时期对维斯拉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的称呼。——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 57 页。——编者注

军在尽了非凡的努力之后，可用来对抗俄军的可能只有 9 万人。即令法国和英国有足够的军队可以派往克里木，但已开往黑海的轮船却有四分之三在各种借口下被留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又能到哪里去找运输工具呢？英国横越大西洋的航线已完全瘫痪，现在迫切需要海洋轮船，但是无处可寻。唯一能够拯救联军的办法，是用军舰将奥地利大约 3 万人的一个军从多瑙河口及时运到克里木。没有这支增援部队，不论是皮蒙特军和那不勒斯军，或是英法为数不多的补充兵员以及奥美尔—帕沙的军队，都不能给联军以任何有力的援助。

现在来看一看英法已把哪一部分军队用于克里木。下面我们只谈步兵，因为配属给这种远征军的骑兵和炮兵所占的比例变动极大，以致无法对他们的数量作出任何肯定的结论。此外，一个国家的基于军队已有多少参战，总是根据步兵参战的数量来确定的。我们准备谈土耳其，因为参战的奥美尔—帕沙的军队是土耳其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支军队。至于它在亚洲部分的残部，已不能算作军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英国军队共有 99 个团，即 106 个步兵营，其中驻殖民地的至少有 35 个营。此外，约有 40 个营已编入派往克里木的头 5 个师，后来至少又有 8 个营前往增援。还余下约 23 个营，其中恐怕连一个营也抽调不出来了。因此，英国最近所采取的军事措施，实际上就等于公开承认它平时建立的基于军队已经用尽。为了弥补漏洞，他们还玩弄了各种花招——允许约有 5 万人的民军志愿到本土以外去服役；打算把他们派往直布罗陀、马尔他岛和科尔富岛，以便把驻在这些殖民地的约 12 个营抽出来派往克里木。已决定建立外籍军团，但很可惜，外国人似乎不愿意到这个实行体罚的军

队中来当兵。最后，2月13日又下令在93个团内建立第二营，其中43个营各为1000人，50个营各为1200人。这样就将增加103000人，此外，还将补充骑兵和炮兵17000人。但是这12万人中连一个人还没有招募到；而且谁来训练和指挥他们呢？不列颠军队奇特的组织和对它的共同领导，使除了后备连和若干后备营以外的几乎所有的步兵——不仅兵士，而且**军官**——都被调到克里木和殖民地去了。列入军队名册中领取半薪的将官和校官的确为数甚多，他们可以在这些新编的部队中任职。但据我们所知，领取半薪的上尉却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而受过必要训练的中尉、少尉和士官则根本找不到。生手很多，但是未经训练的军官是不能够训练未经训练的新兵的；大家知道，任何军队的骨干都是经验丰富的、久经锻炼的老士官。同时像威廉·纳皮尔爵士这样的权威人士也认为，要想使古老英国的任何一群乌合之众变成约翰牛所说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兵士”和“英国的精华”，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在有现成的**军官干部**的情况下尚且如此，那末在缺少下级军官或士官的情况下，想把还待征召的12万兵士个个都培养成英雄，又需要多少时间呢？我们可以认为，英国的全部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已陷入了这种困境，以致在今后一年内英国政府能够用以对抗敌人的兵力，最多也不过是一支4—5万人的“英勇的小部队”。即令这个数目可以增加，也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而且还会严重破坏未来的增援部队的全部训练工作。

法国军队的数量比较多，组织比较完善，已参加作战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法国有100个基干步兵团、3个朱阿夫团、2个外籍军团，每团有3个营；此外，还有20个猎兵营，6个非洲营，共计341个营。在这341个营中，有100个营即每个基干团各有1个

营为后备营，由它来接收和训练新兵；只是每团的头两个营用于作战，后备营则用于补充兵员，使头两个营经常保持足额。这样，就应当从营的总数中一下子减去 100 个。如果今后这些后备营被用来作为核心编成第三野战营（拿破仑时代常常这样做），那末就需要编入更多的新兵，而且还需要经过一些时间的训练才能用来作战。因此，目前法军可以使用的兵力不超过 241 个营。其中至少有 25 个营必须驻防阿尔及尔。4 个营现驻罗马。9 个步兵师，即大约 80 个营，已派往克里木、君士坦丁堡和雅典。除后备营外，按整数算来共使用了 110 个营，即几乎占法国平时步兵总数的一半。法国军队中所采取的措施，后备营的预先建立，在服役期最后一年归休的兵士的征集，不用紧急征兵即能圆满完成每年征兵任务的能力，以及法国人对服兵役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使法国政府有可能在一年内把步兵的数量增加一倍。如果我们注意到法国自 1853 年年中开始就不断地暗中扩充军备，建立了 10—12 个皇家近卫营，并且注意到去年秋季在某些兵营内所集结的兵力，那末就可以推断，目前法国国内的步兵总数同没有调出 9 个师以前的数量相等；如果再考虑到法军有可能以各团的后备营为基础编成第三野战营，而且不使后备营的训练职能受到显著的破坏，那末步兵数量甚至可能还要多一些。然而，如果我们说，3 月底以前在法国本土上的步兵将为 35 万人，那就不是估计过低而是估计过高了。按照法国的现行编制推算，35 万名步兵再加上骑兵、炮兵等，就相当于 50 万人的一支军队了。其中至少有 20 万人要留在国内作为后备营的基干，用来维持国内秩序以及为军事工厂和医院服务。因而到 4 月 1 日止，法国能参加战争的军队将有 30 万人，约 200 个步兵营。但这 200 个营不论在组织和纪律方面，或

是在战斗顽强性方面，都不能同以前派往克里木的部队相比。这些营将有很多年轻的新兵，许多营将是专门为了这次战争编成的。这些部队因为官兵互不了解，并且直到出发前才按上级指示仓卒编成，因此在许多方面都比老部队要差，而老部队的成员则因长期共同服役、共历艰险、多年朝夕相处，已养成了 *esprit de corps* (团结友爱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强烈影响下，即使最年轻的新兵也能很快地习惯本部队的生活。所以必须承认，已派往克里木的 80 个营在法国军队中所占的地位，比单从数字上所显示的要重大得多。如果说英国把它的全部精锐部队几乎不留一兵一卒地投入了战争，那末法国已把将近一半的精锐部队派到了东方。

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关于俄军兵力的材料，因为不久以前我们曾报道过俄军的人数和部署^①。只要指出下面一些情况就足够了：在俄国作战军队即用于本国西部边境的军队中，目前参加作战的只有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而近卫军、掷弹兵和第一军还未动用，第二军似乎派了约 1 个师的兵力到克里木去。除这些部队外，还有已经组成或正在建立的 8 个预备军，他们在人数上或营的数量上相当于作战军队的 8 个军。这样，俄国用以对抗西方的兵力约有 750 个营，但是其中可能有 250 个营尚在建立，并且永远也不会足额，另有 200 个营曾在两次战局中遭受严重的损失。至于预备部队，则每个团的第五、第六营多半由老兵编成（如果最初的建立部队的计划已经实现）；而第七、第八营则肯定由新兵编成，因而战斗力最差，因为俄国人虽然聪明，但是要他们习惯于担任军事勤务却需要很长时间。此外，所有的预备部队都缺少

^① 见本卷第 14—17 页。——编者注

军官干部。因此，目前俄国方面参战的部队约为其正规的作战军队的一半。尚未参战的另一半军队——近卫军，掷弹兵，第一军和第二军——是俄国军队的精华，是沙皇宠爱的部队，他对这一些部队的战斗力特别关心。而俄国把一半作战军队投入战争后，究竟取得了什么结果呢^①？俄国几乎全部摧毁了土耳其的进攻和防御能力；迫使英国葬送了 5 万军队，使它至少在一年内衰弱无力；此外，还迫使法国把相当于俄国自己派出的那样多的部队投入了战争。而当法国精锐的非洲团已同敌人交战的时候，俄军的 élite（精锐部队）却还一枪未放。

因此，虽然在欧洲作战的俄国部队并无任何胜利可以夸耀，而且相反地，在所有重大的会战中总是放弃阵地，放弃自己的一切计划，但是优势暂时还是在俄国方面。然而，只要奥地利一参战，情况就将起根本的变化。奥地利有 50 万军队已作好战斗准备；此外，后备部队有 10 万人，编入预备役的有 12 万人；如果进行一次规模很小的紧急征兵，军队总数就可能达到 85 万人。但是我们把它算作 60 万人，其中只包括后备部队，而不包括尚未征召的预备兵员。这 60 万人中，有 10 万人是后备部队，另有约 7 万人驻在意大利和受不到俄国威胁的国内其他地区。其余 43 万人编成数个军团，配置在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多瑙河下游一线，这样就能在很短时间内向任何地点集中 15 万人的兵力。一旦奥地利对俄国开战，这支庞大的军队将立即造成对俄国的优势；因为自从俄国原来的整个多瑙河军团全部调往克里木后，奥军已在各个方面超过俄军，并能很快地把预备部队调往边境，虽然目前俄军已

^① 马克思为“新奥得报”翻译此文时，将此句改为：“只有以外交对西方作战发生影响这一点，才能解释俄国已获得的成就。”——编者注

先开到。但是还需要指出一点，在预备兵员的数量方面，奥地利远比不上俄国，这 12 万预备兵员征集后，要想进一步扩军，就必须征召新兵，因此扩军将是很慢的。所以，奥地利宣战的时间越迟，对俄国就越有利。据说，法国的辅助部队将进入奥地利，因而情况将得到改善。但是由第戎或里昂到克拉科夫的路程十分遥远，需要有很好的组织，否则，如果刚刚改编的奥地利军队因战斗素质差而不是兵力即使稍占优势的俄军的对手，那末法军的到达就可能太迟了。

这样一来，奥地利就成了命运的主宰者。它自从在自己的东部边境占领阵地以来，就保持了对俄军的优势。如果由于俄国预备部队的及时开到而使它暂时失去这个优势，那末它也可以依靠它那些经验丰富的将军（近年来除若干匈牙利人外，唯有他们显露了军事才干）和那些组织良好、大部分受过战斗洗礼的部队。只要进行几次巧妙的机动，来一次小小的退却，就能迫使敌人分散兵力，造成胜利的良机。用军事语言来说，只要奥军一开始行动，俄国就将被迫完全转入防御。

还必须谈谈另一个情况。假如法国把国内的军队扩充到 50 万人，奥地利把全部军队扩充到 80 万人，那末这两个国家在一年内至少还可各征召 25 万人。在俄国方面，如果沙皇有一天完成了各步兵团的第七、第八营的兵员补充，从而把作战军队增加到譬如说 90 万人，那末他就为防御做了几乎所能做到的一切。据说，最近一次征兵工作到处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因而不得不降低原定的身高标准，并采取了保障征足所需人数的其他措施。沙皇发布征召南俄罗斯的全部男性居民入伍的命令，并没有使军队数量显著增加，却等于公开承认今后再也不能正常地征召新兵了。当 1812

年法军入侵而俄国真正遭到侵略时，曾经采用过上述办法，不过那也只是在 17 个省内。当时，莫斯科提供了 8 万非常后备军，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斯摩棱斯克派出了 25000 人，等等。可是在战争时却哪里也看不到他们，这几十万非常后备军未能防止俄军在到达维斯拉河时发生与法军同样狼狈、同样混乱的现象。这次 en masse（普遍的）征兵，还说明尼古拉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如果说从军事观点来看，奥地利的参战将迫使俄国转入防御，那末从政治观点来看，情况就决不能说一定如此。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沙皇握有厉害的政治进攻手段——唆使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暴动并宣布匈牙利独立。

我们的读者知道，奥地利的国家活动家是多么害怕这一点。无疑地，沙皇在必要时将采取这一手段；其结果如何，很难预料。

我们丝毫没有谈到普鲁士。它最后也许会同西方联合起来反对俄国，虽然这只有在发生了谁也无法预见的风暴之后才有可能。不管怎样，只要还没有发生某种民族运动，普鲁士军队就未必会起很大作用，因此我们暂时几乎可以不把它考虑在内。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2 月 20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3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32 号，并载于 1855 年 2 月 23 日和 24 日“新奥得报”第 91 和 9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议会和军事问题

伦敦 2 月 20 日。虽然下院又在昨天下午 4 点到深夜 2 点开会，并且决定拨款大约 750 万英镑作为陆军的经费，但是这次辩论并不值得详细论述。我们只指出，帕麦斯顿在答辩时装模作样、说些鄙俗话，而且在说这些鄙俗话时态度蛮横无礼，带有挑衅性，因而使他的自由派反对者们大发雷霆。他用一种只有在阿斯特利马戏院里才合适的朗诵声调讲述巴拉克拉瓦会战，同时大骂累亚德“庸俗地高谈贵族”。他说在军需部、运输部门、医务主管部门里的并不是贵族。可是他忘记了在那里的是贵族的奴才。累亚德准确地看出帕麦斯顿所发明的委员会只会使得在远征军的权限问题上引起冲突。但帕麦斯顿却大声叫喊道：怎么——他又装出理查二世的姿态，而议会则扮演平民瓦特·泰勒的角色——你们希望建立一个只适合于编辑 Blue Books⁶⁹的议会委员会，而反对我的“应当工作！”的委员会吗？帕麦斯顿对议会的态度非常傲慢，甚至认为这一次没有必要使出自己说俏皮话的本领。他借用了议员桌上的政府晨报里的一些俏皮话。他既谈到“纪事晨报”上提出的“社会拯救委员会”，也谈到“晨报”的一句平淡无奇的俏皮话——把要求调查的议员送到克里木去，并让他们留在那里。但这类东西只能够奉献给目前这样的议会。

这样，帕麦斯顿在议会里甚至胜过了老阿伯丁，然后他就在报刊上——不是在直接受他支配的机关报上，而是在联合起来的啤酒店老板的一张盲目轻信报纸^①上——散布谣言，说什么他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宫廷束缚着他等等。

既然和平会议不久就要在维也纳开会，那末来谈一谈战争，大致估计一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参战的国家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就是适时的了。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军队的总数，而且在于可以用来进攻的部队的数量。现在我们只详细地谈谈步兵，因为其他兵种的员额同步兵有相应的比例。

英国军队共有 99 个团，即 106 个步兵营，其中驻殖民地的至少有 35 个营。此外，有 40 个营已编入派往克里木的头 5 个师，后来至少又有 8 个营前往增援。因此，还余下约 23 个营，其中恐怕连一个营也不可能调到国外去服役。5 万名以上的民军则有到国外去服役的权利。打算把他们派往直布罗陀、马尔他岛和科尔富岛，以便抽出约 12 个营供克里木调用。外籍军团，正如帕麦斯顿昨天在下院所说的，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最后，2 月 13 日又下令在 93 个团内建立第二营，其中 43 个营各为 1000 人，50 个营各为 1200 人。这样就将增加 103000 人，此外，还将补充骑兵和炮兵 17000 人。但是这 12 万人中连一个人还没有招募到；而且还需要训练他们，给他们配备军官干部。

目前不列颠军队的这种奇特的组织，使除了后备连和若干后备营以外的几乎所有的步兵（不仅兵士，而且——这似乎是难于置信的——军官）都被调到克里木和殖民地去了。列入不列颠军

^① “晨报”。——编者注

队名册中领取半薪的将官和校官多得很，他们可以在这些新编的部队中任职。但是领取半薪的上尉却几乎完全没有，中尉和士官则根本找不到。大家知道，士官是任何军队的骨干。按照这方面的最高权威、研究比利牛斯半岛战争⁷⁰的历史学家威廉·纳皮尔将军的意见，要想使古老英国的《tag-rag》和《bob-tail》（流氓无产阶级）变成“英国的精华”，变成“世界上最优秀的兵士”，需要整整三年时间。但是这只有在拥有军官干部和只需要加以补充的条件下才能做到。想把这 12 万名兵士个个都培养成英雄，又需要多少时间呢？在今后一年内，英国政府最多只能拿出 5 万名“英雄的小部队”来同敌人对抗。诚然，在短时期内这个数目可能会增加，但是这将严重破坏未来的增援部队的训练工作。

要付邮了，我们只能谈到这里。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2 月 20 日
载于 1855 年 2 月 23 日
“新奥得报”第 9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论新的内阁危机

伦敦 2 月 24 日。下院昨天挤满了人，都等着听大臣们对第一届帕麦斯顿政府垮台的解释。在拥挤到极点的大厅里，议员们迫不及待地等候着高贵的子爵的到来，议会宣布开会后过了一小时，这位子爵终于出现了，有的议席上对他报以嘲笑，有的议席上则对他 cheers（欢呼）。变节的大臣们——格莱安、格莱斯顿、赫伯特——在所谓激进派（曼彻斯特学派）的议席上坐了下来，布莱特似乎在那里欢迎他们。在靠近他们的议席上坐着也已退出内阁的卡德威尔。帕麦斯顿勋爵提出了立即审查罗巴克委员会问题的提案。接着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开始了他那大臣的表白，但他刚开始玩弄词藻，就传来了帕麦斯顿的伴奏——酣睡的可靠征兆。

格莱安反对调查委员会的辩词原则上可以归结为：任命这样的委员会就是下院侵犯王室的特权。我们知道，英国大臣们有一种习惯，即在反对王室时举出议会的特权，而在反对议会时则举出王室的特权，这已经有 150 年的传统。实际上格莱安是以委员会的调查会造成英法同盟破裂的危险这一点来吓唬人。而这不过是暗示说，法国同盟者将被看成是一切失败的主要罪魁。至于格莱安的退出内阁，据说内阁从一开始就把罗巴克的提案完全看做是一种隐蔽的不信任投票。因此阿伯丁和纽卡斯尔公爵就成了牺牲品，旧内

阁也就被解散。但是新内阁除了坎宁和潘缪尔以外，仍由原班人马组成；那末为什么罗巴克的提案能够突然得到另一种解释呢？不是他，而是帕麦斯顿勋爵从上星期五到本星期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不是他，而是他的高贵的朋友是一名逃兵。此外，——格莱安天真地承认——他退出改组的内阁的原因在于他确信

“现在的政府并不比几星期以前下台的政府得到议院更大的信任”。

格莱安还在他的发言中说道：

“在组织新政府的时候，我曾问过高贵的勋爵（帕麦斯顿），是否会对阿伯丁伯爵的对外政策作某种修改，是否会对已经提出的媾和条件作某种修改。帕麦斯顿勋爵肯定地向我保证说，在这方面一切都将照旧。”

（我们援引的这些话是在下院所讲的原话，而不是他在报纸上刊登的经过修饰的词句。）

布莱特马上就抓住格莱安的这个声明，来证明他并不想推翻帕麦斯顿政府，他个人对高贵的勋爵并不怀任何敌意，不但如此，他确信帕麦斯顿和罗素拥有受到不公正攻击的阿伯丁所缺少的东西，即享有足够的声望，可以在四项条款的基础上来签订和约。

悉尼·赫伯特。——罗巴克的提案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第一、罗巴克提议调查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军队的状况；第二、调查直接负责军队给养的政府机关方面的领导如何。议会有权做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赫伯特 1 月 26 日曾激烈地反对“后者”，正像现在，2 月 23 日他反对“前者”一样，是否就是根据这一点理由呢？当他（赫伯特）在本届内阁中担任职务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完全符合于他在上星期五所作的发言，说任命委员会是一种违宪的措施，并且认为，随着阿伯丁和纽卡斯尔公爵的离

职，委员会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帕麦斯顿甚至不怀疑，现在议会不作任何讨论就否决罗巴克的提案。既然委员会的目的不是弹劾政府，而是调查军队的状况，那末任命这个委员会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骗局。帕麦斯顿勋爵没有勇气根据他不止一次表明过的信念来行动，从而也就削弱了政府。如果一个强有力的人执行的是软弱的政策，那他还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格莱斯顿对自己的同僚们的解释实质上并没有作任何补充，如果说有的话，那只是提出了这样一种论据，这种论据曾使已故的皮尔有理由就格莱斯顿退出他的政府一事（那时谈的是梅努特神学院问题 71）指出，在他的朋友没有想到要在两小时的发言中向议会说明退出政府的原因以前，似乎他就已经理解这些原因了。

帕麦斯顿认为谈自己以前的同僚们的解释是多余的。他惋惜他们的离职，但是没有他们也能过下去。在他看来，委员会的目的不是弹劾，而是调查军队状况。起初他反对任命委员会，但是现在他确信，要迫使议院撤销自己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国家不能没有政府，因此他仍将留下来担任政府的首脑而不管有没有委员会。对于布莱特的问题，帕麦斯顿回答说，和平谈判将认真进行，给罗素的指示是在四项条款的基础上拟定的。关于他的内阁的情况，他什么也没有向议院报告。

尽管帕麦斯顿的第一届政府突然垮台了，但是帕麦斯顿却已经无可争辩地取得了胜利，即使不是在舆论界，至少也是在内阁和议会里。他派罗素率领代表团去维也纳，从而摆脱了这个令人难堪的、变化无常的对手。他同罗巴克妥协，把议会的调查委员会变成了政府的委员会，并使它仅仅成为同他自己设立的三个委员会并列的第四个委员会。用悉尼·赫伯特的话来说，帕麦斯顿

用“骇人听闻的骗局”代替了事实。皮尔分子的退出内阁使他有可能会成立由一些等于零的人物组成的内阁，而其中只有他是整数。然而毫无疑问，要成立这个真正的帕麦斯顿内阁必将碰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2 月 27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97 号

卡·马克思 休 谟

伦敦 2 月 24 日。休谟死了，下院失去了一员老将。他的长时期的议会活动是在 1831 年最为得势的那个资产阶级激进政党的发展的精确晴雨表。在改革⁷²后的初期，休谟在议院里起了议会的沃里克即“议员制造者”的作用。八年以后，他同丹尼尔·奥康奈尔和菲格斯·奥康瑙尔一起成了“人民宪章”⁷³的拟订者。“人民宪章”直到现在还是宪章派的政治纲领，按其实质来说，这就是要求**普选权**和创造在英国能够真正实现这种权利的条件。

在这以后不久，工人和资产阶级鼓动者之间发生了分裂。休谟是站在资产阶级鼓动者这一边的。在罗素内阁时期，他拟定了“小宪章”，这个宪章成了所谓“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⁷⁴的纲领。“小宪章”的三项条目代替了“人民宪章”的六项条目，并且只要求用多少“扩大了”的选举权来代替“普遍”选举权。最后，在 1852 年，休谟宣布了新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他放弃了自己的“小宪章”，而只坚持一项条目——秘密投票 (Ballot)。此外，休谟还是所谓“独立”反对派的典型代表，科贝特曾非常恰当地把这个反对派称为旧制度的“安全阁”。晚年，休谟沾染了一种习惯（这成了他的真正的癖好），即向议会提出提案，然后遵照内阁的指示在最后一分钟放弃这些提案。他喜欢卖弄的那句“节约公款”

的话已经成为口头语了。内阁让他抨击小的支出项目和缩减这些项目,目的是要使大的支出项目能毫无阻碍地在议院通过。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2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2 月 28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98 号

卡·马克思

* 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

伦敦 2 月 27 日。帕麦斯顿对那种反对贵族的喧嚷作了讽刺的回答，他成立了一个由 10 个勋爵和 4 个从男爵组成的内阁，而且在这 10 个勋爵中有 8 个人参加贵族院的会议。为了回答由寡头政治中各派别之间的妥协而引起的不满，他促使辉格党内的各个家族集团取得妥协。在他的内阁中，格雷氏族、萨特伦德公爵家族以及克拉伦登家族都得到一部分职位。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是格雷伯爵的堂兄弟，而海军首席大臣查理·伍德爵士娶了格雷伯爵的姐姐；格兰维耳伯爵和阿盖尔公爵代表萨特伦德家族。财政大臣乔·康·路易斯爵士是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的姐夫。只有一个印度分给了没有爵位的维农·斯密斯，但他同辉格家族也有姻亲关系。理查三世曾经大声疾呼：“一个王国换一匹马！”^①帕麦斯顿也摹仿卡利古拉⁷⁵大声叫嚷：“一匹马为王国效忠！”并且把维农·斯密斯变成印度的大莫卧儿⁷⁶。

“晨报”抱怨道：“帕麦斯顿勋爵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在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贵族式的政府，而且用可以找到的最坏的贵族材料组成了自己的政府。”但是，天真无邪的“晨报”聊以自慰地说：“帕麦斯顿直到目前为止还不是行动自由的人，他的手脚还带着镣铐和绳索……”

①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①，帕麦斯顿勋爵用一些等于零的人物来组织内阁，而只有他才是内阁中的整数。约翰·罗素勋爵在1851年不讲策略地将他从辉格党人的内阁中撵了出去，他却很巧妙地把罗素派去旅行⁷⁷。他为了继承阿伯丁的职位，曾利用了皮尔分子。在他的首相职位稳固之后，他马上撇开了阿伯丁的信徒，并且像迪斯累里所说的那样，从罗素那里不仅盗取了辉格党人的法衣，而且把辉格党人本身也抢走了。尽管目前的政府和1846—1852年罗素的辉格党政府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把它们混为一谈也是十分错误的。现在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内阁，而在于代替内阁的帕麦斯顿勋爵。虽然内阁的成员大多数都是旧人，但是，内阁位置的分配不同了，内阁在下院中的支柱大大不同了，而且它本身是在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说过去它是一个软弱的辉格党内阁，那末现在，只要帕麦斯顿不是假皮特，路易·波拿巴不是假拿破仑，而约翰·罗素勋爵还继续自己的旅行的话，它就体现着强有力的个人专政。英国的资产者虽然对局势的这样突然的转变感到非常烦恼，但是帕麦斯顿用来欺骗和愚弄朋友和敌人的厚颜无耻的把戏还可以供他们取乐。西蒂区的商人说，帕麦斯顿再次表现出他很《clever》。但《clever》是一个不好翻译的词，它有各种意思、各种含义。它包含着一个善于表现自己的优点以及善于巧妙地损人利己的人的一切品质。英国资产者虽然信奉道德、讲究尊敬，但他们仍然首先称颂他们所谓的《clever》的人，这种人不受道德的约束，虔诚也不能使他迷乱，他把原则看成捕捉他周围的人的罗网。既然帕麦斯顿《clever》到这种

^① 见本卷第100—101页。——编者注

程度,那他不是也能用巧计胜过俄国人,就像用巧计胜过罗素一样吗?——英国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中的政治家发出这样的议论。

至于托利党人,他们以为美好的旧时代又回来了,联合的恶毒诱惑力被摧毁,辉格党内阁和托利党内阁的传统交替现象重新恢复起来。不仅仅限于消极瓦解的一种真正的变动,事实上只有在托利党政府时期才可能发生。只有在托利党人执掌政权的时候,才开始有强大的外界压力——*pressure from without*——和实行不可避免的改革。例如,天主教徒的解放⁷⁸是在威灵顿内阁时期,废除谷物法是在皮尔内阁时期;如果不谈议会改革法案本身,那末至少关于改革运动——其意义比效果大得多的运动,也可以这样说。

当英国人从海外请来一位荷兰人^①做国王的时候,随同新的王朝的建立,开始了新的纪元——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相结合的纪元。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血统特权和金钱特权之间的立宪均势。例如根据血统特权,军队中一部分的职务是按家族关系的原则、通过徇私和宠爱来分配的,但是金钱原则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因为一切军官官衔都是用硬币买卖的。据统计,目前在军队中供职的军官用于购买自己军衔的资本已达600万英镑。为了不失去自己在供职期间所获得的权利,以及为了不致被任何年轻的富人排挤出去,不太富裕的军官只好去借债,为升官奔波,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受抵押奴役的债务人了。

在教会中也像在军队中一样,除了家族关系的原则以外,现金原则也仍然盛行一时。教会的一部分职务落到年幼的贵族子弟手中,另一部分职务则落到花钱较多的人的手里。因为英国人民的

① 奥伦治的威廉。——编者注

“灵魂”属于国教会，对英国人民的“灵魂”的交易，也和贩卖弗吉尼亚黑人的生意一样经常化了。在这门行业中不仅有卖者和买者，而且也有经纪人。Court of Queen's Bench (皇家法院)昨天审理了这种“宗教”经纪人中的一个姓辛普森的诉讼案。他要求一个叫拉姆的人付给他应得的酬金，这位拉姆根据契约规定，应当帮助约瑟亚·罗德韦耳牧师弄到西哈克尼教区的圣职，并有言在先，辛普森可以从买者和卖者那里分别拿到百分之五的佣金，某些额外收入除外。据他说，拉姆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桩交易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拉姆的父亲是一个70岁的牧师，在萨塞克斯拥有两个教区，这两个教区的售价定为16000英镑。不用说，这种价格与教区的圣职收入成正比，另一方面又与占有者的年龄成反比。拉姆次子是拉姆长子所占有的教区的照管人，又是第三个更年轻的拉姆——西哈克尼的教区占有者和牧师的哥哥。因为后面这位拉姆年纪还很轻，他的薪高事少的下一任圣职的价格比较低。虽然这个教区每年的收入是550英镑(牧师的住宅费用除外)，但是它的占有者把下一任圣职只卖1000英镑。在父亲去世后，他的哥哥必须把萨塞克斯的教区交给他，而又答应把西哈克尼的空位子通过辛普森以3000英镑卖给约瑟亚·罗德韦耳。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拿到2000英镑的纯收入，他的弟弟可以得到较好的教区，而经纪人在这桩交易中按应付给他百分之五的佣金计算，也可以赚300英镑。后来不知为什么合同被取消了。法院判给了经纪人辛普森50英镑作为他“花费劳动”的赔偿费。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2月2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3月3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105号

卡·马克思 不列颠宪法

伦敦 3 月 2 日。不列颠宪法在一切受到战争考验的地方都全部破产了，而在国内，英国历史上最具有宪法精神的联合内阁也垮台了。死于黑海沿岸的 4 万名不列颠兵士是不列颠宪法的牺牲品！军官团，总参谋部，军需部，医务主管部门，运输部门，海军部，最高统帅部，军械部，陆军和海军——全都瓦解了，它们使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威信扫地。但是，大家一想到它们不过是履行了对不列颠宪法所担当的义务，也就心安理得了！“泰晤士报”就这个全面破产写道：“不列颠宪法本身受到了审判。”它这样写比它原来设想的更接近真理！宪法受到了审判，并且被认为是**有罪的**。

但是，这个不列颠宪法是什么呢？它的实质是否就是代议机关或者限制行政权呢？这些特征并没有使它无论同北美合众国的宪法或是同无数“熟悉本行业务”的英国股份公司的章程有什么区别。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腐的妥协。在 1688 年“光荣”革命以后最先参加妥协的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派别——**金融贵族**。1831 年的改革法案使另一派，即英国人称为《millocracy》的**工业资产阶级**巨头也参加了妥协。1831 年以来的立法史就是一部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

(从新济贫法⁷⁹到废除谷物法,从废除谷物法到实行地产遗产税)的历史。

如果资产阶级——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一般也被认为是政治方面的统治阶级,那只有在各方面的一切实际管理,甚至行使立法权的职能,即在议会两院实际立法的权利,都掌握在土地贵族手中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宁愿再同土地贵族妥协而不愿同英国人民群众妥协。而贵族虽然屈从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某些原则,但是却无限制地统治着内阁、议会、国家管理机关、陆军和海军;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不列颠宪法最重要部分的贵族阶级,现在不得不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了,并且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继续治理英国。为了使它起死回生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的尝试!内阁一个接一个地组成,不过是为了在上台执政几个星期之后宣布自己解散而已。危机连绵不断,政府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一切政治活动都中止了,每个人都意识到,他所企求的只是给这台政治机器上上油,使它不要完全停顿下来。下院在按照自己的模样建立的那些内阁里,已经再也认不出自己了。

在这种普遍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仅要进行战争,而且要同比沙皇尼古拉危险得多的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就是**工商业危机**,它从去年9月以来日益加剧,日益普遍。危机的铁手一下子就把那些鄙俗的自由贸易的信徒的嘴给堵住了,这些信徒许多年来一直鼓吹说,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市场上商品过剩和社会危机就永远成为历史掌故了。但是现在,市场上商品过剩已成为事实,正是那些仅仅在五个月前还以武断的、绝对正确的口吻说生产过剩永久不再发生的经济学家,现在比谁都更响亮地叫喊没有缩减生产的工厂

主缺乏先见之明。

这个病症早在普雷斯顿罢工⁸⁰时期就以慢性病的形式出现了。此后不久,美国市场商品过剩引起了合众国的危机。印度和中国虽然也堆满了商品,但它们仍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一样,继续对生产过剩起着排水渠的作用。英国工厂主再也没有可能不降低价格而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自己的商品,因此便采取了冒险的办法——把商品运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去委托出售。这种办法使他们能在某一个时期内避免了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商品抛到国内市场上去就会给商业造成的那些困难。然而,输出的商品刚一到目的地,它们立即就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市场价格,而且到9月底,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后果在英国这里也开始感觉到了。

于是,慢性危机转变成了急性危机。第一批遭到破产的企业是印花工厂——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一些老商号。接着轮到的是船主以及同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做买卖的商人,然后是同中国做买卖的商行,最后是同印度做买卖的商行。大家都轮到;其中大部分亏损严重,许多商行不得不歇业,而且对这些商业部门中的任何一个部门来说,危险都还没有过去。相反地,这种危险还在日益增大。丝织工厂的厂主也被危机波及;丝织品的生产目前缩减到几乎等于零,而在丝织品生产的各个中心地现在极端困难。随后就轮到棉纺织厂的工厂主。他们当中某些人已经支持不下去了,而且有更多的人注定要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已经指出过^①,细纱工厂实行了不完全工作周制,粗纺工厂很快也会不得不

^① 见本卷第78页。——编者注

这样做。部分粗纺工厂现在就已经一周只工作几天了。它们能不能这样长久地维持下去呢？

再过几个月，工业区的危机将达到 1842 年危机的规模，甚至超过它。但是一旦工人阶级自己充分感觉到危机的影响，近六年来在工人阶级中间多少处于沉寂状态，并且只保存下来进行新的鼓动的干部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正是在资产阶级同贵族的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又会开始。至今一直掩盖着大不列颠政治面貌的真正特点而不让外国看见的假面具终将被撕破。只有不知道这个国家拥有多么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的人，才会对这个国家能胜利地摆脱面临的大危机而振兴起来这一点发生怀疑。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6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09 号

卡·马克思 累 亚 德

伦敦 3 月 2 日。著名的亚述学家累亚德前天在艾尔斯贝里向自己的选民们发表的演说中，举出了值得注意的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一方面说明寡头政治家在分配极重要的国家职位时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另一方面说明所谓自由和独立的议员们对这些寡头政治家所抱的十分暧昧的态度。

累亚德说，格兰维耳勋爵任命他为外交副大臣；在罗素内阁倒台、得比内阁成立以前，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三个月。得比建议他在指定为他的继任者的斯坦利勋爵（得比的儿子）从印度回国以前仍旧留在这个职位上，并说以后将派他（累亚德）出国办理外交。

累亚德说：“我所有的政界朋友都认为我应当接受这个建议，只有罗素勋爵除外，他有相反的意见；我立即听从了罗素的劝告。”

这样，累亚德拒绝了得比的建议。妙极啦！罗素勋爵又成了内阁大臣，而且累亚德也没有被遗忘。罗素邀请他坐上“内阁的席位”，就是要他担任《Board of Control》（“督察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也就是担任印度事务副大臣。累亚德表示同意。但是罗素突然想起，辉格党人中有一个以前曾经负责过爱尔兰事务、但从未负责过亚洲事务的上了年纪的绅士托马斯·雷丁顿爵士“还没有安插”（原话）。因此，罗素暗示累亚德，要他不阻碍安插可尊敬的绅

士。累亚德又让步了。于是，被这位学者的谦逊态度和自我牺牲精神所鼓舞的罗素，就劝他索性让路改任驻埃及的领事。但是，这一次累亚德却大发雷霆，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在议会中发表了反对内阁的东方政策的动人演说，以此来引起议员们对自己的注意。

帕麦斯顿组阁以后，想用军械部秘书的职务来满足累亚德。累亚德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说他对火炮等等东西一窍不通。多么天真啊！好像已经离职的军械部秘书、爱尔兰旅的捐客之一蒙塞耳先生曾经能够把普通的火枪和针发枪区别开来似的！于是帕麦斯顿建议累亚德担任陆军部副大臣的职务。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第二天帕麦斯顿突然发现，弗雷德里克·皮尔这个官气十足的渺小人物目前是陆军部绝对不可缺少的，虽然大家知道，皮尔对陆军部的职能一无所知。最后，帕麦斯顿以罗素的名义建议累亚德担任殖民部副大臣的职位作为补偿。累亚德认为，要去熟悉从来没有研究过的 50 个殖民地，在目前的状况下太困难了。他又表示拒绝，于是这段颇有教益的历史就到此结束了。

内阁的报纸从这里得出的唯一教训是：累亚德在处世方面还很少经验，而他自己的过错则是没有利用自己在亚述学方面的名望。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5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07 号

卡·马克思 英国的危机

在“大西洋号”轮船从欧洲带来的一切消息中⁸¹，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沙皇的逝世和这一事件对当前复杂局势的影响。但是，关于这一事件或其他欧洲问题的消息无论怎样重要，都未必能使深思熟虑的观察家感到兴趣，因为更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目前英国不由自主地卷入的那种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逐渐发展的征兆。企图保持被称为不列颠宪法的那种过了时的妥协（即官方统治阶级和非官方统治阶级之间的妥协）的最后一次尝试，显然已失败了。在英国，不仅联合内阁即在历届内阁中最合乎宪法的内阁已破产，就连宪法本身在它遭到战争考验的一切地方也全部破产了。死于黑海沿岸的4万名不列颠兵士是不列颠宪法的牺牲品！军官团、总参谋部、军需部、医务主管部门、运输部门、海军部、最高统帅部、军械部、陆军和海军——全都瓦解了，它们使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威信扫地。但是，大家一想到它们不过是履行了对不列颠宪法所担当的义务，也就心安理得了。伦敦“泰晤士报”就这个全面破产写道：不列颠宪法本身受到了审判。它这样写比它原来设想的更接近真理！

宪法受到了审判，并且被认为是有罪的。这个不列颠宪法无非就是过了时的妥协，由于这种妥协，国家政权完全转入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手里，然而其条件是：一切实际管理、全部行政权、甚至行

使立法权的职能,即在议会两院实际立法的权利,都依旧掌握在土地贵族手里。而贵族虽然屈从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般原则,但是却无限制地统治着内阁、议会、国家管理机关、陆军和海军;这个构成不列颠宪法最重要部分的贵族阶级,现在不得不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了。它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继续治理英国了。内阁一个接一个地组成,不过是为了在上台执政几个星期之后宣布自己解散而已。危机连绵不断,政府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一切政治活动都中止了;每一个人所企求的只是给这台政治机器上足油,使它不要完全停顿下来。一切拥护宪制的英国人引以自豪的下院本身,已经弄到瘫痪的地步。它自从分裂为许许多多的派别由它们去试验在一定的位数下所能拼出的组合和变分后,再也认不得自己了。它甚至在按照自己的模样建立起来(其唯一目的是重新解散它们)的各种不同的内阁中,也已认不得自己了。真是彻底的破产。

一种束手无策的毛病已感染了全国,它像克里木的流行病一样,渐渐蔓延到了政治机体的各个部分,在这种普遍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不仅要进行战争,而且要同一个比俄国可怕得多的敌人作斗争,同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内阁、所有这些格莱斯顿派、卡德威尔派、罗素派和帕麦斯顿派的内阁加在一起也无力抵御的一个敌人作斗争。这个敌人就是工商业危机,它从去年9月以来就带有极其尖锐、极其普遍和猛烈的性质,以致人们已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它那无情的铁手一下子就把那些鄙俗的自由贸易的信徒的嘴给堵住了,这些信徒许多年来一直鼓吹说,在谷物法解除以后,市场上商品过剩是不可能发生的。以最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市场上商品过剩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在今天已成为事实,面对这一事实,谁也没有像那些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断言生产过剩永不再

产生的经济学家那样，狠狠地责备没有缩减生产的工厂主缺乏先见之明。我们早已注意到了这种慢性病的存在。美国最近的困难和引起美国商业停滞的危机无疑地加深了这种病症。印度和中国虽然也堆满了商品，但它们仍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一样，继续起着排水渠的作用。英国工厂主再也没有可能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自己的商品，或者说，为了不降低价格而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便采取了荒谬的办法——把商品运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去委托出售。这种办法使他们能够在某一个时期内避免了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商品抛到国内市场上去就会给商业造成的那些困难；然而，输出的商品刚一到达目的地，那些国家的市场上就立即发生了困难，到去年9月底，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后果在英国也开始感觉得到了。

于是，慢性危机转变成了急性危机。印花工厂的厂主们首当其冲；包括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一些老商号在内的许多企业全都破产了。接着轮到的是船主以及同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做买卖的商人，然后是同中国做买卖的商人，最后是同印度做买卖的商行。大家都轮到了；其中大部分亏损严重，许多人甚至不得不歇业，而且无论对谁来说，危险都还没有过去。相反地，这种危险还在日益增大。丝织工厂的厂主也被危机波及；丝织品的生产几乎等于零，而这一生产的各个中心地过去是而且直到现在还是极端困难。随后就轮到棉纺织工厂的工厂主。根据最近的报道来看，他们当中某些人已经支持不下去了，而且有更多的人注定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大家知道，细纱工厂实行了四日工作周制，粗纺工厂很快也会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它们中间是否有很多的工厂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支持下去呢？

再过几个月，危机将达到英国自 1846 年以来或许甚至从 1842 年以来所没有过的规模。但是一旦工人阶级自己充分感觉到危机的影响，近六年来处于沉寂状态的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那时，英国工人就会重新起来进行斗争；并且恰好是在资产阶级最终把贵族从政权中排挤出去的时候，给资产阶级以威胁。至今一直掩盖着大不列颠政治面貌的真正特点的假面具终将被撕破。英国的两种真正斗争着的力量——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这个国家终将被纳入欧洲社会的总的社会发展轨道。当英国同法国结成联盟的时候，它就彻底丧失了那种由于它是岛国而产生的、并且早就被世界贸易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所破坏的孤立性质。现在，它也未必能够逃避其他欧洲国家所卷入的那些伟大的国内运动。

不列颠宪法的末日同路易—菲力浦君主政体的末日一样，充满了一幅幅腐朽透顶的社会制度的图景，这个事实也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已经报道了议会的丑事和政府的丑事，报道了斯托诺尔、萨德勒、劳勒的丑事^①，但是，最重要的是汉德科克和德·巴勒案件的被揭发，在这个案件中，英国贵族克兰里卡德勋爵如果不是最可恶的罪行的直接参与者，至少也是间接的参与者。毫不奇怪，这足以作出比较，人民一看到案件的可耻细节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喊起来：“普拉兰公爵！普拉兰公爵！”英国已经到了自己的 1847 年；谁知道它的 1848 年将在什么时候开始和将是什么样子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4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文集（1952 年版）

^① 见本卷第 29—31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军衔买卖。——澳大利亚消息

伦敦 3 月 3 日。大家知道，葛德里奇勋爵关于把军士提升为上尉的提案在前天的下院会议上被否决了。帕麦斯顿举出了一个旧的理由：局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旧制度的一个环节关联着另一个环节。总之，个别的实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改革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而整个制度的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因此，改革在理论上是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实际上行不通。目前的下院——遵循《*principiis obsta*》（“把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个原则的下院，自然很乐意听信这一点，或者更确切些说，不需要别人说服，因为它事先就已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帕麦斯顿就这个问题指出，买卖军官官衔证书的制度由来已久。这一点他说得对。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制度是在 1688 年“光荣”革命时期与建立国债、银行券和荷兰王朝等制度同时产生的。还在 1694 年惩治叛乱法⁸²中就曾指出必须防止

“在皇家军队中买卖军衔的巨大罪恶活动”，同时规定“每个有官衔证书的军官（只有军士没有官衔证书）必须发誓：他的官衔证书不是买来的”。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应用到实践中去；相反地，1702 年，掌玺大臣纳·莱特爵士作出了相反的决定。1711 年 5 月 1 日，官衔证书制度直接得到了女王安的一项命令的承认，这项命令写道：

“未经国王批准，任何军官官衔证书都不得出卖，服役未满 20 年或尚未被认为不宜服役的任何军官都无权出卖官衔证书”等等。

这种对军官官衔证书买卖的正式承认同官衔证书市价的正式确定只相隔一步之差。官衔证书市价最初是在 1719—1720 年规定的。后来，军官官衔证书的价格在 1766 年、1772 年、1773 年、1783 年都作了调整，而最后在 1821 年确定了价格，这个价格一直保持到现在。早在 1766 年，陆军大臣巴林顿就公布过一封信，信中说道：

“这种买卖军官官衔证书的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这样：怀着最热切的志向来服军役并且不放过立功机会的人一生的官衔都是很低的，因为他们穷。这些可尊敬的军官常常受到极大的屈辱，他们处在豪门出身的年轻军官的管辖之下，而这些年轻军官入伍晚得多，他们有钱，可以在团队外寻欢作乐，而其他人则经常呆在营房里钻研自己的业务，执行这些绅士们的职务。”

英国一般法律固然认为，因授予某一国家职位而接受馈赠或“佣金”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正像国教会章程中规定必须把买卖宗教职位⁸³的人开除教籍一样。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任何法律都不能决定实践，任何实践也都不能取消同它矛盾的法律。

最近来自澳大利亚的消息给普遍的骚乱、恐慌和不稳定的图画又增添了几笔。我们应当把巴拉腊特（靠近墨尔本）的叛乱和席卷维多利亚全省的革命运动区别开来。前者现在大概已经被镇压下去了；后者只有在满足了一切要求之后才可能停止。前者只是后者的征兆和偶然的爆发。至于巴拉腊特的叛乱，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巴拉腊特金矿区，有一个名叫本特利的“厄夫里卡”旅馆的老板，他同采金人发生了各种冲突。在他的旅馆里发生了一件凶杀案，这更加强了人们对他的仇恨。在验尸官验尸以后，本特利作为

与案件无关的人而获释。但是,在验尸时到场的 12 位陪审员中,有 10 位对 coroner (验尸官)企图隐瞒对被捕者不利的证词的偏袒态度提出异议。根据居民的要求,进行了第二次侦查。尽管揭发他的证词确凿,本特利又被释放了。这时才弄明白,原来有一个法官给这个旅馆投过资。许多控诉书,过去的和新收到的,都说明巴拉腊特专区的政府官员有暧昧行为。在本特利第二次获释的那一天,采金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烧毁了他的旅馆,然后便走散了。根据维多利亚省省长查理·霍桑爵士的命令,逮捕了三名祸首。11 月 27 日,采金人代表团要求释放被捕者。霍桑拒绝了这个要求。采金人便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省长从墨尔本调来了警察和正规部队。双方发生了冲突,结果有几个人被打死。根据最近的消息(12 月 1 日左右)采金人举起了独立的旗帜。

就连这个基本上从一家政府机关报上借用的叙述,也决不能说明它对英国法官和政府官员有利。它只证明普遍对他们不信任。维多利亚省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围绕着两大问题进行的,由于这两大问题才燃起了激烈的斗争。采金人要求废除采金特许证,也就是要求取消直接对劳动所课的税收;其次,他们坚决要求取消对下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从而企图把对税收和立法的监督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难看出,实际上这些动因和那些促使合众国宣布独立的动因是相类似的,所不同的只是在澳大利亚,对那些同殖民官僚相勾结的垄断资本家的反抗是由工人开始的。在“墨尔本阿尔古斯报”上,我们一方面看到有利于改革的盛大的群众集会,另一方面则看到政府的大规模军事准备工作。该报写道:

“在一次有 4000 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指出特许证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一种对自由劳动的非法税收,因此与会者必须用烧

毁全部特许证的方法来立即废除这个制度。假如有人因没有特许证而将被捕，人民就要联合起来支持和保护他。”

11月30日，专员里德和约翰逊在骑兵和警察的随同下在巴拉腊特出现了，他们手执武器要采金人出示特许证。采金人大部分也都武装起来，他们举行群众大会，决定全力抗拒征收可恨的特许证税。他们拒绝交验自己的特许证，声称他们已经把特许证烧毁了；有人便向他们宣读惩治叛乱法，这时，真正的叛乱也就开始了。

这里只要引证以下事实就足以表明，在省立法机关作威作福的垄断资本家和那些与他们勾结的殖民官僚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1854年，维多利亚省的政府开支达到了3564258英镑，赤字是1085896英镑，即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强。而由于目前的危机和全面破产，查理·霍桑爵士竟要求1855年的预算达到4801292英镑！维多利亚总共不过30万居民，而要从上述总额中拿出1860830英镑（每人摊到6英镑）用在公共工程方面，例如：修筑道路、船坞、堤岸、营房、政府大厦、海关、植物园、公家的马厩等等。如每人按6英镑计算，大不列颠居民单是在修建公共工程方面每年就得缴纳16800万英镑，也就是说要缴纳比他们所交的税款还多二倍的数目。工人居民起来反对这种过重的税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官僚和垄断资本家靠别人出钱来这样大规模地共同修建公共工程，从而得到了多大的好处，这也是不难想像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3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3月7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111号

卡·马克思 英国报刊论沙皇逝世

—

伦敦 3 月 3 日。所有今天出版的日报和周报，不用说，都发表了关于俄国皇帝逝世的社论，但是，所有这些报纸登的全是庸俗不堪和千篇一律的东西。“泰晤士报”至少企图以 100 匹马力的热情把自己的文笔提到帖木儿—塔梅尔兰的高度。我们只提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对帕麦斯顿勋爵说的恭维话。这两个地方就是：任命“沙皇的死敌”帕麦斯顿为首相，更加重了对尼古拉的过度刺激，加速了他的死亡；在 1830 年到 1840 年期间（实行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头十年），沙皇就放弃执行自己的掠夺和统治世界的政策。两种说法不过是半斤八两而已。

另一方面，“晨报”提出了它的发现，米哈伊尔是沙皇的长子因而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晨邮报”在悼词中对英国公众宣称：

“维也纳会议虽然还要拖延一个时期，但是一定会很快开幕的，而且会对未来作出新的展望”，同时，“今天午后克拉伦登勋爵将在布伦同拿破仑皇帝会谈，届时两国政府将对这样意外的和重要的事件交换意见。”

“每日新闻”不相信“意外事件”会产生和平后果，因为西方列强不会同意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以前结束战争，而俄国也不会同

意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以后结束战争。

二

伦敦 3 月 6 日。尼古拉皇帝的逝世使这里的报刊有机会登出一些不完全是一般化的广告消息。詹姆斯·李先生没有作过任何医疗上的监护，却比格兰维耳医生还高明⁸⁴：

他在今天的“晨报”上说，“2 月 6 日我曾寄给你们一封信，其中写道，俄国皇帝，从我发信的日子算起，过不了三个星期就要寿终正寝”。

“晨报”编辑部在按语中说明，他们确收到过李的信，但认为这封信上写的是病人的呓语，所以把它扔到字纸篓里去了。李不仅说过这些话，他还要在“晨报”上预告另一个帝王快死的消息，但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即他的消息一定要登出来。看来，李的预言的价值比西维拉占语集的价值更低贱。

沙皇的逝世也促使那作为一个苏格兰高地居民、天生具有洞察一切才能的乌尔卡尔特发表了几句皮蒂娅格言⁸⁵，其中最典型和最容易懂的就是下面这些话：

“尼古拉和波兰人之间流过血，对这些波兰人不能没有监督，并且要从他们那里得到 50 万名战士。尼古拉的前辈亚历山大在莫斯科大教堂宣布的恢复白色双头鹰——斯拉夫种族联合的象征，在尼古拉一生中未能实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乌尔卡尔特认为，现在到了俄国变成大斯拉夫帝国的时候，正像从前莫斯科王国变成俄国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3 和 6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6 和 10 日
“新奥得报”第 109 和 1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伦敦 3 月 6 日。今天的“先驱晨报”由于发表了下面的消息而使伦敦感到震惊：

“我们有一切理由断定，法国皇帝曾经对战争情况调查委员会的任命表示抗议，他声明，如果这个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两国军队就不能再采取一致行动，虽然它们致力于同一目的。为了满足路易一拿破仑，同时又不致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满，议会一有适当机会就将解散。”

我们并没有特别重视“先驱报”的这篇简讯，我们认为它是拉芒什海峡两岸的潜伏势力破坏英法同盟的许多征兆之一。请回忆一下前任各大臣所作的说明吧。

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调查委员会的压力下，我们的海军上将将被迫说出造成封锁延缓的原因，因此，当避免在我们之间发生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误会已经显得极端重要的这种时刻，进行调查就会涉及我们同伟大而强盛的盟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悉尼·赫伯特。——他吁请委员会要看到问题的实质，同时不要损毁我们在克里木的军队的声誉，尽可能地不要动摇我们盟国的信任。如果委员会中没有一个委员能及时阻止委员会走上危险的道路，那末就会发生严重的不公正行为；被委员会讯问的军官可能因为不准对提出的控告进行答辩（因为这样会造成微妙而危

险的揭发)而受害。至于赫伯特自己,他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不让不列颠军队的军官处于被束缚住双手和没有申辩机会的被告人地位。

格莱斯顿。——除了其他一切外,委员会应当查明以巴拉克拉瓦为起点的那条道路为什么没有早一点修好。如果委员会不调查这个问题,那末它就什么事也干不了;如果它正在调查这个问题,那末答案会是:由于劳力不足。如果它接着问,劳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那末就会回答:人们都在挖堑壕,由于法军和英军的阵地彼此分开,因而这些堑壕的距离很长。我还要说:如果调查时不追究道路问题,那末调查就完全是虚有其名,如果追究这个问题,那末被告人在申辩时就会直接涉及英法关系的最微妙方面。

显然,大臣们的这种说明促进了已经播下的不信任种子的成长。把在克里木的英国军队的作用缩小到在巴拉克拉瓦执行卫兵勤务的这种情况,强烈地触犯了英国人的民族感情。随后,在“通报”⁸⁶上出现了一篇带有“皇帝”对英国宪法的一些看法的半官方性文章。这篇文章遭到了英国各周刊的尖锐批驳。在这以后,发表了布鲁塞尔回忆录⁸⁷,在这个回忆录里,路易-拿破仑一方面被描绘成克里木远征的倡议人,而同时又被描绘成向奥地利让步的倡议人。对这个回忆录进行评论(例如“晨报”所发表的评论)时所采用的尖锐词句使人想起了关于十二月二日政变的“一个英国人^①的信件”⁸⁸。

所有这一切在真正的民间刊物中究竟引起了怎样的反应,可以根据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的下面一段话来判断⁸⁹:

① 阿·理查兹。——编者注

“波拿巴把英国引诱到克里木……我军落入了圈套，而被他置于这样的境地：在俄国军队同他自己的军队发生接触前，我军就已打垮了俄国军队。在阿尔马河，在巴拉克拉瓦、因克尔芒和塞瓦斯托波尔城郊，英军都是处在最危险的阵地上。他们不得不承受主要的打击，因而遭到最大的损失。如果同法国相比较，那末，英国根据条约只应派出三分之一的军队。这三分之一的军队必须挑起几乎所有战役的重担。也就是这三分之一的军队应当守住塞瓦斯托波尔城郊一半以上的阵地。由于粮食和服装未能运到（这些物资在巴拉克拉瓦腐烂了），我们的军队被消灭了；粮食和服装未能运到的原因是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没有道路，而没有这条道路的原因是由于拿破仑坚持要占全部军队三分之一不到的英军完成一半以上的挖壕作业；这就使得英军不可能拨出必要的人力来修筑道路……格莱安、赫伯特和格莱斯顿所暗示的秘密就在这里……这样一来，拿破仑就蓄意毁灭了我们 44000 名兵士”，等等。

对法国同盟者表示不信任的所有这些迹象和对它的不满所以具有意，是因为领导政府的是帕麦斯顿勋爵，是每次都利用同法国的联盟作为向上爬的阶梯，然后又突然制造一种几乎必然要以战争来代替英法同盟的局面的人物。在 1840 年土耳其—叙利亚事件和签订 7 月 15 日条约（他以此结束了同法国的十年联盟）期间⁹⁰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842 年罗伯特·皮尔爵士曾经就这一点说过：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废除同法国的联盟——这个高贵的勋爵看来总是那样引以自豪的联盟。”

1847 年在同西班牙联姻问题⁹¹上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1846 年帕麦斯顿之所以能重新登上他的职位，就是为他访问了路易—菲利浦，极郑重地同他言归于好，并且在下院的一次讲话中奉承了法国人。1847 年他要人相信路易—菲利浦废除了联盟，因为路易—菲利浦破坏了乌得勒支条约⁹²（这个条约在 1793 失效，

此后未再生效),对英国女王采取了“背信弃义”的行为。至于谈到背信弃义,这里倒有一部分真话,但是,正如后来发表的文件所表明的,是帕麦斯顿为了得到决裂的借口,用最巧妙的方法促使法国宫廷背信弃义的。由此看来,狡猾的路易-菲利浦本来指望以机智胜过帕麦斯顿,可是自己却落入了这位子爵——“爱开玩笑者”所精心设置的圈套。只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二月革命,才阻碍了英法战争的爆发。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9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15 号

卡·马克思 调查委员会

伦敦 3 月 7 日。借口调查委员会破坏了同法国的联盟因而议会即将解散的传说，看来已经得到了证实。关于这一点，“晨报”记者指出：

“是谁赋予委员会以公开性质的？是帕麦斯顿勋爵。正如大家所断定的，他存心要解散议会。要求进行调查并且争取到这一点的罗巴克坚决主张委员会处于秘密状态。而反对进行调查但又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帕麦斯顿勋爵却赞成公开。起初他迫使委员会选择了一条在我们的国外同盟者看来是最可耻的途径，然后，这条途径的可耻性就成为首相解散议会、停止进行调查和暗自嘲笑这两者的理由。”

关于这个问题，“先驱晨报”的社论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当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占据自己的阵地时，英军在数量上多于法军；后来我军队伍之所以减员，完全是由于在地中海缺乏预备部队，在英国本土缺乏有组织的民军。由于这些原因，英军就缺乏必要的增援部队。想把我们的盟国的声誉纠缠到辩论中去的这种企图乃是一些绝望了的、没有良心的人所勉强能掩盖住的诡计，这些人力图逃避调查，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调查对他们未来的政治前途十分有害。克拉伦登勋爵通过迂回的途径设法会见了法国皇帝，其唯一目的就是迫使他发表可以被解释为不赞同调查委员会的声明或意见。现在，当这一点已经做到后，爱国的大臣们就抱定宗旨要在‘**同法国的联盟在危急中！**’这个口号下用解散来威吓议会并向全国呼吁。”

十分明显,如果这种诡计是为了使英国政府摆脱调查委员会,那末同时它也就使同法国的联盟受到损害,因此就恰好准备下了它似乎应当预防的东西。必须放弃委员会,因为据说它能揭穿使法国同盟者的声誉受到损害的“微妙和危险的”秘密,这种论断本身就已经使法国同盟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撤销委员会要比委员会本身更能说明是反对法国同盟者的。何况,根据对英国舆论经常摇摆不定这一点的最肤浅的了解,我们深信:撤销委员会或者解散议会(这被理解为似乎是根据波拿巴的要求对外国所作的巨大让步)一遇适当时机就会引起反应——对法国的影响进行最强烈的反抗。

让我们从调查委员会头两次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引证爵士德·雷希·伊文思将军的供词吧。在军队从英国出发以前不久,曾经派了一位军需部的官员到马尔他岛去,他在岛上惊异地知道:连一匹骡子都没有买到。在斯库塔里,屠宰牲口和烘制面包的必要准备工作也没有做好。当时已经发现,财政部所订的一些规章制度严重地妨碍着正常工作的进行。伊文思坚信在战争初期就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幻想,似乎用不着放一枪一切就能顺利解决,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建立各种各样的仓库。军需部虽然受总司令监督,但是它同财政部(因而同首相)也有密切的联系,看来,军需部的官员曾经得到过这样的启示:支付目前战争所必须的费用是一种狂妄行为。在瓦尔那,收容伤兵的准备工作几乎完全没有做。显然,大家都深信在这次战争中不会出现伤兵。使军队能够立即开始野战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做。当俄军越过多瑙河时,奥美尔-帕沙曾经向英军求援,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军队没有必要的运输工具(不用说,这是早就应当考虑到的)。政府依旧在等待着维也纳的照会和议定书,而没

有作很大的努力使军队准备行动。当然，要对这种拖拉行为负责的是政府，而不是军需部。俄军已经开始围攻锡利斯特里亚，而英军却仍然没有做好出动的准备。军队的粮食供应由两个主管部门——军需部和补给部负责。可是同军需部发生冲突是常见的现象。军需部的官员也许是财政部的好文书。而事实上他们也不过是从事与财政部的来往公文的抄写工作而已。在战时他们根本没有用处。甚至要在距离瓦尔那 18 英里的地方采购粮食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瓦尔那军需处的人员太少了，因而不得不拨出 100 名士官去担任军需勤务。驻瓦尔那的兵士死亡率所以很高，主要是因为令人难受的、长期无所作为而产生的压抑情绪。

在谈到驻克里木的部队的状况时，德·雷希·伊文思重复了一部分大家所已经知道的事实——缺乏粮食、军服和板房等等。现在我们只举下面一段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说得很详细，因而值得加以注意：

“还在向比利牛斯进军期间就领导军需部、而现在是总补给官的年迈的菲耳德，从来没有和他商量过有关他（伊文思）的师的需要问题，而本来他是应当做到这一点的；他（伊文思）坚决要求履行这个职责，但是菲耳德拒绝了他的要求。菲耳德虽然是腊格伦的属下，但同时与财政部有直接的公文来往。”“用炮兵和骑兵的马匹来运送饲料是极不妥当的。结果是他（伊文思）的火炮最近只有半数能得到马匹供应。”“从巴拉克拉瓦港到兵营的道路已被严重冲毁，泥泞不堪。要有 1000 名兵士工作 10 天，才能使这条道路畅通，但是据他推测可以用于这方面的人力都派去挖战壕了。”

最后，伊文思说明了造成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死亡的原因：

“我深信，如果兵士们不是由于挖战壕而疲劳过度，那末在运送军服、粮食和燃料方面的缺点是不会引起军队中这种骇人听闻的死亡和生病现象的。

人体的疲惫衰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兵士的人数一开始就根本不足以应付他们所投入的那种劳动。夜间劳动时过分紧张无疑是军队遭受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10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17 号

卡·马克思 布鲁塞尔回忆录

伦敦 3 月 7 日。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晨邮报”今天刊登了附有一篇简短序言的著名的“布鲁塞尔回忆录”的英译文，在序言中推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拿破仑亲王。报纸同时还刊登了一篇充满着对拿破仑·波拿巴的恶毒攻击的社论，社论中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论调：“回忆录”的作者可能“只是一个俄国奸细”。

“晨邮报”显然只是借口保护路易·波拿巴免受他的堂兄弟的陷害和保持对阿希尔·勒卢阿，*alias*（要不）就是弗洛里芒，*alias* 就是德·圣阿尔诺的纯洁无瑕的怀念而为英法之间的矛盾寻找资料。圣阿尔诺是在历代法国骗子手的历书中所常见的那些 *Saints*（圣徒）^①，例如圣热尔门、圣乔治等等当中的一个。“晨邮报”的功绩就是把这些 *Saints* 尊为圣者，并且把他们变成相应等级的圣徒。说什么“回忆录”向俄国人泄露了“军事”秘密，这种论断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德国的评论界都没有等待“回忆录”的出版来说明克里木远征是一种失策。虽然“回忆录”的功绩是毫不客气地描绘了那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指挥作战的庸碌之辈的群像，但是“回忆录”并没有比在它出版以前就

^① 这里是俏皮话：法国人名字中的“圣”按字义就是“圣徒”。——编者注

出现的那些评论多说一个字。只有俄国人才希望对克里木远征抱有幻想，“晨邮报”谈到俄国的代理人和奸细时所表现出的那副激动样子使人想起了埃斯基涅斯，此人一方面指责狄摩西尼，说他受了菲力浦的收买，而同时自己又吹嘘说比别人先识破马其顿皇帝的密谋。但是我们，当然决不是要把拿破仑·波拿巴亲王说成是狄摩西尼。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7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11 日

“新奥得报”第 11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爱尔兰的复仇

伦敦 3 月 13 日。爱尔兰向英国报了仇：在社会方面，爱尔兰在英国每一个较大的工业城市、海港城市和商业城市中都分出了爱尔兰人区；在政治方面，爱尔兰在英国议会中有了“爱尔兰旅”。1833 年，丹尼尔·奥康奈尔痛斥辉格党人，说他们“下流、残暴和冷酷”。但到 1835 年，他却变成了那些辉格党人手中的最驯服的工具，因而，墨尔本政府尽管遭到英国大多数人的反对，毕竟还是靠着奥康奈尔和他的爱尔兰旅的支持，从 1835 年 4 月执政到 1841 年 8 月。为什么 1833 年的奥康奈尔和 1835 年的奥康奈尔竟是这样不同呢？原来有了一个所谓“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⁹³，根据这个协定，辉格党内阁保证对奥康奈尔在爱尔兰予以“保护”，而奥康奈尔则保证爱尔兰旅在议会中支持内阁。辉格党一被推翻，这位“丹王”^①就开始了 Repeal（取消合并）的鼓动⁹⁴，但当托利党遭到失败的时候，“丹王”就又变成了普通的律师。奥康奈尔逝世后，爱尔兰旅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影响。相反，事实表明，它之所以有影响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天才，而是由于一般的权力关系。英国议会中的两个历来的大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大体上是势均力敌的。

① 丹尼尔·奥康奈尔。——编者注

因此,改革后的议会里获得议席的新兴的小派别——曼彻斯特学派和爱尔兰旅——能在双方之间起着举足轻重和决定性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爱尔兰人区”在英国议会中的作用就是由此产生的。奥康奈尔逝世后,已经不能用 Repeal (取消合并) 的鼓动来发动爱尔兰群众了。“天主教”问题也只能偶尔利用一下。自天主教徒解放以后,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可用来进行鼓动的经常题目了。因此,爱尔兰的政治家们就不得不干当年奥康奈尔所极力回避和反对的事情,即触及爱尔兰的祸根——土地所有制关系并提出改革这种关系的要求作为竞选口号,也就是有助于他们被选入议会的口号。在得到议席之后,他们就立即设法利用佃农的权利问题等等(像从前利用 Repeal 一样),来缔结新的“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

爱尔兰旅推翻了得比内阁。它在联合内阁里取得了一个职位,虽然是一个次要的职位。它是怎样利用这个职位的呢?它帮助联合内阁“埋葬”了改革爱尔兰土地关系的措施,这些措施本来是托利党信赖爱尔兰旅的爱国精神并想把它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而自己决定提出的。帕麦斯顿作为一个爱尔兰出身的人,是深知自己的“爱尔兰人区”的,因而主动地在最广泛的基础上恢复了 1835 年的“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他任命爱尔兰旅的首领克奥为爱尔兰的 Attorney General (首席检察官),任命也是由爱尔兰选出的天主教自由派议员菲兹吉拉德为 Solicitor General (总检察长),又任命爱尔兰旅的第三个成员为爱尔兰 Lord Lieutenant (总督) 的法律顾问;这样,控制爱尔兰的整个司法总部现在就由天主教徒和爱尔兰人组成。原来联合内阁的 Clerk of Ordnance (军械局秘书) 蒙塞耳,虽然像门茨(北明翰选出的议员、军火制造商)所正确指出

的，连毛瑟枪和针发枪也分不清，可是帕麦斯顿在稍经犹豫之后，仍然批准他担任原来的职务。帕麦斯顿指示各郡郡长：凡是爱尔兰民军中的上校职位和其他负责职位，一般都该优先委派给与议会内的爱尔兰旅有联系的爱尔兰僧侣所保护的人来担任。帕麦斯顿的政策已经收到了效果，serjeant（皇家法官）施氏的倒向内阁就是证明。此外，这还表现在阿思隆的天主教主教达到了使克奥重新当选的目的，以及天主教僧侣帮助了菲兹吉拉德再度当选。凡是在天主教下级僧侣把“爱尔兰的爱国精神”真当一回事并反对倒向政府一边的爱尔兰旅成员的地方，这些下级僧侣都受到知悉外交秘密的主教们的申斥。

一家托利党新教派的报纸悲戚地喊道：“帕麦斯顿勋爵与爱尔兰僧侣之间完全一致。如果帕麦斯顿把爱尔兰交给神甫，那末这些神甫所选出的议员就会把英国交给帕麦斯顿。”

爱尔兰旅为辉格党控制英国议会服务；辉格党以职位和薪俸给爱尔兰旅一点小恩小惠；天主教僧侣则以双方承认、巩固和扩大天主教势力为条件，让一方收买它和另一方出卖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随着爱尔兰人在英国政治方面的势力的增长，克勒特人在爱尔兰社会方面的统治在削弱。看来，议会中的“爱尔兰人区”和爱尔兰僧侣都同样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背后，盎格鲁撒克逊的革命正使爱尔兰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这一革命就是爱尔兰的土地关系制度正在让位于英国的土地关系制度，小的租佃制度正在被大的租佃制度所排挤，正如旧日的土地所有者让位于现代的资本家一样。

准备了这一变革的主要事件是：1847年饥荒，这次饥荒的结果大约死了100万爱尔兰人；向美洲和澳洲的移民，这次移民又使

100 万人从爱尔兰的土地上消失而且还在继续使成千上万的人消失；遭到失败的 1848 年的起义⁹⁵，这次起义使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信心也丧失了；最后是迫使负债的爱尔兰旧贵族拍卖地产的议会法令，这一法令把这些贵族从土地上赶走了，正如饥馑夺走了小佃农、转佃农和无地农民的生命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16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27 号

弗·恩格斯 克里木事件⁹⁶

伦敦 3 月 16 日。由于官方的无能、英国内阁的阴谋和波拿巴主义的贪婪而产生的对克里木战事的幻想，与最近几个月盖满战场的积雪一同开始消失了。在小日罗姆·波拿巴的一本小册子中直接提到：正当克里木的情况乱成一团的时候，

“总司令们奉政府指示掩饰和隐瞒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困难”。

这完全为这些将军们的报告、特别是他们不止一次散布的定于某日强攻的谣言所证实了。自去年 11 月 5 日到今年 3 月初，拉芒什海峡两岸的公众一直等待着这场戏的最后一幕。而长期围攻的结果，在兵营内也造成了以有见识的军官们公开发表的意见为根据的某种舆论，总参谋部的先生们已经再也不能散布联军将于某日进行强攻和城市将被攻占的谣言了。现在这已经欺骗不了任何一个兵士。防御工事的性质，敌人火力的优势，围攻部队的兵力与它所担负的任务的不相称，特别是北堡的决定意义，——这些现在在整个兵营内都知道得很清楚，以致老调不能重弹了。我们曾有机会读到英国军官的信件，他们对于这种情况是丝毫也不怀疑的。

从现有材料来看，到 2 月底，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有

58000名法军，1万名英军和1万名土军，共约8万人。但是即使联军有9万人，也未必能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而以另一部分兵力进攻巴赫契萨赖附近的俄军。因为联军能调往巴赫契萨赖的野战部队不会超过4万人，而俄军却至少能以6万人和它对抗，并且那里地形开阔，联军不会再像在因克尔芒和巴拉克拉瓦之间时那样，两翼都有无法接近的阵地。因此，联军将继续被困于赫尔松涅斯，直到他们能够以大约10万军队渡过黑河时为止。但是在这里又可以看出他们所陷入的那种恶性循环：投入这个染有鼠疫菌的捕鼠器的部队愈多，因病遭受的损失就愈大；而从那里安然脱身的唯一办法，却是派遣尽可能多的部队。

联军想出的另一个计策，是土军向叶夫帕托利亚远征，而现在看来，这却是原先错误的直接翻版。土军在叶夫帕托利亚附近刚一登陆，便发觉自己的兵力过于薄弱，不能向半岛的腹地推进。看来，这个据点周围的工事占了很大的面积，需要2万人左右的部队防守。而规定容纳4万人的营垒也一定相当大，以致当敌人来袭击时，需要大约以半数的军队积极迎战。这样一来，城市本身的防御大致就需要2万人，而只剩下2万人可以进行野战。但就是这2万人，也不能离开叶夫帕托利亚若干英里，否则就业遭到俄军从两翼和后方的各种袭击，甚至与城市的联系也有被俄军切断的危险。而俄军却能够向皮列柯普和辛费罗波尔这两个方向退却，而且由于是在本国领土上，随时都能避免同来自叶夫帕托利亚方向的2万土军进行任何较大的决战。因此，距城市一日行程的1万俄军，随时都能威胁集中在城内的4万土军。俄军每后退10—12英里，敢于离开作战基地的土军人数将随之减少。换句话说，叶夫帕托利亚是第二个卡拉法特，所不同的只是卡拉法特

58000名法军，1万名英军和1万名土军，共约8万人。但是即使联军有9万人，也未必能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而以另一部分兵力进攻巴赫契萨赖附近的俄军。因为联军能调往巴赫契萨赖的野战部队不会超过4万人，而俄军却至少能以6万人和它对抗，并且那里地形开阔，联军不会再像在因克尔芒和巴拉克拉瓦之间时那样，两翼都有无法接近的阵地。因此，联军将继续被困于赫尔松涅斯，直到他们能够以大约10万军队渡过黑河时为止。但是在这里又可以看出他们所陷入的那种恶性循环：投入这个染有鼠疫菌的捕鼠器的部队愈多，因病遭受的损失就愈大；而从那里安然脱身的唯一办法，却是派遣尽可能多的部队。

联军想出的另一个计策，是土军向叶夫帕托利亚远征，而现在看来，这却是原先错误的直接翻版。土军在叶夫帕托利亚附近刚一登陆，便发觉自己的兵力过于薄弱，不能向半岛的腹地推进。看来，这个据点周围的工事占了很大的面积，需要2万人左右的部队防守。而规定容纳4万人的营垒也一定相当大，以致当敌人来袭击时，需要大约以半数的军队积极迎战。这样一来，城市本身的防御大致就需要2万人，而只剩下2万人可以进行野战。但就是这2万人，也不能离开叶夫帕托利亚若干英里，否则就业遭到俄军从两翼和后方的各种袭击，甚至与城市的联系也有被俄军切断的危险。而俄军却能够向皮列柯普和辛费罗波尔这两个方向退却，而且由于是在本国领土上，随时都能避免同来自叶夫帕托利亚方向的2万土军进行任何较大的决战。因此，距城市一日行程的1万俄军，随时都能威胁集中在城内的4万土军。俄军每后退10—12英里，敢于离开作战基地的土军人数将随之减少。换句话说，叶夫帕托利亚是第二个卡拉法特，所不同的只是卡拉法特

以把敌人赶到海里，而在岸上构筑一些简单的土质工事，就甚至可以
把军舰阻挡于相当远的距离以外。如果联军舰队向叶夫帕托利
亚派遣一支能压制俄军抵抗的分舰队，那末俄军就可以烧光这个
地方，使它以后完全不能用作登陆部队的作战基地。但是在目前形
势下，俄军只会乐于让叶夫帕托利亚留在联军手中。4万土军——
土耳其拥有的唯一值得重视的军队的最后残余——被封锁在营垒
中，俄军用1万兵力就可以把他们箝制在这里，而且土军还受到
通常因人群聚集而随之发生的流行病和困苦生活的威胁；这4万
被俄军箝制的土军，使联军的进攻兵力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法军和英军被封锁在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土军被困在
叶夫帕托利亚，而俄军却与塞瓦斯托波尔北区和南区保持着顺畅
的联络，——这就是在克里木5个月试验的光荣结果。与此有关
的还有许多政治和军事情况，我们将在下次通讯中分析。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3月16日
左右
载于1855年3月19日“新奥得报”
第131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5
年4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5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弗·恩格斯 大冒险家的命运

这几天我们发表了从拿破仑亲王不久前出版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几段有趣的话；我们并不怀疑，读者已经给予了应有的注意⁹⁸。这本小册子揭露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令人惊异的事实，即克里木远征是路易·波拿巴本人的创举，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而独自制定了详尽的远征计划，为了避免瓦扬元帅的反对，他把计划的手稿送往君士坦丁堡。当所有这一切真相大白之后，这次远征造成的最严重的军事错误有很大一部分从远征的创举者的王朝利益中找了解释。在瓦尔那军事会议上，圣阿尔诺不得不直接借用“皇帝”的权威硬要到会的陆海军将领进行克里木远征，因为当时这位统治者本人曾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见公开斥为“怯懦的建议”。来到克里木之后，圣阿尔诺却情愿接受腊格伦所提出的向巴拉克拉瓦进军的真正怯懦的建议，因为实现这个建议，即使不能直接到达塞瓦斯托波尔，那末不论到什么地方，至少也是接近了它的大门。没有充足的器材就狂热地强行围攻；迫不及待地开火，因而使法军如此忽视自己工事的牢固程度，以致敌人在几小时内就把他们炮队的火力压下去了；兵士在堑壕里经常过度疲劳，现在已证明，这同其他原因一样促使不列颠军队崩溃；从10月17日到11月5日进行了没有意义和没有效果的炮击；忽视各种防御工事，甚至忽视比

较巩固地占领通往黑河的一大片丘陵地，因而在巴拉克拉瓦和因克尔芒附近遭到了损失，——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波拿巴王朝需要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在最短期限内攻下它，联军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康罗贝尔如果获得成功，就可以如愿地成为法国的元帅、伯爵、公爵、亲王，并享有“滥用”公款的无限权利。反之，如果失败，他就要成为出卖皇帝利益的叛徒，并将和他的同僚拉摩里西尔、贝多、尚加尔涅一样被流放。腊格伦是那样的优柔寡断，以致不能不对这位与成败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同僚让步。

然而以上这些不过是皇帝的作战计划的最微不足道的结果。法军有 9 个师，即 81 个营被拖入这场毫无指望的战争。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最轻率的牺牲，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塞瓦斯托波尔比以前更加坚固了；我们现在根据可靠的材料得悉，法军的堑壕仍然在距离俄军工事整整 400 码远的地方，而英军的堑壕还要远一倍。波拿巴派去视察围攻作业的尼耶尔将军声称，强攻是根本谈不上的；他改变了主攻方向，把攻击的出发地点从法军方面转移到英军方面。这样一来，不仅延长了围攻的时间，而且把主要打击的矛头指向城郊，即使城郊被占领，它与城市之间仍被南湾隔开。简单地说，施展一个个诡计，玩弄一个个花招，并不是为了保持胜利的希望，而只是为这种希望装装样子而已。当事态发生了如此变化的时候，当大陆上即将爆发全面战争的时候，当一支新的波罗的海远征军（这支远征军在目前航行季节内应当取得某些成就，因此登陆部队的数量应比 1854 年的远征大得多）正在装备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固执的性格促使路易·波拿巴又把 5 个步兵师投入了克里木泥潭，而在那里兵士们甚至整个整个的团就像变魔术似的消失着。不但如此，他还决定亲自到克里木去，以便看看他的兵

士们是怎样进行最后一次强攻的。

这就是路易·波拿巴第一次战略性试验使法国所陷入的处境。这个不知为什么自以为将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堪与其王朝奠基人媲美的伟大统帅，其实从一开始他就不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小人。路易·波拿巴仅掌握非常有限的情报，却制订了向远在 3000 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远征的计划，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就详尽而秘密地制订了这个计划，并把它送给自己的总司令，而这位总司令虽然离攻击目标仅几百英里，但同样一点不知道敌人的抵抗力量，也一点不知道可能会遇到的障碍的性质。远征开始了，失败接踵而来，就是胜利也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它将要造成的唯一后果，便是远征军本身的复灭。拿破仑在自己的极盛时期也决不至于坚持采取这种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善于寻找其他出路，出敌不意地将自己的军队调往新的攻击目标，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甚至使暂时的失败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如果他在阿斯佩恩⁹⁹抵抗到底，那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只是在他没落的时期，在遭到 1812 年的惨败因而动摇了信心之后，他的坚强的意志力才变成了盲目的固执，例如，在莱比锡¹⁰⁰他就因此而死守那些他作为一个统帅而不可能不意识到是完全无用的阵地。然而，这两位皇帝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拿破仑以此而告终的正是路易·波拿巴由此而开始的。

看来路易·波拿巴真的坚决要去克里木亲自督战，以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他的行期可能推迟，但是要使他改变决心，只有签订和约。事实上，作为他第一次军事行动的这次远征关系着他个人的命运。但是可以认为，他真正出发的那一天，将是法国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革命的开端。欧洲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一点，都劝他放弃此行。法国资产阶级在提到他的克里木之行的时候，都不禁发

抖。但是这位斯特拉斯堡的英雄¹⁰¹是百折不挠的。他一生就是一个狂热的赌徒，近来又成了惯于下巨注的大赌徒，他正在凭着自己的“福星”，不顾最不利的时机而孤注一掷。此外，他也很清楚地了解，资产阶级把他留在巴黎以求摆脱危机的希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不论他在不在巴黎，法兰西帝国的命运，现行社会制度的命运，都要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堑壕里决定。如果他不顾一切，在克里木赢得胜利，那末他的亲临战场将有助于（至少在欧洲舆论界面前）使他不再被看做是一个强盗，而是一位英雄；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帝国都会灭亡。他随身带着自己的竞争者和可能的继承人——身穿中将制服的小日罗姆·波拿巴这一事实，就说明他是估计到可能会有这种结局的。

目前克里木远征首先是为奥地利的利益服务的。如果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斗争再持续几个月，那末这个吞噬一个又一个军的并且削弱法国和俄国力量的泥潭，将使奥地利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仲裁人，它在欧洲大陆的60万名兵士的巨大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足轻重，使它获得决定性的优势。然而幸亏还有阻碍奥地利获得这个最高权位的对抗力量。只要法国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支奥地利军队就将分裂为几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就将摆脱硬把他们拴在一起的锁链，而重新形成旗帜不同、目标各异的两大阵营，以代替欧洲今日不稳定的偶然的联合和敌对。那时斗争将只在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和另一方面是**君主反革命**之间进行。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3月16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4月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5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

伦敦 3 月 17 日。小日罗姆·波拿巴的小册子揭露了以下事实：克里木远征是路易一拿破仑本人的创举，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而独自制定了详尽的远征计划，为了避免瓦扬元帅的反对，他把计划的手稿送往君士坦丁堡。当所有这一切真相大白之后，这次远征造成的最严重的军事错误有很大一部分从远征的创举者的王朝利益中找到了解释。在瓦尔那军事会议上，圣阿尔诺不得不直接借用“皇帝”的权威硬要到会的陆海军将领进行克里木远征，因为皇帝本人曾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见公开斥为“怯懦的建议”。来到克里木之后，圣阿尔诺却情愿接受腊格伦所提出的向巴拉克拉瓦进军的真正“怯懦的建议”，因为实现这个建议，即使不能直接到达塞瓦斯托波尔，至少也是接近了它的大门。没有充足的器材就狂热地强行围攻；迫不及待地开火，因而使法军如此忽视自己工事的牢固程度，以致敌人在几小时内就把他们炮队的火力压下去了；兵士在堑壕里过度疲劳，现在已证明，这同军需部、运输部门、医务部门等等一样促使不列颠军队崩溃；从 10 月 17 日到 11 月 5 日进行了没有意义和没有效果的炮击；忽视各种防御工事——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波拿巴王朝需要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内攻下它；联军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康罗贝尔如果获得

成功,就可如愿地成为法国的元帅、伯爵、公爵、亲王,并在财政方面取得无限的权力。反之,失败就意味着他的官运的终结。腊格伦是那樣的优柔寡断,以致不能不对这位与成败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同僚让步。

然而这不是皇帝的作战计划的最重要的结果。法军已有 9 个师,即 81 个营被拖入这场毫无指望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几乎被认为输定了;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最轻率的牺牲,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塞瓦斯托波尔比以前更加坚固了;我们根据可靠的材料得悉,法军的堑壕仍然在距离俄军工事 400 码远的地方,而英军的堑壕还要远一倍。波拿巴派去视察围攻作业的尼耶尔将军声称,强攻是根本谈不上的;他改变了主攻方向,把攻击的出发点从法军方面转移到英军方面,这样一来,不仅延长了围攻的时间,而且把主要打击的矛头指向城郊,即使城郊被占领,它与城市之间仍被南湾隔开。简单地说,制定一个个计划,玩弄一个个花招,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保持胜利的希望,而只是为这种希望装装样子而已。当事态发生了如此变化的时候,当大陆上即将爆发全面战争的时候,当一支新的波罗的海远征军(这支远征军这次应当取得某些成就,因此需要比 1845 年更多得多的登陆部队)正在装备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波拿巴又把 5 个步兵师投入克里木泥潭,而在那里兵士们和整个整个的团就像变魔术似的消失着。不但如此,他还决定亲自到克里木去,要不是可能性极小的和约或者波兰边界的严重事件迫使他改变决定的话,他就一定会到那里去。这就是波拿巴的第一次战略性试验使他本人和“皇帝的”法国所陷入的处境。促使他到那里去的不仅仅是他的固执性格,还有那种认为法兰西帝国的命运要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堑壕里来决定

的不祥的预感。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马连峨能证明雾月十八日的再版¹⁰²是正当的。

复辟的帝国不管怎样努力摹仿自己的原型，还是不得不到处做和拿破仑所做的相反的事情，这种情况，真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拿破仑打击的是同他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心脏；今天的法国攻击的却是俄国的 *cul de sac*（死胡同，偏僻地方）。希望不寄托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寄托在成功的 *coup de main*（突击）、奇袭和冒险上面。第一和第二法兰西帝国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整个差别就在于这种策略的不同。拿破仑惯于以胜利者的身分进入现代欧洲各国的首都。而他的继承者则以各种借口——保护教皇、保护苏丹、保护希腊国王——把法国的守备部队分驻在古代欧洲各国的首都：罗马、君士坦丁堡和雅典；结果丝毫没有加强威力，而只是分散了力量。拿破仑的秘诀在于集中，而他的继承者的秘诀却在于分散。当拿破仑看到自己不得不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作战时，例如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就立即把自己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有决定意义的作战线上（在对奥战争中是斯特拉斯堡—维也纳线），而把较少的兵力留在次要的战场上（意大利）；因为他相信，即使他的军队在次要战场上打了败仗，他自己在主要作战线上的胜利也能比任何直接的抵抗更可靠地阻挡敌军的前进。反之，他的继承者却把法国的兵力分散在许多地方，而把一部分兵力集中在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连最小的胜利（如果一般地说能够取得这种胜利的话）也要付出最大牺牲的代价。除了在罗马、雅典、君士坦丁堡、克里木的军队以外，还得向奥地利接近波兰的边境派遣一支辅助部队，向波罗的海派遣另一支辅助部队。这样，法国军队起码要在三个彼此相距最少也有 1000 英里

的战场上作战。按照这个计划，法国的兵力还在欧洲战争具有严重的性质以前，就几乎全部使用上了。当拿破仑认识到他已经开始的行动不合理时（例如在阿斯佩恩），他便不坚持这一行动，而善于找寻其他出路，出敌不意的将自己的军队调往新的攻击目标，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甚至使暂时的失败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只有在他没落的时期，当他在 1812 年以后对自己丧失了信心的时候，他的坚强的意志力才变成了盲目的固执，使得他死守作为一个统帅很清楚地知道是完全无用的那些阵地（例如在莱比锡）。可是他的继承者却不得不一开始就做他的先辈最后才做的事情。对于一个来说是无法解释的失败的结果，对于另一个来说则是无法解释的幸运的结果。对一个来说，他所信赖的福星是他自己的天才，对另一个来说，却不得不以自己的福星的信赖来代替天才。一个赢得了真正的革命，因为他是能够实现这个革命的唯一人物；另一个则赢得了重新唤起的对过去革命时代的回忆，因为他承袭了这个唯一人物的名字，因而他本身就是一种回忆。在第二帝国的内政中反映了它的作战方法的自命不凡的平庸，在这方面也是外表代替了现实，“经济的”远征决不比军事的远征更有成效，要证明这些本来是并不困难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17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20 日
“新奥得报”第 1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 报刊的反普鲁士运动。
—— 斋戒日。—— 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伦敦 3 月 19 日。为了说明这里报刊对普鲁士的态度，我们引证两段摘录——一段摘自托利党的机关报“先驱晨报”，另一段摘自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先驱晨报”在引证刚被任命为海军副大臣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对他的朴次茅斯选民发表的演说时指出：

“罗伯特·皮尔爵士希望迫使普鲁士采取明确的政策，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地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感情，因为否则我们第二次远征波罗的海就会像第一次远征那样毫无结果。我们的议定书够多了，‘条款’也够多了；早就应当切断俄国的物资来源，引起俄国内部相应的反应了。”

“晨邮报”收到了下面一篇关于韦德尔将军使命的巴黎通讯：

“韦德尔将军把他接到的指示通知拿破仑内阁。这些指示是什么呢？韦德尔将军告诉法国政府：（1）普鲁士国王陛下对他的内弟——俄皇之死深感悲痛；（2）关于 12 月 28 日的议定书，普鲁士完全同意西方各国的意见，并准备按任何传统的形式签字，因此普鲁士应在维也纳会议上占有席位。然而全部问题在于：12 月 28 日的议定书并不使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它不过是一份外交上的历史文件草稿而已。因为普鲁士拒绝签订关于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缔结联盟的正式的条约，所以韦德尔将军的使命可以认为是完成了。”

大家知道，泰尔和迦太基的统治者们在希望上帝发慈悲时，并

不是拿自己去当祭品的，而是收买穷人家的孩子，把他们扔到烧得通红的摩洛赫怀抱里。官方的英国规定人民要依顺上帝，进行斋戒和为前任政府因其拙劣的管理方法而使人民受到的那些耻辱忏悔，为政府从他们身上榨取来而没有作出一桩好事的数百万英镑忏悔，为它昧着良心地从他们那里攫去的数千条生命忏悔。枢密院宣布最近这个星期三为忏悔和祈祷日，

“以便祈求宽恕我们的罪孽，用最恭顺和虔诚的方式高举我们的祈祷文和给万能上帝的禀帖，恳求它赐福、保佑我们的武器和为女王和她所有的领地恢复和平”。

坎特布里大主教就像在举行宫廷仪式时的宫内大臣一样，颁布了一张进行这种宗教仪式的“表格”——规定怎样祈求万能上帝的表格。在英国国教会和也为俄国武器恳求上帝赐福的俄国国教会之间的这种惊人竞争中，优势显然是在后者这方面。

“先驱”¹⁰³指出：“沙皇的臣民读了坎特布里大主教所规定的祈祷文，会感到这是胆小鬼的祈祷文；英国人读了它，会感到这是伪君子的祈祷文；非国教徒读了它，会理解为这是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所有教徒的教派祈祷文；而工人将认为它是有钱人的祈祷文，这些有钱人属于同一教派，并且支持整个这种骗局，认为这种骗局能间接地帮助他们保留对官位的垄断。大主教的这种殷勤到肉麻的创作引起了全国各地工人阶级的愤慨。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斋戒和节制日是一种现实的东西。而对于所有那些不相信贫穷的人来说，不论他们抱有什么其他信仰，这一天只是意味着在平日的食物中加上鸡蛋和鱼汤，并且像星期日那样关上他们的企业和作坊的大门。对于工人来说，斋戒日意味着丢掉工资，因而也就意味着丢掉一顿午餐。”

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我们曾指出：

“正是在资产阶级同贵族阶级的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业无

不是拿自己去当祭品的，而是收买穷人家的孩子，把他们扔到烧得通红的摩洛赫怀抱里。官方的英国规定人民要依顺上帝，进行斋戒和为前任政府因其拙劣的管理方法而使人民受到的那些耻辱忏悔，为政府从他们身上榨取来而没有作出一桩好事的数百万英镑忏悔，为它昧着良心地从他们那里攫去的数千条生命忏悔。枢密院宣布最近这个星期三为忏悔和祈祷日，

“以便祈求宽恕我们的罪孽，用最恭顺和虔诚的方式高举我们的祈祷文和给万能上帝的禀帖，恳求它赐福、保佑我们的武器和为女王和她所有的领地恢复和平”。

坎特布里大主教就像在举行宫廷仪式时的宫内大臣一样，颁布了一张进行这种宗教仪式的“表格”——规定怎样祈求万能上帝的表格。在英国国教会和也为俄国武器恳求上帝赐福的俄国国教会之间的这种惊人竞争中，优势显然是在后者这方面。

“先驱”¹⁰³指出：“沙皇的臣民读了坎特布里大主教所规定的祈祷文，会感到这是胆小鬼的祈祷文；英国人读了它，会感到这是伪君子的祈祷文；非国教徒读了它，会理解为这是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所有教徒的教派祈祷文；而工人将认为它是有钱人的祈祷文，这些有钱人属于同一教派，并且支持整个这种骗局，认为这种骗局能间接地帮助他们保留对官位的垄断。大主教的这种殷勤到肉麻的创作引起了全国各地工人阶级的愤慨。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斋戒和节制日是一种现实的东西。而对于所有那些不相信贫穷的人来说，不论他们抱有什么其他信仰，这一天只是意味着在平日的食物中加上鸡蛋和鱼汤，并且像星期日那样关上他们的企业和作坊的大门。对于工人来说，斋戒日意味着丢掉工资，因而也就意味着丢掉一顿午餐。”

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我们曾指出：

“正是在资产阶级同贵族阶级的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业无

工资和资本家记入借方的那笔款项之间的差额。这样一来，工人就变成了雇主的债务人，不得不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同雇主重新订立合同。现在他们还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奴，但是与农奴不同的，就是他们甚至连维持自己肉体存在的保证都没有。

对于应该杜绝这种岂有此理的现象的亨利·哈耳福德爵士的法案，下院是在二读时把它否决的，而对于英国著名的抨击文作家的儿子科贝特的法案，**议院连理睬都不屑于理睬**。因为这个法案所要达到目的是：(1) 以 1847 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制停歇机器的办法使法律所规定的对工厂劳动时间的限制成为“现实”。

明天我们再来谈谈关于伦敦饭店中的群众大会的情况。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22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37 号

卡·马克思

* 伦敦饭店中的群众大会

伦敦 3 月 20 日。“晨报”几个月来作了不少努力来组织一个名叫“国民和立宪协会”的鼓动团体，其宗旨是推翻寡头政治制度。经过巨大的准备工作如发出呼吁和征集签名等等后，终于在上星期五在伦敦饭店召开了公开的群众大会¹⁰⁶。这一天就成了被大肆宣扬的新协会的誕生日。早在大会开始以前，大厅就挤满了工人群众，最后，当那些自己把自己选出来的新运动的领袖们来到时，他们好容易才在讲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席位。当选为主席的詹姆斯·泰勒先生宣读了累亚德·德·雷希·伊文思爵士、韦吉利、詹姆斯·杜克爵士和约翰·雪莱爵士等人的来信，他们表示完全同情协会的宗旨，但却借口种种原因，不肯亲自出席会议。然后又宣读了“告人民书”。内容是论述东方战争进行的情况和内阁的危机。接着就声明：

“每一个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有才干的人，都具有担负国家管理职务所必需的条件。”

这种对资产阶级特殊奢望的笨拙的暗示遭到了响亮的嘘声。

“告人民书”中接着写道：“这个协会的首要任务是要消灭贵族阶级对政权和国家职位的垄断，因为这种垄断对国家的最高利益是极其有害的。属于次要任务的是废除秘密外交。这个团体的特殊使命是向联合王国的全体选

民呼吁，以便提醒他们要对那些受他们委托来保护国家的物质资源和自由的人进行必要的严密监督，尤其是不要再把自己的选票投给贵族阶级和财富的微不足道的代表及其傀儡。”

在这以后，**比耳斯**先生站起来，作了详尽的发言，为第一个建议辩护：

“由于国内情况危急，由于在篡夺了政府职权、垄断了国家职位和特权并给国家招来耻辱和不幸的目前寡头政治制度的条件下所作的任何改进尝试都已显然无望，因此有必要把人民联合起来以制止旧制度的继续存在……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名叫**国民和立宪协会**的团体。”

梅里勒榜的巨擘之一**尼科莱**先生支持这个建议。议员**阿普斯利·佩拉特**也以同样的精神发了言：

“人民将以**克伦威尔‘铁骑军’**般的决心、稳健适度、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担负起改革管理制度的事业。英国的选民如果决心**无报酬地**派遣廉洁正直的人到议会里去，那末他们就有充分的可能消灭一切舞弊行为。但是如果像埃布林顿勋爵那样的人只是因为他付出了 5000 英镑（而他的倒霉的对手却白白花了 3000 英镑）就可以代表梅里勒榜参加议会，那末英国选民就不可能指望会有廉洁正直的代表。”

接着议员**默娄**先生走上讲台，但在会议的坚决要求下他不得**不让乔治·哈里逊**（诺定昂的工人，宪章派）先发言。

哈里逊说：“这个运动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分配国家职位和抚恤金、并为比现存的寡头政体更坏的寡头政体打下基础的一种尝试。”

接着他宣读了**一个修正案**，宣布土地贵族和金钱贵族同样是人民的敌人，并且声明，复兴国家的唯一手段是实行包括下列五项条目的**人民宪章**：普选权，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取消财产资格限制。

厄内斯特·琼斯（宪章派领袖，出身于贵族家庭）支持这个

修正案，并且指出：

“人民如果支持这种以夺取政权和职位为目的的资产阶级运动，那末他们自己就破坏了自己原来的立场。毫无疑问，在讲台上有不少人是渴慕首相职位的（cheers（表示赞同的喊声）），有很多人是喜欢 in partibus（异区的）^①薪金事少的职位的（cheers）。然而，人民不应当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之流以及货币资本的代表缔结联盟。不是土地贵族，而是资本的代表抗拒人道的工厂法；正是他们否决了反对 stoppage of wages（名义工资中的扣款）的法案，他们阻挠通过有益的协会法——也正是货币和工业资本的代表早在一切人之先就力图压迫和凌辱人民。从我这方面来说，我随时都准备参加旨在摧毁戴文希尔公爵和其他等人势力的运动，但决不是为了让代表工厂尘埃的公爵和代表纱锭的勋爵来代替他们。（表示赞同的喊声和笑声）有人说，工人运动、宪章运动是死气沉沉的。我要向资产阶级的改革家先生们表明：工人阶级是充满生气的，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任何一个运动。如果资产阶级不把人民宪章及其五项条目列入它的纲领，工人阶级就不会让资产阶级动一动。资产阶级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吧——他们休想再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经过短时间的争辩后，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主席企图摆脱修正案，说这不是修正案，但是不久他还是被迫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修正案被提付表决，并且在至少是 10：1 的情况下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人群中发出了响亮的表示赞同的欢呼声，人们挥舞着帽子。主席宣布修正案通过后，在哄堂笑声中表示相信大多数出席大会的人毕竟是拥护成立“国民和立宪协会”的。因此，发起人将着手进行这个协会的下一步组织工作，稍后再向人民发出要求支持的呼吁。这时，他暗示了一下（纵然是用隐讳的形式），今后为了避免别人的反对，只允许持有会员证的人出席会议。兴高采烈的宪章派称

^① 原意是：“不信教地区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地区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就加有这种字样。——译者注

赞了主席,对他表示感谢,于是群众大会就结束了。

不能否认,甚至从被公开宣布的协会的原则这方面来看,逻辑是在宪章派这方面。协会想通过向议会而不向内阁呼吁的方式推翻寡头政体。但内阁是什么呢?是议会多数人的亲信。或者它想通过向选民呼吁的方式来推翻议会吗?然而议会是什么呢?是自由选举出来的选民代表机关。可见,出路只有一条——扩大选民范围。那些拒绝接受宪章因而拒绝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包括全体人民的人,自己就供认了他们想用新的贵族制来代替旧的贵族制的意图。他们想以人民的名义同现在的寡头政体打交道,同时在向人民发出号召时又想避免使人民自己登上舞台。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41 号

卡·马克思 英国报刊的消息

伦敦 3 月 20 日。纽卡斯尔公爵发布了召回卢肯勋爵的命令，潘缪尔勋爵发表了腊格伦反对卢肯的信件，而哈丁勋爵这位卓越的英军元帅则拒绝卢肯提出的进行调查和军事审判的要求。卢肯勋爵不顾两位大臣——克里木的总司令和伦敦最高统帅的反对，昨天在上院作了详细的说明，来证明要对巴拉克拉瓦城郊轻骑兵复灭负责的不是他，而只是腊格伦，证明阿伯丁内阁和帕麦斯顿内阁想为克里木的这位随和、笨拙和好说话的总司令开脱责任而把卢肯勋爵交给愤懑的公众去惩罚。本来就应当设法使这个大怪物——社会得到满足的。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从卡瑟克特将军尸体上找到的一封没有写完的信，这封信是寄给他妻子的，写信的日期是 11 月 2 日，即因克尔芒会战¹⁰⁷前三天，也就是骑兵在巴拉克拉瓦城郊进行攻击后的一星期。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写道：

“完全相反，不论是卢肯勋爵，或是卡迪根勋爵，都不应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只是服从命令。”

“泰晤士报”在今天的一篇关于维也纳会议¹⁰⁸的文章中提出了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意见：如果会议能认真进行，那末主要障碍将来自土耳其人方面。必须力争苏丹，而不是沙皇在四项条款范围内作出重大的让步。

前天“泰晤士报”又以下列“可靠”消息蒙骗读者：还在3月19日以前就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强攻。这种从无可救药的悲观绝望到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愉快乐观的突然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泰晤士报”开始它的克里木战局来反对已被推翻的联合内阁，以及在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必要性问题上它说《*ceterum censeo*》¹⁰⁹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即格莱斯顿建议废除印花税和减轻那种邮资是一辨士的报纸的重量，因而对它的垄断造成了威胁的时候；他建议把这个重量限制为4盎斯，也就是比一份“泰晤士报”的重量还轻。格莱斯顿刚被推翻，他的继任人乔·康·路易斯爵士就撤回了这个法案，同时“泰晤士报”希望一切都能照旧，因此突然放弃了它对克里木事件的忧郁看法，而代之以一幅动人心弦的、闪耀着胜利希望光芒的图景：仅仅在三个月以前这家报纸还对它致悼词的那支军队在这里又活动起来了。今天“泰晤士报”的情绪又转为忧郁，因为昨天乔·康·路易斯爵士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又提出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泰晤士报”大声喊道：这是往事述评文作者对新事物的憎恨！大家知道，路易斯过去是“爱丁堡评论”杂志的发行人。

一旦下院详细阐述这个法案，我们再来谈这个法案；现在我们只指出一点：这个法案是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而这个学派的功绩就是孜孜不倦地鼓吹在报刊方面实现竞争自由。帕麦斯顿内阁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是 *captatio benevolentiae*（企图博得好感）以防解散下院和进行新的议会选举。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3月2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3月23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139号

卡·马克思
* 议会新闻：上院关于
普鲁士的辩论

伦敦 3 月 21 日。在上院昨天的会议上，利物浦和卡斯尔里的旧同僚林德赫斯特勋爵终于提出了他早就答应提出的“关于普鲁士对维也纳会议的态度”的提案。他指出，最近有两个情况使这个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垂死的俄国皇帝写信给普鲁士宫廷和亚历山大二世发表宣言；亚历山大二世在宣言中保证贯彻彼得、叶卡特林娜、亚历山大和他父亲的政策。俄国本身是怎样想像普鲁士的政策，这可以从波茨措—迪—博尔哥在 1828—1829 年战争爆发前不久拍给涅谢尔罗选的一封秘密急电的下列一段摘录中看出。在这封急电中有一段写道：

“如果俄国对土耳其采取强制手段，那末就有一切理由指望：普鲁士决不会在这方面阻挠它；相反，普鲁士的独立自主同时又是和睦亲善的立场将对其他各国发生强烈的、抑制性的影响，使它们不得不同意符合于俄国的尊严和利益的结果。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让柏林内阁知道我们的意图，并使它相信，我们分配给普鲁士担任的角色将促使双方君主和双方宫廷之间的真诚关系得到巩固。”

林德赫斯特高声喊道，难道在过去就能够未卜先知地预言最近半年或一年来普鲁士宫廷所奉行的那种方针吗？诚然，普鲁士

在12月5日、1月13日和4月9日的议定书上签了字。这些议定书的目的就是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使苏丹的独立和土耳其的完整得到保证。普鲁士宫廷有没有遵照这个目的行事呢？曼托伊费尔男爵曾经就用于军事行动的3000万塔勒借款问题声明：在上述议定书中普鲁士对俄国政策所表示的意见就是认为俄国作了一种很不正义的行为，但是普鲁士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和积极参加战争。难道这是一个大国的语言吗？难道普鲁士签订了1840年和1841年的条约而不承担保护土耳其的直接义务吗？曼托伊费尔男爵又补充说道：德国的独立或德国的利益并不因发生了冲突而受到损害，因此普鲁士并不认为自己应当作出任何牺牲。然而曼托伊费尔男爵自己在另一个文件里又坚决主张相反的东西。不过，要是沙皇占领君士坦丁堡，那谈论德国的独立和德国的利益也就没有必要了。它们都应当对优势力量让步。接着，林德赫斯特顺便提了一下陆军大臣博宁的辞职、从伦敦召回本生大使和拒绝草拟普鲁士议会对御前演说的答词等问题后，就把话题“转到这出政治悲剧的第二幕”。他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奥地利认为要求俄国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是可能的。这个要求拟就后就送到柏林去签字了。柏林给维也纳送来了一些反建议，这些反建议根本不能接受，但是需要花费时间，因为还得把它们提交盟国研究。当时俄国已经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但是以军事上的理由继续占领着它们一部分领土。并且俄国还声明：今后打算采取单纯防御性的立场；于是普鲁士就退出了联盟，它肯定地说俄国已经满足了一切合理的要求。从这时起，普鲁士就使用一切手段来破坏奥地利的计划。抱着这个目的它向联邦议会和德意志各邦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顺利）建议。就在这个时候，俄国

对德意志两个邦拒绝参加同盟国公开表示感谢。他（林德赫斯特）现在又把话题转到这出戏的第三幕和最后一幕来了。同盟国确定 8 月 8 日在维也纳会谈，以决定向俄国提出哪些要求作为任何初步谈判的基础。同平常一样，普鲁士接到了这方面的通知，而且通知书不只接到一封。它没有直接拒绝参加会议，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参加。由于普鲁士的缺席，同盟国没有草拟议定书，而是签署了一个照会，其中提出四项条款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同时要俄国接受这四项条款，但是俄国拒绝接受。而普鲁士方面却公布并散发了一个文件，反对上述四项条款。与此同时，它还继续劝说联邦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宫廷，以阻止德意志各小邦参加同盟国。12 月 2 日的条约签订后，普鲁士得到通知说，可以给它以加入这个条约的机会。普鲁士拒绝加入，但声明它准备单独同法国和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上述国家对此表示同意后，普鲁士在历次谈判过程中明明知道法国和英国必然不会同意，却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要求无止境地进行修改。当他（林德赫斯特）谈到普鲁士时，仅是指官方的普鲁士。他知道，普鲁士的人民绝大多数是对俄国有反感的。可是完全不能理解，普鲁士在拒绝加入 12 月 2 日的条约后，又怎么能要求别人邀请它参加维也纳的谈判。他希望各同盟国不论在何种借口下都不要让普鲁士代表参加，否则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就不是一票，而是两票了。普鲁士的外交政策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起就没有改变过。他提起了 1794 年、提起了奥斯特利茨会战前后不久的那个时期等等。

克拉伦登勋爵。——他只打算对英国和普鲁士之间谈判的消息作几点补充。在俄国政府拒绝了同盟国提出的条件后，曾经召集过有关各国大使的会议，但是会议始终没有开成，因为普鲁士

政府的代表不愿参加。虽然后来普鲁士驻伦敦大使对克拉伦登声明：他的政府打算给予它驻维也纳大使以所需要的许可令，但是他（克拉伦登）回答说：“现在太晚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通信是对俄国有利的。还在12月2日的条约签订以前，就曾经邀请普鲁士参加这个条约，但是没有结果。普鲁士要求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允许它参加新的会议，其理由说是：这次会议是前一次尚未结束的、普鲁士根本不想退出的会议的继续。对于后面这种说法，英国政府引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会议由于普鲁士不顾屡次邀请而不愿参加，因而已经一度中断。何况新的会议根本不是旧的会议的继续，因为奥地利在10月和11月向英法两国提出重新召开会议的要求时，英法已经对它作了答复，言明签订议定书和举行会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但是如果奥地利同意和它们签订军事条约，那它们要看一看，和平能否争取到。这样就产生了12月2日的条约。后来曾经表示准备同普鲁士签订单独的条约。

“但是，让普鲁士享有一切特权而不与我们分担任何危险；允许它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参加可能以和平告终、但也可能引起更大规模战争的会议；在普鲁士还没有就它的目的和政策发表任何声明以前，对于现在或必要时它是否会同我们结成联盟这一点还没有把握以前，对于它将作为中立国家，还是作为敌对国家，还是作为友好国家来出席会议这一点还不了解以前，就允许它参加会议——这些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克拉伦登说，普鲁士后来派出的专门代表团不论是在伦敦或是在巴黎都受到了同样的善意接待，但是谈判暂时还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他毕竟没有认为谈判已经中断了。只不过是在三天以前才提出了新建议。可惜，维也纳会议仍然是在普鲁士因其本身的行为而受到排斥的情况下开幕的。像普鲁士这样的大国是不能把

自己关在德国这个狭窄范围内的。有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普鲁士提出警告，反对过这种态度，但普鲁士却总是回答说：它的政策就是和平。而实际上它的政策“既非欧洲式的，又非德国式的，也非俄国式的”；与其说它是要威胁俄国，不如说它是要妨碍奥地利。而且一旦有人拿欧洲的重大利益作为赌注的时候，普鲁士毕竟不能长期坚持它的闭关自守的政策。它不能站到俄国方面，因为这同普鲁士和德国的民族感情有抵触。普鲁士十分清楚地懂得：如果它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地利，它就会成为俄国的附庸。而支持奥地利普鲁士又不愿意。相反，它对奥地利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

“因此我断定：普鲁士采取了闭关自守和虚伪的态度。这种做法也许是它的敌人所喜欢的，但是它的盟邦和它本国人民中的爱国者却深感遗憾。”

最后克拉伦登勋爵保证，他将竭尽全力以争取普鲁士的合作。

威·格莱安勋爵在下院质问首相道：

“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再度当选时说过，不恢复波兰和匈牙利，就不能满意地解决东方问题。不知奥地利大使有没有要求克拉伦登勋爵对这些话作解释。”

帕麦斯顿勋爵没有对这个问题作任何答复，而只对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位表示高兴。至于谈到匈牙利，他说奥地利早就知道，把匈牙利从帝国分离出去，英国就会认为是对欧洲的一种很大的不幸，因为奥地利帝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欧洲中心的存在被当作是保持均势的一个重大因素。至于谈到波兰（这时由于帕麦斯顿在回答时作了片刻停顿，在继续讲话时又用了一种奇腔怪调，因而引起了哄堂大笑），他说，他的看法是，在波兰目前的制度和现在被占领的情况下，它对德国是一个经常的威胁。然而现在维也纳正在讨论的各项条款并没有包括任何关

于改组波兰的条文。但是，英国和法国将根据情况或战局的发展而保留这样的权利：以他们认为对欧洲未来的安全来说是重要的其他条文来补充作为目前进行谈判的基础的四项条款。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41 号

弗·恩格斯 拿破仑最近的诡计¹¹⁰

“如果克雷兹渡过加利斯河，他必将毁灭辽阔的帝国。”这个回答吕底亚国王的德尔斐神谕^①，现在完全适用于路易·波拿巴的克里木之行。他的亲征的确将招致帝国的毁灭，不过毁灭的不是俄罗斯帝国，而是他自己的帝国罢了。

特殊的、不正常的局势要求采取不寻常的行动。任何人如果处在他的地位，进行这种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为一比十的亲征，都会被看做是疯子。路易·波拿巴大概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仍不得不亲征。他是整个远征的倡议者；他把联军引到了现在所处的不妙境地，因此，他应对全欧负起使联军摆脱这种处境的责任。要知道这是他第一次重大的军事伟业，其结局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将影响他作为一个统帅的声誉。他对这次远征的成败，恰好要用自己的皇冠负责。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原因同样地使他把这次冒险的克里木亲征看做国家大事。兵士们在东方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对争取新帝国的军事荣誉已经大感失望。在瓦尔那和巴扎尔吉克，假查理大帝的帕拉丁之流^②被自己军队赠以“猴子”的绰号。《A bas

① 德尔斐为古希腊城市，因阿波罗神庙的神谕出名。所谓神谕就是祭司借神灵之名所说的话，它是为贵族服务的。——译者注

② 帕拉丁是中世纪长篇小说和长诗中查理大帝最亲密的战友的名字，此处指路易·拿破仑的亲信圣阿尔诺、埃斯潘纳斯等人。——译者注

les singes! Vive Lamoricière!》（“打倒猴子！拉摩里西尔万岁！”）——朱阿夫兵在被圣阿尔诺和埃斯潘纳斯派到保加利亚荒原而将死于霍乱和寒热病时这样高声喊道。现在，在军队里人们已不单是把失宠的将军们的荣誉和名望同目前率领法军的指挥官们值得怀疑的声誉加以对比了。小日罗姆·拿破仑在东方任职期间的奇怪行为¹¹¹使富有经验的阿尔及利亚兵士记起了奥尔良亲王们在非洲时截然不同的行为；那些亲王，不论人们怎样议论他们，总还是身先士卒履行自己军人的天职的。当然，年轻的奥马尔和年轻的拿破仑之间的鲜明对照足以促使兵士们议论：要是奥尔良王族仍然当政，亲王们定会同我们并肩作战，同我们共患难，要知道他们都不叫拿破仑！这就是兵士们说的话。怎么能让他们沉默呢？这个“被允许穿师长制服”的人，竟然损害了同拿破仑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军事传统；而皇室其余的成员不是十足的文人、自然科学家、教士，便是些道地的冒险家；老日罗姆由于年迈不能算数，况且他昔日的战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荣誉。由此可见，路易—拿破仑除了亲自出马以外，别无他法。此外，关于当前克里木之行的消息已传到法国的穷乡僻壤，并且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而路易—拿破仑正是被农民拥上宝座的。农民们确信，被他们拥上宝座并且也叫做拿破仑的这位皇帝，的确应当是 *Napoleon redivivus*（再生的拿破仑）；在他们看来，路易—拿破仑应当率领军队，他所率领的军队决不会次于大军的军团。塞瓦斯托波尔所以没有攻下来，就是因为皇帝还没有到那里去；只要他在那里一出现，俄国要塞的棱堡就会像耶利哥的城墙一样土崩瓦解。因此，路易—拿破仑即使不愿意去，也不能收回自己亲征的诺言，因为关于他这次出征的消息已广泛地传开了。

因此，准备工作正以全力进行。为了加强已经在克里木的 10 个师，应当再增派 4 个师，其中 2 个师应在战局刚开始时在君士坦丁堡组成预备军团。这 4 个师中，1 个师将由皇家近卫军组成，另 1 个师将由精兵混成连即巴黎军团的掷弹兵和轻骑步兵组成；其余 2 个师（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或者已经开始上船，或者正在土伦和阿尔及尔集结。这些增援的生力军到达后，法军在克里木的人数将达 10—11 万人左右；而到 4 月底，15000 名皮蒙特人和大批不列颠增援部队也将开到那里。但是，未必能指望联军在 5 月会有 15 万人开始作战。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变成了一个大墓地，并且是非常荒芜的基地，那里的情况是，随着炎热或潮湿天气的到来，它必将成为各种各样流行病的发源地；不论那里有多少军队，疾病将非常猖獗，死亡率也一定会很大，因而联军将遭到比目前更为可怕的损失。在全部增援部队到达以前，联军的作战部队没有任何可能从现在的阵地向前推进，而增援部队要在 5 月中旬才能开到，可是那时流行病将十分猖獗了。

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联军也不得不把 4 万人留在塞瓦斯托波尔南区附近，因此只有 9—10 万人能用来同俄军野战部队作战。只要联军不进行特别成功的机动，而俄军又不犯严重的错误，那末这支军队从赫尔松涅斯出动后首先就应击溃俄军，将它赶出辛费罗波尔，然后才能同叶夫帕托利亚附近的土军会师。我们假定实现这一会师没有特别的困难，但是土军能够派给这支五花八门的法、英、皮蒙特联军的增援部队至多也只有 2 万人，并且还不完全适于野战。这样，总共将组成一支约 12 万人的军队。很难设想，这样一支军队在被俄军破坏过的、缺粮的以及主要财富即牲畜无疑被俄军赶到皮列柯普去了的这一地区内能够生存下去。只要军队前进一步，就必

须运去大量饲料并派出大批部队保障翼侧和通往海港的交通线。迄今尚未参战的俄国非正规骑兵将开始用袭击的方法疲惫联军。与此同时，俄军也会调来增援部队；由于法国对最近 6 个星期的军事准备工作大肆宣扬，俄军得以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无疑，俄军从沃伦和贝萨拉比亚的部队中或从新编的预备部队中抽调的 2—3 个师，目前正开往克里木，以保持那里原有的兵力对比。

可是，联军却不能不用最大的一支部队从北区封锁塞瓦斯托波尔。这又需要用去 2 万人，剩下的部队，在供应上这么困难，而且还累赘地带着一大串运载弹药和粮食的车辆，因此未必有足够的力量把俄国野战部队赶出克里木。

十分明显，路易·波拿巴企图在克里木靠胜利来取得拿破仑的声誉，但是这棵胜利之树却长得相当高，要攀折它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指出的一切困难都只是局部性的。反对这种在克里木的作战方法的主要理由，归根到底是这种作战方法把可以使用的法国全部武装力量的四分之一用在次要战场上，而在这里即使取得最大的胜利，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种在夺取塞瓦斯托波尔问题上不顾一切的、已经发展到某种迷信地步的并且赋予成败以虚构的意义的顽固态度，正是整个作战计划的最根本的错误。而赋予克里木整个事件以虚构意义，反过来就又使这一计划的倒霉的制定者吃到加倍的苦头。对亚历山大来说，塞瓦斯托波尔远非整个俄国，但对路易·波拿巴来说，不能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便等于失去法国。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23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5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会战¹¹²

今天本报刊登了法、英、俄官方关于塞瓦斯托波尔会战的报道。这一极其重要的事件值得我们作某些说明和评论，以作为对官方文件的补充。

大约一个月以前，俄军的出击通常都是成功的，这使我们作出了如下结论：堑壕已推进到使被围者和围攻者势均力敌的距离上^①。换句话说，堑壕已构筑到这样近的地方，以致俄军在出击时能够向任何一段堑壕集中至少相当于联军在 1—2 小时内才能调集的兵力。既然一两个小时就足够用来把倒刺钉钉入火炮的火门以破坏炮台上的火炮，联军自然不能使自己的接近壕再向前推进。从这时起，直到可以用来替换一部分英国步兵和加强堑壕警卫的法军 3 个旅（第八师的 1 个旅和第九师的 2 个旅）开到时止，联军停止了积极的行动。同时，工程部队的将军尼耶尔和琼斯来到后，又使围攻作业展开了，并纠正了主要由于法国比佐将军的固执和由于英军步兵人数不足所造成的错误。联军构筑了新的接近壕，特别是在离马拉霍夫冈上的俄军工事约 300 码的英军配置地段上，构筑了新的平行壕。一些新构筑的炮台已非常逼近因克尔芒，以致只要一开火，便能从后方射击或以纵射火力射击俄军的部分炮台。

^① 见本卷第 60—61 页。——编者注

俄军为了对付这几线新的工事，采取了非常巧妙和大胆的行动。

从平面图上可以看出，俄军的防线由卡兰亭湾到内港，再由内港到基连湾入口处，成半圆形围绕着城市。基连湾是由一条深谷形成的不大的海湾，这条深谷从大湾即塞瓦斯托波尔停泊场一直远远地伸向联军兵营所在的台地。这条山谷西面的许多高地构成了俄军的防线；其中最大的高地是马拉霍夫冈；这个冈由于居高临下而成为俄军整个右翼的锁钥阵地。在这条山谷和基连湾的东面也有一个高地，它完全处在俄军炮台和军舰的炮火射程内，又由于联军未能彻底破坏塞瓦斯托波尔和因克尔芒之间的、为停泊场北面的堡垒和炮台的火力所掩护的交通线，因而它始终未被联军占领。但是，由于联军把自己的炮队设置在马拉霍夫冈东面和东南面的阵地上，能从翼侧和后方威胁俄军的防线，所以这个双方都未占领的高地便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俄军在2月20日夜间接了一个作业队到那里构筑由俄军工程师预先设计好的多面堡^①。21日晨，联军看到了一道长壕及其外面的胸墙，但是他们大概完全不理解这些工事的作用，因而并没有阻拦俄军施工。到次日晨，多面堡已经筑成，当然并没有完全筑成，因为以后的战事表明，护堡壕的断面即护堡壕的深度以及胸墙的坚固程度还很不够。这时联军开始明白，这个堡垒的位置非常优越，使俄军能以纵射火力射击他们的纵射炮台，从而使这些炮台几乎失去作用。工程师们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夺下这一堡垒。因此，康罗贝尔极其秘密地建立了一支约由1600名朱阿夫兵和3000名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强攻纵队。由于作战命令是在深夜突然下达的，因此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结时耽搁了一下，当朱阿夫兵终于带头发起攻击时，已经是2月24日清晨

^① 色楞格多面堡。——编者注

2 时了。他们经过短时间的跑步后，到达离护堡壕 20 码的地方。与通常进行这种攻击时一样，没有允许放枪；兵士们奉命取下枪上的火帽，以免进行不必要的和过早的射击。突然传出俄军下达口令的声音，多面堡内一支强有力的部队行动起来，他们把枪放在胸墙上，对进攻的纵队进行齐射。由于夜暗和在堑壕内作战的兵士根深蒂固的常规——任何时候都只通过胸墙向正前方射击，这一齐射仅能使进攻纵队正面不宽的先头部队遭到轻微的损失。朱阿夫兵的前进几乎一点没有被尚未筑好的护堡壕和垒墙的缓坡所阻滞，他们转瞬间就冲入了多面堡，端着刺刀扑向敌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过了不久，朱阿夫兵攻占了半个多面堡，稍后，俄军便完全放弃了该堡。而在这时，跟在朱阿夫兵后面不远的海军陆战队不知道是迷了路还是由于其他某种原因，在高地斜坡上停了下来。他们在这里遭到俄军纵队两翼夹攻，虽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仍被俄军赶下高地。显然，在战斗时或战斗后不久天就亮了，因为俄军曾仓促地撤离高地，把多面堡留给朱阿夫兵，随后便以所有能利用的火炮轰击朱阿夫兵。有一段时间，朱阿夫兵卧倒了，而一些随伴他们的志愿兵射手则爬向马拉霍夫冈上的工事，企图对准炮眼向俄军炮手射击。但由于俄军炮火过于猛烈，不久朱阿夫兵便不得不退到朝向因克尔芒的高地斜坡上，在那里可以避开大部分炮台的火力。他们肯定地说，他们把自己的全部伤员都撤回来了。

在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中，朱阿夫兵在蒙奈将军的指挥下作战非常勇敢，而俄军则以固有的顽强精神很巧妙地作战。俄军的兵力为两个团，即色楞格团和沃伦团，这两个团的人数在数次作战之后每营已不超过 500 人，共计 4000 人。它们由赫鲁朔夫将军

指挥。俄军的行动如此成功，以致法军宣称，似乎俄军已预先了解了他们的整个攻击计划。俄军对海军陆战队的攻击几乎转瞬间即获全胜；他们由未完工的多面堡撤退后，就把倒霉的、失去支援的朱阿夫兵置于炮兵的猛烈射击之下，而当战斗还在多面堡内进行时，炮兵却一弹未发。

康罗贝尔将军发现，这次失败在他的军队中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已经不止一次表现出来的急躁情绪，现在强烈地爆发出来了。兵士要求强攻城市。“背叛行为”一词——这是法军一惯用来解释每次失败时的用词——在军队中响亮地喊出来了，甚至还指出了把法国军事会议的秘密决议泄露给敌人的背叛者的名字；人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就认为这个背叛者是福雷将军。康罗贝尔非常慌张，急忙写了一道命令，把整个行动说成是辉煌的、虽然是相对的胜利；同时又给腊格伦勋爵送去一份文件，建议立即开始强攻，而这一建议当然被腊格伦勋爵拒绝了。

俄军守住了这一新的多面堡，并进行了加修。这个阵地非常重要。它保障通向因克尔芒的交通线并保障从那方面运送给养。它还从翼侧威胁着联军围攻工事的整个右侧，只有构筑新接近壕才能消除这一阵地的危害性。不仅如此，所有这一切还证明，俄军不仅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且能够前进到阵地以外。2月下旬，俄军在新多面堡附近对着联军的工事建立了反接近壕体系。但是，报告里没有指出这些工事的准确方向。不管怎样，在塞瓦斯托波尔有上面所说的那两个基干团，这就说明到目前为止仅由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组成的守军已得到很大的补充，并且现在已有足够的兵力来应付敌人可能的行动。

最近的报道说，联军炮台可能在3月10—11日左右射击俄军

的防御工事。但是，在俄军实力雄厚和联军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否指望联军会造成胜利的首要条件，即围攻者的火力比被围者的火力猛烈，并且猛烈到在英军和法军弹药耗尽前就能压制住俄军炮台的火力呢？但是即令联军能取得这种结果，即令俄军野战部队在这种决定性的关头不试图攻占因克尔芒和巴拉克拉瓦附近的阵地，即令联军将对俄军的第一道防线进行一系列的攻击并且突破它，那时又将怎样呢？在强攻纵队面前将会出现新的防御工事、新的炮台和改成小型碉堡的坚固建筑物，而要消灭它们又必须构筑新的炮台。联军在弹雨下将被迫撤退，最多也只能守住夺得的俄军第一道防线。

这以后将是对第二道防线围攻，接着又是对第三道防线围攻，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小型障碍物了，而俄军工程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是不会不在他们负责的防御地段上设置这种障碍物的。同时，酷暑和阴雨交替，在由于成千具的人马尸体腐烂而产生瘴气的土地上，将引起前所未闻的疾病。当然，流行病不仅会在城外，而且还会在城内猖獗起来，但是，谁知道究竟哪一方将首先被流行病瓦解呢？

春天的来临对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正在激战的这个宽 5 英里、长 10 英里的小小半岛来说，将意味着可怕的灾难；如果路易·波拿巴的这一伟大的远征终于开始获得丰硕的果实，那他真应当替自己庆幸。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23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7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4358 号，并载于 1855
年 3 月 26 日“新奥得报”第 14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

伦敦 3 月 24 日。迪斯累里的报纸“新闻报”¹¹³断定说,“路易皇帝”是缔结和约道路上的唯一障碍,他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奥地利力求摆脱这项协定),从而使自己同奥地利联结起来,这种说法在上星期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托利党人直到现在仍像保护自己的婴儿一样保护着英法同盟。难道马姆兹伯里勋爵没有加强同波拿巴的联盟?¹¹⁴难道迪斯累里未曾在议会中恶毒地嘲笑格莱安和伍德,说他们似乎在自己的选民面前罪恶地诽谤十二月二日的政变?难道两年来托利党人无论在议会讲坛上或在报刊上都不是最狂热的战争提倡者?而现在突然毫不转弯抹角、也毫不客气地诋毁同法国联盟,刻薄地讽刺“路易皇帝”并鼓吹和平!年高望重的托利党人的老朽的机关报“先驱晨报”不知道党的领袖的秘密,怀疑地摇晃着脑袋,嘟哝着激烈的词句来反对它所不能理解的“新闻报”的错觉。然而,“新闻报”今天又回到不祥的命题上来。它在最显著的地位用黑体字刊登着以下的报道:

“重要的情况已经弄清楚了。我们不久前曾说过,我们有根据推测, congress re infecta (没有结束工作的会议)将要中断,约翰·罗素勋爵即将回国。奥地利在尼古拉皇帝逝世后改变的对俄国的口气,特别是奥地利皇帝向亚历山大二世所作的声明,无疑都促成这种结局。现在我们也有根据推

测，法国皇帝已消除了走向全面和解道路上的障碍，法国会同意完全撤出克里木，对拆毁或缩减这个地区的工事也不会提出任何条件。”

“新闻报”为了说明这个预言，援引了“自己的一篇社论里所报道的可靠的详情细节”。但是，恰巧这些详情细节同根据这些详情细节十分仓促地作出的结论奇怪地矛盾着。

社论写道：“维也纳的事态每小时都在朝着不明智和不顺利的方向转化；因此，重要的是要使拉芒什海峡双方所阐明的意见产生应有的作用，以防止可能引起激动和惋惜的后果。如果 1853 年我们的大臣们真诚地对待英法同盟，那末也许不会导致战争；但如果战争避免不了的话，那末战争很可能进行得很顺利很成功。可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同法国结成友好的联盟，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争取达到它所说的 *A dhäsion* (吸引) 德意志各大邦的目的。西方列强同俄国作战的理由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坚决要明目张胆地割夺俄罗斯帝国的南部。这是解决东方问题的唯一办法。1853 年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但是错过了。它们白白地花费了时间和金钱，毁坏了军队和荣誉。如果 1853 年我们对法国没有诚意，那末，德意志各邦就不得不跟着我们走。而现在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奥地利皇帝向亚历山大皇帝保证说，‘奥地利既不企图缩小俄国的疆界，又不企图使俄国的领土遭受任何损失’。这些话只能有一种解释。至于谈到我们过去已经暗示过的法奥秘密协定，那末，根据绝对可靠的资料，我们已经知道，虽然这个协定显然带有两个帝国永久同盟的性质，但是其中丝毫没有说什么奥地利必定要进攻俄国。——俄国皇帝准备接受媾和条件，这些条件虽然并不意味着东方问题的解决，但是，毫无疑问，它们承认了侵略的彻底失败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所干的暴行的一种赎罪。我们认为，实施较高水平的政策的时机已经错过了，能够保证欧洲独立的各种情况的这种凑合不会马上再现；现在毕竟还可以求得一般对欧洲有益，对土耳其有利而对西方列强不失体面的和平。但是我们有根据担心这种和平谈判能否进行。谁阻碍着这件事呢？…… 法国人的皇帝。假如他现在仍然坚持那种任凭条件不利，东方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的意见，那我们就不会谈英国应当撤走了。但是我们知道，皇帝完全是别有意图…… 法国皇帝想出了缩小俄国疆界和可能的和平谈判之间的 *mezzo termino* (某种中间东西，中间道路)，这是危险的，也

可能是非常不幸的。皇帝梦想一个充满光辉的功绩、能恢复他的 prestige (荣耀) 的战争; 战争应当以一个和约告终, 而这个和约丝毫不能更改奥地利和俄国的建议所规定的、英国驻维也纳特命全权代表已准备同意的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疆界。至于计划中关于单纯为了挽回威信而决心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那一部分, 则更不用说了……我们认为, 这个计划的狂妄轻率与它的不道德是同样不能容忍的。如果为了威信而发动的战争没有成功, 那又怎么办呢? ……除了俄军在克里木设置的障碍以外, 瘟疫也像武器那样是一种威胁。如果为了威信而发动的这个战争没有成功, 那英国和法国又将如何呢? 那时德意志各邦将站在哪一边呢? 前途只有一个: 欧洲的衰落和毁灭。即使时机对我们有利, 我们是否有权利去冒这种风险, 何况不是为着去执行一定的政策, 而是单纯地进行示威? 对于法国人的统治者来说, 错过这种良机也许是很痛心的; 对于英国人民来说也同样痛心的。但是国家活动我们应当考虑到情况。无论法国、英国或是俄国, 1855 年的处境与 1853 年的处境不同。出卖欧洲最高利益的人们真是可怜得很。让他们去遭受他们所应遭受的命运吧。法国人的统治者和英国女王并没有过错, 但是他们不应该像失掉理智的竞技者那样, 在突然极度悲观或一阵绝望之下加速他们将要遭到的那种不幸的来临。”

在同一家报纸上我们发现引自日拉丹的一本抨击性小册子“和平”¹¹⁵的一段话, 其中欢迎同时拆除塞瓦斯托波尔和直布罗陀的军事设备, 认为这是真正解决和平问题的办法。

“新闻报”感叹地说道: “真想不到这本抨击性小册子, 或者确切些说, 它的出售, 是得到法国政府准许的, 而它的作者是皇位的可能继承者的亲密的朋友、顾问和同事!”

这里值得指出, 得比派(他们的机关报是“新闻报”)力图同爱好和平的曼彻斯特学派联合, 而内阁这方面也想靠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关于这个法案, 我们回头还要谈)把它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纯粹进行示威性战争的思想, 进行欧洲战争不是为了打击强大的敌人而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的思想, 进行装装样子的战争的

思想,自然一定会使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英国人失去自制力。现在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思想是否像复辟的帝国所理解和不得不理解的那样,是《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¹¹⁶之一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27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45 号

卡·马克思 拿破仑和巴尔贝斯。 ——报纸印花税

伦敦 3 月 27 日。根据可靠的材料我们得知，波拿巴定于 4 月 16 日访问圣詹姆斯宫¹¹⁷将成为大规模抗议性示威的导火线。宪章派已邀请法国流亡者阿尔芒·巴尔贝斯也在 4 月 16 日到伦敦来，在他到达之际伦敦将举行街头游行和大规模群众集会。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巴尔贝斯作海上旅行。

昨天下院二读通过了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法案。这项法案的主旨如下：（1）取消强制的报纸印花税。（2）在盖了印的纸上印刷的定期刊物像以往一样，享受免费邮寄的特权。第三条是有关邮寄印刷物的范围，最后还有一条规定，在盖了印的纸上印刷的报纸应当提交保证金以防因造谣中伤而可能引起的诉讼。为了说明报纸课税的旧制度，只要举出一两个例子就够了。在伦敦，出版日报至少需要 5—6 万英镑的资本。全部英国报刊，除了少数例外，掀起了反对新法案的一个最下流无耻的运动。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旧制度是对现有的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吗？在英国，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的无上特权。少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周刊（当然谈不上出版日报），依靠为了总的目的而作出与大陆工人完全不同的牺

牲的英国工人的每周捐款，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英国出版界的庞然大物——“泰晤士报”——悲喜交集地大声疾呼 *pro aris et focis*（为保卫社稷和家园，为自己的切身事业）而奋斗，也就是为报纸的垄断而奋斗，同时，它时而谦逊地把自己同德尔斐神灵作比较，时而断言在英国只存在一个唯一值得保存下来的机关即“泰晤士报”，时而自命为世界新闻界的统治者和——用不着什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欧洲所有新闻工作者的保护人。

“泰晤士报”的所有这些《cant》（“大话”）在下院的昨天会议上怪人德拉蒙德的发言中遭到了应有的驳斥，德拉蒙德说：

“现在的报刊是商业企业，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瓦尔特之流的先生们（“泰晤士报”的主要股东）自然有同布莱特先生开，设棉纺织厂一样的权利来开设政治性的废话工厂…… ‘泰晤士报’比它的竞争者更善于经营。瓦尔特之流的身边经常有一帮狡猾的人——开业多年的律师和类似他们的人，这些人随时准备对任何问题表示赞成或反对。例如巴恩斯、奥塞哲、楼梯林、德兰恩、莫利斯、娄和戴森特先生们就是这样的人。所有这些绅士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不善经营的愚蠢报纸，例如‘纪事晨报’，则投靠一个固定的党派。一种报纸渐渐成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另一种报纸则渐渐成为得比派的机关报等等。当皮尔派兴盛的时候，它的报纸也兴盛，但是只要皮尔派一不顺利，他们的报纸也就不顺利。不在行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真正的艺术——这里‘泰晤士报’也显示了它的技能——在于雇佣一大帮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绅士，并强使他们写稿。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的不彻底性；假如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持同一种观点，那末，这些新闻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说来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凑在一起，则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彻底的了。新闻界的真正美德看来是遵守这样的原则：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文学方面个人应表现正派，集体则应表现不诚实。这种原则很有用，‘泰晤士报’经常使德拉蒙德想起他的一个佃农，他曾叫这个佃农排于一块沼泽地。佃农说：‘决不！请不要排于这块地吧！下雨天在这块地上能长出一些喂牛的东西，如果长不出什么喂牛的

东西，那末会长出一些喂猪的东西，如果连喂猪的东西也一点长不出来，那末总会长出一些喂鹅的东西来的。’至于谈到报纸的叛卖性，那末这里有关于‘泰晤士报’的直接证据，拿破仑在谈到‘泰晤士报’时曾经说道：‘他们给我寄来了“泰晤士报”，下流的“泰晤士报”，波旁王朝的报纸。’在奥马腊的一本书里肯定地说，‘泰晤士报’每月从他那里得到 6000 法郎。奥马腊持有由报纸出版者签名的正式领钱收据。奥马腊还说，拿破仑在被放逐到厄尔巴岛前曾收到各种报纸，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关于著文保护他的建议。拿破仑拒绝了这些建议，但是后来他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了。”

对于上述情况，我们只补充一点，即“泰晤士报”于 1815 年曾坚决主张把它称之为欧洲蛊惑宣传头目的拿破仑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判处枪决。而在 1816 年，这家报纸却力图使北美合众国“这个胜利叛乱的极危险的典型”重新置于英国的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7 日

载于 1855 年 3 月 30 日

“新奥得报”第 15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调查委员会的揭露

伦敦 3 月 28 日。下院调查委员会已经开了 12 次以上的会议。它的调查结果大部分已为公众所知道了。社会各阶层的见证人，从剑桥公爵起，到“泰晤士报”的麦克唐纳先生止都被讯问过。他们的所有证词的特点是罕见的一致。各管理部门都受到了检查，它们都处于不仅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简直是可耻的、丑恶的状态。陆军司令部、医务部门、供应管理局、军需部、运输部门、医院管理局、卫生警察局、巴拉克拉瓦和君士坦丁堡的港务警察局——所有这些部门都一致被认为是不中用的。但是不论每一个部门单独来说多么糟糕，这套机构的全部美妙之处只是在它们相互接触和协作的过程中才显示出来。规章制度订得非常出奇，以致当它们一开始生效，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职权范围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终止以及应当同谁打交道。请读一读叙述医院状况的文章以及叙述在运输船上的和到达指定地点的伤病员所处的那种非常悲惨的境地（不知是由于玩忽职守，还是由于疏忽大意）的文章。在撤出莫斯科时还没有这类骇人听闻的现象。而且所有这些事实都发生在距君士坦丁堡——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大城市——很近的斯库塔里，而不是发生在仓皇退却的时候，即在哥萨克追踪退却者、切断其供应线的时候；所有这一切是发生在作战还顺利的时候。

候，发生在防御敌人进攻的地点内，发生在大不列颠用来为自己的军队集中储备物的、巨大的中心仓库内。而且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的祸首不是野蛮人，而是属于“成万个上层人物”之列的绅士，是一些独特的软心肠人。规章制度 fiat (万岁)，军队 pereat (让它去毁灭吧)！“请找别的部门吧，这件事不归我们管！”——“但是找什么地方呢？”——“了解哪一个部门是主管部门，这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内，即使这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也没有权限把这一点告诉你。”——“但是病员需要衬衫、肥皂、床单、住房、药品、面包和波尔特温酒。他们许许多多快要死亡了。”——“我们实在感到很遗憾，英国的精华会这样快毁灭，但是我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忙。即使我们有东西，没有六个人签署过的有关正式命令，我们也一点不能发给，而且这六个人中有四个人不在这里，他们在克里木，或者在其他地方。”即使兵士们看到甚至感觉到那些能够救他们的命的物资，他们也应当像唐达鲁士那样死去。在当地找不到一个男人有足够的毅力去打破这套陈规旧习，能够根据情况的需要而不顾规章地去负责采取行动。只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那是一个女人，南丁格尔小姐。她确信必需的物品都在仓库里，于是带领了几个大胆的人，真的撬开了锁，盗窃了女王陛下的仓库，并且向吓得呆若木鸡的军需官们声称：

“我终于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现在请你们把你们所看到的去告诉英国吧。全部责任由我来负。”

掌管君士坦丁堡和斯库塔里事务的老朽的懦夫们不仅不能采取这样勇敢的行动，而且表现得十分胆怯，要不是他们自己坦白承认，就很难令人相信有这等事。譬如调查委员会曾问过他们当中一个当过医院院长的安得鲁·斯密斯医师：难道在君士坦丁堡

就没有购买必需物品的资金和能够弄到这些东西的市场吗？

他回答道：“是啊！但是请你相信，在国内习惯了 40 年之久的因循守旧和拖拉作风后，我很难在几个月内弄明白哪些资金是真正由我全权支配的。”

而不列颠军队就是委托给这样一些老朽的懦夫们的！在报刊上和议会内所作的极其生动的描述与见证人的证词中所展示的实际情景比起来就显得黯然逊色了。对于赫伯特辈、格莱斯顿辈、纽卡斯尔辈以及 *tutti quanti*（诸如此类）的老爷们，对于皮尔的高级官员们（他们在议会内不止一次地把目前已经证实的事实说成是谎言，并且以很难期望于“最受尊敬的”老爷们的那种激情驳斥了这些事实），又能说些什么呢！对于 Exeter Hall 118 的这些纨绔子弟、皮由兹式的花花公子来说，“变形”和“实际存在”之间的差别是生命问题，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朴素的”自信心指挥战争，并且在不列颠军队的“变形”方面获得那么大的成就，以致使这支军队丧失了全部的“实际存在”。格莱斯顿回答道：“它正驻扎在某处，1 月 1 日驻克里木的不列颠军队有 32000 人。”但对他不幸的是，我们掌握有剑桥公爵提供的证据：在因克尔芒会战以后，即在 11 月 6 日，不列颠军队连 13000 人也不到，我们知道，11—12 月以来，这支军队损失了将近 3000 人。

同时，关于下院对内阁表示愤慨的消息、关于罗巴克委员会以及关于国内广泛不满的消息传到了克里木。为士兵们所欢迎的这些消息，使将军们和各部门的长官们感到恐惧。一星期以后又传来一则消息说，受权进行谈判和调查的委员会代表们已在途中。这个消息就像一股电流那样刺激了一下瘫痪病人。同时，没有受传统、常规和官僚恶习束缚的铁路工人也开始工作了。他们保障了登陆地点的物资供应，拿起了铁锹，修建了造船厂、掩蔽所和

障碍物，而且当滑稽可笑的老绅士们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第一批铁轨就已经铺成了。对于围攻来说，这条铁路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用更简便更省钱的办法就可以具备它的一切优点），但是它的极大好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范例，把墨守陈规、软弱无能的英国与现代化的工业英国作了鲜明的对比。由于铁路工人坚定地“前进”，因而使不列颠军队摆脱了被魔法迷惑的麻木状态，这种麻木状态是由虚假的不可设想的幻想所造成的，而这种幻想则把英国官兵引导到土耳其人的愚昧的宿命论，并迫使他们平心静气地把必然的灭亡看成是命中注定的厄运。由于铁路工人的坚决行动，在军队中又开始说：《Aide- toi et le ciel t'aidera》（“要自己争气，老天爷才会帮助你”）。在六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样。腊格伦和他的司令部，各个师和旅的将军们天天都在堑壕里出现，他们察看一切并发布命令。在军需部里找到了马匹、大车和车夫，而部队也能够为自己的病员、同时部分也为自己修筑掩蔽所。医务人员消除了医院帐篷和板房内的极其令人气愤的恶劣现象。开始有了弹药、军服以至鲜肉和蔬菜。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建立起来了，虽然还有许多应该加以克服的旧弊病，但是状况已得到改善则是无可置疑和非常显著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3 月 31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153 号

卡·马克思 不列颠军队

我们曾有机会了解到由下院任命去调查不列颠军队在克里木状况的著名委员会的大约 12 次会议的报告内容。社会各阶层的见证人，从剑桥公爵起，都被讯问过，他们的所有证词的特点是惊人的一致。各管理部门都受到了检查，它们都处于不仅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简直是丑恶的状态。陆军司令部、医务部门、供应管理局、军需部、运输部门、医院管理局、卫生警察局和违警法庭、巴拉克拉瓦的港务警察局——所有这些部门都一致被认为是不中用的。

但是不论每一个部门单独来说多么糟糕，这套机构的全部美妙之处只是在它们相互接触和协作的过程中才显示出来。这些机关的规章制度订得非常出奇，以致当部队在土耳其登陆后它们一开始生效，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职权范围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终止以及有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应当同谁打交道。因此，由于害怕负责，大家都把自己担负的责任推给别人。在这种制度下，医院中的病员都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疏忽大意和玩忽职守严重地影响到在运输船上的以及到达指定地点的伤病员。揭露出来的事实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撤出莫斯科时还没有这类骇人听闻的现象。然而这些事实确实发生在距君士坦丁堡——一个既拥有

人力又拥有丰富资源的大城市——很近的斯库塔里。所有这一切不是发生在仓皇退却的时候，即在哥萨克追踪里却者、切断其供应线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作战还顺利的时候，发生在防御敌人进攻的地点内，发生在大不列颠用来为自己的军队集中储备物的、巨大的中心仓库内。而且这些骇人听闻、卑鄙龌龊的事件的祸首不是残酷无情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出身名门受过教育的英国绅士们，是那些心肠软的、以慈悲为怀和笃信宗教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的每个人作为普通的人，是乐意做一切必需做的事情的；作为官方人士，他们则应当袖手旁观，若无其事地看待所有这些卑劣行为，并以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这种情况在女王陛下规章制度中的与他们有关的任何一项条文中都没有规定。宁可让 1000 名兵士去牺牲，也不要违犯女王陛下的规章制度！即使能够救兵士们的命的物资离开他们非常近（看来只要一伸手就能得到！），他们还是应当像唐达鲁士那样死去。

在当地找不到一个男人有足够的毅力去打破这套陈规旧习，能够根据情况的需要而不顾规章地去负责采取行动。只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那是一个女人，南丁格尔小姐。她确信必需的物品都在仓库里，于是就像报道所说的，她带领了几个大胆的人，真的撬开了锁，盗窃了女王陛下的仓库！掌管君士坦丁堡和斯库塔里事务的老朽的懦夫们不仅不能采取这样勇敢的行动，而且表现得十分胆怯，要不是他们自己坦白承认，就很难令人相信有这等事。曾经问过他们当中一个当过医院院长的安得鲁·斯密斯医师：难道在君士坦丁堡就没有购买许多必需物品的资金和能够弄到这些东西的市场吗？

他回答想：“是啊！但是请你相信，在国内习惯了 40 年之久的因循守旧

和拖拉作风后，我很难在几个月内弄明白哪些资金是真正由我全权支配的！”

在报刊上和议会内的发言中对情况所作的极其阴暗的描述与我们面前所展示的实际情景比起来就显得黯然逊色了。某些最令人发指的事实早已宣扬开了，但是现在它们带有更加阴暗的色彩。虽然这幅图景还远不是完整的，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以判断全部状况。在这幅图景中，除了随军的女看护以外，没有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一群群的工作人员都同样地恶劣而愚蠢，如果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自己的报告中敢于按照见证人的证词那样来写，那末他们就很难在英语里找到相当有力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谴责心情。

经过所有这些揭露以后，人们不仅对于直接的祸首、而且首先对于组织这次远征并且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些非常明显的事实为捏造的政府，是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极度愤恨和蔑视的感情的。这种伟大的“群贤”的联合，这批杰出的大政治家（他们的上台本来就应当意味着英国黄金时代的到来）现在在哪儿呢？辉格党人和皮尔分子、罗素的信徒和帕麦斯顿的追随者、罗尔兰人和英格兰人、自由保守党人和保守自由党人——所有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议价成交而已，而且所有那些被他们任命担任国家职务的人不是些老朽的懦夫，就是些十足的笨蛋。这些大政治家深信他们在30年内所操纵的机器一定能出色地运转，以致竟然没有派遣一名享有特命全权的人到克里木去应付预料不到的情况；既然管理得那么好，还会发生什么预料不到的情况呢！这些英国大臣们，就其天性和习惯来说，只善于服从别人，现在突然担负了指挥的职务，自然使英国弄到了非常可耻的地步。就拿腊格伦这个老头子来说，这是一个终身呆在威灵顿司令部里的人，这个人从来没

有得到许可由他自己独立负责地去行动，他活到 65 岁只养成了盲目服从命令的习惯。而这样一个人却突然被委托带领整整一支军队去对付敌人，去迅速而独立地决定一切问题！于是他也就非常出色地显示了自己。动摇不定、犹豫不决、对自己毫无信心、毫不果断和毫无主动精神，这一切都说明他的每个举动的特点。现在我们知道，当克里木远征的决定被通过的时候，他在军事委员会里表现得多么胆怯。他完全是听命于像圣阿尔诺那样的吹牛大王和下流胚（而威灵顿老头子只要说一句平淡的讥讽话就能迫使圣阿尔诺哑口无言）！在向巴拉克拉瓦进军时他犹豫不决，在围攻时和冬季灾难时期他又束手无策，除了躲避人们以外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其次是哈丁勋爵，就其性格来说，也只适合于担任下属的角色，但在这里，在英国，却是军队的司令官。虽然他是历次战役的参加者，但是从他的一套管理制度以及他在上院坚持他的一套制度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他从来没有走出过他的营房和办公室。说他一点也不了解作战部队最起码的需要，或者说他懒得去考虑这些需要，这是对他的活动可以作出的最温和的评语。再其次是皮尔的官员们——卡德威尔、格莱斯顿、纽卡斯尔、赫伯特以及 *tutti quanti*（诸如此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彬彬有礼、外表可亲的年轻绅士，他们的文雅风度和崇高的感情都不允许他们粗暴地行动或者对这个世界上的事务表现出哪怕是表面的果断。他们的座右铭是“留心看看”。他们对一切都 very 注意；他们对一切都给予应有的重视；他们对一切都 very 细心，并指望所有的人注意到这一点以后也会对他们本身给予应有的注意。他们喜欢一切都圆满和平稳。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毅力和实力的征象——不随和那样使他们更厌恶的了。

这些软心肠的、老实而虔诚的绅士们厚颜无耻地否认来自军队的关于领导无能而使军队遭到毁灭的消息；既然他们 a priori（早先）就确信他们的管理是无可指摘的，那末除了他们以外又有谁会发表这类反驳的言论呢。当指责愈来愈坚决，而来自战场的官方消息甚至使他们不得不部分地承认对他们的指责是正确的时候，在他们的反驳中仍然还继续发出愤懑和讥讽的声调。他们对罗巴克关于进行调查的提案表示反对是一个顽固地公开否认真相的前所未见的可耻例子。伦敦“泰晤士报”、累亚德、斯泰福以至他们原来的同僚罗素都指责这些绅士们在撒谎，然而他们却进行顽抗。整个下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都指责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们仍然进行顽抗。现在他们受到罗巴克委员会的审查并且被揭露了，但是，据我们所知，他们还是在继续顽抗。然而现在他们顽抗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而这将不可避免地促使不列颠军队在组织和管理上的改变。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3 月 2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1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6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争的进程

正当外交家们聚集在维也纳讨论塞瓦斯托波尔的命运、而同盟国企图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缔结和约的时候，俄军在克里木却利用敌人的严重错误以及自己在半岛上所处的中央位置，再次全面转入进攻。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联军在入侵之初的大话，那末目前的状况是可笑的，而且看来正是对人的自恃和愚蠢的绝妙讽刺。但是，这出戏尽管有滑稽可笑的一面，整个说来却是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再次建议读者把“亚美利加号”轮船在星期日早晨送来的最近报道中所叙述的事实仔细地加以研究。¹¹⁹

在叶夫帕托利亚，奥美尔—帕沙的军队实际上从陆地方面已被封锁住。俄军在骑兵数量上占优势，所以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前哨和骑兵哨几乎派到城边，在城郊巡逻，从而切断敌人的供给线，而当敌人进行猛烈的出击时，就退到自己步兵的所在地。可见，俄军正做着我们以前所预料的事，即以相当于土军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兵力，箝制着数量上占优势的土军。¹²⁰因此，奥美尔—帕沙等待骑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同时又到英法兵营去通知联军，说明他此刻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迫切希望法军派出约 1 万人的增援部队。毫无疑问，能派出增援部队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康罗贝尔本人同样也需要增援部队。康罗贝尔已经发觉，他所掌握的军队太

多，同时又太少，——如果继续采用老办法围攻并防守黑河，兵力就太多；如果强渡黑河，把俄军击退到半岛的腹地并围攻北堡，兵力就太少。派1万人到叶夫帕托利亚，不一定能使土军开始顺利的军事行动，但法军少了他们，却会恰好在春季增援部队到达后开始行动后，陷于困难的境地。

现在围攻的情况实际上很糟。朱阿夫兵2月24日夜间的攻击的结果，比我们一星期前所报道的还更加令人失望^①。从康罗贝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他下达攻击命令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他写道：

“鉴于攻击目的已经达到，我军即行撤退，因为谁也不想完全被敌人火力控制的地点巩固下来。”

但究竟达到了什么目的呢？既然这一地点不能扼守，又为什么要发起攻击呢？完全没有必要。多面堡未被摧毁，在敌人火力下也不可能被摧毁，即使像第一次报告中所肯定的那样，朱阿夫兵一度完全攻占了多面堡，情况也是如此，何况朱阿夫兵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俄国人在自己的报告中坚决驳斥这一事实，而康罗贝尔甚至不敢提出类似的反驳。究竟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况下发起攻击呢？原来原因在于：康罗贝尔看到俄军巩固了阵地，使得围攻者陷于非常困难而又非常不体面的境地，于是不加思索，不衡量一下这一行动的可能结局，便把军队投入了攻击。这是真正毫无意义地驱使兵士去送死的行为，它将成为康罗贝尔军事声誉的污点。能够作为辩解的唯一理由，是法军渴望开始强攻，而这位将军决定给他们机会，以便让他们多少认识到这种强攻将会得到

^① 见本卷第171—173页。——编者注

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样的辩解，正如攻击本身一样，也会使康罗贝尔威信扫地。

马拉霍夫冈附近的战斗的结果，俄军在紧靠自己防御工事前面的地段上占了优势。位于高地棱线上的、朱阿夫兵未能攻下的那个堡垒，被俄军称为色楞格多面堡，以纪念防守该堡垒的色楞格团。受战斗胜利鼓舞的俄军立即采取了巩固胜利的措施。色楞格多面堡现在已扩大和加固，并设置了火炮（尽管在搬运它们时遭到围攻者极猛烈的射击），还在多面堡前挖掘了反接近壕，可能是为了在多面堡前再构筑一个或两个不大的堡垒。在另一处，即在科尔尼洛夫堡前，俄军在原有的工事前面 300 码处还构筑了一系列新的多面堡。如果相信英国人以前的报告，那末上述行动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一直听说，联军早就把自己的堑壕推进到更加靠近俄军防线的距离上了。但我们根据权威性的军事资料已经查明，约在一个月前，法军战线仍然距俄军外围工事 400 码，而英军战线甚至还要远一倍。现在，“泰晤士报”的记者终于在 3 月 16 日的报道中承认，直到目前为止，英军的堑壕距俄军的堑壕仍有 600—800 码，而且准备向敌人射击的炮台，实际上还是去年 10 月 17 日进行射击的那些炮台！请看，围攻的胜利多么大，堑壕推进得多么远，这就是三分之二的英军牺牲生命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两军炮台线之间的间隙地看来足够俄军用来构筑新的工事，但构筑这种工事是被围守军以往从未采取过的一种最大胆最巧妙的措施。这实质上就是在距联军工事 300—400 码的地方构筑一条新的平行壕，即一条对付围攻者的最大的反接近壕，因而迫使围攻者立即转入防御，而任何围攻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却是围攻者要迫使被围者处于防御地位。这样一来，攻

者和防者的角色已完全调换过来了，而且俄军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不论俄国工程师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在施尔德尔的指挥下在锡利斯特里亚做过什么不合实际的试验，但在这里，在塞瓦斯托波尔，看来联军所遇到的却是另一种人。俄军工程师在构筑塞瓦斯托波尔周围的防线时，善于迅速而正确地判明情况，能够随机应变、大胆而准确地实现既定意图；防御的薄弱地点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不断注意加强这些地点的防护；火力配系组织得极为出色，能向正面任何地段集中比敌人更猛烈的火力；在第一线工事之后构筑第二、第三、第四线工事，——简单地说，整个这一防御的组织堪称典范。最近在马拉霍夫冈和在科尔尼洛夫棱堡前面构筑的前进工事，是围攻史上前所未有的，这说明其组织者是第一流工程专家。还必须公正地补充一点，塞瓦斯托波尔的工程长官是托特列本上校，他是俄军中一位不太出名的人物。然而，不应当把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体系看做是俄国筑城术的典型。比较切合实际情况的是介于锡利斯特里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

不论在克里木，或者在英国和法国，人们现在已开始懂得（虽然很慢），以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是毫无希望的。陷于窘境的“泰晤士报”请教于“大军事权威”后认识到，必须转入进攻，为此应当：或者强渡黑河，同奥美尔—帕沙的土军会合（不论在同俄国的监视军会战以前或者以后）；或者对卡法实行佯攻，以迫使俄军分散兵力。既然联军的兵力据推测现有 11—12 万人，那末采取这样的行动就应当是联军力所能及的。其实康罗贝尔和腊格伦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强渡黑河并同奥美尔—帕沙的

军队会合是多么需要；但正如我们多次证实的那样^①，遗憾的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高地上的联军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达到过 11—12 万人。到 3 月 1 日，联军在那里能担任勤务的兵士不超过 9 万人。至于谈到远征卡法，当现在联军在其所控制的两个点上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完成规定的任务的时候，如再将兵力分散在距中心点 60—150 英里的三个不同的点上，那当然是俄军求之不得的事！“大军事权威”郑重其事地奉劝“泰晤士报”出面主张再走远征叶夫帕托利亚的老路，显然是对该报的嘲弄！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30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6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参看本卷第 87—88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论克里木局势

伦敦 3 月 30 日。关于和谈进程的报道的性质每天都在改变着。今天说和平是不容置疑的，明天又说战争是不容置疑的。帕麦斯顿在“邮报”^①上用大炮和剑进行威吓——这证明他随时准备缔结和约。拿破仑命令自己的报刊歌颂和平之树——这最确凿地证明他打算继续战争。克里木事件的进程绝难说明塞瓦斯托波尔即将陷落。在叶夫帕托利亚，奥美尔—帕沙的军队实际上从陆地方面已被封锁住。俄军在骑兵数量上占优势，所以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前哨和骑兵哨几乎派到城边，在城郊巡逻，从而切断敌人的供给线，而当敌人进行猛烈的出击时，就退到在他们后面的步兵所在地。可见，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②，俄军以相当于土军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兵力，箝制着土军的优势兵力。在伊斯甘德—贝伊（即波兰人伊林斯基，他是在卡拉法特城郊出的名）的指挥下土耳其骑兵进行了出击，但是被三支从三个不同地点同时向土军攻击的俄国部队所击退。像所有训练得不好而又不果断的骑兵一样，土军没有拔出马刀向俄军冲击，却停留在相当远的距离上，用马枪向俄军射击。这种显然证明土军不果断的行动，促使俄军

① “晨邮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38—141 页。——编者注

转入进攻。伊斯甘德—贝伊带领一个骑兵连企图向敌人攻击，但是除了巴希布祖克外，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因而不得不退却，冲出俄军重围。奥美尔—帕沙等待骑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同时又到英法兵营去通知联军，说明他此刻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迫切希望法军派出约1万人的增援部队。毫无疑问，能派出增援部队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康罗贝尔本人同样也需要增援部队。康罗贝尔已经发觉，他所掌握的军队太多，同时又太少。如果采用老办法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和防守黑河，兵力就太多；如果强渡黑河，把俄军击退到半岛的腹地并封锁北区，兵力就太少。派1万人到叶夫帕托利亚，不一定能使土军开始顺利的军事行动，同时法军要在开阔地上行动也会感到力量不足。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天天地使围攻者陷入愈来愈困难的境地。

我们看到，俄军在2月24日坚守住了萨蓬山上的多面堡（在马拉霍夫冈附近）。¹²¹这个多面堡现在已扩大和加固，并设置了火炮，还在多面堡前挖掘了反接近壕。在另一处，即在科尔尼洛夫棱堡前，俄军在原有的工事前面300码处还构筑了一系列新的多面堡。这对“泰晤士报”的读者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根据这家报纸的报道，联军早就把自己的堑壕推进到更加靠近俄军防线的距离上了。现在，“泰晤士报”的记者终于承认（例如3月16日的报道），直到目前为止，英军的堑壕仍然位在600—800码的距离上，而且**准备向敌人射击的炮台，实际上还是去年10月17日进行射击的那些炮台**。请看，围攻的胜利多么大，堑壕推进得多么远，这就是三分之二的英军牺牲生命和健康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两军炮台之间的间隙地看来足够俄国用来构筑新的工事。这些工事可以被看做是在距联军工事300—400码的地方构筑的一

条对付围攻者的新的平行壕，即一条对付围攻部队的最大的反接近壕。因此，围攻部队不得不转为防御，而任何围攻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却是围攻者要使被围者处于防御地位。

不论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兵营，或者在英国本土，人们现在已开始懂得，以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是毫无希望的。陷于窘境的“泰晤士报”请教于“大军事权威”后认识到，必须转入进攻，为此应当：或者强渡黑河，同奥美尔—帕沙的土军会合（不论在同俄国的监视军会战以前或者以后）；或者对卡法实行佯攻，以迫使俄军分散兵力。既然盟军现有 11—12 万人，那末采取这样的行动就应当是力所能及的。“泰晤士报”是这样认为的。

腊格伦和康罗贝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现在同奥美尔—帕沙的军队会合是多么需要。但遗憾的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高地上的联军直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达到过 11—12 万人；联军在那里能担任勤务的兵士最多是 8—9 万人。至于谈到远征卡法，那是俄军求之不得的事。联军在其所控制的两个点上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完成规定的任务的时候，就将其兵力分散在距中心点 60—150 英里的三个不同的点上！莫非“泰晤士报”采用了“俄国”军事专家的建议？

由于法军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已在途中，而其余部分同第十三师、第十四师和两个皮蒙特师一起准备随后开来，所以到 5 月底联军的兵力将达到使它能够而且不得不从自己在黑河的防御阵地向前推进的程度。军队都将在君士坦丁堡集中，他们多半是同时乘舰出发，以便在不幸的赫尔松涅斯停留尽可能短的时间。这个办法可能会使行动迟缓一些，然而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到目前为止，一小队一小队地逐渐派到克里木的增援

部队虽然汇合成了一支完整的军队，但是始终没有使远征军加强到能够转入进攻的程度。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3 月 30 日
左右

载于 1855 年 4 月 2 日
“新奥得报”第 15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法国立法团的丑事。
—— 德鲁安·德·路易斯的
影响。—— 民军的现状

伦敦 4 月 3 日。来自巴黎的报道：

“波拿巴的立法团中发生了一场丑剧，有关这场丑剧的消息没有传到英国的报界。在辩论代役法¹²²时，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在蒙塔朗贝尔发言之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在最激愤的时候漏出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只要这个法律一生效，军队就会理所当然地效忠于秩序和皇帝，我们就不会再看到丢人的景象——兵士倒戈（soldats à baionnettes renversées）的现象。这个公然颂扬土耳其近卫军制度是法国军队的理想的发言在结束时甚至在这个会议上也引起了一片哄然的怨声，因而格朗尼埃只得坐下了。这时立法团的另一个议员接着发言，他猛烈地攻击了格朗尼埃。于是演出了这样一出丑剧：甚至莫尔尼也不得不要求卡桑尼亚克进行解释。（众所周知，当基佐还在他编辑无聊的小报“地球报”时，他就把卡桑尼亚克叫做 le roi des drôles（丑角之王）。）格朗尼埃十分沮丧地表示了正式的歉意，并提议在‘通报’上对这场风波保持缄默。会议开得是这样地热烈，简直就同路易—菲利浦时代众议院极盛时期一模一样。”

今天的“纪事晨报”写道：

“英国公众得出了一个结论：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到维也纳去，是想以谗言和怂恿的方法影响约翰·罗素勋爵，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位勋爵的行

为既不能使自己的同胞感到满意，又得不到我们盟友们的欢心。这位高贵的勋爵是以其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忽高忽低而著称的。当他处于反对派地位或者必须为自己争取政治资本的时候，他对社会活动特别积极；一当直接的利害关系消失的时候，他就完全无所作为。这一次好像也在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因而人民已经开始抱怨了……在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到伦敦来过以后，上层集团中开始出现一种比较坚定的语调。有人甚至说他的使命完成得十分成功，以致使约翰·罗素勋爵的和平意图遭到了政府的反对，我们的活动人物（帕麦斯顿）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同意提出看来会遭到俄国轻蔑地拒绝的最后通牒。”

英国的军队已经消失了，英国的民军也正在逐渐消失。根据1852年（得比勋爵执政时期）议会法令所建立起来的民军，按照法律规定，平时服役期一年应不超过28天。但是，在外敌侵入或出现任何其他紧急情况时，民军也可以应征长期服役。相反地，由于1854年的议会法令，所有在1854年5月12日以后被征的人都必须服役到战争结束。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规定那些根据1852年法令征召入伍的人的义务。王室法律顾问们声称，他们认为这一类人也应当在整个战争期内服长期兵役。与法学家们的这种结论相反，潘缪尔勋爵在数星期前颁布了一项命令，根据这项命令，所有在1854年法令颁布前被征入伍的人都可以退役，但是，如新兵的报酬，现时步兵是7英镑，骑兵是10英镑，所以在民军中服役5年报酬不过是1英镑这一点，就成了解散民军的最可靠的方法。将征募民军一事几乎拖延了一年之久的帕麦斯顿勋爵，看来一有机会便想重新摆脱民军。因此，我们得知最近两个星期来民军团一个接一个地减少了三分之二到八分之五的人员。例如，索美塞特郡的第一民军团500人中有

414 人退役，北德勒穆的民军 800 人中有 770 人退役，莱斯特的民军 460 人中有 340 人退役，萨福克郡的炮兵团 130 人中有 90 人退役等等。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4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4 月 7 日
“新奥得报”第 163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

1855年4月10日星期二于伦敦

请允许我在长时间的中断之后恢复我在“论坛报”上的通讯。

昨天和今天大概是维也纳会议的头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因为4月9日的会议应当是在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出席的情况下开幕，此外，还可以预料到，在这以前，俄国大使定能接到关于第三和第四项条款的指示。在所有的交易所里一开始就有人大吹大擂，把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出行说成是真正的和平征兆。他们断言，这样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如果不确信谈判会获得成功，当然不会亲自参加这种谈判。至于谈到这位外交家的“杰出品质”，那末它们完全带有神话般的特性，而且主要是存在于由他支付报酬的那些报纸论文中。在这些论文里他被捧为第二个达来朗，似乎他在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多年经历中，从来就没有树立过“杰出的”庸碌无能的名声。他这次出行的真实原因是：约翰·罗素勋爵由于人所共知的不懂法语，竟在数星期之内用他从来不打算作的让步束缚住了盟国，因此现在需要花费不少力气来收回这些让步。约翰勋爵的法语是典型的约翰牛的语言，是“弗拉·迪亚沃洛”¹²³以及过去在法国流行的其他剧本里的“大人”所使用的语言；他从《monsieur l' aubergiste》（“老板先生”）这

句话开始，而以《très bien》（“很好”）这句话结束。如果他只听懂别人对他说的话的一半，那末他可以告慰的是，他感到别人能听懂他的话还更少些。正是由于这种考虑，他的朋友和竞争者帕麦斯顿勋爵才把他派到维也纳去，以为在这种活动场所只要有两三次重要的失算，就足以把可怜的小约翰彻底毁掉。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罗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了解谈话的内容，对于哥尔查科夫或布奥尔的每一个尖锐的突如其来的插话，这位不走运的初次登台的外交家总是不好意思地回答说《très bien》。这就使俄国、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奥地利有可能断定，某些条款，在涉及到英国的情况下，已经达成协议，尽管可怜的约翰勋爵从来也没有想到要作出这种让步。既然全部过错都算在他的不幸的同僚头上，帕麦斯顿自然不会反对这样做。但是，路易·波拿巴不能容许别人用这种欺骗办法来迫使他缔结和约。法国政府希望结束这种外交，因此决定立刻把事情弄出一个结局。它拟定了一份最后通牒，德鲁安·德·路易斯带着这份通牒到伦敦去了，在伦敦他取得了英国政府的同意，然后又带着这份文件前往维也纳。这样一来，德鲁安·德·路易斯现在可以看做是英国和法国的共同的代表，而且毫无疑问，为了自己主子的利益，他会用最好的方式来利用这种地位。既然路易·波拿巴唯一的兴趣是：在他还没有为法国取得新的荣誉和新的优势之前，在战争还没有被充分证实是《moyen de gouvernement》（“管理手段”）之前，他就不缔结和约，那末很明显，德鲁安·德·路易斯的使命绝对不是和平的；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无疑是在尽可能漂亮的借口下保证战争继续进行。

在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集团内，这场战争根本不受欢迎。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这场战争一开始就不受欢迎，因为从 12 月 2

日起，这个阶级对“社会救主”的政府采取了完全反对的立场。在英国，资产阶级内部意见有分歧。它的大部分将自己对法国人的民族仇恨转移到了俄国人身上。虽然约翰牛自己有时可以在印度实行某种兼并，但是他并不想让别的国家在离英国本土或它的领地非常近的一些地方去干同样的事情。俄国是在这方面早已引起约翰牛不安的国家。由于不列颠同东方地区的贸易以及通过特拉比曾德同亚洲内地的贸易日益大规模地扩大，船只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对英国来说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英国不能容许俄国逐渐并吞多瑙河沿岸各国，因为这些国家作为谷仓的意义在日益增长；英国不能容许俄国封锁多瑙河上的航行。俄国的粮食现在已经是英国消费项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要是这些与俄国毗邻的产粮国家归并于俄国，那就会使大不列颠处于完全依赖俄国和合众国的地位，而这两个国家就会变成世界粮食市场的调节者。此外，在英国常常流传着关于俄军向中亚细亚挺进这样一些捉摸不定的、使人惶惶不安的谣言；不熟悉地理的英国公众，很容易相信那些在印度事务上有利害关系的政客和吓破了胆的幻想家所大力散布的这种谣言。因此，当俄国开始侵略土耳其时，民族仇恨马上就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也许，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像这场战争那样受人欢迎。主和派只好暂时保持缄默；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已被大流所卷走。但是了解英国人性格的人都相信这种好战的热情不会持续很久，至少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如此。只要战争使资产阶级破费，它的唯利是图的天性就比它的民族自豪感占上风，对私人利益立即会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比对全民族的巨大优势必然要逐渐遭到损失的恐惧心理更厉害。皮尔分子——战争的反对者，与其说由于真正爱好和平，不如说由于自己的局

限性和胆怯（这种局限性和胆怯总是使他们在碰到任何一次大危机和果断行动的时候就害怕起来），采取了种种措施想使每个英国商人和工厂主都能精确地计算每一个法寻、他个人 per annum（每年）要为战争付出什么代价的伟大的时刻加快到来。格莱斯顿先生轻视发行公债这一通常的主意，一下子就把所得税提高了一倍，并且暂时中止了财政改革。后果很快就表现了出来。主和派又重新抬头了。约翰·布莱特以他固有的毅力和顽强精神大胆地起来反对国内盛行的情绪，结果他终于使得工业区倒向他这一边。在伦敦，情绪仍然有利于战争，但是主和派影响的增长甚至在这里也渐渐明显起来。顺便应当提到，和平协会以往在首都从未享有过任何重大的威信。然而它正在全国加紧鼓动工作，只要再经过一年的时间征收加倍的所得税并且发行公债（而发行公债现在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就足以消灭工商业阶级中的好战精神的最后痕迹。

这两个国家里的人民群众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法国的农民从1789年起，就是战争和军事荣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次农民们都确信，他们不会强烈地感觉到战争的重担，因为在土地无止境地在小私有者之间分散的国家里，征兵不仅使农业区不再有剩余的劳动力，而且每年使将近两万个年轻人有适当的机会去挣相当多的钱，使他们有可能作为代替者去服兵役。只有持久的战争才会严重地影响到农民。至于军事税，皇帝不敢把它加在农民身上，他不会拿自己的王冠和生命去冒险。在农民中间维护波拿巴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免除农民的军事税以收买农民的好感；因而在最近几年内农民大概能免于这种压迫。

在英国，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农业区通常存在着劳动力过剩

的现象，兵士的基本群众是由农业区提供的，只是在战争后期才从城市的不安分的人中间得到了大量的补充兵员。因为在战争开始时商业或多或少还处于令人满意的状态，不久前在农业方面又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所以这次农村新兵的数量比过去少些，而目前民军中市民显然占多数。但是即使应征入伍的人数不多，也足以对工资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农村居民的同情心又总是在来自他们中间的并且后来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兵士这一边。直接税并不触犯小佃农和农业工人，必须经过几年战争他们才会感觉到自己身上间接税的增加。在这些人中间，好战热情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没有一个乡村不开设以“阿尔马的英雄”为招牌的新啤酒铺或诸如此类的什么铺子，乡村里几乎每一家的墙上都装饰着奇奇怪怪的描绘着阿尔马会战、因克尔芒会战、巴拉克拉瓦城郊的攻击的彩色画以及腊格伦勋爵等人的肖像。但是，如果说法国的小农由于占巨大优势（占人口的五分之四）而且对路易·拿破仑抱有特殊态度因而他们的意见能举足轻重，那末在英国，仅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就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只不过扮演了土地贵族的附属品和应声虫的角色。

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业无产阶级对于战争采取了几乎是同样的特殊态度。无论英国无产者或是法国无产者都充满着崇高的民族感情，不过他们或多或少摆脱了两国农民所固有的陈旧的民族偏见。除了同胞们的胜利能使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而法国人轻率地过于自信地指挥战争和英国人胆怯地愚钝地指挥战争，给予他们一个很好的鼓动机会来反对现政府和执政阶级以外，战争对他们很少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下面这一点：与商业危机（目前还只有一些初步表现）结合在一起

的、由那些没有能力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的任务的人们所指挥的、同时又具有欧洲规模的这场战争，必然会引起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将使无产阶级能够重新取得它在法国 1848 年六月战斗¹²⁴中所失去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法国，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中欧，包括英国在内。

在法国，任何新的革命风暴早晚会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对这点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在英国事态很快会发生同样的变化。贵族阶级希望继续战争，但是它没有能力进行战争，而去年冬季战争进行得很不利，这使它的声誉已经完全扫地。资产阶级不希望继续战争，但是战争现在又不可能结束；资产阶级为了和平而奔忙，从而证明它没有能力治理英国。如果事件迫使贵族阶级连同它的各种派别离开政权，同时也不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那末只剩下两个阶级能执掌政权：小资产阶级即小有产者阶级和工人阶级。前者在每一次号召它把言论变成行动时，都暴露出缺乏毅力和果断精神；后者则在作为一个阶级开始行动时，常常因表现出了过多的毅力和果断精神而受到指责。

究竟哪一个阶级能使英国摆脱目前的搏斗和由此而眼看就要产生的那些困难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4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5 年 4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75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 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¹²⁵

伦敦 4 月 14 日。公众，甚至法国的公众，看来都已识破塞瓦斯托波尔围攻的秘密。因此，作为“通报”en chef（总）编辑的路易·波拿巴就这个问题又大写起冗长的社论来。他指望用这篇社论达到几个目的：总的是就已开始的行动遭到失败一事安慰公众；特别是解脱拿破仑第一的继承者对失败所负的责任，而其中还对布鲁塞尔回忆录进行了答辩。这篇以半亲昵、半官腔的笔调（这是同时为法国农民和欧洲各国政府撰写文章的这位作者特有的风格）写成的文章很像是战史，还夹杂了为每一个步骤所臆造的根据。这个文件极为拙劣，因为它非常无力而不能令人信服。但是，既然波拿巴被迫用这种办法讲话并替自己辩护，那末可见 pressure from without（外界的压力）是很大的。

在冗长的前言之后，公布了圣阿尔诺在作战初期所接到的部分指令，并说明为什么联军起初在加利波利登陆。这里写道，俄军可能在鲁舒克附近强渡多瑙河，迂回苏姆拉到凡尔那一线，越过巴尔干山脉向君士坦丁堡挺进。在凡是可以引来为加利波利登陆辩护的所有理由中，这是最坏的一个。首先，鲁舒克是**要塞**，而不是像这位至高无上的“通报”发行人看来所想像的那样，是不设防的城市。这使我们联想到不久以前“通报”刊载的关于尼古

拉皇帝的讣闻中把阿德里安堡条约同摩楚克—凯纳吉条约混同起来而犯的历史错误¹²⁶。至于谈到俄军这一侧敌行军的危险性，那就应当想到：俄军如果不派强大的兵力去箝制固守在四大要塞^①之间的6万土军，那末他们的后方便不能不受到威胁：这一侧敌行军会使巴尔干山脉狭谷中的俄军陷于杜邦在拜兰和万当在库尔姆¹²⁷那样的境地；在最好的情况下俄军也只能有25000人到达阿德里安堡。至于认为这样的一支军队对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威胁的那些人们，他们可以从莫尔特克少校关于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一书¹²⁸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现在再看下面写的。如果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危险，那末联军就应派几个师向瓦尔那推进，以便粉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任何企图。在这以后可能的行动有两个：或者在敖德萨登陆，或者攻占克里木。联军的将军们应当就地讨论这两个行动的问题。指令末尾是用训示和格言形式写的几点英明的军事忠告：

“要经常了解敌人在做什么。要集中兵力，不要分散；当你被迫分散兵力时，要使他们能在一昼夜内重新集结于指定地点”云云。

所有这些的确都是最宝贵的行动准则，但却是老生常谈和人所共知的东西，以致使人立刻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既然圣阿尔诺需要这样的训示，看来他在主子眼中是个十足的不学无术之徒。然而，指令却忽然用下面几句话出人意料地结束了：

“元帅，您享有我的充分信任！出发吧，我相信在您富有经验的指挥下，法兰西之鹰将获得新的光荣。”

至于谈到主要的一点，即克里木远征，波拿巴承认，这是他

① 即鲁舒克、锡利斯特里亚、苏姆拉和瓦尔那。——译者注

得意的计划，后来他为此给圣阿尔诺发去一批新的指令。但是他否认他曾亲自拟定远征计划的一切细节并把计划送到大本营。按他的话说，将军们是可以选择在敖德萨登陆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波拿巴引用了这些新指令中的一点，即他曾提出在费奥多西亚（卡法）登陆，因为考虑到那里有安全而宽阔的停泊场，可供应当成为军队固定作战基地的舰队使用。关于作战基地的概念，他还在最初的指令中就试图最详尽最通俗地对这位著名的元帅作解释。军队应该从卡法这个地点开往辛费罗波尔，把俄军赶到塞瓦斯托波尔，在塞瓦斯托波尔工事前面也许要进行会战，最后再围攻该城。“不幸得很”，联军的将军们没有执行他所提出的计划。但这个“不幸的”事情却成了一并幸运的事情，因为它使波拿巴摆脱了对这个不愉快事件的全部责任，而把一切推到将军们的身上。以6万兵士在卡法登陆以便由该地进击塞瓦斯托波尔这一计划的确是很奇特的。按照一般的规则，在敌人领土上的军队的进攻力量至少是离作战基地愈远就愈弱，试问：通过120多英里长的距离以后，联军还会有多少人开到塞瓦斯托波尔？必须留在卡法的有多少人？扼守和巩固中间地点需要多少人？保护运输和肃清残敌又需要多少人？也许，在要塞的城墙下连集中2万人都办不到，然而仅是封锁这座要塞就需要比这多两倍的兵力。如果路易·波拿巴在某一天忽然想起要亲自出征，并按照这些原则作战，那末两个都姓波拿巴的人在战史上无疑将成为最鲜明的对照。^①至于谈到卡法安全的停泊场，那末黑海的每个水兵都知道而且任何地图都

①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这篇文章中，这一句话是：“如果路易·拿破仑在某一天忽然想起要亲自出征，并按照这些原则作战，那末他便会立刻关心到他在伦敦的住处米瓦特私邸，因为他再也不会看到巴黎了。”——编者注

标出：卡法是一个暴露的停泊场，只能挡住北风和西风，而黑海上最可怕的风暴却是西南风和东南风。例如 11 月 14 日的风暴便是这样。如果舰队那时停泊在卡法附近，那它一定会被刮上海岸。

接着，是社论最微妙的部分。路易·波拿巴自以为他本身已侥幸地卸脱布鲁塞尔回忆录加在他身上的责任。但是他又不便牺牲腊格伦和康罗贝尔。因此，为了证明这两位将军的才干，他又对围攻法作了概略的描述。但是这个描述实质上只是证明塞瓦斯托波尔尔是不可能攻下的，因为它明确地强调了所有的一般规则都不适用于塞瓦斯托波尔尔。

社论写道：“例如在一般的围攻中，如果从一个方向攻击，那末最后一道平行壕的长度可能约为 300 米，堑壕全长可能不超过 4000 米。而在这里，平行壕却长达 3000 米，堑壕的全长则达 41000 米。”

的确是这样，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为什么当全部情况要求把火力尽量集中到一两个地点的时候，却反而把攻击线拉得这样长呢？**答案是：

“塞瓦斯托波尔尔不同于其他要塞。那里只有一条不很深的护城壕；没有石质内岸，代替这些防御工事的是**鹿砦**和**防栅**。因此，我方火力只能对土质胸墙起很小的作用。”

这不可能是为圣阿尔诺元帅写的（他可能会相信这个说法），所以显然是特地为法国农民写的，因为法军的任何一个士官都可能对这派胡言哈哈大笑。防栅只要不是设在护坡壕底，至少不是在围攻者看不到的地方，那就很容易为霰弹所毁。**鹿砦**可以烧毁。鹿砦应当设在斜堤脚附近，距胸墙约 60—80 码，否则就会妨碍炮兵射击。但是从哪里能取得做这些鹿砦用的树木呢？——这要粗大的树木，并且要把它们牢固地连接起来，横放在地上，使砍尖

的枝干朝向敌方。在这个无林区哪里有树木呢？关于这一点“通报”却只字不提。说什么防栅比石质内岸进了一步，这真是新发现；要知道这种木质工事很容易被烧掉，因而当防守者的炮火被压制住以后，它们并不能阻碍强攻。

社论的结尾告诉我们，联军将军们已作了所能作的一切，而且超过了在这样条件下所能期望于他们的，甚至还获得了荣誉，——这正是这篇社论所要证明的一点。如果荣誉需要证明，而且用这种方式来证明，那末这是不光彩的荣誉！这些将军老爷们之所以不能包围塞瓦斯托波尔，他们之所以没有能赶走俄国的监视军，他们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塞瓦斯托波尔，那只是因为力量不够！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可是，如果说他们力量不够，那末究竟谁对这个在一切错误中最大的错误负责呢？不是别人，正是波拿巴。这就是“通报”社论所导致的必然的结论。至于这篇社论在巴黎造成的印象如何，那可以从平常是那样奴颜婢膝的“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的一篇通讯的摘录中看出：

“有些人认为这篇社论简直是军队完全撤离克里木的先声。在正统主义集团中可以听到：我们曾被许以拿破仑式的战争，但看来现在将得到路易-菲利浦式的和平。另一方面，在圣安东郊区的工人居民中也充满着这种情绪。他们认为发表这篇社论是公开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力量。”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4 月 14 日
左右
载于 1855 年 4 月 17 日“新奥得报”
第 177 号，并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7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弗·恩格斯 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¹²⁹

伦敦 4 月 15 日。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仍旧进展缓慢，毫无生气，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有个别无结果的冲突和零零星星的攻击才带来了一些生气，不过每次的攻击都是上次的翻版和下次的样本而已。如果撇开守方在工程方面的优点不谈，那末确实很少见到像这样能表明双方指挥人员庸碌无能的、如此长期对峙的战例。

我们手头有法国和英国官方关于 3 月 23 日出击的报道；俄国方面详尽的报道我们还没有见到。同往常一样，联军将军们的报道故意写得含糊不清，以致无法从中得知任何肯定的东西。但依靠英国人的私人信件和报纸的通讯，还是能够——虽然是概略地——描述这一事件的。联军**进攻部队的右翼**正对塞瓦斯托波尔防线的东南段，由于联军构筑了三条接近壕，即锯齿形堑壕，并把这些接近壕的末端以所谓第二道平行壕连接起来，因此右翼推进到距俄军第一道防线 600 码的地方。而这三条接近壕又从第二道平行壕起很缓慢地、毫无规则地也向前延伸，以便由第三道平行壕把它们连接起来，并在中央那条接近壕内建立筑垒阵地或足够配置预备队的隐蔽地。中央那条接近壕由英军占领，左右两侧的接近壕则由法军占领。两侧的接近壕比中央的接近壕推进得远些，因此法军堑壕比英军阵地距要塞大约近 50 码。

3月23日拂晓前，俄军以相当大的兵力（大约12个营），从城内冲向围攻工事。俄军非常了解联军构筑堑壕时完全忽视了操典所规定的预防措施，平行壕的两端没有适当地弯向后方，也没有多面堡防护，因此向平行壕的两端大胆地猛攻必然能突入堑壕；于是俄军以突然而迅速的机动开始了攻击，结果迂回了平行壕的东西两翼侧。当俄军的正面攻击牵制住堑壕的战斗警戒部队及其预备队时，他们的迂回纵队不顾法军的英勇抵抗，跳进围攻工事，开始沿堑壕迅速前进，一直冲到英军防守的中央阵地。正面受不到严重威胁的英军阵地，在来自左右两方的步枪射击迫使英军部分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前一直没有遭到攻击；甚至在这以后，俄军的正面攻击仍然不猛烈，因为他们的主攻力量都集中在迂回纵队内。但是这些迂回纵队沿攻占的堑壕边战边进地通过了很远的一段距离以后，便丧失了最初的锐气，自俄军同英军接触时起，他们的军官所考虑的便都是如何保障退却以结束出击。这样一来，战斗很快就转入双方相持不下的阶段，而在此时，出击部队正是应当考虑如何安全退却了。俄军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真正打算把英军逐出阵地，而是继续坚持战斗，直到大部分部队退到距塞瓦斯托波尔已足够近时为止；此后，后卫也撤退了，在同法军和英军的预备队的战斗中，后卫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看来，俄军原来以为在第二道平行壕内能发现许多火炮、大量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他们出击有目的只能有一个，即消灭所有这一切。但是俄军在那里几乎什么也没有找到，因而这次出击毫无所获，只是使俄军确信：就是在距自己工事这样远的地方，他们也能在出击的最初几小时内保持优势，直到敌人集中预备队时为止。这当然有某些意义，但是未必能补偿出击所受的损失。俄军给围攻工

事造成的物质损失在一两天内就得到了弥补，而这次出击的精神作用则可以说等于零。因为任何出击必然以退却结束，所以围攻者总是把自己看做胜利者。出击在精神上所起的作用通常对围攻者比对被围者更加有利，只有当后者的损失大大小于前者时才是例外。

正当康罗贝尔和腊格伦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表面的胜利时，俄军这种没有什么效果的、最后仓卒退却的出击正合他们的心意。法军特别夸耀自己曾把敌人一直追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跟前。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做到这点并不怎么困难，因为要塞炮为了怕误伤自己的部队而不能进行射击。至于英军方面，由于他们的阵地过于缩在后面，因此与其说是起了第一线部队的作用，倒不如说是起了预备队的作用，但他们避开这一情况不谈，却大肆吹嘘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说英国兵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因而不会后退一步，但是，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少根据了。就在这些不屈不挠的兵士防守的地区内被俘并老老实实地被押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凯利上校和其他英国军官们知道，这种 cant（自夸）究竟有多少价值。

与此同时，英国报界的大战略家们继续在慷慨激昂地重复强调说，在考虑强攻塞瓦斯托波尔之前，无论如何必须先攻克俄军新构筑的外围工事；他们还希望这能很快就实现。自然，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也是陈腐的。问题在于，联军既然在自己炮队火力的控制范围内都不能阻止俄军构筑这些工事，又怎样能攻克它们呢？对色楞格多面堡（在萨蓬山上）的攻击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以巨大损失作代价可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攻克这样的工事，但难以理解的是：既然这些工事攻克后守不了多久，甚至还守不到为破坏它所需的时间，那末为什么还要去攻克它。问题在于，这些新工事是俄军整个防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翼侧

和后方都处于主要防线的控制之下，所以不采取攻夺主要防线时所必需的那些手段，那是无法夺取它们的。对攻击和占领这些外围工事作认真考虑之前，必须使接近壕向前延伸到足够近的距离上，构筑带屯兵场的隐蔽平行壕，并设置射击俄军主要防线用的炮台。鼓吹得最厉害并坚决主张立即夺取外围工事的“泰晤士报”，只是忘记了说出用什么新方法能够在几小时内完成它这样有信心地宣布的艰巨任务。但该报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乐观的希望，就接到驻克里木记者的来信，这位记者不仅宣称俄军新的外围工事是攻不破的，而且还说那些工事仅仅是第一线，俄军还打算有步骤地从那里向前延伸自己的反接近壕。马美朗多面堡（俄军称之为堪察加多面堡）前的战壕，已经被一条整齐的堑壕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道新的防线。在马美朗多面堡与色楞格多面堡（在萨蓬山上）之间，挖掘了一条新的堑壕，它形成正方形的三个边，从这里可以对法军的部分接近壕进行纵射。总之很清楚，俄军企图建立完整的前进防御工事体系，以便由两翼和正面掩护马拉霍夫冈，而最后也可能要攻占联军的堑壕。一旦这一企图实现，联军在这个攻击地段的围攻线就将被突破。最近6个月以来，联军仅仅是扼守自己的阵地，多半是巩固自己的炮台，而很少向前推进，但俄军在一个月内向敌人阵地推进了很多，并且还在继续推进。当然，还有比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更出色的防御战例，但是像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这样没有系统、不可理解和不光彩的围攻战例，在特洛伊围攻以来的战史中却是一个也找不出来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4月15日左右
载于1855年4月18日“新奥得报”第179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7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¹³⁰

—

据可靠消息报道，俄国当今的皇帝给某些宫廷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道：

“一旦奥地利同西方最终结成联盟，或者对俄国采取某种公开敌对行动，亚历山大二世就要亲自领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并且将把他目前的全俄罗斯皇帝的称号改为全体斯拉夫人皇帝的称号（？）。”

如果亚历山大的这个声明确实可信，那末它就是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坦率的表白。这是使战争具有欧洲性质的第一个步骤，到现在为止这种性质只是从各种各样的托词和借口、议定书和条约、瓦特耳的几段话和普芬多夫的语录来猜测的。土耳其的独立问题、甚至土耳其的生存问题从而也退居次要地位。现在问题已经不是谁来管辖君士坦丁堡，而是谁来统治整个欧洲了。斯拉夫人由于内部纠纷早就弄得四分五裂，他们被德国人逼退到东方，部分地被德国人、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所征服，但是他们用逐渐传播泛斯拉夫主义的办法在 1815 年以后又悄悄地把自己的各个支系联合起来，现在他们第一次声明自己的统一，并且进而向至今还统治着欧洲的罗曼—赛尔特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宣布殊死战。泛斯拉

夫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这是一种力图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化为乌有的运动；这是一种只有把土耳其、匈牙利和半个德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又只有通过征服欧洲的办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的运动。现在泛斯拉夫主义已经从信条变成了政治纲领，它掌握有 80 万名步兵。它使欧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或者被斯拉夫人征服，或者永远消灭泛斯拉夫主义的进攻力量的中心——俄国。

我们必须回答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奥地利被俄国式的泛斯拉夫主义所触动的程度如何？在居住在波希米亚森林和克伦地亚的阿尔卑斯山以东的 7000 万斯拉夫人中，几乎有 1500 万人处在奥地利君主的统治之下，其中几乎包括斯拉夫语系的所有各种代表。波希米亚系或捷克系（600 万人）全部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波兰系有近 300 万加里西亚波兰人，俄罗斯系有住在加里西亚和匈牙利东北部的 300 万小俄罗斯人（卢西人和卢田人），这是在俄罗斯帝国境外的唯一的俄罗斯族；南斯拉夫系几乎有 300 万斯洛文尼亚人（克伦地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为数不多的散居各处的保加利亚人。因此，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由各民族的残余分子组成，他们过去有自己的历史，而现在的历史发展是同那些与他们有不同种族和语言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作为民族，处境是困难的，这是因为这些过去伟大而现在悲惨的残余分子在奥地利境内没有任何的民族的组织，相反地，他们散居在各个省内。斯洛文尼亚人虽然勉强强有 150 万人，但他们分散在克莱纳、克伦地亚、施梯里亚、克罗地亚以及匈牙利西南部等各省。捷克人是奥地利斯拉夫人中人

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一部分住在波希米亚，一部分住在莫拉维亚，一部分（斯洛伐克系）住在匈牙利西北部。因此上述这些民族虽然全都住在奥地利境内，但未被承认为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他们或者被看成是德意志民族的附加部分，或者被看成是匈牙利民族的附加部分，实际上他们也不是什么别的民族。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另一集团是由一些零星的不同的民族构成的，这些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同本民族的基本群众分离，因而他们的主要中心是处在奥地利境界以外。因此，奥地利的波兰人倾向于俄属波兰，把它看做自己的自然中心，卢西人倾向于另一些同俄国合并的小俄罗斯地区，而塞尔维亚人则倾向于土耳其的塞尔维亚。所有这些同本民族分离的零星部分，每个都倾向于他们的自然中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他们中间文明的传播，并因此对民族历史活动的需要的日益增长，这种现象也就愈来愈明显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仅仅是 *disjecta membra*（分散的人，零星的部分），他们力图彼此重新结合起来，或者是各自同本民族的基本群众合而为一。为什么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俄国的而是奥地利的发明创造，原因就在这里。为了保证各个斯拉夫民族的复兴，奥地利的各个斯拉夫民族就开始赞成欧洲所有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俄国本身是强大的，波兰则深深意识到自己民族存在的不可动摇的稳定性，而且公开地敌视斯拉夫俄国——显然这两个民族都不会要求创造泛斯拉夫主义。处在土耳其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还很不开化，不会提出这种思想；保加利亚人顺从地屈服于土耳其人，而塞尔维亚人则致力于争取本身独立的斗争。

二

泛斯拉夫主义的最初形式是纯粹艺术的形式。它的创始人是**多勃罗夫斯基**（捷克人，斯拉夫方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和**科勒**（匈牙利外喀尔巴阡出的斯洛伐克诗人）。多勃罗夫斯基富有学者和研究家的热情，而科勒的政治思想很快占了优势。泛斯拉夫主义起初只满足于一些哀诗，它的诗歌的主题是过去的伟大，现在的耻辱、不幸和异族的压迫。“呵，上帝！难道大地上就找不到一个人能把正义交还给斯拉夫人吗？”关于建立一个迫使欧洲遵守它的法律的泛斯拉夫帝国的想法，那时还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表露。但是，哀诗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单纯“为了斯拉夫人的正义”的呼吁也随之过去了。

有关斯拉夫人的政治、文学和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研究活动，在奥地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语言学家**沙法里克**、**科皮塔尔**和**米克洛希奇**以及历史学家**帕拉茨基**领导了这个运动，追随他们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天资较差或根本没有才能的学者，如**汉卡**和**盖伊**等人。捷克和塞尔维亚的光荣的历史时代都被作了色彩鲜明的描绘，以与这些民族目前受屈辱的悲惨处境相对照；正如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政治和神学在“哲学”的幌子下遭受批判一样，在奥地利，梅特涅认为，泛斯拉夫主义者利用语文学来鼓吹斯拉夫人统一的学说，并建立这样一个政党，它的目的显然是要根本改变奥地利各民族的现状，甚至要把奥地利变成一个大斯拉夫帝国。

从波希米亚和克伦地亚往东，一直到黑海，语言的混杂情况真是令人吃惊。居住在邻接德国地区的斯拉夫人中间非民族化的

过程，德国人的缓慢而不间断的推进，匈牙利人的入侵（这一入侵的结果使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被 700 万密集的芬兰民族分割开来），插入斯拉夫族地区的土耳其人、鞑靼人和瓦拉几亚人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真正的语言上的巴比伦。村与村之间，几乎是田庄与田庄之间，语言都有变化。甚至在波希米亚，500 万居民中有 200 万德意志人和 300 万斯拉夫人，而且这些斯拉夫人三面受到德意志人的包围。奥地利的斯拉夫族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斯拉夫人的原有土地归还给斯拉夫人，把奥地利（提罗耳和伦巴第除外）变成一个斯拉夫帝国，这就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宣布近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全部无效，砍掉德国的三分之一和整个匈牙利，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变成斯拉夫的城市——目前占有这些地区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是不能同情这种行动的。而且，各种斯拉夫方言的差别很大，除极少数外，讲斯拉夫方言的人彼此都听不懂。有一个可笑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1848 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¹³¹上，曾经想找出一种大家都听懂的共同语言，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最后与会者不得不讲他们所最痛恨的语言——德语。

因此，我们看到，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缺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群众和统一。所以缺乏**群众**，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只掌握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人民中没有什么威信，因此要同时反抗它所敌对的奥地利政府以及德意志民族和匈牙利民族，力量就不够了。所以没有**统一**，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的统一原则是纯粹理想的原则，在第一次企图实现这种统一原则时，就因语言上的差别而遭到了失败。只要泛斯拉夫主义一直是纯粹奥地利的运动，那末它不会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它会很快地找到它

所需要的那种统一和群众的中心。

本世纪初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运动¹³²很快就使**俄国政府**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土耳其的居民中大约有 700 万斯拉夫人，他们的语言是所有斯拉夫方言中同俄语最近似的一种语言，而宗教和**教会语言**（古斯拉夫语或教会斯拉夫语）则同俄国人的完全一样。俄国依靠自己的希腊正教教会领袖和庇护者的地位，正是在这些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当中第一次开始进行了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当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刚刚在奥地利生根的时候，俄国就立刻把它的谍报机关的分支伸展到自己盟国的地区。在它碰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斯拉夫人的地方，就根本不提宗教方面的问题，俄国仅仅表现为一个吸引一切斯拉夫人的中心，即团结各个复兴的斯拉夫民族的核心，它要使各个斯拉夫民族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利亚海到北冰洋的伟大的斯拉夫帝国。总之，这里已经找到了所缺乏的群众和统一！泛斯拉夫主义一下子就落入了圈套。于是，它宣布了自己的判决。为了重新建立想像中的民族，泛斯拉夫主义者表示愿意为维护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统治而牺牲八百年来实际参加过的文明生活。难道这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动地反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和力图使世界历史开倒车的运动的自然结果吗？

梅特涅在自己实力最雄厚的年代就已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并且觉察到了俄国的阴谋。他使用他所有的一切手段来镇压了这个运动。但是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那就是**迫害**。而唯一有效的手段——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精神的自由发展完全可以驱散斯拉夫怪影——是同他的一套卑鄙的政策相矛盾

的。结果，在梅特涅垮台以后，1848年斯拉夫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开展了，它席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居民阶层。然而这个运动的极其反动的性质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当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运动显然是一种进步的运动的时候，——斯拉夫人却正是挽救了旧制度，使旧制度免于毁灭，使拉德茨基得以向明乔河推进，使文迪施格雷茨得以夺取维也纳。为了使奥地利完全依赖于斯拉夫人，强大的**斯拉夫后备军**即俄国军队于1849年开进了匈牙利¹³³，在那里强迫它接受和约。

如果说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同俄国的结合是它的一种自我斥责的话，那末奥地利同样明显地承认了它自己的没有生命力，因为它决定接受、甚至呼请这种斯拉夫人的援助以反对它境内的三个刚刚具有历史生命力而且正在表现这种生命力的民族，即反对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从1848年起，对泛斯拉夫主义所欠的这笔债一直威胁着奥地利，意识到这笔债，是奥地利政策的主因。

奥地利已开始在本国领土上反对斯拉夫人，但是，如果不实行哪怕有部分的进步性质的政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各省的特权都废除了，实行了集中管理制度来代替联邦管理制，提出承认一种人为的民族——**奥地利民族**来代替各种不同的民族。虽然这些新办法有一部分是针对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但是它们的重点却落在不大密集的斯拉夫族身上，德意志人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果说国内对斯拉夫人的依赖因此而消除了，那末对俄国的依赖仍旧存在，所以必须哪怕是暂时地或在一定程度上结束这种直接的和屈辱的依赖状态。这就是奥地利在东方问题上奉行虽然是动摇的、但至少是公开宣布的反俄政策的真实原因。

另一方面，泛斯拉夫主义并没有绝迹；它深受凌辱，它正在愤怒、沉默，并从在匈牙利进行干涉的时候起把俄国皇帝当做它命中注定的救世主。一旦俄国作为泛斯拉夫主义首领而采取公开行动，奥地利为了使自己生存不至于遭到威胁，是否会采取向匈牙利和波兰让步的对策？考察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任务。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已经不仅是俄国，而是整个泛斯拉夫主义的阴谋有在欧洲废墟上建立自己统治的危险。所有斯拉夫人的联合具有显著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会日益增强，因此这种联合很快要迫使与它敌对的力量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这里我们没有谈到波兰人，他们可尊敬的大部分是敌视泛斯拉夫主义的；也没有谈到假民主和假社会主义形式的泛斯拉夫主义，这种泛斯拉夫主义本质上同普通的露骨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它的漂亮言词和假仁假义。我们同样很少谈到德国思辨哲学的代表¹³⁴，这些代表们因离奇的愚昧无知而堕落后为俄国阴谋的工具。以后我们还要来谈这个问题，并将详细说明这些以及另外一些与泛斯拉夫主义有关的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4 月 17 日

左右

载于 1855 年 4 月 21 和 24 日

“新奥得报”第 185 和 18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论鼓动运动的历史

伦敦 5 月 7 日。在英国举行各次大规模的鼓动运动的时候，伦敦西蒂区一次也没有能够在运动中打先锋。直到目前为止，伦敦西蒂区的参加任何一次鼓动，只是意味着这次鼓动的目的已经达到，它已是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由北明翰发起的**议会改革运动**就是这样。由曼彻斯特领导的**反谷物法运动**也是这样。1797 年的**银行限制法**¹³⁵却是一次例外。那时伦敦西蒂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们所组织的群众集会，支持了皮特**禁止**英格兰银行用现金进行支付，**在这以前**，银行的董事们曾于事先几星期内通知皮特说，银行濒于破产，只有通过 *coup d'état*（政变），也就是说通过银行券的强制性的行价才能挽救银行。英格兰银行服从支付现金的**禁令**，与西蒂区商人（他们的信贷依赖于银行信贷）支持皮特的禁令并使之推行于全国^① 比较起来，当时情况并不要求英

①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最新的政治经济学史中，把当时西蒂区的行为引为英国爱国主义的证据。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冯·哈克斯特豪森先生在他的“论俄国”（1852 年版第 3 卷）一书中，竟抱着那样轻信的态度，以致断言，皮特用银行暂时停止支付现金的办法控制住了英国的货币。¹³⁶在俄国，人们究竟造了什么样的谣言，使一个人竟能相信这种事情？对于完全信赖冯·哈克斯特豪森先生并为了证实这一点而仿效他的说法的柏林评论，我们又应怎样考虑呢？

格兰银行更多地放弃私利。挽救英格兰银行就是挽救西蒂区。由此才出现了当时西蒂区的“爱国主义的”群众集会以及它的“鼓动者的”倡议。西蒂区上星期六在伦敦饭店和金碧大厦举行了自己的群众集会，成立了“行政改革协会”¹³⁷，它在目前担任倡导的功绩在于：这是英国非常罕见的新鲜事物——无前例的事件。而且在这些群众集会上不吃不喝，这也是西蒂区史册上的新鲜事，因为它的“元鱼汤爱国主义”早就被科贝特永久保存下来了。最后，伦敦西蒂区的商人们在伦敦饭店和金碧大厦召开的群众集会是在大白天营业时间举行的，这也是新鲜事。目前的商业萧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所以，一般来说，萧条是西蒂区商界人士精神纷扰的一种酵素，而且是一种重要的酵素。不管伦敦西头的贵族怎样竭力嘲笑西蒂区的这个运动，但决不能否认这个运动的重要意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报纸“每日新闻”、“晨报”、“纪事晨报”（这家报纸从某个时期起就属于这一派）竭力想在自己的反对者面前表现出西蒂区协会的“远大前途”。但是它们没有觉察到直接的效果。它们不懂得召集群众集会的事实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些非常重大和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解决：（1）把议会外的统治阶级和议会内的执政阶级分裂开来；（2）把直到现在还对政策发生影响的资产阶级分子排挤掉；（3）使帕麦斯顿声誉扫地。

大家知道，累亚德答应今晚要在下院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大家知道，大约在一星期以前议院没有让他说话，对他发嘘声，嘲笑他并且给他喝倒彩。西蒂区的英国商界巨子们在自己的群众集会上，为了对累亚德表示尊敬高呼“万岁”。累亚德成了伦敦饭店和金碧大厦的一时众所瞩目的大人物。西蒂区的 cheers（欢呼声）是对下院 groans（喝倒彩）的一种挑衅性的回答。如果今晚下院表

现出了自己的胆怯，那末它的威信就要丧失，它的日子也就快完了；如果下院还再 groans，那末反对者的 cheers 会更加强烈。而从“阿布德拉人”¹³⁸一书中我们可以知道，cheers 和 groans 之间的竞争会导致什么结果。西蒂区的群众集会是对下院的一个直接的挑衅，这就像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选举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为韦斯明斯特的代表是一个挑衅一样。

大家知道，过去领导英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是曼彻斯特学派及其布莱特辈和科布顿辈。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现在被西蒂区的商人们排挤掉了。他们的正统的反战立场使英国的一刻也不得闲着的资产阶级确信，他们——至少是现在——已失去了领导资产阶级的能力。曼彻斯特的大亨要能在现时保持“领导权”，就必需胜过西蒂区的大亨。在布莱特辈及科布顿辈受到排斥、同时他们也自动放弃参加的西蒂区群众集会上，实际表明了资产阶级的两个最大的派别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预示着对人民运动将会有好处。可以举下面这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西蒂区委员会书记写信给伦敦的宪章派，建议他们派人来参加西蒂区的常务委员会。宪章派就派了厄内斯特·琼斯到那里去。在商业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自然没有像在工人与工厂主、millocracy（工业巨头）之间的那种直接的对抗，因此，他们可能采取——至少在开始时——宪章派和曼彻斯特派之间所不可能有的共同步骤。

帕麦斯顿在国内的一个最重要的选区第一次被人嘲笑，被人喝倒彩，——这也是西蒂区群众集会的最后一个巨大成果。他的名字的魅力永远消失了。使他在西蒂区丢脸的并不是他的比三十年战争¹³⁹更长久的俄国政策；使他丢脸的是：一方面他假装要帮助英国摆脱它所经历过的一切危机中最可怕的危机，另一方面他又进

行恶毒的嘲笑，厚颜无耻地妄自尊大，而首先是开“平淡无味的玩笑”。所有这一切激怒了资产阶级的良心，虽然在堕落的“下流”议院^①里也曾取得过成就。

要在目前这样的议会内进行行政改革——任何人都会马上明白这些善良的愿望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纪里也看到了教皇改革家们¹⁴⁰。我们经历过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改革宴会¹⁴¹。因此，如果冲击古老英国的雪崩一开始是以西蒂区商人改革家手中的雪团的形状出现的，那也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10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15 号

① 双关语：《Haus der Gemeinen》意思是“下院”，亦即“下流的议院”。——编者注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¹⁴²

星期六晚间这里收到的“亚美利加号”轮船带来的邮件，再次使我们有可能向读者们作比较全面的有关克里木战争进程的报道，尽管依然互相矛盾和含糊不清的官方报道和报纸通讯使我们的工作做起来颇不容易。十分明显，维也纳和谈的挫折¹⁴³使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联军兵营有了生气和较大的活跃气氛，虽然可以说炮击在4月24日就停止了，但是以后的两周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行动的。目前还很难断定联军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果，尽管有一个记者肯定说，俄军的前进防御工事——色楞格多面堡、沃伦多面堡和堪察加多面堡——以及这些工事前的整个一线上的战壕均已失守¹⁴⁴。因为这无疑是联军最大限度的成就，所以我们暂且假定这个消息是确实的。某些记者报道，法军曾强攻马奇塔棱堡并攻占了它，但这些消息不足置信。它们只不过是4月21日事件毫无根据的夸大而已，当时法军曾利用地道爆破的方法在这个棱堡前面炸开了一条最前面的堑壕。^①

① 本文在“新奥得报”发表时，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巴拉克拉瓦、伦敦、巴黎之间建立的电讯直到现在还什么也没有向公众报道过，但却给公众所获得的消息带来了更大的混乱。

英国政府要就是什么都不公布，要就是只发表一些有关胜利的含糊不清

我们假定俄军已确实被击退到自己最初的防线，虽然很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联军攻占萨蓬出和马美朗高地的报道。即使这些高地上的多面堡已不在俄军手中，但是仍然谁也不能否认，俄军已经很有效地利用了它们。俄军扼守萨蓬出，是从2月23日起到4月底止，扼守马美朗高地上的堪察加多面堡，是从3月12日起到4月底止；在这整段时间内，联军的堑壕不是处在俄军炮台的纵射火力之下，就是处在它们集中的正面火力之下，而俄军整个阵地的锁钥——马拉霍夫冈，在整整两周的炮击期间却充分地得到掩护。俄军在有效地利用了这些高地之后，是可能自动放弃它们的。

关于联军得以攻占俄军战壕和反接近壕的许多次夜围攻击，以及俄军为夺回这些工事而进行的出击，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叙述。这些行动从战术观点来看，只对那些亲自熟悉过地形的人才有兴趣，因为这类行动大多取决于下级军官和兵士的机智、勇猛和顽强。英法军队在这些素质方面优于俄军，所以他们能够在紧

的声明。法国政府公布了康罗贝尔签署的一些电文，但其内容已经过严重的删改，以致从中几乎什么也不可能得到。例如，法军主要攻击的棱堡过去一直叫做马奇塔棱堡——Bastion du Mât。现在，我们听到的却是法军先在攻击中央棱堡而后在攻击第四棱堡时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些报告同过去的、特别是同俄国方面的报告仔细核对，便可以看出所谈的仍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棱堡，即马奇塔棱堡，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这样故弄玄虚完全是有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注定如此’的。

但是，电讯虽没有给公众带来好处，却显然使联军兵营有了一些生气，无容置疑，在康罗贝尔收到的第一批电报内就有严格的指示：更坚决地行动，用一切手段获得某些胜利。有一则非官方报道肯定地说，俄军的全部前进防御工事——色楞格多面堡、沃伦多面堡和堪察加多面堡，——以及它们前面的整个一线上的战壕均已失守。”——编者注

靠俄军工事的某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据点。在个别地方，双方已接近到手榴弹可以投到的距离，也就是说联军距俄军的隐蔽路只有20—39码，距主墙只有40—60码。俄军宣称，围攻部队距主墙30俄丈，即60码。在马奇塔棱堡、中央棱堡和大凸角堡之前的态势就是如此，那里有些洼地形成了死角，而且它们的位置使俄军火炮不能构成相应的俯角对它们进行曲射。但是由于俄军炮兵的火力根本未被压制住，所以很难同这些洼地保持联络和把它们变成完整的堑壕体系，因而联军将会遭到俄军侧射火力的严重威胁。事实上，当联军的炮队还在前进堑壕之后400—500码处的时候，很难设想联军能守住这些没有掩护的阵地，去对抗俄军相当大的兵力突然进行的出击；而在目前已公认为不成功的炮击以后，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使向前推进得较远的新炮队开始射击。

联军几乎到达俄军的要塞围墙脚下这一突然的进展，虽然表面看来不像过去那样缓慢和迟疑不决，但实际上还是老一套。联军进行这次围攻时，既无系统，又未遵循严格的顺序；而任何围攻既然实质上都是严格的循序渐进的行动，在每一步骤完成之后，为了不致徒劳无益，都应当立即获得某种新的胜利。因此十分明显，联军是按照各种可能有的计划中最糟糕的一个计划进行围攻的。虽然联军的将军们在最初看到作战地区时曾产生过失望情绪，虽然去年秋季在所谓第一次围攻期间有过失策，联军本来还是能够获得更大的胜利的。这里，我们也像联军的将军们那样完全撇开塞瓦斯托波尔北区不管。这些将军们毅然决定单攻南区，要冒险进入为他们无法接近的堡垒所瞰制的市区。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或者是联军的将军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攻下南区，如果是这样，他们现在将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或

者是他们感到自己的兵力太弱，那末试问，他们为什么不调援军来呢？现在已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即在这个“值得纪念和史无前例的”围攻中，是一次接着一次地失策的。看来，在冬季不得不忍受的困苦，使部队和将军们都产生了无法克服的萎靡不振、淡漠和疲倦的情绪。在2月间，俄军大胆地冲出自己的工事，在前面建立了新的防线，这对联军来说似乎应当是个相当大的震动，应当迫使他们动员自己的兵力；然而，康罗贝尔却只会利用这一严重的警告来冷却朱阿夫兵的战斗热情，派他们去进行他明知必败的攻击。掘壕作业恢复了，但这与其说是为了使炮队更接近敌人，不如说是为了给强攻纵队开辟隐蔽路。甚至在俄军要塞附近呆了6个月以后，联军的每个行动都仍然证明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没有确定总攻击的地点；相反地，他们仍然抱着以 *coup de main*（大胆突击）的方法攻取塞瓦斯托波尔尔的老主意不放，这就妨碍他们采纳任何合理的建议，阻碍他们实现逐步前进的任何企图。联军所做的并不多，而且比正规围攻作业多花了两倍的时间；同时，由于行动没有按顺序，又没有总的计划，因此甚至没有能产生对这种行动所本应具有的胜利信心。

然而联军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不久前进行的炮击上面。这就是他们为历次行动迟缓和按兵不动作辩解的主要理由。虽然很难说以远离目标600—1000码的炮队进行炮击这件大事究竟能产生什么效果，但是炮击终于开始了。头两三天，每门炮发射了150发炮弹，后来发射了120发，再往后是80发、50发，最后是30发，这以后炮击就停止了。假如不算联军损坏的火炮和用空的弹药库，那末就几乎看不到什么结果。如果联军进行5天最猛烈的炮击，那也许比进行15天开始猛烈而后立即减弱的炮击会使俄军

受到更大的损失，并使联军有更多的获胜的机会。但是，联军在弹药缺乏、火炮损坏的情况下，难道能够利用这样的有利机会吗？他们是不能比现在所做的再多做些什么的；而这时，当联军的炮火减弱而且已不再像最初5天那样每天向俄军发射5万发炮弹以后，俄军目前的处境比可能有的处境已好得多。联军用减弱火力强度的方法延长炮击的持续时间，这种做法是严重违背一切军事原则的，是不可解释的，这无疑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头两天的炮击使联军误以为有希望，但是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却必须保持虚张声势的炮击，这就迫使他们毫无目的地消耗了弹药。

炮击已经停止，维也纳会议已经中断，电讯已经建立。情况立即起了变化。巴黎发出了迅速而坚决地行动的命令。原来的攻击方法不再使用了，无效果的炮击改为局部强攻、用地道爆破夺取阵地、进行互射和白刃格斗。虽然遭到了被围部队的初次出击，联军仍向前占领并守住了新的地点。但是，如果不可能在接近俄军防线的地点配置炮队并迫使俄军撤离这些防线的話，这就不是什么成功。如果每天不付出重大的代价，不能经常在互有胜负、得失难定的格斗中坚持下来，就无法守住这些最前面的阵地。即使第二和第三道平行壕内的炮台已经构筑好，并且为了构筑这些炮台一开始就已将俄军赶出战壕，但是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这些新炮台上架设足够的火炮，以便对最近两次炮击中已经表明并不弱于联军火力的俄军的火力进行有效的回击呢？炮队距离敌人工事越近，可能向它们集中的交叉火力就越猛烈，配置火炮的空间也就越有限，换句话说，只要守方的火力未被较远距离上的炮队的火力压制住（现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攻守双方的火力就会更加不相上下。

俄军究竟依靠了什么才如此顺利地抗击了联军的攻击呢？第一，依靠联军本身的错误和犹豫不决；第二，依靠守军的英勇和工程长官托特列本上校的才略；第三，依靠阵地本身的天然坚固性。因为必须承认，阵地的坚固程度的确是少有的。按照直到最近才辨别清楚的质量很差的地图来看，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山坡的下方，后面有高地瞰制；但按照质量较好的新地图来看，该城边缘位于成环形的、同台地之间有维谷相隔的若干独立的丘陵上；这些丘陵实际上是在同样的程度上瞰制城市和台地。这种地形也许可以充分地说明，为什么去年9月联军不敢强攻要塞；看来，它对联军的将军们起了极大的影响，竟使他们甚至不敢试图迫使敌人显露防御力量。俄国工程师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地形上的优点。在塞瓦斯托波尔所有面向台地的山坡上，都构筑了两列甚至三列而且一列比一列高的炮台，这使得防御力量增强了一倍甚至两倍。在其他城市（如巴黎的蒙瓦勒里安山坡）筑垒时也曾构筑过这种炮台，但工程师们一般并不赞成这种炮台，并称之为靶子。它们的确是围攻部队的大靶子；炮弹在未命中所瞄准的炮台时，也会射中其上方或下方的炮台，因而守方总是要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是，在要塞甚至没有被围住的情况下，比如在塞瓦斯托波尔，这种损失同炮台赋予防御火力以巨大威力的好处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我们认为，在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结束以后，对这种炮台的非难就会很少了。在防守有大量军用物资且不易被围的第一流要塞时，如果地形有利，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利用这种炮台。除了这种炮台以外，俄军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墨守工程学上的陈规。按旧的棱堡体系，要塞周围构筑15个甚至17个棱堡可能还不够用，它们对要塞的防御可能还保障得很差。现在俄军改变了这种做法，只在向前突出的高地上构筑6个棱

堡，而连接棱堡的中堤则成折线形，可以不依赖棱堡本身的火力进行侧射，而配置在折线突出部的重炮则能射击前面的整个地区。在这些中堤上（几乎是整个中堤）配置了火炮，这又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一般棱堡的中堤上通常只配置 1—2 门仅用以射击专门目标的花炮，而整个火力防御则依靠棱堡和眼镜堡。现在虽然没有更详细的技术材料，但就上述情况也可以看出：俄军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条件，即使联军攻占了马奇塔棱堡或马拉霍夫冈上的棱堡，他们无疑地还会碰上第二和第三道防线，而且必须施展全部本领和运用一切机智，才能突破这些防线。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5 月 8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5 月 2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01 号，并
载于 1855 年 5 月 11 日“新奥得报”
第 21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皮阿诺里。——对奥地利的不满

伦敦 5 月 9 日。“纪事晨报”、“晨报”、“每日新闻”以及其他报纸对“通报”的某一号提出了十分怯懦的责难，从而结束了它们对奸诈的凶手皮阿诺里的一切痛骂。这一号“通报”发表了对皮阿诺里的起诉书，同时刊载了付给坎提昂（前法国军士，而现在是在布鲁塞尔的滞锁货）一万法郎的决定（这笔钱是拿破仑遗赠给他作为对他图谋杀害威灵顿的奖励）。平常十分严肃的“纪事报”现在献殷勤和卑躬屈节得特别令人发笑。它竟认为，拿破仑第三似乎并不知道为了表示尊敬拿破仑第一而作出了这样一件奇怪的在目前来说是极其笨拙的事情。“坎提昂”的名字想必是由于 lapsus pennae（笔误）而偶然出现在“通报”的洁白的版面上的。也许是某一位过分热心的下级官吏擅自给坎提昂一万法郎的，等等。看来，可尊敬的“纪事报”以为，法国的官僚制度是按照英国的样式建立的；在英国，正如从议会调查委员会进行的最近一次讯问中可以看出，Board of Ordnance（军械部）的下级官吏确实可以背着他的长官擅自订购某一种火箭，而且价目达数千英镑；在英国，正如帕麦斯顿向下院所说明的，提交议会讨论的外交文件可以因为外交部所委托转交这些文件的“人”感冒或得了风湿病而积压数星期。

伦敦的报刊逐渐不再赞扬奥地利已经有好几天了，它正在准

备使读者理解到将在方针上作急剧的转变,将采取完全另一种调子。同往常一样,开辟道路的应当是《our own correspondents》(“我们自己的记者”)。例如,“纪事晨报”发表了下列柏林通讯:

“不要揭穿普鲁士内阁的任何一件显然不诚实的行为或违背诺言的行为。如果西方各国政府有所误解,那只是由于它们自己的过错,或是由于那些应当使西方各国政府注意的人的过错。但是能不能那样去说奥地利呢?奥地利的行为是不是也像普鲁士的行为那样十分明显呢?普鲁士千方百计地伤害西方国家,而且是直截了当地和公开地干这种勾当的。普鲁士嘲弄和讥笑我们是毫不掩饰、毫不客气的。而奥地利在 20 个月内一直在向英法献媚,偷偷地讥笑我们,它引起了徒劳无益的希望,它利用官方的和私人的途径,吸引我们参加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它提出了绝对的保证。可是现在,正如那些没有被过分的信任所迷惑的人们早就预言的,如果我们不接受那些对俄国来说可能较为有利、而对英法来说则根本不能接受的媾和条件,那末奥地利就打算离弃我们!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奥地利起初是俄国在普鲁特河上的挡箭牌,它让哥尔查科夫几乎把他所有的部队从贝萨拉比亚调到了克里木,而现在它却主张并且坚持缔结一个应保持原状不作任何变更的和约。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能期待于奥地利友谊的一切,那末这种假面具摘掉得越快越好。”

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发表了下列维也纳通讯:

“统率第三和第四军的海斯男爵不久前草拟了并向皇帝递交了一封短信,信中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向俄国宣战对奥地利来说是不明智的。可能人们会喧嚷起来反对我,因为我这样坦率地涉及到一个如此微妙的问题。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我说,英法只应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奥地利的援助未必能指望得到,那末我就是为英法效劳了。要是奥地利能说服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提供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来掩护它的左翼,那末,尽管障碍重重,奥地利大概也早就担当起开始进攻俄国的义务了。海斯男爵在他的短信中提出了哪些论据,确实不知道,但是奉行俄国方针的奥地利人在这种事情上总是比谁都掌握有更多的情报的,他们确信,这些论据大概可以归结为以下一点:西方国家十分明显地证明,为了在克里木顺利地同俄军对抗,他们不得不把自

己的全部力量以及土耳其的全部力量都投到克里木去。因此，如果奥地利不能保证自己得到德意志联邦的支援就同俄国打仗，那就太不聪明了。大家都承认，俄国在波兰有一支为数 25 万人的军队，其中包括近卫军和掷弹兵军；而且由于这支军队驻扎在俄罗斯帝国的七个最强大的要塞的地区，因此至少必须有一倍多的兵力，才能顺利地同上述俄国军队对抗。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很紊乱，法国不可能提供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来让奥地利支配，英国政府显然无能为力，普鲁士的态度不可靠等等。最近一周以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论据——事物一般是变化无常的，特别是人的命运变化多端，如果在奥地利同俄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时路易一拿破仑发生了什么问题的话，奥地利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9 日

载于 1855 年 5 月 12 日

“新奥得报”第 21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局¹⁴⁵

伦敦 5 月 11 日。法军中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迫使康罗贝尔泄露了联军的作战计划。按这个计划，应当把 25000 人的预备军团调往克里木，随后还要派去 3—4 万名法军和皮蒙特军。预备军团一开到，法军将立即出动，渡过黑河，攻击在任何地点遭遇到的俄军，力图在阿尔马河和卡查河附近某处同奥美尔—帕沙的部队会合，以后再根据情况行动。与此同时，舰队的蒸汽舰应向卡法和刻赤进行袭击，如果成功，即占领并扼守这两个城市，作为野战部队可能利用的 Pivôts，即据点。的确，这是使联军能胜利结束克里木战局的唯一可行的计划。但是，要在开阔地上采取这样的行动，联军必须在数量上占相当大的优势。没有这种优势，他们就不能指望在同俄国的监视军接触时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目前双方兵力的对比究竟怎样呢？

法军在克里木有 9 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旅 (Chasseurs d' Afrique (非洲猎兵))。每个师如为 7000 人，则共有步兵 63000 人，骑兵 1500 人。英军有 5 个步兵师，每师不超过 6000 人，有 1 个骑兵师，为 2000 人。此外，在克里木还有 1 个土耳其步兵师，约 6000 人。这里还应加上法国的预备军团，其中在康罗贝尔规定的战局开始时间以前能调到克里木的不超过 2 万人，包括 5 月 3

日已登陆的 4000 名皮蒙特军在内。这样，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兵力总数如下：

法军	步兵	83000 人,	骑兵	1500 人
英军	步兵	30000 人,	骑兵	2000 人
土军	步兵	6000 人,	骑兵	—
共计……步兵		119000 人	骑兵	3500 人

我们对留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预备军团的编成了解得很少，因此不知道目前是否能再调一些骑兵到克里木去。在战局开始前，联军的骑兵最多能增加 2000 人，这样，骑兵总数将增加到 5500 人。为了继续围攻，至少必须有相当于目前担任围攻任务的兵力，即 46000 人（4 个法国师，每师 7000 人；3 个英国师，每师 6000 人）。此外，还应加上守卫巴拉克拉瓦和由此到因克尔芒一线的工事的、同时又作为围攻部队预备队用的水兵和步兵，其数量至少为 12000 人，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 6000 名土军。如果这些部队中有 4000 人是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那末从步兵总数 119000 人中减去的应该是 54000 人，这样，用于野战的则为 65000 名步兵和 5500 名骑兵，共计 7 万余人。此外，还应考虑到在叶夫帕托利亚附近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它大约有步兵 35000 人，骑兵 3000—4000 人。其中 15000 人必须留守要塞，因此奥美尔—帕沙大概能够出动步兵 2 万人，骑兵 4000 人，共计 24000 人。

这样算来，联军这两支独立的部队中可用于野战的兵力总数为：

	步兵	骑兵	总数
塞瓦斯托波尔方面的部队 ……………	6500	5500	70500
叶夫帕托利亚方面的部队 ……………	20000	4000	24000
	85000	9500	94500

至于俄军的数量，从俄国人自己所引用的关于他们目前在克里木的部队的总数的材料中取其最小的数字来看，步兵为 12 万人，骑兵为 2 万人。这一数字中应除去必须防守塞瓦斯托波尔的 5 万人，其中 26000 人防守南区，24000 人防守北堡和营垒。所以用于野战的还有步兵 7 万名和骑兵 2 万名。至于野战炮兵，甚至连大概的数字也无法估计。如果考虑到联军在马匹补给方面有许多困难，而俄军一向随带大量火炮，那就未必还会怀疑俄军在炮兵方面将占优势。他们在骑兵方面的优势也同样是明显的。至于步兵，联军兵力合起来超过俄军，但分开算，每支野战部队的步兵人数都比俄军少。然而俄军最大的优越条件还是它所占有的阵地。俄军配置在阿尔马河、塞瓦斯托波尔和辛费罗波尔之间的三角地带，在北面同奥美尔—帕沙对抗的俄军占领着沿阿尔马河的筑垒阵地，这个阵地可用 15000 名步兵在正面防守，而同时俄军骑兵采取侧敌机动还可能切断土军同叶夫帕托利亚的联系。所以，如果奥美尔—帕沙决定单独向阿尔马河推进，那是决不能渡过该河的，除非等到英法军队把俄军击退到辛费罗波尔并从而迫使他们放弃阿尔马河的阵地。只有那时，这两支军队才有可能会合。因而英法军队向前推进是全局胜利的基本条件。但联军向前推进的路线，看来只可能是沿着向梅肯集田庄去的那条道路。这条通向阿尔马河和辛费罗波尔方向的道路设有两道防御工事：一道构筑在俯瞰黑河的出脊上，另一道构筑在从梅肯集田庄附近的山岭到塞瓦斯托波尔湾末端的狭谷的北面。这第二道、也是主要的防线全长约 2 英里，据说构筑得非常坚固，联军必将在这里进行第一次决战，其结果将决定：联军是仍然被困在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呢，还是能够突入半岛的腹地。联军不得不在狭窄的正面上行动，这对俄军是有利的。如果俄军在此遭到失败，阵地被夺，那

末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退往贝尔贝克河，并扼守这道防线以抗击联军，同时将专门派出一支部队去威胁在阿尔马河的土军。即使俄军在此再度遭到失败，但由于他们在骑兵方面占优势，而联军因运输工具不良又不能在远离海岸的地点站稳脚跟，所以俄军仍能撤离联军的活动地区。俄军可能退守的防线，是其左翼的延伸部分，但这是很不利的阵地。可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即俄军一开始就力图将联军牵制在黑河地区，同时以主力对付奥美尔-帕沙，以便在骑兵的协助下围歼土军，然后再将全部兵力调转头来对抗英法军队。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5 月 11 日

左右

载于 1855 年 5 月 14 日“新奥得报”第 221 号，并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5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0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晨邮报”反对普鲁士。 ——辉格党和托利党

伦敦 5 月 14 日。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晨邮报”今天登载了一篇对普鲁士充满威胁的文章，其中写道：

“1854 年 4 月，枢密院决定许可用中立国船只把俄国产品输入联合王国。普鲁士非常迅速地利用了这种许可。下列统计资料（引自向议会呈报的官方统计表）表明 1853 年和 1854 年从这个国家输入英国的脂油、大麻和亚麻的比较数字。尽管我们严密封锁了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港口，但是去年进口增加的数额却清楚地表明通过默麦尔和但泽而找到了通往不列颠市场的道路的俄国产品的数量。从普鲁士输入联合王国：

	1853 年	1854 年
	(单位：公担)	
脂 油	54	253955
大 麻	3447	366220
亚 麻	242383	667879
亚麻籽	57848	116267

这些数字充分说明这个新的贸易部门对普鲁士的意义。结果，尽管我们封锁了俄国，但它仍然能够像在平时那样自由地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我们却必须为这些产品多付 50% 的税和为普鲁士商人所得的利润。我们承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根本不合逻辑的。但是有益的办法不是撤除对敌人港口的封锁，而是消灭（因为这是我们有能力做到的）经过普鲁士领土的陆上贸易。”

反对贵族政治的运动在英国只可能有这样一个直接的结果：使托利党、即特殊的贵族政党执掌政权。如果结果不是这样，那末运动首先就必然归结为辉格党人的一些鄙俗行为，即两三项不值得一提的虚伪的行政改革。累亚德声明他打算提出关于“国家状况”的决议案，而这个声明又受到了下院的欢迎，这样就引起了西蒂区群众大会的召开。但是在西蒂区群众大会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埃伦伯勒在上院的提案，托利党人借这个提案来掌握这种新的改革运动，并且利用这种运动来作为进入内阁的手段。累亚德本人在提案中把“贵族的影响”这样的字眼变换成“家族的影响”，从而对托利党人作了让步。议会外的一切运动在议会内的形式，就是执政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争吵。为辉格党人所掌握的反谷物法同盟成了推翻托利党人的工具¹⁴⁶。为托利党人所掌握的行政改革协会将成为推翻辉格党人的手段。只是不应当忘记：这两个派别都这样拿旧制度的基础一个接着一个地轮流去作牺牲，然而制度本身（必须补充一句）却仍然有效。我们早就说过，只有托利党人才常常被迫作更多的让步，因为只有他们在他们执政时，外来的压力才具有威胁的、甚至是革命的性质^①。辉格党代表英国寡头政体本身，代表像萨特伦德、培德福德、卡莱尔和戴文希尔等这样一些少数有实力的家族的权势。托利党代表 squireocracy，也可以说是代表容克派，尽管在英国的大地主和北德意志容克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托利党人是教会和国家、保护关税政策和反天主教问题上的一切旧英国偏见的保持者。辉格党人是文明的寡头政治家，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些妨碍他们实现操纵国

① 见本卷第 105—106 页。——编者注

家职位的世袭权利的偏见。辉格党人的好意总是束缚着资产阶级运动；托利党人的好意则经常把人民群众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而资产阶级又把人民群众交给辉格党人支配。现在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不再有什么区别，因为后者好像是贵族中的平民，而前者则是贵族的 *haute volée*（上层）。贵族中的平民惯用旧贵族的词句，而贵族中的显贵则惯用自由派的词句。但实际上在老的托利党人（博林布罗克勋爵等）退出舞台以后，领导托利党的一直是像皮特、阿丁顿、派西沃、坎宁、皮尔和迪斯累里这样一些暴发户。*Homines novi*（新人，暴发户）总是出在托利党内。在得比（得比本人就是从辉格党阵营投过来的）组阁时，在阁员中除了得比本人外，最多也不过两个知名人物。所有其余的人都是一般的大地主，还有一位文学家。相反，根据不同情况而毫不犹豫地更换自己的常礼服和观点的、自己经常在表面上进行一些革新和改变的辉格党人却不需要新人。他们能够使自己的姓名永垂不朽。如果我们总的回顾一下 1688 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历史，那末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旨在反对人民群众的一切法律，从把议会的任期改为七年的法令¹⁴⁷起，到最近的习艺所法¹⁴⁸和最新的工厂法止，都出自辉格党人之手。但是辉格党人的反动政策总是经资产阶级同意后实施的。托利党人的反动政策反对资产阶级的程度甚至比反对人民群众的程度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辉格党人被视为自由派的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1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18 日
“新奥得报”第 227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上院会议

伦敦 5 月 15 日。昨天下午，上院走廊里还在开会以前就挤满了人。人们等待着一个有趣的场面——讨论埃伦伯勒勋爵的提案和 Ins und Outs (政府和反对派) 之间的真正交锋。此外，人们都好奇地想亲眼看一看继承的立法者将怎样扮演反对贵族的十字军骑士的角色。演得很糟糕。演员们经常离开自己的角色。演出以悲剧开始，而以闹剧告终。在假交锋的时候，甚至连一点幻想、戏剧性的幻想都没有保存。一眼就可以看出，崇高的战士们不仅竭力保存彼此的完整，而且甚至竭力保存他们用来交锋的武器的完整。

辩论既然围绕着对进行战争的批评，它也就低于伦敦的任何一个 Debating Club (辩论俱乐部) 的辩论水平，在这种辩论上哪怕是花一分钟，也意味着白白浪费时间。但我们仍然打算用轻轻的几笔来勾划出高贵的勋爵们是怎样扮演维护行政改革、反对贵族独霸国家管理大权的角色的，他们对西蒂区的群众大会是怎样反应的。埃伦伯勒勋爵高声地叫道：“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为了证明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功绩、而且仅仅是根据功绩得到自己的荣誉，他举出了这样一件事实：他本人 (埃伦伯勒) 和哈德威克勋爵之所以能呆在上院，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以自己的功绩为

自己进入贵族院开辟了道路。相反,在我们看来,这个例子正好说明,借助于别人的功绩,在这里是自己父亲的功绩,不仅可以取得其一个终身的职位,而且甚至还可以取得英国立法者的称号。Lord chief justice of the Queen's Bench (皇家法庭大法官)老埃伦伯勒和哈德威克勋爵的父亲查理·约克先生所借以为自己进入上院开辟道路的功绩,究竟是什么?这段历史是可资借鉴的。已故的埃伦伯勒,这个英国律师,后来的法官,在审理皮特和他的继承人时期所发生的出版案、阴谋案和警察间谍案的过程中取得了 en miniature (小)杰费雷斯的声誉。在他的领导下, special jury (特别陪审法庭)在英国取得了甚至连路易-菲力浦时代的《jurés probes et libres》(“正直而自由的陪审员”)都从来没有享有的荣誉。这就是老埃伦伯勒的功绩,这些功绩为他进入上院开辟了道路。至于说到哈德威克勋爵的先辈查理·约克先生,那末他在功绩方面还超过老埃伦伯勒。这位查理·约克,当了 20 年由剑桥选出的议员,是受皮特、派西沃和利物浦的委托《to do the dirty work for them》(“为他们干肮脏事情”)的特殊人物之一。当时每一个“公正的”恐怖措施都找他来作自己的品得。他认为每一次反对公开买卖下院席位的请愿都是“雅各宾阴谋”。查理·约克把每一个反对在英国已经出现了赤贫现象的时候还在实行的无耻的滥设官职制度的提案说成是图谋破坏“我们神圣的宗教的幸福安宁”。这位查理·约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庆贺自己高升到了上院的呢?伐耳赫伦岛远征¹⁴⁹于 1810 年在英国引起了像克里木远征在 1855 年所引起的事件。当时波尔切斯特勋爵向下院提出了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提案。查理·约克激烈反对,说这是阴谋,这是要激起人们的不满,等等。尽管如此,波尔切斯特勋爵的提案还是被通过

了。于是约克决定使公众无法了解调查材料，坚持要行使旧的不合理的议会特权，坚持不让公众和记者进入议会走廊。结果是这样做了。这时有一位盖耳·琼斯先生，伦敦一个 Debating Club（辩论俱乐部）的主席，发表了一则消息，说俱乐部将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讨论查理·约克破坏出版自由和粗暴地侮辱舆论的问题。为了对付这一点，查理·约克在下院斥责盖耳·琼斯侮辱议员，破坏“议会特权”，之后，下院就不顾英国的一切法律，未经审讯就直接从议院的会议上把琼斯送进了新门监狱，“以便下院要把他在那里押多久就押多久”。查理·约克在树立这些英雄的功勋的时候还夸耀自己的独立性。请看，他只是作为一个正派的“乡村贵族”、作为“国王的朋友”、作为“忠诚的反雅各宾主义者”而行动的。但是，大家知道，由于约克的坚持而把走廊封闭后还不到三周，他就已经向派西沃内阁提出了自己的账单，经过讨价还价，他获得了 Teller of the Exchequer（国库检查员）（有点像“绿蜡保管员”）这个薪高事少的终身职位，换句话说，他这一辈子每年的收入是 2700 英镑。查理·约克在接受这个肥缺以后，就必须到剑桥的选民那里去参加重选。在选举大会上，人们用口哨声和嘘声、烂苹果和臭鸡蛋来欢迎他，于是他只好逃跑。派西沃则把他提升上来，授予他贵族的称号，作为对他的失败的补偿。查理·约克是通过这样的道路变成了勋爵的，他是通过这样的道路使得组织得很好的国家机关承认他的功绩的，——埃伦伯勒勋爵开导帕麦斯顿勋爵说。埃伦伯勒这个无疑与可怜的骑士^①相类似的人物不顾这种天真的富有特色的 lapsus linguae（失言），竟

^① 唐·吉珂德。——编者注

大部分用了西蒂区群众大会的语言。

他的朋友得比甚至竭力限制这种纯粹词句上的让步。他驳斥了他同累亚德有勾结的谣传。他的全部天才在于慎重，所以他斥责累亚德不慎重。他说，在西蒂区的先生们的观点中有很多正确的东西，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太古怪（!!）了。大臣应该在议会里为自己找到同僚，不仅要在议会里，而且要在他所加入的党里，并且主要不是在党的一般成员中，而是在那些在议会里享有威信的成员中。在这些成员当中，直到现在还常常被忽视的那些才能当然应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得比认为，错误在于1831年的议会改革。《rotten boroughs》即“腐朽的市镇”被消灭了，但恰恰是这些市镇提供了头脑清醒的英国国家活动家。这些市镇使有势力的人们能够把天才的、但是还没有资产的年轻人送进议会，并经过议会去担任国家职务。因此甚至按照得比的意见，不进行议会改革——只是在相反的意义即在恢复“腐朽的市镇”的意义上的议会改革——任何行政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注意到下院有85个席位至今还属于大约60个小的《rotten boroughs》（仅仅在英格兰），其中任何一个市镇都没有超过500名居民（虽然有的还派出两名议员），那末，得比的抱怨就不是完全有根据的了。

代表内阁发言的潘缪尔勋爵使上院的辩论沿着讨论问题的实质这个方向进行。他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的豪言壮语所追求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议会外面所掀起的喧嚣把我们赶出内阁，自己来占据我们的位置。为什么得比三个月以前在接到女王的建议时不组织内阁呢？得比得意地微笑着回答说，是的，三个月以前！但在三个月内情况变了。三个月以前帕麦斯顿勋爵还是一个 *homme à la mode*（时髦人物），一个伟大的没有人能够代

替的国家活动家。现在他的美妙时光已经过去，该轮到我们的了。

上院的辩论表明，在这里任何一方都没有可以用来培植成一个真正的人的材料。至于下院，那末埃伦伯勒公正地指出，它已经失掉香味了，丧失威信了，因此不应该在议会内部，而应该到议会外面去找政治影响。上院的辩论清楚地表明了贵族反对派的 mala fides (不真诚)，他们企图用欺骗来使资产阶级运动化为乌有，而同时又利用它来作为反对内阁的攻城槌。在下篇通讯中，我们还将有机会证明西蒂区改革派对待工人阶级也是 mala fides 的，他们打算玩弄工人阶级，就像他们被贵族反对派玩弄一样。这就使我们有可能确信，英国目前的运动按其性质来说是极其复杂的，正如我们早先已经指出的，它本身包含着两个彼此对立和敌对的运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1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19 日
“新奥得报”第 228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 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¹⁵⁰

伦敦 5 月 16 日。资产阶级反对派对上院就埃伦伯勒提案进行的表决表示愤怒，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派软弱的标志。资产阶级反对派本来应当相反地把这个提案的否决当作一种胜利来庆祝。迫使上院这个贵族最高会议在庄严而公开的辩论过程中声明它对迄今进行的战争表示满意，迫使上院大声地承认帕麦斯顿是自己的领袖和代表并且甚至完全拒绝行政改革和任何一切改革的良好愿望——**贵族的敌人**从埃伦伯勒的提案中还能期待什么更好的结果呢？他们本来应当首先竭力破坏上院这个英国贵族的最后堡垒的威望。可是他们却抱怨上院忽略了必须依靠现在的内阁而不是依靠自己的特权来获得极短暂的威望的机会！如果是托利党机关报、宣扬“我们最完美的宪法”的一切偏见的报纸“先驱晨报”这样抱怨，那末这是理所当然的。“先驱晨报”用这样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在辉格党寡头政治家在一个半世纪内履行了资产阶级和“自由进步”的朋友的义务以后，角色将有所变动，在以后一个半世纪内，资产阶级和“自由进步”的“贵族”代表这一角色将由托利党人来担任。“先驱晨报”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来发牢骚。可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呢？难道它以为，西蒂区的商人举行一次温和的游行示威就足以使贵族自杀和放弃政权了吗？然而真实情况是，资

产阶级希望妥协，它期待着对方的让步以便自己也有让步的机会，它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真正的斗争。因为真正的斗争一开始，“千百万人”即他们所谓的“下层”阶级就会挤上舞台，他们不仅作为旁观者或公断人，而且作为斗争的一方来参加战斗。可是这一点是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要避免的。正由于这种原因，辉格党在1808年至1830年间才不得不在内阁之外。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推翻自己的对手，只要不对资产阶级作真正的让步（而没有资产阶级的援助就不能赶走托利党人），只要不进行议会改革。我们看到，埃伦伯勒和得比是怎样模棱两可地耸着肩膀、带着保留条件并用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讽刺方式宣布自己是资产阶级行政改革的拥护者，而同时却把自己的虚假的同盟者完全弃之不顾。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又看到，西蒂区的商人改革家一开始就多么胆怯而阴险地在竭力防止宪章派的一切反对，而且竭力使他们暂时保持沉默，以便然后悄悄地把他们从他们自愿让出的阵地上排挤出去。西蒂区的先生们同托利党人一样，对虚假的同盟者的恐惧和仇视超过了对虚假的对手的敌意。事件经过的简略情况如下：

行政改革协会害怕宪章派的反对，读者一定还记得，在圣马丁大厅和南威克召开的两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宪章派同国民和立宪协会进行了顺利的斗争，迫使它退出了它所选定的阵地。4月26日，詹姆斯·艾克兰先生（过去是反谷物法的鼓动者）登门拜访厄内斯特·琼斯，声明他是行政改革协会的“使节”，协会指望得到宪章派的支持，因为协会力图废除“阶级立法”和建立国民政府。他邀请厄内斯特·琼斯不日同这个协会的委员会会晤。琼斯表示，他没有授权代表宪章派答复这个问题，在同伦敦宪章派执行委员会¹⁵¹（将在这个星期天召集会议）商量以前，他不得不拒

绝会晤。

在4月29日，星期天的晚上，琼斯把这一切告诉了宪章派委员会，该委员会授权他继续进行谈判。第二天早晨，琼斯同西蒂区运动领导人英格列海姆·特腊佛斯先生会晤，英格列海姆·特腊佛斯先生亲自向他介绍他的这个党派的全权代表詹姆斯·艾克兰。英·特腊佛斯先生向琼斯保证，他们的目的是建立国民政府。他说，在“泰晤士报”上登载的决议只是初步的决议；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将由伦敦饭店举行的群众大会所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来确定。为了证明对行政改革的同情，宪章派应委派一位发言人来代表宪章派出席群众大会。这个发言人应当在主席的邀请下支持某一项决议。宪章派还应当派出一位代表，这位代表将在群众大会上根据西蒂区商人临时委员会的提议，而被选为改革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最后，达成了协议，由于参加群众大会必须凭票入场，宪章派将得到相当数量的入场券。琼斯不同意仅限于口头上的这些谈判，因而对英格列海姆先生说，上述各点应当用书面形式转达给宪章派执行委员会。

于是就这样做了。充满庄严保证的信件接到了。但是送来的入场券却只有12张。宪章派委员会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违背诺言的行为，得到的回复是推说入场券不够，但他们说，如果宪章派委员会愿意派两个宪章派成员站在饭店门口的话，那末他们可以不要票而把他们所希望的人放进去。为此，宪章派选出了斯洛克福先生和沃克曼先生，他们也得到了特腊佛斯先生的委托书。为了消除一切猜疑，行政改革协会在举行群众大会的那一天，在开会前几小时，派专人送给琼斯一封信，提醒他说，主席要求他支持第四项决议，并说将向群众大会提出宪章派代表琼斯作为候选

人，以便把他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群众大会开始前大约一个小时内，饭店门前聚集了大批宪章主义者。大门一开，斯洛克福先生和沃克曼先生却被禁止放进任何没有票的人入内。当门外的压力愈来愈大的时候，为了**拖延时间**，就十分勉强地散发了 8 张入场券。拖延时间是为了把早就布置在附近街道上的一队警察引进来。从这时起，除了“著名的商人和银行家”外，谁也不放进去了。身穿**工人服**即大家所熟悉的绒布短上衣的人即使有入场券也不让进去。为了欺骗在街上等待的工人群众，大门突然关上了，门上贴出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客满。停止入内。”其实这时大厅里连一半也没有满，而乘着马车来的“绅士们”，却从窗户和厨房后门进去了。工人群众没有识破这种阴险行为，他们静静地散去了。在大会进行时，尽管厄内斯特·琼斯拿出了他的“发言证”，但是没有让他上讲台，当然也就没有能够发言。协会达到了两个目的：防止了宪章派的反对，并且有了机会向人们指出在街上聚集的群众就是**他们的拥护者**。然而群众只是在街上充当了不说话的配角。

厄内斯特·琼斯在告英国工人书中揭露了这个阴谋骗局的全部过程，并用宪章派的名义向行政改革协会挑战。¹⁵²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19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29 号

卡·马克思 金融市场

伦敦 5 月 19 日。根据英国报界的一些乐观主义者的看法，英国的工商业危机已经结束了，工商业又在沿着上升线发展。他们得出这种令人快慰的结论的事实根据是，金融市场的状况有了改善。这就是说，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地窖里的黄金储备量有了增加，另一方面，银行降低了贴现率。1855 年 1 月 20 日黄金储备量只有 12162000 英镑，到 1855 年 5 月 12 日，黄金储备量已达 16045000 英镑——增加了 3883000 英镑。1855 年 1 月 20 日贴现率是五厘，3 月 31 日，银行把它降低到四厘五，4 月 28 日，又降低到四厘。然而这些先生们没有考虑到，银行地窖里黄金的积累和贴现率的降低，除了经济繁荣以外，还可能有另一种恰好相反的原因：营业萧条和与此有关的对资本需要的减少。英格兰银行每周公布的统计表表明，这一次的真正原因正好是后一种。不应当像上面提到的乐观主义者那样，仅仅注意这些统计表中的黄金储备量和贴现率两栏。必须把另外两栏——预备银行券和贴现期票对比一下。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是由两个不同部门组成的：即 Issuing department（发行部）和 Banking department（银行部）。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英格兰银行的造币厂。它的全部活动就是发行银行

券。由于 1844 年罗伯特·皮尔颁布的法令，银行券的发行受到了法律的限制。这就是说：除了国家应给予英格兰银行的资本 1400 万英镑以外，银行有权发行的银行券总数不能超过保存在银行地窖里的黄金储备量。因而，如果银行发行银行券 2000 万英镑，那末在它的地窖里就应有 600 万英镑的黄金。银行 Issuing department 的全部活动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调节银行券的印制和发行。发行部将其所印制的全部数量的银行券转交给 Banking department，即原来意义上的银行。这种银行和一切其他的储蓄银行和贴现银行一样，与公众发生关系，它通过票据贴现、发放有息证券的贷款、给国家债权人支付股息、发付银行存款等办法使银行券进入流通。这种令人惊叹的发明（把英格兰银行分成两个互不依赖的部门以及对所发行的银行券的数量进行这种调节）是罗伯特·皮尔搞出来的；罗伯特·皮尔以为，这样就能防止一切未来的货币危机，证券的流通就将借助于自动生效的机械规律而同金属储备协调一致起来。但是著名的国家活动家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他的调节只是调节了 Issuing 和 Banking department，即英格兰银行的两个部门之间的流通，而决不是调节银行部和外界之间的流通。银行发行部把它根据法律有权印制的这些数量的银行券（例如 2000 万，假定在它的保险库里有 600 万黄金的话）转交给银行部。但是，在这 2000 万中究竟有多少数目真正进入流通，这取决于营业的状况，取决于商业界的需求。银行不能使之进入流通因而留在 Banking department 的保险库中的那个余额，则作为**预备银行券**而列入银行的账目。

我们看到，银行的黄金储备量从 1855 年 1 月 20 日至 1855 年 5 月 12 日增加了 3883000 英镑，预备银行券的总数在这个时期则

从 5463000 增加到 9417000，即增加 3954000 英镑。行券，即存在 Banking department 保险库中的银行券数量愈多，则实际上进入流通的银行券数量就愈少。但是从上面举出的数字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银行地窖中黄金积累的同时，进入流通的银行券数量减少了。这种流通量缩减的原因何在呢？完全在于营业积极性的削弱和商业交易数量的减少。银行账目完全可以证实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从这些账目中可以看出，银行贴现的期票价值在 1855 年 1 月 20 日达到 25282000 英镑，到 1855 年 5 月 12 日反而下降到 23007000 英镑，即减少了 2275000 英镑。可是银行贴现的期票价值是银行同商业界成交数字的最可靠的尺度。如果注意到银行在 4 月 28 日把贴现率降低到四厘，因而提供自己的商品——资本——比过去的 1 月份便宜 20%，那末结果就更加令人吃惊了。同时从 4 月 28 日银行降低了贴现率这个时候起，到 5 月 12 日，银行为票据贴现而发行的银行券数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这证明，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资本即使按四厘的利率计算，也还是太贵了，它甚至不能找到像在 1 月初按五厘的利率计算时所获得的需求量。这证明，贴现率的降低并不是因为资本的大量流入，而仅仅是因为工商业对资本的需求量减少而引起的。最后，这证明，银行地窖里的金属储备量的增加只不过是放在那里的目前没有使用的资本的增加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22 日
“新奥得报”第 233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争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克里木的野战行动大概已经开始了（关于这次野战行动的准备情况，我们在几天前已经谈到过了¹⁵³），因而局限于半岛范围内的这次战争，便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发展阶段。皮蒙特军和法军的预备队迅速开到，特别是司令官突然易人，康罗贝尔调任军长，总指挥权被授予佩利西埃，这无疑证明联军改变战术的时候已经到来。

关于将成为新战场的地形的概述和应投入战斗的兵力的概略数字，读者可以从我们前一篇文章中找到。应当提醒的是，同塞瓦斯托波尔北区保持联系的俄国监视军的基本阵地，设在从因克尔芒起到巴拉克拉瓦—辛费罗波尔道路同黑河和贝尔贝克河分水岭的交叉点止这一线的台地上。俄军在这个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阵地上几乎到处挖掘了战壕。这个阵地从塞瓦斯托波尔湾末端延伸到不能通行的山岭为止，长达4英里左右；俄军在这里至少可以集结5—6万名步兵和炮兵，——这些兵力用来防御是很够的了。

要想从正面攻击这一阵地，必须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和付出重大的代价；然而联军既不能建立巨大的兵力优势，也不肯付出重大的代价。即使他们攻占了俄军的工事，其损失之大也将使他们不能积极而坚决地继续作战。因此，他们必须将部分俄军从这

一阵地上诱开，并寻找迂回该阵地的道路。为此向刻赤进行了神秘的远征。联军约 15000 人乘船在俄军眼前经过雅尔达开往刻赤，后来又返回原地。他们没有试图登陆，这似乎是因为接到了巴黎的电令。但无论如何，这个不配称为佯动的行动应当被看做是彻底的失败，——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将军，都不会分兵去进行这种最后甚至连装装样子的会战都没有发生的远征。向卡法的进攻，即使司令部曾经作出过计划，大概也终于放弃了。向叶夫帕托利亚调动部队以便由该地出击这一问题，目前也不可能存在；否则，皮蒙特军和法军的预备队就可能立即调到那里去了。由于不论在巴拉克拉瓦和卡法之间或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夫帕托利亚之间，沿岸都没有别的港口或良好的停泊场，因此从海上迂回俄军的想法显然终于打消了，现在别无他法，只有从陆上迂回，可是我们已经说过，这种行动将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俄军在因克尔芒以北占领的那条道路外，仅仅还有一条从巴拉克拉瓦通到辛费罗波尔的大道。它沿南海岸到阿卢什塔，在那里折向半岛腹地，在海拔 2800 英尺的高度上穿过克里木最高的查特山（即沙特山）以东的山地，然后向下经过克里木最大的萨耳吉尔河的盆地通到辛费罗波尔。从巴拉克拉瓦到阿卢什塔是 4 天行程，从阿卢什塔到辛费罗波尔是 3 天行程，共约 95 英里。但是，由于附近没有别的道路可供部队成几个纵队齐头并进，因此所有的部队必须成一路特别长的纵队沿一条道路行进；这就至少需要一个拉得很长的纵队行军 4—5 天。在阿卢什塔附近和在山口上原来就有若干个旧工事，而且不用怀疑，出口本身也一定是牢固地设了防的。本来只须 7 天就可通过查特山，现在也许要 12 天，——这段时间足以使俄军采取行动；或者对留下准备进

行围攻的联军实行攻击；或者用大部分兵力去对付迂回的敌人，当敌人走出隘路时以优势兵力迎击，而轻装的机动纵队则可沿卡查河和阿尔马河上游的山径前进，从翼侧和后方进行打击。但是，联军经过阿卢什塔的侧敌运动的最大缺点，还在于那里没有作战基地。由于阿卢什塔的停泊场是暴露的，因此，即使把这座城市变成临时基地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甚至在联军还未通过阿卢什塔以前，俄军轻步兵就会沿山径而下，非常顺利地切断阿卢什塔与巴拉克拉瓦之间的交通线。

所以，经过阿卢什塔的行军未必会成为事实。这样行军所冒的危险远远超过它可能带来的好处。然而还有迂回俄军的另一个方法。既然联军经过阿卢什塔行进时俄军可利用山径进行袭击而使大路给联军造成的一切优越条件几乎完全消失，那末联军为什么不能同样地利用这些山径呢？不过，这样就意味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就得把野战部队的基本兵力，包括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部队，直接配置在因克尔芒附近的俄军兵营前，以迫使他们把大量部队集中在战壕内。同时，按照从拜达尔盆地和从阿卢普卡（距巴拉克拉瓦 30 英里）附近的南海岸通向贝尔贝克河和卡查河盆地的山径的数量，把朱阿夫兵、法国猎兵、轻步兵、英国猎兵、甚至骑着马的 *Chasseurs d'Afrique*（非洲猎兵）以及可能集中的山地炮兵编成几个纵队。经过一夜行程，担任迂回俄军极左翼的部队就可能通过拜达尔盆地，到达南海岸，在这里他们已经摆脱了敌人。再经过一天行程，他们便可到达阿卢普卡。阿卢普卡以北矗立着雅伊拉的一连串陡峭的山岭，在它北坡上拔海约 2000 英尺处是一片台地，上面有极好的牧羊草地，台地的北缘是悬崖峭壁，下面就是比尤克—乌津和乌津—巴什两条小河的

狭小的盆地，这两条小河汇合成贝尔贝克河。有三条山径从阿卢普卡地区通到台地上，然后通向比尤克—乌津和乌津—巴什两河的狭小的盆地。这整个地区对惯于在非洲复杂得多的条件下在山地作战的朱阿夫兵或法国猎兵这样的步兵来说，是完全可以通行的。其次，从黑河上游盆地（通常叫做拜达尔盆地）至少有两条山径通向贝尔贝克河上游盆地；最后，巴拉克拉瓦—辛费罗波尔道路在山口前又分出一条山径，在梅肯集田庄东南3英里处越过山岭，直通俄军筑垒阵地的左翼。不论这些山径对军队来说是多么难走，但来自非洲的法国轻装部队还是能够通过的。“山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一个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一两匹马就能勉强通过；而最后连野炮也可能拖过去。”有时地图上标示的山羊能通行的小径和人能通行的小路，事实上甚至是乡间土道，尽管道路很坏，但终究可供也许包括有炮兵的纵队作侧敌运动之用，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没有什奇怪的。在这种场合，应尽量以较多的兵力进行迂回运动，那时，甚至不进行猛烈的正面攻击，俄军也将很快被迫撤离战壕。如果这些山径是野炮所不能通过的（火箭发射管和山炮则到处可以通过），那末迂回部队就得变成普通的游动队，尽可能把俄军赶出贝尔贝克河上游盆地，深入卡查河盆地，威胁俄军的后方，切断俄军的交通线，消灭俄军的运输纵队，收集确实的情报，侦察地形，吸引尽可能多的俄军兵力，直到困难最少的一条道路改建得炮队也能够通过时为止。然后，可随这些游动队之后派出大量兵力，使俄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迫使俄军放弃他们的工事。我们并不认为，单靠步兵和轻骑兵通过这些山岭向俄军左翼和后方前进，便能取得这种结果，因为这些部队不到达使炮兵能重新发挥全部作用从而

使具有炮兵的一方占优势的地区，就不可能给俄军交通线造成严重威胁。然而无疑地，只要想出一定的办法，炮兵便能随迂回纵队一起行动。拿破仑在耶拿会战¹⁵⁴时表明，通向陡峭的山顶的普通人行小道究竟可以利用来做些什么：在5个小时内就把它开辟成足以供火炮通行的大路，使普军的翼侧受到攻击，从而保证了次日的胜利。克里木的大车能通过的地方，野炮也能通过；我们所谈的一些山径，特别是从黑河通向贝尔贝克河的那些山径，看来都是通行大车的旧乡间土道。

但是，实现这种机动的首要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兵力。无疑，俄军将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对地形很熟悉也是他们的有利条件。奥美尔—帕沙的部队从叶夫帕托利亚向阿尔马河大胆挺进，便可能抵销俄军在数量上的优势。虽然由于俄军在骑兵方面占优势，奥美尔—帕沙不能前进得又快又远，但是他只要巧妙地机动并很好地保障交通线，还是能迫使哥尔查科夫公爵用更多的步兵来对付他的。然而，联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次要的行动上，因为这样就等于碰运气。为了从巴拉克拉瓦实行进攻，联军可能采取的较好的办法，就是在实际进攻开始前一两天把大约2万名土军调到赫尔松涅斯（据不久前报道，联军已经这样做了^①），在那里，一个兵的作用可以抵得上在叶夫帕托利亚的两个兵。这就使联军有可能以将近11万人的兵力（包括约6000名骑兵）攻击俄军，而俄军能用来对抗的兵力约为65000—75000名步兵（包括北区守备部队中的1500—20000人）和1万名骑兵。但是，进行迂回的部队一开始威胁俄军的左翼和后方，俄军可能用来对抗它们的兵力

^① 括号内的句子，看来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加的。——编者注

就将比较弱，因为如果从北区调动部队，他们同城砦周围的营垒之间的联系便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联军由于能够将全部现有的野战部队用于任何一点而有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疑可以指望获胜；但是，假如他们攻击俄军时没有外援，假如最可靠的权威人士所提出的双方兵力对比合乎实际情况，那末联军取胜的机会就将很少。联军进行迂回的部队的兵力就会太小，俄军就可以对它置之不理而从自己阵地上大胆出击，把兵力已经减弱的联军从高地上赶到黑河里去。

有人认为联军也可能采取另一种打法：立即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甚至有消息说，巴黎用电报发出了无条件地进行这种强攻的命令，康罗贝尔辞职就是由于他认为这种打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他看来，这种打法要损失4万人。从路易—拿破仑在干预当前战局的指导工作时显示的军事知识来看，也许可以认为曾发出过这种命令。但是，甚至像佩利西埃这样鲁莽的 *sabreur*（武夫）也不大可能去执行这种命令。最近一个月的事件应当使法军兵士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他们在强攻时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况且不损失4万人（占担任强攻的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一以上）便不能实现的这一行动，获胜的可能性也无疑是很小的。佩利西埃也许渴望取得从康罗贝尔手中滑落的元帅杖，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怀疑他是否够得上一个敢于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拿自己的命运和名誉去冒险的波拿巴主义者。假定这种强攻能够成功，联军不但夺取了第一道防线，而且夺取了第二道防线，甚至隔断通向岸防炮台的道路的街垒、设防的家屋和避弹所以以及这些岸防炮台本身也被攻占，整个南区落入联军手中，而且联军只损失了3万人，俄军则损失2万人，那又怎样呢？联军比俄军多损失1万人，所夺

取的要塞又不得不立即放弃，而进行野战也会更加困难。

但是，有一个情况能打消人们关于立即进行总攻的任何想法。我们纯粹为了辩论起见，曾根据一些半官方的报道，在以前发表的关于围攻的一篇文章^①中引用过一种推测，即俄军被赶出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新构筑的外围工事。但同时我们又指出，我们有一切理由怀疑这些报道的准确性，因为像这样的任何一个胜利，联军都会用肯定的语气大肆宣扬的。情况果然如此，目前我们获得的来自俄国方面的可靠消息说明，堪察加（马美朗）多面堡、色楞格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都还在俄军手中，而来自联军兵营的报道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还承认被围俄军在构筑新的外围工事这一事实。因此，联军由于对要塞进行接近壕作业而取得的优势，便因俄军筑有反接近壕而化为乌有，双方力量平衡的对峙线仍离主壕很远。然而只有当进攻者用于围攻的兵力同防御者的兵力相等的对峙线已推进到防守主壕一线时，才适于进行强攻。否则，强攻纵队在尚未冲到胸墙上面以前，显然就将被击溃和被消灭。这就说明为什么当联军还不能将俄军击退到主壕后面时，便不能强攻主壕后面的主墙。至于夺取主壕后面的第二道防线，那在目前就更谈不上了。

很可能，在法军正进行主要的挖壕作业的地段上，即从卡兰亭棱堡到马奇塔棱堡这一地段上，已经造成了对左面，即对市区进行局部强攻的有利形势。但是，由于法国政府的策略，我们对俄军在这里的外围工事的长度和强度一无所知，而最近仅用电报发来的俄军方面的报告，也没有任何明确而详尽的说明。不过俄国人自己已承认，在马奇塔棱堡附近法军的工事已靠近主墙，并

^① 见本卷第 230 页。——编者注

在主墙下面进行了爆破，虽然没有收到什么重大的效果。因此，这一地段的强攻可能会成功，但这个棱堡的位置突出在前面，它后面（俄军的雅佐诺夫多面堡）的地形又居高临下，所以夺取这一棱堡能否取得某种进展是很值得怀疑的。在这个棱堡的后面，大概有一两道横墙把它同其余的工事隔开，这就使强攻纵队难以在棱堡里巩固下来，至少难以再向前作某些推进。

这样看来，不论联军是否进行强攻或野战，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无论如何，联军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以来所采取的毫无生气的作战方法就要告终，现在可以期待更重大的、从军事观点来看是真正有意思的事件和行动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5 月 21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6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1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关于改革运动

伦敦 5 月 21 日。伦敦各家报纸今天刊登了西蒂区改革派（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他们的执行委员会）的告“英国人民”书。这个文件的文体枯燥无味，纯粹谈事务，不如那些定期出版的商业通报的文体高超，商业通报根据同样的材料，用比较巧妙地编造的华丽词句向全世界推销咖啡、茶叶、糖、香料以及热带地区的其他产物。协会答应提供暴露政府的各个主管部门真正生理现象的材料，以及揭露唐宁街¹⁵⁵——世袭贤明的唐宁街的全部秘密。这就是协会许下的诺言。协会从自己这方面要求英国的选民们把自己亲自选举出来的有功劳的候选人派到议会中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贵族俱乐部硬塞给他们的候选人派去。因此，它认为享有选举权的特权集团的存在是正常的，按照它的说法，这个选民集团对某几个俱乐部的依附关系、卖身投靠和缺乏独立性才产生了现今的下院，从而也产生了现今的政府。协会不想取消这个特权选民集团，更不想扩大这一集团；它只想从道义上来影响这个集团。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直接向寡头政体的良心呼吁以代替向它威胁要取消它的特权呢？要知道使寡头政体的头目们转向正路似乎要比使寡头政体的选民集团转向正路来得更容易些。西蒂区协会显然想煽起反贵族政治的运动，但这只是在合法的（按照基

佐的说法)官方的英国的范围内进行的运动。它想怎样来扰乱这个选民集团的污浊的泥潭呢?它打算如何强迫这些选民们弃绝促使他们成为两三个贵族俱乐部的仆从和执政寡头政体的支柱的那些利益和习惯呢?依靠唐宁街的生理作用吗?不全然。还要依靠从外部施加的压力,即借助于群众大会等。但是,为了对这个特权选民集团施加压力,它打算怎样使非官方的没有选举权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呢?它号召人民群众放弃人民宪章(在这个宪章中除了要求普选权和那些保证在英国能真正实现普选权的条件以外,实质上没有别的内容),并承认西蒂区改革派自己所说的正在分崩离析的那个狭小的选民集团的特权。西蒂区协会有“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的先例。它知道这个由休谟、布莱特、科布顿、华姆斯莱和汤普逊领导的运动遭到了失败,因为他们提出了所谓“小宪章”来代替人民宪章,因为他们向人民群众只作了一些个别的让步,只想同人民群众缔结妥协协定。他们虽然作了让步,但未能达到目的,难道协会能希望不作让步就能达到目的吗?或者,协会也许从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中得出结论说可以通过局部性的改革促使英国人民参加运动?然而这个运动的目标涉及最广泛的阶层,它是非常受人欢迎和非常显著的。大家知道,与保护关税派小面包不同的大圆面包是反谷物法同盟的象征。特别是在饥荒的1846年,大圆面包对人民说话自然要比“唐宁街的生理作用”更有效得多。没有必要提起著名的小册子——“西蒂区的生理作用”¹⁵⁶。在小册子里确凿地证实了,不管西蒂区的先生们把他们自己的事情办得多好,在管理社会事业方面,如管理各种保险公司,他们多多少少是在仿效官方唐宁街的榜样的。他们在铁路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欺诈哄骗手段以及完全忽视安全措施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议

论,他们的管理情况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报界、议会内和议会外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要不要把铁路从私人资本家手中收回来或要不要使铁路受国家直接监督的问题!因此,唐宁街的生理作用产生不了什么结果,正如英国人所说的——《this will not do, sir!》(“先生,这个行不通!”)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24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37 号

卡·马克思 评克里木局势。——议会新闻

伦敦 5 月 23 日。召回刻赤远征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联军的陆海军中所引起的严重不满，在伦敦报刊上得到了反映，虽然反映得极为软弱无力和毫无生气。人们开始担心，克里木军事戏剧的统一行动和正常进程与其说是受到俄国人的威胁，不如说是受到军事天才拿破仑第三这个 *Deus ex machina*^① 的横蛮无理的肆意干涉的威胁。“通报”上刊载的著名军事科学教学“经验”¹⁵⁷ 中所提供的这位天才的事例，事实上绝不能令人快慰和安心。不过到目前为止，战地远离土伊勒里宫，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不受巴黎军事学门外汉的实际干涉。可是海底电报消除了这种距离，同时也毁掉了这种保证，一向自命为《the most thinking people of the world》（“世界上最有思想的人民”）的约翰牛开始思考、发牢骚，并且埋怨英国陆军和海军不该充当一种供那个祖传的、天赐的“军事天才”作试验的 *corpus vile*（毫无价值的东西）。

今天的“先驱晨报”十分肯定地说，召回远征军是因为波拿巴又被从南面强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冒险思想迷住了。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土伊勒里宫的军事天才被这种固执的念头所控制，但

① 直译是：“机器神”（在古代剧院中，扮演神的演员是借助于特别的机械装置而出现在舞台上的）；转意是：突然出现的挽回局势的人。——编者注

是我们不能相信，甚至连佩利西埃这样一个普通的《sabreur》（“武夫”）也能执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毁灭性计划。因此我们认为：曾经通过了 en masse（全部人马）渡过黑河的决定，把 12000 人的队伍分成小队的分散兵力的做法被认为是冒险的。的确，不应该把这 12000 人分成小队，相反地，应当在发动前让 15000—20000 名土军在叶夫帕托利亚坐上军舰去同主力军会合，而在那里只留下防守这个地点所必要的守备部队。正像过去一篇通讯中指出的^①，战局的胜负完全取决于疲过黑河的军队的人数。无论如何，召回刻赤远征军又一次证明了这位在摸索行动的门外汉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可是现在这些都被当做 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了。

同时，为了 coup d'état（政变）的需要而赶制出来的英雄们都飞快地退出舞台了。这帮英雄中头一个是埃斯潘纳斯，在他不光彩的多布鲁甲进军¹⁵⁸之后，朱阿夫兵迫使他拚命地逃往巴黎了。正是这个埃斯潘纳斯，在他负责保卫国民议会大厦的时候，把大厦交给了敌人。¹⁵⁹往下数第二名是勒卢阿，alias（换言之）圣阿尔诺，12月2日的陆军大臣。随后是福雷，此人在迫害法国东南部的不幸农民时非常勇敢，而对俄国人却又异常殷勤和人道。军队中有人怀疑，他曾把法国军事委员会的秘密泄露给俄国人，因此不得不把他从克里木调到非洲去。最后一个是由于明显的无能而被降级的康罗贝尔。历史真会捉弄人，佩利西埃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英法联军的统帅。关于这位佩利西埃，1841年在议会里，在伦敦军官俱乐部里，在省群众大会上，

^① 见本卷第 197 页。——编者注

在“泰晤士报”和“笨拙”上，人们反复地说过，永远不会有有一个正派的英国军官能和这个“怪物”（《that ferocious monster》）在一起服务的。而现在英国军队不仅同他一起服务，而且整个英国军队要听从他的指挥！当辉格党人和它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被托利党人推翻的时候，帕麦斯顿在梯维尔顿召集了自己的选民，并向他们证明说他有权废除英法同盟而同俄国联合，理由是法国政府、路易-菲力浦竟任用像佩利西埃这样的“恶棍”！应该承认，如果法国军队为自己的十二月叛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末同复辟帝国结成的联盟给英国带来的也不光是“玫瑰花”。

昨天内阁在下院遭到了失败，这种失败只是证明议会往往由于 out of doors（在议会外）受到鄙视而向大臣们进行报复。有一位魏兹先生提出了一项提案：

“本院认为，必须按照 1850 年选出的官员薪俸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办法来全面检查我们的外交机关。”

魏兹先生是帕麦斯顿的朋友。他的提案两年来几乎一直列在下院的议程里面，但是一直没有进行讨论。昨天正是使不满的下院注意它的好机会。魏兹发言了，他打算在帕麦斯顿提出某些意见后再玩弄老一套花招，撤回自己的提案。然而贝利先生却不管这种协定，竟支持魏兹所撤回了的提案，并违反魏兹和帕麦斯顿的心愿，以 112 票对 57 票的多数通过了这项提案。这次失败丝毫没有使帕麦斯顿这样一个老的有经验的策略家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议院为了维持自己外表的独立性，有时不得不判处内阁的提案以死刑而给反内阁的提案以生路。相反地，迪斯累里的提案¹⁶⁰倒像是对大臣席发出的一个晴天霹雳。帕麦斯顿本人，这个议会喜剧的老手祝贺“这场无与伦比的戏的作者和演员”。这不是讽

刺。这是一个艺术家对在同一领域内战胜了他的对手所给予的情不自禁的称赞。在星期一的会议上，帕麦斯顿非常巧妙地同米尔纳·基卜生、格莱斯幅、赫伯特、布莱特和魏恩勋爵玩了一套把戏，看来，把关于对外政策的一切辩论推迟到三一节假期以后是有保障的了，内阁和议院的既定的行动方针是保下了，高贵子爵本人的许多星期的独裁也定下了。辩论还可能进行的唯一的一天是星期四，可是已经预先规定用来讨论累亚德关于改革的提案。这样一来，谁也不能妨碍帕麦斯顿在三一节假期内签订和约，并且就像他不止一次地做过的那样，再以自己的一个臭名远扬的条约来使再次开会的议院大吃一惊。议院方面也可能不会反对这种安排得如此巧妙的意外遭遇。背着议院签订的和约，甚至是 a tout prix（不惜任何代价）的和约，也可能被议院通过，不过为了面子，议院会提出一些 post festum（事后的）抗议。但是，如果内阁和议院不得不在假期以前发表意见，内阁就不能使议院措手不及了，而议院也不能让自己遭到意外了。这就说明了迪斯累里站起来提出自己的提案而累亚德又把自己的那一天让给他时所产生的混乱局面。因此，按“邮报”的论断，这个“累亚德和迪斯累里之间的秘密勾结”打乱了还“没有结束的维也纳会议”“闭幕”以来所玩弄的一切诡计。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26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41 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帕麦斯顿勋爵官邸演出的喜剧
序幕。——克里木最近
事件的经过¹⁶¹

伦敦 5 月 24 日。当迪斯累里的建议刚一提供了在下院内 Ins（政府）和 Outs（反对派）之间目前这场搏斗的前景时，帕麦斯顿就决定敲起警钟，在开会前几小时把几阁的追随者们以及皮尔分子、曼彻斯特学派和所谓“独立党人”邀请到他的唐宁街官邸来。到了 202 位议员，其中包括累亚德先生，他感到自己无力抗拒内阁妖魔的迷人的召唤。帕麦斯顿运用了外交手腕，认错，道歉，抚慰和劝说。他含着微笑恭听了布莱特、娄和累亚德的训导。他让罗伯特·格娄弗诺勋爵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去同“激动的”议员们商谈。自帕麦斯顿在他的官邸中看到不满分子同他的拥护者一起聚集在他周围的时候起，他就明白，他们对他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们情绪不好，但都渴望和解。下院会议的结局就这样预先安排好了；剩下的只是在公众面前演一出议会喜剧。紧张局面已经过去。喜剧的最后一幕一演完，我们就将对这出戏作简短的介绍。

随着温暖而潮湿的 weather 的到来，克里木春季和夏季所常见的

疾病又蔓延开来了。霍乱和间歇热又出现在联军的兵营里；虽然流行病暂时还不很厉害，但是足以成为对未来的警告。在赫尔松涅斯，尸体只埋了几英寸深，到处可闻到大批腐烂尸体散发出的臭气。同时，围攻部队的精神状态也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围攻部队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冬季战役的困难和危险，兵士中间之所以还能保持一定的秩序和士气，只是由于春季的来临和依靠一再提出的迅速地胜利结束围攻的诺言；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俄军已推进到自己防线以外的地方，并在双方争夺的地区筑起了多面堡。朱阿夫兵不再服从指挥了，因此于2月23日他们被派到萨逢山去送死。此后，联军将领们开始表现出一点灵活性——这还不能称为积极性；但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坚决贯彻任何坚定的计划。法国兵士中间的哗变情绪像过去那样抑制了下来，这是因为俄军以经常的出击来打扰他们，还因为开始了第二次轰击，而这次轰击似乎一定会以神奇美妙的总强攻而告终。但结果却一败涂地。此后，便开始了缓慢而艰苦的、不能带来显著成绩的、但为维持士气所必要的挖壕作业。兵士们很快就厌恶这种在战壕里的夜间格斗，因为在那里死了好几百人却没有取得任何显著成果。又开始有人要求强攻，而康罗贝尔又不得不许下诺言，虽然他早知道诺言是不可能兑现的。佩利西埃以5月1日举行的夜袭，把他从再次出现的哗变局面中救了出来。据报道，佩利西埃是不顾康罗贝尔的命令而举行夜袭的，当康罗贝尔的命令到达时，部队已经投入了战斗。据说，这次成功的攻击又提高了兵士的情绪。这时候，皮蒙特预备部队开到了；赫尔松涅斯驻满了军队。军队认为，他们得到增援以后，就可以转入直接行动。当时必须采取一种措施。曾决定派远征军去刻赤，远征军也启程了。但是，在远

征军到达刻赤停泊塌以前，从巴黎拍来了电报，责成康罗贝尔召回远征军。当然，腊格伦是同意这一点的。而这支远征军的不列颠陆军和海军司令布朗和莱昂斯曾央求法国同事不顾这道反命令而去攻打要塞。但是白费力气。远征军不得不撤回。这一次军队的愤懑情绪已经不可遏止了。甚至连英国人说的话也完全不是模棱两可的了；法国人则几乎要哗变了。这样一来，康罗贝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不再指挥军队，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任何权力和任何影响。佩利西埃是他的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因为兵士早已讨厌在波拿巴主义的温室里栽培出来的将军，屡次要求换上过去在非洲受过训练的军事长官。佩利西埃得到兵士们的信任，但他是在困难的条件下接受最高统帅的职务的。他必须行动，不得延误。既然强攻没有可能，那末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俄国人进军，而且不应采用我们以前谈过的办法，即全军沿着**仅有的一条**并且由俄军大力防守的道路前进，而应把军队划成分队，沿着无数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羊和牧人才能通过的小山道前进；这样，就可能从翼侧迂回俄军阵地。但这里有困难。法军拥有的运输工具大约能载运3万人，而且只能运到离岸不很远的地方。至于英军的运输工具，如果用它们来运一师人，运到黑河的乔尔贡不远的地方，看来就再无所余了。很难设想，在这种缺乏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可以开始进军，在顺利时封锁北区，把敌人追击到巴赫契萨赖并同**奥美尔—帕沙**取得联系。况且，俄军照例都会设法做到除了残垣断壁以外什么也不留下的；要保证军队有大车、马匹、骆驼等等，只有在联军使俄军遭到决定性失败之后才有可能。我们且看佩利西埃是怎样摆脱这些困难的。

以前我们已经指出过同任命佩利西埃有关的一些奇怪

的情况^①。但是，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点。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担任总司令职务的是圣阿尔诺，一个 *par excellence* (真正的) 波拿巴主义的将军。他是这样为自己的皇上效劳的：上任不久便死了。在头等波拿巴主义者中间，无论马尼扬或是卡斯特朗，无论罗格或是巴拉盖·狄利埃，一个都没有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却任用了康罗贝尔，一个对波拿巴主义的修养不深、资格也不老、但具有丰富的非洲经验的人。现在，指挥官又在更换，正像 *de la veille* (昨日的) 波拿巴主义者一样，*du lendemain* (明日的) 波拿巴主义者也是没有分的。这个职位给了一个普通的非洲将军，他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色彩，但服军役多年并且在军队中颇有名气。沿着这条线下去，将来是否必然会轮到尚加尔涅、拉摩里西尔或卡芬雅克即波拿巴主义队伍以外的将军呢？

“没有能力进行战争，同样也没有能力签订和约，——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一位把整个命运同帝国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国家活动家在几天以前这样指出过。复辟的帝国的每一个步骤，包括任命佩利西埃在内，都证明他是正确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4月24日
载于1855年5月29日“新奥得报”
第243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
6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1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① 见本卷第271—272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议会改革。——维也纳会议的中断
和恢复。——所谓歼灭性战争

伦敦 5 月 26 日。关于帕麦斯顿前天在下院举行会议前召集的 Comité du Salut Ministériel (拯救内阁委员会)，大家已经知道了某些细节，这些细节说明了议会机构的性质和给予内阁以 100 票多数的各个不同派别的态度。帕麦斯顿一开始就威胁说：如果迪斯累里的提案被通过，他就要辞职。他以成立托利党内阁的前景相威胁。所谓激进的议员们，poor fellows (可怜虫们)，从 1830 年起就享有这样一种特权：每当他们开始哗变时，就受到这种最后的可怕威胁。而这种威胁每一次都使他们屈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在托利党组阁时必然要发生的群众运动。一位激进主义者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的自白可以证明这个论断是多么的正确。这位激进主义者本人现在就是一位大臣——虽然只不过是一个王室森林大臣。这个职位完全适合于一个生来就具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天才的人。作为伦敦一个区——南威克的代表，他接到了他的选民们邀请他出席上星期三在南威克举行的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的请帖。(请注意：正像过去在国内各地举行的大多数群众大会一样，在这次群众大会上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说，不预先进行议会改革，要求行政改革就是一种虚伪和欺骗。)摩耳斯

沃思没有出席这次群众大会，但是送发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这个激进主义者和内阁阁员写道：“如果迪斯累里先生的提案被通过，那末行政改革的必要性就更加明显了。”这种“明显”意味着：如果托利党人组成内阁，那末改革运动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以辞职相威胁并不是帕麦斯顿的主要法宝。帕麦斯顿暗示要**解散议会**，暗示了仅仅在三年前不惜巨大牺牲才在“值得尊敬的议院”中给自己买到席位的许多倒霉的议员们所要遭到的命运。这个论据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在已经不是他辞职的问题，而是**他们辞职**的问题了。

帕麦斯顿对一些人用**自己辞职**，对另一些人用**他们被赶出下院**这种办法进行威胁，他给一些人揭示和平的前景，给另一些人又揭示战争的前景，因此，较之迪斯累里提案，他获得了100票的多数。但是，已经恢复了的联合现在又重新解体了，而且正好是在事先排练好的喜剧在公众面前演出的时候解体的。大臣们在辩论过程中被迫发表的声明抵销了他们 *en petit comité*（在小圈子内）所发表的声明。把各个固执己见的派别联结在一起的水泥不是被一阵飓风，而是被一阵议会的微风吹得四分五裂了。情况是这样的：罗巴克在昨天的会议上就有关恢复维也纳会议的谣传向首相提出了质询。他希望知道，有没有委派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参加这次会议。然而大家知道，自从不走运的外交家罗素从维也纳回来以后，帕麦斯顿就借口不应妨碍“虽然中断了但决没有结束的维也纳会议”而拒绝任何有关战争和外交问题的辩论。上星期一，米尔纳·基卜生撤回了（确切些说是搁下了）他的提案，因为依照高贵的勋爵的声明，“关于会议的问题尚未决定”。同时，帕麦斯顿特别强调指出，英国内阁已经让**奥地利**——“在一定程

度上是我国的盟友”——去寻找和平谈判的新的出发点。他说，维也纳会议将要继续召开，这是无容置疑的。虽然罗素离开了维也纳，但是威斯特摩兰还留在那里，此外，各大国的大使还在维也纳商谈；因而继续不断地举行会议的一切因素是存在的。

但是，自从星期一帕麦斯顿赐与议会这些启示以后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星期一的帕麦斯顿和星期五的帕麦斯顿之间出现了迪斯累里的提案和对这个提案的辩论日；迪斯累里说明他的提案的理由是：担心在议院休会期间，内阁可能“把国家拖入可耻的和平”，就像在阿伯丁执政期间国家被“拖入”可耻的战争一样。因此，表决的命运就取决于帕麦斯顿对罗巴克质询的答复。帕麦斯顿决不能在这个时候唤起维也纳会议的幽灵并对议会声称，在维也纳作决定，而在圣斯蒂凡大厅¹⁶²进行讨论，这里是提议，而那里是安排。因为罗素只是前一天才抛开奥地利、和约草案和维也纳会议的，所以帕麦斯顿尤其不能这样做。因此帕麦斯顿回答罗巴克说：维也纳会议没有恢复，英国大使在没有得到唐宁街的特别指示前不得出席任何新的会议。在这以后，米尔纳·基卜生怀着极其愤懑的情绪发了言。几天以前，高贵的勋爵曾经声明，会议只是暂时休会，威斯特摩兰拥有无限的权力来进行谈判。难道他的这些权力被取消了吗？什么时候被取消的呢？——帕麦斯顿答道：权力是有的！他的权力仍然像以前一样是无限的，但是他没有权利利用它。拥有权力和有权利用它——这不是一回事。帕麦斯顿对罗巴克质询的答复破坏了内阁同那依靠皮尔分子壮大起来的^{of} ^a tout prix（不惜任何代价）谋取和平的主和派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误会”。迪斯累里前天磨难和盘问了罗素几个小时，用烧红的针去刺他。迪斯累里一只手指出

了这个阿西德克辉格党人通常披挂着的外表美丽动人的狮子皮，另一只手指出了隐藏在这块狮皮后面的用马来树胶做成的小人。罗素虽然由于他多年的议会经验和冒险行为，就像无法伤害的齐格弗里特那样顶住了这些尖锐的言辞，但是在这种对他的真正的“我”作了无情揭露的情况下，他终究不能保持平静。他在迪斯累里发言时丑态毕露。当格莱斯顿在迪斯累里之后进行他的说教时，罗素在自己的席位上一直坐立不安。格莱斯顿的话一有停顿，罗素就站了起来，他听到会场上发出的笑声，才意识到还没有轮到他发言。最后，格莱斯顿结束了他的发言，罗素终于能够畅所欲言了。罗素向议院陈述了他恰当地向哥尔查科夫公爵和提托夫先生隐瞒了的一切东西。他在维也纳会议上维护了俄国的“荣誉和尊严”，现在据他看来俄国是一个不可抑制地力图统治全世界的强国，它缔结条约是为了替掠夺性战争制造借口，它进行战争是为了以后用条约来毒化气氛。在罗素看来，不仅英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受到了威胁，因此除了歼灭性战争以外别无出路。他还暗示到了波兰。简单说来，维也纳的外交家突然变成了“下流的蛊惑家”（这是他所喜欢的用语之一）。迪斯累里巧妙地促使他作了这样一篇过甚其辞的发言。

在**表决以后**，皮尔分子詹姆斯·格莱安爵士马上发了言。他没有听错吧？罗素向俄国宣布了“新的战争”，这是一次十字军远征，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一场民族的战争。问题十分严重，以致不能不继续辩论了。他说大臣们的意图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不明确。罗素以为在**表决以后**他照例可以脱下狮子皮。因此他决定采取不客气的态度。他说格莱安把他“**误解**”了。他只是希望“土耳其平安无事”。于是迪斯累里高喊道：请看吧，你们这些人否决

了我的提案，撤销了对内阁“口是心非”的指责，现在请欣赏一下他的诚意吧！这位罗素在表决以后背弃了他在表决以前的讲演！我祝贺你们和你们的表决！

在这种《demonstratio ad oculos》（“明显的证据”）面前，议院的会议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辩论被延期到三一节休假以后举行；内阁所取得的胜利转瞬间又成了泡影。本来打算喜剧只分两幕并以表决而告终。现在又增加了一场尾声，而这场尾声又有比演出的主要部分显得更为重要的危险。然而议会假期倒使我们有可能更详尽地来分析前面的两幕。辩论在表决以后反而具有了严重的性质，这是议会史册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直到目前为止，议会斗争通常都是以表决而告终的，就像恋爱以结婚而告终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30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45 号

卡·马克思 迪斯累里的提案

伦敦 5 月 28 日。按照文雅的格莱斯顿的说法，大家向下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菜单”——要在迪斯累里提案和贝林对迪斯累里提案的修正案之间、在威·希斯科特爵士对贝林修正案的 *sous-
amendement*（补充修正案）和娄先生旨在反对迪斯累里、贝林和威·希斯科特爵士的 *contre-
sous-
amendement*（对补充修正案的反修正案）之间进行选择。迪斯累里的提案包括对大臣们的谴责和送呈国王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奏本：第一个问题谈得明确，第二个问题谈得含糊不清，两个问题是靠只有议会的思维过程才能理解的那种关系彼此连结在一起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奏本之所以采取怯懦的形式，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解释。迪斯累里担心在自己的阵营里引起愤懑。一位托利党人格兰比侯爵表示**反对**这个奏本，另一位托利党人斯坦利勋爵则表示**赞成**，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和平拥护者。贝林的修正案是**内阁**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不同意对内阁进行谴责，而原封不动地接受迪斯累里提案中的军事部分，只不过在前面加上了这样几个字：议院“遗憾地确认，维也纳会议没有导致军事行动的停止”。贝林同时泼了两瓢水，一瓢是热的，一瓢是冷的。“遗憾”——是对主和派说的，“继续战争”——是对主战派说的，内阁对这两派都没有明确的义务——这既是对白

票、也是对黑票设下的 shell trap (圈套, 陷阱), 既是给长笛用的乐谱, 也是给长号用的乐谱。希斯科特的 sous-amendement (补充修正案) 用纯粹是安宁闲逸的词句来补充吴林的模棱两可的修正案, 它增加了这样一些字: “议院仍然抱着 (cherishing——这完全是不会得罪人的说法) 希望, 继续举行的会议将获得成功。”相反地, 娄的修正案却声明和平谈判是由于俄国拒绝第三项条款而结束的, 并且以这一点来论证送呈国王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奏本。我们看到, 内阁的折衷主义修正案中所企图掩饰和中和的两个部分, 是和平地相互对立着的。希斯科特高喊: 继续举行维也纳会议! 娄回答: 不要举行任何维也纳会议! 贝林低声说道: 要举行维也纳会议, 也要继续进行战争! 这部三重唱曲的主题的发挥, 我们过一个星期就能听到, 现在我们回过来谈一谈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头一个晚上对这个提案发表意见的只有三个主要的政界要人, 即**迪斯累里**、**格莱斯顿**和**罗素**: 第一个人的发言尖锐而中肯, 第二个四平八稳而善于论辩, 第三个——枯燥无味而又杂乱无章。

我们不同意说迪斯累里由于个人反对罗素而忽视了“问题的实质”这种指责。俄英战争的秘密不应当在战场上寻找, 而应当在唐宁街寻找。罗素是接获彼得堡内阁的秘密通知时期的外交大臣, 是最近维也纳会议期间的特命全权代表, 同时又是下院的首领; 他是唐宁街的活的化身, 是唐宁街的**被揭开了**的秘密。这不是因为他是内阁的灵魂, 而是因为他是内阁的喉舌。

迪斯累里谈到, 在 1854 年年底, 罗素曾经在议院全场热烈掌声下耀武扬威地宣称:

“在没有得到足以把俄国的实力限制在对欧洲无危险的**范围**以内并从而保证未来的完全安宁的这种**物质保证**以前, 英国不能放下武器。”

而这个人就是同意 1853 年 12 月 5 日维也纳议定书的那个内阁的成员。在这份议定书中，英法代表曾作了保留声明：战争不应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物质条件”的削弱或改变。克拉伦登在答复林德赫斯特提出的关于这个议定书的质问时，曾以内阁的名义声明：

“不允许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实力，这可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愿望，但不是法国和英国的愿望。”

迪斯累里说，罗素在下院把尼古拉皇帝的行为形容成“虚伪的和阴险的”。1854 年 7 月，他吹嘘说即将攻入克里木，并声称，破坏塞瓦斯托波尔对欧洲是必要的。最后，他推翻了阿伯丁，因为在他看来，阿伯丁把战争进行得太无生气了。狮子皮的外表看起来就是这样的，——现在来谈谈狮子本身。在 1853 年的两三个月内，即在英国从彼得堡获得“秘密的和机密的信件”时期，罗素是外交大臣。在彼得堡的秘密信件中，尼古拉公然坚持要瓜分土耳其，其借口首先是要保护在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而这种保护，就像涅谢尔罗迭在最近一次急电中所承认的，是向来都不存在的。罗素做了些什么呢？他给英国驻彼得堡大使拍去了一份急电，其中有下面这一段话：

“土耳其政府愈是遵循公正立法和正义管理的策略，俄国皇帝就愈认为没有必要行使自己的专有**保护权**，因为他认为行使这种权利是十分沉重和不方便的，虽然这种保护无疑是他应尽的义务，而且是被条约神圣化了的。”

由此可见，罗素事先就在这个争执点上作了让步。他声称保护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应尽的义务。这种保护是他从凯纳吉条约引伸出来的。而维也纳会议的“第四项条款”谈的是什么呢？它谈的是“对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错误解释乃是目前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宣战前，我们看到罗素扮演了维护俄国权利（现在

连涅谢尔罗迭也放弃了这种权利)的角色,而在战争第一个阶段结束时,在维也纳会议上,我们又看到罗素扮演了维护俄国荣誉的角色。3月26日刚接触到问题的实质的时候,即刚开始讨论第三项条款的时候,反对俄国的罗素就起来郑重地声明:

“在英国及其盟国看来,最好的和唯一许可的媾和条件,就是那些能同俄国的荣誉和尊严最好地协调同时又能保证欧洲的安全等等的条件。”

因此,4月17日俄国代表拒绝主动提出有关第三项条款的建议;在罗素发表声明以后,他们深信:同盟国代表提出的条件将比俄国自己所能提出的条件更符合俄国的精神。但是,限制俄国的海军实力难道就是“同俄国的荣誉最好地协调”吗?因此涅谢尔罗迭在最近一次通告中牢牢抓住罗素在3月26日发表的声明。他引用了罗素的话。他问罗素,4月19日的建议是否是“最好的和唯一许可的”?在战争前夕,罗素扮演了俄国庇护者的角色。在战争第一个阶段结束时,他又在布奥尔伯爵宫殿里的会议桌旁扮演了俄国庇护者的角色。

迪斯累里反对罗素的发言就是这样。后来他解释战场上的失利和国内的不满情绪的原因是内阁采取了自相矛盾的行动:内阁在克里木的行动是有利于战争的,而在维也纳的行动却有利于和平,从而把尚武的外交同外交化的战争结合了起来。

他高声喊道:“我不认为,只要征税和装备远征军就足以进行战争了。必须支持人民的情绪。但是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经常在使国家相信:你们是致力于和平的,大家所争论的那一项条款的意义毕竟是比较小的。如果人们确信将要同一个强大的敌人较量,那末他们就会去作巨大的牺牲。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参加的斗争是一场涉及国家的荣誉、生存和强盛的斗争,那末他们就会去作巨大的牺牲。如果你们把所得税增加一倍或两倍,如果你们驱使人们离乡背井去服兵役,如果你们用血战的消息来引起英国人心灵的

忧郁，如果你们做了这一切，那末人民就不应当听到，全部问题在于俄国在黑海是不是要有四艘或八艘巡航舰……要顺利地战争，不仅需要支持本国的情绪，而且需要支持其他国家的情绪。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你们向别的国家呼吁，请求它充当调停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永远也不会成为你们的盟友了……帕麦斯顿勋爵保证他不会签订可耻的和约。高贵的勋爵替他自己担保，可是谁又能替高贵的勋爵担保呢？……你们依靠维也纳会议是不能摆脱困难的。你们利用外交只会增加危险和困难。你们在各方面所采取的态度都是错误的，要是你们得不到相信你们有决心的热情奋发的人民和盟国的支持，你们永远也不能顺利地进行进攻性战争。我希望议院今晚进行表决，结束这种错误的两面手段，即同时采取战争和外交的手段；我希望议院公开而明确地声明：谈判的时机已经过去。我认为，凡是看过涅谢尔罗迭通告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5 月 31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47 号

卡·马克思
* 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
提案的辩论

伦敦 5 月 29 日。格莱斯顿的演说术从来还没有像他在星期四晚上的 speech (演说) 中表现得那样完美无缺。文雅, 流畅, 玄奥, 甜蜜而又含毒素, 柔软而又强硬, 带有经院哲学的色彩, questiones 和 questioniculae (有大问题, 也有小问题), 或然主义的全部武器都使用上了, 既讲诡辩的良心, 也讲没有良心的保留, 有不容置疑的理由, 也有理由充分的怀疑, 温文尔雅的优越感, 合乎道德的阴谋, 诡计多端的朴实, 既谈拜占庭, 又谈利物浦。格莱斯顿的演说与其说是围绕着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下面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久以前还是主战内阁阁员的格莱斯顿现在变成了不惜任何代价谋取和平的主和派信徒? 他作了分析, 他从各方面研究了自己的良心界限, 并以他特有的谦虚态度来要求不列颠帝国在格莱斯顿的良心范围内进行活动。因此, 他的演说带有外交心理的色彩, 如果说这种色彩把良心的因素带进了外交, 那末在更大的程度上, 也把外交的因素带进了良心。

对俄国进行的战争, 据说最初是正义的, 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继续进行下去, 那就有罪了。自从东方局势开始复杂化以来, 我们不断提高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条件愈提愈高, 而

俄国却步步退让。最初,俄国不仅要求对信奉正教的土耳其基督徒建立宗教保护关系,而且还要对他们建立世俗的保护关系,它不愿意放弃任何旧条约,甚至不愿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俄国拒绝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任何大国会议,而建议土耳其大使到圣彼得堡来,或者到俄国大本营来。这是俄国在1854年2月2日的论调。西方列强当时的要求和四项条款有多大的差别呀!就在1854年8月26日,俄国还声明,它决不能同意接受这四项条款,而宁愿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无益的斗争。俄国在1854年8月和1854年12月的论调又有多大的差别呀!1854年12月它已经保证“无条件地”接受这四项条款了!这四项条款是我们所提出的要求的最高限度,同时也是俄国所能作出的让步的最高限度。所有超出这四项条款范围以外的东西,都超出了基督教道德的范围。就算这样吧!俄国接受了第一项;它也接受了第二项;它并没有拒绝第四项,因为第四项没有讨论。这样一来,剩下的只有第三项,因而只剩下四分之一的问题有分歧,甚至有分歧的不是第三项全部,而只是第三项的一半,也就是说,只在八分之一的问题上有分歧。问题在于:第三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第二部分的内容是削弱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威力。对于第一部分,俄国或多或少表示了谅解,因此剩下的只有第三项的后一部分。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也表示不反对限制它在海上的统治,它所反对的只是**我们实行这种限制的方法**。西方列强只提出了一个方法。俄国提出的不是一个,而是另外两个方法;这就是说,在这方面俄国也走在西方列强的前面。西方列强所提出的方法,是有损俄罗斯帝国的尊严的。但是,不减弱国家的力量,就不能损害国家的尊严。另一方面,决不能减弱国家的力量,因为这样做,就将损害它的尊

严。在考虑到一切“方法”的同时，依靠一种方法就可以使八分之一的分歧变成三十二分之一的分歧，对于这种“方法”是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但是难道应该为这点再牺牲 60 万人的生命吗？恰恰相反，应该声明，我们已经达到了战争的目的。难道我们应该仅仅为了**威信**，为了作战的光荣而继续战争吗？我们的兵士已经使自己获得了荣誉。可是英国在大陆上已经威信扫地，

值得尊敬的绅士叫喊道，“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因为这种威信扫地而让人类去流血，应该向国外发出更确实的消息来恢复人们对英国的信任”。

的确，为什么不去“纠正”国外的报纸呢？联军的进一步胜利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它们的胜利会迫使俄国更顽强地反抗。假如联军失败了，那又怎样呢？它们的失败会引起伦敦和巴黎居民的愤慨，从而迫使联军采取更坚决的进攻。这样，为战争而战争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最初，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和英国对俄国的要求是**一致的**。现在普鲁士已经退到一旁了。如果今后还坚持战争的话，奥地利也会退到一边去的。同英国站在一起的就只剩下一个法国了。

如果英国根据那种除了法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意的理由而继续战争的话，那末“它的立场的道德威信就会大大削弱和动摇”。反之，如果英国同俄国缔结和约，即使这个和约有损英国得自这个世界的**威信**，那就会增强它的“道德威信”，而这种威信是蛀不坏、锈不了的。此外，不同意用俄国的方法来实行第三条款的后一部分的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是要瓜分俄罗斯帝国吗？不引起“民族战争”，这一点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奥地利是否愿意而法国是否可能支持这种民族战争呢？如果英国想挑起“民族战争”，那末它不得不单独进行这个战争，而这意味着

“它根本不敢进行这个战争”。因此,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提出俄国可以同意的那些要求。

如果不按字面而按精神实质来看,格莱斯顿的演说就是这样。俄国开始用另一种论调讲话了;这证明它实际上已经让了步。在可尊敬的皮由兹分子看来,言语是唯一的问题。他也开始用另一种论调讲话了。现在他因战争而诉起苦来;全人类的灾难使他感到精神痛苦。当谴责调查委员会的时候,他作了辩护性的发言,并认为英国军队遭受饥饿和鼠疫的重重灾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军队是为和平而作出牺牲的!自从军队为战争作出牺牲的时候起,罪恶就开始了。然而,格莱斯顿成功地证明,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同俄国作战的问题;他成功地证明,无论现在的英国政府还是现在的法国政府都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同俄国认真作战;他成功地证明,战争的借口是不值得一驳的。格莱斯顿只是忘记了,这些“借口”原是他和他以前的同僚捏造出来的,英国人民迫使他们进行了这个“战争”。对他们来说,指挥这个战争只是为了拖垮这个战争和保持住自己职位的一个借口。而从他们借以进行战争的虚假借口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格莱斯顿又成功地得出结论说:他们就在这些虚假的借口下也可以缔结和约。他同他的老同僚只是在一点上有所不同。他是 Out (反对派),而他们是 In (政府)。但是,适用于前任大臣的虚假借口,并不是适用于现任大臣的虚假借口,尽管加在母鹅肉上的调味汁也就是加在公鹅肉上的调味汁。

格莱斯顿的这种极度混淆概念的做法,正是罗素期待已久的信号。他站立起来,不顾企图替俄国辩护的格莱斯顿,开始对俄国进行诽谤。然而格莱斯顿是《Out》,而罗素是《In》。罗素大声

疾呼地重复了一切众所周知的、虽然是庸俗的但却是正确的关于俄国征服世界的计划的一般说法，然后他就转入本题，即罗素的本题。他说，从来也没有过一个如此重大的民族问题像在迪斯累里的演说中那样被贬低到这种地步。的确，把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甚至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和一个矮小的约翰，即约翰·罗素等同起来，难道还能够比这更轻视这个问题吗？在战争第一阶段开始和结束时，都是欧洲 contra（反对）俄国，正像罗素 contra 涅谢尔罗迭一样，这并不是迪斯累里的罪过。这个矮小的人物在接触到四项条款的时候，非常滑稽地竭力设法摆脱窘境。一方面他必须指出，他的媾和条件是与他自己所描绘的俄国的可怕情况相符合的；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指出，他是忠实于他自愿地、没有任何强制地向提托夫和哥尔查科夫提出的保证的，他提出的条件是能“同俄国的荣誉最好地协调”的。因此，他一方面证明，俄国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海军强国，因而很容易就会同意对这种仅仅是想像中的力量所加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断定，俄国自己沉没的军舰是对土耳其因而也是对欧洲均势的一个可怕的威胁，因此“第三项条款的后一部分”有巨大的独立意义。敌人迫使他的对手陷入进退两难的死胡同。罗素自己使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绝境。他提供了说明他的外交天才的新证据。主动和奥地利结盟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只要打一个败仗，就会使俄军进入维也纳，他就是这样来鼓励他的同盟者之一。

他继续说道：“我们感到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进行统治的打算，因为土耳其显然走上了瓦解的道路；我也不怀疑，关于法国和英国在这个国家崩溃时所作的打算，俄国抱有同样的看法。”

不仅如此，他还补充说：“其实俄国看错了；不是英国和法国，

而是英国一个国家应当控制君士坦丁堡。”伟大的外交家就这样唤起奥地利站在英国的一边，他就这样向土耳其泄露了土耳其的朋友和拯救者所抱有的而且是“明显地”抱有的意见。罗素作为议会的策略家在一点上毕竟是满有成绩的。1854年7月他大放厥词，叫嚷克里木将被占领，当时迪斯累里把他弄得很窘，迫使他在议院投票表决以前就放弃了他的好战言论。这一次他把这种自杀行径（放弃他所宣布的全世界反对俄国的斗争）推迟到议院举行投票表决以后。真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罗素在演说中还举了两个历史例证，他对同尼古拉皇帝就凯纳吉条约进行谈判一事作了非常有趣的描述，并对德国的情况作了概述。这两件事都值得简略地提一提。正像读者所想起的那样，罗素依据凯纳吉条约，直接承认了俄国的保护制度。英国驻彼得堡大使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是一个比较不肯忍让和比较多疑的人。他向俄国政府作了探问，而罗素天真到这般地步，竟把这件事的经过情形说成这样：

“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恳请已故的俄国皇帝把条约中可以作为他提出要求的根据的那部分条文给他看。皇帝陛下说：‘我不能给您看条约中可以作为我提出要求（要求建立保护制度）的根据的那部分专门条文。请您去找涅谢尔罗迭伯爵吧，他会给您看的。’汉密尔顿·西摩尔就向涅谢尔罗迭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涅谢尔罗迭伯爵回答说，他不熟悉条约的条文，而介绍他去找布萨诺夫男爵，或者让他的政府去找他；布隆诺夫男爵会把条约中作为俄皇提出要求的根据的那一部分条文告诉他。我想，布隆诺夫男爵任何时候也不敢说出条约中的这部分条文。”

关于德国，高贵的勋爵这样讲道：

“俄国通过婚姻关系同德国为数极多的小君主保持联系。在这些君主中，不得不惋惜地承认这一点，有很多人在实行自己的统治时都对他们所预料的

臣民的革命情绪感到极大的恐惧，因此他们指望他们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然而这些武装力量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军官受到了俄国宫廷的腐蚀和败坏。俄国的宫廷授给他们勋章，发给他们奖章和奖金，在某些情况下，俄国还定期发给他们津贴以支付他们的债务，因此，德国本来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堡垒，领导欧洲防止俄国的统治，但是由于俄国的阴谋和俄国的金钱，多年来已经逐渐削弱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

所以，为了唤起德国高举火把前进，为了促使它服从“无上的命令”，履行义务，罗素在维也纳会议上宣布自己是“俄国的荣誉和尊严”的捍卫者，迫使德国来倾听这位自由独立的英国人的傲慢言词。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5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6 月 1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49 号

卡·马克思 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

伦敦 6 月 1 日。如果说格莱斯顿用看来很深奥的东西迷惑人，那末帕麦斯顿就是用显然表面的东西迷惑人。他善于在一大堆动人的词句和对目前的要求作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让步下巧妙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他在内阁的讲话一周前就为公众所知道了。日报和周刊讨论了它、研究了它、批评了它。他的敌人说，他在过去许多个月内说的都是旧阿伯丁的语言，而现在在一个晚上他却认为说旧帕麦斯顿的语言又是适时的了。他们说：高贵的勋爵为自己担保，可是谁又为高贵的勋爵担保呢？他们把他的讲话叫做巧妙的把戏，因为他成功地避免了对他的政策作任何明确的声明，并且使自己的讲话显得如此从容不迫、不可捉摸，以致丝毫不能对它有任何揭露。相反，他的朋友们却没有忘记把他用风琴作美妙动听的演奏时所掀起的那阵风宣布为音乐。他立刻正确地估计到了他自己在议院和国家面前所应处的地位。他说在我面前的是谁呢？一方面是那些认为我们进行战争不够坚决的人，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企图促使国家接受可耻的媾和条件的人；一方面是那些责备我们，说我们被拖入了同奥地利进行无益的、同时使战争瘫痪的谈判中的人，而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认为我们在这种谈判中做得还不够并且用过分的要求破坏了谈判的人。

于是，他自己就采取了中庸立场。他把战争拥护者的攻击转

给和平拥护者，而把和平拥护者的攻击转给战争拥护者。反对绝对的和平拥护者，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显露早就有意显露的爱国精神，来庄严地保证经常保持充沛的毅力，来玩弄他经常用来欺骗 niais（头脑简单的人）的所有豪迈词句。他列举了英国所拥有的巨大资源，来使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这就是他对指责他不能管理大量资源的唯一答复。

迪斯累里说：“高贵的勋爵使他想起了一位想在情人面前夸耀自己财富的暴发户：我有别墅，在城里有房子，有绘画陈列馆，有精致的酒窖。”

英国也是这样：有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每年 8000 万英镑的国家收入等等。然而在所有这些动人听闻的小事（帕麦斯顿讲话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些小事）掩盖下，帕麦斯顿成功地作了**某种声明**，以后在适当的时候他就可以回到这个声明上来，把它宣布为议院所批准的政策原则。任何一家英国报纸都没有**觉察到**这个声明，但帕麦斯顿的演说术也正是在于他善于把他讲话的真正意思掩饰起来，善于用滔滔不绝的、空洞而圆滑的词句把这种意思从听众的记忆中冲洗掉。既然帕麦斯顿不是仅仅追求片刻的成功，像什么罗素那样，既然他还考虑到将来，那他自然不满足于当前所必需的演说手段，而是用心地为以后耍弄手腕奠定基础。上述声明一字不漏地照抄如下：

“我们参加了黑海上的大规模行动，我们认为而且希望，胜利将在我们这边，我们深信，胜利将使我们争得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目前的冲突状况下认为自己有权要求的那些条件。”

因此，不论怎样扩大黑海上的行动，战争的外交基础却依然照旧。不论在军事上取得怎样的胜利，最终结局却事先已由“四项条款”所规定，所限制。这一点是帕麦斯顿在累亚德把掩饰亲

俄的那四项条款的假面具摘掉以后过了几小时声明的。但是帕麦斯顿转移了大家对累亚德批评的注意。他反驳格莱斯顿，而为第三项条款的后半条辩护，并把这半条说成是**完整**的一条，从而逃避了对真正重要问题——关于战争的任务和目的问题的考察。

有一件打断了帕麦斯顿讲话的事情是值得提一提的。英国的伪君子罗伯特·格娄弗诺勋爵责备帕麦斯顿，说他谈到军事上的胜利和估计战争的可能性时，没有考虑到上帝的恩惠和庇护，甚至“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因而他协助天神赐与自己的国家以惩罚。帕麦斯顿于是立刻开始忏悔了，并且捶打自己的胸口，以此证明，在需要时他也可以传道说教，而且翻起白眼来不会比格娄弗诺差。然而这次议会事件被人民继续发展下去了。梅里勒榜（伦敦的一个区）的公民在考彼尔街的一个学校内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群众大会，抗议“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因为这里问题涉及到选民，所以参加群众大会的有作为法案辩护人的埃布林顿勋爵和罗伯特·格娄弗诺勋爵；这个法案就是他们向议会提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依靠上帝的庇护和恩惠，而是有远见地在会场的各个地方布置了一打领取报酬的专业捧场者和捣乱者。秘密很快就被揭穿了，伪君子雇佣的走狗立即被公民们抓住并被赶出会场。“高贵的勋爵们”这时无法反抗会场上发出的吵闹声、口哨声和喊叫声，只好狼狈不堪地重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他们刚一离开会场，在他们的马车后面就跟着一批“没有领取报酬的”人群，脸上都明显地露出罪孽深重的讥笑和冷淡无情的表情。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6 月 4 日
“新奥得报”第 253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 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

伦敦 6 月 5 日。行政改革协会在帕特取得了胜利。它的候选人泰特先生（他与托利党候选人竞选）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为议员。今天自由派的报纸把这种在“合法的”英国的领域内所取得的胜利当做一件大事来庆祝。关于《poll》（“选举”）情况的公报是以不亚于关于在阿速夫海的不流血胜利的公报的那种吹嘘口气发表的。帕特和刻赤！——这就是当前的口号。但是，各种报刊（不论是主张改革的报纸，还是反对改革的报纸；不论是内阁的报纸，还是反对派的报纸；不论是托利党的报纸，还是辉格党或激进派的报纸）都避而不谈一点，这就是行政改革协会最近几天在伦敦、北明翰和伍斯特所经受的那些失败和绝望。当然，这一次的斗争并不是在特权选民集团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的。而斗争的结果也没有使西蒂区改革派的对方取得胜利。

改革协会在伦敦组织的第一次真正公开的群众大会（或者说不收入场券的群众大会）是上星期三在梅里勒榜举行的。一位宪章主义者针对西蒂区改革派所提出的决议案提出了修正案，其中说道：

“西蒂区先生们所代表的金钱贵族也像土地贵族一样坏；在改革的幌子下，他们只是力图依靠人民而钻到唐宁街去，以便在那里同寡头政治家瓜分

职位，共享薪俸和荣誉；而人民运动的唯一纲领就是宪章及其五项条目。”

群众大会的主席，西蒂区的一个大亨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他是否要把这个修正案付诸表决；第二，先表决什么，决议案还是修正案；最后，采用什么方式进行表决。听众对他的犹豫不决的态度、种种策略上的考虑和有失体面的手腕感到了厌倦，于是就宣布他不能继续主持大会，而选举厄内斯特·琼斯来代替他做主席；后来进行了表决，绝大多数人投票反对决议案，而赞成修正案。

在北明翰，西蒂区协会在市长的主持下在市会议厅举行了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针对协会的决议案也提出了和在伦敦提出的一样的修正案。但是市长断然拒绝把修正案付诸表决，而要求把“宪章”这两个字换成另一些比较体面的字。他说否则他就不当主席。因此“宪章”这两个字就改为“普选权和秘密投票”。措词上作了这种改动的修正案以 10 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在伍斯特（西蒂区改革派也在这里举行了公开的群众大会），宪章派的胜利和行政改革派的失败更为明显。这里宪章未经任何拖延就被宣读通过了。

协会由于在伦敦、北明翰和伍斯特举行的大会取得了极不利的结局，因此就不再公开诉诸 vox populi（人民的呼声），而是采用在一切最大城市里散发请愿书的办法，来向它的拥护者征集签名。西蒂区的头子同联合王国商界大亨之间的广泛联系以及这些大亨对他们的伙计、商行职员和“更小的”商务代理人的影响，无疑会使他们有可能悄悄地在暗地里给这些请愿书填满签名，然后再加上英国人民的呼声这样的题词，把这些请愿书送呈“值得尊敬的议院”。但是这些先生们如果认为依靠这些乞求来的和用阴谋诡计收集来的签名就可以吓倒政府，那末他们就想错了。政府怀着讥讽的自负心情观察到，协会的拥护者是怎样在口哨声中被赶

出 *theatrum mundi* (世界舞台) 的。政府机关报暂时保持沉默, 一方面是因为不那样它们就不得不提到宪章主义的胜利, 另一方面是因为执政阶级已经有领导行政改革协会运动的意思, 如果人民运动过于坚强的话。它们保持着“误解”以防产生这样的危险, 这种误解就是将来在某一个时候把协会的拥护者当做人民意志的代表者。这种误解正是英国的“历史”发展的要点, 谁也不像自由思想的辉格党人那样善于利用它。

宪章是一个十分简洁的文件, 其内容除了要求**普选权**外, 只提出下列五点作为实现普选权的五项条件: (1) 秘密投票 (用球来进行表决); (2) **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 (3) 支付议员薪金; (4) 议会每年选举一次; (5) 各选区一律平等。1848年法国的实验使人们对**普选权**失去了信心¹⁶³, 从此以后, 大陆上的居民就有轻视**宪章**对英国的重要性的倾向。他们没有看到, 在法国社会中农民占人口三分之二而市民占人口三分之一; 可是在英国, 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而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农村。普选权在英国所产生的效果同它在法国所产生的效果**相反**, 正像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情况相反一样。这也就说明了法国和英国对普选权的要求具有恰好相反的性质。在那里, 这是政治思想家的要求, 这种要求在某种程度上 (以他的信仰为转移) 能够得到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支持。而在这里, 这种要求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一方和人民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水岭。在那里, 它具有政治问题的性质; 而在这里, 它具有社会问题的性质。在英国, 当普选权成为人民群众的口号以前, 争取普选权的鼓动工作就已有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法国, 普选权**先**实行, 然后才开始它的历史道路。在法国, 遭到毁灭的是普选权的实践; 而

在英国，则是普选权的思想。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在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卡特赖特少校和科贝特时代，普选权还带有不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由于这种性质，普选权就成为一切不直接属于执政阶级的居民阶层的良好愿望。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普选权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在 1831 年通过议会改革所取得的那种东西的奇异的概括性表现。而在 1838 年以后，对普选权的要求在英国就不具有真正的特殊的性质。证据是：连休谟和奥康奈尔也在宪章上签了名。1842 年，最后的幻想消失了。这时洛维特做了一次最后的但是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把对普选权的要求说成是所谓激进派和人民群众的**普遍**的要求¹⁶⁴。从这时起，就不再存在对普选权实质的任何怀疑了。对它的名称也没有疑问了。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1848 年普选权在法国被理解为全民团结的口号，而在英国却被理解为战争的口号。在那里，普选权是革命的直接内容；在这里，革命是普选权的直接内容。如果追溯一下普选权在英国的历史，那末可以看到，随着英国现代社会及其永无止境的矛盾——由于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矛盾的发展，普选权逐渐地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性质。

除了官方的和半官方的政党，以及除了宪章派外，我们在英国还看到“贤人”集团，这些人对政府和统治阶级以及对宪章派都是同样的不满。他们高喊道：宪章派想干什么呢？想加强和扩大议会的无上权力，把它变成人民的政权。他们并不要废除议会制，他们是要把议会制提到更高的高度。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摧毁代议制！领导这个集团的是一位东方贤人——戴维·乌尔卡尔特。他想恢复英国的 Common law（习惯法）。他想缩小 Statute law（成文法）

的界限。他希望用地方化来代替集中。他想重新挖掘“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古老的和真正的法律源泉”。让这些泉水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灌溉和肥沃周围的土地。但是戴维至少是彻底的。他打算把现代的分工和资本的积聚都恢复到古盎格鲁撒克逊的水平，最好是恢复到东方的水平。他原籍苏格兰高地居民，根据自由选择当了切尔克斯人和土耳其人的干儿子，他能够指责文明及其各种祸害，有时甚至还能对这种文明进行批判。但是他并不像一些幻想家那样庸俗，他没有把现代国家形式同现代社会分离开来，他并不幻想与资本积聚同时存在的地方独立性和与反个人主义分工同时存在的个人特殊性。戴维——这是一位目光注视着过去、对古老英国抱着古玩家赞美心情的预言家。因此，不管他怎样肯定地和坚决地叫喊：“戴维·乌尔卡尔特是唯一能够拯救你们的人！”（几天前他就曾在斯泰福群众大会上这样呼吁过）新的英国都没有理睬他而让他站在原地不动，他应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6 月 8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61 号

卡·马克思

* 议会关于战争的辩论

伦敦 6 月 6 日。帕麦斯顿又施展了他利用议会把持外交、又利用外交把修正案都是以维也纳会议为基础的。在三一节为时一周的假期里，帕麦斯顿借口议会辩论已经结束而巧妙地回避了维也纳会议，并在奥地利面前作了表白，在议会复会时，又借口维也纳会议已经结束（他说会议还在举行只是一种传说）而巧妙地回避了辩论。维也纳会议不存在了，要求维也纳会议继续开会的修正案也就没有意义了；修正案没有意义了，关于内阁政策的辩论也就没有意义了；辩论没有意义了，内阁也就没有必要对“新”战争的趋势、任务和目的作说明了。正如戴维·乌尔卡尔特（他就是戴维老爷）所断言的，这个目的仅仅在于使联军在领教了克里木的冬季疾病后，再尝一尝克里木夏季疾病的滋味。如果说乌尔卡尔特对情况并不是全都了解，那末他对自己的帕麦斯顿却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他的错误只在于他认为秘密阴谋有无限的力量，即秘密阴谋可以影响正式的历史进程。总之，帕麦斯顿向复会的议会声明，再也没有讨论的对象了，议会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向国王送呈有关战争问题的奏本，换句话说，就是对内阁表示信任。起初，由于那些背熟了关于修正案的长篇发言和希

望贩卖自己货色的议员们的顽固态度，他受到了挫折。但是他解散了维也纳会议以后，也就使这些发言失去了它们的锋芒，而由于 horror vacui（害怕空虚）和寂寞无聊，议会终于被迫通过了他的奏本。为了摆脱这些发言，议会就抓住这个奏本。

俾的修正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了它的含义。原先它意味着维也纳会议中断。现在这个修正案意味着同意维也纳会议和内阁的外交政策，因为修正案认为罗素所提出的削减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力量的要求是战争的真正任务和最终目的。修正案对主和派来说是一块绊脚石，因为它的要求太多，对主战派来说也一样，因为它的希望太少，同时，它对内阁来说也是一块绊脚石，因为它毕竟提出了战争的目的和正式承认战争的目的问题。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和平拥护者和托利党人现在表示赞成俾的修正案继续进行辩论，而内阁却表示反对；由此就产生了帕麦斯顿想把这个修正案抛弃掉的企图。这种企图没有得逞。因此他把辩论推迟到星期四晚间的会议上进行。这样就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发表了维也纳会议的最后议定书。议定书提交给了议会。这样就突然产生了新问题，而帕麦斯顿通过自己的 dissolving views（渐淡和渐换他影的幻灯影），可以指望辩论的真正对象将从讨论中取消。

两天的议会辩论枯燥无比，冗长噜苏，毫无系统，——从事先就已失去锋芒的发言中也不可能期望得到什么别的东西。辩论的场面仍然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和平拥护者在迪斯累里的决议案表决以前是怎样向内阁献媚的，而现在又是怎样向反对派献媚的，我们指的是官方反对派。其次辩论暴露了皮尔分子和曼彻斯特学派之间的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皮尔分子公开希望在和约

签订以后治理英国，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首领，他们以此自慰。在这种情况下，皮尔分子经过长期的彷徨之后终究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而工业家们也会找到自己的职业国家活动家。但是如果和平拥护者这样地得到了格莱斯顿、格莱安之流，那末他们就失去了他们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激进的”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摩耳斯沃思大概在他出版的霍布斯的著作¹⁶⁵中读到：“理智是通过耳朵而来的。”因此他不是向理智呼吁，而是向耳朵呼吁。他做了哈姆雷特禁止演员做的事¹⁶⁶。他的残酷胜过暴君，他比罗素本人更像罗素。此外，他还在霍布斯的著作中读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能使别人失去生命。既然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延长自己的大臣生命，因此他也就按照那些能够从他那儿夺去大臣生命的人的精神讲话。看看这架计算机怎样在唱赞歌是很有意思的。甚至拜比吉在自己的“机器哲学”¹⁶⁷中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曼彻斯特郊区从男爵米尔约·基卜生的讲话单调无味，使人昏昏欲睡，内容枯燥，听了使人厌倦。看来，他在离他很近的英国工业首府学会了用最少的生产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这种人的整个外表都说明他是很无聊的。为什么他还竭力使自己的同行们开心呢？你怎样对待我，我也怎样对待你！此外，看来他把说俏皮话，开玩笑，凑热闹也算作 *faux frais de production* [生产的非生产性费用] 了，而他所属的那个经济学派的第一条法规就是要避免“非生产性费用”。布尔韦尔一方面有他的“国王制造者”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有他的“尤金·阿拉姆”¹⁶⁸的消极情绪。在以前者的精神面貌出现时，他向俄国挑战，在以后者的精神面貌出现时，他就在梅特涅的头上编织桃金娘花冠。

米尔约·基卜生、摩耳斯沃思和布尔韦尔是第一个晚上的显

著人物。科布顿、格莱安和罗素是第二个晚上的显著人物。只有科布顿的发言是值得分析的，然而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分析了。我们只想指出一点：根据他的论断，波拿巴已准备接受奥地利的最后建议。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 dirty boy (干脏活的小孩) 最近献身于《sentiments》(“感情”)、“破碎的心”和“对真理的爱”，他为他最亲近的人，即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本人辩护。他禁止纳皮尔在任何一次战役对英国舰队都是致命的这样的季节到来以前，就在波罗的海采取行动。他禁止邓达斯轰击敖德萨。这样，他就使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英国舰队失去了活动能力。他以他所装备的舰队的数量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对的。这样的舰队存在本身就是英国强大的证明。因此舰队的活动是多余的。几天以前纳皮尔给乌尔卡尔特的一个朋友寄去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乌尔卡尔特在斯泰福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这封信。此信的全文是这样的：“先生！我认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是能干出任何卑鄙勾当来的。查·纳皮尔。”

最后，罗素大显身手。他在发言的开头宣称，议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如果我们打算签订和约，那末我们能接受什么样的媾和条件？如果我们打算继续战争，那末我们继续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答案可以在维也纳会议议定书中找到，至于谈到第二个问题，即战争的目的问题，他对它只能作一个非常一般性的回答，换句话说，什么也没有回答。如果同意把“土耳其的安全”这句话当做回答，他一点也不反对。在维也纳照会里对这种“安全”作了一种解释，而在四项条款中又是另一种解释；寻找第三种解释——这不是罗素的事，而是战争的事。拿破

仑的原则是战争本身应该抵补自己的开支，罗素的原则是战争本身应该确定自己的目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6 月 9 日
“新奥得报”第 263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¹⁶⁹

星期四夜晚“亚细亚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使我们能够在昨天发表佩利西埃将军关于5月22日晚间塞瓦斯托波尔城郊会战的报告，以及关于联军于5月25日向乔尔贡挺进的可靠报道。大约有25000人在康罗贝尔的指挥下强渡了黑河，把俄军前哨赶出了俯瞰黑河右岸的那些高地上的阵地，并占领了沿河一线。因为俄军本来就没有准备在这道防线上进行会战，所以不出所料，他们退出了这一线，把所有的部队集中到因克尔芒和它东面山峦之间的坚固地区。联军由于向前推进，就把所占领的地区扩大了将近一倍，从而保证了部队人数增加后所急需的空间，打通了拜达尔盆地的道路，这将会有很大好处。恢复野战行动的第一步已经顺利完成，但紧接着就该采取一些规模更大的行动了。

5月22日的战斗是在卡兰亭湾和中央棱堡（按俄军编号为第五棱堡）之间的地段进行的。这是一场非常顽强的血战。现在从佩利西埃的报告中得知，俄军利用独立堡垒和战壕守住了自卡兰亭湾南端直到墓地、再从墓地到中央棱堡的整个地段，虽然按照英国海军部绘制的官方的攻城工事平面图来看，这一重要地段上已布满了堑壕。现在已经弄清楚，当马奇塔棱堡和中央棱堡刚受到严重威胁而掩护它们的外国工事刚被法军攻占时，俄军便把这

一地段变成了一个大型堡垒。他们用几夜的时间就构筑了几条长长的相互连接的胸墙，把整个地段都围在里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 *place d'armes*（屯兵场）即防区，部队可以在里面安全地集中，以便在法军攻击时对他们进行侧击，甚至从翼侧对法军向前突出的工事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佩利西埃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俄军会怎样迅速地构筑这种工事并且在完成土工作业后会怎样顽强地防守这些工事。因此他决定立即对他们攻击。5月22日晚，联军分两路纵队进行了攻击。左路纵队在卡兰亭湾南端附近占领了俄军的堑壕，并在这些阵地上巩固了下来。右路纵队也攻占了向前突出的堑壕，但由于敌人火力猛烈而未能巩固下来，所以被迫在拂晓时退却。次日晚，联军以较大的兵力再度进行攻击，结果获得全胜。联军占领了整个筑垒地段，并把堡篮从堑壕的这一边移到那一边，使这一地段变成为对付俄军的阵地。据说，法军在这次战斗中极其英勇，表现了过去使他们闻名于世的那种 *furia francese*（法兰西的猛劲），虽然应当承认，佩利西埃在描写他的部队不得不克服的那些困难时，是少不了要夸大一番的。

根据我们从哈里法克斯得到的消息，联军对城市的第三次炮击是从6月6日开始的，紧接着又在6月7日对马美朗和白色堡垒^①进行了强攻，并夺取了这些工事；在这方面，“亚细亚号”轮船带来的邮件没有提供新的消息，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对星期三的报道作任何补充。可是我们已经得知，在叶夫帕托利亚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有25000人调到赫尔松涅斯；显然，联军准备进行野战，因为如果打算再进行一次炮击和强攻，那末这些土耳其部

① 色楞格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编者注

队就应当留在他们原来的阵地上。但是也可以推测，联军向半岛腹地进军所必需的运输工具和粮食保障得很差。可能，佩利西埃在等待解决这些困难的时候，决定不让部队闲起来，于是就恢复了攻城的积极行动，但目的决不是为了在目前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强攻，而是想借此来保持部队的士气。

自从佩利西埃接任司令官以来，他的行为表明，他似乎决定按照自己的意见行动，而不重视路易·波拿巴头脑里可能想到的计划和方案。制定克里木战局的计划看来现在已成了巴黎的一件时髦的事情了。甚至年迈的瓦扬元帅也送去了一两份计划，可是佩利西埃却立刻回电说，既然瓦扬认为自己的计划很高明，那就让他到克里木来亲自实现它吧。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位刚强的但固执而残忍的司令官将如何行动。不管怎样，如果他确实认为甚至不需要费心把“命令”内容事先通知英军、土军和撒丁军的司令官，就可以把命令直接下达给他们的参谋长，那末联军内部很快就會发生严重的纠纷。要知道，到目前为止，联军的最高机构并不是某一位将军，而是一个包括各国军队的司令官在内的军事委员会。请设想一下：那位老元帅腊格伦勋爵怎么会服从一个法军中将的指挥！

在这时，俄军并没有白白浪费时间。由于奥地利重新采取了“观望”态度，以及预备部队和新兵也从后方开到，俄军已经能调生力军到克里木去。那里除了几个骑兵师以外，已经有步兵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早在一个半月以前就已听说，开到克里木的步兵第二军，现在真的从沃伦调往战场了，接着开去的是配属给掷弹兵军的轻骑兵第七师。这确实预示着：掷弹兵军的步兵和炮兵部队调到克里木的时刻已快到来。现在他们已经在开往沃伦

和波多利亚的途中，以便到那里接替第二军。帕纽亭将军（曾经在匈牙利指挥过配属给海瑙军团的俄军 1 个师）所指挥的第二军将开往克里木的兵力除炮兵和轻骑兵外，为步兵 49 个营，共计 5—6 万人，因为没有参加过战斗的步兵军无疑是按照战时编制补充足额的。第二军的部队将在 6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之间，也就是在很可能开始决战的时期，到达战场，因此，他们在当前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中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6 月显然将是克里木战局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月份。到 6 月底，或者至迟到 7 月底，不是俄国的野战部队被迫放弃克里木，就是联军被迫准备撤出自己的军队。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8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6 月 2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2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评克里木事件

伦敦 6 月 8 日。由于继撒丁军的 2 个师以后又调来了法军的 3 个预备师，联军已经不能再留在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这一狭窄地区了。因此，5 月 25 日，在佩利西埃将军接任司令官后不久，他们便把 20000—25000 人派到黑河，占领了沿河一线，并把俄军前哨赶出了俯瞰黑河右岸的那些高地上的阵地。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指出^①，俄军这条突出在最前面的防线并不是他们真正准备会战的地方，因此他们大概不会扼守这一地段和在这一线应战，很可能在一遭到猛烈攻击时便放弃它，以便把自己所有的部队集中到因克尔芒和它东面山峦之间的坚固地区。情况果然如此。联军由于向前推进，就把他们所占领的地区扩大了将近一倍，并打通了到富饶的拜达尔盆地的道路，这在今后将会有很大好处。可是已经取得的优越条件目前还利用得不够迅速和坚决。刚前进了一步就又停滞不前。这可能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而造成的。联军司令官之间的意见分歧也被认为是一个原因。联军在 6 月 6 日重新开始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即第三次炮击，使人怀疑联军已打算在一度积极行动以后仍然采取以往的拖延手段。但是：在炮击之后随着将进行野战的这种可能性也

^① 见本卷第 242—243 页。——编者注

并不是没有的。不管怎样，一项必要的措施（见“新奥得报”第241号^①）——把奥美尔-帕沙亲自指挥的约2万名土军从叶夫帕托利亚调到赫尔松涅斯——终于实现了。这样，联军现在就有整整20万人。只要运送粮食的组织工作和运输工具的现有数量能保证进行野战，联军有这样多的兵力，便能有把握地开始积极行动。当然，这当中还需要克服不少的困难。

我们在叙述主力军队作战经过时应当提到的另一事件，就是在卡兰亭湾和中央棱堡（按俄军编号为第五棱堡）之间的地段进行的战斗。这是一场顽强的血战。现在从佩利西埃将军的报告中得知，俄军利用独立堡垒和战壕守住了自卡兰亭湾南端直到墓地，再从墓地到中央棱堡的整个地段，虽然按照英国海军部绘制的官方的攻城工事平面图来看，在整个这一重要地段上出现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法军工事。当马奇塔棱堡和中央棱堡刚受到严重威胁而掩护它们的外国工事刚被法军攻占时，俄军便把这一广阔的地段变成了一个大型堡垒。他们用几夜的时间就构筑了几条长长的相互连接的胸墙，把整个地段都围在里面，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 *place d'armes*（屯兵场）即防区，部队可以在里面安全地集中，以便在法军攻击时对他们进行侧击，甚至从翼侧对向前突出的法军工事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为了不使俄军赢得时间以实现他们的计划，佩利西埃决定在俄军还没有完成土工作业以前立即对他们攻击。5月22日晚，联军成两路纵队进行了攻击。左路纵队在卡兰亭湾南端附近占领了俄军的堑壕，并在这些阵地上巩固了下来；右路纵队也攻占了向前突出的堑壕，但由于敌人火力猛烈，所以

^① 见本卷第271页。——编者注

被迫任拂晓时退却。次日晚，联军以较大的兵力再度进行攻击，结果获得全胜。联军占领了整个筑垒地段，并把堡篮从堑壕的这一边移到那一边，使这一地段变成了对付俄军的阵地。据说，法军在这次战斗中表现了过去使他们闻名于世的那种 *furia francese*（法兰西的强劲），虽然应当承认，佩利西埃在描写他的部队不得不克服的那些困难时，是少不了要夸大一番的。

大家知道，联军向阿速夫海的远征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主要是由英法两国舰队的轻型军舰组成的区舰队，搭载了 15000 名英、法、土军，未遭抵抗便攻占了刻赤、叶尼卡列和通往阿速夫海的海峡。这些军舰在这个内海前进，驶抵别尔疆斯克、格尼切斯克和阿拉巴特，毁坏了或者迫使俄军自己毁坏了大量储备的粮食和弹药，以及若干艘轮船和大约 200 只运输船。联军幸运地在刻赤附近截获了哥尔查科夫给该地区部队司令官的一些信件。这位俄军总司令埋怨塞瓦斯托波尔的粮食不够，坚决要求火速派出新的运粮队。原来，在整个这次战局中，阿速夫海是俄军向克里木运送储备品的主要孔道，而用来运输货物的工具则是 500 只帆船。既然联军到目前为止只发现并消灭了 200 只帆船，那末其余的 300 只大概是在更北的什么地方，即在塔干罗格或阿速夫附近。因此联军派出了一队蒸汽舰去搜索这些帆船。联军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它迫使俄军改道经皮列柯普或臭水海用既缓慢而又不可靠的兽力车运送一切储备品，并把主要仓库设在德涅泊河畔的赫尔松附近或别里斯拉夫附近，也就是说，设在比阿速夫海北部危险得多的地方。这次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远征所获得的胜利，对于联军统帅部却是一次最严重的非难。既然现在在 4 天内就取得了这样的战果，那末在去年的 9 月或 10 月——当时俄军的交通

线如受到这样的破坏，就可能被迫退出克里木和放弃塞瓦斯托波尔，——为什么不派出这样的远征队呢？

随同这支远征队一起行动的陆军部队的使命，是在必要时保护军舰，派出兵力驻守已占领的居民点，破坏俄军的交通线。这些部队的主力看来仅作为游动队以进行野战；他们应当在每个有利时机进行勇猛的攻击，然后在舰炮的掩护下退回自己的筑垒阵地，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当他们受到敌人的很大优势的兵力的威胁时，甚至再回到舰上。如果陆军部队的使命正是这样，那末他们是能够胜任愉快的，而 15000 人用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也不算太多，如果他们的使命是作为有自己作战基地的独立单位来行动，对俄军进行认真的侧敌机动，企图对克里木的腹地造成严重的威胁，那末这 15000 人（由于必须派出一些独立部队，因而兵力还要削弱）就未免太少了；这样会有很大的危险，他们将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切断、包围以至歼灭。现在我们仅仅获悉，这些部队已在刻赤登陆，目前正在加固向陆方向上的城防工事。自从俄军自动放弃苏茹克—卡列以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留在俄军手中的唯一的要塞就是阿纳帕。这个要塞由于自然条件本来已很坚固，现在又很好地加固了。我们怀疑联军现在会去进攻阿纳帕。如果他们没有速胜的把握就进攻阿纳帕，那末他们就会犯大错误。他们就会在需要最大限度集中兵力的时候把兵力分散，并且在既得的地区尚未巩固的时候把兵力浪费在对新目标的攻击上。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8 日
左右

载于 1855 年 6 月 11 日
“新奥得报”第 26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表

卡·马克思

* 英国议会中的辩论

伦敦 6 月 9 日。议会大辩论结束了，或者更确切些说，唾沫已经吐干了。贝林的提案“在议院的哄堂大笑中”无异议地通过了。这个实质上很荒谬的提案是以向国王送呈有关战争问题的奏本结束的。议院真的没有宣布战争是《une guerre pour rire》（“开玩笑的战争”）吗？或者，也许议院宣布自己是《un parlement pour rire》（“开玩笑的议会”）？不管怎样，两周辩论的真正结果并不在于通过了贝林的提案——这是一种无谓的手续，而在于哄堂大笑，在于不由自主的、礼节所不容的痉挛性动作和不顾体面的狂叫；“值得尊敬的议院”把提案和反提案，修正案和反修正案、内阁和反对派、演说、反驳、说教、推论、辛辣的讽刺和动人的誓言、和平的祈祷和好战的叫嚣、有分寸和没有分寸，自己和自己的投票统统湮没在这种气氛中。议院在自己把自己嘲笑一番之后才摆脱了令人发笑的状况。这样它就承认了，在议会这样的环境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严肃性起先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严肃性，然后这种矫揉造作的严肃性突然又以自然而然的开心作乐而告终。

任何想迫使帕麦斯顿说明内阁政策、宣布战争的任务、趋向和目的的企图最后都完全失败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能向大臣或哪怕是向熟人打听战争的目的。”首先帮助他的是和平拥护者。

你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吗？理查·科布顿就坐在这儿，他希望付出任何代价以求得和平。难道你们不认为不要付出任何代价的战争比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和平更好吗？打理查·科布顿吧！帕麦斯顿总是这样把科布顿或布莱特、格莱安或格莱斯顿置于自己和自己的对手之间的。

棉花英雄们不仅作为一块供他缝制军服的衬里来为他服务。不但如此，他还用棉花做了火药。同时，在辩论过程中表明，罗素和以前的阿伯丁一样，都是帕麦斯顿内阁的避雷针，都是内阁的神圣人物专用的避雷针。他把罗素派到维也纳去正是为了要把他变成自己的避雷针。正如以前累亚德之流宣布阿伯丁要对英勇的帕麦斯顿的《shortcoming》（“缺点”）负责一样，现在罗巴克也宣布罗素要对此负责。正如以前的皮尔分子一样，现在的罗素分子也妨碍着他的“自由的灵魂展翅飞翔”^①。就像黑林山钟似的，在他身上挂着这些钟锤，但并不是为了使他能和钟一样地走动，而是为了不正确地乱报时辰。

在一场似真似假的交锋以后，下院的一切集团都被击溃了。皮尔分子终于承认，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没有军队的军官。他们放弃了建立自己派别的要求，而公开投靠了曼彻斯特学派。在战争的第一年曾受委托指挥陆军和海军的这些人，承认了他们信仰永久和平，他们非常愚蠢地暴露了自己是联合内部的**背叛者**，这就使得帕麦斯顿—罗素又惊又喜。他们自己损害了自己。

曼彻斯特学派是真正愿意和平的，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工业战争。它追求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和英国本

^① 格·海尔维格“来自山巅”。——编者注。

土的统治地位，在世界市场上，应当使用它的武器——棉花包来进行战争；在英国本土，作为现代生产的累赘的贵族应该被消灭，作为现代生产的简单工具的无产者应该被奴役，而它本身，作为生产的领导者，也应该领导国家和占据国家职位。但是现在，科布顿却在痛骂牧师格里菲思博士，因为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上院可以不要，而布莱特则为王室子弟的命运痛哭，因为战争的破坏迫使他们自己洗自己的衬衣。他们两人都痛骂人民运动。这就是反谷物法同盟的英雄，当人民运动的波浪把他们抬高的时候，他们就说“王权的不文明的光辉”，勋爵、土地贵族等等是“生产的非生产性费用”。他们的运动，包括和平说教在内，全部要点就在于反对贵族。而现在，他们却在贵族面前痛骂群众！*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为了生命而丧失整个生命的根基）^①。曼彻斯特学派在这些辩论中放弃了自己存在的基础。

托利党人也发现了自己的营垒里存在着主和派，并且证明，他们很少保留有作为英国民族主义代表的传统，正像他们对“波拿巴王朝”很少有仇恨一样。

最后该谈谈内阁的支持者们！再也没有比慌忙地企图抓住提案这种情况更能说明他们的特点了。帕麦斯顿本人在一个星期以前曾不得不拒绝这个提案，原提案人也想放弃它，可是沃尔波尔却以托利党人的名义，格莱斯顿以和平拥护者的名义，议院则为了引起“哄堂大笑”而接受了这个提案。

“先驱晨报”收到了来自芬兰湾的下述报道：

“5月28日‘奥里昂号’在距喀琅施塔得16哩处进行了侦察。据它报告，

^① 尤维纳利斯“讽刺”。——编者注

喀琅施塔得的俄国分舰队包括 6 艘可以航行的战列舰、同等数量的几乎拆卸了索具的战列舰、13 艘按其外形判断已被改装成浮动炮台的战列舰、8 艘大蒸汽舰和大批无法计算的炮艇。在访问博马尔松德时我们发现那儿的一切仍和过去一样；俄国人根本没有着手修复工事。那儿一个居民也看不到。由于对去年和联军分舰队做过生意的那些人进行了惩罚，因而使得居民特别小心谨慎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6 月 12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67 号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¹⁷⁰

“波罗的海号”轮船带来的邮件，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最近塞瓦斯托波尔战况的官方文件。昨天我们已刊登了佩利西埃将军和腊格伦勋爵的急电，今天准备根据这些材料和其他材料继续报道一些事实。

6月6日，右翼的联军炮队重新开始轰击城市。可是这一次不是全面的轰击，而是为了立即夺取一定的地点而进行的集中射击。俄军2月23日和3月12日在这一防御地段上构筑的外围工事——色楞格多面堡、沃伦多面堡和堪察加多面堡，暂时把围攻部队及其炮队阻止在一定的距离上。在西段，即在联军的左翼，没有这样的外围工事，因而这时几乎已逼近护城壕或隐蔽路（如果那里有隐蔽路的话）的法军，也就比进展较慢的右翼部队前进得远多了。按照围攻计划，联军把正面上的两大地段——内港^①以西的市区和内港东岸的军港区——看做是两个独立的要塞，准备同时对它们强攻，因此必须加紧右翼的进攻并夺取外围工事，以便在这一方向上的部队能推进到与左翼的突出的平行壕取齐的一线。为此，必须夺取前面提到的那些多面堡和马美朗（堪察加多面堡）右面采石场的一些次要工事。正因为如此，6月7日晚，法

^① 南湾。——编者注

军在炮击 36 小时以后，开始越过基连谷向色楞格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以及向马美朗推进，而这时英军则攻击采石场。经过 1 小时的激战，联军攻占了这些工事，缴获了数门火炮，俘掳了 400 名敌军，其中有军官 13 名。双方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因此，目前这一地段上的情况几乎又恢复到了 2 月 22 日以前那样。联军攻占的这些多面堡中，以马美朗（俄军称它为堪察加多面堡^①）最为重要。它是在 3 月 12 日和以后几天内筑成的。早在那时我们就已指出这一工事的重大意义和它在战争中将起的重要作用^[71]。当前的战事已完全证实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仓卒筑成的野战工事竟把占长达围攻线的二分之一的地段上的围攻部队阻挡了 88 天，也就是说比一般围攻中足以用来两次攻克大要塞的时间还多。类似的奇迹在围攻史上只出现过两次：1807 年普军防守科尔贝克和 1813—1814 年法军防守但泽。现在我们试图解释一下这个奇迹。

随着野战部队数量的增多，沃邦时代的那种旧式的而且通常不大的工事已失去作用。胜利者的主力部队往往安然地绕过这些工事，而其游动队对它们则几乎不予理会；占领这些工事已成为后续的预备队的任务。但是，在这些大军的行进途中出现了几个大要塞的时候，军队的前进就一定会受到阻碍。拿破仑 1797 年在曼都亚附近和 1807 年在但泽附近就是这样。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当一支 15 万人的军队进入敌国时，一些小要塞不会在它的后方造成任何威胁，因为它们的守军加在一起也不足以阻挡增援部队以及从后备兵力中派来补充作战部队的预备队的前进。其次，这些兵力不大的守军也无力派出较大的队伍去搜索各个地区和破坏敌人的交

^① 指堪察加眼镜堡。——编者注

通线。如果军队在行进途中遇到了驻有 15000—25000 名守军的大要塞，那末情况就不同了；这种要塞是整个地区的防御中心；它可以向任何方向，而且向相当远的地方派出一支既能进行野战又能在遭到敌人优势兵力攻击时随时退入要塞的大部队。封锁这种要塞所花费的力量几乎同攻占它相等，因此以攻占它更为有利。

在沃邦和科尔蒙太涅工事体系的旧式要塞中，全部防御力量都集中在主墙的周围和主壕内。所有的凹角堡、眼镜堡、堡障和塔楼式内堡配置成一道防线。如果敌人楔入了这道防线，那末在数日内他就能突破全线；既然防线已被突破，那末要塞也就被敌人攻占了。显然，这种工事体系完全不适用于大要塞，因为后者本身就能阻止入侵的大军的进攻；保留这种体系就意味着牺牲守备部队，因为一旦防线被突破，要塞就毫无防护。因此必须采用另一种体系——独立堡垒体系。最先不顾当时盛行于军界的偏见而大胆主张构筑独立堡垒的是卡诺的老师蒙塔郎贝尔将军。但是，带有形成完整防御体系的独立堡垒的大要塞的构筑法，是在德国创立和改进的，而首先是普鲁士的阿斯特将军创立和改进的。他构筑了科伦、科布伦茨、波兹南、科尼斯堡以及美因兹部分地区的那些出色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标志着筑城史上的新纪元。最后，法国人也终于承认必须改用这种体系，于是建造了设计出色的第一流的带有独立堡垒的巴黎防御工事。

独立堡垒体系立即引起新防御法的诞生。大要塞守备部队的数量不得不大量增加，以致再没有必要只进行消极防御，即在敌人向斜堤前进而还未到达守军可以出击的距离以前只是消极等待。一支 20000—25000 人的守备部队，已有足够的力量到敌人的阵地上去攻击敌人。要塞和它周围的地区在独立堡垒的掩护下，已

具有营垒的性质或守备部队野战基地的性质，这时守备部队实际上已成为一支不大的野战军队。在这以前防御是消极的，而现在则是积极的；它具有了进攻的性质。采用这种防御法的必要性已非常明显，如 1807 年法军围攻但泽时，为数约两万的普鲁士守军就修筑了这种独立堡垒，当时那里本来没有这种堡垒，但当必须使用这支人数众多的守军来真正保卫城市时，便立刻感到需要这种独立堡垒了。1813—1814 年法军防守但泽对抗反法同盟军时，更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原则。

从沃邦时代起，围攻一直是一种短时间的行动，如果没有什么外来的阻挠，它的目的几乎肯定能够在预定的期限内达到；而现在，围攻已成为像野战那样的一种军事行动，其结局取决于很多因素了。架在要塞围墙上的火炮一下子便失去了它的首要的作用，而野炮则甚至在防守要塞时也开始起比较重要的作用了。工程师的技能已经不仅用于修整被围时遭到破坏的工事，现在他们还必须像在野战部队中一样，选择和加固堡垒前面的阵地，朝着敌人的堑壕挖掘堑壕，构筑从侧面威胁敌人工事的反围攻工事，突然地改变防御正面，从而迫使敌人变换攻击方向。在围攻战中，也像在野战中一样，步兵成了主要的力量，而骑兵则成了几乎每一守备部队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已不可能事先断定——即使是大致地断定——围攻的持续时间，而沃邦的关于夺取要塞的原则虽然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因为他谈的是关于炮兵攻击的细节，但对整个围攻来说，却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没有时间修筑独立堡垒。他们不得已而沿用了修筑要塞的老方法，构筑了主墙作为第一道防线，的确，在当时主墙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在主墙后面又修筑了第二和第三道

防线，同时继续加固第一道防线。后来，俄军逐渐地意识到甚至主墙以外的一定距离上还有对他们有利的地方，于是向前推进，修筑了色楞格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最后，还在马美朗修筑了工事和一道长的战壕线；而在法军主力所在的西翼上，他们只能在主壕附近修筑几座眼镜堡，并在这些眼镜堡前面不远的地方挖掘一些战壕。所以，俄军自加强了马美朗以后，东翼就比较安全了；而在没有这种外围防护工事的西翼，围攻部队则已逐渐地推进到主壕的边沿。因此，围攻部队要接近马拉霍夫冈上的棱堡——他们右翼最重要的制高点，首先必须夺取马美朗。可是马美朗在掩护马拉霍夫冈的同时，本身也有后方工事作掩护。从康罗贝尔在第二次炮击时没有敢认真地进攻马美朗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种掩护是多么有效。现在丝毫也不用怀疑，法军在夺取这一工事时所遭到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联军恢复了炮击，那位不爱惜兵士生命、力图利用每一有利时机向敌人防御纵深挺进的佩利西埃将军采取了有力的行动，与此同时，黑河上的行动却完全停止了。这些情况立刻使我们对佩利西埃将军的性格有了一个了解，并证实他得到倔强、固执、死不回头的人的这种名声是完全正确的。他可以有两种打法：或者是开始野战，并从北区包围塞瓦斯托波尔，然后以两倍的兵力重新围攻，这样，迅速取得胜利的机会就会增加三倍；或者是继续采取最近八个月以来的错误战术，即固执地对南区进行进攻，把它彻底摧毁，并把俄军逐出要塞，这样即使俄军放弃要塞，联军同样也会因遭到北区炮台的射击而无法占领它。

在东西两半球上找不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军人，在获悉佩利西埃被任命为司令官和联军得到大量增援部队以后而不期待佩利

西埃选择第一种打法的。特别是在奥美尔—帕沙指挥的 25000 名土军到达巴拉克拉瓦以后，联军毫无疑问已拥有足够的兵力可以一面继续围攻，一面派 15000 人到刻赤去，同时以比俄军可能用来进行抵抗的更大的兵力进行野战，向前推进。为什么联军没有这样做呢？难道他们的运输工具还不够吗？还是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在克里木作战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佩利西埃不是由于**非常重大**的原因而放弃野战，那末他所以继续执行极其错误的方针，只是出于他的固执和任性；以他的部队在目前强攻中所不得不付出的同样的代价，他就能在野战中取得更大得多的战果，获得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只去夺取南区，甚至不试图包围完全控制着南区的北区，这就是根本蔑视一切作战原则的做法，如果佩利西埃打算这样行动，那末他就会葬送他所统率的这支大军。

但是我们应尽量为这位新司令官的每个可疑的行动找出辩解的理由。可能左翼上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那是由于俄军构筑了反接近壕而引起的。也可能围攻者在冒险把全部军队分成围攻部队和野战部队以前，必须先迫使俄军退到最初的阵线，对他们进行几次猛烈的、歼灭性的打击，借以显示一下自己的优势。但是，即使承认这一切，我们现在仍必须指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如果联军不用一切可用的兵力在战斗中预先疲惫俄国的野战部队，那末任何攻城的新的重大企图都显然是错误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12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6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29 号，并载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新奥得报”第 27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拿破仑的军事计划

法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巴黎“立宪主义者报”172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布最近几个月战争将如何进行。这样的 exposés（论述）现在不仅是时髦的，而且还是定期的，它们虽然时常互相矛盾，但仍然能使人们对法国政府在目前有些什么样的成功的希望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就是路易·波拿巴可能采取的各种对俄作战计划的汇集，而像这样的论述，是值得给予某种注意的，因为它们涉及到第二帝国的命运和法兰西民族复兴的可能性。

总之，似乎任何《grande guerre》（“大战”）都不会发生，50万奥军和10万法军也不会出现在维斯拉河和德涅泊河上出现。一直在注视着西方的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全面起义，同样也不会发生。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的军队也不会因毁灭罗马共和国¹⁷³的那个人的魔杖一挥而出现。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奥地利对西方尽了自己的责任。普鲁士尽了自己的责任。全世界都尽了自己的责任。大家彼此满意。目前的战争根本不是大战。它的目的并不在于恢复法国人在以往对俄战争中取得的荣誉，顺便说一下，尽管佩利西埃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的与此相反。法军被派到克里木，不是为了在那里获得胜利的荣誉；他们只不过是

那里执行警察勤务。需要解决的黑海霸权问题是纯粹局部性的，因此它将在那里就地解决。如果扩大战争范围，那是不明智的。联军将会“有礼貌地但又坚定地”粉碎俄军在黑海及其沿岸进行抵抗的一切企图；而在做到了这一点以后，当然，联军或是俄军，或者作战双方就会停战议和了。

波拿巴主义者的又一个幻想就这样破灭了。把法国的疆界伸展到莱茵河以及把比利时和萨瓦并入法国的宿愿消失了，而代之以异常清醒的谦让精神。——我们进行战争完全不是为了挽回法国在欧洲应有的地位。决不是的。我们也不是为了文明而战，正如不久以前我们不止一次地讲过的那样。我们是很谦虚的，不会有担负如此重大使命的奢望。战争完全是由于对维也纳议定书的第三项条款的解释而进行的！——请看，这位靠军队的恩惠和欧洲的容忍成为法国皇帝的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现在是用怎样的语言在讲话。

但是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人对我们说，战争是为了解决纯粹局部性的问题而进行的，因此用纯粹局部性的手段就可以顺利地结束。只要剥夺俄国在黑海上的实际霸权，战争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只要成为黑海及其沿岸的主人，掌握住已经夺得的一切，俄国就会很快让步。这就是巴黎大本营制定的许多作战计划中最新的一个计划。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计划。

首先谈谈目前的局势。从君士坦丁堡到多瑙河的整个这一面海岸和切尔克西亚海岸、阿纳帕、刻赤、巴拉克拉瓦直到叶夫帕托利亚的整个另一面海岸，都已经从俄军手中夺过来了。目前只有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还在坚守，而且卡法已陷入困境，塞瓦斯

托波尔则由于所处的位置，在遭到严重威胁时也不得不放弃。不仅如此，联军的舰队正在阿速夫内海破浪前进；他们的轻型船舰曾进到塔干罗格，并且袭击了所有重要的沿岸据点。除了从皮列柯普到多瑙河这一段，即俄军在这一带原有海岸线的十五分之一以外，可以说再也没有任何一段海岸留在俄军手里了。现在假定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也已经陷落，克里木已经落入联军手中，那又将怎样呢？俄国处于这种境地，是不会缔结和约的，关于这一点，它已经公开宣布过了。从它这方面来说，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等于在主力正赶来的时候由于前卫被击退而放弃战斗。联军以巨大牺牲作代价取得这些胜利以后，又能做些什么呢？

有人对我们说，他们可以破坏敖德萨、赫尔松、尼古拉也夫，甚至派大军在敖德萨登陆，并且在那里巩固下来，以便击退任何数量的俄军的猛攻，而以后，再根据情况行动。此外，他们可以派兵到高加索去，似乎还能消灭穆拉维约夫指挥的现在驻扎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其他地区的那支俄军。好吧，假定这一切都已实现，那仍然会发生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以后俄国还是拒绝媾和（它无疑会这样做的），那时又将怎么办呢？不应当忘记，俄国的情况与英法不同。英国是可能让自己去缔结没有好处的和约的。因为约翰牛只要一感到自己所担的风险和军费太大，就会尽一切努力摆脱困境而让自己那些尊敬的盟友去单独收拾残局。英国真正强盛的保证及其力量的源泉并不需要在这一方面寻找。而对路易·波拿巴来说，也会有那么一天，他将认为与其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还不如缔结一个不光彩的和约，因为不应当忘记，当这样的冒险家陷入绝境时，他那种把自己的统治再延长半年的希望，就会压倒其余的一切想法。在决定性的时刻，土耳其和撒丁连同它

们那些少得可怜的资源将被抛下不管。这是无须怀疑的。可是俄国却同古罗马一样，只要敌人还在它的领土上，就不可能缔结和约。近一百五十年以来，俄国从来没有缔结过一次割让领土的和约。甚至提尔西特和约¹⁷⁴都使俄国的领土扩大了，而这个和约是在连一个法国人没有踏上俄国土地的时候缔结的。当俄国领土上有一支大军正严阵以待的时候，缔结一个割让领土或者至少使沙皇的权力限制在自己领地范围以内的和约，就会意味着根本违背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传统。刚刚即位不久的沙皇，对于民众说来是生疏的，有势力的民族派正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他的行动，因此他是不会走这一步的。在俄国的全部进攻力量尤其是全部防御力量尚未动和尚未消耗殆尽以前，这种和约是不可能缔结的。然而这样的时刻必然会到来，那时俄国将被迫放弃对他国事务的干涉，但只有与路易·波拿巴和帕麦斯顿完全不同的敌人，而且经过比在俄国黑海沿岸领地上采用“局部性”讨伐手段坚决得多的斗争，才能使俄国做到这一点。但是，假定克里木已被占领并在那里驻扎了5万名联军，高加索和南部所有领地上的俄军已被肃清，联军把俄军阻止在库班河和捷列克河一线，敖德萨已被占领并且变成了营垒，其中驻了比如说10万名英法军队，而尼古拉也夫、赫尔松和伊兹马伊耳也都被联军破坏或占领；甚至假定除了这些“局部性”的行动以外，联军在波罗的海还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某些重要的战果（尽管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很难预言那里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这以后又将怎样呢？

联军就只限于扼守自己的阵地和消耗俄军的兵力吗？疾病夺去在克里木和高加索的联军兵士的生命将比补充兵员的来到更加迅速。他们的主力，譬如说在敖德萨，将不得不依靠舰队得到供

应，因为敖德萨周围几百英里的土地全都没有耕种。俄军拥有在草原行动时特别有利的哥萨克部队，他们将会袭击任何企图越出营垒范围的联军部队，而且还可能就在城市附近占领固定阵地。在这种条件下，是无法迫使俄军进行会战的；他们总是具有能够诱敌深入本国腹地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对联军的每一次进攻他们都将以缓慢的退却来对付。同时，也不能长期使一支大军呆在营垒里无所事事。纪律败坏和军心涣散现象的逐渐增长，将迫使联军采取某种坚决的行动。疾病也会使情况复杂化。总之，如果联军在占领了沿海的重要据点以后，就在那里等待俄国认为有必要让步的时刻，那将会毫无结果。最先筋疲力尽的，十之七八将是联军，而在黑海沿岸很快将会出现成千上万的联军兵士的坟墓。

这样的行动就是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错误的。要想控制沿岸地区，仅攻占沿岸的主要据点是不够的。只有占领内地才能确保沿岸地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联军占领俄国南部海岸这一事实本身所形成的情况，将迫使联军向俄国腹地进军。可是困难也就从这里开始了。一直到波多尔斯克省、基辅省、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边境的这片土地，尽是灌溉条件很差，几乎还没有开垦过的草原，那里除了野草以外什么也不生长，就连野草在夏天也会被火热的太阳晒枯。假定说敖德萨、尼古拉也夫和赫尔松都将变成作战基地，可是联军能派兵进攻的作战目标又在哪里呢？那里的城市不多，彼此相隔很远，而且其中没有一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致攻占它就能使战斗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直到莫斯科也没有如此重要的地点，而莫斯科却在 700 英里以外。远征莫斯科需要 50 万人，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情况无疑是这样：如果战事朝这个方向发展，那末“局部性”的战争无论如何不会

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还是让路易·波拿巴用他全部丰富的战略想像力去寻找另外的途径吧！

可是要实现这一切计划，不仅需要奥地利严守中立，而且还需要它在道义上给予支持。但这个国家现在站在哪一边呢？在1854年，奥地利和普鲁士曾经声明，它们将把俄军向巴尔干山脉的推进看做对俄 *casus belli*（作战的理由）。¹⁷⁵因此怎能担保它们在1856年就不会把法军对莫斯科甚至对哈尔科夫的进攻当做对西方大国作战的理由呢？不应当忘记，任何一支由黑海向俄国腹地推进的军队，它的翼侧暴露给奥地利的程度，并不亚于由多瑙河向土耳其推进的俄军；因此在一定的距离上，这支军队同作战基地之间的交通线，也就是它本身的生命线，将依靠奥地利的恩赐。要想使奥地利不参加战争（哪怕在某一时期），就不得不贿赂它，把贝萨拉比亚让给它的军队。奥军进到德涅斯特河以后，就会成为敖德萨真正的主人，就像这个城市被他们占领了一样。联军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够狂追俄军而进入俄国腹地吗？那会是没有理智的行动！可是应当注意到，这种没有理智的行动却是路易·波拿巴的最新计划即“进行局部战争”计划的必然后果。

第一个作战计划是联合奥地利进行《*grande guerre*》（“大战”）。这个计划会使法军在数量上同奥军相比处于从属的地位，就像目前英军同法军相比所处的地位一样。同时，这个计划会使俄国发动革命。路易·波拿巴既不能要前者，也不能要后者。奥地利拒绝参战；计划破产了。第二个计划是“民族战争”。这个计划一方面会在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中间引起风暴，另一方面也会在斯拉夫人中间引起起义，这就会立刻影响到法国，会使路易·波拿巴的没落帝国 [Lower Empire]¹⁷⁶在比它建立所用

的时间还要短的时间内垮台。冒充拿破仑的这个假“铁汉”惊恐地退缩了。第三个计划，即所有计划中最小的计划，就是这个“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的计划。它的荒谬性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于是我们又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后又怎么办？总而言之，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情况下登上法国皇位，比保住这个皇位要容易得多，即使皇帝陛下在穿衣镜前面长期练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帝王的一切举止动作。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7 月 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纳皮尔的信。——罗巴克委员会

伦敦 6 月 15 日。查理·纳皮尔爵士以下列内容的第一号信¹⁷⁷
开始公布关于波罗的海舰队的一批信件：

“有人问道：为什么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分舰队去年没有干出什么重要的事情来而今年大概也不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对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因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对我去年 6 月寄给他的计划不加理睬，甚至还装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的样子；其次是因为海军部对我去年 9 月寄给它的计划不予重视。如果能保证邓达斯海军上将获得我所指出的全部设备，那末，炮击斯维阿波尔格就已经实现，而要塞也可能被摧毁了。他们不去作这件事，却花了大约 100 万英镑去建造浮动装甲炮台，这种炮台只能勉强地浮起来，如果把它们送到波罗的海去，就未必能回得来。而在建造这些炮台之前，在朴次茅斯就已经证实，在 400 码的距离上，用六十八磅火炮就能击毁它们，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在 800 码的距离上它们就不能毁坏花岗岩的墙壁。假如用同样的钱来建造白炮艇，那还可以有一点指望；或者只用这些钱的一半来实现丹多纳耳德勋爵同我谈过的计划，那末无论是在波罗的海或者是在黑海，我们无疑地都会取得成就。我能揭露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对待我的一切行为的那一天是总会到来的（这一天已经快了）。邓科布先生已经揭露了他，（在那迪埃拉兄弟的案件中）说他拆看私人信件。格莱安企图把对不幸的克里斯提上尉之死所负的靠罪推在累亚德先生身上，而我指责他歪曲了我的信件。他们不许我提供证据，说什么公布出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这种借口很快就要破产了，那时候全国就会知道，值得尊敬的从男爵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来唆使贝克莱海军上将和理查兹海军上将签署那些一旦加以执行就会招致皇家舰

队复灭的指令。要让全国知道，海军首席大臣是否可以把一个军官的私人信件宣扬出去，然后又阻止这个军官用同样的办法对待海军首席大臣的信件。

查·纳皮尔爵士”

罗巴克委员会昨天又召开了会议（第四十九次），为的是对那个应当呈提给下院的报告作出一个结论。经过四小时的辩论，委员会的委员们如同在以往各次会议上一样，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又把会议延到星期一，“指望”那时候他们终于能够提出报告，说明自己的工作已告结束。

行政改革协会昨天在德留黎梭剧院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集会，然而，它不是公开的集会，而是 ticket meeting，即凭票入场的集会。因此，协会的先生们感到毫不拘束，就像是《au sein de leur famille》（“在自己家里”）。他们声称，这次集会是为了给“舆论”开路。然而，为了防卫这种舆论不受到外来的风的吹袭，在德留黎梭剧院的入口处布置了半个连的警察。只是在警察和入场券的保卫下舆论才敢于成为舆论，这是多么微妙的有组织的舆论啊！这次集会首先是支持累亚德的一次示威，因为今天晚上累亚德终于要向议院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了。

前天在太恩河畔新堡举行的公开的集会上，戴维·乌尔卡尔特痛骂了“叛变的内阁和低能的议会”。

关于宪章派目前在地方上准备的集会，我们下次再来介绍¹⁷⁸。

当现状受到各方面和各种观点的抨击时，阿尔伯特亲王利用在领港公会¹⁷⁹举行的一次宴会的机会，说明了宫廷对普遍不满的态度。原来他也有防止危机的法宝。这就是：“对内阁表示爱国主义的舍己忘身的信任！”阿尔伯特亲王认为，只有内阁的专制才能使立宪的英国有能力同北方的专制制度作战，即利用俄国的武器

击败俄国。他所作的英俄之间的对比既没有说服力，也不恰当。例如：女王无权招募兵士，除了自愿为她效劳的以外，她手中再没有其他军队了！阿尔伯特亲王忘记了，女王手中差不多有 3000 万英镑可以用来雇佣兵士。从什么时候起强迫劳动变得比雇佣劳动效率更高了呢？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厂主在抱怨莫斯科的厂主同他竞争时，竟说什么他手中只有一些“自愿效劳”的工人，那末人们会说他什么呢？阿尔伯特亲王不去强调指出俄国皇帝已下令在教坛上明确地向人民宣布他的“神圣的”战争的目的，而英国打了两年的仗，首相在议会谈到战争的时候还说“谁也不能确定它的目的”，——阿尔伯特亲王不去强调这一点，却抱怨说：

“女王政府不可能实施有利于继续战争的任何一项措施，如果它不事先把这一点告诉议会的话。”

好像罗巴克委员会不是在英军牺牲了三分之二以后才成立似的！好像关于维也纳会议问题的辩论不是仅仅在维也纳会议闭幕以后才开始似的！实际上如果不把罗素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远征的夸耀性声明计算在内，政府在议会内一次也没有报告过它为了进行战争而采取的措施，而罗素的声明是他本人自动提出的，其目的显然只是为了向彼得堡内阁及时提出警告。如果说关于封锁问题进行过辩论，那末这不是因为内阁采取了这项措施，而是因为内阁宣布要封锁而没有实行封锁。阿尔伯特亲王不去抱怨那种议会阴谋，即迫使女王在对俄战争期间忍受公然亲俄和显然企求和平的内阁的专制独裁，反而去抱怨议会中不利的表决结果“迫使女王撤掉了自己所信赖的仆人”。阿尔伯特亲王不理直气壮地去抱怨：所有那些错误、无能和卑鄙行为，在俄国任何一个将军、大臣和外交官都可能因之而遭到流放西伯利亚，而在英国至多在报

刊上和议会内引起一些最无关痛痒的空谈，——反而去抱怨

“没有一次挫折（哪怕是极小的挫折），没有一个缺点和弱点不会马上遭到谴责，而有时甚至还被人怀着某种不正常的满足心情而加以夸大”。

阿尔伯特亲王用这些不正常的气忿话来向自己的宿敌帕麦斯顿勋爵祝酒。但是帕麦斯顿根本没有宽大的胸襟。他马上利用了亲王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向亲王拍着胸脯大声说道：“我必须声明，英国人民给予了我们最慷慨的支持。”帕麦斯顿继续讲下去。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享有英国人民的“信任”。帕麦斯顿反驳了亲王对人民所作的令人厌烦的训诫。在亲王奉承了他之后，他奉承了人民一番。帕麦斯顿甚至不愿花费一点口舌对王室说些恭维话作为回报。阿尔伯特亲王想把自己说成是内阁的庇护者，因此宣称内阁“不依赖”于议会和人民；帕麦斯顿的回答是，确认王室“依赖”于内阁。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18 日

“新奥得报”第 27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

伦敦 6 月 16 日。关于累亚德提案的辩论，昨天没有结束，辩论将在星期一晚间会议上继续进行。因此，我们暂时也把对于辩论的评论延搁一下。

在下院的会议上有一件事倒值得提一提。在辩论维也纳会议的问题时，帕麦斯顿顺便谈到，皮尔派曾提出以接受一定的媾和条件作为加入他的内阁的条件。罗素在维也纳维护的正是这些条件。昨天，**奥特韦**要求帕麦斯顿表示态度，他是否支持皮尔派所倡议的、即自己承认是为俄国利益效劳的那个派别所倡议的媾和条件？这时**格莱斯顿**就站起来，要求这位指责他和他的朋友**叛变**的发言人遵守秩序。这一点是做到了。然而**奥特韦**还是重复了他对皮尔派的评语和对帕麦斯顿的质问。帕麦斯顿像他所应该做的那样，拒绝回答。他说，媾和条件当然取决于战争事件。至于谈到皮尔派，那末他们和他商定的，仅仅是他必须保守秘密的“某个”条件不要成为媾和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格莱斯顿在回答帕麦斯顿时声称，他从来没有和帕麦斯顿就媾和条件问题进行过谈判。也许他的朋友**格莱安**的做法不同。不过，他反对帕麦斯顿的那一套：一方面装腔作势地摆出官方的矜持态度，另一方面又给予一些含蓄的指示、模棱两可的暗示和说些吞吞吐吐

的话。让内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或者干脆沉默不语吧。格莱斯顿怀着恭顺而痛苦的心情给了帕麦斯顿以这种应得的训诫。

法国政府在“立宪主义者报”上对于今后几个月如何进行战争问题作了新的 exposé (阐述)。这样的 exposés 现在不仅成了一种时髦的、而且也成了定期的做法。尽管这些阐述相互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但是对于揭露路易·波拿巴反对俄国的“一切可能的”作战计划来说还是有价值的。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证实了波拿巴的幻想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灭了。第一个计划是同奥地利联盟，以奥军 50 万人和法军 10 万人在维斯拉河和德涅泊河进行“大战”的计划。这个计划会使法军在数量上同奥军相比处于从属的地位，就像目前英军在克里木同法军相比所处的地位一样。这个计划会使俄国发动革命。可是奥地利拒绝参战。计划破产了。第二个计划是“民族战争”——“经常注视着西方的被压迫者”的普遍起义。这个计划一方面会在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中间引起风暴，另一方面也会在斯拉夫人中间引起起义。这个计划对法国有反作用，有使“第二”帝国遭到崩溃的危险。这个假“铁汉”惊恐地退缩了。计划又破产了。现在一切都成了往事。奥地利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普鲁士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全世界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于是波拿巴就作出了第三个计划，即最小的计划——“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法国军队在克里木作战不是为了荣誉，仅仅是在那里担负警察勤务。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纯粹地区性的意义（黑海霸权），这样的问题应当在这里就地解决。使战争具有较大的规模是不理智的。联军一定会“恭敬地、然而坚决地”击退俄军在黑海进行抵抗的任何企图。然后他们，或者俄国人，或者双方将提出议和。原来的豪言

壮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有关文明的字句也没有留下，除了为维也纳议定书的第三项而斗争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波拿巴的预言者指出，仅仅为了局部目的战争只能使用局部手段进行。只能剥夺俄国人在黑海的霸权！在下一篇通讯中我们将要指出：在波拿巴从“大战”转到“民族战争”，又从“民族战争”转到“为了局部目的使用局部手段而进行的局部战争”之后，这种局部战争也是“荒谬绝伦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6月16日

载于1855年6月19日

“新奥得报”第27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阿尔伯特亲王的祝词。 ——报纸印花税

伦敦 6 月 18 日。阿尔伯特亲王的演说和帕麦斯顿的答词的发表使人感到有些奇怪。这些讲话本来是 6 月 9 日（星期六）在领港公会作的。星期一，各家日报只是顺便提了一下领港公会一年一度的宴会，没有谈到阿尔伯特亲王的祝词。只有 6 月 13 日（星期三）的“每日新闻”和 6 月 14 日（星期四）的“泰晤士报”发表了祝词和答谢词的全文。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些讲话的发表是帕麦斯顿勋爵玩弄的把戏。他指望依靠这位至高无上的祝福人为自己赢得声誉。阿尔伯特亲王不得不为“绝对信任”高贵的子爵、为如此坚决地号召全国去信任他而付出代价。大部分周报对阿尔伯特亲王的‘祝词反应如何，可以根据“雷诺新闻”¹⁸⁰上的一段话来判断。顺便说一下，“雷诺新闻”的发行额是 2496256 份。报纸在作了一番详细的评论以后就写道：

“至高无上的审查者断言，任何一个弱点，任何一个缺点都遭到谴责，而有时甚至还被人怀着某种不正常的满足心情而加以夸大。英国人民有耐心已变成口头语了。英国人民像以萨迦一样，可以比作一头驴，背着高利贷和土地垄断这两付重担。然而女王的丈夫的这种指责是英国人曾经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最粗暴最骇人听闻的侮辱。好一个不正常的满足心情！这就是说，英国人民看到叛变和贵族的愚蠢使我们英勇的兵士遭到可怕的苦难而感到不正

常的满足；对奥地利欺骗我们感到不正常的满足；对轻率地浪费 4000 万英镑和牺牲 4 万名最勇敢的兵士感到不正常的满足；对我们引起我们仿佛要予以帮助的同盟者的不信任和我们所打算加以惩罚的敌人的轻视感到不正常的满足。然而，亲王的责难不仅是粗暴的和带有侮辱性的，而且是极端虚伪的和带有诽谤性的。不管英国人民有什么错误，——上帝知道，错误是很多的——英国人决不会因自己的兵士和水兵遭受苦难和民族荣誉蒙受耻辱而感到满足。但是，原籍德国的至高无上的人物、贵族叛徒和他们的应受到轻视和鄙弃的食客们却是例外……当然，我们乐意相信，游手好闲、饱食终日的奢侈淫佚之徒和睡在绒毛褥子上的兵士是很难理解真正的兵士和水兵们的苦难和遭遇的……然而，有一点我们是同意至高无上的战士的，那就是**立宪主义**是一个最大的 sham（骗局），是一种特别庞大的、糟糕的、不公正的、不中用的政体。但是亲王认为除了专制以外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道路，那就错了。我们建议他回想一下，共和主义这样一种政体还存在着，我们的民族可以选择这种政体；我们感到，舆论现在正是越来越倾向于这方面了，要求共和主义而不是要求好战的亲王所希望的那种无限制的专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雷诺新闻”就是这样写的。

废除报纸印花税的新法令在上星期日得到了女王的批准并从 6 月 30 日起开始生效。根据这个法令，报纸印花税只向那些由邮局**免费**递送的报纸征收。在伦敦的各家日报中只有“先驱晨报”宣布把每号的定价从 5 辨士降到 4 辨士。相反地，在周报中却已经有许多家报纸，例如“劳埃德氏周刊”、“雷诺新闻”、“人民报”等报纸宣布把每号定价从 3 辨士降到 2 辨士。有消息说，伦敦还将出版一种和“泰晤士报”同样大小的日报“信使电讯报”，每号定价 2 辨士。伦敦目前出版的每号定价 2 辨士的新的周报有：“舵手”（天主教报纸）、“泰晤士画报”和查理·奈特先生的“城乡新闻”。最后，威洛特先生和列哲尔先生宣布，他们要在伦敦每周出

版 penny paper（“辨士时报”）（定价 1 辨士的报纸）。然而由于废除报纸印花税，地方报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仅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将出版 4 种定价 1 辨士的日报。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到目前为止每星期只出版一次或两次的报纸都将改成日报，每号定价 3 辨士、2 辨士和 1 辨士不等。使地方报刊摆脱伦敦的控制，使报业分散经营，这实际上是曼彻斯特学派在它顽强而长期地反对报纸印花税的运动中的主要目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8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21 日
“新奥得报”第 28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奇怪的政策

德·普腊德神甫在他的“维也纳会议”一书中公正地指责了这次如德·利奈公爵所说的跳舞式的会议，说它为俄国在欧洲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并且批准了这种统治。

德·普腊德感叹地说：“这样，欧洲为争取独立反对法国而进行的战争就以欧洲隶属于俄国而告终了。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获得这样的结果是否值得！”¹⁸¹

反对法国的战争，同时也是反对革命的战争，反雅各宾的战争，这种战争，正如早就应当料想到的，使政治势力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从法国转移到了俄国。维也纳会议是反雅各宾战争的自然产物。维也纳条约是维也纳会议的合法成果，而俄国的统治则是维也纳条约的非婚生子。因此不能容许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著作家根据下述事实而把全部罪过加在普鲁士头上：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由于对亚历山大皇帝盲目忠诚和断然指示他的全权代表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支持俄国而妨碍了可耻的三人同盟——卡斯尔里、梅特涅和达来朗去实现他们的密谋，即建立防止俄国入侵的可靠的区域性壁垒，以便预防他们自己十分热心地强加于欧洲的那种制度产生令人不快的、但是必然的后果。甚至那种不择任何手段选举教皇的会议也没有能臆造出事件发展的逻辑。

俄国在欧洲所取得的优势是同维也纳条约有密切联系的：因此任何反对这个强国的战争，只要它不是从一开始就宣布废除条约，就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的讹诈欺骗和阴谋勾结。然而目前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废除维也纳条约，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1815年的议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约。有人希望，从这时起保守主义的千年王国就会开始，各国政府将能够仅仅为了使欧洲思想界“平静”而作共同的努力。下面从一位普鲁士元帅克奈泽贝克的小册子“维也纳会议开会期间拟定的关于欧洲均势的备忘录”¹⁸²中摘出的几段值得注意的话的译文可以表明，早在会议期间，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就十分清楚地懂得，保存土耳其就像瓜分波兰一样，是他们的“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让土耳其人留在欧洲！土耳其人使你们受到了什么损害呢？这是一个强大而正直的民族；只要你们不去干涉他们，他们就会几世纪和平地生活下去，他们是完全可以信赖的。难道他们曾经欺骗过你们？难道他们在政策上不真诚不坦率？虽然他们是好战的、大胆的，但是就许多方面来说，这是好的，有益的。土耳其人是防止亚洲过剩人口入侵的最好的屏障，这正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有领土，他们阻挡着各种各样的侵犯。如果把他们赶出欧洲，他们自己就要入侵。暂且假定他们被赶走了。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要么这些土地被俄国或奥地利侵占，要么在那里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家。你们是否真的想使俄国变得更强盛？你们是否也想从这方面使这个庞然大物成为自己的累赘？俄国已经从伏尔加河挺进到尼门河，又从尼门河挺进到维斯拉河，而现在大概又进一步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瓦尔塔河，难道你们觉得这还不够？如果不是这样，那末你们是否打算使奥地利的力量用在亚洲方面，从而削弱奥地利或者使它对自己保住强国中心的地位来防止西方侵犯这一点采取漠视态度？请回想一下，杨·萨比斯基、萨瓦亲王奥伊根和芒帖库利在当时的处境是怎样的。难道起初法国争得了对德国的统治，不正是因为奥地利不得不经常派出兵力去反对亚洲？你们是否想使奥地利靠拢亚洲而恢复从前的状况，并且更加深这种状况？”

如果是那样，就应当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家或拜占庭国家！但这会改善欧洲的状况吗？在这个民族（希腊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况下，欧洲是否反而要经常武装起来保卫自己以防止土耳其人的卷土重来呢？由于俄国利用宗教、贸易和金钱对希腊发生影响，希腊是否就会单纯地变为俄国的殖民地呢？有土耳其人的地方，最好别去打扰它，当不安分的力量沉睡时，就不要去惊动它。

心地善良的慈善家会感叹地说：‘可是那里对待人的态度是多么坏啊！包括古雅典和斯巴达在内的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住的却是野蛮人！’

我的朋友，这一切可能是真实的：那里正在摧残人，或者说过去一直在摧残人；但是在别的国家也有用棍棒、树条和鞭子打人以及贩卖人口的。在改变一种状况前，应当想一下，改变之后是否会好些。用棍棒和树条抽打以及希腊人的背信弃义行为是否比土耳其人的细绳和敕令要好受些呢？首先必须在欧洲消灭这一切和贩卖奴隶的现象，不要再为土耳其人的野蛮而感到难过；在他们的野蛮中包藏着力量，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增添了勇气，而我们正需要力量和勇气，以便有可能沉着地观察俄国人是怎样在向瓦尔塔河推进的。

由此可见，土耳其人必须保存，而波兰人，作为民族来说则应当绝迹！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一切有力量坚持下来的事物则生存，一切腐烂的东西则应死亡。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波兰人保留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且具有它所固有的一切特点，那会产生什么后果。从宫廷到茅舍，到处都是酗酒、贪食、谄媚逢迎、对一切优秀民族和一切其他民族采取藐视态度、刻薄地嘲笑各种规章制度、挥霍浪费、淫佚放荡、卖身投靠、奸诈狡猾、隐瞒欺骗、荒淫无耻——这就是波兰人在其中生活的最如意的环境。为了这些他们歌唱着，奏着提琴或弹着六弦琴，吻着情人，用情人的小鞋喝酒，拔着剑，捻着自己的胡子，跃上战马去同杜木里埃和波拿巴或者另外什么人战斗，他们过度地喝着伏特加酒和潘趣酒，同朋友和仇敌搏斗，他们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农奴很坏，他们变卖自己的财产，跑到国外去，他们骚扰着半个世界，并且当着考斯丘什科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发誓，说波兰决不会灭亡——这些就同他们是波兰人一样的确实。

你们要求复兴波兰，你们看，你们支持的是什么。

这样的民族是否值得独立存在呢，这个民族的构成条件成熟了吗？民族

的任何一种构成都包含制度观念,因为它只是调整并向每个社会成员指出他的位置;为此它规定国家应由哪些阶层组成,并且明确规定每个阶层的位置、社会地位、体制、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器的活动方向和国家管理的基本方针。如果谁也不想要制度,那末又怎样来管理一个民族呢?一个波兰国王(斯蒂凡·巴托里)有一次曾经感叹地说:‘波兰人!你们之所以能存在,不是由于制度——你们是不承认制度的,也不是由于政府——你们是不尊重政府的,而仅仅是由于侥幸!’

而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现在。杂乱无章、荒淫无耻——这就是波兰人的最如意的环境。不,最好还是让这个民族忍受棍打吧。这是天意。什么对人有好处,那只有天知道!

因此,今天必须打倒波兰人!”

目前的战争(其目的是扩大和巩固 1815 年的维也纳条约)看来是要实现老元帅克奈泽贝克的心愿。在法国复辟和七月王朝的整个时期,曾经散布过这样一种错觉:似乎拿破仑主义意味着废除正式把欧洲置于俄国托管下而把法国置于欧洲的《surveillance publique》(“公共监督”)下的维也纳条约。现在这位为自己的悲惨处境遭到冷酷讥讽的念头所苦恼的摹仿自己伯父的皇帝向全世界证明,拿破仑主义意味着**不是为了使法国摆脱维也纳条约,而是为了使土耳其服从这个条约而进行战争**。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存维也纳条约,但是其借口却是削弱俄国的实力!

这就是来自巴黎的使拿破仑观念死灰复燃的人所解释的真正的《idée napoléonienne》(“拿破仑观念”)。作为第二个拿破仑的骄傲的同盟者的英国人当然认为,他们是可以像拿破仑第一的侄子对待拿破仑第一的观念那样来对待拿破仑第一的名言的。因此,当读到一位现代英国作家(邓洛普)的作品¹⁸³时就不应当感到惊讶了,在这篇作品中谈到,似乎拿破仑曾经预言过,即将同俄国进行的斗争会提出一个伟大的问题:欧洲应成为“立宪的还是哥萨克

的”。在没落帝国形成以前，通常都认为拿破仑曾说过：“共和的还是哥萨克的。”然而人总是活到老学到老的。

由于“论坛报”对维也纳条约和以维也纳条约为基础的欧洲“制度”赞扬不够，人们竟指责它背叛自由和人权的事业！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1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7 月 1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
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

伦敦 6 月 20 日。波拿巴在“立宪主义者报”上宣称的局部战争，就是在黑海上的战争，其目的是消灭俄国在黑海的似乎是现有的 *suprématie* (优势)，顺便提一下，甚至对土耳其人，这种海上的 *suprématie* 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证明。现在的情况怎样呢？从君士坦丁堡到多瑙河的整个这一面海岸，以及直到巴拉克拉瓦和叶夫帕托利亚的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都已经从俄军手中夺过来了。目前只有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还在坚守；卡法已陷入困境，塞瓦斯托波尔则由于所处的位置，在遭到严重威胁时也不得不放弃。不仅如此，联军的舰队正在阿速夫内海破浪前进，他们的轻型船舰曾进到塔干罗格，并且炮击所有重要的沿岸据点。除了从皮列柯普到多瑙河这一段（约占这个沿岸地区的十五分之一）以外，沿岸的任何一个地段都已不在俄军手中了。假定卡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也已经陷落，克里木已经落入联军手中，那又将怎样呢？俄国就像它已经声明的那样，是不会缔结和约的。缔结和约是不明智的。这等于在主力正赶来的时候由于前卫被击退而放弃战斗。而联军会做什么呢？有人对我们说，他们可以破坏敖德萨，赫尔松、尼古拉也夫。他们可能向前推进，派大军在敖德萨登陆，加强敖德萨的防御，以便击退任何数量的俄军的猛攻，而以后，再根据情况行动。此外，他们可以

派兵到高加索去,消灭驻扎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其他领地的那支俄军(这支军队由穆拉维约夫将军指挥),并且切断俄罗斯帝国同它的南亚领地的联系。但要是俄国还不缔结和约呢?当敌人还在它的领土上的时候,它是不可能缔结和约的。一百五十年以来,俄国从来没有缔结过一次使它受到任何损失的和约。甚至提尔西特和约都使俄国的领土扩大了,而这个和约是在连一个法国人都没有踏上俄国土地的时候缔结的。刚刚即位的亚历山大二世不会冒险去做甚至对尼古拉来说也是危险的事情。他不会突然破坏帝国的传统。假定克里木已被占领并在那里驻扎了5万名军队,高加索和南部所有领地上的俄军已被肃清,联军把俄军阻止在库班河和捷列克河一线,敖德萨已被占领并且变成了驻有10万名军队的营垒,尼古拉也夫、赫尔松、伊兹马伊耳也都被联军破坏或占领。如果是这样,联军是否只会守住自己的阵地,并把希望寄托在俄军的疲惫上呢?疾病夺去在克里木和高加索的联军兵士的生命将比补充兵员的来到更加迅速。集中在敖德萨的联军主力将不得不依靠舰队得到供应,因为敖德萨周围几百英里的土地全都没有耕种。联军一想超越阵地就会遭到俄军首先是哥萨克的攻击。迫使后者作战是不可能的。俄军总是具有能够诱敌深入本国腹地的有利条件。对联军的每一次进攻他们都将以缓慢的退却来对付。同时,也不能长期使一支大军呆在营垒里无所事事。疾病和逐渐滋长的纪律败坏、军心涣散的现象将迫使联军采取坚决行动。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夺取沿岸地区的主要据点,然后等待俄国人自动地让步。这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错误的。要想控制沿岸地区,仅攻占沿岸的主要据点是不够的。只有占领内地才能确保沿岸地区。当联军在俄国南部沿岸地区站住了脚以后,形势将迫使他们把自己的部队向俄国

腹地推进。可是困难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一直到波多尔斯克省、基辅省、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边境的这片土地，尽是灌溉条件很差，几乎还没有开垦过的草原，那里除了野草以外什么也不生长，就连野草也会被火热的太阳晒枯。假定说敖德萨、尼古拉也夫和赫尔松都将变成作战基地，可是联军能派兵进攻的作战目标又在哪里呢？这个目标只可能是莫斯科，而莫斯科却在 700 英里以外，向它进军需要 50 万人。但是这样的进军不仅需要奥地利严守中立，而且还需要它在道义上给予支持。但这个国家现在站在哪一边呢？在 1854 年，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声明，它们将把俄军向巴尔干山脉的推进看做 *casus belli*（作战的理由）。那为什么不能假定，在 1856 年，它们将把法军对莫斯科或者甚至对哈尔科夫的进攻当做作战的理由呢？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任何一支由黑海向俄国腹地推进的军队，它的翼侧暴露给奥地利的程度，并不亚于由多瑙河向土耳其推进的俄军；因此在一定的距离上，它的交通线和它的作战基地，即它的存在本身，将都依靠奥地利的恩赐。联军在这种条件下，难道还能够狂追俄军而进入俄国腹地吗？那会是没有理智的行动，纯粹是没有理智的行动，但是这种没有理智的行动是波拿巴的最新计划即“进行局部战争”计划的必然后果。确定不移的辩证法使得“局部战争”在各个据点远远超出它所规划的地界而变成“大”战，只不过没有大战的前提、条件和手段而已。但是波拿巴的最新“计划”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认在舞台上应该出现另一种力量来进行对俄战争，也承认复辟的帝国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它只得在局部范围内进行对俄战争，即只能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这种战争。拿破仑的对俄战争转向“局部战争”的这种变化，将超过 *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在复

辟的帝国所经受的所有奇异的变化。

在今晚恢复的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中，布尔韦尔代表托利党提出的修正案使政府能够以 7 票对 1 票的多数击败行政改革派。辩论的总的特点是带有**小官吏的性质**，它一分钟也没有超出这一点。大谈宠爱和徇私的群情细节，议论“最优等考试”的题目，对轻视功绩这一点大发雷霆，——所有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的。人们会以为，是在听取一位下级林务官向可尊敬的阁部提出的书面申诉。格莱斯顿坚决地说，甚至阿伯丁 in petto (心中) 也赞成改革官僚制度。迪斯累里肯定地说，得比也是如此。帕麦斯顿则发誓说，我的内阁也并不逊色。因此，西蒂区的先生们没有必要准备斗争来改革、开导、改组我们的官厅了。请放心吧！

英国资产阶级在自己过去的鼓动运动中曾出其不意地控制了执政集团，并且诱使群众同自己唱一个调子，因为它在自己的纲领里走得要比自己的实际目标远一些。这一次它在自己的纲领里甚至不敢提高到实际目标的水平。你们一个一个地说服我们，说你们不想消灭贵族政治，而只想同我们团结起来修好政府机器！Very well！[很好！]以友谊对友谊！我们自己来为你们改革行政机关，自然不越出它的传统范围。你们断言，“行政改革”不是阶级之间争论的问题，谈的只是“实际事务”、“善意的”改革。我们希望你们让我们自己来制定行政改革的细节以首先证明你们的善意，因为这里谈的只是细节。我们自己看得更清楚，我们能够走多远，既不使我们的阶级受到损害，又不由于疏忽而把行政改革变成阶级之间争论的问题，也不使它失去仁爱的性质。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它相信这种贵族的 bonhomie (好意) 的讽刺语言，因为它自己就是用虚伪的语言同群众讲话的。贵族、内阁和反

对派,托利党和辉格党,一分钟也没有误解行政改革派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这种鼓动早在进入议会以前就以破产告终了。这样,他们还能误解吗?尽管行政改革协会只允许特殊人物出席在德留黎棱举行的大会,尽管它的听众是经过三番五次筛选过的,但是它对可能提出的任何民主提案或者议程没有规定的任何发言都非常恐惧,以致主席在大会开幕前宣布:与会公众只是为了“听取程序单上所公布的发言人的讲话”,任何“提案”都不付诸表决,“因此不能提出任何修正案”,也不能“对已报名的发言人的名单作任何补充”。当然,这样的鼓动是不能对顽固的英国寡头政治发生作用并迫使它让步的。

前天晚上在下院宣读的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用空洞的大话掩盖了尖锐的问题。报告吞吞吐吐地谴责各个主管部门,例如军械部,军需部,医务主管部门等等。报告指责帕麦斯顿对民军的管理,指责整个联合内阁实行塞瓦斯托波尔远征的轻举妄动。由于委员会在讯问证人时千方百计地回避寻找惨败的真正原因,它自然也就不得不在报告中老是摇摆不定,不是泛泛地指责政治领袖,就是琐琐碎碎地责难担任执行者角色的人们。一般说来,委员会完成了它作为减轻舆论压力的安全阀的任务。

日报对俄国人在汉格进行的“背信弃义的屠杀”发出了愤怒的叫喊。然而“纪事晨报”承认,英国人利用挂着白旗的船只测量海洋深度,并且在俄国人的阵地附近如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附近进行间谍活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6月20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载于1855年6月23日
“新奥得报”第287号

卡 · 马 克 思
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
——巴黎交易所新闻。——上院
关于汉格暴行的辩论¹⁸⁴

伦敦 6 月 22 日。“梦行者”¹⁸⁵第二幕刚演完，德留黎棱剧院的幕布刚落下，突然发出的响亮的击鼓声把拥向小卖部的观众又召回到大厅里来。幕布重新升起，剧院经理走上舞台，他用一种不自然的过度激昂的音调说了下面的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十分荣幸，能够向你们报告一件重要的事情：**联军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

全场欢跃，高呼“万岁！”，“万岁！”，鲜花如雨点般地抛来。乐队奏乐，观众齐唱《God save the Queen》，《Rule Britannia》和《Partant pour la Syrie》¹⁸⁶。从上层观览席发出了要求唱《La Marseillaise!》（“马赛曲！”）的呼声，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剧院经理的即兴作品是以一则电讯为根据的，但这则电讯根本没有谈到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事，只是谈到 6 月 18 日法国人对马拉霍夫冈的强攻和英国人对大凸角堡的强攻都**被击退了**，而且**损失很大**。这位演员昨天晚上在德留黎棱的舞台上仿效了另一场戏的主持人的做法，这个主持人大约在一年前的一次盛大的军事检阅¹⁸⁷过程中曾经临时

编造了一句使人意料不到的和忘记不了的话：《Messieurs, Sevastopol est pris!》（“先生们，塞瓦斯托波尔被占领了！”）

佩利西埃坚持对南区进行单方面攻击，使联军兵力继续不断地遭到毁灭，这种不可理解的固执做法显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而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大家知道，波拿巴已经发出了几十亿期票用来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而且强迫法兰西民族贴现这些期票。他还打算再发出8亿或接近这个数字的期票。因此，为偿清业已流通的期票而进行支付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如果说，越过黑河保证了**实际的效果**，那末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就预示了**表面上的辉煌成就**。“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会对发行新公债的前途产生有利的影响；既然为战争而发行公债，那末为什么不**为公债而进行战争**呢！在这样的论据面前，任何军事科学评论都必然不再发生作用了。一般说来，在克里木战争和巴黎交易所之间有着美妙的联系。大家知道，正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电线都汇聚到土伊勒里，这些电线在这里都最后成了“内阁的秘密”。据了解，巴黎发表最重要的电讯要比伦敦迟几小时。据说，在这几小时内，一个名字叫**奥尔西**的科西嘉人就在巴黎交易所内大肆活动。这个奥尔西过去曾经是当时的被放逐者^①在伦敦交易所的“命中注定的”代理人，这在伦敦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英国内阁已经发表的邓达斯海军上将的急电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丝毫没有容许由“哥萨克”调遣的船只上的军官或船员滥用军使旗从而使俄国人有可能为**汉格的暴行**制造借口，那末“俄国残废者”关于这件事的叙述¹⁸⁸就不会令人产生任何疑问。显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然，俄国人没有料想到有一个名叫约翰·布朗的船员从那里活着回来，并且还会提出反驳他们的证词。因而“残废者”认为没有必要控告英国船只从事间谍活动、探测海洋深度等等，它同西哀士神甫一起深信“死人不会说话”，而仓促地编造了自己的一套说法。昨天上院已经讨论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泰晤士报”这样的论断：“在习惯上和原则上总是十分冷静和态度端正的上院”这一次却无法抑制极端的愤慨情绪的真实流露。我们看到，口头上装腔作势地表示愤慨，而实际上却温情脉脉地关怀着“俄国的荣誉”，胆怯地畏惧民族复仇。托利党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伯爵站起来简略地叙述了问题的实质，然后感叹地说道：

“我逐次回忆了全部英国历史，找不到这样残暴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于欧洲每一个军官、每一支军队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彻底追究这次事件，使这次罪行的执行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辉格党的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声明，他对自己同僚的“愤慨”表示赞同。这个如此骇人听闻和无与伦比的暴行是同文明国家所采用的方法和习俗完全相违背的，因此可以设想，它的执行者不可能是根据他们长官的命令或在他们长官同意下进行活动的。很可能500名俄军的指拇官不是 commissioned officer（有军官官衔证书的军官）（所有英国军官包括尉官在内都有 commission（官衔证书），但是军士和士官没有）。因此完全有可能俄国政府并不同意这种行动。为此他委托英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通过丹麦驻彼得堡公使向俄国政府转达以下的意见：英国政府十分殷切地希望知道，俄国政府采取了或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表明自己对这种行动的态度；这种行动如果发生在太平洋某一个野蛮的岛屿上，也许不会引起任何惊讶，但发生在文明的欧洲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俄国政

府不严格地和适当地惩办这一行动的肇事者，那末就需要对这种行动采取最严峻的压制手段。克拉伦登最后表示：英国内阁期待着俄国方面的声明，以便根据声明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科尔彻斯特勋爵认为，

“每逢发生这种事情，指挥官的职责就是通过举白旗的军使而同他所能取得联系的俄国较高级的机关进行直接联系，向它说明情况，并要求谴责这种暴行”。

马姆兹伯里勋爵第二次发言，声称他一般同意政府的行动，但是当听到克拉伦登说采取“压制手段”时，他就不寒而栗了。英国这方面不能按俄军的方法办事。必须从道义上惩罚俄国沙皇，必须唤起欧洲各国宫廷都对彼得堡宫廷提出抗议，从而使俄国受到国际的判决。一切带有“报复”性质的办法只能加深舆论的“反感”。英国内阁的挂名主席格兰维耳**伯爵热烈响应托利党人的发言，并且像基督徒那样地祈求：“不要进行任何报复！”**

如“泰晤士报”所说的上院的这些极端愤慨的表现究竟说明什么呢？义愤填膺的托利党人提出质问。辉格党人的愤懑情绪更为强烈，但自己同时却在给俄国政府暗示辩护的理由，并且给它指出一条出路：拒绝承认，同时用某个下级军官来当牺牲品。他低声而含糊地说“可能”采取压制手段，从而掩饰自己的退缩行为。科尔彻斯特勋爵想用派遣另一个打着白旗的军使去同俄军接头的办法来惩罚俄军对打着白旗的军使进行凶恶攻击的行为。这时托利党人再次发言，他们从要采取压制手段转而诉诸道义了。辉格党人因有放弃采用压制手段（虽然只是可能采取的压制手段）的可能而感到高兴，随声附和他们说：《No retaliatun!》（“不要进行任何报复！”）真是一出地道的喜剧！上院为了掩护俄国而置身

于人民的激愤情绪和俄国之间。不再扮演角色的唯一贵族是**布鲁姆**。他说：“如果说国家曾经号召过流血的话，那末现在就是这样。”至于谈到英国在采取“压制手段”、行使《jus talionis》（“报复权”）方面的敏感性，**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一幕幕回忆英国历史时，显然忽略了英国史中关于爱尔兰、印度和北美等篇页！英国的寡头政治曾经在什么时候表现出像对待俄国那样温情脉脉呢？

在议院宣读过的**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中，最后一段话——**罗巴克**提出的、由委员会表决通过的一段话很奇怪地不见了。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对情况没有应有的了解就计划实际或着手进行的一切事情，都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和预防措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行动方式是使我军在克里木遭到一切灾难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2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25 和 26 日

“新奥得报”第 289 和 29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六月十八日的失利。 ——增援部队

伦敦 6 月 23 日。滑铁卢会战¹⁸⁹纪念日（6 月 18 日）这一次自然不是在伦敦举行庆祝。本来打算在克里木通过不是对法国人的胜利，而是同法国人一起取得的胜利来庆祝这个日子。这个事件之所以特别耸人听闻，是因为威灵顿的 famulus（仆从）腊格伦反正是听从拿破仑第三的一个将军的命令来进行指挥。报道的标题已经拟就，只是这个报道本应使之永垂不朽的事件却令人失望。在复辟帝国的历史上，不能不承认那种致命的癖好：通过再版即修订版来肯定成绩，否定失败，竭力使 Empire（帝国）的伟大日子重显光辉。在过去反对共和国的战斗中已经取得的这种拿破仑日子的光荣复活，在目前反对外敌的战斗中却遭到了破灭。没有 Empire 胜利的 empire 使人想起了对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所作的加工，经过这种加工，不仅使丹麦王子的忧郁心情大为减弱，而且把丹麦王子这个人都弄得看不到了¹⁹⁰。巴黎原定在 1854 年 12 月 2 日在克里木建立军事上的丰功伟绩。但由于多雨和弹药不足而未能立功。1855 年 6 月 18 日曾经打算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演出修订版的、另一种结局的滑铁卢会战。但结果是英法军队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失败。

伦敦的气氛阴沉，有价证券跌价了，帕麦斯顿在一天之内又丢掉了他在几个月内利用极其巧妙的策略所获得的东西。遭到失败的那天是6月18日；报道失败消息的电报在6月22日大家才知道。上星期四官方报纸“地球报”¹⁹¹按照帕麦斯顿的指示声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同一天，帕麦斯顿在下院的晚间会议上郑重地证实了这个保证性的声明。而现在很清楚，他早在6月20日星期三午后4点钟就接到了电报。“先驱”断定拖延的原因在于巴黎的坚决要求，因为战场上的失利在巴黎变成了交易所中的成功。不管怎样，cockney（科克奈（伦敦居民））却对帕麦斯顿大为恼怒。打败了——已经够糟糕的了。但由于大臣们的狡猾手段竟在德留黎梭和康文特田园剧院中参与令人发笑的欢呼，庆贺塞瓦斯托波尔的占领，this is too bad, sir！（这太不像话了，先生！）

我们已经充分地预先告诉了读者，佩利西埃坚持强攻南区的固执态度是联军失利的预兆。当他接受指挥权时，我们还指出过一个可以谅解的情况，即运输工具的不足会使佩利西埃在野战中遇到很大的困难。¹⁹²这两种情况现在在英国报刊上都得到了证实。例如，在今天的“先驱晨报”中谈到：

“军队不能出动——而按照一切战略规则它本来应当去粉碎驻在辛费罗波尔的辅助部队。军队不能出动的理由是：**主要的掘墓人**——当局所固有的疏忽态度和拖延时间的做法——在这里起着破坏作用，我们本来需要28000头役畜，可是我们手里只有4000—5000头；而且这一切又是在疾病再度悄悄地蔓延到已经蕴藏着寒热病、霍乱和鼠疫病原体的兵营里的时候发生的。这种无法向前推进的情况（正像在瓦尔那和死亡盆地曾经发生的情况一样）乃是我们的将军们不得不每天在对几乎是无法攻克的土质工事作绝望的攻击中摧残我们兵士的生命的原由，而应当行动的英勇军队由于缺乏骑兵和运输工具而只好在黑河边按兵不动。”

刚刚公布的财务报告再一次证明了战争初期内阁在利用交给它支配的资金问题上采取了特别疏忽的态度。根据这个官方报告，到 1854 年 1 月 1 日，在拨给军队的款项中库存金额有 1835882 英镑，而到 1854 年 4 月 1 日，用在军队上的数目总共只有 227 万英镑；这样，招募新兵所用的钱还不到议会所表决拨付的数目的四分之三。根据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军队复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疲劳过度。而疲劳过度的原因又何在呢？——在于数量太少。而军队的数量太少，就像财务报告所表明的，是由于内阁搞阴谋的结果。可是阿尔伯特亲王还埋怨说女王自己没有掌握军队！说内阁的两手被束缚住了！在关于累亚德提案的辩论中揭露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内阁，一方面埋怨运输工具不够，同时却派遣运输船只经过太恩河畔新堡到朴次茅斯去装运煤炭，或是派遣船只从克莱德到利物浦、从德普弗德到乌里治，让 Surveyor（航海船只检查员）去进行巡视。

由于 6 月 18 日的失利，因此必须火速派遣增援部队。根据这种情况，昨天发布了命令，要不久前从锡兰回来的第十五步兵团立即登舰；第五十一皇家轻步兵团，第八十和九十四步兵团，由各个后备连组成的原来预定用于印度的所有小部队以及 1200 名骑兵必须立即开往战区。同时打电报到马赛命令急速调汽船给马尔他岛的总督和直布罗陀的总督以及伊奥尼亚群岛的 Lord High Commissioner（高级专员）使用，以便在派去换防的团和民军到达以前，就利用这些船只把驻防军和近卫旅预备队的全部适于服役的人员以及一切可以调出来的后备营都调出来。而且要立即从直布罗陀调出第十三轻步兵团，从伊奥尼亚群岛调出第三十一步兵团，从科尔富岛调出第四十八步兵团，从直布罗陀调出第五十四、

第六十六步兵团和苏格兰高地的第九十二步兵团。这样一来，不列颠在克里木的兵力就将增加 13000 人以上。此外还应加上 4 个野炮连、1 个骑炮队和攻城炮队的增援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只等待运输船只。然而英国现在就像处在 1854 年的状况。它没有后备部队。而且情况比 1854 年更坏。在 1854 年，正如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断言的，帕麦斯顿阻挠建立民军，迟迟不实行这一措施，而在 1855 年，已经建立起来的民军几乎被他解散。从上面所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增援部队不仅包括军队的主力，而且还包括后备营和骨干。这样，英国的情况就使人想起了孟德斯鸠著作中的那个野蛮人，他为了获取树上的果子，把树也砍倒了。这个 *par excellence* (最道地的) 节俭的国家所花费的是它的军事资本，而不是利钱。阿尔伯特亲王要求给予绝对信任的内阁玩弄手腕的结果就是这样！大陆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看法，说英国人口太少，提供不了军队；没有比这更错误的看法了。在 1815 年，即在二十二年战争以后，英国的武装力量在 35 万人以上！然而内阁却故意轻视这样两种办法：提高常备军的薪饷和进行民军的抽签工作！1827 年，利文公爵夫人偿还了这位首相的债务，1830 年利文公爵夫人使他当上了外交大臣，首相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俄国对土耳其实行了八年的统治，而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期满前一星期又在达达尼尔海峡条约中使俄国仍旧保持了这种统治¹⁹³——对这位首相还能期望什么呢？

昨天罗巴克在下院宣称，7 月 3 日（星期二，即再过一个星期）他要提出下列提案：

“议院对军队在克里木的冬季战局中遭受苦难深感悲伤，它同意它的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意见：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使军队遭到灾难的首要的和

主要的原因,因而它严厉谴责这个内阁中由于自己的建议而导致这种悲惨结局的每一个成员。”

这样,罗巴克的提案就有意识地把帕麦斯顿、罗素、克拉伦登、格兰维耳和兰斯唐——这些既是这一届内阁的成员同时又是上一届内阁的成员都包括进去。这个渺小的、刻薄的、与瑟息替斯很相像的、而且又是老练的、完全掌握了议会策略的道道地地的律师,看来是被迫提出这种提案的,因为罗巴克在设菲尔德的选民曾经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投不信任票威胁过他——这个在星期二指责过帕麦斯顿而在星期四又投票信任同一个帕麦斯顿的人。阿尔伯特亲王对内阁和议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倒霉的干涉以及他对议会自主权的挑衅行为,是提出这个再一次威胁女王要夺去她“所信托的仆从”的提案的第二个原因。

关于行政改革派最近的活动和诡计以及迷信宗教的人的阴谋,我们下一次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6 月 26 日
“新奥得报”第 291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 反教会运动。——海德
公园的示威

伦敦 6 月 25 日。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它尚未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候,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现在英国寡头政治的表现就是这样。它的孪生姊妹——**教会**的表现也是这样。英国国教会内部(“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都包括在内)曾无数地试图改组,企图调和与非国教徒之间的分歧¹⁹⁴,以便集中力量来和全国不信上帝的群众相对抗,现已迅速地接二连三地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以前叫做艾释黎勋爵的那位虔诚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上院悲痛地确认:仅仅在英格兰就有 500 万人不但完全离开了教会,而且根本不信奉基督教。国教会答道:《Compelle intrare》(“强迫进来”)^①。国教会要艾释黎勋爵和像他一样的那些

① 福音书里的话。——编者注

非国教的、宗派主义的、歇斯底里的信徒们为它火中取栗。

第一个宗教方面的强制性措施是 Beer Bill (啤酒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星期日任何公共娱乐场所除晚上 6 点到 10 点以外，一律不准营业。这个法案是在虔诚的先生们以答应延长专卖制的有效期限，即答应保持大资本的垄断地位来换取了伦敦大啤酒店老板的支持以后，在议院的几乎无人出席的会议快结束时偷偷地通过的。接着就是 Sunday Trading Bill (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这个法案现已在下院三读通过，个别条文刚刚在下院全院委员会¹⁹⁵的会议上讨论过。这个新的强制性措施也得到了大资本的支持，因为星期日做买卖的只是一些小店铺，而大商店总是愿意用议会的手段来消除小店铺的星期日的竞争的。从这两件事中我们看到教会和垄断资本共同策划的阴谋；这两件事情表明，宗教的惩治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下层阶级，而使上层阶级在良心上可以安静下来。Beer Bill 对贵族的俱乐部妨碍不大，正如 Sunday

Trading Bill 并不影响特权阶级的星期日活动一样。工人阶级是在星期六晚上领到工资的。因而星期日的买卖只是为它而存在的。只有工人才不得不在星期日购买他们所需的一点点东西。所以新的法案打击的对象只是工人阶级。在十八世纪法国贵族说过：伏尔泰，给我们；弥撒和什一税，给人民。在十九世纪英国贵族说：信奉上帝的话，由我们来说；执行上帝意志的事，让人民去做。基督教的古圣先贤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而鞭答自己的肉体；今天的有教养的圣者们却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鞭答人民的肉体。

这一骄奢淫逸、腐化堕落、贪求享乐的贵族阶级和教会的联盟，这一靠啤酒店大老板和垄断资本家大商人齷齪的利润来维持的联盟，昨天在海德公园引起了自乔治四世这个“欧洲第一位绅

士”死后伦敦从来未见过的**大规模的示威**。这个示威我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如果说**英国的革命昨天已在海德公园开始**，我们认为这并不是过甚其词。最近从克里木来的消息对于这个“**非议会的**”、“**议会外的**”和“**反议会的**”示威说来，有效地起了酵母的作用。

人们向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起草人**罗伯特·格娄弗诺勋爵**提出了谴责，说他的法律只是为了反对穷人而不是反对富人，而格娄弗诺勋爵这样回答道：

“贵族已大为节制，在星期日不再使他们的仆人和马匹过分劳累了。”

上周周末，在伦敦的墙上到处可以看见贴着**宪章派**所出的这样一张用大铅字印的宣传品：

“**新的星期日法案禁止穷人**读报、修面、吸烟、吃喝，禁止穷人享受他们现在还能享受的一切生理上和精神上所需要的饮食和休息。星期日午后，在海德公园将召开一次手工业者、工人和首都‘**底层**’的其他代表的**露天群众大会**，让我们亲自来证实，贵族究竟是怎样虔诚地遵守假日诫条的，他们究竟是如何操心在这一天不再使他们的仆人和马匹过分劳累的，看看究竟是不是像格娄弗诺勋爵所说的那样。大会定于3点钟在瑟盆坦湖（海德公园里的一条小河）的右岸，在通向肯辛顿公园的路上举行。欢迎参加，并请携带妻子儿女，以便让他们也能从‘**上等阶级**’给他们树立的榜样中吸取教益！”

应当指出，正如巴黎人的**朗香**一样，海德公园瑟盆坦湖畔的马路是英国 *haute volée*（上层）人士在下午，特别是在星期日炫耀自己的豪华的马车和服饰的地方，他们带着大群仆役在这条马路上昂首驰骋。从上述的宣传品可以看出，反对僧侣主义的斗争，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严重斗争一样，同样具有穷人反对富人、人民反对贵族、“**下层**”阶级反对“**上层**”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

到那天下午3点钟，约有5万人聚集在指定的地点，即海德

公园瑟盆坦湖右岸的广阔的草地上。不久，由于左岸的人不断涌来，聚集的人数至少增加到了 20 万。可以看到，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在挤来挤去。在场的大批警察显然企图剥夺大会组织者们的这件阿基米得为了扭转全球而要求的东西——立足点。终于，人数比较多的一群人守住了一块地方，宪章主义者**布莱**就在这群人中间的一小块较高的地方站了起来执行主席的任务。可是他刚开始讲话，警察局督察员班克斯就带领 40 名手里挥动着警棍的警察走过来，并向他们宣布，公园是**皇家的私产**，不准在这里开会。于是进行了工夫不大的 pourparlers (交涉)，布莱当时想证明公园是公共财产；班克斯对他说，按照上级的命令，如果布莱坚持自己的意图的话，就要把他逮捕起来。布莱随即在周围群众的愤怒的呼声中喊道：

“女王陛下的警察宣布海德公园是女王的私产，女王陛下不愿把自己的地方借给人民开会。那我们就到牛津市场去吧。”

人们一面讽刺地高喊：《God save the Queen!》（“愿上帝保佑女王!”），一面散开，各自向牛津市场转移。可是在这时候，宪章派执行委员会¹⁹⁶的一个委员芬伦被挤到比较远的一棵树那里去了。跟在他后面的那些群众转眼间就把他紧密地围起来，以致警察也只得放弃了捉他的念头。

他说道：“一个星期有六天他们在压迫我们，而议会还要抢走我们在第七天所享有的一点点自由。寡头们、资本家们和翻白眼的牧师们一起昧着天良杀害人民的子弟，使人民的子弟在克里木惨遭牺牲，他们自己不去**赎罪**，却要我们替他们**赎罪**。”

现在，我们抛开这一群人，去看看另外的一群人吧。那里有一个演说者伸着两手倒在地上，就这样平卧着向听众讲话。忽然四面

发出了喊声：“到马路上去，到马车那儿去！”这时大家已经开始向马车上的人和骑马的人发出了侮辱性的嘲笑声。不断从城里获得增援的警察，赶走了在马路上闲逛的人们。这样，他们就使得从阿普斯利大楼经罗敦路直到肯辛顿公园这段沿着瑟盆坦湖要走一刻多钟的道路上两边都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人。这些人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工人，三分之一是资产阶级人士，全都带着妻子和孩子。坐在高大而华丽的马车上并由身穿制服的仆役前后呼拥着的、温文尔雅的女士们和绅士们、上下两院的议员们，以及葡萄酒喝得全身燥热的骑着马的上了年纪的老爷们，这些不由自主的演员们，这一次却不能大摆阔绰派了。他们简直就像穿过棒列似的。讥讽的、激愤的、侮辱的字眼（这种字眼在哪种语言里也没有像在英语里这样丰富）立即像连珠炮似地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打来。由于这个音乐会是在临时凑起来的，所以缺少乐器。因此合唱者们可以利用本身的可能条件而使演出只限于声乐。大声讪笑、发嘘声、呼哨声、嘶哑的叫喊、跺脚声、喃喃的埋怨、咆哮声、高声尖叫、呻吟声、呐喊、哭诉、咬牙切齿声，所有这些声音结合成一个什么样的恶魔的音乐会啊！这是一种足以使人发狂、使顽石点头的音乐。真正古英国式的幽默和压抑已久的狂怒奇特地混在一起爆发了。唯一可以听得清楚的喊声是：《Go to the church!》（“到教堂去！”）有一位女士为了使气氛缓和一下，很虔诚地从马车里递出一本精装的 prayer book（祈祷书）来。千百个人的声音像霹雷一样地回答：《Give it to read to your horses!》（“叫你们的马去读吧！”）每当马因受惊而直立或跑跳起来狂奔因而威胁着它们身上的文雅货物的生命时，嘲笑声就来得更大、更猛、更无情。高贵的勋爵们和女士们，其中有格兰维耳伯爵夫人，即大臣、枢密院院长的夫人，不得不走下车来，用自己的

两条腿走路。当那些可敬的绅士们(他们穿的衣服,尤其是他们戴的宽边帽子,就说明他们特别要装出一副笃信宗教的样子)骑着马走过的时候,就像有人下了命令一样,怒吼声忽然变成了不可遏制的哄笑。这些绅士中间有一位忍无可忍了。他像摩菲斯特斐勒司一样扮了一个鬼脸——向敌人吐舌头。在路一边有人喊道:《He is a word-catcher, a parliamentary man! He fights with his own weapons》(“这是个专门吹牛的家伙,是议员,他用他自己的武器打仗!”)另一边有人就回喊:《He is a Saint! He is psalm singing!》(“他是个圣者,他是唱圣诗的!”)这时候,通过市内电报通知了所有的警察派出所说海德公园发生暴动,命令他们立即开赴战场。过了不多一会儿,就有一队队警察接连着从站在阿普斯利大楼到肯辛顿公园的马路两旁的人群中间开过,人们每次都用下面这首民间小调来迎接他们:

《W here are gone the geese?

A sk the police!》

(“要问鹅哪里去了?

那只有警察才知道!”)

这里指的是不久以前一个警察在克勒肯威尔偷鹅那件远近皆知的事情。这个场面继续了三个钟头。只有英国人才能有这样的本领。在人们大喊大叫时,在各个人群中都可以听到:“这只是开始!”“这只是第一步!”“我们恨他们!”等等。在工人们脸上可以看到愤怒的表情,而在资产者的脸上却浮现出我们一次也还没有见过的那种怡然自得的微笑。在快要结束的时候,示威者们的激愤情绪更加强了。他们挥舞起棍棒要打马车,无休止的喧哗汇成一种喊声:《Y ou rascals!》(“你们这些坏蛋!”)在这三个钟头

里，积极的男女宪章主义者一直挤在人群中散发传单。传单上面用大字印着：

“重整宪章运动！” 兹定于下星期二，即 6 月 26 日在弗来尔街的文学科学研究会，在民法博士会馆举行群众大会，选举参加首都的重整宪章运动会议的代表。自由入场。”

今天绝大多数的伦敦报纸关于海德公园的事件，只刊登了简短的报道。除帕麦斯顿的“晨邮报”以外，没有一家报纸对此事发表社论。

“晨邮报”写道：“在海德公园发生了最不成体统的、最危险的事情。这是公开侮辱法律、不顾脸面的举动，是用暴力非法干涉立法当局自由活动。必须防止下星期日再度发生这种事情的危险。”

同时该报却又宣布“狂热的”格娄弗诺勋爵是这次骚动唯一“应负责任的”祸首，责备他引起了“人民的正当的愤懑”。好像议会没有三读通过格娄弗诺勋爵的法案似的！或者也许高贵的勋爵也“用暴力”影响了“立法当局自由活动”吧？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6 月 28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295 号

卡·马克思 消息数则

伦敦 6 月 26 日。昨天在下院的会议上奥特韦先生站起来问道：

“帕麦斯顿勋爵是否打算采取某些措施以促使格娄弗诺勋爵撤回自己的 Sunday Trading Bill (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全场发出赞同的呼声)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如果我的高贵的朋友(格娄弗诺)听到了全场的这些赞同的呼声，那末，我想他会重视这些呼声的。”(表示赞同的呼声)

显然，海德公园的群众示威吓坏了下院。下院拒绝了这个法案并且 *bonne mine à mauvais jeu* (强作欢颜)。“泰晤士报”把海德公园星期日的场面叫做“应得报应的伟大举动”，把法案叫做“阶级立法”的产物，“有组织的伪善手段”，并拿“议会的神学”来取乐。

关于汉格的罪行，海军首席大臣查理·伍德爵士通知说，他收到了海军上将邓达斯的新的报告。从报告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被俄军炮火击毙的有 5 名水兵和 1 名芬兰舰长，负伤被俘的有 4 名水兵和 2 名芬兰人，无伤被俘的有 3 名军官、4 名水兵和 2 名芬兰人。海军上将邓达斯给赫尔辛福斯的省长去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事实，并对射击挂有白旗的船只的暴行提出最坚决的抗议。邓

达斯得到了答复，省长在答复中表示道歉，并对已发生的事作了某种程度的辩白。他解释说，据军官和兵士们说，他们没有看见白旗。他们曾经非常激怒，因为在其他一些情况下船只升起的是俄国旗帜；此外，报纸报道过英国船只为了测量海洋深度曾在别的地方用过白旗。这样一来，全部辩解都归结为俄国兵士和军官们的眼睛近视。不管怎样，俄国兵士能读报并且报纸的报告引起他们的“非常激怒”，这已经是文明的标志。

行政改革协会通知明天在德留黎棱召开新的群众大会。和从前一样——凭票入场，演讲人也是事先指定的。本丢·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帕麦斯顿问道：功绩是什么？行政改革派回答说：人的功绩就是他一年的收入^①。根据这一点，我们的改革派在自己的组织内进行了改革。从前总委员会的委员们——实际上是自己选举自己的——表面上应由协会全体会员投票选出。而现在凡是每年向协会捐献 50 或更多英镑的人，都能自动地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从前为了防止下层阶级分子参加“运动”，加上 10 个基尼和 1 个基尼的附带条件就够了。现在 10 个基尼的先生已经不那么“受人尊敬”，而 1 个基尼的先生们就完全被看做《mob》（“平民”）了。在通知召开群众大会的宣传品上明确地写着：

“仅凭发给协会会员的票入场。缴纳 50 和更多英镑者为总委员会委员，缴纳 10 个基尼和 1 个基尼者为协会会员。”

由此可见，协会内会员的权利是按照基尼的调节制计算的。肆无忌惮地在宣扬着基尼的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统治。西蒂区改革派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原来是这样的鼓动家！而且，最近的情

^① 双关语：《Verdienst》意思是“功绩”，也是“收入”，“利润”。——编者注

况对他们并不十分有利。德拉蒙德在议会内公开责备他们“一贯不道德”和“贪污”。说明他们阶级纯洁性的例证就像是按照口令那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起初“手术刀”（医学杂志）举出证明说：各种商品和食品的伪造和变坏决不只是小商人的罪过，批发商业公司通常也干这些事情。后来又听说，西蒂区的“受人尊敬的”公司发行了伪造的 dock warrants（船坞仓库证券）。最后是斯特兰、约翰·保罗爵士和贝茨的私人银行的大规模 fraudulente（预谋的）倒闭，同时直接吞没了寄存的有价证券。最后这件事也教会了贵族要重视西蒂区先生们的“管理”天才，因为银行“管理”的首先是贵族们的基尼。帕麦斯顿受了损失，克兰里卡德侯爵受了损失，而纳皮尔海军上将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教会也失去了不少的尘世的福利，因为斯特兰、保罗和贝茨等先生们特别以自己的虔诚出名，他们有时主持“向多神教徒传教”的埃克塞特会堂会议，他们是“圣经传播”协会的主要捐献人，并且担任了“罪犯改造协会”的理事。他们的信仰为他们创造了威望。他们的银行成为信教老爷们和私人团体特别喜欢的银行。但是，银行家们的“管理”天才对什么也不爱惜：既不爱惜孤儿寡妇的钱财，也不爱惜水兵们的微小的存款。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支配他们现在正向其伸手的“公款”呢？

Par excellence（主要是）西蒂区改革派机关报的“每日新闻”忧郁地感叹道：“现在在我们中间正出现这样一些预兆，这些预兆表明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可以在工业阶级中举出一些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斯特兰之流的先生们的破产自然造成了公众对西蒂区私人银行出纳处的《run》（“挤兑”）。在这以前，这种私人银行比股份银行更具有不可比拟的威信。大的私人银行家已经意识到不能不

“公开鼓励”相互定期检查寄存在他们那里的有价证券，也不得不通过“泰晤士报”邀请自己的账户来亲自检查他们存放在银行里的贵重物品。还有一个情况对西蒂区改革派先生们来说也极不凑巧：大家知道，西蒂区巨头之一路特希尔德正作为他们的当选人站在下院的门外，但是还没有被允许进入殿堂，因为他不愿宣读“真正基督徒的誓词”¹⁹⁷，而他的同僚约翰·罗素勋爵不想“实现”关于犹太人的法案。因此，昨天邓科布发了言。在他知道根据1782年议会法令，每一个当选后同政府订立任何供应合同的议员都要被褫夺在下院的席位，以及不久前路特希尔德给国库提供了1600万英镑的贷款后，他声称明天晚上他要提出关于在西蒂区进行新选举的目的的提案。不但如此。马林斯接着邓科布发言，他对林赛提出类似的提案，因为在辩论改革问题时，查理·伍德爵士曾公开指责林赛同政府订立了船只供应合同，可是林赛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议员。这整个事件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像西蒂区的巨头和改革派当中的巨头这样一些人物被弄得身败名裂。它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它提醒公众：藐视1782年法令的皮特、派西沃和利物浦正是通过西蒂区最显赫的生意人，即通过一些同政府订立贷款和供应合同的人士为自己在议会内外找到了支持。这批金融贵族——在当时，比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更为卖身投靠——曾是反雅各宾战争的灵魂。财政寡头们一方面摘下了赫斯贝里德姊妹的金苹果，同时在西蒂区的臭名昭彰的群众大会上劝说，全国人民

“要献出金钱和鲜血，以便把我们神圣宗教的极美好的安宁生活从褻渎教堂的法国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把自己从无神论的悲观绝望中拯救出来”。

因此，使全国人民在最不适当的时候想起了：现在起来反对

寡头政治的西蒂区恰好就是这个寡头政治赖以生长和开出绚烂花朵的苗圃。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26 日

载于 1855 年 6 月 29 日

“新奥得报”第 29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¹⁹⁸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昨天早晨“太平洋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中没有关于6月18日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败北的详细报告。诚然,我们有几篇谈及这次行动中死伤人数的贫乏的报道,这在下面将要简略地提到。大家所期待的报道没有送到,最后,送来了佩利西埃将军关于攻占马美朗和采石场的详细报告。不过就连这份报告也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位实际上在克里木指挥着20万联军的人物所遵循的作战计划。如果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得出什么结论,那末我们与其依靠正面的材料,倒不如依靠反面的材料。要判断佩利西埃准备怎样行动,主要的应当不是去分析他在干什么,而是分析他不干什么。但是,我们想再谈谈攻占马美朗的情况;这一行动的某些特点值得加以分析。

6月6日和7日,联军的炮队对全线进行了轰击。这次轰击在左翼(自马奇塔棱堡至卡兰亭棱堡)仅是虚张声势,而在右翼(自大凸角堡至萨蓬山)则是认真进行的。这里俄军的外围工事受到特别猛烈的轰击。6月7日傍晚,当看来俄军炮台的火力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下去,而炮台的防守者也被大大削弱时,曾下达了强攻的命令。法军应以猛攻夺取两个互不相连的阵地,它们是被一条山谷隔开的两个台地;英军则应夺取两侧都是山谷的一个台地。两支军

队在准备强攻时采用的方法反映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传统。法军派出了四个师，每两个师强攻一个阵地。这样，就为强攻马美朗（堪察加多面堡）集中了两个师，又为强攻萨蓬山集中了另两个师。而且每个方向上的第一梯队都有编成强攻纵队的两个旅，另两个旅作为预备队。由此可见，担任强攻的有 18 个营，又有同等数量的营作为预备队，两者合计至少有 28000—30000 人。这种战斗队形完全符合法军的操典和传统，因为他们在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时总是列成纵队，有时似乎是过于庞大的纵队。英军如果以同样的战斗队形来完成他们的任务，那就需要两个师：以两个旅进行强攻，两个旅作为预备队。然而，他们却按照自己的战术原则，派出了 1000 人左右担任强攻，这大致相当于两个营，也就是说，几乎还不到法军半个旅的兵力。毫无疑问，他们有强大的预备队；然而，在法军要用三个人的地方，英军却只用一个人。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军用横队的而不用纵队的进攻方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英国兵在防御阵地上具有高度的顽强精神。应当指出，甚至这 1000 名英国兵也不是一下子都投入战斗的，而是先用 200 人进行攻击，以强攻夺取了俄军的工事，然后再派出 200 人前往增援，其余的兵士也都是这样投入战斗的。在这以后，所有 1000 名英国兵都在俄军阵地上巩固下来，扼守住了这些阵地，在俄军工事的不间断的正面射击和纵射之下连续击退了六次攻击。到拂晓，英军伤亡过半；但他们守住了阵地，而且个别小股英军在追击俄军时甚至冲进了大凸角堡。1000 名法国兵永远也不会取得这样的战果。英国兵在敌人火力下表现出的那种镇静沉着的精神几乎是无限度的；像那天夜晚那样，当白刃格斗使英国兵想起他们最喜爱的消遣——街头打架时，他们就感到是在自由的天地里，就毫无惧色地、如醉如狂地一个人和六个人对

打起来。

佩利西埃将军在谈到法军攻击的情况时，给我们详细地叙述了参加攻击的各旅和各团的情况，并对每个部队都用了褒奖的词句；但是他对每个纵队的出发地区和攻击线却说得极不明确，对战斗过程也写得非常含糊，而且在他的报告里根本没有提到损失的数字。把这份官方报告同其他报道对照一下，我们便可得出结论：法军在第一次攻击时就夺取了马美朗，把退却的俄军一直追到马拉霍夫冈，并在某处冲进了这个棱堡，但被俄军逐出；接着法军又失去了马美朗，成半圆形卧倒在它的周围，终于，在第二次攻击后又将它占领。而基连谷另一面的沃伦多面堡，法军未受重大损失就把它占领了；争夺这个多面堡后面的色楞格多面堡的战斗虽较为激烈，但远不能同争夺马美朗的战斗相比。由于佩利西埃派往攻击地点的部队人数众多，而且显然又是列成庞大的纵队，因此法军的损失一定很大。官方没有公布损失数字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依我们看来，如果把这次的损失估计为 1500—2000 人，也并不夸大。

至于说到俄军，他们的处境是困难的。他们不能派遣大量的兵士到外国工事去，因为那样必定会使一部分俄军还在强攻开始之前就被敌人的炮火歼灭。因此，他们在这几个多面堡里只能保留最低数量的守军，而且必须依靠马拉霍夫冈和大凸角堡上控制周围地区的炮兵的火力，以及依靠配置在要塞内的预备队的行动。在马美朗，他们有两个营，约 800 人。但是在这些多面堡被敌人攻占以后，俄军就不能把它们夺回来并在里面很好地巩固下来。他们懂得，被围攻的军队失去一个阵地可能很快，但要再把它夺回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此外，马美朗多面堡构筑得如此复杂（堡内的横墙和

避弹所构成了某种临时的穹窿),以致堡内的守军即使能极好地躲避敌人的炮击,但在敌人强攻时却几乎束手无策,因为每个隔间只能勉强容纳火炮和炮手。因此火炮从炮架上一卸下来,那些应在强攻时防守工事的步兵,就没有足够的地方用作射击位置来对强攻纵队同时进行猛烈的密集射击了。这些步兵由于分散成小队,因此经受不住强攻者的猛攻。他们又一次证明:当俄国步兵不能用大量兵力作战时,在行动的迅速和机动灵活方面便不如法军,而且也没有英军那种死咬住不放的精神。

在6月7日的战斗以后,平静了10天。在这段时间里,联军的堑壕和交通壕已经挖好,炮队的阵地已经选好,火炮和弹药都已运到。同时联军向腹地派出了两支侦察队。派往拜达尔(位于通往南海岸的道路上,距巴拉克拉瓦12英里)的一支侦察队只进行了试探性的侦察。派往艾托多尔(位于靠黑河的乔尔贡以东6英里处)的另一支侦察队则派到了需要的方向。艾托多尔位于通往贝尔贝克河上游盆地的高地上,要知道,正像我们早已指出的^①,只有经过这条路才能真正迂回因克尔芒附近的俄军阵地。但是仅向那里派出一个侦察纵队,而不紧接着以强大的兵力去占领这一地区,也不立即开始战斗行动,这只意味着向敌人指出危险的方向,使他预有戒备。当然,艾托多尔周围的地形可能是难以通行的,但是我们对这点有怀疑;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联军所采取的机动也过于明显地暴露了从翼侧迂回敌人的意图。如果这次侧敌行军可以作为吸引敌人注意力的佯动,那才可能是完全适当的,但是我们确信,这次行军是主要的行动,因此,联军不应当在真正着手执行这

^① 见本卷第259—263页。——编者注

样的计划以前就把它暴露出来。

可是佩利西埃将军不去扩大这些小规模的机动，却采取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行动。6月18日，滑铁卢会战纪念日那天，英军和法军一起在右翼对俄军阵地发起了强攻，英军攻击大凸角堡，法军攻击马拉霍夫间。他们本来打算这样来为滑铁卢会战雪耻，但是遗憾得很，进攻没有成功。联军被击退，损失很大。官方公布这次伤亡约5000人，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法国的官方报道一向是不真实的，因此不得不再增加百分之五十。因为还没有详细的材料，我们暂时还不能谈论这次会战的战术特点。现在要研究的只是这次会战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

欧洲的所有报刊都把佩利西埃描写成一个无法从巴黎用电报加以指挥的、独断独行的人物。但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真正具有这种独特的固执性格。他企图以法军和英军的共同胜利来“真正地”为滑铁卢会战雪耻，就完全证实我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这样的想法只能出自法国的皇帝陛下——这个迷信节日的人，这个每逢12月2日一定要竭力设法用某些不寻常的举动来表示庆祝的人，这个曾经在贵族院宣布过为滑铁卢会战雪耻是他的特殊使命的人。毫无疑问，佩利西埃曾收到必须隆重纪念滑铁卢会战的最严格的命令。他本人所负的责任，只是用什么方式来纪念它而已。

对军港区防线的强攻，应当认为是错误，这一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信不疑。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彻底了解佩利西埃，因此我们仍试图为他所有的那些在离开战区这样遥远的地方都会使人发生疑问的做法寻找辩护的理由。也许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的卫生状况（关于这一情况我们早就提请读者注意）使他很希望赶快结束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的行动。25000具腐烂的人尸和1万具马尸

发出的恶臭，在夏季对于兵士的健康有严重的危害。关于他们在那里必然会碰到的另一些可怕的现象，我们不准备谈了。显然，佩利西埃认为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俄军逐出南区，并将要塞彻底摧毁，只留下少数人在那里防守，然后以强大的部队开始野战。我们作出这样的假定，是因为想从这位老兵的行动中找出哪怕是稍许合理的动机。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就说明他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曾经谈过，想扩大6月7日的战果并开始对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本身进行强攻的任何企图，都一定会遭到失败；^①我们的意见被战事证实了。我们曾经指出过，塞瓦斯托波尔的锁钥是因克尔芒以北地区；依我们看来，6月18日的会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愿意承认，佩利西埃将军宁愿强攻军港区而不愿进行野战，是以完全合乎逻辑的想法作根据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在战区的人们往往喜欢把一些次要的事实作为自己的结论的根据，而佩利西埃正像6月18日的失败所表明的那样，显然是受了这一弱点的影响。诚然，固执地力求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这是毅力的表现，但如果只是由于事情已经开始就要勉强地继续下去，即使是潦草地进行下去，这也同时说明了缺少理智。佩利西埃无论如何都要攻下塞瓦斯托波尔，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看不到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捷径是经过因克尔芒和防守该地的俄军阵地，那末他无疑是错了。

如果联军不注意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那末他们很快或会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俄国早就认为必须增加克里木的兵力。现在由于补充了正规军的各后备营，征集了非常后备军并用以组成了

^① 见本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200 个营，特别是由于奥地利的监视军已缩减到 18 万人（其余的或者已归休，或者已调驻帝国内地），俄国就有了这种可能性。结果是在敖德萨建立了一个预备军团，其中一部分约为 25000 人，据说驻扎在尼古拉也夫附近，距塞瓦斯托波尔约 12—15 天行程。还有人说，两个掷弹兵师已由沃伦出发。因此到 7 月中旬，也可能更早一些，俄军就能够重新恢复数量上的优势，只要在这段时间内同联军对抗的俄军不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诚然，据报道又有 5 万名法军正在开往土伦和马赛途中，准备在那里登舰，但是毫无疑问，等他们到达就已经太晚了，他们除了用来弥补由于战斗和目前联军兵营里再度发生的疾病所造成的损失以外，未必能够用来解决什么问题。

阿速夫海上的行动虽然破坏了俄军的一条供应线，但是由于德涅泊河是一条比顿河重要得多的俄国产粮区的天然水路交通命脉，因此毫无疑问，在赫尔松会有很多粮食，比克里木俄军所需要的还要多。由赫尔松不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把粮食运到辛费罗波尔。因此谁期望阿速夫海的远征会立刻严重地影响塞瓦斯托波尔的粮食供应，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久前向联军一方倾斜的天平可能又要恢复平衡状态了，甚至还可能向他们的对方倾斜。如果俄军行动迅速，克里木战局就决不能认为已成定局。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 29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7 月 1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9 号，
并载于 1855 年 7 月 2 日“新奥得报”
第 30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消息数则

伦敦 6 月 30 日。由于格娄弗诺勋爵拒绝自动撤回他的 Sunday Trading Bill (禁止星期日交易的法案), 所以今天伦敦最繁华的街道上出现了号召参加明天下午在海德公园举行的新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宣传品。当格娄弗诺问道: 大多数议员意见的突然改变是不是由于海德公园的 mob (平民) 的行动引起的, 下院和藹地回答 No! No! (不是! 不是!) 下院的这种行为是相当幼稚的。

在回答一位托利党贵族的质问时, 潘缪尔顺便提到: 大臣们以女王的名义向军队发出了一项文告, 文告宣布决定大大增加某些军和团 (正在克里木战区的军和团) 的薪饷, 不仅包括他们现在服役期间的薪饷, 而且包括过去数月的薪饷, 同时退休金也要增加。这件事现在仅是以女王的名义宣布的; 虽然这时下院正在开会, 但是大臣们什么也没有通知它。这样, 大臣们便把按照宪法规定仅仅属于下院的权利——确定军队薪饷数额的权利攫为己有。不过, 再过几个星期或几天, 大臣们还得在下院出面, 以便取得对所许诺的增饷的批准。但是文告走在议会表决的前面。如果议院拒绝增饷要求, 那末它就会同军队发生冲突。对罗巴克委员会关于内阁要对军队所受的灾难负责的结论的回答就是如此。这是根据阿尔伯特亲王指示的方针中所采取的步骤之一。

昨天在下院二读通过的**包法利法案**，对英国的商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英国，到目前为止，凡是获得贸易公司一份利润的人，都算作股东，因此，他以他的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商业债务负责。按照包法利代表内阁提出的法案，这种法律规定就应当废除。更为重要的是包法利关于**股份公司**的法案。到现时为止，这种公司的每个成员不仅对他的股票总值负责，而且也以他的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全部债务负责。按照所提的法案之一规定，责任的大小以各个股东的股票总值为限，但是这只是在那些全部资本最少为 2 万英镑，开业合同由股金不少于 15000 英镑的股东签字，而且股金的已付部分又不少于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司中才是这样。需要这类法律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到目前为止财政寡头已经把立法权操纵到了什么程度，财政寡头又怎样成功地在世界上头等商业国家里使贸易协定受到最荒诞和最放肆的法律限制。新法案希望实现“使劳动和小资本跟大资本处于同等地位（在商业法中）”的原则。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呢？用这种方法：少于 2 万英镑的股本不再享受法律规定的优惠，而继续受到过去的限制。大资本不愿满足于它用来打败小资本家竞争的经济手段中的优势，在英国大资本也采取了各种法律上的特权和各种特别法，这些事实，从英国的有关股份公司和一般贸易公司的法律上得到了最雄辩的证明。例如几年以前，还规定银行不得拥有 6 个以上的股东。过了很长时间，股份公司才取得了起诉和代表董事会在法庭上答辩的权利。但是为了利用这项特权，它们应当进行登记，也就是进行合并，可是按照 1837 年的法律，合并是要由王权根据 Board of Trade (贸易部) 的呈报来实现的；因此，某一公司能否合并实际上是听凭于 Board of Trade 是否大发慈悲。银行、慈善协会、互助会等丝毫不受新法

律的影响。

今天一家日报引证了以下一项**议会统计数字**：一共有 327 个选区。其中受资本巨头控制的情况是：有 1 个资本巨头控制 9 个选区，有 4 个资本巨头各控制 8 个选区，有 1 个资本巨头控制 7 个选区，有 3 个资本巨头各控制 6 个选区，有 8 个资本巨头各控制 5 个选区，有 26 个资本巨头各控制 4 个选区，有 29 个资本巨头各控制 3 个选区；因此 72 个资本巨头控制着 297 个选区。所谓“独立的”选区仅仅 30 个。下院总共有 654 个议员，其中 594 个议员是由 297 个受控制的选区选出来的。这 594 名议员中有 274 名不是贵族的直系亲属，就是贵族。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6 月 30 日

载于 1855 年 7 月 3 日
“新奥得报”第 30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 法案所引起的风潮

伦敦 7 月 2 日。反对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示威昨天又在海德公园重演了；这次规模更大，情况更危险，后果也更严重。今天笼罩着伦敦的阴沉而激动的气氛就证明了这一点。

号召大家再度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品同时还邀请大家在星期日上午 10 点钟到虔诚的格娄弗诺勋爵的公馆门前集合，并且伴送他到教堂里去。可是这位虔诚的绅士在星期六晚上就离开了伦敦，他乘着遮掩好的马车，不给人知道就偷偷地跑了。他在伦敦所有报纸上发表的那项声明中，一方面坚持他的法案，另一方面却极力证明这个法案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毫不重要，这就说明他很会想办法使别人替自己成为殉教者。星期日一整天他的公馆都布满了人——不过不是唱圣诗的，而是 200 名警察。他的兄弟、有名的富豪韦斯明斯特侯爵的公馆也布满了警察。

星期六，伦敦警察局长理查·梅恩爵士在伦敦街上贴出布告，不但“禁止”在海德公园开大会，而且还不准在那里“成群结队”，不准以任何方式表示赞同或反对。这个命令引起了这样的结果：连警察局的报告也承认，早在两点半钟，公园里就已经有 15 万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而且人越来越多，多到连伦敦

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程度。伦敦人不仅大批前来,而且又在瑟盆坦湖畔的马路两边排列开来,这次比上星期日排得更密更宽了。只是 haute volée (上层人士)没有在场。马车大概一共有 20 辆,多半是小的双轮轻便马车和四轮敞篷马车,这些马车走过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然而比较华丽、车身比较宽大、驾驭台很高、扎有金银色绦带的马车经过时则遇到了和上次一样的接待和雷鸣般的吼声,这次轰隆的吼声把周围一里以内的地方都震动了。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就在群众大会和成千上万的人的叫喊声中被取消了。Haute volée 没有上战场,他们不在,也就等于承认了 vox populi (人民的呼声)压倒一切。

已经到 4 点钟了,示威由于缺少对象,看来变成了不会得罪人的星期日的游逛。可是警察们的估计却不是这样。难道警察们会遗憾地以告别的目光望着自己贴在公园入口处的大字布告,在人们的大笑声中撤走吗?况且警察局的长官们都在场:骑着马的有理查·梅恩爵士、警察局监督员吉卜斯和沃克,步行的有督察员班克斯、德尔金、伯莱南。800 个警察作了战略性的分散,大部分隐蔽在建筑物里,埋伏以待。更强的小队则布置在附近作为后备。瑟盆坦湖畔的马路和通向肯辛顿公园的林萨道相交地方的公园管理处、火药库、救护站,都变成了有强大的警察队伍守卫着的临时防舍,用来收容被捕者和受伤者。在皮卡第莱区的外恩街警察派出所附近,停了很多车辆,准备派赴战场把抓到的人稳稳当当地押回来。简而言之,警察局拟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如“泰晤士报”所说的,根据这个计划要进行一场比“我们在克里木听到的任何作战计划”所要进行的都更“激烈的战斗”。警察们需要把人们打得头破血流,需要抓人,为的是使自己不至于连转脸的余地都没有就一下子

由耀武扬威的样子落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于是，当路旁的人流刚刚稀疏了一些，人群刚刚向离马路较尽的公园的辽阔的空地一堆一堆地散开的时候，警长们就骑着马跑到路中央，夹在两旁的人群中间，左右顾盼地以挑衅的口吻发号施令，好像是为了保护来往的马车和骑马的人。可是因为既没有马车也没有骑马的人过来，也就没有人可保护，于是警察们就开始在“虚假的借口”下从人群中拖出一些人来，把他们当做 pickpockets (扒手) 而加以逮捕。当这种把戏耍多了，这种借口失效了的时候，人们发出了怒吼。这时警察的队伍就从埋伏的地方跑出来，挥动警棍向人群打来，直把人们打得头破血流，同时还从人群中拉出一些人来，把他们拖到临时防舍去（这样总共逮捕了 104 人）。马路的左边和瑟盆坦湖只隔着一条狭窄的地段。一个警官带着一帮警察巧妙地把看热闹的人们赶到湖边，要把他们赶下湖去洗个冷水澡。有一个人为了免吃警棍，就泅水游到瑟盆坦湖对岸，可是一个警察坐了小船去追他，得意洋洋地把他捉了回来。

今天的场面和上星期日比起来，具有多么不同的特点啊！今天看到的不是富丽堂皇的马车，而是肮脏的马车，这些车辆一直在从外恩街警察派出所到海德公园的临时牢房之间的道路上往返奔驰。坐在驾驭台上的不是仆役，而是警察和喝得醉熏熏的马车夫。车里坐的不是温文尔雅的先生们和女士们，而是被那些穿着伦敦警察制服的爱尔兰流氓无产者中的形迹可疑的家伙押着的头破血流、头发松乱、衣服撕得稀烂、赤身露体的被捕的人。今天已看不到轻挥羽扇，却只听到包着皮子的警棍（所谓警察的《truncheon》）的呼啸声。统治阶级上星期日摆出了上流社会人士的面孔，这一次则摆出了国家执政者的面孔。在满面堆笑的老绅士、花花公子、显贵

的高龄寡妇背后，在用开司米披肩、鸵鸟羽毛、花环、钻石打扮起来的香气四溢的美人背后，站着身穿雨衣、头戴亮光光的油布帽、手持 truncheon 的警察。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上星期日群众碰到的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个别代表人物。今天这些阶级是以国家政权、法律、truncheon 的形式出现的，这一次反抗它们，就意味着造反。而在英国人造反之前是必须长期地逐渐地把他们鼓动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示威者的反抗一般只限于：对警车发嘘声、叫骂和嘲笑，作一些想解救被捕者的有气无力的尝试、而主要是进行一些消极抵抗和冷淡地守卫着阵地。

值得注意的是兵士在这些场面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兵士有的属于近卫军，有的属于第六十六团。他们来的人很多。其中有 12 个是近卫军战士，有的胸前还佩戴着克里木奖章，他们都站在一群正在挨警棍的男女老少的中间。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经不住殴打，倒在地上了。一位克里木英雄喊道：“伦敦的 stiffstuffs（骂警察的绰号）比因克尔芒的俄国人还厉害！”警察想要抓他，可是群众高喊“军队万岁！”警察也就立刻住了手。警察见势不妙，转身想溜走。这时来了一些掷弹兵，兵士们排成了队伍，在群众前呼后拥之下，挑衅地在公园里走来走去，高呼：“军队万岁！打倒警察！打倒星期日法案！”警察们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来了一个近卫军军士；他大声斥责警察们的粗野行为，使兵士们平息了下来，并劝说一些兵士跟他一起回兵营去，以免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可是大多数的兵士却仍旧站在人群中，对着警察尽情地发泄自己的愤懑。英国的军队和警察之间很早以来就存在着对抗，而现在，当军队成了人民群众的《pet child》（宠儿）的时候，这种对抗就更不可能减弱了。

据说，一个姓罗素的老人今天因受伤而去世了。还有六个受伤

的人躺在圣乔治医院里。示威的时候，人们曾经试图在各个地方分别举行群众大会。在阿尔伯特门附近，即在公园里警察最初所占的那块地方的外面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有个不知名的人向群众发表了演说，内容大致如下：

“古老的英国的人们！醒来吧，从你们的睡梦中清醒过来吧，否则你们将永远倒下了。每个星期日都来和政府对抗吧！都来示威，反对教会法案，就像今天你们所做的那样！不要怕要求本来属于你们的那些权利，挣脱寡头政治的压迫和暴力的锁链。不这样做，你们就一定会被压死的。文明世界中的这个最大的首都的居民，竟让一个叫什么格娄弗诺勋爵或埃布林顿勋爵来保护自己的自由，难道这不可耻吗！勋爵阁下认为必须把我们赶进教堂，并通过议会立法强迫我们信教。枉费心机！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看看现在的战争吧！难道这个战争不是依靠从事生产的阶级，依靠他们的流血牺牲来进行的吗？而不事生产的阶级干些什么呢？他们就只能把事情搞坏。”

当然，这位讲演人的讲演和大会本身都被警察打断了。

在格林威治，在天文台附近伦敦人也组织了群众大会，参加群众大会的有 10000 到 15000 人。这个大会也被警察驱散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7 月 5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307 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论
克里木事件¹⁹⁹

伦敦 7 月 6 日。从星期一到昨天晚上，伦敦的警察同《mob》（“平民”）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前者用警棍进攻，后者用石头还击。在马尔波罗街及其附近的街道上，我们看到了使我们生动地想起巴黎情景的一些场面。昨天晚上邓科布在下院提出了调查上星期日警察的“卑鄙残酷”行为的提案。群众准备后天到派尔·麦尔²⁰⁰的俱乐部去。宪章派打算组织一次从黑袍僧桥到海德公园的武装的（不是用刀枪武装，而是用工具和木棍武装）游行，要打着旗帜，喊着《No Mayne law》（“废除梅恩法”）的口号（宪章派有意赋予这个口号以双重意思。大家知道，Maine law 是美国清教徒关于禁止饮用酒类的法规名称，而 Mayne 是伦敦警察局长的姓）。从过去的报道^①中可以看出，海德公园里的群众性示威是自发地发生的。由于警察局的挑衅性的粗暴行为，风潮后来就扩大和加剧了。而警察局长理查·梅恩爵士也就显示了他对得自巴黎的勋章是受之无愧的。然而，现在已经可以识别那些为了达到自己的进一步的目的而竭力想激发、领导和利用群众运动的各个派别了。这些

① 见本卷第 363—369、385—389 页。——编者注

派别如下：

首先是政府本身。在波拿巴逗留伦敦期间，所有反对他的标语和漫画好像变戏法一样都从墙上消失了。可是现在警察局又让那些最激烈的宣传品挂在墙上。一切都表明了正在策划着一个密谋：警察们的**奉命的**粗暴，律师们在马尔波罗街法庭上为政府辩护的挑衅性的辩词，**违法地**使囚犯踩 Treadmill²⁰¹，官方报纸的带侮辱性的语调，阁员们在议会内的吞吞吐吐的发言。也许，帕麦斯顿需要一个小规模的 coup d'état (政变) 以保持自己的内阁？或者他需要一个内部的大混乱以转移大家对克里木的注意？我们知道这位过于自信的国家活动家善于以表面的轻率来掩盖他的深奥而冷静的打算，因此我们认为他像哈巴谷式的伏尔泰那样是一个《capable de tout》（“什么都能干的人”）。

其次是行政改革协会派。他们竭力利用群众运动，一方面是为了吓唬贵族，一方面是把群众运动当做自己争取声誉的手段。因此，**巴兰坦**曾经代表他们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作为上星期日被捕者的辩护人在马尔波罗街的 Police-Court (治安法庭) 上说了话。因此，行政改革派昨天还为所有犯人偿付了罚金，赎出了他们。因此，**他们的**报纸既保护《mob》（就像政府报纸“地球报”那样称呼人民），又攻击警察局和内阁。

第三是宪章派。他们的目的是大家都知道的。

有关 6 月 18 日进攻失利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消息终于公布了。官方电文的发表推迟了几天，当然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毫无疑问，6 月 18 日事件是在东方问题上经常发生的那些荒唐和错误的最完善的典型。

法军的前进堑壕距离俄军炮台 400—500 码，英军的前进堑壕

距离俄军炮台 500—700 码。这恰好是进攻纵队在强攻时暴露在俄军炮火下而自己又无炮火支援的情况下所必须跑过的距离；在快跑时，任何像样的战斗队形都免不了会被打乱，部队在 3—5 分钟内遭到敌人步枪的射击（而这段时间是足以使他们完全瓦解的），便会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仅仅这一事实就说明了整个进攻计划的特点。本应当一开始就完全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并用不断的曲射火力有效地阻碍敌人在其工事内集结大量部队——不这样就毫无成功的希望。

俄军似乎识破了联军的计划，如果他们不是像佩利西埃所认为的那样，事先就得到了关于联军计划的情报的话。6 月 17 日他们仅仅用微弱的火力回击联军的炮火，白天把自己的火炮掩蔽在胸墙内，采取了在他们第二天抵抗攻击时几乎毫无必要的预防措施。但一夜之内火炮便移到了自己的阵地，调来进行防御的各个纵队和预备队也都占据了自己的岗位。

佩利西埃和腊格伦之间商定的最初的计划是：6 月 18 日拂晓恢复炮击，并在数小时内全力射击，然后以七个纵队突然和同时开始强攻。一个纵队（法国纵队）进攻基连谷附近的棱堡，两个纵队（法国纵队）进攻马拉霍夫冈，三个纵队（英国纵队）进攻大凸角堡和一个纵队（英国纵队）进攻大凸角堡和内港末端之间的一片房屋和墓地。既然原就打算进行强攻，那末这个计划是十分明智的。计划如果实现，俄军的火力就会被压制下去，俄军为了进行防御而集结的部队也会在进攻开始以前就被击溃。另一方面，联军部队在堑壕内集结时也必然会因俄军的射击而遭受损失，而且防御者大概也会很快发现用来向他们的阵地进行白刃冲击的纵队。但这是最小的灾难。尽管有着这些缺点，最初的计划仍不失为当时条件下的

最好的计划。至于这个计划怎样被破坏，佩利西埃对月桂冠的期望怎样落空，联军怎样不得不在复辟帝国之鹰的庇护下经历“步兵的巴拉克拉瓦”——所有这些我们明天再谈。

今年的夏天好像会给“圣徒们”带来严重的考验。伦敦的第一个银行家、教友派的著名首脑、既笃信宗教又同样富有的葛尼（本生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好像由于在斯特伦德的预谋的破产而名誉扫地了。他知道斯特兰商行倒闭了，但是又给它贴现了37000英镑的期票，从而使这家商行能够再哄骗公众达数月之久，而自己也能毫无所失地摆脱困境。尘世的报刊因为上帝的选民也不是浑身清白而正在幸灾乐祸。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7月6日左右
载于1855年7月9日“新奥得报”
第313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
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444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六月十八日的强攻

伦敦 7 月 7 日。昨天我们分析了联军 6 月 18 日强攻的最初计划。6 月 17 日夜晩，佩利西埃获悉俄军企图在次日对马美朗发起新的大规模进攻。本来，佩利西埃应当把这看成是真正的幸事，因为马美朗的防御无疑能够经得住俄军可能派来的任何兵力的猛攻。否则，马美朗（现名布兰西昂多面堡）还怎么能成为强攻马拉霍夫冈的作战基地呢？因此，俄军在进攻马美朗失败后，就必然要很不幸地接着进行一次防守马拉霍夫冈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对这一阵地进攻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可是佩利西埃却另有考虑。他在深夜撤销了炮击的命令，确定清晨 3 点钟进行强攻。强攻的信号是三发信号弹。关于命令变动的情形也通知了英军。

整个这次行动以其应有的结局而告终，这完全符合拿破仑——真拿破仑对那些优柔寡断、庸碌无能的将军们一生的活动所说的一句名言：《Ordre, Contreordre, Désordre》（“朝令夕改，一片混乱”）。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半小时，右翼上最靠边的法军纵队已经进入战斗。它究竟是被俄军的假出击拖入战斗的，还是像佩利西埃所断定的那样，是由于一位将军把法军的爆炸弹看成了信号弹而进入战斗的，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不管怎样，佩利西埃被

迫提前发出了进攻信号，而那些还正在堑壕里寻找指定地段的纵队，只好在有一半人处于混乱状态和一部分人不是从指定的出发地点出发的情况下开始进攻。原定从翼侧迂回马拉霍夫冈的法军的中央纵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突入了俄军的工事；可是另外两个纵队却未能冒着雨点般的霰弹和枪弹冲进去。每一个纵队由一个旅（四个营）组成；每个师的另一个旅作为第二线部队，而近卫军则组成总预备队。可见司令官掌握的兵力约为四个师，即两万人。第二线的部队曾被用来支援最初的攻击，但未成功。最后，近卫部队也投入了战斗，但同样受阻，接着也被击退。这时司令官手里只剩下了两个营。时间已经是8点半了。组成中央纵队的那个旅突入俄军的工事，但是被赶了出来。在所有的地方法军都被击退，损失惨重，而手边又没有生力军。英军的进攻同样没有成功。于是佩利西埃下令退却，按他的说法，退却进行得“颇为体面”。

在英军的攻击地段上，每一个先头纵队只有1800人，比法军的每个先头纵队少1000人。这1800人当中，1000人用于战斗，其余的800人则用来完成各种必要的作业。每旅派出先头纵队后余下的1200—1400人配置在先头纵队后面作为第二线部队。每个师的另一个旅则配置在前一个旅后面作为第三线部队。最后，由近卫部队和苏格兰高地部队（第一师）组成总预备队。可见，集中在作战地区的英国步兵的总数中，只有7200人准备用来投入最初的攻击，而其中只有4000人能真正参加战斗。先头纵队的人数所以这样少，一方面是由于英军的传统，一方面是由于英军成横队进攻的习惯。所有的报告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英军这一次仍是成横队进攻的，使自己白白地成了敌人霰弹的好靶子。部队在狭

窄而又不正规的堑壕里前后排成四个横队的困难，一开始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带来了损失。如果战斗稍许激烈一些的话，还会使部队完全乱成一团。第一和第三纵队（从右向左算起）应当从两侧迂回大凸角堡，而第二纵队则应当在这两个纵队达到目的以后，立即对大凸角堡进行突然攻击。第四纵队，即最左边的纵队，应向内港南端方向攻击。

当信号发出时，英军各纵队也和法军一样，还正在向指定的阵地前进。第一纵队毕竟还是越过了堑壕的胸墙，但立即遭到极其猛烈的霰弹射击。在翻越胸墙时各列混在一起的部队怎么也排不成战斗队形。指挥这个纵队的耶伊上校曾经呼唤号兵，以便命令他发出退却信号，但没有找到号兵，因此部队继续毫无秩序地前进。有些兵士突入大凸角堡周围的鹿砦区，但是这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这个纵队大部分立即退了下來，在堑壕里寻找掩蔽地点。第三纵队晚了一两分钟才出动。他们迷失了方向，没有从侧面迂回大凸角堡，却从正面向大凸角堡攻击。他们冒着致命的弹雨勉强前进，但队形被破坏，几分钟以后就混乱不堪地退却了。在腊格伦勋爵的复杂的预备队的任何部分还没有来得及去支援以前，对大凸角堡的攻击就这样结束了。第二纵队看到应当从两侧支援自己的那些部队遭到如此意外的失败后，吓得甚至没有跃出堑壕。只有第四纵队在墓地及其周围的房舍里站住了脚。约 1800 人在这里坚持了整整一天；他们无法退却，因为后面是处在俄军交叉火力之下的开阔地。他们奋战到晚上 9 点钟，然后在夜暗的掩护下退了下來。伤亡占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佩利西埃对军港区的大规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行动是仓促地决定的，而在最后的时刻又更加仓促地根本改变了这个决定，战斗指挥也显得特

别无能。6月19日休战时有个俄国军官向英国军官提的问题很对：“昨天你们的将军们在指挥强攻时，该不是喝醉了酒吧？”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7月6日

左右

载于1855年7月11日“新奥得报”

第317号，并作为社论载于1855

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4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议会新闻：罗巴克和
布尔韦尔的提案

伦敦 7 月 11 日。大家知道，对上一届联合内阁的全体阁员表示谴责的罗巴克提案，原订于下星期二进行讨论。在北明翰、设菲尔德、新堡和其他地方都组织了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来支持他的提案，同时在伦敦各个角落公开征集在有关该问题的请愿书上签名，可是，议员们却跑到巴黎、那不勒斯及自己的田庄逃避表决。罗巴克竭力想制止这种为帕麦斯顿所大力支持的逃避行为，他昨天要求授权宣布下星期二在下院实行《Call》（“点名”）。《Call》是一种旧的议会程序，自从进行有关解放天主教徒的辩论以后就被人遗忘了。这个程序要求在会议开幕时对所有议员进行点名。不到会者应由议会警卫逮捕，他们必须在议会会议上当众认罪，并处以一定数量的罚金。但是下院以 133 票对 108 票的多数否决了罗巴克采用《Call》的强制办法。没有什么东西比对待罗巴克提案的态度更能说明英国议会和作为议会喉舌的报刊的特点了。提案不是由一个“官方”反对派的成员提出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缺陷。这个提案不仅反对这一届内阁的阁员，而且也反对上一届内阁的阁员。因此，它不是纯粹的党派的计谋。这个提案宣称，新内阁的成立还不能赎回上一届内阁的罪过。这个提案是

关于追究责任的提案的前提，这也就是提案的第二个大缺陷。不言而喻，官方反对派只愿意“在更换大臣的范围内”进行议会斗争。他们根本不愿意就大臣们的责任问题进行斗争。Ours（反对派）集团对保存内阁的万能权力所表现的热心程度并不比Ins（政府）集团差。议会斗争的技巧恰好在于：在短兵相接的格斗中打击的不是职位，而仅仅是当时占据职位的人，并且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使这个人在作为大臣下台以后，马上又能作为大臣的候选人而上台。寡头政体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因此，托利党人像辉格党人一样也不满意罗巴克的提案。

至于报刊，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泰晤士报”的立场。当罗巴克委员会可以被用来一方面促使大臣的更换，另一方面发泄社会的激愤的时候，拥护成立罗巴克委员会的呼声哪家报纸喊得最响亮呢？而自从罗巴克采取进一步行动，依靠自己的委员会的工作成绩，用使联合内阁的所有阁员遭到议会方面的谴责这种办法相威胁的时候起，又是哪一家报纸保持比“泰晤士报”更顽强的沉默呢？对这家报纸来说，罗巴克提案并不存在，昨天在议会内发生的关于《Call》。显然，罗巴克本人不是布鲁士斯；他一方面看到，辉格党人对他多年的服务给予的报酬是何等的菲薄，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他有他自己的选民的支持。他是具有大量选民的选区的代表，既然他不能用现金来报答他们，他就应当报之以声誉。最后，当代的沃里克、议会的“国王制造者”的角色不符合沽名钓誉的、但至今未必有很大成就的律师的口味。作为反对派的托利党人自然不能够采取辉格党人的方式来进行反对罗

巴克提案的斗争。因此，他们极力要走在它的前面。这就是**布尔韦尔**根据**约翰·罗素勋爵**对**维也纳会议**所作的令人惊奇的揭露而提出的向内阁投**不信任票**的提案的秘密。布尔韦尔的提案完全是“在更换大臣的范围内”兜圈子。这个提案从罗巴克手中夺走了内阁的命运。如果他的提案能通过，这就意味着托利党推翻了辉格党，一旦托利党人控制了内阁，那末他们通常所有的“宽宏大量”就不会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胜利和进一步去支持罗巴克。但是，托利党人的狡猾手段同时也使帕麦斯顿有可能采取旧的议会手段。**罗素**的辞职——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会挡开布尔韦尔的提案，就像布尔韦尔挡开了罗巴克的提案一样。如果罗素的辞职不是发生在会议的结束时期，那末他的辞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帕麦斯顿内阁的垮台。而现在相反，罗素的辞职可以延长帕麦斯顿内阁的寿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在帕麦斯顿之前还没有一个英国大臣能这样巧妙地 and 成功地利用人民的怨言来硬使议会各党派接受自己的意见，利用各种微小的议会利益、议会派别和议会手续来硬使人民接受自己的意见。他好像是一个能施妖法的老人，有一次航海家辛伯达让这个老人爬到自己的肩膀上以后，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摆脱他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1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7 月 14 日
“新奥得报”第 323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 议会新闻: 布尔韦尔提案,
爱尔兰问题

伦敦 7 月 13 日。不知道法学秘密的人们难于理解: 怎么在最普通的诉讼案中竟突然发生不是由该诉讼案件的实质、而是由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和条文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善于运用这些法律条文使人成为律师, 就同善于主持宗教仪式使人成为婆罗门教的祭司一样。无论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 或是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 形式都在变成内容。但是, 法庭上诉讼程序所起的作用, 在立法机关中却是属于日程和会议规则的。土地立法的历史表明, 罗马的老寡头政治家——诉讼程序中的讼棍手段的创造者首先在立法程序中采用了讼棍手段。但是, 在这两方面英国都超越了他们。把一个提案提到日程上时所遇到的技术困难, 一个法案在成为法律前所必经的各式各样的改变; 允许提案的反对者不让提案进入议会、法案的反对者不让法案通过议会的那种规则——所有这些就构成议会的讼棍手段、造谣中伤和纵横捭阖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武库。在帕麦斯顿以前, 毕竟没有一位英国大臣能够这样充分地使下院具有 Court of Chancery²⁰²的面貌、风度和特质。在权术无能为力的地方, 他就采取讼棍手段。在他的支配下, 有关他所不喜欢的提案的辩论每次都变成应当把这一辩论定在哪天、什么时候讨论本提

案的初步的辩论。过去对米尔纳·基卜生的提案是这样，对累亚德的提案是这样，现在对布尔韦尔的提案也是这样。在常会末期日程安排很满的情况下，布尔韦尔为了提出自己的提案当时只能选择下院作为 Committee of Supply²⁰³开会的日子，也就是内阁向下院提出拨款要求的那一天。为此目的而开会的日子通常规定在星期五。可是什么时候向下院要钱，自然是由内阁决定的，也就是说由内阁决定什么时候下院应当作为 Committee of Supply 举行会议。帕麦斯顿当时立即对布尔韦尔说，这星期五他不能用来 Supply——术语就是这样——而要用来讨论关于有限责任贸易公司的法案。让布尔韦尔本人挑一个“对自己合适的日子”吧。因此，迪斯累里上星期二正式声明他要在下星期四（昨天）向议院要求消除这种讼棍手段。但帕麦斯顿赶在他的前头了。昨天开会时，帕麦斯顿结了起来，在全场笑声中声称：他当然没有这样的目的：要拖延辩论布尔韦尔的关于举行不信任投票的提案和技术性的障碍来阻挠值得尊敬的议院作出自己的判决。但是，尽管作了一切努力，有关维也纳会议的补充文件仍然无法在明天以前提交议员们审查，而不先了解有关问题的文件，议员们又怎能作出判决呢？他准备把星期一用来讨论布尔韦尔的提案。迪斯累里强调说，“补充文件”同布尔韦尔的提案完全无关。关于有限责任贸易公司的法案在某一点上说是很重要的法案。但是国家首先希望了解下面这一点：

“内阁对自己的行动是否完全负责，或者难道有限责任的原则在这里也适用？国家首先希望了解唐宁街的商行股东们办理自己事务的条件是什么？”

布尔韦尔宣称他同意把辩论移到星期一举行。而罗素则枉然地企图利用这个事件以削弱和变换他在上星期五所作的声明的意

思。但是，正像今天的“泰晤士报”所令人信服地证明的，这个第二次修正版出得太迟了。许多天以来，“泰晤士报”就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技艺，用牺牲罗素来挽救帕麦斯顿内阁。在这件事上，老实的“晨报”也坚定不移地支持它。每当帕麦斯顿有失去议会的信任的危险时，“晨报”总是完全恢复对帕麦斯顿的信任。同时帕麦斯顿赢得了好几天时间来玩弄新手法。昨天在下院演出的爱尔兰的 row (丑剧)，证明他是多么巧妙地在利用着这样的每一个日子。

大家知道，三个关于调整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法案在议会中已经讨论了两年。一个法案规定着佃农因改良土地而可以要求的补偿数额，如果土地所有者拒绝同佃农重新订约的话。迄今为止，爱尔兰佃农（佃农几乎都是临时的——期限为一年）所进行的改良只不过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在租佃期满后提高租金。因此，如果佃农拒绝在不利条件下重新订约，那你就失去农场和他花费在改良上的资本，要不他就得为那种用自己的资本对土地所作的改良而向大地主缴付超过原来地租的租金。支持上述三个法案是保证联合内阁获得爱尔兰旅的选票的条件之一。因此，1854年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了，但是在上院由于大臣们的暗中协助，它们起初被搁置到下届常会（1855年），后来则被删改得失去了任何意义，就这样面目全非地被送回下院。上星期四，补偿法案的主要一项在下院作了土地所有制的牺牲品，爱尔兰人惊异地发现，使他们的对手获得优势的，一部分是内阁的票，一部分是与内阁有直接联系的人的票。Serjeant^①施氏对帕麦斯顿的猛烈攻击有可能酿成议会的“爱尔兰人区”的 riot (骚动)，而骚动

^① Serjeant at law——皇家法官。——编者注

的后果恰好在这时是危险的。因此，帕麦斯顿请求前联合内阁阁员爱尔兰旅的掮客萨德勒调解，结果由 18 个爱尔兰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前天访问了他，问他是否利用自己的影响以取消议会的决定，并在再度表决时使主要的一项在议院获得通过。帕麦斯顿当然宣称自己准备做一切，只要在举行不信任投票时能获得爱尔兰的票。这个阴谋在下院的过早揭露引起了一场丑剧，而这类丑剧都是说明寡头制议会衰退的。爱尔兰人有 105 票以上。但是事实表明，他们的大多数没有授予 18 人代表团以任何全权。总之，帕麦斯顿在内阁危机期间已经不能像奥康奈尔时代那样利用爱尔兰人了。随着议会所有旧派系的瓦解，议会的“爱尔兰人区”也四分五裂了。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表明帕麦斯顿怎样在利用他所赢得的时间来笼络各种集团。与此同时，他期待着来自战区的哪怕是很小的有利的消息，期待着任何微小的事变，而这种事变，他即使不能从军事观点也能从议会观点来加以利用。海底电报夺去了将军们手中的战争指挥权，使它服从于波拿巴的肤浅的占星术的奇想以及议会外交的阴谋。这就是克里木第二次战局的难以理解的和前所未见的特点的由来。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13 日

载于 1855 年 7 月 16 日

“新奥得报”第 3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²⁰⁴

伦敦 7 月 14 日。我们在前一篇通讯^①中谈到了约翰·罗素勋爵被迫或者自愿辞职这样一个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 的问题。辞职是在昨天下午提出的, 应当说, 这是一种综合性的辞职: 自愿的同时又是被迫的。其原因是帕麦斯顿把包法利所率领的一部分最贪图职位的辉格党人弄到犯上作乱的地步。他们声明, 如果罗素不提出辞呈, 他们将不得不投票赞成布尔韦尔的提案。罗素对此进行了抗拒, 但是毫无效果。背信弃义的辉格党小人对这种功绩还不满足, 就在下院的接待室里在给帕麦斯顿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 要求帕麦斯顿说服女王接受罗素已经提出的辞呈。这些卑劣的手法无论如何会使罗素得到一种满足: 他按照自己的模样建立了党。

如果下院的大多数不死命抓住能使下院延期解散的每一个借口, 那末乌尔卡尔特所说的那种“为了保证自己精神上的支柱而常常暗自活动”的人的辞职, 未必会对内阁的存在产生任何影响。而一旦通过了布尔韦尔提案, 下院的解散就不可避免。如果投了不信任票, 帕麦斯顿仍然留任, 他就一定会解散下院; 如果他的

^① 见本卷第 400 页。——编者注

继承者是得比，那末得比也一定会那样做。但是下院未必乐意为祖国而牺牲自己。

乔治·格雷爵士成立了一个警察暴行调查委员会。它是由伦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法官们组成的，它将在下星期二开始举行会议。

如果说在贸易上时间是金钱，那末在战争中时间就是胜利。放过有利的时机，不利用机会调派优势兵力去对付敌人，这就是犯了战争中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如果不是在防御时而是在进攻时，即在侵入敌人的领土时犯这种错误，那末它就会造成加倍的危险，因为防御时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还可以纠正，而在进攻时这样的疏忽便会招致全军复没。这都是老生常谈，任何一个准尉都会认为这是陈腐的道理。虽然一般不会经常违反任何一条战略或战术规则，但是似乎佩利西埃将军，这位行动迅速的人，这位克里木军队的“一往直前的元帅”却有天赋成为一贯忽视这些人所共知的原理的鲜明榜样。

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是经由因克尔芒到达要塞的北区。佩利西埃及其司令部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要占领北区，联军必须展开野战行动，动用主力部队击溃俄军，包围北区，并且抽出一支能把俄国野战部队阻挡在相当的距离上的部队。采取这种行动的适当时机是在撒丁军和奥美尔-帕沙指挥的土军到达的时候。联军当时比俄军强大得多。但是他们没有做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他们向刻赤和阿速夫海进行了远征，多次企图强攻塞瓦斯托波尔。野战行动只不过是进行侦察和把营地扩大到拜达尔盆地的入口处。现在终于查明，这种按兵不动的原因似乎是**运输工具不足**，因此联军在进行了15个月的战斗以后仍然被困在

海上，被困在卡梅什和巴拉克拉瓦！这真令人奇怪。克里木不是南极什么地方的一个荒凉岛屿。虽然它是一个粮源可能已经枯竭的地区，但是它今后仍能提供大量的饲料、役畜和车辆，只要有本领和勇气去夺取它们。在黑河周围数英里的范围内犹豫不决而缓慢地来回调动，当然不是得到这些物资的办法。但是即使完全不考虑到克里木现有的骆驼、马匹和大车，在欧洲和亚洲的黑海沿岸地区也有充足的、可用轮船在两天内运到的运输工具。为什么联军不征用这些运输工具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呢？原来俄军在实践上给他们上了一堂很生动的课，告诉他们应当怎样行动。当联军感到把粮食从巴拉克拉瓦运到塹壕里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俄军把第三、第四和第五军以及各种后各师运到了克里木。部分军队是用大车穿过草原运来的，看来他们的粮食非常不足。因为在皮列柯普 200 俄里方圆内人烟稀少。然而他们用征用的办法从比较遥远的省份弄到了物资，而本来俄军要把大车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波尔塔瓦、哈尔科夫等地运到克里木比联军从鲁美利亚、安那托里亚得到运输工具更困难得多。总之，联军推说运输工具不足，错过了夺取克里木（直到辛费罗波尔为止）的机会。现在情况改变了。俄军在敖德萨和赫尔松之间的地区为克里木组织了一支后备军团。我们只能根据从西方军团中调来的部队来判断这支军队的实力：他们由整个第二军和 2 个掷弹兵师组成。这支军队的总兵力为 5 个步兵师（82 个营），1 个骑兵师（32 个骑兵连）和 80 门火炮。此外，还应当加上步兵和骑兵的后备队。这样，如果扣除在行军中遭受的损失，则集结在敖德萨和皮列柯普之间奉命开往克里木的军队的人数，可以大致确定为 7—8 万人。这支军队的先头部队现在可能已经越过皮列柯普，而到 7 月底就会使联军

觉察到它的到来。联军能够用什么抵抗这些援军呢？联军的兵员还会因霍乱和寒热病而逐渐减少，其减少的数量不会少于因企图进行种种强攻而伤亡的数量。不列颠的援军来得很缓慢，实际上只有很少几个团上船出发。我们不久前报道启程出发的有 13000 人^①，这是内阁的一种虚张声势。而法国政府声称，它不打算派遣新锐师，而只从后备部队中派出一些小部队去弥补战场上所遭到的损失。如果这些补充部队能及时到达，那末他们勉强能使联军的人数凑足 6 月间原有的人数，即 20 万人，其中包括土耳其军队和撒丁军队。最可能的是联军的人数不超过 18 万人，而俄国在 8 月初用来对付联军的军队至少为 20 万人，而且这支军队占据着有利的阵地，支配着自己的后方地区，控制着作为登陆场的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联军再度被逼退到黑河彼岸的狭窄的台地上，那末，挤满了那么多人的台地必然会变成墓地。

发动战局的时机还没有失掉。虽然最适当的时机是错过了，但是尽管如此，联军只要勇往直前，甚至现在仍能保证有更广阔的活动地区。然而联军似乎不打算利用这种可能性。

为了替佩利西埃辩白，也许应当补充一点，无论伦敦或巴黎的舆论都在路易·波拿巴这位远方的将军的干预中寻找和找到第二次克里木战局全部 *misère*（失败）的原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7 月 14 日

载于 1855 年 7 月 17 日“新奥得报”
第 327 号，并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7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5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
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
对过

① 见本卷第 361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罗素的辞职

伦敦 7 月 17 日。罗素的辞职，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会挡开布尔韦尔的提案，就像以前布尔韦尔挡开了罗巴克的提案一样。我们在 7 月 11 日的通讯^①中发表的这种看法在下院昨天的会议上完全得到了证实。有一句辉格党的老格言：“政党像蜗牛，尾巴带动头。”现在的辉格党内阁很像一个水虺；它好像是靠切除术长大的，随便切掉肢体、头部，它都容易忍受过去，就是不要切掉尾巴。虽然罗素不是内阁的首脑，但是他是组织内阁的政党的首脑，而这个内阁又代表着那个政党。Board of Trade（贸易部）副大臣包法利代表着辉格党水虺的尾巴。他发现，为了保存辉格党躯体的生命，必须砍掉辉格党的头部，并且代表辉格党的尾巴和受尾巴的委托把这个发现通知了帕麦斯顿。罗素昨天声明他“蔑视”这条尾巴。迪斯累里用“友谊的生理现象”和对不同类（其中以“朋友”著称的类本质占有特殊的地位）的天性的描绘来长期折磨包法利。最后，包法利替自己辩白的企图（他说，他和尾巴是为了拯救罗素本人才把罗素推开的）完成了一幅描绘这个追求名位者的政党的风俗画。

^① 见本卷第 400 页。——编者注

当辉格党的天生的头部这样被砍掉的时候，它的已被篡位的头部——帕麦斯顿勋爵却更加牢固地长在躯体上。阿伯丁和纽卡斯尔下台后，帕麦斯顿为了占有联合内阁的遗产，利用了格莱斯顿、格莱安和赫伯特。格莱斯顿、格莱安和赫伯特辞职后，帕麦斯顿为了组织纯粹的辉格党内阁，又利用了约翰·罗素勋爵。最后，他又利用辉格党的尾巴来巧妙地排斥罗素勋爵，从而成为内阁的独裁者。每一次变形都是走向组织纯粹帕麦斯顿内阁的阶段。从罗素本人的声明中我们知道，他不止一次地向帕麦斯顿提出辞职书，但是帕麦斯顿每次都劝他把辞职书收回。帕麦斯顿也同样地劝说阿伯丁内阁用各种手段去反对罗巴克的调查委员会。在这两种场合他都取得了同样的成果，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布尔韦尔的提案同罗素个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 *corpus delicti*（犯罪要素，犯罪证据的总和）——罗素刚从内阁消失，提案本身就已失去了意义。这就迫使布尔韦尔声明收回自己的提案。然而他忍不住要发言来论证自己的提案，而忘掉了他在自己的发言中所论证的提案本身已经不存在。帕麦斯顿利用了已造成的尴尬局面。刚一声明斗争不再进行，帕麦斯顿马上就摆出一副斗士的姿态，不顾体面、大喊大叫、过于自信地干起来；但是迪斯累里为此而严厉地斥责了他，这位十足的伪君子——他的面部表情说明了这一点——甚至也不能保持他通常所有的毫不知耻的平静态度。然而在迪斯累里的答复中最重要的是如下的声明：

“我知道罗素勋爵从维也纳带来的那些观点不仅得到大多数人的赏识，而且甚至得到他的全体同僚的赏识，只是他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情况阻碍了高贵的勋爵的计划被愉快而一致地通过。我这样说是充分有根据的。我是以一个半月前谈论政府的模棱两可的声明和不果断的行为时所抱的那种信心来

谈这件事的；后来所发生的事件都证明我的论断是正确的。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次议会常会结束以前，议院就会得到这些论断的证据。”

迪斯累里所暗示的“情况”，正像他发言时所阐明的，是“法国方面进行的阻挠”。迪斯累里指出，提供议会参考的克拉伦登的通讯是与内阁的秘密指令相矛盾的。迪斯累里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主要的过错在于对我们事务的拙劣领导。发现了一份外国的文件（布奥尔的通令）：人民的愤懑情绪正在增长，人民在思索、在讨论，人民的代表在向议院提出质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们最杰出的国家活动家甚至不敢同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争论。他偷偷地隐匿起来。究竟谁敢这样做呢？女王陛下的首相。首相今天晚上在议院讲话时的那种腔调和神气与他的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并且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这种腔调和神气使我相信，如果国家的荣誉和利益今后仍掌握在他手里，那末这只能导致荣誉被凌辱，利益被出卖。”

罗巴克说话的尖锐性胜过了迪斯累里：“我想知道，现在谁是内阁的叛徒？”起初叛徒是阿伯丁和纽卡斯尔。后来是格莱安、格莱斯顿和赫伯特。以后是罗素。Sequens（再下一个）是谁呢？

然而这个以前暗中领导联合内阁、而现在正式领导内阁的人的地位大大地巩固了。如果在常会结束前议会会因某种原因而投不信任票（这是不大可能的），那末他就会解散议会。不管怎样，他还有六个月时间可以全权执掌英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在下院既不会有喧嚷，又不会有臆想的争吵来打扰他。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17 日

载于 1855 年 7 月 20 日
“新奥得报”第 3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译文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在议会内

伦敦 7 月 18 日。7 月 16 日晚间下院举行的激烈的、热闹的和兴奋的会议的必然结果是普遍的萎靡不振、没精打彩和漠不关心。熟知议会病态秘密的内阁打算利用这种情绪来阻挠对罗巴克提案的表决，不仅是阻挠表决，而且还阻挠辩论。虽然已近午夜，会快散了，下院却出现了一瞬间的、好像是邀请大臣们进行解释似的寂静，尽管四周不止一次地发出了要求进行解释的喊声，还是没有一位政府成员起来发言。内阁顽固地坚决保持沉默，因而使埃克塞特侯爵的代表们、华德勋爵的代表和下院议员中与他们类似的贵族代理人有可能把值得尊敬的下院沉没在永无止境的混合物中。但丁在他的“地狱”中把在这种混合物中存身描绘为冷漠无情的人的终身命运²⁰⁵。对罗巴克的提案提出了两个修正案——皮尔将军的修正案和阿德尔上校的修正案，两个修正案都是代表军人提出的，两个修正案都不过是回避问题的一种手腕。皮尔的修正案要求下院将“先决问题”²⁰⁶提付表决，也就是要下院对基本提案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从而回避对罗巴克的问题作任何回答。阿德尔上校要求赞同“据以进行塞瓦斯托波尔远征的政策”，并呼吁“坚决支持这一政策”。因而他用对克里木远征的良好开端的夸奖挡开了罗巴克的关于谴责对这次远征的恶劣领导的提案。

内阁对于哪一个修正案将被提升为内阁级提案的问题未作任

何声明。显然，内阁是想先摸清下院的情绪，然后决定是跟皮尔将军一起躲在没有解答的问题后面，还是同阿德尔上校一起躲在没有问题的解答后面。最后，下院显然进入了正是帕麦斯顿所期待的那种半睡意朦胧之境了。帕麦斯顿立即派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阁员查理·伍德爵士到讲台上，宣布皮尔的修正案是内阁的修正案。随后帕麦斯顿在来自对他友好的议员席上的“表决！表决！”的喊声的支持下发言了，他表示“希望下院立即作出决定”。他以为他已经把罗巴克“扼死”了，甚至使他失去了“大辩论”、议会决斗的倡导者的光荣角色。然而表决不仅仅遭到迪斯累里的反对。布莱特也以通常所有的分外严肃的神情站起来说：

“政府显然想用欺骗手段回避正在讨论的问题，所以直到午夜还不发表任何声明。其实这个问题是过去提请下院注意的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使这场辩论再继续一个星期，国家也只能从中得到好处。”

这样一来，帕麦斯顿只得同意延期辩论，而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作战计划。他遭到了失败。

罗巴克发言的最大优点是简单扼要。他不是像一个律师，而是像一个法官那样简单明确地论证了他所作的判决：他的发言也应当是这样，因为他是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显然，他不得不同阻碍联军舰队进入塞瓦斯托波尔湾的障碍——沉没的船只一样的阿伯丁辈、赫伯特辈、格莱斯顿辈、格莱安辈等开战。只有在战胜他们之后，他才能收拾帕麦斯顿和寿命比阿伯丁等人长的其他联合内阁的阁员。他们堵住了他进入这届内阁的道路。罗巴克曾企图利用恭维话来排除他们，因此他声称，纽卡斯尔和赫伯特因为热心职守应该得到表扬，格莱安也是如此。何况他们因为情况了解不够犯了错误而已经被逐出了唐宁街。现在的问题是要收拾还

逍遥法外的罪人。他说他的提案的本来目的就是如此。他特别攻击了帕麦斯顿，不仅把他当做被告之一，而且首先是把他当做一个领导过民军的人加以攻击。为了使自己的提案适合传统的议会框子，罗巴克明显地磨掉了提案的锋芒。内阁的辩护人所引证的论据是这样的空洞，以致在说明这些论据时所采取的使人昏然欲睡的形式起了真正良好的效用。一部分人喊道：证人的证据不够充分。另一部分人喊道：你们用排斥手段威胁我们。塞西耳爵士说：事情已经过去。为什么不回过头也去谴责罗·皮尔爵士呢？“自由派的”菲利莫尔说：每个阁员都对整个内阁的全部活动负责，但没有一个阁员单独地对某一件事情负责。娄（通过“泰晤士报”）说：你们使同法国的联盟受到威胁，你们想审判法国皇帝！跟在娄后面的是詹姆斯·格莱安。格莱安是一个心地纯洁的人，甚至他也宣称他不满意对皮尔将军的“完全否定”。他坚持下院的裁决：“有罪”或“无罪”，他不满意《Not proven》（查无实据）的公式，而苏格兰法院是根据这个公式拒绝受理可疑的刑事案件的。你们是不是又想实行已经过时的和非议会的“起诉”（impeachment²⁰⁷）公式呢？这全是报刊即舆论的过错。是舆论促使大臣们在时机不利和经费不足的条件下采取了远征。如果你们谴责内阁，那末你们也应当谴责支持内阁的下院！末了是查理·伍德爵士的辩护：如果罗巴克甚至为纽卡斯尔、赫伯特和格莱安辩白，那末他又怎么能控告我们呢？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伍德就是这样说的，他“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18 日

载于 1855 年 7 月 21 日
“新奥得报”第 33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争的前景

根据最近的一些报道看来,克里木的战事暂时寂静下来了。联军再没有试图强攻,火炮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如果双方阵地之间没有经常的步枪互射,如果联军没有挖掘对壕和地道向马拉霍夫冈推进,如果俄军没有时常出击,那末就可以认为军事行动已完全停止了。然而,这不过是风暴前的暂时寂静,也许现在风暴已经爆发了。有一切根据推测,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已经发生并结束了一场比因克尔芒会战、马美朗战斗或6月18日的强攻更为激烈的搏斗。

事实上,8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战局的胜负。到那个时候,俄军的增援部队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一定能够开到,而联军的队伍却由于疾病将不可避免地逐渐减少。联军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扼守赫尔松涅斯台地上的阵地。现在甚至连英国的报刊也放弃了在今年内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想法。联军只有指望分区地彻底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如果他们仍然像以前那样缓慢地行动,围攻在时间方面就可能同特洛伊的围攻一样了。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指望,他们能加快速度完成自己所面临的任務,因为有人向我们几乎正式地宣布:迄今所遵循的那套拙劣的战法今后仍将顽固地保持下去。巴黎“立宪主义者报”驻克里木的通讯员,一位在法军

中担任要职的人(据说,他就是近卫军司令官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将军)曾经宣称,人们对于进行野战和可能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北区所作的种种推测都是枉费心机的。他说,在目前条件下,不撤除围攻,不把整个台地让给俄军,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已决定对那些以前攻击过的阵地尽量加强炮击,力求将它们彻底摧毁。应当说,这篇通讯中报道的消息是可以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从这一方面发出的一切消息,在刊登前法皇不仅要审批,甚至还要修改。同时他对雷尼奥又特别赏识。

不难预见,这一切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在塞瓦斯托波尔及其周围的俄军现在有第三军和第四军,第五军的2个师和第六军的1个师,以及海军陆战队、水兵、地方部队、哥萨克和骑兵,总共为180个营,即9万名步兵,3万名炮兵和骑兵,其中不包括约4万名伤病员。甚至法国“通报”所计算的俄军兵力也有11万人。另外,整个第二军(50个步兵营,32个骑兵连,96门火炮),2个掷弹兵师连同1个骑兵师(24个步兵营,32个骑兵连,72门火炮)正在开赴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或者已经接近该地。这是一批包括55000名步兵、1万名骑兵和哥萨克以及5000名炮兵的补充兵力。这样,俄国人最近能集中的军队至少为175000人,也就是说,将大大超过联军不久前在战斗中以及因疾病所遭到的损失以后所剩下的人数。有了这样的兵力,俄军无论如何也能守住自己的阵地,何况他们还能经常派出生力军去替换疲劳过度的守军。毫无疑问,这是对俄军兵力的最低估计。

与此相反,联军却不能指望得到这么多的增援部队。目前他们有:21个步兵师(法军12个师,英军4个师,土军3个师,皮蒙特军2个师),约190个营;3个骑兵师(法军、英军、土军各1个师),

约 60 个骑兵连, 以及相应数量的火炮。但是由于联军的步兵营, 特别是骑兵连在作战中遭到重大损失, 因此联军的总人数不会超过: 步兵——11 万人; 骑兵——7500 人; 炮兵、辎重部队和适于担任非战斗勤务的人员——20000—25000 人^①。如果说在俄军增援部队到达以前交战双方的兵力完全不相上下, 那末在俄军增援部队到达以后, 优势显然不会在联军方面。盟国以前派去和目前派去的所有增援部队, 都是从后备部队中抽调的个别小部队, 是用来补充已在克里木作战的步兵营和骑兵连的, 而且如果相信报刊上的消息, 那末他们的人数是很少的。不过据报道, 3 个师正在开赴马赛和土伦的途中, 轮船也正在向这两个地点集结; 在英国, 指定派往克里木的各团已奉命作好立即上船的准备。它们大约是 1 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师。因此, 在 8、9 两月就会有 33000 名左右的步兵, 还可能有 2500 名骑兵和炮兵陆续到达克里木, 可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迅速上船出发。不管怎样, 联军在人数方面仍将少于俄军, 而且还可能重新被箝制在他们凄凉地度过去年冬季的那个台地上。俄军这一次能否把联军逐出这个要塞, 还很难说。显然, 联军要是得不到大量的增援部队, 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扼守已占领的阵地。这样, 战争也就会变成一连串毫无结果的流血小战斗, 双方每天都派出生力军, 时而在要塞的围墙或堑壕的胸墙上, 时而在因克尔芒和巴拉克拉瓦周围陡峭的高地上进行白刃格斗。交战军队为了取得如此微小的战果也许会比在类似的战斗中洒下更多的鲜血, 这样的情况是难以想像的。

^① 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议会新闻。——战区消息”一文（见本卷第 422 页）中，此处列举的数字是 30000—35000 人。——编者注

但是，决定性的会战仍然可能发生。如果俄国人除已派出的部队之外，能再调 5 万人到克里木，从而保障自己的军队占绝对优势，那末他们就能够使联军遭到严重的失败，并迫使他们登船返国。要判断这种可能性，就必须弄清楚俄国在整个边境上究竟拥有多少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克里木的军队，包括上述增援部队在内，我们计算约有 175000 人。在高加索，除地方部队和哥萨克外，作战的是第十六师和第十七师，它们的人数应为 6 万人左右。在贝萨拉比亚，据说有利迭尔斯指挥的 6 万俄军；可以推测，这些部队主要是由一些混成营和预备部队组成的，因为那里只驻有第五军的一个步兵师，而且我们并没有得到第一军或第二军所属部队已调往该地的消息。在波兰和沃伦，看来目前只剩下 2 个近卫师和 1 个掷弹兵师以及第一军的 3 个师和各种预备部队，共约 16 万人。大部分预备部队和一部分近卫军集中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其配置如下：西韦尔斯指挥的 5 万人驻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贝尔格指挥的 3 万人驻芬兰；里迪格尔指挥的 5 万预备部队驻彼得堡及其附近一带。全部共约 585000 人。俄军其余的部队约 65000 人分驻内地。由此可见，俄军的全部武装力量为 65 万人。如果考虑到俄国正在大量征兵，那末这个数字绝对没有夸大。

十分明显，现在，在夏末，俄军丝毫不用担心敌军会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登陆；因而它完全能够进行全面调动，把各种部队从此地派往南方，而用非常后备军或从内地调来的其他部队来替换它们，这样，比如说，就可以抽出 3 万人。这 3 万人可以调往波兰，而从波兰抽出同等数量的部队；当奥地利把它的边屯部队缩减到没有威胁性的数量即 7—8 万人时（这在最近一定会进行），

从驻波兰的俄国部队中还可以再抽出 3—4 万人。结果，俄军就可以得到相当多的补充兵力，使得联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攻占克里木，而且这些补充兵力在 10 月中旬就可能开到战区。但是，这里却产生了一个问题：政府在整个冬季能否供养这样庞大的军队，特别是现在，当阿速夫海上的俄国船只已被肃清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由于没有充分的材料，不准备回答；但是，如果这是可能的，如果它真正采取这些措施，那末联军将不得不离开环绕巴拉克拉瓦的悬崖峭壁，撤离为 25 万军队所直接或间接地保卫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围墙。

到目前为止，奥地利的 30 万军队一直在通往克里木的交通线的一侧威胁着俄国。只要俄国一摆脱这种障碍，联军很快就会相信，他们将不得不与之较量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他们错过了在奥地利的间接帮助下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时机。而现在，当来自奥地利的威胁正在消失而俄国唯一的敌人只剩下同盟国的时候，已经晚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7 月 20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8 月 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5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议会新闻。——战区消息

伦敦 7 月 20 日。关于罗巴克提案的辩论绝对没有发生内阁所指望的那种变化。一直到昨天早晨，内阁还在自己的半官方机关报上预言，罗巴克提案将以 5 票对 1 票遭到否决。到了昨天夜里，内阁能够以 289 票对 182 票通过了关于 Previous Question（先决问题）的决议，也就是说使议院完全拒绝就罗巴克提案作出任何决议，这时候内阁就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了。就是强迫阿伯丁辞职（因为他拒绝任命调查委员会）的那个议院拯救了帕麦斯顿，它终于拒绝作出关于自己的委员会的结论的决议。由于议会会议延期，帕麦斯顿内阁的命运也可以延续到下一次常会举行的时候了。到那时候内阁的美妙时光就将过去。关于会议本身，我们回头还要来谈。

目前克里木的战事暂时寂静下来了。联军再没有试图强攻，火炮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如果双方阵地之间没有经常的步枪互射，如果联军没有挖掘对壕和地道向马拉霍夫冈推进，如果俄军没有时常出击，那末就可以认为军事行动已完全停止了。

这是风暴前的暂时寂静。两三个星期后将开始一场比因克尔芒会战、马美朗战斗或 6 月 18 日的强攻更为激烈的斗争——搏斗。8 月应当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月；正在途中

的俄军到那个时候一定能够开到，而联军队伍却由于疾病将逐渐减少。那时就将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联军将不得不花费不少的力气来扼守他们所占领的台地上的阵地。

现在甚至连英国的报刊也放弃了在今年内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想法。联军只有指望分区地彻底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如果他们仍然像以前那样缓慢地行动，围攻在时间方面就可能同特洛伊的围攻一样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望，他们能加快速度完成自己所面临的任务，因为现在有人向我们几乎正式地宣布：迄今所遵循的那套拙劣的战法今后仍将顽固地保持下去。巴黎“立宪主义者报”驻克里木的通讯员，一位在法军中担任要职的人（据说，他就是近卫军司令官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将军）曾经宣称，人们对于进行野战和可能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北区所作的种种推测都是枉费心机的。他说，在目前条件下，不撤除围攻，不把整个台地让给俄军，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已决定对那些以前攻击过的阵地尽量加强炮击，力求将它们彻底摧毁。这篇通讯中报道的消息可以被看做是半官方性的，因为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从这一方面发出的一切消息，在刊登前波拿巴不仅要审批，甚至还要修改。他对雷尼奥是特别赏识的；这就是那个在立法国民议会期间在尚加尔涅辞职书上签署的陆军大臣。

不难预见，这一切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在塞瓦斯托波尔及其周围的俄军有第三军和第四军，第五军的2个师和第六军的1个师，以及海军陆战队、水兵、地方部队、哥萨克和骑兵，总共为180个营，即9万名步兵，3万名炮兵和骑兵等，其中不包括约4万名伤病员。甚至法国“通报”所计算的俄军兵力也有11万人。另外，整个第二军（50个步兵营，32个骑兵连，96门火炮），2个

掷弹兵师连同 1 个骑兵师（24 个步兵营，32 个骑兵连，72 门火炮）正在开赴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或者已经接近该地。这是一批包括 55000 名步兵、1 万名骑兵和哥萨克以及 5000 名炮兵的补充兵力。这样，俄国人最近能集中的军队至少为 175000 人，也就是说，将大大超过联军不久前在出击时以及因疾病所遭到的损失以后所剩下的人数。俄军无论如何也能守住自己目前的阵地，何况他们还能经常派出生力军去替换疲劳过度的守军。

与此相反，联军却不能指望得到这么多的增援部队。目前他们有：21 个步兵师（法军 12 个师，英军 4 个师，土军 3 个师，皮蒙特军 2 个师），约 190 个营；3 个骑兵师（法军、英军、土军各 1 个师），约 60 个骑兵连；以及相应数量的火炮。但是由于联军的步兵营，特别是骑兵连在作战中遭到重大损失，因此联军的总人数不会超过：步兵——11 万人；骑兵——7500 人；炮兵、辎重部队和非战斗人员——30000—35000 人。因此，如果说在俄军增援部队到达以前交战双方的兵力完全不相上下，那末在俄军增援部队到达以后，优势显然不会在联军方面。盟国以前派去的所有增援部队，都是从后备部队中抽调的个别小部队，是用来补充正在作战的步兵营和骑兵连的，而且如果相信报刊上的消息，那末他们的人数是很少的。不过据报道，3 个师正在开赴马赛和土伦的途中，轮船也正在向这两个地点集结；在英国，指定派往克里木的各团已奉命作好立即上船的准备。它们大约是 1 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师。因此，在 8、9 两月就会有 33000 名左右的步兵，还可能 有 2500 名骑兵和炮兵陆续到达克里木，可是这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迅速上船出发。不管怎样，联军在人数方面仍将少于俄军，而且还可能重新被箝制在他们凄凉地度过去年冬季的那个台地上。

俄军这一次能否把联军逐出这个要塞，还很难说。显然，联军要是得不到大量的增援部队，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扼守已占领的阵地。这样，战争也就会变成一连串毫无结果的流血的小战斗和白刃格斗，双方每天都派出生力军，时而在要塞的围墙或堑壕的胸墙上，时而在因克尔芒和巴拉克拉瓦周围陡峭的高地上进行白刃格斗。很可能的是，事态就是这样变化。交战军队为了取得如此微小的战果也许会比在类似的战斗中洒下更多的鲜血，这样的情况是难以想像的。这一切所以会发生，都是由于双方总司令的庸碌无能，巴黎的草率从事和伦敦的蓄意背叛。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7月20日

载于1855年7月23日

“新奥得报”第33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大不列颠
统治阶级的生理现象

伦敦 7 月 23 日。如果保证给土耳其贷款²⁰⁸的问题今天晚上遭到像上星期五那样的反对，那末帕麦斯顿就一定会立即解散下院。一切情况都对这个狡猾的人有利。在过去，由于布尔韦尔提案而解散议院或由于罗巴克提案而解散议院——这两种做法都是同样冒险的。维也纳会议上的外交活动，冬季战役期间政府机关的活动——根据这些问题不向议会而向选民发出呼吁是很困难的。但是“保证给土耳其贷款”的问题出现了！布景、场面、情节都好像随着魔棒的挥动在变化着。现在已经不是议会谴责内阁背叛和无能。现在是内阁指责议会，说它阻挠战争的进行、使同法国的联盟有遭到破裂的危险以及让土耳其听天由命。内阁不再为了使自己摆脱议会认为有罪的判决而向全国呼吁了。它向全国呼吁是为了谴责议会。实际上贷款的条件是这样拟定的：土耳其直接得不到钱，而只是在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失体面的条件下受到保护，在这种保护下，所谓给予土耳其的贷款应由英国的专员来分配和开始。而且事实上，既然英国的管理制度在东方战争中显得如此卓越，那末怎能不情不自禁地要对异国赐以恩惠呢？西方列强把

君士坦丁堡的外交部抓到了手，并且不仅是外交部，还有内务部。自从奥美尔—帕沙由保加利亚乘船到达克里木时起，土耳其就不再指挥自己的军队了。现在西方列强正把手伸向土耳其的财政。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在借国债，而且是在得不到贷款的情况下借国债的。它陷入了这样一个地主的境地，这个地主不仅抵押土地来进行借贷，而且必须让抵押物的持有者有权支配贷给他的钱款。他剩下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地产本身也交给抵押物的持有者。帕麦斯顿曾经用这种贷款的方式使希腊萎靡不振，使西班牙陷于瘫痪。但是**表面现象**是对他有利的。主和派参加反对贷款的一派加深了这种表面现象。帕麦斯顿靠着玩弄诡计又作为战争拥护者的代表来反对代表和平拥护者的联合起来的反对派。他打算进行**怎样的战争**，我们是知道的。在波罗的海利用徒劳无益而毫无结果的大火使芬兰同俄国更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在克里木使流血牺牲无止境地延长下去；而能使流血牺牲停止的只会是失败，不会是胜利。他按照老习惯利用外交联盟以争取在议会内获得成功。波拿巴已经命令他的所谓“立法团”批准给土耳其贷款。英国议会除了成为“立法团”的回声，即成为回声的回声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否则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帕麦斯顿一方面利用同法国的联盟作为挡箭牌来避开对自己的一切攻击，同时又为这个联盟受到攻击而感到高兴。为了证明“他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帕麦斯顿任命摩耳斯沃思先生为殖民大臣，而本·霍尔爵士则代替摩耳斯沃思担任王室森林和庄园大臣。摩耳斯沃思属于主张殖民地化的**威克菲尔德学派**²⁰⁹。这个学派的原则是：在殖民地人为地提高土地的价格和人为地降低劳动力的价格以达到“生产力的必要结合”。由于试图在加拿大采用这种理论，所以就把移民从

加拿大赶到了合众国和澳大利亚。

现在在伦敦有三个调查委员会在开会：一个是由内阁成立的，另外两个是由议会成立的。由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审判员组成的第一个委员会是为了调查海德公园事件而成立的，每天向它提出的许多证据，不仅证明警察犯了不可思议的粗暴行为，而且证明他们是按照上级命令蓄意那样干的。如果要公正地进行调查，那末调查就应该从主要的祸首——乔治·格雷爵士和内阁开始。由贝克莱主持的第二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禁止“星期日出卖酒类”的法令的影响，它揭露了想用调整星期日休息时间来改善社会的那种伪善的庸俗的企图。因酗酒而造成的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这些事件仅仅是部分地从星期日移到了星期一。由斯科菲尔德领导的第三个委员会，研究食品、饮料和一切与饮食有关的商品的掺假问题²¹⁰。掺假是常规，质量好倒是例外。为了使不好的食品也具有色香味而掺进的物质，大部分都有毒，对健康起着破坏作用。商业就好像是一个庞大的欺骗实验室，价目表是掺假的物品的吓人的一览表，自由竞争则是进行毒害和遭受毒害的自由。

包括到4月30日为止这半年来的情况的“工厂视察员的工作报告”²¹¹已呈交议会两院。这份报告为说明曼彻斯特的和平拥护者和争取从贵族那里夺得治理国家垄断权的那个阶级的特点作出了无可估价的贡献。“由于机器而发生的不幸事故”在报告中分成下列各项：

(1) “死亡事故”，(2) “失掉右手或右手腕；失掉一部分右手；失掉左手或左手腕；失掉一部分左手；折断手和脚；头部和脸部受伤”以及(3) “组织破裂、内伤和上面没有举出的其他损伤”。

在报告中我们读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失掉了右手”，一个儿童的“鼻梁骨被机器压扁并由于双目受伤而失掉了视觉”，一个男人“左腿被折断，右手被折断三四处，而头部则被毁坏得很可怕”，一个青年人“被折断了一只手臂，还有其他损伤”，以及另一个青年人“两只手臂都被折断，躯体下部被压裂，以致内脏露出体外，头和两条大腿也被压碎”等等。工厂视察员的这份工业通报比关于克里木战役的任何一份通报都更可怕、更吓人。妇女和儿童不断地为伤亡者名单提供大量名额。死亡和受伤如同种植场主的鞭子在黑人身上留下的伤疤一样被看得平淡无奇。几乎所有的不幸事故都是忽视法律所规定的**防护机器**的结果。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曼彻斯特这个主和派的首府的厂主们曾经不惜任何代价派出代表团与政府纠缠，反对规定在使用机器时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的法令。既然厂主们目前不能达到废除法律的目的，他们就企图阴谋撤销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职务，把他撵走，并以一个更好说话的法律维护者来代替他，但是目前没有得到成功。厂主们断言，装置安全设备会吞没他们的利润。然而霍纳证实说，在他的区里，如果花上 10 英镑还不能保障安全的工厂只是少数。在报告涉及的 6 个月中，由于机器而发生的不幸事故的总数为 1788 起，其中**死亡事故**为 18 起。对厂主所处的罚金、由他们缴付的赔偿费等等的总数在这段时间内达到 298 英镑。为了凑成这个总数，其中列入了因“在法律禁止的时间内工作”、因“使用未满八岁的儿童的劳动”等等所处的罚金；因此，因 18 起死亡事故和 1770 起重伤事故所处的罚金还远远没有达到 298 英镑。298 英镑！这比一匹参加赛马的三等马的价值还少呢！

罗巴克委员会和英国寡头政治！斯科菲尔德委员会和英国商

业阶级！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和英国厂主们！在这三个标题下可以明显地看出现时大不列颠统治阶级的生理现象。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7 月 26 日
“新奥得报”第 343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
约翰·罗素勋爵²¹²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25 日
—8 月 12 日

载于 1855 年 7 月 28 日、8 月 4、
7、8、10 和 15 日“新奥得报”第
347、359、363、365、369、和 377 号
及 1855 年 8 月 2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47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伦敦 7 月 25 日。约翰·罗素勋爵爱引用辉格党的一句老格言：“政党像蜗牛，尾巴带动头”。大概他没有料想到，尾巴为了自救，是会把头砍掉的。而罗素勋爵虽然不是“历届辉格党内阁中上一届内阁”的首脑，但无疑是辉格党的首脑。伯克有一次说道：

“罗素家族从英国人民那里抢去的房产、田地、城堡、山林等等的数目，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quite incredible)。”²¹³

约翰·罗素勋爵所享有的荣誉以及他敢于在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内所扮演的那种显要角色，是更加难以想像的，如果罗素家族所攫取的“田产的数目”不是揭开这个谜的钥匙的话。

约翰勋爵好像一生只致力于猎取职位，而当职位弄到手之后，便死命地抓住不放，甚至连实权都一点也不想要了。1836—1841 年，当他取得下院领袖的地位时是这样。1846—1852 年，当他获得首相名位时也是这样。他在作为向国库冲击的反对派首领时所具有的那种虚幻的力量，每次都在他上台执政的那天就消失了。罗素只要一从 Out (反对派) 的人变为 In (政府) 的人，便立即失去作用。英国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活动家都没有具备同等的能把有力量化为无力量的本领。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同样巧妙地把自己的无力量充作有力量。

那种虚幻的权力之所以周期性地落在约翰勋爵手中，除了靠培德福德公爵 (约翰勋爵是他的幼子) 家族的势力之外，还靠他缺

乏所有那些一般说来他人能够控制别人的特点。他对事物的那种浅薄的看法像传染病一样感染别人,而且比对真理进行最精巧的歪曲还更能给他的听众造成概念的混乱。他的真正的才能在于能够把他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降低到自身那种矮小的程度,把整个外部世界无限地缩小,变成一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庸俗的小天地。他的那种把大事化小的天赋才能,只有他的那种把小事充作大事的罕有本领才能比得上。

约翰·罗素勋爵的一生是建立在利用骗人的幌子上的。对他来说,议会改革是一种骗人的幌子,信仰自由是一种骗人的幌子,贸易自由也是一种骗人的幌子。他对骗人的幌子的力量的信念如此真诚,以致认为在骗人的幌子下不仅可以成为英国的国家活动家,而且还可以成为诗人、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胡诌出来的东西,如他的悲剧“唐·卡洛斯,或迫害”、“自亨利七世到现在英国政府及宪法的历史经验”以及他的“乌得勒支和约以来欧洲事务札记”²¹⁴。由于头脑里充满了狭隘的自私观念,罗素把每一件事物都只看做是一块供他写上自己名字的 *tabula rasa* (白板)。他的见解从不以实际事实为依据,相反地,在他心目中事实本身是由他对事实的说法来决定的。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独到见解,没有一句至理名言,没有一点真知灼见,没有一点鲜明的记述,没有一点美妙的思想,没有一个生动的隐喻,没有一点幽默的描写,没有一点真实的情感。“一个最可怜的庸才”(正如罗巴克在他的改革内阁的历史一书 215 中所认定的),这就是他甚至在进行他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件最伟大的壮举——向下院提出他的所谓改革法案的时候使他的听众感到惊异的地方。他具有一种独特的手法:把他那种像拍

卖时估价人的喊叫一样的枯燥无味、呆板单调的话，同一些幼稚的历史例证和以“宪法的美妙”、“国家的普遍自由”、“文明”、“进步”等为题的冠冕堂皇的令人莫名其妙的词句结合起来。只有当他本人受到触犯的时候，或者当他被自己的敌手逼得放下他那副假装的高傲自负的姿态而露出心绪不宁的种种迹象的时候，他才会表现出真正的情来。在英国，一般都认为他所遭到的无数次失败都是由于他的特殊的天生的急躁情绪所致。实际上这种急躁情绪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幌子。这种急躁情绪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他那种只是为了应付目前而使用的诡计和被迫采取的手段同后来形成的不利情况必然发生了冲突。罗素不是凭感情行动的，而始终是凭盘算行事的，可是他的盘算正像他本人一样浅薄，永远只能敷衍一时。因此他经常摇摆不定，支吾搪塞；突然冲上前去，忽又厚着脸退却；出言不逊，但又立刻转舵；提出高傲的保证，却又可耻地收回，而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时，他就泪流满面呜咽哭泣起来，以期赢得全世界的怜悯。因此他的一生可以看做或是一连串的 sham (骗局)，或是一连串连续不断的失算。

有人也许会奇怪，一个社会活动家，有这样多的措施成了死胎，这样多的草案失败了，这样多的计划早产了，他竟然还能站得住脚。可是正像被切除后而繁殖起来的水螅一样，约翰·罗素勋爵只是由于这些早产儿才飞黄腾达起来。他的大部分计划都只是为了缓和他的同盟者即所谓激进派的不满情绪而提出的，然而他同他的敌对者即保守派的妥协又保证了他“扼杀”这些计划。从议会改革以来，难道有议能举出一项他的“广泛的自由主义的措施”，一次“伟大的改革的兑现”（他是把这种兑现和他的内阁的命运联系起来）的吗？恰恰相反。为了讨好自由派，他提出了一些措施，为了

讨好保守派，他又撤回了这些措施；这种做法最有助于他的内阁的巩固和持久。在罗素的一生中有过这样的时期：皮尔有意识地让他掌权，免得被迫去做他知道罗素只会瞎吹一通的事情。罗素在这些同自己的正式敌对者达成秘密协议的时期，对自己的正式同盟者采取了挑衅的态度。他在骗人的幌子下成了勇士。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过去的活动，即从 1830 年到现在的活动吧。对于这样一个庸碌的天才是完全值得我们这样做的。

二

伦敦 8 月 1 日。

科贝特说过：“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就会把英国的宪法画成一棵老橡树，这棵树的树根已经腐烂，树梢已经枯死，树干上有窟窿，根基已经动摇，一乱风就摇摆不停，而把约翰·罗素勋爵画成这棵树上的一只小鸟，这只小鸟竭力想把一切整顿好，正在最下面的一根树枝的一半已经腐烂的树皮上啄虫窝。有些人甚至疑心他是在清除树皮上的害虫的幌子下啄食着嫩芽。”

在罗素飞黄腾达的史前时期，即从 1813 年到 1830 年，他的改革尝试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这些尝试不但极其微不足道而且甚至不是真心诚意的。只要有一点可以获得大臣职位的迹象，他就一分钟也不犹豫地放弃这些尝试。

从 1807 年起，辉格党人就梦想染指官家的羹肴，但无结果，直到 1827 年，他们在贸易和对外政策问题上似乎与之意见一致的坎宁内阁的成立，看来给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罗素这时已经声明，他准备提议讨论他的一个“小鸟般的”关于议会改革的法律草案，突然坎宁表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坚决反对议会的任何改革。于是约翰勋爵便请求发言以撤回自己的提案。

他说：“议会改革是一个在改革的拥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的问题，而辉格党的领袖们始终反对把议会改革看做是党内的问题。现在他是最后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他厚着脸皮在结束发言时宣称：“人民不再希望议会改革了。”

约翰·罗素一向是以自己曾大叫大嚷地反对过 1819 年卡斯尔里的六条臭名昭彰的非常法²¹⁶而自夸的，而现在却在表决休谟关于废除这些法令中的一条的提案时弃权，这条法令规定，任何出版物，只要从中看出哪怕一点点诋毁上院或下院的倾向，作者就要受到终身流放的惩罚。

这样，约翰·罗素勋爵在他的议会生涯的第一时期的末尾，就背弃了他吹嘘了十多年的主张议会改革的豪言壮语。这完全符合现代辉格党人的原型霍雷修·沃尔波尔对康威表白的话：

“民主的法律草案从来不是严肃地提出来的，它们只是政党的工具而不是实现这些古怪思想的保证。”

因此，罗素在 1827 年 5 月**最后**一次提出议会改革提案的四年以后，于 1831 年 3 月 1 日再度提出这个提案即著名的改革法案，这决不能怪他。他迄今一直用来证明他应该获得全世界特别是英国的赞美的这个法案，决不是他的创造。这个法案的主要特点是：取消大部分的腐朽的市镇，增加各郡的代表人数，给予官册农和契约农²¹⁷以及 24 个英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以选举权。从这些特点看来这个法案是格雷伯爵（1830 年组成的改革内阁的首脑）在 1797 年向下院提出的那个法案的翻版，当时格雷伯爵是反对派，可是当他 1806 年参加了内阁之后，就机灵地把这个法案置诸脑后了。这就是那同一个法案，只不过稍微变了一下样子而已。威灵顿因为表示反对议会改革而被赶出内阁，法国爆发七月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北明翰、曼彻斯特和伦敦等地成立的巨大政治组织表现出具有威胁性的积极性，各农业郡发生农民战争，赤公鸡把自己的火焰遍布在英国最富饶的地区²¹⁸——所有这些情况迫使辉格党人不得不好歹提出一个议会改革法案。辉格党人屡次想通过

同托利党妥协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职位，但都枉费心机，于是就无可奈何地、勉勉强强地作了让步。他们遇到的阻碍是：人民群众的可怕行动和托利党的死不妥协。然而，当议会改革法案刚刚完成了立法手续开始实施的时候，人民就像布莱特在 1849 年 6 月 6 日所说的，“感到自己受骗了”。

恐怕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强大的、看来似乎成功的人民运动得到这样微不足道的表面的结果。不仅工人阶级仍旧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影响，而且资产阶级本身也很快就了解到，改革内阁的中心人物，即奥尔梭普勋爵对他的托利党营垒中的敌对者所讲的下面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

“议会改革法案是曾经向国民提出过的措施中最贵族化的一个。”

农业区的新的代表名额大大超过城市增加的票数。给佃农^①以投票权，使得各郡更加变成了贵族的工具。以每年收入 10 英镑以上房租的房主这一类代替纳税人这一类，这样就剥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投票权。给某些人以选举权和剥夺某些人的选举权，一般地说来，不是为了增强资产阶级的势力，而是为了削弱托利党的努力，加强辉格党的势力。辉格党人用一连串令人很难置信的诡计、狡猾手段和欺骗，保存了选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恢复了代表名额同某些选区的人口和这些选区的重要性之间的极不适应的情况。约有 56 个居民极其稀少的腐朽的市镇被取消了，可是整个整个的郡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却变成了腐朽的市镇。约翰·罗素本人在给他的选民——斯特劳德的选民一封“论改革法案的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卡·马克思的文章中这里是这样写的：“每年交纳租金 50 英镑的佃农”。——编者注

原则”(1889年)的信中也承认:“十英镑投票权受到各种各样条例的限制,每年的选民登记成了挑剔和浪费的根源。”在不能再使用恐吓手段和利用传统影响的地方,就采用一套收买的办法,这套办法在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便成了英国宪法的基石。这个只是由罗素提出而不是由他草拟的议会改革法案就是如此。能够明显地看出是他的发明的只有以下两条:一条是规定所有自由农²¹⁹,除神职人员外,占有土地的期限为一年;另一条规定罗素家族所在的“腐朽的市镇”——塔维斯托克原封不动地保留自己的特权。

罗素在改革内阁(1830年到1834年11月)中只不过是一个次要人物——陆军财务主任,在内阁中没有表决权。他在自己的同僚中几乎是最不重要的一个,然而他是有势力的培德福德公爵的幼子。因此大家都同意给他在下院提出改革法案的荣幸。可是要实现这个各家族之间的协议有一个障碍。在1830年以前的改革运动期间,罗素一直当Henry Brougham's Little man(亨利·布鲁姆的下手)。当布鲁姆同他一起在下院开会的时候,是不能委托他来提出议会改革法案的。不久这个障碍就消除了,这位好虚荣的平民被调到上院去坐羊毛口袋²²⁰了。因为初期的改革内阁的一些最重要的阁员,不久有的跑进了上院(如奥尔梭普在1834年),有的死掉了,有的转到托利党去了,所以罗素不但成了这届内阁的唯一继承人,而且还获得了改革法案之父的名声,但充其量他不过是这个法案的教父而已。他冒充改革法案的起草人,在这骗人的幌子下出足了风头,其实连改革本身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东西和狡猾的手腕。在1830—1834年期间,除改革法案外,他引起过人们注意的只是他在反对审查养老金名单的措施时所表现的那种暴躁态度。

三

伦敦 8 月 3 日。我们再来品评一下罗素吧。我们之所以要多费些笔墨来谈论他，因为第一，他本人是当代辉格主义的典型代表，第二，他的历史——至少从某一方面来说——是议会自改革以来的历史。

罗素在为他的改革法案辩护时，关于 Ballot（秘密投票）和短期议会（大家知道，辉格党人在 1694 年把英国议会任期由一年改成三年，又在 1717 年改成七年）作了如下的声明：

“毋庸置疑，Ballot 有很多优点。主张 Ballot 的人们所持的论据，同在讨论某个争论问题时我所听到的任何理由一样是既机智而又令人信服的。可是议院毕竟应该避免作出过分仓促的决定……关于短期议会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让别的议员有机会在将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不能让我的大题目包括过多的细节。”

1833 年 6 月 7 日，罗素声明，

“为了避免同上院冲突，他不顾深深扎根在他心灵的信念（！）而放弃了这两项建议。他深信这些措施对于国家的幸福、繁荣和安宁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你们看，这就是他玩弄辞令的典型例子。）

由于这种“深深扎根的信念”，他在内阁任职的整个时期中始终如一地、毫不妥协地反对秘密投票和短期议会。在他发表这些声明的时期，这些声明都是追求双重目的的诡计。它们要安定下院多疑的民主派，又要引起上院顽固的贵族们的恐惧。但是，当

罗素一有把握获得维多利亚女王新宫廷的支持（见 1839 年布鲁姆对罗素的致斯特劳德选民书的回答）因而自以为将永远有官可做时，就在 1837 年 11 月发表声明为“改革法案实行得极其缓慢”进行辩护，说什么这个改革排除了进一步发展的一切可能。

他说：“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土地占有者的优势，并且按照设想，它是对一个重大的宪法问题的最终解决。”

简单地说，正是这个关于已经达到极限的声明，使他获得了《Finality John》（“顶点约翰”）这样一个绰号。可是他对待《Finality》、对待停在原地的决心，并不比他对待以前的前进的决心更加认真。在 1848 年，他反对休谟关于议会改革的提案。当休谟在 1849 年再度提出同样的提案时，他依靠辉格党人、托利党人和皮尔分子的联合力量，以 268 票对 82 票的多数又一次击败了休谟。由于保守派的支持，他的胆子大起来了，他以挑衅的口吻宣称：

“当我们拟定并提出改革法案的时候，我们力求使下院的代表名额适应其他的国家政权机关，使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宪洗。布莱特先生和他的同道者目光这样短浅，他们的判断力和理解力被这样狭小的眼界所限制，简直没有办法向他们讲明白我们祖先用以奠定我国宪法基础并应为我们后人心悦诚服地赞颂和力求仿效的那些伟大原则。下院在改革以来的 17 年中，没有辜负人们公正地对它寄予的一切希望。现行制度虽然有些脱离常轨，但是恰恰是由于脱离常轨，它才很好地在起着作用。”

但是，1851 年，在罗素反对洛克·金的在各郡扩大选举权（凡年收入 10 英镑的小土地占有者都有选举权）的提案遭到失败并看出自己不得不辞职几天的时候，他的“广阔的眼界”突然使他看到有必要提出一项新的改革法案。他向下院保证提出这样一

项法案。他不谈新“措施”的实质是什么，只是开了一张答应在最近的一次议会常会上兑现的期票。

同罗素结成联盟的所谓激进派的机关刊物“韦斯明斯特评论”当时声称：“目前的内阁还妄想继续执政，这已成了众人嘲笑和责难的对象；最后当内阁的倒台和执政党的崩溃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时候，约翰勋爵就答应在1852年提出新的改革法案。他喊道，请坚持到那个时候吧，我一定会满足你们对于广泛的自由主义的改革所抱的强烈愿望。”

1852年他果真提出了一项新的改革法案，这一次倒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不过规模渺小得连保守派也认为不必加以攻击，自由派则认为无须为它辩护。无论如何，这项早产的改革却给了这位终于不得不开离内阁的矮小人物一个借口，使他能够在逃跑时回身向他的胜利的继任者得比伯爵放了一支暗箭。他在离开时大声威胁说，“**将坚持扩大选举权范围**”。扩大选举权范围从此就成了“他衷心热爱的事情”。这位刚刚被赶出内阁的常常采取不得已措施的英雄，现在已被自己的拥护者称为《Foul weather Jack》（“坏天气杰克”^①），他在切舍姆街的私邸召集了各个不同的派别开会，这些派别的结合便产生了一个虚弱而奇怪的联盟。他没有忘记邀请“目光这样短浅”的布莱特和科布顿，没有忘记在这个庄严的会议上因自己的广阔眼界而请求他们原谅，并给他们开了一张新期票，保证另外提出一个“意义更大的”改革法案。1854年罗素作为联合内阁的一个阁员又提出了一个选举法改革草案来取悦下院。这个草案事先已经确定要成为新的伊菲姬尼亚，由罗素这位新的亚加米农献出来，作为取得新的特洛伊远征胜利的祭

① 这是英国人给海军上将约翰·拜伦（1723—1786）取的绰号。因为他在海上航行或作战时总是遇到倒霉的事。——译者注

品。他主持祭礼仪式时用的是梅塔斯塔西奥的音乐话剧的风格，眼泪汪汪，可是一当他在内阁所占据的“没有薪俸的”职位，由于他用卑鄙的阴谋反对自己党的党员斯特腊特先生而变为薪俸2000英镑的枢密院院长的职位时，眼泪立刻就干了。

第二个改革草案的目的是要巩固他的摇摇欲坠的内阁，第三个则是在迫使托利党内阁垮台。第二个草案是骗局，第三个草案是诡计。他的第二个草案所具有的形式使得谁也不愿理它，而第三个草案则是在谁也没有可能做那样事情的时候端出来的。这两种情况都证明了虽然命运使他当了内阁大臣，但他的本性却注定了他只配扮演像克里斯多弗·史赖一样的流浪的补锅匠的角色。甚至在第一个，也就是唯一付诸实施的那个改革草案中，他所抓到的不过是寡头政治的诡计，而不是整个策略的历史含义。

四

伦敦 8 月 4 日。从反雅各宾战争时起，辉格党在英格兰的势力就每况愈下了。因此，他们就把视线转向爱尔兰，决定借爱尔兰来挽回自己的势力，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党旗上写上“解放爱尔兰”。他们在 1806 年执政的短时期内，确实向下院提出了在爱尔兰实行细小的改革的法案，这项法案经二读通过了，可是后来为了讨好伪善而愚蠢的乔治三世又自愿把它撤回了。1812 年，辉格党人曾试图（当然没有成功）强迫摄政王（后来的乔治四世）容纳他们，他们的借口是：他们是可能同爱尔兰达成和解的唯一的工具。无论在改革运动以前或是在改革运动期间，他们都百般奉承奥康奈尔，而“爱尔兰的希望”也作为强有力的武器为他们使用。尽管如此，改革内阁在改革后的议会的首届常会时期作出的第一道法令却是对爱尔兰宣战，却是一种“野蛮而血腥的”措施：使爱尔兰处于戒严状态的“非常法”^①。辉格党人用“火、监狱、流放甚至死刑”来履行自己过去的诺言。奥康奈尔被起诉，并被判以叛乱的罪名。而辉格党人向议会提出并在议会通过为爱尔兰制定的非常法只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坚决保证提出另一个法案，即关于在爱尔兰的英国国教会的法案。这个法案必须包括这样一条，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句话的结尾是这样的：“……为爱尔兰制定的非常法——‘关于红衣法庭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在爱尔兰设立了军事法庭以代替普通法庭和陪审法庭。”——编者注

即国教会在爱尔兰的收入中的一部分**余额**应交议会支配（这就是辉格党人承担的义务）。而议会方面则应当把这笔钱用来做有利于爱尔兰的事情。这一条的意义在于承认议会**有权征用国教会的财产的原则**，这个原则在约翰·罗素勋爵看来当然特别显得正确，因为他的家庭的大量地产都是过去教会的土地。辉格党人保证坚持这个教会法案，否则就提出辞职。可是非常法刚一通过，辉格党人就必须避免同上院发生冲突为借口，撤销了上述的唯一使他们的教会法案具有意义的条款。他们投票反对自己的提案，使它遭到了否决。这件事发生在1834年。可是，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辉格党人对爱尔兰的好感就像受到电流刺激一样又复活起来了。原因是1834年秋，他们不得不把内阁的席位给罗伯特·皮尔的内阁让出来。他们又被抛到反对派的位子上去了。于是我们立刻就看到我们的约翰·罗素在同爱尔兰和好方面的非常热心的活动。1835年1月，他是出席签订**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²²¹的谈判的主要代表。按照这项协定，辉格党人给予奥康奈尔在爱尔兰有 patronage（分配职位等等的权力）。奥康奈尔这方面则保证爱尔兰在议会内外都投他们的票。可是要把托利党人赶出唐宁街必须有一个借口。于是罗素就以他固有的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选择了爱尔兰的**教会收入**问题作为战场，而以他和他的改革内阁的同僚们在这不久以前就已自己放弃和撤回了的那项臭名昭彰的所谓“**征用条款**”作为战斗口令。皮尔内阁果然在“征用条款”的旗帜下被推翻了。成立了墨尔本内阁，约翰·罗素勋爵得到了内务大臣的职位并当了下院的领袖。于是他就自吹自擂起来，一方面说他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因为他虽然已经当政，但仍继续坚持他的关于“征用条款”的信念，另一方面说他有道德上的节制力，因为他并

没有根据这些信念行事。他的信念总是停留在口头上，因而他就从来没有把它实现过。1846年他当了首相后，他的道德上的节制力是这样完全战胜了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以致他连自己的“信念”也放弃了。罗素声称，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措施比侵害国教会的物质基础即它的收入的措施更为有害的了。

1833年2月，约翰·罗素以改革内阁的名义激烈地反对爱尔兰的 Repeal（取消（取消合并）运动）。

他在下院高喊道：“这个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力图直接推翻联合议会，并以奥康奈尔为首领和主脑的议会来代替联合王国的国王、上院和下院。”

1834年2月，国王的演说又对 Repeal 运动加以攻击，于是改革内阁在答词中建议

“郑重宣布，保持三个王国的立法机构合并的不可侵犯和完整无缺的形式是议会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可是，一当约翰·罗素又停搁在反对派浅滩上的时候，他就宣称：

“谈到 Repeal 合并一事，这个问题之可以作为修正和质问的对象，完全像立法机构的任何其他法令一样”，

也就是说，简直就像任何啤酒法案一样。

1846年3月，约翰·罗素同那些对自己的领袖在谷物法问题上的变节行为急欲加以惩罚的托利党人联合起来，推翻了皮尔政府。借口是皮尔为爱尔兰提出了“武器法案”，罗素义愤填膺地坚决抗议这个法案。他当了首相。他的第一步就是向议会提出同样的“武器法案”。可是，这只是使他白白地丢了脸。奥康奈尔已经及时地组织了许多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反对这个法案，并且在

请愿书上征集了 5 万人的签名；他那时在都柏林，从那里领导整个运动。King Dan（丹王——人民这样称呼丹尼尔·奥康奈尔）如果这时被认为是和罗素一伙的话，那他就会失去他的王国和收入。因此他以威胁的形式警告这个矮小人物，要他立即撤回他的武器法案。罗素撤回了这个法案。尽管奥康奈尔和辉格党人有秘密的勾结，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在巧妙地打败了他们以后又侮辱了他们一番。为了不使人有一点点怀疑退却信号是根据谁的指示发出的，8 月 17 日，即约翰·罗素在下院宣布撤回武器法案的同一天，奥康奈尔就对在都柏林和好大厅集会的取消合并运动的参加者宣布了撤回武器法案这件事。1844 年，罗素责备罗伯特·皮尔爵士，说“他使爱尔兰驻满了军队，他不是治理那个国家，而只是占领了它”。1848 年，罗素占领了爱尔兰，在那里实行了叛国法，使 Habeas Corpus Act²²²暂时停止生效，并吹嘘克拉伦登的“果断措施”。可是这种果断也只是骗人的幌子。在爱尔兰有两派人互相对立着，一方面是同辉格党人有秘密勾结的奥康奈尔的拥护者和神甫们，另一方面是斯密斯·奥勃莱恩及其信徒。后一派入只是些 dupes（受骗者，糊涂虫），他们把取消合并的把戏当成了正经事，结果是以闹剧终场。罗素政府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和干下的暴行，完全不是由于实际情况所引起的。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巩固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而是为了延长辉格党在英国的执政。

五

伦敦 8 月 6 日。1815 年在英国实行了谷物法，因为托利党和辉格党共同决定用向国民征税的办法来提高他们的地租。托利党和辉格党所以共同决定这样做，不仅仅由于谷物法（反对从国外进口谷物的法律）能在几年内人为地提高谷物价格。如果我们把 1815 年到 1846 年这段时期考察一下，我们会看出，起着更大作用的大概是租佃农场主的幻想：似乎在任何条件下谷物法都能使谷物价格保持在 *a priori*（原定的）水平上。这种幻想对租佃契约是有影响的。为了经常保持这种幻想，我们看到议会经常在忙于修订和改进 1815 年的谷物法。但尽管有谷物法的规定，谷物价格还是不断下跌了，这时，议会就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来调查造成 *agricultural distress*（农业灾难）的原因。作为议会调查对象的 *Agricultural distress*，实际上只是租佃者付给土地占有者的土地租金和他出售给消费者的农产品价格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换句话说，就是地租和谷物价格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因而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是很容易克服的，只要降低土地贵族收入来源——地租就可办到。土地贵族自然宁可利用立法手段来“降低”谷物价格，而不屑降低地租；一个谷物法换成另一个谷物法，只不过稍微改变一下外表而已；他们把谷物法不起作用的原因每次都归咎于一些不重要的细节问题，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议会颁布一项新的法令就可以解决。因此，谷物价格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

保持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而地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由于问题涉及到了土地贵族“最神圣的利益”，涉及到了他们的现金收入，所以他们的两个派别——托利党和辉格党——都同样乐于把谷物法看做是高悬在他们党派斗争战场上空的恒星。辉格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想要宣布他们的“自由主义观点”，尤其是因为以重获官职、取得世袭年金的办法来弥补他们在地租方面可能出现的亏空，当时在他们看来还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情。这两派人由于都希望得到金融贵族的支持，所以在1819年都投票赞成银行法！根据这条法律，以贬值的货币计算的国债，其利息应以足值的货币偿付。国家所借的假如是50英镑，它就值得偿还100英镑。他们就这样买得了金融贵族对谷物法的同意。以欺诈手段提高国债的利息换取以欺诈手段提高地租——这就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狼狈为奸的意图。这以后，就无怪乎约翰·罗素勋爵在1835年和1837年议会选举的时候，宣称对谷物法的任何改革都是有害的、荒谬的、不实际的和不必要的了。从他踏上内阁的宦途时起，他就反对任何这类的提案，起初还比较斯文，后来就恼火了。他在维护高额的谷物关税方面，远远超过了罗伯特·皮尔爵士。1838年和1839年饥荒的前景没有能够动摇他和墨尔本内阁其他阁员的意志。国家的灾情不能触动他们，但内阁的灾情却把他们打动了。750万英镑的国家财政赤字和有引起对法战争危险的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促使下院根据皮尔的提议对墨尔本内阁投了不信任票。这件事发生在1841年6月4日。总是那样贪婪地追求职位、那样不称职、但又那样不乐意放弃职位的辉格党人，试图（当然是枉费心机）用解散议会的办法来逃避自己的命运。这时在约翰·罗素的心灵深处产

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先利用反对谷物法运动，然后再把这个运动化为乌有，就像过去在他的帮助下先利用改革运动，然后再把这个运动化为乌有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突然表示赞成用“适度的固定关税税率”来代替关税调节制的原因——要知道他总是主张“适度的”政治上的贞节和“适度的”改革的。他恬不知耻地同政府候选人的队伍一起在伦敦大街上游行，队伍中还有人在他们拿的旗杆上挂了两个对比鲜明的面包：一个是两辨士的面包，上面写着“皮尔的面包”；另一个是一先令的面包，上面写着“罗素的面包”。可是这一次人民不上他们的当了。人民从经验中知道，辉格党人答应给面包，中还是只得到了76席的少数。辉格党政府终于不得不出让内阁的席位。罗素对1841年没有替他好好效劳的那个适度的固定关税税率进行报复，罗素在1842年心平气和地让皮尔的“调节制”成为法律。现在他鄙视“适度的固定关税税率”，已经不再理它，一声不响地听任它破产了。

1841年到1845年间，反谷物法同盟发展到了巨大的规模。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旧盟约已经不再是维护谷物法的保证了，因为工业资产阶级排挤着金融贵族，日益成为资产阶级中的主导部分。而废除谷物法对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切身问题。在工业资产阶级看来，废除谷物法意味着：降低生产费用，扩大对外贸易，增加利润，缩小土地贵族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也就削弱他们的权力，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1845年秋，爱尔兰马铃薯发生病害，英格兰谷价上张和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歉收，这些都大大地帮助了工业资产阶级。被带有危险性的行情吓坏了的罗伯特·皮尔爵士于1845年10月底和11月初举行了一系列

的内阁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暂时废除谷物法的建议，甚至暗示有永久废除的必要。由于一个阁员斯坦利（即现在的得比勋爵）的拚命反对，内阁当时没有作出决定。

这时正在利用议会假期在爱丁堡游览的约翰·罗素，嗅到了皮尔内阁所发生的事件。他决定利用斯坦利造成的阻碍，以便赶在皮尔的前头，第一个占领必能给他带来声望的阵地，冒充为皮尔的鼓舞者，从而使皮尔想要作出的决定失去任何道义上的力量。与此相适应，他借口内阁迟迟没有就爱尔兰的灾情问题作出决定，于1845年11月22日从爱丁堡写信给他的西蒂区的选民们，信中充满了针对皮尔的刻薄而恶毒的暗语。1831、1835、1837和1839年在爱尔兰发生的周期性的饥荒，没有一次动摇过罗素和他的同僚们对谷物法的信心。现在他却突然热心起来了。甚至像两个民族的饥荒这样可怕的灾难，也只是被这个矮小人物用来作为给他的“身居要职的”对手设置陷阱的借口。他在这封信里企图隐匿他突然变成贸易自由拥护者的真实动机，用一个悔过的罪人的如下的自来掩饰：

“我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念在20年中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过去总认为谷物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则中的一个例外，但是观察和经验使我确信，我们应该放弃对食物输入问题的任何干预。”

就在这封信里，他责难皮尔，说皮尔至今还没有干预爱尔兰输入食物的问题。于是皮尔就使这个矮小人物跌进了他自己所设的陷阱。他呈请辞职，但他上书女王，表示如果罗素负责废除谷物法，那他就支持罗素。女王召见了罗素，委托他组织新内阁。他来看了一看……宣布这事即使有自己对手的支持也是力不胜任的。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在他看来，一切本来都只是

骗人的幌子，可是现在有人威胁着要用他的话来揪他了！于是皮尔重新上台，并且废除了谷物法。他的这种行动打垮了并瓦解了托利党。罗素又同托利党联合起来准备推翻皮尔。这就是他可以用来辩明他有资格取得“贸易自由大臣”称号的全部东西，几天以前他还用这个称号为自己吹嘘过。

六

伦敦 8 月 12 日。我们再来谈一谈约翰·罗素勋爵，以便完成对他的评述。他在他的政治生涯开始的时候，以虚假的容忍态度骗得了一定的声誉，他在他的政治生涯结束的时候，又以虚假的虔诚骗得了某种声誉；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用的是关于废除《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²²³的提案，在后一种情况下，则用的是他的《Ecclesiastical Titles Bill》（教会圣职法案）²²⁴。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使非国教徒失去了担任国家职务的可能性。而罗素在 1828 年提出他的轰动一时的关于废除这些法令的提案时，这些法令早已成为僵死的字句了。他提出他那提案的论据是：他确信，“废除这些法令能加强国教会”。当时有人写道：“对这个提案顺利通过一事最感惊讶的是提案人自己。”只要回想一下，一年以后（1829）托利党内阁自己提出了解放天主教徒的法案，当然就是希望预先摆脱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那末，这个谜是不难猜透的。可是非国教徒从约翰勋爵那里除了他在当反对派时许给他们的一些诺言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一旦他上台执政，他甚至反对废除教会税（church rates）了。

他对罗马教皇^①的攻击，更加清楚地说明此人的空虚和他所抱动机的卑鄙。我们看到，他在 1848 年和 1849 年把辉格党和托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利党及皮尔派联合起来，搞垮了他自己的同盟者所提出的关于改革的提案。1850年，当教皇关于对在英国的罗马天主教僧侣实行圣秩制度和任命红衣主教魏兹曼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的圣论在一部分最虚伪、最短视的英国人中间引起了某些波动的时候，他的内阁是极端软弱和不稳固的，因为它那样依赖于保守的反对派。但不管怎样，对罗素来说，教皇的举动并不是出乎意外的。当“罗马日报”于1848年发表任命魏兹曼的消息的时候，他的岳父敏托勋爵就住在罗马。从红衣主教魏兹曼“给英国人民的信”中我们知道，教皇还在1848年就把在英国实行教会圣秩制度的圣论给敏托勋爵看过了。罗素自己还事先采取了一些措施，迫使克拉伦登和格雷正式承认爱尔兰和各殖民地的天主教的教会圣职。可是现在他考虑到自己的内阁不稳固，回忆起1807年辉格党政府因反对天主教而倒台这段历史就感到不安，惟恐斯坦利在议会假期中仿效派西沃和他自己来赶在他前头，就像他自己曾经试图靠废除谷物法来赶在罗伯特·皮尔爵士前头一样——被所有这些预感和怪影所苦恼的这个矮小人物突然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新教的狂热，于是便实现了 *salto mortale*（致命的一跳，冒险的一步）。1850年11月4日，他发表了臭名远扬的“给德勒穆主教的信”，他在信里向主教保证说：

“我完全同意您的这一看法：教皇最近对我们新教的侵犯，不能不认为是蛮横的、阴险的，因此我和您一样对这种情况表示愤怒。”

他谈到了“目前为了束缚精神和奴役灵魂而作的顽强的尝试”。他把天主教的仪式称作“大多数国民所鄙视的迷信的伪装”，最后他向主教保证：如果旧法律不足以对付教皇的这种僭越行为，他就提出新的法案来。同一位约翰勋爵，在1845年，在他确实还没

有掌权时却曾宣称：

“我想，我们可以废除那些阻止罗马天主教主教取得国教会主教们所取得的圣职的条款。没有比保持这种差别更荒谬更幼稚的了。”

1851年，他向议会提出了教会圣职法案来巩固这些“荒谬而幼稚的差别”。可是由于在同一年，在讨论洛克·金的关于扩大选举权的提案时他被爱尔兰旅、皮尔派、曼彻斯特派等所组成的联盟所击败，他的新教狂热也就烟消云散了，同时他还答应修改这个法案，而实际上这个法案早已是一个死胎了。

不仅罗素对罗马教皇进行的攻击是骗人的幌子，就连他热烈拥护解放犹太人也是骗人的幌子。大家知道，他的 Jewish Disabilities Bill（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是每年都要上演的滑稽剧，是对被奥地利路特希尔德男爵所控制的西蒂区选民的诱饵。此外，罗素反对奴隶制的宣言也是骗人的幌子。

布鲁姆勋爵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您反对一切有利于黑人的提案，您反对即使只是想阻止重新恢复起来的奴隶买卖的企图，这都扩大了您和国家之间的鸿沟。谁要是相信，您，一位在1838年攻击一切反对奴隶制法律的人，一位反对对殖民地奴隶主会议的活动进行任何干涉的人，真的突然对黑人产生了这样的热爱，以致在1839年不顾有失去一切职位的危险，提出了保护黑人的法案，那他就是一种惊人的自欺的癖好。”

对于罗素来说，司法改革也是一种骗人的幌子。当1841年议会对辉格党内阁投了不信任票，而且即将采取的解散议院的手段看来也无济于事的时候，罗素就企图使下院仓卒通过 Chancery Bill（关于大法官法庭的法案），以便

“通过设置两个新的 judges of equity（正义法官）（这种法官应该遵循的不是法规，而是正义）的职位来医治我们制度中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毛病——courts of equity（正义法庭）的拖拉现象”。

罗素把他的这个法案叫做“在司法改革方面的一次重大的兑现”。他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托利党人组阁看来即将成为事实以前偷偷地把他的两个辉格党朋友安置在新设的职位上。爱德华·萨格登爵士（现在的圣莱昂纳兹男爵）看透了罗素的用意，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根据这个修正案，法案要到10月10日（即在新选出的议会召集起来以后）才能生效。尽管对这个法案（用他的话来说，这个法案是这样“迫切”需要）的实质没有作丝毫的变动，但是当那个修正案一被通过，罗素马上就把它撤回了。法案变得“淡而无味”，它失掉了自己的盐分。

殖民地的改革、国民教育方面的草案、“臣民的自由”、出版和公开集会的自由、战争热情和对和平的渴望——这一切对于约翰·罗素勋爵来说都不过是骗人的幌子。他整个人就是骗人的幌子，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派谎言，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达到肮脏的目的，为了侵吞公共财富和篡夺仅仅是表面上的权力而使用的一连串卑劣的阴谋诡计。圣经上有一句格言：人是不可能使自己的身长增加一英寸的。要证明这句话，除罗素外，很难找到更好的例子了。他的出生和亲朋关系以及时势给他造成的机缘使他爬上了高峰，可是他始终是一个在金字塔顶上跳舞的矮子，一个侏儒。像他那样名位显赫的渺小人物，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卡·马克思
北明翰代表会议：丹麦王位继承
问题和四项保证问题²²⁵

—

伦敦 7 月 27 日。伦敦成立了同“行政改革协会”相对抗的“国家改革协会”²²⁶。这个协会吸收了厄内斯特·琼斯和宪章派其他一些领袖参加它的委员会。前天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的这个协会的主要宗旨是：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实行议会改革。

北明翰代表会议于 7 月 23 日闭幕。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哈得兹菲尔德、太恩河畔新堡、伦敦、哈里法克斯、设菲尔德、里子、得比、布莱得弗德、诺定昂和北明翰的代表，他们在北明翰集会是为了对统治阶级及其在内阁和议会的代表的对外政策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北明翰每日新闻”所指出的，宪章派

“拒绝参加任何人发起的任何运动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这一次他们的表现却不同。他们十分兴奋地参加了这次运动，因为他们感到，这次运动并不追求任何同他们敌对或不相容以及一般的任何阶级的利益”。

乌尔卡尔特在工厂区逗留，对于这次值得注意的代表会议的召开，无疑是一种促进；他出席了代表会议的所有会议。由于时间不够，我们未能应邀参加北明翰代表会议，我们只是在现在才有可

能从一些值得注意的文件中作出摘录,这些文件包括在寄给我们的关于代表会议工作情况的铅印报告²²⁷中。卖身投靠的伦敦报刊对这次代表会议要就是只字不提,要就是歪曲事实。马姆兹伯里伯爵同代表会议选出的委员会的秘书有过下列信件往来:^①

“先生!我荣幸地接到了您要我参加北明翰代表会议的邀请。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但是我急于要把您所感到兴趣的关于1852年5月8日签订的丹麦条约的材料告诉您。您对这个条约的目的所作的估计是错误的。说‘条约保证俄国继承丹麦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王位’是不正确的。无论现在或是将来,俄国都不会得到它在条约缔结以前所未曾有过的任何权利。目前,有权要求丹麦王位的四个男性继承人还健在。条约规定:一旦所有的继承人都去世,缔约各方,即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英国、法国和瑞典必须考虑丹麦国王为了保证王位的继承而根据丹麦君主国完整的原则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因此,如果发生上述事件,缔约各方就会着手妥善解决关于丹麦王位的继承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卡·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上述这段话,而是下列原文:

“如果根据伦敦报刊的报道来判断英国的运动,那是极大的错误。例如最近一次北明翰代表会议伦敦大部分报纸连提都没有提,其余的报纸只报道了会议召开的消息。这次代表会议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呢?这是一次有北明翰、伦敦、哈得兹菲尔德、新堡、哈里法克斯、设菲尔德、里子、得比、布莱得弗德、诺定昂以及其他地方的代表参加的公开的代表大会。代表们集会是为了从腐败无能的议会手里夺取审查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英国的对外政策的权利。

毫无疑问,由乌尔卡尔特先生在所有工厂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促进了这次运动,而在北明翰举行的代表会议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代表共同参加了这次会议。代表会议成立了若干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就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报告。我得到了关于代表会议历次会议的详细报告和有关文件。我现在把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介绍给‘论坛报’的读者。首先介绍代表会议秘书和得比勋爵政府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之间的来往信件,这些信件是说明1852年5月8日签订的关于丹麦王位继承问题的条约的。马姆兹伯里勋爵写道:”——编者注

问题,我请您自己判断一下:在这种情况下,5月8日同俄国签订条约的五个强国是否会愿意让作为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朝首脑的俄国把整个丹麦君主国并入自己的领土。”

马姆兹伯里勋爵的信的内容就是这样。代表会议秘书对这封信的答复如下:

“阁下!北明翰代表会议委托我对您函告丹麦条约一事表示感谢。从您的来信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四个法定继承人去世,英国和俄国有责任干预以丹麦国王为一方和以某些国家如丹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了解,这种干预的权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坚信,同俄国交战的事实应当被用来杜绝这种十分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您使我们了解到,按照您的看法,六个强国本身就是不容许俄国继承王位的保证。阁下,我们很想从您那里知道,整个君主国如果不转交给俄国,那转交给谁呢?如果英国不认为俄国是一切领土的继承者,那末它为什么不提出俄国放弃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权利作为签订条约的条件呢?既然这个条约是您签订的,那就可以这样设想,要么对这些问题根本不能回答,要么只有您才比其他人更能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受委托请求阁下您回答这些问题,从而使我们消除严重不安的理由。”

不用说,通讯到此中断了,虽然勋爵阁下可以说,他只是形式上参与了这件事。帕麦斯顿早就同布隆诺夫男爵签订了一项议定书,其中明确规定了未来的这个条约的章节和原则。^①

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来研究和草拟各项问题的报告。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关于四项条款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现在我

^① “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不是这段话,而是下列原文:

“通讯到此中断了,——马姆兹伯里勋爵不想把通讯继续下去。勋爵阁下不能回答所提的问题这一事实是有一定理由的:一切有关丹麦王位继承的条文已经由帕麦斯顿勋爵在1850年7月8日签订的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了,以致崇高的勋爵除了在条约上签字外,确实别无他事可做。”——编者注

们从这个报告中摘引一些最重要的地方：

“委员会力图揭示作为签订和约的基础的四项条款的意义，因而考察了：这些条款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哪些发展；各有关国家提出的有利于发展这些条款的每一个建议得到了怎样的支持或遭到了怎样的反对；法国和英国内阁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来说明这些条款的；这些条款的根据是什么，它们符合于公认的战争目的——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的程度如何。我们认为，1854年6月29日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急电中谈到的题为‘保障基督徒在土耳其的权利’的下列建议是四项条款的根据：‘土耳其政府所有基督教臣民应当受到保障的公民权利是同他们的宗教权利分不开的，我们根据这种认识曾经声明：如果承认这一点，那末皇帝向土耳其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就能实现，争端就能解决，陛下就准备促使欧洲保证实现这些特权。’

这个建议——即不是由一个强国而是由五个强国经常干涉土耳其内政的建议——被英国和法国以第四项条款的形式采纳了，并且由德鲁安·德·路易斯在1854年7月22日答复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急电中表述如下：‘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应当要求有对土耳其政府的臣民（不论他们信仰什么教）给予某种正式保护的权力；相反地，法国、奥地利、大不列颠、普鲁士和俄国将共同努力，促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宣布并且遵守各种基督教团体的宗教特权，使苏丹陛下对各派基督徒的幸福予以宽大的关怀，但不损害苏丹陛下最高权力的尊严和独立。’

采纳这第四项条款，就必然会使奥斯曼帝国丧失独立，但是公认的战争目的是保卫它的独立；这个条款的非法性在于：英国和法国未经土耳其同意就作出这样的让步，而且不顾土耳其的反对，英国和法国还是坚持要在维也纳会议上讨论这项条款。用悉尼·赫伯特的话来说，就是：‘问题复杂化的原因在于我们同我们的敌人、而不是同我们的盟友达成了协议。’

要知道，如果我们在同俄国的战争中遭到失败而不得不要求和平，那末我们就没有权利代表第三国提出这样的建议。为了消除这种非法性，英国和法国应当一开始就公开转到俄国这一边而向土耳其宣战。同第四项条款意味着放弃土耳其的独立一样，第一项条款意味着放弃它的完整；第一项条款同第四项条款一样，未经有关方面同意就作出了让步，因为土耳其的全权代表已经明白表示，他将不同意讨论第一项条款。

我们认为,在保证必须使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依旧归土耳其统治的背后,却暗含着把这些地方从土耳其夺走的意思。‘今后不应准许对这些地方作任何特殊的保护’这句话在第五节作了解释,即把五个强国同土耳其政府列于同一地位——几国的最高执政者共同实现自己的权力的地位。这句话最后体现在英法在维也纳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中: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由欧洲的一个执政王朝的王室成员中选出的某个世袭君主来统治。英国放弃了它所宣布过的打算,不承认我们的盟友土耳其的权利,而且由于这一切是在俄国军队被迫撤离土耳其领土而法国和英国军队又未给土耳其以任何援助时发生的,因此英国的这种行为就更为可耻了。因为放弃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发生在远征塞瓦斯托波尔之前,由此就必然得出结论:这次远征是为了用武力来取得对这种放弃的同意,即一方面利用土耳其资源已经耗尽的情况来强使土耳其同意,另一方面以表面上对俄国的胜利安慰英国来强使英国同意。”

二

伦敦 7 月 28 日。北明翰文件中关于第二项条款谈到:

“第二项条款规定在多瑙河可以自由航行。多瑙河停止自由航行是从 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土耳其被迫把多瑙河口让给俄国。把多瑙河口让给俄国,是同 1827 年 7 月 6 日签订的禁止俄国占有土耳其任何领土的伦敦条约相违背的。英国起初默认这种非法的占有,后来又支持并承认这种占有,这一事实证明了英国不止一次地在破坏国际法。所有这一切是在维护和平的借口下作出的;而现在由于战争状态,这个借口自然就不成立了。把多瑙河口归还给土耳其,这是英国和俄国之间一切真正的战争中的重大要求之一。但是在英国向俄国提出的建议中,根本没有提到多瑙河口的问题。这样英国就把这个问题变成了对奥地利进行侮辱的一种手段,因为奥地利在多瑙河自由航行方面的利益也许只是稍低于土耳其本身的利益。在 1855 年 3 月 21 日维也纳会议的第四次会议上,奥地利的全权代表普罗克希男爵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俄国同意多瑙河口中立化。俄国的全

权代表回答说,“他不会同意这种采取间接剥夺形式的条件”。约翰·罗素勋爵没有支持奥地利的这个极为温和的建议,3月23日,问题解决了,决定多瑙河口留归俄国占有。在这一点上向俄国作了彻底让步后,罗素于4月12日写信给克拉伦登勋爵说:“布奥尔伯爵对我说,他不坚持要求多瑙河口诸岛屿中立化,因为他确信,如果这样,俄国就会破坏会议。”4月16日约翰·罗素勋爵打电报给克拉伦登勋爵说,“奥地利不打算支持任何有关出让领土的要求”。罗素一开始就错过了支持奥地利的机会,同意它所提出的关于多瑙河口中立化的治标办法,后来又深信奥地利不会完全支持整个这一办法,即把河口让给土耳其(由于约翰勋爵在3月23日对俄国所表现出的那种唯命是从的态度,这个办法本身就已失去意义了),罗素现在乃向克拉伦登勋爵建议,“要求把土耳其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让出的多瑙河口诸岛屿归还给土耳其”。

第三项条款写道,1841年7月签订的条约应当根据维持欧洲均势和限制俄国在黑海的实力的精神由缔约双方进行修改!如果说在这项条款后面还隐藏着一些真实的意图,那末其中就应包括:第一,限制俄国的实力,第二,恢复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和波斯普鲁斯海峡的权利。恢复苏丹对海峡的专门监督权并不需要另外达成协议。这种权利过去由于签订一些条约而暂时丧失了,现在因战争而废除了这些条约,于是这种权利也应同时归还给苏丹。这些简单的理由,甚至在维也纳会议上也没有提出来。

至于限制俄国的霸权问题,布奥尔伯爵在1855年5月20日的信中曾公正地指出:“在我们看来,盟国应当共同努力来限制俄国的政治霸权,即使不可能做到使俄国不去滥用它的物质资源,至少也要使它在这样做时感到极大的困难。要消除俄国因其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对土耳其的优势,单是减少和甚至全部消灭在黑海的俄国舰队还是不够的。”

在英国政府企图把议会引入迷途的所有方法中,只有一个是失败了,这就是关于限制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实力的提案。如果进行战争的确是为了所宣布过的那种目的,那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一开始就有保障了,那时媾和条件就可能是这样的:(1)把直到现在 *de jure* (在法律上)仍归土耳其占有的多瑙河口归还给土耳其,(2)俄国负责抵偿军事费用。”

在提出了一些意见以后,文件以下面一段话收尾:

“委员会认为，并不是所有阁员都是同样有意识地犯下过错的。委员会不能不指出四个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罗素、阿伯丁以及首先是帕麦斯顿所起的特殊作用。帕麦斯顿保证了对阿德里安堡和约的承认，甚至在战争时期向俄国偿付了久已失效的债务，拟定或批准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达达尼尔条约、巴尔塔利曼尼条约和 1850 年的丹麦议定书；帕麦斯顿对波兰、西西里岛和伦巴第的背信弃义以及他在很大程度上对法国、波斯、西班牙和丹麦的背叛行为——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他不仅是土耳其的、而且是所有欧洲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英国内阁的全体阁员都听命于帕麦斯顿；他能够使他们参与自己的罪行，而他们却无法识破这些罪行。这样也就使帕麦斯顿有可能完全使他们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只有根据英国的法律惩罚叛国行为，才能从为了外国利益而出卖人民的阴谋家手里把人民拯救出来。”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7 月
27 和 28 日

载于 1855 年 7 月 30 和 31 日
“新奥得报”第 349 和 351 号
及 1855 年 8 月 10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446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欧洲军队²²⁸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6 月底—9 月

载于 1855 年 8、9 和 12 月
“普特南氏月刊”第 32、33
和 3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普特南氏月刊”

弗·恩格斯

第一部分

近两年来席卷黑海沿岸的战争,引起了人们对欧洲平时就保持着的 200 万军队的特别注意,这些军队的数量可能很快就增加一倍。假如战争仍继续下去,——这几乎是无需怀疑的,——那末我们就会亲眼看到,这 400 万军队将在两海之间的横贯整个欧洲大陆的战场上,投入一场激烈的军事行动。

因此,不仅对那些已经卷入东方冲突的军队,而且对其他一些比较强大的欧洲军队的评述就不能不引起我们读者的兴趣了,何况在大西洋这一岸幸而从来还没有过在数量上甚至可以多少同欧洲第二流军队相比的军队;因此,在美国,关于这样一些军队的组织,外行人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

从前因猜忌和竞争造成的各国军队严守秘密的状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论人们多么惊奇,但是,即使在最不赞成公开的国家,在一切民政部门至今仍然处在专制政体所特有的保密状态中的国家,军队的组织也已经为广大的各界人士所熟知了。现在关于军队公布有许多官方的情报,不仅说明了军队的区分,如军、师、旅、团、营(骑兵连),而且也说明了军队的配置,以及指挥官的数量和姓名。当举行大规模检阅的时候,不仅允许外国军官参加,而且甚至表示欢迎;请他们提出批评的意见并叙说自己的观感;和他们认真地讨论各国军队在体制上有什么区别和有什么革新。由此可见,同其他管理部门相反,这里是完全公开的。欧洲各国的陆军部

现在能保守秘密的只不过是几种化学成分的配方、某些火箭或炮弹信管，然而就连这些秘密也很快就泄露，或者由于新的发明而过时。例如，英国的康格里弗火箭就被黑耳先生的军用火箭所排斥，后者曾在北美军队中使用，现在也被英国军队所掌握了。

由于这种公开情况，文明世界各国的陆军部在平时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事委员会，它的目的是讨论某种新措施的优点，使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利用所有其他成员的经验。这样一来，几乎一切欧洲军队的体制、组织和一般管理制度就大体上趋向一致，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国军队同另一国军队是相近似的。然而民族性格、历史传统、特别是不同的文化水平，却又造成了许多差异，并形成了各个国家军队所特有的长处和短处。法国人和匈牙利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德意志人——他们在一定条件下都能成为同样优秀和灵巧的兵士；但是，尽管训练方法相同（这好像可以消除一切差异），各国兵士由于自身的条件不同于对手，而仍然各有所长。

这就使我们面对着各国爱国军人不止一次讨论过的这样一个问题：哪一国的兵士最好呢？当然，每一民族都热心维护本民族的荣誉，而且在那些受了既缺乏批判又不够准确但却强烈地渲染着爱国感的传奇轶事的熏陶的公众人士看来，某个国家的一个团能够“消灭”其他任何国家的两三个团。以正确评价事实为唯一指导原则的军事史，作为一门科学还很年轻，因此目前还谈不上拥有大量的文献。然而，它已经跨进了科学的领域，并且日益把愚蠢无耻的吹牛当做糟粕清除出去。这种吹牛在长时间内是那些只故意歪曲每一传说的事实的所谓历史著作的特点。过去，编写战史的作者常常能够在缔结了和约而不允许再用炮弹轰击敌人的时候，安然

无事地对原先的敌人口诛笔伐，以此作为这场战争的继续，然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军事史中的许多次要问题目前还是悬案，但仍然无需怀疑，每一文明的民族有权因为它曾在某一时期拥有当代最好的兵士而自豪。中世纪末期的德意志雇佣兵、十六世纪的瑞士兵在一定时期内是号称无敌的，就像优秀的西班牙战士后来代替了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步兵”一样；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和奥伊根亲王的奥地利军队一度争夺过这种荣誉称号，直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鲁士军队打败了这两国军队，结束了这场争夺时为止；然而普鲁士军队在耶拿遭到打击后又丧失了这种荣誉，法国军队再度被公认为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但这并没有妨碍英国军队在西班牙在一定的条件下和战斗的某些时机表明自己比法国军队优越。无疑地，拿破仑于1805年从布伦兵营调到奥斯特利茨²²⁹的军团是当时最好的军队；无疑地，威灵顿也知道，在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²³⁰结束后，把他的军队誉为“无往不利、无战不胜的军队”意味着什么。但是，这支曾在比利牛斯作战的不列颠军队的精华，又在新奥尔良²³¹被既无技能又无组织的非常后备军和志愿兵击溃。

从所有过去战争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而且每个不抱成见、思想健全、富有经验的军人都会证实这一结论，这就是：勇敢善战这种军事素质，在世界各民族中基本上是相同的；其次，各民族兵士的区别与其说在于他们的长处，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特点；最后，就是在目前军事公开的情况下，只有多动脑筋，在军事领域和国家资源的利用方面不断地改进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才能在一个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在竞争者中间跃居首位。因此，我们就看到，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对

不够发达的邻国在军事上具有怎样的优越条件。我们可以拿俄国军队为例。它的兵士虽然具有一切优良的战斗素质，但是从未超过文明的欧洲的任何一国的军队。在同等条件下，俄国人不论怎样殊死奋战，结果总是——至少到目前的战争为止——被敌人打败，有时被法国人、有时被普鲁士人、波兰人或英国人打败。

在开始分述各国军队以前，需要作几点与它们全体有关综合论述。

军队，特别是 30—50 万人以上的大军队，需要加以区分，需要有不同的兵种、大批的人员和物资及一套编制机构，因此它是如此复杂的有机体，以致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简化。军队所必不可缺的部门是如此之多，因而想要人为地、毫无意义地进一步细分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然而，传统的习惯和腐蚀了一切旧军队的那种讲究豪华排场的风气，使几乎所有欧洲军队的组织极端复杂化了。

在每一个国家里，由于人员的身长、体力和气质的不同以及马匹的特长不同，由重步兵和重骑兵区分出轻步兵和轻骑兵是必要的。要想完全消除这种区分，就是说要把具有本质上相反的战斗素质的人员合并在一个部队里因而使这些素质中和，便会削弱整个这一部队的战斗力。因此，每一兵种就自然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重装的、动作不灵巧的人员（和相应的马匹）组成，主要用来进行大规模的坚决的攻击和成密集队形作战；第二部分由轻装的和灵巧的人员组成，特别适合于散兵战，适合于担任警戒和前卫，适合于迅速机动等等。这种区分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几乎在每一国的军队里，除了这种自然的区分以外，各兵种又有各种区分，这种区分仅仅表现在光怪陆离的服装上，而且是以经常

被经验和实践所驳倒的理论观点为根据的。

例如，在欧洲各国军队中，都有一种兵，叫做近卫军，他们自命为军队的 élite (精华)，但实际上不过是由征集来的人员中身躯最高大、最魁梧的一些人组成的。在这方面俄国和英国的近卫军特别突出，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比同一兵种的其他团队更勇敢善战。老拿破仑的近卫军则完全不同，他们确实是军队的 élite，在编组这种军队时，并不以身材作为标准。然而就连这种近卫军，也因为吸收了军队中的优秀分子而削弱了军队的其他部分。拿破仑由于过分爱惜这支精锐部队，有时也犯了错误。例如，在博罗迪诺²³²，他在决定性时刻没有把近卫军调到前面，结果坐失战机，使俄军有秩序地退走了。在法国，除皇家近卫军外，每个营里还有类似的 élite 部队，它由两个连即掷弹兵连和轻骑步兵连组成，这样就毫无必要地使营的战术动作复杂化了。其他国家也有这种类似的部队。所有这些精锐部队不仅编组的方法特殊，服装奇异，而且军饷较高。据说，这套办法能够激发兵士的功名心，尤其对易于激动的民族——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更是如此。但是，假如把应该享有这种待遇的兵士留在原先的连里，而不使他们妨碍营的战术统一和行动协调，那末，仍然可以达到同样目的，而且收效也许会更大。

在骑兵中还可以看到更加令人吃惊的蠢事。这里，把轻装和重装马匹的差别作为划分各类骑兵——胸甲骑兵、龙骑兵、马枪兵、枪骑兵、猎骑兵、骠骑兵等的依据。所有这些分类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由于过分复杂而简直是毫无意义的。骠骑兵和枪骑兵起源于匈牙利和波兰。不过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两种骑兵有着一定的意义；他们是本民族的军队，服装也是本民族式样的。把这

些特点搬到没有这种民族精神因而使特点失去意义的其他国家中去，至少是荒唐的。无怪在 1814 年，一个匈牙利骠骑兵回答一个称他为“同行”的俄国骠骑兵时说道：“什么同行？我是骠骑兵，而你是小丑！”（*Nix Kamarad, ich Husar, du Hanswurst!*）另一种同样荒唐的骑兵，是几乎在一切军队中都有的胸甲骑兵。这种骑兵实际上没有战斗力，并且由于胸甲很重（法国的胸甲重 22 磅）使马匹也失去了战斗力；况且，胸甲甚至不能抵御从 150 码距离射来的枪弹！几乎所有的欧洲军队都废弃过这种胸甲，然而由于拿破仑喜欢排场和迷恋帝制传统，在法国又采用了胸甲，不久，欧洲各国也都仿效法国了。

假如把人数较少的美国军队除外，那末撒丁军队就要算是文明国家中唯一把骑兵仅分为轻骑兵和重骑兵而不再细分并彻底废弃了胸甲的军队。

各国军队的野炮由于口径各式各样，因而非常复杂。在理论上，英军火炮的区分最多，共有 8 种口径和 12 种式样，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火炮的储备量很大，而得以大大简化它们的种类。譬如在克里木，英军几乎全部采用九磅加农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法军在最近几年中大大简化了炮兵，用一种轻型十二磅加农炮代替了四种不同口径的火炮，关于这种加农炮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论述。在其余的大多数军队中，直到现在还有三四种口径的火炮，至于炮架、炮车、车轮等的差别，那就更大了。

关于技术部队、工程部队等等，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上司令部，它们的编制在各国军队中几乎相同，但英国军队除外，它的司令部完全不是独立的机构，这给它的害处很大。至于其他次要的区别，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再谈。

我们首先从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建立的法国军队谈起，因为它从本世纪初起就成为一切欧洲军队的榜样了。

一、法国军队

到目前的战争开始时，法国有 100 个基干步兵团（从第七十六团到第一〇〇团不久前称为“轻步兵”团，不过它们在训练和编制方面同其他基干团毫无区别）。每团 3 个营，第一、第二营为基干营，第三营为后备营。但在战时第三营可以很快地编入作战军队，这时由 3 个营中抽出的各补充后备连编成的第四营，便成为后备营。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就被采用了，当时甚至还编成了第五营，有时还有第六营。不过现在每团只有 3 个营。每营由 8 个野战连（1 个掷弹兵连，1 个轻骑步兵连和 6 个基干连）组成；战时每连由 3 名军官和 115 名军士和兵士组成。由此可见，法国的基干营在战时约 960 人，其中第八连（轻骑步兵连）专门用来担任轻步兵的勤务。

担任轻步兵勤务的特种部队由 chasseurs^à pied（猎步兵）和非洲部队组成。战前共有 10 个猎兵营，但在 1853 年增到 20 个营，这样几乎每个步兵师（4 个团）在编成时都可得到 1 个猎兵营。每个猎兵营有 10 个连，约 1300 人。专门在非洲服役的部队，是由 3 个朱阿夫团（9 个营）、外籍军团 2 个团（6 个营）和 6 个轻步兵营（其中有 3 个土著猎兵营）组成的，共计 21 个营，约 22000 人。

骑兵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

1. 重骑兵即预备队骑兵——12 个团：2 个马枪兵（披有甲胄的射手）团和 10 个胸甲骑兵团= 72 个骑兵连；
2. 基干骑兵——20 个团：12 个龙骑兵团和 8 个枪骑兵团

- = 120 个骑兵连；
3. 轻骑兵——21 个团：12 个猎骑兵团和 9 个骠骑兵团= 126 个骑兵连；
4. 非洲轻骑兵——7 个团：4 个 chasseurs d' Afrique (非洲猎兵团) 和 3 个斯帕吉团= 42 个骑兵连。

按战时编制，预备队骑兵和基干骑兵每连 190 人，轻骑兵每连 200 人。平时勉强可征集 4 个骑兵连，其中装备齐全的仅有 120 人，所以每次军队动员时，都必须召集大批归休兵回队并为他们安排马匹。在像法国这样缺马的国家里，这只有从国外大量输入马匹才能解决。

炮兵经过不久前的改编以后，现有 17 个团：5 个步炮团(担任警备和攻城勤务)，7 个基干团(在步兵师内担任勤务)，4 个骑炮团和 1 个架桥团。步炮兵看来仅在特殊情况下才用于野战。在野战炮兵中，炮架和前车的构造便于炮手在迅速移动时乘坐。骑炮兵的编制和其他炮兵相同。野战炮兵和骑炮兵共有 137 个连，每连 6 门火炮；还有作为预备队的 60 个步炮连。总计有 1182 门火炮。此外，炮兵还有 13 个工役连。

军队的专门业务部门包括：总参谋部，计有 560 名军官；要塞司令部、炮兵司令部和工程兵司令部，共约 1200 名军官；3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5 个驮载连，5 个辎重连，1187 名医官等。军队的总数如下：

步 兵	
基干步兵：300 个营和 300 个后备连	335000 人
猎兵：20 个营	26000 人
非洲部队：21 个营	22000 人
共 计	383000 人

骑 兵

预备队骑兵: 72 个骑兵连和 12 个后备连	16300 人
基干骑兵: 120 个骑兵连和 20 个后备连	28400 人
轻骑兵: 126 个骑兵连和 21 个后备连	31300 人
非洲骑兵: 42 个骑兵连	10000 人
共 计	86000 人

炮兵和专门业务部门

1200 门火炮	70000 人
以上总计	1200 门火炮和 539000 人

这里应加上由 1 个步兵师 (2 个掷弹兵团和 2 个轻骑步兵团)、1 个骑兵旅 (1 个胸甲骑兵团和 1 个吉德团)、1 个猎兵营和 4—5 个炮兵连新组成的近卫军, 以及由 25000 人组成的宪兵队, 其中 14000 人为骑宪兵。此外, 不久前又编成了 2 个步兵团——第一〇一团和第一〇二团, 并且正在编组外籍军团的 1 个新的旅 (瑞士人)。因此, 法国军队按其目前的编制应当有将近 60 万人, 这个数字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法军的现有兵力。

军队以抽签的方法在年满 20 岁的青年中征集兵员。按理每年应征集约 14 万人, 然而实际上平时服兵役的仅有 6—8 万人。其余的人可在中签后 8 年内随时征集入伍。此外, 平时大部分兵士归休, 所以就连已征人员的实际服役时间也不超过 4—5 年。这种制度虽然能够保证现役部队受到良好的训练, 但却不能保证培养出受过一些训练的预备部队以应付紧急情况。一旦爆发大规模的大陆战争, 法国必须投入 2—3 个庞大的军团作战时, 在第二次战局中它就势必以大量缺乏训练的新兵补充作战军队, 而在第三次战

局中，就会显著地表现出军队的质量降低。无疑地，法国人很容易掌握军事这门职业，但是，究竟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这么长的服役期限，使得很大一部分青年不能受到军事训练呢？

凡兵役制带有义务性质而服役期限长的国家，欧洲社会认为必须给有产阶级规定以某种形式出钱免除本人服役的特权。例如在法国，代役制是法律所规定的，因此约有 8 万代役兵经常在法国军队中服务。他们通常是由所谓“社会的危险阶层”中招募来的；这些人很难控制，但只要善于管理，他们就会成为优秀的兵士。为了迫使他们服从，需要有极严格的纪律，而他们对秩序和服从的理解有时是很独特的。当一个团的大部分兵士是代役兵时，如果让他们担任警备勤务，那就必定会招来许多麻烦。因此一般认为，最适合他们的地点是在面对敌人的前线。非洲的轻装部队主要是从他们中间招募的，例如朱阿夫兵几乎全都是作为 remplaçants (代役兵) 入伍的。克里木战局清楚地表明，朱阿夫兵在任何地方从不改变他们非洲人的习惯——喜欢抢劫和在困难时刻自由行动。和他们气味相投的已故的圣阿尔诺元帅在阿尔马河会战的报道中说：“朱阿夫兵确实是世界上优秀的兵士！”大概就是指的这一点。

法国军队的武器和装具都是头等的。兵器构造精良，尤其是马刀，它的式样美观，虽然也许稍微长了一点。步兵的服装是按照法国和普鲁士同时采用的新式样置备的。佩戴子弹和剑(或刺刀)用的交叉式皮带已不采用。这些东西挂在有两根背带的腰带上，背包则用两条绳子舒适地背在背后，而不是用旧式的连结带横束在胸前。这样一来，胸部完全不受束缚，因此现在的兵士已经一点不像过去被皮带束紧和按旧式样被一种皮胸甲捆绑起来的那种不幸的兵士了。服装的式样普通，但很美观；应当承认，不论便服或军服的

式样，法国人的确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讲究。蓝色的上衣，衣领低硬而且前面开口的、衣长到膝的独特外衣，瘦小的红裤子，轻便的军帽（它是在所有曾经设计的式样中最适合于兵士的帽子），带护腿的皮鞋和轻便的灰色大衣——这些就是法国步兵的服装，它是欧洲军队所从未有过的最简便的服装。在非洲，兵士头戴白法兰绒的披巾式遮阳帽，并领到法兰绒贴身衬衣。在克里木，兵士在去年冬季披着可以遮住头、颈和两肩的带风帽的厚呢斗篷。Chasseurs-à-pied（猎步兵）穿着全身灰色的衣服，带有绿色饰带；朱阿夫兵穿着看来为适应气候和他们所执行的勤务而仿照土耳其的式样制作的奇异服装。猎兵和某些非洲步兵营装备着米涅式步枪，其余的步兵装备着普通的短铳枪。然而有根据推测，装备线膛枪的军队数量将会增多。

骑兵是由体格匀称的骑手组成的，比起其他许多国家的兵士来，他们的体重较轻，但质量绝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兵士。骑兵平时全部配备着充足的马匹，有的马是从国外运来的，有的是由国家养马场和养马区供给的。这些养马区改良了不久前还认为是很不好的当地马种。但在战时马匹的需要量一下就增加一倍的情况下，法国出产的马根本不够，因此势必要从国外购买成千上万匹马，但是有许多马匹对骑兵未必适用。这样一来，在持久的战争中，只要政府不能像1805、1806和1807年那样把盛产马匹的国家的马源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的骑兵就会丧失其战斗素质。

炮兵目前全部装备着新式的轻型十二磅加农炮，即路易一拿破仑的所谓发明。但是由于装药量等于实心弹重量四分之一的轻型十二磅加农炮在英国和荷兰军队中原已存在，由于比利时人已经停止在他们的榴弹炮内安装药室，而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已习

惯在某些场合用他们普通十二磅和二十四磅的加农炮发射爆炸弹，因此路易一拿破仑的所谓发明，只不过是把这种轻型十二磅加农炮改装在法军八磅加农炮的普通炮架上而已。然而法国炮兵由于这种革新而显著地得到了简化，并提高了效率，不过是否因此降低了炮兵的运动性，以及十二磅加农炮是否不适于发射空心弹，还需要查明。不管怎样，我们得到消息：已经承认必须将更大口径的榴弹炮运往东方供军队使用。

法国军队的操典，是军人健全的理智和陈腐的传统的惊人结合。大概没有一种语言像法语那样不适于用来下达简洁、准确和有说服力的口令了，而且通常下达口令时要用很多字；本来用两三个字就够了，但军官却必须说一整句话，有时还要说两句。动作是复杂的，在队列教练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与现代战术水平绝对不相容的陈旧的东西。善于进行散兵战，看来是法国人天生的本领，但是在训练兵士进行散兵战的方法上，其呆板程度甚至为俄国所不及。骑兵和炮兵在操练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不过只要法国人一作战，情况就会很快地迫使他们抛弃所有这些过时的和呆板的方法；谁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迅速地掌握和运用适于新条件的新的作战方法。

总的说来，轻装部队是法国军队的 forte（中坚）。他们确实是欧洲最轻便的部队。没有一个国家的兵士的平均身材像法国兵那样矮小。1836年，在将近8万名法国兵中，仅有743人身长5英尺8英寸以上，仅有七人身长达到6英尺，而有38000人身长4英尺10英寸半到5英尺2英寸。但是这些身材矮小的兵士不仅善于搏斗，而且能经得住高度的紧张，在运动性方面也能超过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军队的兵士。纳皮尔将军断言，不列颠兵士是世界上所有的

兵士中最能负重的作战的动物。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法国兵——非洲远征的参加者，他们除了武器和个人的行囊外，还背着帐篷、木柴、食品——这些高出他们所戴的高筒军帽的物品；同时在炎热的阳光下每天步行 30—40 英里。而现在就请你们把平时军队中身长至少为 5 英尺 6 英寸的高个的、笨拙的英国兵同身长 4 英尺 10 英寸的矮个、短腿、轻巧的法国兵比较一下吧！这种矮小的法国兵虽然背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却仍旧是出色的轻步兵：他们成散开队形作战，善于奔跑、猛扑、卧倒、跃起，同时装弹、射击、进攻和退却、散开和重新集结以及变换队形；他们表现出不仅比从“里脊”岛来的身材高大的对手具有加倍的运动性，而且具有加倍的机智性。在 20 个 chasseurs-à-pied (猎步兵) 营中，轻步兵的勤务达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无与伦比的部队——在特殊勤务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被训练得能在敌人眼前以一种所谓 pas-gymnastique (运动步伐) 的独特的跑步(每分钟 160—180 步)完成各种运动。他们不仅能够跑半个小时以上(中间只作短暂的休息)，而且还善于匍匐、跳跃、攀登、游泳等，一句话，只要需要，能以任何一种方法运动；同时他们也是头等射手，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很少有人能在同这些善于在极其平坦的地形上掩蔽的、弹无虚发的神枪手进行互射时坚持下来。

至于法国步兵在密集队形中的行动，则法国人固有的狂热性不仅使步兵具有很大的长处，而且也给它带来了很大的害处。通常法国步兵第一次攻击的特点是整齐、迅速、坚决，甚至是猛烈的。在顺利的情况下谁也抵挡不了他们。在失利的情况下他们很快就整顿好自己的队伍，重新投入战斗；但是在形势不利或者甚至在互有胜负的战局中，法国步兵便迅速丧失自己的坚定性。一切军队都需

要打胜仗，但罗曼—赛尔特民族的军队尤其需要打胜仗。条顿人在这方面绝对比他们强。法国军队在拿破仑为他们铺平了道路时能在 15 年间排除一切障碍，直到失败时为止；但是法国军队从来未能像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²³³中那样取得胜利，在那次战争中，弗里德里希大帝曾不止一次地处于毁灭的边缘，常常败北，但最终赢得了胜利。1809—1814 年的西班牙战争，可以在这方面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骑兵同步兵相反，他们成密集队形时的行动远比担任轻装部队的勤务时享有更大的声誉。法国骑兵被认为是无敌的，就连纳皮尔也承认他们胜过当时的英国骑兵。威灵顿也在某种程度上同意纳皮尔的意见。然而奇怪的是，这支无敌的骑兵却是由那些一般只用快步冲锋而在万不得已时才用轻跑步冲锋的、骑术不精的骑手组成的！但是只有在炮兵以猛烈的火力为他们开辟道路后，他们才能以密集队形运动，开始冲锋，而且就在这时也仅以大群的兵力进攻。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现在的法国骑兵，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团队中的骑兵，都是很优秀的兵士，虽然他们的骑术还不如英国、普鲁士，尤其是奥地利的骑兵，但他们通常都是出色的骑手，同时更是击剑的能手。可是由于在战时不得不将骑兵的兵力扩充一倍，因此无疑地，骑兵的质量必将降低；然而大家知道，法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我们称之为**勇猛** [dash] 的那种对骑兵来说是重要的素质，它可以弥补许多缺点。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兵士像法国兵那样不爱惜自己的战马。

法国的炮兵一向水平很高。近三四百年以来，炮兵方面的一切改进几乎都从法国开始。拿破仑战争时代，法国炮兵善于选择发射

阵地的本领对敌人威胁最大,那时其他国家的军队对这种本领掌握得还很差。一切证据都表明,谁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善于把自己的火炮设置在既能避开敌人火力、又能取得良好射击效果的地形上。炮兵理论也一向是法国人喜爱的一门知识,他们的数学头脑有助于掌握这门知识;鲜明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正确的观点——这些都是法国炮兵书籍的特征,它表明这门知识是怎样地符合于法国人的民族精神。

关于专门业务部门——工程部队、司令部、卫生部门和运输部门,只能说它们是精通本行业务的。军事学校是这类部门的雏型。对于一个法国军官来说,并不要求他具有在普鲁士被认为是必需的那些一般知识;但学校教给他卓越的专业技能,其中包括辅助学科的良好知识和至少一门现代外国语。法国军队里还有一类军官,他们是从年老的军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很少晋升到上尉以上的军阶。因此,在法国军队里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年轻的将军和年老的上尉,并且这种制度完全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整个说来,法国军队以自己的全部特点表明,它属于尚武的和刚毅的民族,而这个民族也以自己有这样的保卫者而自豪。这支军队由于有良好的纪律和战斗力而战胜了路易·波拿巴对它的诱惑这一事实,以及1851年12月的近卫军能够那样迅速地转变为克里木的英雄这一情况,——所有这一切无疑都说明了法军的优点。从来还没有一支军队,政府要那样去谄媚它,那样在它面前讨好,没有一支军队像1851年秋季法国军队那样得到公开的指示胡作非为,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十二月内战时的法国军队那样受到纵容;然而法国军队重新又成为有纪律的军队,并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诚然,近卫军兵士在克里木曾数次故态复萌,但每次都被康

罗贝尔压制下去了。

二、英国军队

英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完全相反，在它们之间找不到一点相同之处。法国军队强的一面，正是英国军队弱的一面，vice versa (反过来) 也是如此。正像古老的英国到处盛行着大量惊人的舞弊行为一样，英国军队的组织也是腐朽透顶的。军队中的一切似乎都安排得使它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只是由于某种偶然的机，一些最大胆的改进做法——诚然是为数不多——才能在大量毫无意义的陈旧措施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不管怎样，当这架庞大的、吱吱作响的机器开动起来时，它仍然是多少能执行自己的任务的。

要说明不列颠军队的编制，用不着花费很多笔墨。步兵由 3 个近卫团、85 个基干团、13 个轻步兵团和 2 个猎兵团组成。在目前的战争中，近卫团、猎兵团和某些其他的团各有 3 个营，而其余的团，则每团各有 2 个营及 1 个后备连。但是兵士的招募难以补充战争中的伤亡，因此各团的第二营是否存在还很难说。目前步兵的现有人数大约不超过 12 万人。

除了正规部队外，步兵中还包括作为预备部队即新兵来源的民军。根据议会的决定，民军的数量可达 8 万人，现在他们的总数实际上不超过 6 万人，虽然仅在郎卡郡一个郡就招募了 6 个营。根据现行法令，民军可以自愿在殖民地服务，但不能把他们派遣到帝国疆界以外的战区去。因此，目前他们只可能用来替换在科尔富岛、马尔他岛、直布罗陀等地担任警备勤务的基干部队，而以后还可能到更远的殖民地去。

骑兵由 3 个近卫团(胸甲骑兵)、6 个近卫龙骑兵团(重装)、4

个重龙骑兵团和 4 个轻龙骑兵团、5 个骠骑兵团和 4 个枪骑兵团组成。每团按战时编制应达 1000 人（4 个骑兵连，每连 250 人，预备兵员除外）。就是这样编成的一些团被派遣到克里木，但由于冬季的灾难、巴拉克拉瓦城郊的无意义的攻击以及新兵补充的不足，它们总的来说已减少到平时的编制名额。我们不认为目前所有 26 个团的人数会有 1 万人，即每团平均会有 400 人。

炮兵由 1 个炮兵团（12 个营，96 个炮兵连）和 1 个骑炮旅（7 个炮兵连和 1 个火箭连）组成。每个炮兵连有 5 门加农炮和 1 门榴弹炮；加农炮有三磅炮、六磅炮、九磅炮、十二磅炮和十八磅炮五种；榴弹炮的口径有 $4^2/5$ 、 $4^1/2$ 、 $5^1/2$ 和 8 英寸四种。而且，每个炮兵连中都有几乎包括各种口径的轻重两型的加农炮。但在实际使用时，野战炮兵只用轻型的九磅和十二磅加农炮，以及 $4^1/2$ 和 $5^1/2$ 英寸的榴弹炮；一般地可以说，目前英国炮兵普遍采用的是九磅加农炮和作为辅助火炮的 $4^1/2$ 英寸（十二磅）榴弹炮。除上述火炮外，还使用六磅和十二磅的火箭。

因为平时编制的英国军队仅作为战时的基干，而且因为它完全按志愿入伍的原则补充兵员，所以不可能在各个有关时期准确地确定它的实际人数。然而我们觉得，假如把它现有的兵力大致确定为以下数字是不会错的：步兵 12 万人，骑兵 1 万人，炮兵 12000 人，火炮约 600 门（其中骡马牵引的火炮不到五分之一）。在这 142000 人中，约有 32000 人在克里木，约 5 万人驻在印度和各殖民地，其余的 6 万人（一半是未训练过的新兵，另一半是训练这些新兵的人员）驻在英国。此外还有 6 万左右的民军。领优抚金的兵、地方骑兵以及不适于在国外服务的其他人员，我们根本没有计算在内。

志愿兵制度不可能使军队在战时保持足够的兵力，现在英国军队又遭到了这种困难。我们又看到了威灵顿时代的情形，即英国军队在一定的战区内所能集中并随后所能保持的兵力最多为 3—4 万人；而由于英国人的同盟者现在已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法国人，因此英国这支“英勇的小部队”在联军的总数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在不列颠军队中，有一种能充分说明不列颠兵士是从哪些社会阶层招募来的制度。这就是用鞭笞来惩罚兵士。不论是法国军队或普鲁士军队都不采用体罚；就是在许多其他人数较少的军队里，也不采用体罚。甚至在大部分新兵为半野蛮人的奥地利，也有废除体罚的明显愿望；例如，驱使受罚者穿过棒列的那种体罚，不久前已经从奥地利军队的条例中取消了。相反地，在英国“九尾皮鞭”——类似鞭笞盛行时期的俄国皮鞭的一种刑具——仍旧继续采用。奇怪的是，每当议会里提出改革军队条例的问题时，军纪方面的老顽固总是极力维护“皮鞭”，而老头子威灵顿本人特别显得热心。在他们眼里，没有受过鞭笞的兵士是某种不可想像的怪物。他们认为，勇敢的精神、高度的纪律性和不可战胜的气概这些素质，只有背上带有伤疤，至少挨过 50 鞭的兵士才会具备。

不应忘记，“皮鞭”不仅是造成一个人肉体疼痛的刑具，它还给他留下永不可磨灭的伤痕和终身的记号，给他打上了烙印。现在甚至在不列颠军队里，这种体罚，这种烙印实际上也等于是终身的耻辱。受过鞭笞的兵士在自己的伙伴眼里是可耻的。同时，根据不列颠军队的条例，对在前线的兵士的一切惩罚几乎都是鞭笞；因此，同是这种惩罚，在它的维护者看来是在决定性时刻维护纪律的最好手段，而实际上它却破坏纪律，涣散士气并挫伤兵士的 pointd'

honneur (荣誉感)。

这就说明了两件非常奇特的事实：第一、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有大批英国逃兵。冬季，当英国兵为了在战壕内担任警戒而不得不作出超人的努力时，谁要是不能连续在两个至两个半昼夜内不睡觉，就要受到鞭答！试想一下吧！受鞭答的是那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壕里英勇奋战的英雄，是那些在因克尔芒会战中出乎自己将军意料之外获得胜利的兵士！但是纪律条例的条文未留有选择的余地。军队中最好的兵士因疲劳而受到鞭答，他们蒙受侮辱后就逃到俄军方面去了。未必再有什么比这种逃跑更能清楚地表明鞭答制度的全部罪恶了。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发生过某个国家的兵士大批地逃到俄国人那里去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那里对待他们会比在家里更坏。第一次出现这种大批逃兵现象的荣誉属于不列颠军队，英国人自己证明，正是鞭答迫使兵士逃跑的。第二个事实是想建立遵守不列颠军队条例的外籍军团的企图完全破产了。看来，皮肉受苦的事外国人是决不愿干的。那种遭受鞭答的前景压倒了获得高额奖赏和优厚薪饷的诱惑。到6月底，外籍军团招募的人数还不到1000人，而需要的是15000人；而且无疑地，假如当局试图对这听话的1000人采用鞭答制度，那就会引起怒潮而迫使当局让步或立即解散外籍军团。

英国兵的服装和装具是最不合适的。直到现在通行的仍是1815年军队中所采用的式样，没有作过任何改进。旧式后开襟的、奇怪的倒翻袖口的难看制服，仍旧是不列颠兵士的独特之处。裤子瘦小而不方便。佩挂刺刀、子弹盒和背包用的交叉式皮带的旧式样，几乎为所有的团一致采用。骑兵的制服比步兵的方便，并且质量要好得多，但它终究太瘦小，因而妨碍行动。此外，英国人是唯一

在军队中保存了红色制服的民族，纳皮尔称它为“骄傲的红制服”。据说这种制服——英国兵穿上它时就像打扮起来的猴子——能用它耀眼的色彩给敌人造成恐惧。但是，天哪！凡是看见穿红砖颜色制服的英国步兵的人，都必然承认，这种制服穿上四个星期后就完全不能唬人，反而令人可怜。为了恐吓敌人，应该选择耐脏的、不易沾灰和受潮的任何其他颜色。丹麦人和汉诺威人过去也曾穿过红色制服，但很快就不穿了。第一次什列斯维希战局向丹麦人表明，红色制服和白色武装带对敌人来说是多么好的靶子。

根据新的服装规定，英国的红色制服采用了普鲁士的式样。步兵带着奥地利式的高筒军帽或法国式军帽；骑兵带着普鲁士式的头盔。交叉式的皮带和瘦小的红裤子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这样，变化就等于零了，所以，同服装和装具比较合理的其他欧洲军队比起来，不列颠兵士和过去一样，仍将是一种奇观。

然而，不列颠军队取得了一项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成就。这就是全部步兵都装备着经过普里契特改进的米涅式步枪。平时那样固执己见的、统率军队的老将们怎样能作出这样大胆的决定，是难以想像的，然而他们却这样做了，因而将自己步兵的火力增强了一倍。无疑地，在因克尔芒会战中，米涅式步枪以其极大的准确性和巨大的威力使英国军队获得了胜利。每逢英国步兵成散兵线进行射击时，它必定对装备普通枪的任何敌人占上风，因为米涅式步枪装弹像滑膛枪那样快。

在骑兵中服务的是装备着极好的马刀的善骑的出色兵士；他们的本领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已经显示出来。然而整个看来，骑手对马匹是太重了。因此几个月的积极行动必将使不列颠骑兵消耗殆尽。这在克里木又得到了新的证实。假如重骑兵的平均身长

能降低到 5 英尺 6 英寸，轻骑兵能降低到 5 英尺 4 英寸甚至 5 英尺 2 英寸，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步兵所做的那样，那末，就会建立一支更适于他们现在所担任的野战勤务的部队。而在目前的条件下，马匹负载过重，在有效地被用来同敌人作战以前，它们就已经累垮了。

在炮兵中服务的同样是身材过高的人。正常的情形是，炮手的身长应该使他能够将十二磅炮从前车上卸下来，要做到这一点，身长 5 英尺 2 英寸至 5 英尺 6 英寸就足够了，这是我们根据许多亲身经验和观察知道的。的确，凡身长约 5 英尺 5—6 英寸的人，只要他们身体强壮，一般就是最好的炮手。但是英国人追求的是外表，因此他们的兵士虽然身材高大匀称，却不具备真正优秀的炮手所必需的那种体力。英国炮兵的兵器是头等的。火炮是欧洲最好的，火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形炮弹和长炮弹的表面做得极为光滑。虽然如此，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火炮所发射的炮弹都不会有那样大的误差，这说明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操纵火炮。恐怕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军队的炮兵军官像英国军官那样缺乏专业训练。英国炮兵军官的理论知识很少超出炮兵基本知识的范围，而在实际运用时，英国军官只会操纵野炮，甚至连这一点也不精通。然而，英国炮兵——不论军官或兵士——有两点长处：极好的目测能力和战斗中非凡的沉着。

总之，不列颠军队的战斗素质由于军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无知而大大地降低了。现在对军官进行的考试是可笑的：对上尉要求的是欧几里得的著作²³⁴前三册上的知识！但不列颠军队的人事任命主要就是为贵族子弟（长子除外）安排荣誉的职位，所以军官的训练水平必然不适合职务的要求，而适合英国“绅士”一

般的贫乏的知识水平。至于军官的实用军事知识，那也是欠缺的。英国军官认为，他只应当履行一种职责：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向敌人，给兵士做出勇敢的榜样。对他来说，并不要求具有指挥军队、利用有利情况等等的才能；至于谈到关心自己的兵士，了解他们的需要，那末这种想法恐怕从没有在他的脑子里出现过。不列颠军队在克里木失利一半是由于它的所有军官不称职。诚然，英国军官的一种特长有助于他们完成自己的职责：他们大多数是酷爱打猎的人，善于迅速和本能地判断有利的地形。这种特长无疑是由于他们的爱好而形成的。

军官不懂本行业务在参谋部门造成的害处比在其他任何部门都大。由于没有系统地训练参谋军官，所以每个将军从各团抽调完全不懂这门业务的军官组成自己的司令部。像这样的司令部还不如完全没有的好。侦察工作特别草率，这是必然的，因为担任侦察的人想不到他需要干些什么。

其余的各专门业务部门训练得稍好一些，但训练水平比其他国家的军队仍然低得多。总之，英国军官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军官的心目中是出名的不学无术之徒。英国人的军事著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几乎任何著作都是错误百出，在其他国家里即使一个尉官犯这种错误也是不会得到原谅的；对事实的叙述既不认真，又不用专业用语和军事术语，而且对事情的本质也不加注意。一眼就可以看出，作者是不懂本行业务的。这是轻易相信外国书籍中最荒谬的论断的结果^①。不过，我们应当说，有一些可喜的例外，像威廉·纳皮尔著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一书和霍华德·道

^① 切斯尼上校关于火器的著作²³⁵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作者被看做是大不列颠的优秀炮兵军官之一。

格拉斯著的“海军炮兵”一书²³⁶就在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行政、卫生、军需、运输及其他辅助勤务都处于可怜的状态，在克里木一遭到考验就彻底垮台了。现在，对上述勤务正设法改进，试图集中管理，但是在民政机关，实际上是整个国家政权没有改变以前，这些尝试未必能有什么结果。

不列颠军队尽管有着自己的一切严重缺点，但仍能将每次战局进行到底，它虽没有取得突出的胜利，却也没有蒙受耻辱。不列颠军队的损失、指挥的无能以及所犯的错误之多，在我们把这一切和在同等条件下的其他国家的军队的情况相比时，都使我们大吃一惊。不过不列颠军队毕竟没有丧失军人的荣誉，它很少退却，几乎从未遭受彻底的失败。这是兵士个人非常勇敢顽强、遵守纪律和绝对服从的结果。尽管不列颠兵士在独立行动或执行轻装部队的勤务时不灵活、不机智、缺乏才能，但当他们成密集队形行动时，在正规战中谁也不能胜过他们。他们的 forte (长处) 是成横队行动。英国步兵于编成横队战斗队形，能做其他任何国家的步兵未必敢做的事——以横队迎击冲锋的骑兵，把子弹装好，一直到最后时刻，即让敌人进到 30 码的距离时才进行齐射，并且几乎总是获得全胜。英国步兵甚至在最危急的关头也能十分沉着地射击，因而射击效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例如苏格兰人在巴拉克拉瓦以横队行动，击退了俄国骑兵的冲锋。英国步兵的坚定和顽强精神从没有像在因克尔芒会战中表现得那样明显；法国军队要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被击溃；但是法国军队却决不会让自己在那种阵地上遭到突然的袭击。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坚定性和顽强性是不列颠军队的重要素质；正是这些素质，才不止一次地使它免于因军官的无能、指挥的荒谬和运动的不灵活而遭到

完全应得的、似乎预定的失败。

三、奥地利军队

奥地利利用了 1848—1849 年严酷考验后的最初喘息时机，在现代化的基础上改编了自己的军队。几乎全部军队都进行了根本的改组，所以现在它的战斗力比过去大大提高了。

首先是步兵。它由 62 个基干团、1 个猎兵团和 25 个猎兵营、14 个边屯步兵团和 1 个边屯步兵营组成。边屯步兵和猎兵共同组成轻步兵。

1 个基干步兵团包括 5 个野战营和 1 个后备营，共计 32 个连，其中每个野战连 220 人，每个后备连 130 人。这样，每个野战营约有 1300 人，每个团将近 6000 人，即等于英国 1 个师的人数。因而全部基干步兵按战时编制约为 37 万人。

边屯步兵每团有 2 个野战营和 1 个后备营，共计 16 个连，3850 人；全部边屯步兵的人数为 55000 人。

猎骑兵，或者猎兵，共有 32 个营，每营约 1000 人；总数为 32000 人。

军队中有重骑兵：8 个胸甲骑兵团和 8 个龙骑兵团；轻骑兵：12 个骠骑兵团和 12 个枪骑兵团（其中 7 个团原为轻龙骑兵，或者 *chevau-légers*（轻骑兵），不过后来改编为枪骑兵）。

重骑兵团由 6 个骑兵连组成，另有 1 个骑兵后备连；轻骑兵团由 8 个骑兵连和 1 个骑兵后备连组成。每个重骑兵团为 1200 人，每个轻骑兵团为 1600 人。全部骑兵按战时编制的人数约为 67000 人。

炮兵包括 12 个野炮团，每团按战时编制有 4 个六磅步炮连和

3个十二磅步炮连,6个骑炮连,1个榴弹炮连,共计1344门火炮;还有1个岸防炮团和1个火箭团:20个炮兵连(160个火箭发射管)。共计1500门火炮及火箭发射管和53000人。

战时作战军队中战斗人员的总数为522000名。这个数字还应加上16000名左右的工兵—地道爆破兵及架桥兵,2万名宪兵和运输勤务人员等,所以总数约为59万人。

如把预备兵员征集起来,军队可以增加10—12万人;如最大限度地利用边屯部队的兵源,奥地利还可以增加10—12万人。但由于这些兵力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调集在一起,而是将陆续开到,因此他们主要用来补充军队的伤亡。所以奥地利未必能一下子武装起65万以上的人。

军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正规军和边屯部队。正规军的服役期限为八年,随后兵士还有两年的预备役。但是如同在法国一样,奥地利兵士可以长期归休,因此实际上他们在军队中的时间可以肯定为五年。

边屯部队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编成的。他们是南方斯拉夫(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瓦拉几亚移民的后裔,还有一部分是德意志移民的后裔。他们在给帝国服兵役的条件下获得自己的土地,过去被用在达尔马威亚到特兰西瓦尼亚的边境上抵御土耳其人的袭击。现在这一勤务已流于形式,但是奥地利政府决不愿放弃这个雄厚的兵源。正是有了这个边屯部队的组织,1848年拉德茨基的军队在意大利才得到了拯救,而1849年在文迪施格雷茨统率下的奥军才有可能第一次入侵匈牙利。弗兰茨—约瑟夫保全了帝位,不仅应归功于俄国,而且也应归功于南方斯拉夫边屯团。在各团驻防的边疆地区,皇室土地的佃户(几乎每个居民都是这种佃户),凡是年

龄在 20—50 岁的，须随时应征服役。这些边屯团的主力当然是青年，至于中年人，主要是轮流担任边防哨兵勤务，一直到战争爆发征召入伍时为止。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大约 150—200 万居民中，必要时能提供 15—17 万人，即占居民总数的 10—12%。

奥地利军队有许多特点与不列颠军队相似。两者都包括许多不同的民族，虽然每个团通常都由单一的民族组成。苏格兰的赛尔特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差别，并不比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和马扎尔人的差别大多少。不论在奥地利军队中或在不列颠军队中，都有不同民族的军官，其中有许多是外国人。在奥地利和英国，军官的理论素养都是很差的。这两国军队的战术队形保留了旧线式战斗队形中的许多东西，而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采用纵队和散开队形。这两国军队的服装颜色也是异乎寻常的：英国军队的服装是红色的，奥地利军队的服装是白色的。但就编制的特点、军官的实战经验和素养以及军队的机动性来说，奥地利军队远远超过不列颠军队。

兵士的服装，假如不把步兵的稀奇的白色上衣算在内，就其式样来说完全合乎现代的标准。类似普鲁士式的短上衣，浅蓝色裤子，灰色大衣，法国式的轻便军帽，合起来是一套便于执行军事勤务的好服装；只有匈牙利团和克罗地亚团的瘦小的裤子——构成他们民族服装的一部分——很不方便。兵士的个人装具不合要求，交叉式皮带仍被采用。边屯部队和炮兵穿着褐色的上衣，骑兵穿着白色的、褐色的或天蓝色的上衣。枪枝很笨重，而猎兵和各连的大部分兵士所装备的步枪是相当老式的，比米涅式步枪的质量低。一般的兵器是用旧式燧发枪改制成的极不完善的短铳枪，这种枪时常不点火。

步兵擅长于以密集队形作战，但作为轻步兵执行勤务时，其运动性较差，在这方面也同英国步兵相似。不过，我们对边屯部队和猎兵应作别论。前者，至少是其中大部分，都极善于互射，特别是作战时惯用伏击的塞尔维亚人更是如此。猎兵是优秀的射手，他们几乎全部是提罗耳人。步兵中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通常以坚定性著称，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们不止一次地证明在这方面不亚于英国步兵。他们也不止一次地以横队迎击骑兵，而并不认为有必要变换成方队；但当他们变换成方队时，敌人的骑兵就很少能打败他们。阿斯佩恩会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骑兵是卓越的。由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组成的重骑兵，即“德意志”骑兵拥有良马，装备又好，所以行动总是成功的。轻骑兵打败仗可能是由于把德意志 *cheval- légers* (轻骑兵) 和波兰枪骑兵编在一起的缘故，但匈牙利骠骑兵永远是轻骑兵的表率。

炮兵——它的兵士主要是从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征集的——一向具有高度的水平，这不仅是因为它及时地和慎重地进行了改革，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对自己的官兵进行了实际训练。军士受过特别严格的训练，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的军士都要高明。至于军官，他们的理论教育过多地迁就了他们个人的自愿，但是奥地利毕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作家。在奥地利，所有军官，至少是下级军官，通常都要学习，而在英国，军官研究本行的专业却被看做是侮辱自己团队的行为。奥军的专门业务部门、司令部和工程部队也是出色的，根据地形测绘的资料制成的精确的地图，特别是伦巴第的地图，就说明了这一点。英国炮兵指挥用的地图虽然也不坏，却不能同它相提并论。

军队的多民族成分是个很大的麻烦。在不列颠军队中，至少

人人都会说英语，而在奥地利的非德意志团队中，甚至连军士也只能勉强用德语讲话。这当然造成很大的混乱，产生许多困难，甚至军官同兵士谈话时也需要翻译。由于驻区经常变更，军官不得不多少学习一些在奥地利使用的各种语言，这虽减少了一部分困难，但这种不方便终究没有消除。

经常靠榛树条的鞭打才在兵士中维持下去的严格纪律以及长久的服役期限，使不同民族之间不易发生严重冲突，至少在平时是如此。但是 1848 年表明，奥地利军队内部是如何的不稳定。在维也纳，德意志部队拒绝镇压革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民族部队几乎未作任何抵抗就投到了起义者方面。这正是奥地利军队的弱点。谁也不敢说它的团结将保持到什么程度，能维持多久，以及有多少个团会在某个时刻离开它，开始反对自己过去的战友。在奥地利军队中有六种民族，信仰两三种宗教。至于谈到有助于军队团结的相互谅解，那末，当所有的民族像现在一样，渴望自由地使用自己的部队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来代替相互谅解。当同俄国发生战争时，难道能够指望受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影响的、信仰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会反对与自己同血统、同宗教的俄国兄弟吗？在爆发革命战争时，要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牺牲本乡本土的利益，为不同语言和不同民族的皇帝去打仗，这可能吗？这是很难指望做到的。因此，不论奥地利军队多么强大，它还需要具备完全特殊的条件，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兵力调动起来。

第二部分

一、普鲁士军队

普鲁士军队有其独特的一套组织，因而值得特别注意。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中，平时编制的军队就是整个军事组织的基础，而对于大战爆发时立即需要组成的新部队的骨干是不进行任何训练的。但在普鲁士，像有些人肯定地对我们说的那样，为转入战时编制作好了一切周密的准备。因而平时编制的军队就像一所学校，国民在这里学习使用武器，进行操练。有人认为，这种制度规定所有适合服兵役的男子在战时都将编入军队，因此采用这一制度的国家似乎在遭受任何袭击时都能保证安全；可是情况远非如此。采用这种制度，只能使国家拥有比在采取法国或奥地利的征兵制时几乎多百分之五十的兵员。正因为这样，一个人口不超过 1700 万、领土不大、既无海军又不直接进行海外贸易的农业国家，一个工业不太发达的国家，才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欧洲大国的地位。

普鲁士军队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尚在训练中的兵士组成的常备军；另一部分是由已受过训练的、也可以说是由归休的兵士组成的后备军。

常备军的服役期限为五年。凡是年龄在 20—25 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兵士服满三年现役就够了，以后可以归休，在其余的两年被编为所谓预备兵。在这一期间，他们仍然列入原步

兵营或原骑兵连的预备兵名册，随时都可能应召归队。

预备兵两年期满后，转入第一类后备军 (erstes Aufgebot des Landwehrs)，直到 32 岁为止。在这段时间内，每两年应召参加一次后备军的操练，这种操练通常规模极大，而且是和常备军共同进行的。操练照例是一个月，为此集中的往往有 5—6 万人。第一类后备军的使命是和常备军共同进行野战。它同常备军一样，编成独立的团、营 (骑兵连)，并且团的番号相同。但后备军的炮兵仍分属常备军的各个炮兵团。

凡年龄在 32—39 岁的兵士列入第二类 (zweites Aufgebot) 后备军。在这一段时间内，除非爆发战争，便不再服役。如果发生战争，则第二类后备军应承担要塞警备勤务，以便全部常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都能够用来进行野战。

年满 40 岁的兵士可以免征，但在征召有名无实的所谓民军或宣布 en masse (总动员) 时例外。民军包括所有不在现役内、也未编入第一、二类后备军的 16—60 岁的男子，以及所有因身材矮、体质弱或其他某种原因而免服兵役的人。但是关于这种民军，说它有名无实甚至都不恰当，因为从没有认真考虑过它的组织编制，也没有规定过它的武器装备。如果真有一天能把它召集起来，那末除了担负国内的警察勤务和消耗大量的酒以外，它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既然在普鲁士 20—40 岁的每一个公民按法律都要当兵，那末 1700 万人口似乎便可组成一支至少 150 万人的军队。但实际上连这个数字的一半也征集不到。事实上要在三年服役期间在团内训练出这样大批的人，那平时编制的军队就至少应达到 30 万人，而实际上普鲁士现在只有 13 万人左右。人们用各种办法使相当数量

应服兵役的人免服兵役：把一些完全适合服役的人称之为体质过弱，体格检查委员会不是只挑选应征者中体格最强的，就是在挑选适合服役的人员时徇私受贿等等。过去曾采用使步兵的现役期缩短到两年的办法，把平时编制的军队缩减到 10 万或 11 万人。但是在革命以后，政府确信，增加一年服役期对于使兵士服从军官以及使兵士在国内发生起义时仍然忠于政府有很大意义，因而又恢复了三年的服役期。

常备军由 9 个军组成：1 个近卫军和 8 个基干军。现在我们来看看它们的编制的特点。在它们的编成中有：36 个步兵团（近卫团和基干团），每团 3 个营；8 个预备团，每团 2 个营；8 个混成后备营和 10 个猎兵（Jäger）营；总共 142 个步兵营，计 15 万人。

骑兵由 10 个胸甲骑兵团、5 个龙骑兵团、10 个枪骑兵团和 13 个骠骑兵团组成，每团 4 个连，共 800 人；总计 3 万人。

炮兵由 9 个团组成，每团按战时编制有：8 个步炮连（4 个六磅炮连，3 个十二磅炮连，1 个榴弹炮连），3 个骑炮连，并附有 1 个后备连，后者可以作为第十二炮兵连；此外还有 4 个要塞炮连和 1 个工役连。但是，为了维护这些火炮和补充各连的兵力，还需要全体预备兵和第一类后备军中的炮兵，因而可以算出，常备军炮兵由 9 个团组成，每团约有 2500 人和将近 30 门火炮，他们全都配备有马匹和装具。

这样，普鲁士常备军的总数约有 20 万人；但是，有充分的根据可以从这一数字中扣除那些经过三年服役而归休的预备兵 6—7 万人。

第一类后备军是按常备军每一个近卫团或基干团就有后备军的一个团这种标准建立的，8 个预备团除外；此外，第一类后备军

还有 8 个后备营；总计 116 个营，约 10 万人。骑兵由 2 个近卫团、32 个基干团和 8 个后备连组成；共计 136 个骑兵连，约 2 万人。炮兵则如上所述分属常备军的各炮兵团。

第二类后备军同样有 116 个步兵营，另有 167 个骑兵连（包括使命与第二类后备军相同的各种后备骑兵连在内）和一部分要塞炮兵；共约 15 万人。

此外加上 9 个工兵营、各种辅助部队、约 3 万名领优抚金的兵以及按战时编制不少于 45000 人的辎重部队，普鲁士整个军队的人数约有 58 万人。其中 30 万人担任野战勤务，54000 人在后备部队中训练，17 万人担任警备勤务和作为预备队，约 6 万人担任非战斗勤务。全军的野炮数量为 800—850 门，分编为炮兵连，每连 8 门（加农炮 6 门，榴弹炮 2 门）。

所有这些部队都不仅配有经过相当训练的骨干，而且还有武器装备，因而在军队**动员**时，只要收集马匹就行了。但是因为普鲁士马匹很多，而且牲畜和人同样是属于紧急征用之列的，所以在这方面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如按规定来看，情况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1850 年的军队动员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第一类后备军领到了武器装备，虽然也不是没有很大困难的；但第二类后备军的物资却毫无准备，既没有衣服鞋子，也没有武器，因而成了一个大笑柄。曾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务的专家在这以前早就说过，将来的情况必然是：普鲁士在需要用兵时实际上只能依靠常备军和一部分第一类后备军。以后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个预测。无疑地，第二类后备军的武器装备从那时起就已有所储备了，如果现在征召这支后备军，那末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后它就可以完全胜任警备勤务甚至野战勤务。但是，要知道，在战时有三个月

的时间就足以把新兵训练好去担任野战勤务，因而普鲁士所采用的这套笨拙的制度决不能保证人们所说的那些巨大的优越性。此外，为第二类后备军准备的物资在两三年后将会不知去向，就像过去也曾储备过，但到1850年需要使用时却不见了。

普鲁士虽然规定了每一个公民都要当兵的原则，但是半途而废，损害了这一原则，因而也就损害了整个军事组织。既然废除了征兵制而代之以普遍义务兵役制，那末也应该废除像现在这样的常备军，而只保存军官和军士的骨干；由他们来训练青年，而且这一训练的期限也不应超过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需的时间。如果确能如此，那末平时的服役期就可以缩短到一年，至少对所有步兵来说是适当的。然而不论政府或守旧派军人都不同意这样做。政府希望有一支驯服可靠的军队，在必要时可以用来镇压国内的骚乱；而守旧派军人则希望军队在练兵方面、在军容和坚定性方面能够与由年龄较大的兵士组成的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相媲美。由服役期不超过一年的新兵组成的军队，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要求。因此折衷地确定了三年的服役期，普鲁士军队的各种缺点和弱点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我们已经说过，至少有一半适合服役的人没有入伍。他们一下子就被列入第二类后备军的名册中，以致第二类后备军名义上数量大为增加，但实际上由于大批人都从未拿过枪，并不比未经训练的新兵强，所以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国家的实际军事力量至少削弱了一半，这是延长服役期所造成的第一个恶果。

但是，就连常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本身也由于这种制度而受到损害。每一个团有三分之一的兵士服役不到三年，三分之一的兵士服役不到两年，其余的不到一年。不可能指望用这种方法补

充兵员的军队会具有英国、奥地利、俄国甚至法国军队中的老兵所特有的那些军事素质，如严格的纪律性，作战部队的稳定性和 *esprit de corps*（团结精神）。英国兵的服役期长，因而英国人是这方面有权威的评判人，他们认为必须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能把新兵完全训练好^①。可是在平时，普鲁士军队的兵士中没有一个是服役满三年的，因此，十分自然，老兵的那些战斗素质，或至少某些与此类似的素质只是靠粗暴的练兵方法强迫普鲁士年轻的新兵练出来的。普鲁士军队的尉官和士官由于无法完成所担负的任务，所以对待自己的部属粗暴、残忍，同时这种态度由于还带有学究气而加倍地令人厌恶。这种学究气之所以显得更加荒谬，是因为它完全与普鲁士所规定的简单合理的训练制度相抵触，而且又经常要求遵守弗里德里希大帝的传统，但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当时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战术，训练的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兵士。这样，军队的真正的战斗力就成为操场练兵的牺牲品，而且整个说来，普鲁士常备军要比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在对普鲁士战争开始时所能使用的那些老的步兵营或骑兵连都差。

普鲁士军队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它具备其他国家的军队所没有的许多优点。普鲁士人正像一般的德意志人那样，是很适合当兵的。这个既有辽阔的平原又有大片山地的国家，能为任何兵种提供充足的兵员。而且大部分德意志人的体质既适合担任轻步兵，又适合担任基干步兵，这是任何其他民族所难以相比的。国家盛产马匹，并能提供大量从小就习惯于乘骑的骑兵。德意志人稳健沉着的性格使他们特别适合在炮兵中服务。同时，德意志人

^① 见威·纳皮尔爵士“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

是世界上最好战的民族之一，他们在战争中寻求快乐，当自己的家门前无仗可打时，就出外找仗打。从中世纪的德意志雇佣兵起到目前的法国和英国的外籍军团止，德意志人一贯地提供了大批为作战而作战的雇佣兵。如果说法国人在攻击的敏捷和积极性上胜过德意志人，如果说英国人在抵抗的顽强性上超过德意志人，那末德意志人无疑比欧洲所有其他民族都更适合于担任各种军事勤务，这使德意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优秀的兵士。

普鲁士军官在全世界的同行中是最有学识的。在他们接受普通学科的考试时，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中都高得多。在各旅、各师中都附设有学校以提高军官的理论知识；至于更高深的军事专业知识，军官还可以在许多军事学校中获得。普鲁士的军事著作具有很高的水平。近二十五年来著作充分证明，它们的作者不仅熟谙本行业务，而且在科学知识的渊博方面也可以与任何国家军队的军官相媲美。诚然，在个别著作中有不少形而上学的肤浅的论述，但这毫不奇怪，因为在柏林、布勒斯劳或科尼斯堡，你们可以看见军官在大学里和学生一起听课。克劳塞维茨在军事方面同若米尼一样，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而阿斯特工程师的著作则开辟了筑城学中的新时代。虽然如此，“普鲁士尉官”一词在整个德意志却成了普通名词；发展到可笑程度的 *esprit de corps*（团结精神），学究气和由于军队中的整个气氛而在交往中所习惯的那种蛮不讲理的腔调，完全可以说明这一事实。同时，任何地方都不像普鲁士这样，在校官和将官中有这样多的顽固的老学究，而且其中大部分是 1813 年和 1815 年的遗老。在叙述了以上这一切以后，应当承认，由于荒谬地试图使普鲁士常备军变成它所永远不可能做到的、由老兵组成的军

队，因而降低了兵士的质量，同样也降低了军官的质量，也许，后者甚至比前者降低得更多。

普鲁士军队的操典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它简单扼要，条理分明，以几条合理的原则为依据，几乎不能希望有比这更好的了。这一操典是夏恩霍斯特的天才结晶。他大概是自拿骚的摩里茨以来最杰出的军事组织家了。大军统率要则也很好。可是，正式推荐给军官阅读的一些学术性的炮兵指南却内容陈旧，完全不符合现代的要求。不过，这只是就多少带有官方性质的著作而言，与普鲁士整个炮兵方面的书籍无关。

工程部队享有完全受之无愧的极好的声誉。自蒙塔郎贝尔以来最优秀的军事工程师阿斯特就出身于工程部队。从科尼斯堡和波兹南起到科伦和科布伦茨止，普鲁士的军事工程师建筑了一系列的要塞，这些要塞博得了整个欧洲的赞扬。

普鲁士军队的装具自 1843 年和 1844 年实行改革以来，虽然不十分美观，但是十分便于兵士佩戴。头盔能很好地遮蔽阳光和防雨，服装宽大而舒适；全部装具甚至比法国军队的还合用。近卫军和轻步兵营（每团一营）装备有针发的线膛枪；其余的常备军则装备有普通的火枪，这些枪经过很简单的改装后都已成为性能良好的米涅式步枪。至于后备军，再过两三年也将领到米涅式步枪，目前仍是装备着短铳枪。骑兵的马刀过宽过弯，因而劈刺的效果不大。炮兵的武器装备——火炮、炮车和马具——在很多方面还有待改善。

总的说来，普鲁士军队即常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但决不是像普鲁士的爱国作家所夸耀的那样。常备军投入战场后会很快摆脱操场练兵的束缚，经过几次战斗就能同敌人

相抗衡。第一类后备军，只要一激发起他们的老兵精神，而如果战争又是深得民心的话，那末他们将不亚于欧洲最好的老部队。普鲁士所害怕的，是行动积极的敌人在战争初期就投入组织得比较严密的、经受过较多考验的军队来对付它；但是如果战争拖延下去，则普鲁士将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老兵。战争开始时，常备军将是军队的基本核心，但是，第一类后备军很快就会把它挤到次要地位，因为第一类后备军的兵士具有更强的体力和更好的战斗素质。这是普鲁士的真正的老兵，而不是常备军里的那些后生。关于第二类后备军，我们现在不谈，它还需要证明：它究竟能做些什么。

二、俄国军队

俄国也曾采取过一定的措施，采用在某些方面与普鲁士后备兵制度相似的预备兵制度，为战时储备骨干。但总的说来，俄国的预备兵员是如此有限，把他们从广大帝国的各地调集起来又是如此困难，以致在英法宣战半年以后，在克里木响起第一枪之前，就已觉察到必须废除这种制度，着手编组新的大部队，随后又陆续地成立了新的部队。因此在俄国，应当把战争开始时的和现在的军队编成情况区别开来。

平时俄国军队由下列几部分组成：(1) 作战军队——6个基干军（第一军至第六军）；(2) 预备队军队——1个近卫军，1个掷弹兵军，2个预备队骑兵军；(3) 地区军队——高加索军、芬兰军、奥连堡军、西伯利亚军；(4) 内勤部队——老兵、卫兵、残废兵等等；(5) 非正规部队。这里还可以包括由归休兵组成的预备部队。

6个基干军的编成如下：每军有3个步兵师，每师有1个基干

旅和1个轻步兵旅，每旅2个团，每团4个基干营；以上共为6个旅，即12个团，48个营，外加1个猎兵营和1个工兵营，合计50个营。此外还有1个轻骑兵师，由1个枪骑兵旅和1个骠骑兵旅组成，每旅2个团，即16个骑兵连，合计32个骑兵连。炮兵1个师，由3个步炮旅和1个骑炮旅组成；共14个炮兵连，计112门火炮。每个军总计：50个营，32个骑兵连，112门火炮。全部基干军共计：300个营，192个骑兵连，672门火炮。

近卫军由3个师，即6个旅组成，包括12个团（9个掷弹兵团和3个马枪兵团即轻步兵团）；近卫团和掷弹兵团每团只有3个基干营，因此共有36个营。此外还有1个猎兵营和1个工兵—地道爆破兵营，3个骑兵师（胸甲骑兵师、枪骑兵师和骠骑兵师），包括6个旅，即12个团，共计72个骑兵连。还有1个炮兵师，包括5个旅，有15个炮兵连（9个步炮连，5个骑炮连，1个火箭连），共计火炮135门。掷弹兵军由3个师，即6个旅组成，包括12个步兵团，即36个步兵营，外加1个猎兵营和1个工兵—地道爆破兵营。这个军也有1个骑兵师，下属2个旅（1个枪骑兵旅和1个骠骑兵旅），包括4个团，即32个骑兵连。炮兵由3个步炮旅和1个骠骑炮旅组成，有14个炮兵连，共计112门火炮。

预备队骑兵军的编制如下：第一军有3个师（2个胸甲骑兵师，1个枪骑兵师），包括6个旅，即12个团，共计80个骑兵连（48个胸甲骑兵连，32个枪骑兵连）。还有一个骑炮师，由3个旅（6个炮兵连）组成，共计48门火炮。第二军有3个师（1个枪骑兵师，2个龙骑兵师），即6个旅，包括12个团，即112个骑兵连（32个枪骑兵连，80个龙骑兵连）。还有2个骑工兵连和6个骑炮连，有48门火炮。

高加索军包括：1个预备队掷弹兵旅，有2个团，即6个营；

3个步兵师，有12个团，即48个营；1个猎兵营；1个工兵营；高加索防区47个营（非常后备军）；共计103个营。骑兵由1个龙骑兵团组成，有10个骑兵连。炮兵为1个师，有10个普通炮兵连和6个山炮连，共计180门火炮。

芬兰军为1个师，包括2个旅，即12个步兵营。奥连堡军为1个师，也包括2个旅，但只有10个步兵营。西伯利亚军为1个师，包括3个旅，计有15个营。

平时的正规部队的总数见下表：

	步兵营	骑兵连	火炮
6个基干军	300	192	672
近卫军	38	72	135
掷弹兵军	38	32	112
预备队骑兵军	—	194	96
高加索军	103	10	180
芬兰军	12	—	—
奥连堡军	10	—	—
西伯利亚军	15	—	—
共 计	516	500	1195

内勤部队由52个卫兵营，800个老兵和残废兵连，11个半骑宪兵连以及98个炮兵连组成。这些部队是很难列入国家的实际兵力之内的。

非正规部队，主要是骑兵，区分如下：

1. 顿河哥萨克——56个团，每团6个百人队^①；共计336个百人队，13个炮兵连；

2. 黑海哥萨克——72个百人队，9个营，3个炮兵连；

^① “百人队”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3. 高加索防区哥萨克（驻库班河和捷列克河一带）——120个百人队和3个炮兵连；

4. 阿斯特拉罕哥萨克——18个百人队，1个炮兵连；

5. 奥连堡哥萨克——60个百人队，3个炮兵连；

6. 乌拉尔哥萨克——60个百人队；

7. 巴什基里亚部队——85个百人队（几乎全是巴什基里亚人和卡尔梅克人）；

8. 西伯利亚哥萨克——24个营，84个百人队，3个炮兵连，其中有一部分是通古斯人、布里亚特人和其他民族；

9. 阿速夫海哥萨克担任海军勤务；

10. 贝萨拉比亚的多瑙河哥萨克——12个百人队；

11. 外贝加尔哥萨克，是不久前编成的；其组织和兵额不详。

以上约计847个百人队（百人队由“一百”^①一词而来，每个百人队相当于1个100人的骑兵连），33个营，26个炮兵连。共约骑兵9万人，步兵3万人。但是目前能用在西部边境作战的大概只有骑兵4—5万人，炮兵几个连，而步兵则一个营也没有。

由此可见，在平时俄国军队（除内勤部队外）包括：步兵36万人，骑兵7万人，炮兵9万人，共计50万人（哥萨克不算在内，其人数随着情况而变化）。但是在这50万人中，地区军队——高加索军、奥连堡军和西伯利亚军——在任何一次战争中都不能用在帝国西部边境，因而俄国能调来对付西欧的兵力最多是步兵26万人，骑兵7万人和炮兵5万人，火炮约1000门，此外，还有哥萨克约3万人。

^① “一百”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这就是俄国军队平时编制的情况。为了对付战争，俄国采取了下列措施：整个服役期根据情况而规定为 20 年、22 年或 25 年，但服役满 10 年或 15 年后，兵士可以归休，编入预备役。这种预备役的组织常常改变，但正如大家现在所知道的，归休兵在头 5 年内根据原属的兵种而分别列入步兵预备营（在近卫团和掷弹兵团内为第四营，在基干团内为第五营）、骑兵预备连或炮兵预备连。5 年期满后转入本团的步兵后备营，即近卫团和掷弹兵团的第五营以及基干团的第六营，或转入骑兵后备连和炮兵后备连。这样，一旦征召预备兵员，步兵和炮兵的实际兵力就几乎可以增加 50%；骑兵则几乎可以增加 20%。所有预备兵员应由退伍军官指挥，其骨干都受过充分的或相当程度的训练。

但是，在这次战争爆发时，一切都改变了。从作战军队中不得不调两个师到高加索去，虽然这两个师原定在西部边境作战。在英法联军乘船开往东方之前，俄国作战军队中的 3 个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五军）都已卷入对土耳其的战局中。虽然这时正在集中预备部队，但是要把他们从帝国各地调集到各个指定地点，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联军的陆军和海军已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上出现，以及奥地利的态度摇摆不定，都要求俄国采取更坚决的措施；征召的名额增加了一两倍，这样征召来的形形色色的大批新兵连同预备兵员，在所有的步兵团中组成了第四、五、六、七、八营；骑兵也有同样的增加。这样，在 8 个近卫军、掷弹兵军和基干军中，便不是原先的 376 个营，而是现在的 800 个营左右，每两个平时编制的骑兵连和炮兵连都至少增加了一个骑兵后备连或一个炮兵连。但是，所有这些数字在书面上看来要比实际上更惊人一些；由于俄国官吏贪赃枉法，军队指挥拙劣，以及长途行军（新兵必须

从自己的家中到集合地点，再从集合地点到军队的驻地，然后开往作战地点），大部分兵士在尚未与敌人接触以前便死亡或离队了。此外，疾病造成的减员和最近两次战局期间战斗中的伤亡数目很大，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俄军的 1000 个步兵营、800 个骑兵连和 200 个炮兵连的人数目前会超过 60 万人。

但是，政府对这种情况是不满意的。第七营和第八营刚一编成，政府便宣布征召非常后备军，其行动之快，证明政府已经完全认识到，要把大量的人从辽阔的帝国的各个地区调集到一起有多么困难。这种国民军，即**非常后备军**^①，按各省人口比例组成若干个**大队**^②（营），每一大队 1000；名额比例是在每 1000 个男性成年人中为 23 人，即几乎占全体居民的 0.25%。目前只在西部各省征召非常后备军。这次征召是在 1800 万居民中进行的，其中男子约占一半，所以征召的人数应为 12 万人左右，而这个数字与俄国官方的统计是相符的。毫无疑问，非常后备军在各方面甚至比不久前成立的预备部队还差，但不管怎样，它毕竟大大增加了俄国的兵力，如果让它来担任波兰的警备勤务，就可以把大量的基干团抽调出来作战。

另一方面，已经开到西部边境的，不仅有很多哥萨克，而且还有巴什基里亚人、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通古斯人和其他蒙古民族组成的大批部队。这一事实说明把上述部队调往西部的命令是早就下达了的，因为其中许多部队都必须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开到圣彼得堡或维斯拉河。

这样，俄国几乎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它的兵源，在两年战争中

① “非常后备军”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② “大队”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虽然它一次决战也没有失利过，但是仍然不能提供 60 万人以上或者至多 65 万人的正规部队、10 万人的非常后备军或者 5 万人的非正规骑兵。我们并不想以此来说明，俄国的兵源已经枯竭了，然而我们十分清楚，进行了两年战争的俄国决不能像进行了二十年战争而精锐部队又在 1812 年全军复灭后的法国所做到的那样，再补充 30 万新兵并抵挡住（哪怕是暂时的）敌军的攻击。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和另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在军事实力上的差异是这样大。假如法国与俄国接壤的话，那末 6600 万俄国人会比 3800 万法国人弱。毫无疑问，4400 万德意志人是一支比信奉正教的沙皇的 6600 万臣民更大的力量。

俄国军队是用各种方法征集的。它主要是采用定期征兵的方法来补充的，每年一次，一年在欧洲俄国的西部各省进行，另一年则在东部各省进行。通常征集的比例为每千名（男）“丁”中征新兵 4 或 5 人，因为在俄国的丁籍上只登记男性居民，根据正教的等级观念，女子是不算作“丁”的。在帝国西部征集的兵服役 20 年，在东部征集的则服役 25 年。近卫军服役 22 年；军屯中的青年服役 20 年。除了这种征集的人员以外，新兵最大的来源是兵士的儿子。凡是兵士在军队服役期间生的儿子，一律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这一规定适用的范围很广，甚至兵士在 5 年或 10 年内远在帝国另一端服役期间，其妻子所生的儿子也都在国家的征召之列。这些兵士的儿子称为**少年兵**，其中大多数由官费教养；大部分军士是从他们中间提拔出来的。最后，在军队中服役的还有法庭判决的罪犯、流氓和其他根本无用的人。贵族有权将没有生理缺陷的农奴送去当兵。每一个父亲如果不满意自己儿子的行为，也可以这样做。《S' bogom idi pod krasnuyu shapku!》“上帝保佑你，去戴红帽子吧！”就

是说去当兵吧，——俄国农民平时对不听话的儿子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说过，军士大部分是由在官办学校中受教育的兵士的儿子补充的。这些从幼年就充满了服从军纪的思想的年轻人，与那些以后应受他们训练和指挥的兵士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殊集团。他们属于国家，没有国家就不能生存下去；他们逍遥自在，一无所长。在政府豢养下生活，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希望。这些军士在军队中的情况和由下级官吏的子弟补充的下级官吏在民政机关中的情况相同。这是一群仰人鼻息、奸诈狡猾、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人，受过一点点肤浅的教育使他们更加令人厌恶；虚荣心重，唯利是图，把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出卖给国家，而同时又时时刻刻想零星地出卖国家，只要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的话。居斯丁先生在游历俄国以后所著的游记²³⁷中描写得非常出色的那个信差，即伴随他游历的那个送信人，就是这类人的极好的典型。因为有了这类人，那种渗透到俄国的各级国家机构中的贪污之风才在军政部门中大为盛行。但是无疑地，假如俄国废除这种子弟完全归国家所有的制度，那末它便不可能得到它所需要的一批民政机关中的下级官吏和军队中的军士。

军官的情况看来更坏。训练未来的上等兵或司务长花费较少，但是培养百万大军的军官（根据官方材料，俄国正是为这样庞大数量的军队而培养骨干的），却是一件耗费很大的事。私立学校在这方面什么都不做，或者做得很少，一切都得由国家进行。但是十分明显，国家没有力量使上述目的所需的大量青年受到教育；因而施加精神上的压力，使贵族子弟必须在军队或民政机关至少服务5年或10年。凡贵族家庭，其成员连续三代“未服公职”的，便失掉贵族特权，其中包括农奴所有权，而没有这种所有权，大

量地产在俄国便毫无价值了。因此，大量青年到军队里来，取得准尉或中尉军衔，他们的全部教育充其量也只是用法语比较容易地进行一般的交谈，稍许懂得一点简单的数学、地理和历史，——把所有这些东西灌输给他们也不过是做个样子罢了。对他们来说，服公职是不得不干的苦差事，他们怀着难以掩饰的厌恶心情来对待它，把它看做是长期的疗程；只要规定的服役期一满或获得少校军衔时，他们便立刻退伍，列入后备营的名册中。至于说到军校学生，也主要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应付考试才给他们灌输一些知识，因此就连在专业知识方面，他们也远不如在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军事学校里学习的青年。另一方面，有天才而又勤学的热爱本行专业的青年在俄国非常罕见，因此只要他们有所表现，不管他们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都立即受到重视。国家非常慷慨地供给他们学费，使他们能够受完教育，并在职务上迅速提拔他们。这些人通常被当做俄国文明的成果来向欧洲炫示。如果他们有写作的愿望，只要不超过俄国政府规定的范围，总是受到百般鼓励；正是这些人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在俄国军事著作中有价值的东西。但直到目前为止，俄国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都还十分野蛮，不能在学术研究或脑力工作（玩弄阴谋除外）中得到乐趣，因此几乎所有在俄军中服务的杰出人物都是外国人或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德意志人，即“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地区的”^①德意志人（也可以算作外国人）。这一部分人中间最近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今年7月负伤后死去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总工程师托特列本将军²³⁸。不论从俄军方面或联军方面来说，在整个围攻战的所有参加者中

① “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地区的”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间，他无疑是在工程方面最有学识的人，但他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是普鲁士人的后裔。

这样看来，在俄国军队的军官中，有很好的，也有很差的，不过两者比起来，前者的数量极小。俄国政府对本国军官的看法如何，这一点可以根据它的操典明显而无误地判断出来。这些操典不仅规定了旅、师或军编组战斗队形的总则，即指挥官可以根据地形条件和其他情况加以改变的所谓“标准部署”，而且还规定了在各种可能的场合应当采用的各种部署，不给将领留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使他受到约束而尽量不让他负任何责任。例如，操典规定军可以按照五种不同的方法进行部署，而在阿尔马河会战中俄军果真是按照其中之一，即按照第三种部署列成阵势的，结果当然被击败了。这种对一切可能的情况都事先作出规定的癖好，使指挥官的行动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他利用地形的有利条件，因此一位普鲁士将军在批判这种制度时曾这样说道：

“只有在大多数将军都愚蠢到连政府也不能放心委以指挥全权或准其机断行事的军队中，才能容忍这种一切都按规定办事的制度。”

俄国兵属于欧洲最勇敢的兵士之列。他们的顽强精神几乎不亚于英国步兵和奥地利的某些步兵。他们所固有的特点正是约翰牛所自我夸耀的那一点——挨了打，他也感觉不到。俄国步兵的方队即使被骑兵突破后仍能长时间地抵抗和进行白刃战；人们一贯认为，射死俄国人比迫使他们退却要容易一些。在1813—1814年作为俄国的盟友而1854年在克里木则作为俄国的敌人的乔治·卡瑟克特爵士，曾亲眼看到过俄国兵，他以钦佩的心情证明，他们“从来不惊慌失措”。²³⁹此外，俄国兵体格好，身体壮，步伐矫健，要求不高，吃喝随便，而且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的兵士更能听

从自己的长官。虽然如此，俄国军队却没有可以特别夸耀的。自建国以来，俄国军队还从来没有在兵力优势不很大的情况下战胜过德意志军队、法国军队、波兰军队或英国军队。在兵力相等的条件下，他们总是败于其他国家的军队，只有对普鲁士军队和土耳其军队是例外，但在切塔特和锡利斯特里亚²⁴⁰，土耳其虽然兵力较弱，却也战胜了俄国军队。

俄国兵的主要缺点在于他们是最不灵活的兵士。他们既不适于当轻步兵，也不适于当轻骑兵。哥萨克在某些方面来说虽然是出色的轻骑兵，但总的说来很不可靠，以致在和敌人接触时在哥萨克前哨的后方总要布上第二道前哨线。此外，哥萨克完全不适宜于攻击。至于说到正规部队中的步兵和骑兵，他们是不善于进行散兵战的。俄国人处处仿效别人，只能完成命令他们或迫使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他们不得自行作战，他们便什么也干不了。的确，对于那些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有责任心的人，以及对于那些奉命去死就好像奉命去汲水或鞭笞自己弟兄一样地驯服的人，是很难期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期望俄国兵在担任前哨或进行散兵战时能表现出法国人那样的机灵和德意志人那样的理智，那是要落空的。俄国兵所需要的是命令，是清楚明白的命令，如果他没有接到命令，那末他可能不退却，但也不会前进，而且不知道该怎样行动。

骑兵虽然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并受到特别重视，但始终不是优秀的骑兵。不论在对法战争或向波兰进军中，它都未能树立战功。俄国人消极的、能忍耐的和驯服的服从并不是骑兵所需要的品质。一个骑兵的主要优点，恰恰是俄国人最欠缺的，这就是“勇猛”。例如，当 600 名英国龙骑兵以真正骑兵的那种英勇果敢精神在巴拉

克拉瓦附近向人数多得多的俄军猛冲时，他们打垮了俄国的炮兵、哥萨克、骠骑兵和枪骑兵，一直冲到密集的步兵纵队前才不得不调回头去；但是，在这一次骑兵攻击中，究竟谁称得上胜利者，这还是一个疑问。假如这种轻率的攻击是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进行的话，那就不会有一个人生还，因为敌人就会从翼侧和后方包围攻击者，很容易把他们的退路切断。可是俄国的骑兵却勒住马不动，等待敌人，及至想起策马前进时，已被敌人击溃了！老实说，如果要想找一个事实来证明俄国正规骑兵不行的话，那末这就是一个。

俄国炮兵装备着质量不同的火炮，凡是装备有好炮的部队，就能很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炮手在战斗中表现出很大的勇敢，可是他们总是缺乏机智。俄国炮兵连一旦失去自己的指挥官，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但是即使指挥官活着，炮兵连也只能按照操典的规定占领阵地，尽管那是荒谬的。当被包围于要塞中而需要忍耐、刻苦和随时准备遭到危险时，俄国炮兵常常表现出崇高的品质，但这主要的不是说他们射击准确，而是说他们在敌人的火力下能奋不顾身地履行职责和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一点可以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整个被围过程中得到证明。

然而，在炮兵和工程部队中我们遇到的正是俄国向欧洲夸耀的那些受过高深教育的军官，他们确实受到鼓励去尽量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可是比方说在普鲁士，即使最有才干的人，如果军衔不高，一般都要受到自己长官的压制，而他们所提出的一切改良措施则都被斥责为标新立异，自作聪明，因而其中许多人不得不到土耳其谋事，在那里建立了欧洲第一流的正规炮兵。但在俄国所有这样的人都受到鼓励，有一技之长的都官运亨通，升迁迅速。吉比奇和帕斯凯维奇两人成为将军时，一个只有 29 岁，一个只有

30岁，而托特列本在塞瓦斯托波尔不到8个月的期间，便由上尉擢升为少将。

俄国人最引以自豪的是步兵。步兵具有惊人的坚定性，无论在横队或纵队内，或者在胸墙后，都是危险的敌人。可是他们的长处也仅限于此。他们几乎完全不适于当轻步兵（所谓猎兵只是名义上的轻步兵，而实际上担任轻步兵勤务的只是配属给轻步兵军的8个猎兵营）。俄国步兵一般不是好射手，虽然长于步行，但是速度不快；他们的纵队通常编得很差，还没有发起攻击，便常常被敌人的炮火击溃。将军们所不敢改变的“标准部署”，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促成作用。例如在阿尔马河，早在英军编成极不灵便的横队渡河而后再改变队形进行攻击以前，英国炮兵就已使俄国纵队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因克尔芒，8000名英国步兵在尚未完全占领阵地和警戒不严的情况下遭到突然的袭击，他们同15000名进攻的俄军进行了白刃战，抵抗达4小时以上，并胜利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攻击。从此以后，即使在谈论俄国人引以自豪的步兵的惊人坚定性时，也只好有所保留了。因克尔芒会战应当使俄国人明白，在他们最强的一方面，他们也碰上了劲敌。俄军的每次攻击都遭到失败，是因为英国兵勇敢，军士和兵士机智灵活、士气旺盛。在这次会战后，我们可以说英国人自命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基干步兵是有理由的。

俄军的服装几乎完全仿效普鲁士的式样；装具的佩戴非常不便；胸前交叉挂的不仅有佩刺刀和子弹盒的皮带，而且有扎背包的带子。不久前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装具有无变化，我们还不知道。枪枝则非常笨重，只是在最近才采用了短铳枪；俄国枪枝是现有一切枪枝中最沉重、最便于使用的。骑兵的马刀是旧式的，铸

造得也很差。至于在克里木使用的新式火炮,据报道性能良好,效果甚佳;但是否整个炮兵都装备有这种火炮,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最后,俄国军队仍然受到超过本国一般文化水平的学院式教育的影响,因此具有这种温室教育的一切害处和缺点。在小规模的战争中,哥萨克由于积极顽强,所以是值得注意的一支唯一的战斗力量,但是他们嗜酒如命、掠夺成性,因而在指挥官的眼里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在大规模的战争中,由于俄军行动迟缓,只要对方不像去年秋季英军那样的疏忽大意,即俄军的战略机动是没有什么大危险的。在正规的会战中,俄军对于进攻的兵士来说是顽强的敌人,但对于进攻的将领来说却并不可怕。在大多数场合俄军的部署都极其简单、按常规办事,因而很容易被识破;同时,俄军将领和指挥官缺乏机智,军队又不灵活,这使俄军在战场上所作的任何复杂的机动都带有极大的冒险性。

三、德意志各小邦的军队

巴伐利亚有 2 个军,每军有 2 个师。每师由 2 个步兵旅(共 4 个步兵团和 1 个猎兵营),1 个骑兵旅(2 个团)和 3 个步炮连及 1 个骑炮连组成。此外,每军有 1 个炮兵总预备队——6 个步炮连和 1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队。这样,全军总计:16 个步兵团,每团 3 个营,加上 6 个猎兵营,共为 54 个营;2 个胸甲骑兵团,6 个轻龙骑兵团,共为 48 个骑兵团;2 个步炮团(每团 6 个六磅炮连和 6 个十二磅炮连),1 个骑炮团(4 个六磅炮连),共 28 个炮兵连,每连 8 门火炮,合计 224 门,另有 6 个要塞炮连和 12 个辎重连未计算在内;此外,还有 1 个工程兵团(8 个连)和 2 个卫生连。按照战时编制,除了预备兵和目前尚无骨干的后备军外,全军共有 72000 人。

在德意志联邦²⁴¹的军队中,奥地利提供第一、二、三军,普鲁士提供第四、五、六军,巴伐利亚提供第七军,维尔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特共同提供第八军。

维尔腾堡有 8 个步兵团 (16 个营), 4 个骑兵团 (16 个骑兵团), 1 个炮兵团 (4 个步炮连和 3 个骑炮连, 计 48 门火炮)。战时编制总额约为 19000 人。

巴登有 4 个团 (8 个营), 2 个火枪营和 1 个猎兵营; 共计 10 个步兵营, 3 个骑兵团 (12 个连), 4 个步炮连和 5 个骑炮连, 共有 40 门火炮。战时编制总额为 15000 人。

黑森—达姆斯塔特有 4 个步兵团 (8 个营), 1 个轻骑兵团 (6 个连), 3 个炮兵连 (其中 1 个是骑炮连), 18 门火炮。共 1 万人。

第七、八两个军的唯一的独特之处, 是炮兵采用了法国式的炮车。德意志联邦的第九军有两个师, 一个师由萨克森提供, 另一个师由黑森和拿骚的选帝侯国提供。

萨克森师包括: 4 个步兵旅 (每旅 4 个营), 1 个猎兵旅 (4 个营); 此外, 还有准备编成预备队的 4 个基干营和 1 个猎兵营; 4 个轻骑兵团, 每团 5 个连, 1 个炮兵团, 有 6 个步炮连和 2 个骑炮连。以上共计: 20 个步兵营, 20 个骑兵连, 50 门火炮, 按战时编制 24500 人。黑森选帝侯国所提供的军队有: 4 个步兵团, 即 8 个营, 外加 1 个火枪营和 1 个猎兵营; 2 个胸甲骑兵连, 7 个骠骑兵连; 3 个炮兵连, 其中 1 个是骑炮连。共计: 10 个步兵营, 9 个骑兵连, 19 门火炮。战时编制总额为 12000 人。拿骚的军队有: 7 个步兵营, 2 个炮兵连, 战时编制总额为 7000 人, 12 门火炮。

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的军队组成第十军的一个师, 而梅克伦堡、霍尔施坦、奥登堡和汉撒各城市的军队则组成该军的另一个师。汉

诺威提供：8个步兵团，即16个营；4个轻步兵营；6个骑兵团，即24个连；4个步炮连和2个骑炮连。共计：22000人，36门火炮。炮兵是按照英国形式组织的。不伦瑞克提供：5个步兵营，4个骑兵连，12门火炮，共5300人。至于提供另一个师的那些小邦就不值一提了。

最后，德意志最小的几个邦共同组成一个预备师。德意志联邦按照战时编制的军队总额以及该预备师的人数可见下表：

	I. 编制员额				II. 预备兵员额			
	步兵	骑兵	火炮	合计	步兵	骑兵	火炮	合计
奥地利	73501	13546	192	94822	36750	6773	96	47411
普鲁士	61629	11355	160	79484	30834	5660	80	39742
巴伐利亚	27566	5086	72	35600	13793	2543	36	17800
第八军	23369	4308	60	30150	11685	2154	32	15075
第九军	19294	2887	50	24254	9702	1446	25	13136
第十军	22246	3572	58	28067	11107	17888	29	14019
预备军	11116	—	—	11116	5584	—	—	5584
共计	238721	40754	592	303493	119455	20364	298	153767

当然，这还不能说明德意志联邦实际武装力量的全部情况，因为普鲁士、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在必要时所能提供的军队数量比上述兵额多得多。第十军和预备师，或许再加上第九军，可以组成警备部队，以免由于编制杂乱和特点不同而影响野战行动的速度。这些军队的兵士在战斗素质方面大致相当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兵士的水平，但是很明显，在这些兵力不大的军队中没有发挥军事才干的有利条件，而且在其现有的规章制度中有很多陈旧过时的东西。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我们将研究西班牙、撒丁、土耳其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

第三部分

一、土耳其军队

在这次战争初期，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自马茂德登基以来，经过了对土耳其近卫军的屠杀²⁴²，特别是在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以后，对军队进行改组和改革的各种做法已经统一起来而形成了一套制度。第一个最大的障碍——边远各省帕沙的割据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总的说来，他们已逐渐做到像欧洲地区的长官那样服从纪律。然而帕沙的昏庸、蛮横和贪婪依然像在过去亚洲各省独裁者作威作福的时代一样，毫无改变；近二十年来关于帕沙叛乱的消息，我们听到的不多，但是各省起义反抗贪婪的统治者的消息，却听到不少。这些统治者——过去是最微不足道的家奴和“无所不为的小人”——利用了自己的新权势，采取敲诈、受贿、无耻盗窃国家资财的手段来发财致富。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土耳其军队由正规现役军（尼查姆）、预备军（列季弗）、非正规部队和附庸国家的辅助部队组成。

尼查姆由6个军（奥尔杜）组成，各军都在本军驻防地区征集，这一点与普鲁士各省驻军在本省征集新兵的情况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的尼查姆和列季弗的组织形式一般是模仿普鲁士的。6个军司令部的驻地：君士坦丁堡、苏姆拉、托利—莫纳斯特尔、

埃尔斯伦、巴格达和阿勒颇。各军均应由穆希尔(即元帅)统率,下属 2 个师,即 6 个旅,共计 6 个步兵团,4 个骑兵团,1 个炮兵团。

步兵和骑兵的组织制度仿效法国,炮兵则仿效普鲁士。

步兵团由 4 个营组成,每营 8 个连,满额时包括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在内应为 3250 人,即每营 800 人;但是,战前每营很少超过 700 人,而在亚洲地区,几乎一向是缺得更多。

骑兵团包括 4 个枪骑兵连,2 个猎骑兵连;每连应为 151 人,然而骑兵连通常较步兵连缺额更多。

每一炮兵团由 6 个骑炮连和 9 个步炮连组成,每连有 4 门火炮,因而 1 个团的火炮总数为 60 门。

由此可见,各军应有:步兵 19500 人,骑兵 3700 人,火炮 60 门。而实际上每一个军的总数从未超过 20000—21000 人。

除了 6 个军以外,尚有 4 个炮兵团(1 个预备团,3 个要塞炮团),2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以及派往干地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去的总数为 16000 人的 3 支独立的步兵部队。

这样,战前尼查姆,即常备军的总数大致如下:

36 个步兵团,每团平均 2500	90000 人
24 个骑兵团,每团平均 660—670 人	16000 人
7 个野炮团	9000 人
3 个要塞炮团	3400 人
2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	1600 人
独立部队	16000 人
合 计	136000 人

在尼查姆服役满 5 年的兵士可以归休,在以后 7 年内转入列季弗,即预备军。这支预备军和常备军一样编有同等数量的军、师、

旅、团等等；它与尼查姆的关系在实质上就是普鲁士第一类后备军与常备军的关系，其唯一不同之处是：在普鲁士旅以上的大部队中，常备军和后备军总是混合编在一起的，而在土耳其军队中则是分开建立的。列季弗的军官和士官永远在预备部队中服务。列季弗一年一次操练，在操练期间可以获得与常备军相等的薪饷和口粮。但是，这样的组织首先要求有良好的民政管理和相应的文化水平，而土耳其距离这种水平还很远，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所以我们说列季弗的数量和尼查姆相等，显然只是指其最大的可能数字而言的。

在各地征召的辅助部队名额如下：

1. 多瑙河各公国	6000 人
2. 塞尔维亚	20000 人
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0000 人
4. 上阿尔巴尼亚	10000 人
5. 埃及	40000 人
6. 突尼斯和的黎波里	10000 人
合 计	116000 人

在这支部队中还应当加上志愿兵——巴希布祖克；在小亚细亚、摩尔迪斯坦和叙利亚可以招到大量的这种志愿兵。这是过去几世纪遍布匈牙利并两次进逼维也纳²⁴³的大帮非正规部队（主要是骑兵部队）的最后一批残余；近两世纪以来他们屡战屡败，这证明他们连欧洲装备最差的骑兵都比不上。他们丧失了以往的自信心，现在所起的作用只是聚集在军队的周围，吃尽耗光正规部队所需要的给养品。巴希布祖克掠夺成性，极不可靠，因而甚至像俄国人交给哥萨克的那种驻军警戒勤务也担负不了；往往在最需要他们

的时刻，却无法找到他们。因此，在目前的战争中，人们认为减少这种部队的数量是适当的，据我们估计，召集起来的这种部队至多不过 5 万人。

这样一来，关于土耳其军队在这次战争开始时的兵力，我们就可以计算如下：

尼查姆	136000 人
列季弗	136000 人
埃及和突尼斯的正规辅助部队	50000 人
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辅助部队	40000 人
巴希布祖克	50000 人
合 计	412000 人

但是，在上述总数中应该扣除一部分人数。可以充分相信的是：在欧洲驻防的各军情况比较好，土耳其也能尽力使他们得到补充；但是在亚洲，在伊斯兰教居民占优势的边远各省中，人可能是现成的，然而武器、服装和弹药的情况就很不好。多瑙河军团主要由欧洲的三个军组成。这是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的是：欧洲的列季弗，叙利亚军或至少是该军的大部分，阿尔纳乌特人²⁴⁴和波斯尼亚人的部队以及巴希布祖克。可是，奥美尔—帕沙的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坚持不到最后关头决不动用自己的部队——有力地证明了他对土耳其自有正规军以来唯一最优秀的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是多么缺乏信心。但是在亚洲地区，——土耳其过去那种贪污盗窃、不尽职守的风气在那里依然盛行，——尼查姆的两个军、全部列季弗，加上全部非正规部队都未能抵住人数少得多的俄国军队；每次会战都是以土耳其人的失败而告终，到 1854 年战局结束时，土耳其的亚洲军队几乎已不再存在了。由此可见，军队不仅缺少严密的

组织,而且大部分军队本身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从卡尔斯和埃尔斯伦的外国军官以及报社记者那里经常可以听到有关武器、服装、弹药和粮食不足的怨言,他们一致肯定地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那些帕沙不尽职守、昏庸无能和贪得无厌。经费是按期拨付给他们的,但他们却每次都纳入了私囊。

土耳其正规军队的兵士服装大体上是仿效西欧军队的式样的;主要的差别是帽子,这是一种最不适合于当地气候的带穗的红色平顶圆锥形帽,在炎热的夏天戴它常会使人中暑。军服的质料很差,同时又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更换,因为军官通常把用来更换军服的公款占为己有。至于武器,不论在步兵或骑兵中,都是旧式的;只有炮兵才装备着在欧洲籍军官和国内工程师领导下在君士坦丁堡铸造出来的性能良好的野炮。

土耳其人本身是一些不错的兵士。他们素来勇敢,最能吃苦耐劳,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听从指挥。得到土耳其兵士信任的欧洲籍军官,是可以信赖这些兵士的;格拉赫和巴特勒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情况,以及伊斯甘德—贝伊(伊林斯基)在瓦拉几亚的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这是特殊情况。整个说来,土耳其人对“异教徒”的敌意生来就是如此强烈,他们的风俗和观念与欧洲人是如此不同,以致只要他们依然是国内的统治民族,就决不会服从内心所蔑视的人,而认为这些人比自己低下得多。自从军队采取了欧洲式的编制以后,这种蔑视感甚至扩大到对军队编制的看法。一个土耳其兵仇视异教徒的各项制度不下于仇视异教徒本人。不仅如此,现代军队所要求的严格的纪律、持久的积极性和经常集中的注意力,与懒惰的、主张消极宿命论的土耳其人是极不相容的。甚至军官宁可坐视军队被击溃,也不想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智慧。这是土耳其军

队最大的弱点之一，就这一点也足以使土耳其军队不适于进行任何一种进攻战了。

兵和士官是用志愿报名和抽签的办法补充的；下级军官也有从兵士中提升的，但通常是些非战斗兵和勤务兵，即侍候高级军官的仆从。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学校水平很低，训练不出足够的青年来补充缺额。至于谈到较高军阶的人事情况，那末在这里盛行着西方国家所不能理解的那种任用宠人的做法。大部分将军在年轻时都是切尔克斯奴隶，某些显贵的 *mignons* (宠人)。极端的愚昧无知、目光短浅和傲慢自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宫廷倾轧则是晋升的主要手段。甚至那些为数不多的、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务的欧洲籍将军(背教者)，如果不是由于绝对需要他们，以免整个军事机器垮台，那末也是不会去任用他们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是真正值得器重的人，或者不过是些冒险家，都一律不加选择地被录用了。

现在，经过了三次战局，除了分驻多瑙河和克里木两地的奥美尔—帕沙原有的 8 万军队以外，土耳其军队可以说已不存在了。亚洲部分的军队由各式各样的坏分子组成，约 25000 人，他们不适于野战，并且由于打了胜仗而士气颓丧。在原有的 40 万人中，其余的人消失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也许一部分人阵亡在战场，死于疾病，或因残废而退伍，而一部分人则沦为土匪。现有的几万人很可能将是土耳其最后的军队，因为很难设想，由于和英法结盟而受到打击的土耳其还能恢复元气。

在沃耳特尼察战斗²⁴⁵和切塔特战斗中，土耳其人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曾引起了人们过分的喜悦，现在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奥美尔—帕沙固执地按兵不动，这足以使人们对土耳其军队的其

他素质产生怀疑；甚至出色的锡利斯特里亚的保卫战也不可能完全打消这一疑团。土耳其人在亚洲的挫败，在巴拉克拉瓦附近的溃退，在叶夫帕托利亚的单纯守势，以及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按兵不动——这一切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认清土耳其军队的素质。关于土耳其军队的组织，直到目前为止还根本不可能就其优点作出任何总的评价。无疑地，某些团作战勇敢，有优秀的指挥官，能执行各种勤务，但这样的团为数很少。数量庞大的步兵缺乏团结精神，因此在阵地战中虽然也表现了良好的素质，但是却不宜于执行野战勤务。正规骑兵绝对比不上欧洲任何大国的骑兵。炮兵的水平较高，野炮团很出色；兵士似乎生来就能担任炮兵勤务，然而军官却远不能令人满意。在列季弗中，看来组织不好的现象表现得极为明显，虽然兵士无疑是准备尽力效命的。在非正规部队中，阿尔纳乌特人和波斯尼亚人只是优秀的游击队员，但却经常被用来防守工事。而巴希布祖克几乎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有害的。埃及部队的水平看来与土耳其的尼查姆的水平相仿，而突尼斯部队差不多什么也干不了。因此，这一支混杂的军队，军官的质量既差，指挥又不当，经过三次战局几乎全军复没，这是不足为奇的。

二、撒丁军队

撒丁军队包括 10 个步兵旅，10 个猎兵营，4 个骑兵旅，3 个炮兵团，1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以及撒丁岛的一队马枪兵（警察部队）和轻骑兵。

在 10 个步兵旅中有 1 个近卫旅，4 个掷弹兵营，2 个轻步兵营和 9 个基干旅。这 9 个旅共有 18 个团，每团有 3 个营。此外，尚有 10 个猎兵营（bersaglieri（意大利猎兵）），即每旅各 1 个营，因此现

在撒丁军队中受过训练的轻步兵数量比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里都大得多。

此外,每团有1个后备营。自1849年以后,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各营的人数大为缩减。战时1个营约有1000人,而平时每营最多不过400人;其余的人都是归休兵。

骑兵的编成中有4个重骑兵团和5个轻骑兵团。每团包括4个野战连和1个后备连。战时每团的4个野战连共约800人,而平时勉强可达600人。

炮兵3个团由1个工役和技工团,1个要塞炮团(13个连)和1个野炮团(6个步炮连,2个骑炮连,2个重炮连,每连有8门火炮)组成。轻炮连装备八磅加农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重炮连装备十六磅加农炮;共计80门火炮。

工兵—地道爆破兵1个团,有10个连,约1100人。马枪兵(骑马的和徒步的)的数量对于这样小的王国来说是很大的了,他们约有3200人。在撒丁岛上执行警察勤务的轻骑兵约1100人。

在1848年第一次对奥地利战局期间,撒丁军队的人数无疑地达到了7万,而在1849年几乎增加到13万,以后军队曾缩减到约45000人。目前撒丁究竟有多少兵力,很难确定,但毫无疑问,在与英法订约²⁴⁶后军队又重新有了扩充。

皮蒙特军队之所以具有在任何时间都能增减作战部队的这种巨大的伸缩性,是因为它有着与普鲁士极为近似的兵役制;实际上撒丁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为意大利的普鲁士。撒丁各邦的每个公民也有服兵役的义务,与普鲁士不同的一点是容许代役;公民服兵役的期限与普鲁士相同,分为现役期和预备役期两种,归休兵留在预备役内,一旦发生战争即可重新征召入伍。这种制度介乎普鲁士

制度与比利时和德意志各小邦的制度之间。因此，在征召预备兵员后，步兵人数便大致可从3万人扩充到8万人。骑兵和野战炮兵可以增长的人数不多，因为这两个兵种的兵士在整个服役期间通常都必须留在团内。

皮蒙特军队就其军容和战斗素质来说，都不亚于欧洲任何一国的军队。皮蒙特兵和法国兵一样身材不高，步兵更是如此；近卫军平均身高甚至不到5英尺4英寸。但是由于美观的服装、端正的军人姿态、匀称灵活的体格和意大利人的漂亮面貌，因而看起来他们比许多身材高大的兵士更神气。基干步兵和近卫军的服装式样和装具基本上和法国的相似，在某些细小之处则仿效奥地利。意大利猎兵的服装有其特殊的式样：戴着插有鸡翎的水兵帽，穿着褐色上衣。骑兵穿着遮不住臀部的褐色短上衣。步兵基本上装备的是短铳枪，猎兵则装备有提罗耳式短马枪，这是一种性能良好、完全适用的武器，但在各方面仍然不如米涅式步枪。第一横列中的骑兵主要使用长矛；这一常规在轻骑兵中是否保留，我们还不能说。骑炮连和轻步炮连由于装备了八磅炮，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一点和曾拥有同样火炮的法国军队的情况是相同的。但是，重炮连由于装备有十六磅加农炮，因而成为大陆上最重型的野战炮兵。这种加农炮只要架设好，便可极有效地进行射击，这一点已为黑河会战所证实，在这次会战中，十六磅炮的准确射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联军的胜利，从而博得了一致的赞扬。

在意大利各国中，皮蒙特所处的位置最有利于建立一支优良的军队。波河及其支流的平原地区出产骏马，而且有着魁梧漂亮的兵士，他们是意大利人中身材最高的，特别适于在骑兵和重炮兵中服务。在从南、西、北三面环绕平原的山地中居住着勇敢的

人民，他们虽然身材不很高，但同一切山民一样，强壮有力、精力充沛、勤劳机智。正是他们组成了步兵的核心，特别是意大利猎兵部队的核心，这支猎兵部队在训练方面几乎不亚于 chassseurs de Vincennes（文森猎兵），而在体力和吃苦耐劳方面无疑地超过了他们。

整个说来，皮蒙特军事学校的水平是高的，因而军官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在1846年以前在军官任免方面有重大影响的是贵族和教会。当时查理—阿尔伯特认为他统治国家所依靠的力量只有两种：教会和军队；的确，在意大利到处可以听到这种说法：在皮蒙特街道上遇见的三个人当中，一个一定是军人，另一个是僧侣，第三个才是平民。现在当然没有这种现象了；教会已经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虽然贵族仍保留有许多军官职务，但1848年和1849年的战争毕竟对军队起了作用，使军队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质，并且这种民主并不是轻易就能破坏的。某些英国报社驻克里木的记者肯定地说：几乎所有皮蒙特军官都“出身于贵族”，但是事实远非如此；我们就亲自认识一些出身于兵士的皮蒙特军官，因而可以有把握地说：现在大部分尉官都是在对奥地利的斗争中由于勇敢而理应获得自己军阶的人，或者至少也是与贵族无关的人。

我们认为，皮蒙特军队过去的敌人之一、1848—1849年任奥地利军队副参谋长的雪恩哈耳斯将军所发表的意见，便是对皮蒙特军队所作的最好的赞语。这位将军是奥地利军队的优秀军官之一，也是千方百计地阻碍意大利独立的人，但在他所著“意大利战争回忆录”一书中，却始终以极其尊敬的口吻谈到皮蒙特军队。

他写道：“皮蒙特炮兵是由精干的人组成的，担任指挥的是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军官；火炮性能良好，口径也比我们的大。”“对骑兵不应轻视，第一

横列的骑兵装备长矛,但因为这种武器只有最熟练的骑手才能掌握,所以我们不想把这项新措施看做是一种很大的改进。然而他们的骑术则具有高度的水平。”“在桑塔路其亚会战中,双方都表现了惊人的勇敢。皮蒙特人攻击时非常坚决和勇猛;皮蒙特人或奥地利人都建立了许多战功,表现了各自的勇敢精神。”“在谈到诺瓦拉会战时,皮蒙特军队是不会感到羞愧的”等等²⁴⁷。

曾参加 1848 年战局、而且决不同情意大利独立的普鲁士将军维利森也同样称赞过皮蒙特军队。

从 1848 年起,意大利某些方面的人士就把撒丁国王看做整个半岛未来的首领。我们虽不赞同这种看法,但仍然认为,意大利人要想争取到自由,皮蒙特军队将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军事力量,而且它将成为未来意大利军队的核心。在实现这一点以前,皮蒙特军队也许要经历一系列的内部的革命的变化,但其中的优秀分子必能经受住一切考验;这支军队甚至由于编入真正的民族军队而将显得更加出色。

三、意大利各小国的军队

罗马教皇的军队看来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步兵营和骑兵连从来没有足额过,只能组成 1 个兵力薄弱的师。此外还有 1 个瑞士籍近卫团,这是政府多少尚能信赖的唯一部队。托斯卡纳、帕尔马和摩地那的军队兵力太小,不值得一提;只要说明它们基本上是仿效奥地利形式组成的就够了,另外还有那不勒斯军队,但是关于它也不值得多谈。这支军队在敌人面前从未表现过勇敢;无论是在 1799 年为国王而战或在 1821 年为宪法而战,他们总是因善于逃跑而出名的²⁴⁸。甚至在 1848—1849 年,那不勒斯军队的地方部队到处被武装起义者所击败,要不是依靠瑞士籍部队,那末炮弹国王现在就不能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了。在罗马被围期间,加里波第率

领一小队兵士出击那不勒斯师，并且两次击溃了这个师²⁴⁹。那不勒斯军队按平时编制的人数为 26000—27000，但在 1848 年，据说为 49000 人，在全军足额时似已达到 64000 人。在所有上述部队中，只有瑞士籍部队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编为 4 个团，每团 2 个营。足额时每营应为 600 人，4 个团共计 4800 人。但在目前骨干过多，因而每营约有 1000 人（仅第四团——伯尔尼团就有 2150 人）；瑞士籍部队的总数约为 9000 人。这是由瑞士自己的军官指挥，并在内部组织和军队管理方面不受那不勒斯政府支配的真正第一流的军队。它最初受雇于 1824 年或 1825 年，当时那不勒斯国王不再信任不久前叛变的本国军队，而认为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禁卫军来保卫自己。因此与瑞士各州签订了条约，即所谓“定约”30 年；瑞士籍部队保持自己的纪律条例和军事组织，其薪饷为当地那不勒斯兵士的 3 倍；军队是由瑞士各州的募兵处招募的志愿兵组成的。退伍的军官、老兵和伤兵都可领到优抚金。如果 30 年期满后没有订立新约，则各团应予解散。现在的瑞士宪法禁止招募兵士到外国军队中服务，因而在 1848 年以后募兵条约便宣告无效；在瑞士的招募至少在表面上是中止了，但在克亚索以及伦巴第的各地都设立有集合站，许多招募代理人仍在瑞士境内秘密地继续干他们的勾当。那不勒斯政府如此迫切需要新兵，以致连当时逃亡瑞士的政治犯中的背叛者也不拒绝接收。在这种情况下，那不勒斯国王确认了条约规定的关于瑞士兵的特权，去年 8 月，在定约 30 年期满的时候，又颁布特别法令，只要瑞士人继续为国王效劳，这项特权始终有效。

四、瑞士军队

瑞士没有本国的常备军。每个瑞士人只要适合服兵役，都应在民兵部队中服务。民兵按年龄分为三种（Auszug, erstes 和 zweites Aufgebot（适龄的、第一类应征的和第二类应征的））。青年在服役的头几年必须应召受训，有时也把他们集中在兵营内。但是，无论谁，只要有机会看到瑞士兵的笨拙的步伐和丑陋的仪容，或是听到新兵与训练他们的军士相互间的戏谑，就一定会承认他们的军事素质是很差的。关于这种民兵的战斗力的评述，我们只能以 1847 年反宗得崩德的战争²⁵⁰为例来加以评述。这次战争的特点是：伤亡的人数与参战的兵力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虽然民兵的总的体制是联邦法所确定的，民兵受联邦司令部领导，但民兵的组织几乎完全掌握在各州政府的手中，这种做法不可能不造成制度的紊乱和不统一。同时，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妨碍必要的预备兵员的积累，妨碍改革的实施，以及妨碍在重要地点、特别是瑞士最易受到攻击的地区——与德意志交界处系统地构筑工事。

瑞士人和一切山民相同，如果受到严格的训练，就是很好的兵士；他们无论在哪一国的正规军中服务，作战都很出色。然而他们缺乏机智；为了加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团结精神，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比对法国人或北德意志人更长时间的训练。也许，在外国侵犯瑞士时，高涨的爱国热情会弥补这些缺点，但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一支 8 万人的正规军，甚至人数更少一些，也一定能打败瑞士人所自认为能提供的 16 万人以上的民兵。1798 年法国人只用了几个团的兵力就战胜了瑞士人²⁵¹。

瑞士人以他们有优秀射手而极为自豪。无疑地，除了奥地利的

阿尔卑斯山领地以外，瑞士的优秀射手比欧洲任何国家的都要多。但是一看到军队中几乎所有这些神枪手都装备着普通的不便使用的短銃枪时，对瑞士优秀射手的敬意便会大大地降低。为数不多的猎兵营可能是由优秀的射手组成的，然而他们的短而重的猎枪（Stutzen）陈旧过时，根本不能和米涅式步枪相比，而且这种枪采用角形火药筒装填火药的方法，既笨且慢，不能保证他们战胜装备有较完善的武器的军队。

瑞士军队的武器、装具、编制、训练制度都已过时，看来只要各州政府继续干预军事，则今后情况仍将如此。

五、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军队

瑞典和挪威的军队，虽然联合在一个国王的旗帜下，但同他们的国家一样具有独立性。这两个山国和瑞士不同，它们都有常备军。但就其严寒的自然条件以及居民稀少的情况来看，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与瑞士极其近似，甚至在两国的军事组织方面也具有同样的制度——民兵制。

瑞典有三种部队——以召募的方法编成的部队（värfvade trupper）、地方部队（indeltra trupper）和预备部队。Värfvade 包括：3 个步兵团，计 6 个营；2 个骑兵团；3 个炮兵团，计 13 个步炮连和 4 个骑炮连，共有 96 门六磅炮，24 门十二磅炮，16 门二十四磅炮。总计 7700 人和 136 门火炮。瑞典军队的全部炮兵都编在这种部队中。

Indelta 有 20 个团，每团 2 个营，另有 5 个独立步兵营和 6 个骑兵团，各团的骑兵连为 1—8 个不等。这种部队的人数为 33000 人。

预备部队的人数占全军总数的大部分，征召时可有 95000 人。

此外，在哥特兰岛有一支经常保持战斗准备的特种民兵部队，它分为 21 个连，计 7850 人和 16 门火炮。这样，瑞典军队的总数约为 14 万人和 150 门野炮。

第一种部队内，志愿兵的服役期通常为 14 年，但法律也准许招募时以 3 年为期。Indelta (地方部队)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兵，兵士在受训以后，可以同自己家庭一同住在分配给他们的农场里，每年只操练一次，为期一个月。农场收入就是他们的薪饷，但在集训期间可以领到特别奖励金。军官同样可以在国内适当的地区获得一块王家土地作为暂时的领地。凡年龄在 20—25 岁适于服兵役的瑞典人都编入预备部队；他们受短期的军事训练，以后每年操练两个星期。由此可见，除了为数不多的 *värfvade* (招募的部队) 和哥特兰部队以外，瑞典军队的 *indelta* 和预备部队在实质上全都是民兵。

瑞典军队在军事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与其有限的人口是完全不相称的，在这有限的人口中却组成了著名的瑞典军队。古斯达夫·阿道夫在三十年战争 252 期间进行了许多改革，从而开辟了战术的新纪元。查理十二的巨大的军事天才被他的冒险的癖好所毁灭，但他仍然使瑞典人创造了真正的奇迹，例如用骑兵攻击来夺取堡垒。在对俄国的最近几次战争中，瑞典人表现了自己的最优秀的一面；在 1813 年，贝尔纳多特曾尽可能不使瑞典军队去冒险，因而他们几乎没有受到炮火的威胁，除非他们犯了错误；只有莱比锡会战是一个例外，在这次会战中瑞典军队仅占联军极小的一部分。*Värfvade*，甚至 *indelta* 无疑地一定能永远保持瑞典军队的光荣；但是预备部队，如果在军事行动前不集中进行长时间的训练，就只能作为新兵来使用。

挪威有 5 个步兵旅, 包括 22 个营, 计 12000 人; 1 个骑兵旅, 包括 3 个猎兵大队, 计 1070 人; 1 个炮兵团, 约 1300 人。此外尚有民兵形式的预备部队 9000 人。挪威军队总共约 24000 人。这支军队在体制上同瑞典军队很少有区别。其唯一特点是: 少数猎兵连配备有滑雪板, 兵士穿上滑雪板, 用两根长棍支撑, 就和拉普兰人一样能在雪上迅速滑行。

丹麦军队包括: 4 个步兵旅, 包括 23 个营 (1 个近卫营, 12 个基干营, 5 个轻步兵营和 5 个猎兵营), 每营按平时编制约 700 人; 3 个骑兵旅 (3 个近卫骑兵连, 6 个龙骑兵团, 每团 4 个骑兵连; 平时每个连 140 人); 1 个炮兵旅 (2 个团, 计 12 个炮兵连, 共有 80 门六磅炮, 16 门十二磅炮); 3 个工兵连。总计: 步兵 16630 人, 骑兵 2900 人, 炮兵和工兵部队 2900 人, 火炮 96 门。

按战时编制每个步兵连为 200 人, 步兵营为 800 人, 骑兵连为 180 人, 因而全部常备部队的人数可达 25500 人。此外, 从预备部队中还可征集 32 个步兵营, 24 个骑兵连和 6 个炮兵连, 共计 31500 人。这样, 全军总数约达 56000—57000 人。但在必要时人数尚可增加。例如在最近一次战争中, 不算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在内, 仅丹麦一处就提供了 5—6 万人, 而丹麦现在又重新获得在上述两个公国内征兵的权利。

丹麦军队是在 22 岁以上的青年中采用抽签的方法来补充兵员的。服役期为 8 年, 但实际上炮兵留在团内只 6 年, 常备部队的兵士只有 4 年, 而其余的时间他们则被编入预备部队。丹麦人在 30—38 岁时属于第一类应征民兵, 到 45 岁为止属于第二类应征民兵。所有这一切都组织得很好。但是一旦同德意志发生战争, 将近半数的丹麦军队, 即在两个公国中征召的军队就会逃散, 并将调

转枪口来攻打现在的战友。大量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混杂在丹麦军队中，这正是它的弱点，因此在同较强大的邻国发生任何冲突时，丹麦军队实际上将几乎完全没有战斗力。

丹麦军队从 1848—1849 年改组以后，武器和装具都很好，各方面具有十分牢固的基础。丹麦本土人是优秀的兵士，几乎在三年战争的所有战斗中都表现得很出色，然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看来无疑地较丹麦人更出色。丹麦军官一般说来是好的，但军官中间出身于贵族的太多，他们所受的理论教育极差。军官的报告通常都写得极为草率，就像英国军官写的报告一样；丹麦军队同不列颠军队还有一点近似之处，就是运动性差。但是它还没有表现过因克尔芒会战的胜利者所表现的那种不可摧毁的坚毅精神。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无可争辩地应属于欧洲优秀的兵士之列。他们是卓越的炮兵，就像他们的同族人——英国人一样，在战斗中能保持冷静。虽然他们是平原上的居民，但却适合在轻步兵中服务；他们在 1850 年建立的第一个猎兵营可以与任何一个同兵种的部队媲美。

六、荷兰军队

荷兰军队共有 36 个步兵营，编成 9 个团，计 44000 人；4 个龙骑兵团，包括 20 个连，另有 2 个猎骑兵连和 2 个骑宪兵连，共为 24 个骑兵连，计 4400 人；2 个野炮团（5 个六磅步炮连和 6 个十二磅步炮连，2 个六磅骑炮连和 2 个十二磅骑炮连，共计 120 门火炮）和 1 个工兵营；全军总数为 58000 人，殖民地的各团不计算在内。但在平时这支军队并不是经常存在的。只是由军官、士官和人数不多的志愿兵组成的核心保持着战斗准备。大部分兵士虽应服

役 5 年,但实际上受训 2—3 个月后即解散回家,以后每年野营集训数星期。此外,还有一种分为三类应征的预备部队,其中包括所有从 20—35 岁适合服兵役的公民。第一类应征者可组成步兵和炮兵约 53 个营;第二类——29 个营。但这些部队根本没有组织起来,因而很难把他们计算进去,甚至也不能把他们算作民兵。

七、比利时军队

比利时军队由 16 个步兵团组成,计 49 个营,每团附属的 1 个后备营除外;步兵总数为 46000 人。骑兵由 2 个猎骑兵团和 2 个枪骑兵团、1 个吉德团、2 个胸甲骑兵团组成,除 7 个后备连外,共计 38 个骑兵连;骑兵总数为 5800 人。炮兵由 4 个团组成(4 个骑炮连,15 个步炮连,4 个炮兵后备连,24 个要塞炮连),计有 152 门六磅的和十二磅的加农炮;此外还有 1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计 1700 人。全军除预备部队外总共 62000 人;加上预备部队,就同最近一次征召所表明的那样,全军人数可增加到 10 万人。军队是以抽签方式补充兵员的;服役期 8 年,但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兵士可以归休。因此按平时的编制,比利时的实际兵力未必能达到 3 万人。

八、葡萄牙军队

葡萄牙军队在 1850 年由下列部队组成:

	平时编制	战时编制
步 兵	18738	40401
骑 兵	3508	4676
炮 兵	2707	4098
工程部队和司令部	728	495
	<hr/>	<hr/>
	25681	49670

炮兵由 1 个野炮团 (1 个骑炮连和 7 个步炮连)、3 个阵地炮兵和要塞炮兵团以及驻防岛屿的 3 个独立营组成。火炮有六磅炮和十二磅炮两种。

九、西班牙军队

在所有的欧洲军队中,由于特殊情况,西班牙军队是美国最感兴趣的一支军队。因此,在结束对欧洲军队的简评的时候,我们对西班牙军队给予较多的注意,虽然同大西洋彼岸西班牙的邻国的军队相比,这支军队就其作用来说,似乎是不值得这样重视的。

西班牙的兵力由国内的军队和殖民地的军队组成。

国内的军队计有 1 个掷弹兵团,45 个基干团(每团 3 个营),驻休达的 2 个团(每团 2 个营),18 个 cazadores(猎兵)营。所有这 160 个营在 1852 年组成一支 72670 人的作战军队,为此,国家每年要开支 82692651 雷阿耳,合 10336581 美元。骑兵在 1851 年由 16 个马枪兵、龙骑兵和枪骑兵团组成,每团 4 个骑兵连,另有 11 个 cazadores 连即轻骑兵连,共计 12000 人,为此国家每年要开支 17549562 雷阿耳,合 2193695 美元。

炮兵计有 5 个步炮团(每团 3 个大队,王国境内每一地区驻 1 个团),5 个重炮大队,3 个骑炮大队和 3 个山炮大队,共计 26 个大队,或者按现在的名称为 26 个营。每个骑炮营有 2 个连,每个山炮营和步炮营有 4 个连。92 个步炮连和 6 个骑炮连共有 588 门野炮。

工兵—地道爆破兵为 1 个团,计 1240 人。

预备部队包括每个步兵团的 1 个营(第四营)和每个骑兵团的 1 个后备连。

兵力总数,据记载 1851 年为 103000 人;1843 年,埃斯帕特罗下台后,总数仅为 5 万人,但有一个时期纳尔瓦艾斯又把军队增加到 10 万人,平均来看,服现役的最多为 9 万人。

殖民地的军队如下:

1. 古巴军队:老兵 16 个步兵团,志愿兵 4 个连,2 个骑兵团,2 个步炮营(每营 4 个连),1 个山炮营(4 个连),1 个骑炮营(2 个连)和 1 个工兵—地道爆破兵营;除了这些基干部队外,还有 *milicia disciplinada* (国民军惩戒部队)^① 4 个步兵营和 4 个骑兵连,*milicia urbana* (国民军城市部队) 8 个骑兵连;共计 37 个步兵营,20 个骑兵连和 84 门火炮。近几年来,古巴的常备军得到了由西班牙调来的大量部队的补充。如果我们把原有的数量算作 16000—18000 人,那末现在古巴军队大概有 25000—28000 人。不过这只是—个概略的统计。

2. 波多黎各军队:老兵 3 个步兵营,国民军惩戒部队 7 个营,地方志愿军 2 个步兵营和 1 个骑兵连,4 个步炮连。由于大部分西班牙殖民地都被人忽视,因此无法较为准确地确定这支军队的数量。

3. 菲律宾群岛的军队:5 个步兵团(每团 8 个连),1 个吕宋猎兵团,9 个步炮连,1 个骑炮连和 1 个山炮连。另外 9 个土著步兵队(每队 5 个营)以及原先从土著居民中征召的其他部队,已于 1851 年解散。

军队是用抽签的方法来补充兵员的,允许代役。每年征召一批,总数为 25000 人,但在 1848 年征召了第三批,共 75000 人。

^① 国民军惩戒部队是由受惩戒的人组成的部队。——编者注

西班牙军队之所以采用现行的编制，主要应归功于纳尔瓦艾斯，虽然 1768 年查理三世制定的条例仍然是军队体制的基础。纳尔瓦艾斯废除了各团旧有的地方团旗（各团曾有自己的团旗），而换上了统一的西班牙旗。他还取消了地方部队的组织，集中了军队的领导和恢复了军队的统一。他根据经验深知，对这样一支几乎从未领过薪饷和缺少吃穿的军队来说，钱是基本的动力，因此他曾试图调整兵士的薪饷和军队的财务管理。纳尔瓦艾斯是否全部实现了他的创举，无人得知，但他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改良措施，在萨尔托里乌斯及其继任者统治时期便迅速化为乌有了。过去一贯“无饷、无食、无衣”的状况完全恢复了；一方面，将官和校官穿着金光闪闪的制服，甚至穿着按个人的喜好制作的、不合乎任何规定的服装，另一方面兵士却衣衫褴褛，没有鞋穿。一个英国军官在叙述 10—12 年前西班牙军队的情况时这样写道²⁵³：

“西班牙兵完全没有军人的姿态，哨兵站岗时溜来溜去，帽子搭在后脑勺上，枪在肩上晃荡，并且无所顾忌地大声唱着快乐的 *seguidilla*（西班牙舞曲）。他们常常根本没有什么军服，或者虽有上衣和裤子，但却如此褴褛，以致即使在暑天也不得不在军服外面套一件灰大衣；三人中总有一人的鞋子破烂不堪，露出脚趾——这就是西班牙 *vida militar*（兵士生活）的壮观！”

塞拉诺于 1843 年 9 月 9 日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规定：

“今后，全体军官和军队的高级长官在出入公共场所时，凡不穿便服者，应一律穿本团的制服，并需佩戴规定的军刀；全体军官只许佩戴确系规定的勋章奖章，禁止随意佩戴许多军官认为可以炫耀自己的奇异的装饰品。”

这是关于军官的情况，现在引证一段关于兵士情况的叙述：

“科尔多巴旅长亲自带头在加迪斯发起了一次募捐，为的是筹款给阿士土里亚团的每个勇敢的兵士买一条呢裤。”

这种财政上的混乱情形,可以说明从 1808 年起西班牙军队几乎一直处在连绵不断的骚动状态的这一事实。但是,这一方面的真正原因还要更深远些。在同拿破仑的长期战争中形形色色的部队及其司令官取得了政治势力,这次战争使西班牙军队第一次带有罗马近卫军的色彩。远从革命时期起,许多奋发有为的人士就一直留在军队里;游击队并入正规军就更增强了这个成分。因此,如果说高级军官保持了他们那种罗马近卫军式的野心,那末兵士和下级军官直到现在还受到革命传统的鼓舞。所有这一切就为 1819—1823 年的起义逐渐作好了准备,以后,在 1833—1843 年²⁵⁴,内战又把军队及其首领推上了首要地位。被一切党派当做工具使用的军队,暂时把政权抓在自己手里,这是不足为奇的。

德·普腊德神甫曾说:“西班牙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不是一个擅长军事的民族。”²⁵⁵在欧洲各民族中,西班牙人无疑对军事纪律抱有最大的反感。但是这个曾以步兵闻名世界达一百余年的民族,要重新建立一支可以引以自豪的军队,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改变军事制度,而且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民政方面的整个制度。

卡·马克思
辛普森将军的辞职。
——议会新闻

伦敦 8 月 3 日。两天前“晨邮报”用明显地表露出它受窘的语句向英国公众报道了下面这个消息：辛普森将军借口健康不佳即将卸去他的英军总司令的职务，并将不任命他的继任者。换句话说：英国军队将服从法国的总指挥。这样一来，内阁有意地推卸了进行战争的任何责任，而把责任转嫁给“我们光荣而伟大的盟国”。议会从而也失去了最后的表面的监督。同时找到了把英法同盟变成这两个国家间的残酷无情的敌对的可靠手段。我们知道这一切也是那个行家一手干出来的，早在 1839 年，entente cordiale²⁵⁶就是在他的粗暴压力下撕毁的。

议会用以下几件丑事体面地结束了自己的会议。**第一件丑事：**按照大资本家们的要求拒绝了关于私人（非股份的）贸易公司有限责任的法案，这些大资本家们的眉头一皱，就会使最妄自尊大的人——帕麦斯顿发抖。**第二件丑事：**无限期地延期讨论关于调整爱尔兰租佃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已经在议会两院漫游了四年之久；延期——这是胆怯的妥协，它可以让下院放弃它自己的创作，让内阁——违背自己的诺言，而让“爱尔兰人区”——把问题留作悬案，以便在 hustings（选举大会）期间再利用它。**最后一件丑事：**里德少

校的提案责成内阁在议会假期内缔结和约时应召开议会。大家知道,里德是帕麦斯顿所豢养的老奸巨猾的人。他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用狡猾的办法来取得议院对政府的信任。但是议院嘲笑了里德的提案,嘲笑了帕麦斯顿,也嘲笑了它本身。它竟然弄到这般地步,就像一个被唾弃的人除了用“嘲笑”来否定自己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3 日

载于 1855 年 8 月 6 日

“新奥得报”第 361 号

原文是德文俄文译自

“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评议会的辩论

伦敦 8 月 8 日。昨天下院会议上关于印度的辩论，是维农·斯密斯（现在他集大莫卧儿和摩拿于一身）提出的关于不列颠帝国在亚洲的财务报告以及布蒙特提出的将这一重要问题在将来“适于辩论”的时候提交下院讨论的提案引起的。我们暂时不阐述这些辩论，因为在议会休会期间我们打算对东印度的情况作一番详尽的评论。

约翰·罗素勋爵不能不设法利用行将来临的议会休会来为自己的微妙处境积累政治资本。他的处境的微妙在于他已经不在政府内，但又还不是反对派。托利党反对派的首领位置已经被人占了，因而罗素在这里无所作为。在自由主义反对派内，格莱斯顿正在拚命攫取领导权。格莱斯顿在他最近一次自认为是典范的有关土耳其贷款的演说中，巧妙地为同俄国的媾和进行辩护，证明这场战争是靠牺牲土耳其和一些正在斗争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人进行的。罗素已经预感到议会休会期间的可怕的失败和议会复会时的关于媾和的叫喊了。他预感到必须以自由主义的各种幌子作掩护来要求媾和，何况托利党已经处于 *par excellence*（主要是）主战派的地位。意大利正好是同俄国缔结和约的一个幌子！罗素羡慕格莱斯顿，这样一个主意竟首先由格莱斯顿想出来了，既

然罗素已经不能赶到格莱顿前面去，首先占领如此有利的阵地，他便决定吞没格莱顿的主意，把格莱斯顿演说的高尚风格换成庸俗的格调。罗素既不同于帕麦斯顿，因为已经不在政府内，又不同于格莱斯顿，因为还不是反对派——这种情况使他能够把剽窃作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昨晚罗素起来发言，一开始他就保证说，他“不打算缩小也不打算夸大政府的责任”。但是他说这个责任是巨大的。今年就已为战争花去4500万英镑，为这笔巨额款项而应遭到谴责的时刻正在到来。舰队在波罗的海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看样子也不会取得任何成就。在黑海，前景也不见得好些。奥地利政策的改变使俄国能够将它在波兰和其他地方的部队调往克里木。在亚洲沿岸，土军正面临着大的灾难。派遣一支为数2—3万人的外籍军团作为增援部队到那里去的希望已经破灭。他说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从维也纳发出的紧急报告没有提交给议会。关于能否接受以奥地利最近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和约，土耳其大使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如果违背土耳其的意志继续进行战争，那末将来的问题就不是贷款的保证问题，而是津贴问题。皮蒙特已归并于西方列强，但为此他有充分的根据要求改变意大利的状况。罗马被法国人占领，教皇国被奥地利人占领；这种占领既支持了这些国家的专制统治，也支持了双西西里王国的专制统治，并且阻碍意大利人民仿效西班牙的榜样。俄国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成了目前战争的借口。怎样把法国、奥地利占领意大利同这一点联系起来呢？罗马教皇的独立地位以及与此相连的欧洲均势正在遭受威胁。可不可以同奥地利和法国达成协议，改变教皇国的管理形式，以便能从那里撤出部队呢？最后，是一个什么内容也没有的忠告：他说大臣们只应同意缔结光荣的和约，但同时他们不应错过和平

谈判的机会。

帕麦斯顿回答说：他不是那种先对宣战承担重大责任然后又害怕对进行这场战争负责的人。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帕麦斯顿的确知道“负责”的结果是什么。）帕麦斯顿宣称：媾和的条件取决于战争的结果，而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各种情况，也就是取决于机会。（因而机会对战争的结果负责，而战争的结果又对媾和条件负责。）据他（帕麦斯顿）所知，土耳其完全同意法国和英国的看法。即使不是这样，那末也应当记住，土耳其仅仅是反对俄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说“文明的”西方列强应当比衰老的东方列强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有利的。（当战争被称作保卫土耳其的单纯“防御战争”的时候，这是对向俄国宣战的多妙的评论，是对“文明的”西方列强想强使土耳其接受的臭名昭彰的维也纳照会等等的多妙的评论。）至于意大利，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那不勒斯的情况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那不勒斯是俄国的盟国，一个专制国家的盟国。至于谈到被奥地利和法国（非专制国家？）占领的意大利的情况，那末，“虽然那里实行的统治形式跟人民的感情并不相投”，但是为了维持“秩序”，占领仍然是必要的。何况，据说法国已经缩减了驻罗马的军队，奥地利也完全撤出了在托斯卡纳的军队。帕麦斯顿用庆贺同法国的联盟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据他说，这个联盟现在是这样地紧密，以致管理拉芒什海峡两岸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内阁”。帕麦斯顿刚才谴责了那不勒斯同一个专制国家的联盟！可是现在他又祝贺英国有这样的联盟！帕麦斯顿演说的全部精华在于：他顺利地用好战的冗长讲演结束了他很轻易地使之不采取任何好战行动的这次会议。

当然，罗素现在毫不害羞地利用意大利作为缔结和约的骗人

的幌子，正像他从维也纳回来后利用波兰和匈牙利作为继续战争的骗人的幌子一样。罗素毫不害羞地忘记了 1847—1852 年他当首相时，曾让帕麦斯顿先是用虚假的诺言激动意大利，然后使意大利仍旧置于波拿巴和斐迪南国王、罗马教皇和皇帝的控制之下。这并没有使罗素感到不安。他所感到不安的是：怎样从格莱斯顿的手里夺取“意大利的幌子”并将其攫为己有。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8 日

载于 1855 年 8 月 11 日
“新奥得报”第 37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反对俄国的兵力

伦敦 8 月 11 日。目前由盟国调集起来反对俄国的兵力，除了它们本国的军队外还有：

(1) 由 15000 人组成的一个不大的皮蒙特辅助军——借助于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共同进行威胁而从皮蒙特抽出的一个军。这种拿皮蒙特来放血的做法，是奥地利提出的作为参加“12 月 2 日条约” 257 的条件之一。

(2) 只由几千人组成的**外籍军团**——由西方各国雇佣兵组成的 olla podrida (杂牌军队)，这些雇佣兵是被人违背警察条例而一个个秘密地从他们本国诱骗出来的。

(3) 正在组织中的由 4000—5000 人组成的**意大利军团**。

(4) 仅仅在计划中的**波兰军团**。

(5) 最后，今后还打算建立一个**西班牙辅助军**，但是这个军必定会引起“财政上的萎黄病”。

这张形形色色的志愿部队和一些规模不大的军队的清单，反映出目前英国和法国所领导的那个欧洲的地图。能否提供一幅描绘拿破仑第一派去反对俄国的各国军队的更完美的讽刺画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1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8 月 14 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 375 号

卡·马克思 波兰集会

伦敦 8 月 13 日。政府的报纸对上星期三在圣马丁大厅举行的纪念波兰的盛大集会²⁵⁸不止一次地加以愤激的抨击，因此我们也来简短地谈谈这个问题。这个集会无疑是由内阁自己发起的。它推出“波兰之友文学协会”²⁵⁹这个一方面由查尔托雷斯基的拥护者，另一方面由对波兰有好感的英国贵族参加的协会作为幌子。这个协会从成立时起就是帕麦斯顿手中的盲目工具，他通过不久前死去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指导和控制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每年给帕麦斯顿送去的波兰信件和派去的代表团是他维持他的“反俄”声誉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查尔托雷斯基的拥护者们也从这种关系中捞取大量的好处：这种关系使他们能够扮演唯一值得尊敬的所谓“正式的”波兰流亡者代表的角色，排挤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最后是利用这个协会的大量拨款帮助流亡者，作为招募会员参加自己党派的手段。在文学协会和“集中”²⁶⁰即波兰民主协会之间正不断进行着顽强的斗争。1839 年集中曾在伦敦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会上揭露了“文学”协会的阴谋，揭发了查尔托雷斯基分子过去的历史（这是用英文出版的波兰史²⁶¹的作者——奥斯特罗夫斯基干的），并响亮地声明同波兰的外交贵族的“复兴者们”势不两立。从这时起，“文学”协会所僭窃的地位便

动摇了。顺便必须指出，1846年、1848—1849年的事变²⁶²形成了波兰流亡者的第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派，但是它同民主协会一起反对查尔托雷斯基的拥护者。

由政府发起举行的这次集会的目的有三：第一，建立一个波兰军团，把它派到克里木，以便摆脱一部分“波兰流亡者”；第二，恢复帕麦斯顿的声誉；最后，把可能发生的任何波兰运动转交给帕麦斯顿和波拿巴去控制。政府的报纸断言，俄国代理人十分秘密地策划的阴谋使集会未能达到目的。没有比这种断言更可笑的了。来到圣马丁大厅的人大多数是伦敦的宪章主义者。反对政府的修正案^①是由一个乌尔卡尔特分子提出，并得到另外两个乌尔卡尔特分子即科勒特和哈特支持的。大厅内散发的传单的内容如下：

“这次集会是由英国贵族们召集的，他们只是想极力维护古老的不列颠政府制度”等等，“波兰谴责同目前欧洲统治者们缔结的一切联盟，它不愿成为被任何一个现政府所复兴起来的国家，也不愿降到充当外交阴谋的工具的角色”等。

这些传单是由“波兰民主委员会”主席和秘书签署的。如果注意到伦敦的宪章主义者，乌尔卡尔特分子和原来意义上的“民主的”波兰流亡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远远谈不上友好，那末关于“阴谋”的任何怀疑便会立即消失。集会时的激烈场面完全是由于

① 集会通过的科勒特的修正案全文如下：“这次集会真诚希望波兰国家的复兴，但同时不能忘记这个国家的破坏首先是帕麦斯顿在1830—1846年间的诡谲行为的结果，因此，当帕麦斯顿仍然在王国任职的时候，任何关于复兴波兰的提案都只能是一种圈套和欺骗。如下的事实也说明这一论断的真实性：帕麦斯顿抱着尽可能小地伤害俄国的那种目的领导着战争，而他所提出的媾和条件最终会把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化为乌有。”——编者注

担任主席的哈林顿勋爵的行为而引起的。他用完全非议会的方式拒绝宣读和表决科勒特的修正案。由于“波兰之友文学协会”的秘书舒尔舍夫斯基上校竟然想起要叫警察来逮捕科勒特，因而愤慨的情绪就更加激昂了。当哈林顿勋爵、罗伯特·皮尔爵士和他们的朋友们跑下讲台离开会场时，吵嚷之声当然就达到了顶点。在乔治·汤普逊被选为主席代替哈林顿之后，秩序才马上恢复下来。

在这次波兰集会上出足风头的英国执政阶级的代表们，决不能唤起人们对贵族阶级的特别尊敬。哈林顿伯爵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然而无疑他是一个很坏的演说家。不能设想更令人难受的场面了。这位阁下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挤出两句有连贯的话，而在这以前他的讲话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完整的，而由速记员来替他完成。这位阁下是一个军人，勇敢是无疑的，但是从他领导波兰集会来看，那末很明显，他干什么都行，只是不能担当领导者的角色。星期日法案的产科医生埃布林顿勋爵说起话来也不比哈林顿伯爵强多少。他的面孔表情顽固，脑袋的样子像个撞槌。他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优点：不能用讲道理来说服他。拿破仑曾经说过：英国人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在这方面，埃布林顿是英国人的模范。

紧接勋爵们之后发言的是一些从男爵。埃布林顿勋爵宣读了政府关于复兴波兰的提案。然后，罗伯特·皮尔爵士发言支持这个提案。在许多方面都难以想像出比“代表塔姆沃思的议员”（皮尔）和“代表梅里勒榜的议员”（埃布林顿）之间的差别更大的差别来。前者是一个天生的放肆的吹牛家，后者则是一个矫揉造作的清教徒式的胆小鬼。前者使人发笑，后者令人厌恶。罗伯特·皮尔爵士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爬上了贵族地位的葡萄酒推销员，埃

布林顿勋爵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宗教裁判者。如果把汤尼·朗普金和美男子布腊默耳合而为一，那末我们就会想像得出皮尔的面貌、服装和风度的那种奇形怪状。他是小丑和花花公子的惊人的混合物。帕麦斯顿对来自塔姆沃思的怪物抱着偏爱，认为它是有用的。当他想知道人民情绪之风在往那个方向吹时，他便把罗伯特·皮尔爵士作为风向仪摆出来。当他希望证实英国舆论是否准许把维克多·雨果等人驱逐出境时，他就吩咐罗伯特·皮尔尖锐地攻击流亡者和赞扬波拿巴²⁶³。现在在波兰问题上也正是如此。帕麦斯顿利用他作“触须”。皮尔非常适于充当这种并不十分体面的角色。他被英国人称为《a chartered libertine》（“天下公认的浪子”）、道道地地的轻佻的人、享有特权的怪物，既没有一个内阁，也没有一个政党对他的谎言、狂妄、举止和言行负责。罗伯特爵士穿得漂漂亮亮，据说是打扮得像一个演员一样来到了波兰集会会场。他好像一个女时装裁缝一样穿着女人束腰的紧身，扣环中插着一朵鲜红的玫瑰花，洒了香水，右手转动着一把大伞，在讲话时用它打着拍子。在勋爵们和从男爵们讲话之后，由于一个可笑的偶然机会，行政改革协会前副会长**泰特**先生立即起来发言了。大家知道，从泰特由于这个协会的影响而被宣布为巴特的梭伦时起，他就投票**反对**斯卡利的关于局部实行行政改革的提案和投票**赞成**帕麦斯顿的给土耳其贷款而开始了他的议会生涯；同时他又异常谨慎地在表决罗巴克的提案时**弃权**。勋爵和从男爵们好像嘲笑地指着他说：“瞧，这就是应当接替我们的人！”没有必要更详细地说明泰特先生的特点了。因为莎士比亚已经作到了这一点，他创造了不朽的夏禄的形象；福斯泰夫把夏禄比作是一个人们在饭后吃甜食时

用干酪皮刻成的人型^①。

同所有这些先生们相反，一个年轻的、毫不知名的贫民哈特，一开始讲话时就给人一种印象：他是一个有吸引群众和领导群众天赋的人。政府对波兰集会的不满现在可以理解了。集会不仅变成了帕麦斯顿的失败，而且变成了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更大的失败。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8 月 16 日
“新奥得报”第 379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①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后篇第三幕第二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对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 立场的批判

伦敦 8 月 15 日。最近，布腊提昂诺写信给“每日新闻”，描述了多瑙河各公国居民在奥地利占领军的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暗示法国和英国的领事有两面派的行为，随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奥地利在多瑙河各公国保持一支为数 8 万人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来阻止土耳其军队进入贝萨拉比亚（像官方的急电所证明的那样）和阻止罗马尼亚军队建立起来（虽然罗马尼亚军队能够积极参加战争），如果奥地利同时从加里西亚撤出 20 万人，从而使俄国有可能以同等数量的军队开入克里木，那末奥地利是否会充当同盟者或至少充当中立国的角色？”

奥地利自从充当中介人，即既非同盟者又非中立国的角色时起，就采取了两面性的立场。据我们看来，从 1853 年 6 月 14 日克拉伦登勋爵寄给维也纳内阁的急电中摘引的下面一段话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多多少少把奥地利推上了这条道路。

“如果俄国军队通过多瑙河各公国侵入土耳其的另一些地区，那末大概会发生基督教居民不是为了俄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支持苏丹，而是为了争取本身独立的总起义；不用多说，这种起义很快就会蔓延到多瑙河沿岸的奥地利地区。但是，要判断这些事件会对匈牙利和意大利发生什么影响，会怎样鼓舞那些使奥地利有理由担心的欧洲叛乱者（这些叛乱者认为实现自己计划的良机现在恰好就要来到了），这乃是奥地利政府的事情。正是这些理由促

使女王陛下政府同奥地利共同争取达到一个对社会利益十分重要的共同目的，同它一道寻求一个使俄国的正当要求与苏丹的主权能够调和的办法。”

议会常会快要结束了，但还有一个涉及奥地利政策的问题仍然像在常会开始时一样没有搞清楚。奥地利对克里木远征采取了什么立场？今年7月23日，迪斯累里问约翰·罗素勋爵，他根据什么说“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奥地利拒绝越过普鲁特河”。

约翰·罗素勋爵记不起来了，更确切些说，他表示“他的根据就是模糊的回忆、一般性的回忆”。于是迪斯累里又向帕麦斯顿提出这个问题，帕麦斯顿

“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涉及女王陛下政府和在某种程度上是女王陛下的同盟者的一个君主政府之间长期谈判中的某些方面”。

我们看到，帕麦斯顿用这种显然是支吾搪塞的回答证实了罗素的声明，但只不过是间接地、在对“某种程度上的同盟者”使用的委婉词句的掩盖下证实了罗素的声明。现在我们从下院转到上院来看一看。今年6月26日，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表演说猛烈攻击奥地利：

“6月初（1854年）奥地利决定要求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要求的词句极其强硬，带有某种类似威胁的口吻：如果要求不予实现，就要采用武力。”

林德赫斯特作了一些历史性的评语以后，继续说道：

“当时奥地利果真对俄国实行了某种进攻吗？它打算把军队开进多瑙河各公国吗？根本没有。在几个星期以内，一直到锡利斯特里亚解围，俄国军队开始撤退，俄国自己宣布打算过一些时候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军队调回普鲁特河彼岸的时候，奥地利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在这以后，奥地

利才想起了自己的义务。”

克拉伦登勋爵在回答这篇演说时说：

“当奥地利始终如一地担负了对英法的许多义务并且进行了广泛的开支庞大的战争准备时，以及当它坚决地要求英法派遣军事代表去海斯将军的司令部时，奥地利无疑是打算参与战争并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的。但它也指望在有利于军事行动的季节远未到来以前，联军就能在克里木取得决定性胜利，指望联军能腾出力量，同它的军队配合采取另外的行动。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一旦奥地利应我们的要求宣战，它也许只得单独作战了”。

更令人惊异的是**埃伦伯勒**稍晚一些时候在上院所作的声明，这篇声明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大臣反驳过：

“还在军事远征以前，奥地利就提议和盟国讨论未来的军事行动问题。但是盟国却根据事先作出的决定行动起来，进行了远征，这时奥地利就立即声明，它不能单独同俄国作战，克里木远征使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在以后一个时期，正好在维也纳会议召开初期，当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奥地利同我们一起行动，但你们那时仍然只想到怎样保证你们在克里木的行动取得胜利，于是从直接邻接奥地利的领土上撤走了5万有名战斗力的土耳其军队，从而使奥地利失去了在同俄国作战时可以指望的唯一支援。大人们，从这里，以及从克拉伦登伯爵不久前的声明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我们的不明智的克里木远征使奥地利的政策陷于瘫痪，使奥地利处于目前所处的困难境地。还在远征克里木以前，我就预先警告过政府。我曾向政府指出过，这次远征会对奥地利的政策起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看到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约翰·罗素**勋爵和**埃伦伯勒**勋爵的声明是完全矛盾的。罗素说，进行克里木远征是因为奥地利拒绝越过普鲁特河，即拒绝用武力反对俄国。而克拉伦登宣称，不，奥地利不能反对俄国，因为克里木远征没有得到所期望的结果。最后，**埃伦伯勒**勋爵宣称：克里木远征是违反奥地利的愿望

的,使它不得不拒绝同俄国作战。这些矛盾不论怎样解释,反正都证明,具有两面性特点的不只是奥地利的政策。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15 日

载于 1855 年 8 月 18 日
“新奥得报”第 38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英法对俄战争²⁶⁴

—

伦敦 8 月 17 日。英法对俄战争毫无疑问将作为“不可理解的战争”而载入战史。言语夸大而行动却微不足道；准备的规模巨大而成果却小得可怜；近乎怯懦的小心谨慎有时却由于完全无知而变为轻率的大胆；将军们出奇地平庸而军队却出奇地勇敢；失败似乎出之有意而胜利却由误会得来；军队由于疏忽已濒于复灭，却又由于奇异的偶然性而得救，——这是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合逻辑的现象的交错。而所有这一切是俄军的特点，正像是他们的敌人的特点一样。如果说英国人由于文官的拙劣管理和军官的无能而毁了一支模范的军队，如果说法军只是由于路易·波拿巴妄图从巴黎指导战争而使自己遭到无谓的危险和巨大的损失，那末俄军由于拙劣的管理和彼得堡的愚蠢的但却是坚决的命令而受到了类似的损失。关于俄皇尼古拉的军事天才，自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以来，甚至连他的奴颜婢膝的阿谀者们也都尽量“避而不谈”了。如果说俄军有托特列本，——顺便说，他不是俄罗斯人，——那末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哥尔查科夫和其他姓上带“夫”字的人，这些人的平庸丝毫不亚于圣阿尔诺和腊格伦。

看来至少是现在，当这么多有才智的人忙于制订形形色色的进攻和防御计划的时候，当兵员和物资也日益增多的时候，应当想出某种能够获得胜利的主意。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战争在拖延，而且它以后的进程只是促使战区扩大。战区开辟得愈多，各个战区的行动就愈少。目前我们看到有 6 个战区：白海、波罗的海、多瑙河、克里木、高加索和阿尔明尼亚。可是关于在这些辽阔无垠的空间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报道，只要报纸上一栏的位置就能登下了。

关于白海，英法方面总是慎重地避而不谈。联军在这里只追求两个军事目的：阻碍俄国人在这个海面上作近海的和其他的贸易航行，以及在有利时机夺取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曾试图完成第一个任务，但也只是部分地。联合分舰队在去年和今年都是来得太迟，离开得太早。第二个任务——夺取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甚至还没有试图去完成。封锁海岸的联军分舰队不去设法完成这一主要任务，却胡乱地攻击俄罗斯人和拉普兰人^①的乡村，毁坏贫苦渔民少得可怜的财产。英国记者们竟以分舰队感到自己不能做任何重大的事而烦恼和忿怒作理由，为这种可耻的行为辩护！好一个辩护！

在多瑙河，没有任何行动。甚至闹得河口不得安宁的海盗都没有肃清。奥地利握有从这方面进入俄国大门的锁钥，而且显然决心牢牢地掌握住它。

在高加索，一切平静无事。可怕的切尔克斯人同一切野蛮的和独立的山民一样，似乎对俄军行军纵队从他们山谷中撤走已经

^① 拉普兰人是居住北欧北部的民族，又叫萨阿米人，主要从事渔猎。——译者注

十分满足，除非为了抢掠，便没有一点下山到平原去的愿望。他们只会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此外，并入土耳其的前景看来也决不会使他们感到高兴。

在亚洲，土耳其暴露了它现在的真实状态，因为它在亚洲的军队完全反映出整个帝国的腐朽状况。看来必须求救于法兰克异教徒；但是法兰克人^①在这里除了构筑野战工事以外，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强迫军队学习文明战法的一切企图毫无结果。俄军包围了卡尔斯，看来，还准备对它进行有计划的进攻。除非奥美尔—帕沙率领 2 万人的军队在巴士姆登陆，从翼侧打击俄军，此外就很难找出一条援救这个城市的办法了。俄军拥有一支 2—3 万优秀兵士的部队，但是却如此缓慢地、不坚决地同这样缺乏训练的敌人作战，这种情况是难以理解的，也绝对不是俄军可以引以为荣的。不管他们在这个战区取得怎样的胜利，他们能够取得的最大的成果也无非是攻占卡尔斯和埃尔斯伦，因为通过小亚细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亚洲的战争暂时只有更局部性的意义；由于我们离那里远，而且只有不精确的地图，对战术或战略情况未必能作出正确的估计，所以不准备详细讨论这个题目。现在就剩下两个主要的战区：克里木和波罗的海。

二

伦敦 8 月 18 日。在克里木，围攻进行得毫无生气。整个 7 月份，法军和英军都在忙于把围攻工事向大凸角堡和马拉霍夫冈作

^① 近东对西欧人的通称。——编者注

新的**推进**，虽然我们一直听说，围攻工事已“紧逼”俄军的工事，但是现在我们探听到，8月4日对壕顶端距俄军主壕还不下115米，而且可能还要远些。当然，能迫使易于激动的佩利西埃承认他的“强攻法”已遭到破产和只有正规的围攻作业才能给他的部队开辟道路，这已经是好的。但是，那种让20万人静悄悄地躺在帐篷里等待堑壕挖成和死于霍乱及寒热病的作战方法，是非常奇特的。正如巴黎的报纸所说的，如果由于黑河彼岸的俄军阵地难以接近而不能渡过该河，那末从海上向叶夫帕托利亚出征，试图从这方面迫使俄军进入开阔地并暴露其现有兵力和辅助部队的状况，也许会得到某种有益的结果。在目前的情况下，土军、撒丁军以及半数的法军和英军只能袖手旁观。这些军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本来可以用来进行各种牵制行动，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牵制行动却出现在阿斯特利马戏院、萨里剧场和克勒莫恩广场剧院的舞台上，在那里每晚在爱国的cockney（伦敦人）的热烈掌声中俄军都遭到了可怕的失败。

俄军这时想必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全部援军，并且使部队数量达到了最近一个时期的最大限度。英军还要派出几个团，法军已经派出10000—15000人，还有更大的兵力将随后开到；联军在克里木总共应得到5—6万生力军的增援。此外，法国政府登记或征购了大量的内河轮船（根据不同的材料，共有50—60艘），打算用于黑海上的远征。至于这些船只是用于阿速夫海还是用来进入德涅泊河和布格河的河口（在这里，奥查科夫、金布恩、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将成为攻击目标），暂时还不清楚。我们已经说过，在8月中旬将发生激战，因为这时俄军将得到援军而重新取得主动。^①实际

^① 见本卷第420—422页。——编者注

上，俄军在利普兰迪将军的指挥下已经袭击了黑河附近的法军和撒丁军队，但被击退，损失很大。联军的损失没有说明，一定很可观。要想更详细地谈论这一事件，就必须掌握比电讯更为充分的材料。

在波罗的海，终于“给了一个沉重的打击”：《A great blow has been struck!》请看英国的报纸：炮击斯维阿波尔格！斯维阿波尔格被毁！一切土质工事和其他工事都已成为废墟！斯维阿波尔格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联军的辉煌胜利！舰队一片欢腾！现在我们来看看事实本身。由6艘战列舰、4—5艘大型巡航舰(block—ships)以及约30艘白炮艇和炮艇组成的联军舰队，8月7日由列维里向斯维阿波尔格进发。8月8日它们占领了阵地。吃水浅的舰船通过了要塞西面的、较大的军舰不能通过的淡水滩和岩礁，显然停泊在斯维阿波尔格所在诸岛上的远射程炮的射程以内。大型军舰则停泊在远处，据我们判断，是在要塞炮射程以外。然后，炮艇和白炮艇开始射击。看来没有采用直接瞄准射击，只用加农炮所许可的最大射角射击。炮击持续了45小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由于没有关于双方的详细的消息，所以暂时还不能肯定损失究竟多大。军火库和各种火药库（显然是较小的）已被毁坏。斯维阿波尔格“城”（据我们所知，这只是不多的几幢房屋，里面住着在舰上或要塞里当差的人们）被火烧毁。要塞工事直接遭受的损失看来并不大，因为正如两位海军上将所报告的那样，舰队无一个人阵亡，仅有少数人受伤，船只也未受任何损失。这就最好地证明了，分舰队是停在能进行炮击但不能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安全距离上，而要塞工事只有用直接瞄准射击才能破坏。邓达斯在他那份措词比法国海军上将的报告较适当和较有分寸（至少根

据“通报”上发表的、可能被巴黎修饰过的报告来判断是这样的)的报告中承认:斯维阿波尔格所在的7个岛屿中,只有赫尔辛福斯湾主要入口处以西的3个岛受到损失。对主要入口处看来没有试图攻击。大的舰队在袖手旁观,而关于通过类似的攻击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和派部队登陆以便夺取并破坏工事,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受到损失的只是储备物资和仓库,也就是容易恢复的东西。如果俄军有效地利用时间和器材,斯维阿波尔格经过3个星期就会完全恢复原状。从军事观点来看,斯维阿波尔格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失。整个这一过程归结起来,也许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行动,所以采取这一行动,一部分是因为联军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回去以前应当有所作为,一部分是因为帕麦斯顿想施放焰火来结束本届议会常会。可惜,就这个目的来说行动已经迟误一昼夜了。这就是联军舰队对斯维阿波尔格进行的有名的破坏。等详细的报道一到,我们就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8月17和18日
载于1855年8月20和21日
“新奥得报”第385和387号,并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9月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8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论战区事件

伦敦 8 月 22 日。佩诺及邓达斯两位海军上将的报告证实了我们提出的关于“光荣地摧毁斯维阿波尔格这个北方的直布罗陀”（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的判断。而今天我们在一家伦敦报纸上读到下面的消息：

“关于这次对斯维阿波尔格进行大规模炮击的特点，只能说是由于战火的蔓延，敌人想必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然而并没有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由此已占了很多便宜。所取得的胜利既不辉煌，也不巩固。同从前一样，波罗的海的全部情况还有待今后的发展。”

的确，在英国女王访问法国期间，“泰晤士报”必须表现良好的情绪和报道良好的消息，它一味描写 *couleur de rose*（美好的事情）已经有好几天了，它假装成非常乐观的样子，绝不愿抛弃毁灭斯维阿波尔格“城”的幻想。

至于谈到黑河会战，首先需要比较详细的情报，才能对它作出评价。整个问题在于是否争取渡过黑河，以及河水深到什么程度才成为真正的障碍。如果会战是在法军正面没有这种障碍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末它就使俄军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相反，如果谈到征服无法迂回的隘路，那末俄军大批人马的损失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所以会战对双方都可以说是光荣的。但是，毕竟还有

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俄军不试图通过拜达尔盆地实行迂回呢。但有一点还是无疑的：只要联军不是自愿撤离，那末俄军就正像它们现在所表明的，是没有力量迫使联军撤离台地及黑河地区的。这样一来，先前的那种拖延做法又重新开始了。

强攻马拉霍夫冈的消息是指日可待的。如果强攻不成功，联军就会陷于困难的境地。如果强攻成功（这还是可能的，虽然要以巨大的损失作代价），那末这还并不意味着俄军失去南区；除非俄军因缺乏粮食而不得不放弃南区。无论如何，联军在冬季以前有可能将俄军从那里排挤出去。关于在克里木的英国兵士的健康状况的报道是矛盾的。根据一份报告，每月有 1000 名在堑壕里的英国兵士失去战斗力。据查明，仅在一个有 676 人的骠骑兵第十团里就有 161 人患病。政府派到克里木的医疗委员会主席萨特伦德医生在他给舍夫茨别利伯爵的一封信中谈到以下事实：

“7月7日周末：英国军队人数为 41593 人；死亡总数为 150 人，患霍乱病死的有 71 人，寒热病——17 人，腹泻——19 人，痢疾——2 人。7月14日周末：军队人数为 42513 人；死亡总数为 123 人，霍乱——55 人，寒热病——18 人，腹泻——10 人，痢疾——5 人。第一周因伤死亡 44 人，第二周因伤死亡 30 人，共计 74 人。”

因此，在 7 月份头两个星期内，因病死亡人数和因伤死亡人数的比例大致为 4：1。萨特伦德医生把去年冬天和今年夏天军队的健康状况作了如下的比较：

“去冬死亡现象和今夏死亡现象相比，具有完全另一种性质。去冬发生过的几乎在全军引起 scorbuis（坏血病）的那些原因：饮食不好、睡眠不足、身体过度疲劳、缺少衣服和掩蔽所、对恶劣天气预防不好等等，现在连一种也未必有。那时的各种疾病都带有坏血病的性质，因此在斯库塔里医院里死亡现象非常可怕；可以把它同爱尔兰因饥饿而死亡的现象（1847）相比较，而

现在相反，我们碰到的是寒热病和霍乱，由于对兵士的巨大关怀，在我们兵营里，这两种病的蔓延程度无疑已经减弱了。”

目前被围部队的兵士的健康状况无疑要比围攻部队的健康状况坏。但是萨特伦德医生不可能要求绝对相信他的信，因为不久前的一次事件证明，在英国兵营中提出批评要**受到处罚**。大概在一个半月以前，“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报道了6月18日血战后对待伤员的不可容忍的态度。军事当局要求“泰晤士报”说出记者的姓名。该报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只有在弗雷德里克·皮尔先生坚决保证对揭露真相的记者不予追究的条件下，才同意说出姓名。皮尔没有同意这个条件，然而在议会中指责了“泰晤士报”的拒绝态度。当时这封匿名信的作者**贝克韦耳**先生（外科医生的助手）因病在斯库塔里休假。这件事发生在7月中旬。兵营的长官通过某种方式揭露了贝克韦耳的手笔。背着贝克韦耳并**趁他不在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由高级医官（其中大部分人的名誉恰好是因贝克韦耳的信而受到了影响）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作出了贝克韦耳犯罪的结论，既不给他申辩的机会，也不让他有可能对他们提出的控告进行论证。8月3日在军队的通常命令中宣布了解除贝克韦耳的职务。从这个事件来看，也可以估计到英国官方的或半官方的关于兵士健康状况、伤员护理等等的报告的可靠程度。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8月22日

载于1855年8月25日
“新奥得报”第39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纳皮尔的信

伦敦 8 月 24 日。查理·纳皮尔爵士今天在日报上发表了一封信²⁶⁵，这封信基本上证实了我们关于炮击斯维阿波尔格的意见。我们从这封信中摘录如下：

“从我自己写的信中，以及从海军上将邓达斯的报告中都可以看出，如果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行事，斯维阿波尔格就已经被击毁了。现在很清楚，联军共有炮艇和白炮艇 43 艘，而且很多白炮艇不能使用，可是这种白炮艇至少应有 100 艘。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给我的一封信中（1854 年）估计白炮艇的需要量是 200 艘。如果确有这样多数量的白炮艇，那末，就可以像在战壕里那样轮换人，继续进行炮击。白炮就来得及冷却，而炮击也能连续不停，一直到彻底摧毁并给战列舰打出一条通路时为止，战列舰通过了这条路，就能完成任务。但是，海军部显然没有考虑到白炮艇是不能无限期地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虽然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报告看来应使它学到一些东西。因此，好像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军事行动，只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海军上将邓达斯在自己的报告中也承认，俄国的海防工事几乎没有遭受破坏。如果海军上将邓达斯有更多的器材，他就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继续进行炮击，分舰队就可以不回纳尔根，而在斯维阿波尔格抛锚。

在战争的第一年是由于器材不足，这一切还是可以原谅海军部的，但在第二年，就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了。海军部不去建造炮艇和白炮艇，而建造了勉强可以浮在水面的金属浮动炮台，这些浮动炮台即使能够浮动，但仍然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离斯维阿波尔格 400 码时，就一定要被击毁，而在 400 码以外，它们就起不了任何破坏作用。

第一次利用金属的实验,国家花了整整 100 万英镑,这 100 万英镑到哪里去了呢?第二次实验也花了不下 50 万,但是金属浮动炮台仍然没有离开我国的港湾,而且往后也未必会离开。这是无能的人领导的结果。大臣们已经不得不改组军事部门。他们什么时候才考虑海军部的改革呢?在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人民的钱将白白地被浪费掉。看来,海军部没有想到炮击的后果,虽然我在一年多以前就预先告诉过它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他们读一下历史,就会知道马提尼克是依靠白炮艇拿下来的;而且,那里全部守军的穹窿,也和斯维阿波尔格的一样少。按照海军上将邓达斯的说法,他的计划没有规定要用战列舰向防御工事发起总攻,所以他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有限任务是:利用白炮尽可能地击毁要塞和军火库。

如果海军上将邓达斯拥有足够的器材,他就会在自己的计划中规定进攻防御工事并把自己的全部舰队集中起来,以便舰队准备好来利用炮艇和白炮艇所造成的慌乱局面。熊熊大火就已经使守军不能使用武器了,而且舰队在靠近斯维阿波尔格后,就能彻底摧毁要塞工事和小岛屿等等;否则,就只能破坏木建筑物和军火库,而基本任务又要拖到明年去完成。”

纳皮尔在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

“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是在 9 月间把不列颠军队派往塞瓦斯托波尔去的那些大臣中间的一个,这支军队没有运输工具,没有粮食、帐篷、衣服和军医院,因此就要在那里忍受冬季的严寒和死亡。正是这位大臣催促我在 10 月底开始英国舰队的行动,而这可能使英国舰队复没于斯维阿波尔格的岩礁之下。他收罗到了两个海军军官,他们恬不知耻地在格莱安给我的那封侮辱信上签了字。这两个人现在还在海军部。这就是我国指挥舰队的方法。两个夏天,我们在波罗的海采取的军事行动,对海军部来说是一个教训。海军部有我拟定的进攻喀琅施塔得的计划,大概也有海军上将邓达斯的计划。因此,明年夏天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他的两位助手大概会亲自前去实现这些计划。”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 24 日

载于 1855 年 8 月 27 日

“新奥得报”第 39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奥地利和战争

在另一页上，我们刊登了一个奥地利军官写的关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久前视察加里西亚驻军的报告。作者所描述的同这次视察有关的事件以及他对帝国军队配置情况的意见，证实了我们以前谈过的看法，即奥地利在去年进行的战争准备，决不是弄虚作假，故意要欺骗西方列强。毫无疑问，它不可能仅仅为了蒙混世人耳目而作这样的牺牲。²⁶⁶

只有在万分必要时，奥地利才不得不用武力来对付俄国，这种看法是对的；只要能拖延时间，奥地利对于俄国外交作为诱饵向它提出的维持和平的一线希望总是抓住不放的。但是最后，它忍无可忍了。圣彼得堡惊奇地、近似恐惧地得知，奥地利军队正在向加里西亚边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发生的时候，俄国人甚至还没有想到奥地利会采取这样的军事手段，那时俄国根本不可能同样迅速地把自己的相应数量的军队集中到加里西亚边境。因此，不得不重新使用外交艺术。这是怎样进行的以及结果如何，没有必要重复了。不久前还集中在加里西亚边境的庞大的奥地利军队突然分散了²⁶⁷，因而俄国人对这个地区的忧虑就部分地消除了。我们说部分地，是因为随着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而产生的还有两个重要情况，这两个情况即使在军队分散后也必须加以考虑。这里

指的是军队在加里西亚驻扎期间新建的、修建的或补建的工事和铁路。

当时在帝国的所有其他地区，政府通常是让私人企业主来建筑铁路的，而对连接维也纳和慕尼黑的西部铁路根本没有给以任何注意，但加里西亚驻军总司令海斯男爵却使用了数千名兵士来修筑铁路线。这条铁路线的战略意义不论有多大，但是现在从商业观点来看，其价值无论如何是十分值得怀疑的。要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修建这条铁路线的计划大概要在私营公司的工程师那里再搁置 30 年。俄国对修筑这些铁路极其不满，因为奥地利现在可以利用它们来重新集中刚刚分散了的军队，而且所花的时间要比俄国集中同样数量的军队所需要的时间少五分之一。任何人，只要他肯花些工夫去了解一下有关奥地利铁路运输的统计材料，并且把在东部纯粹为了政治目的而做的一切工作同很少注意西部商业利益的情况比较一下，就一定不会对在加里西亚如此仓卒地修筑这条铁路线仅仅是为了欺骗世界这一点发生怀疑。十分明显，迅速建成连接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西部铁路线对实现这一目的具有更重大得多的意义。

不久前在奥地利东部各省改进了旧工事，修筑了新工事，这一点更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如果说修筑铁路可以用战略的和其他的理由来解释，那末修筑工事和建成工事体系以及由于这些工程而引起的非生产开支，就只能解释或是为了实现这些工事所直接服务的目的。我们已经谈到的关于奥地利东西部铁路建筑规模的对比情况更可以用来说明修筑工事的问题。在奥地利帝国的 36 个要塞中，有 7 个直接属于东部防线，有 9 个间接属于东部防线；其中大部分（如克拉科夫、普泽米希尔和扎列施基）只是

在不久前才改建好的。克拉科夫和普泽米希尔，以及由于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不能成为强大要塞的里沃夫，瞰制着通往华沙的道路。扎列施基位于加里西亚东部的末端，同俄国的重要要塞霍亨相对。克拉科夫变成了第一流的要塞，它的全部工事同加里西亚的其他工事一样，完全处于备战状态。从前在奥地利军队中任命年迈体弱的老将军担任要塞司令，这被看成是一种光荣的退休，而在这样的要塞中服役，则被认为是在宫廷中失宠的军官的一种流放。可是现在指挥东部和东北部的要塞的都是一些真正有才干的人，是有功劳的将军和司令部的著名军官。克拉科夫由伏尔特将军指挥，普泽米希尔由艾布纳尔少将指挥，扎列施基由格累泽尔少将指挥，卡尔斯堡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指挥官是泽德耳迈尔将军，西北侧的奥里缪茨的指挥官则是冯·柏姆将军。而西部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那里的东西和人都是衰朽的，而且听任其衰朽下去。但是如果西方列强哪怕是在口头上对奥地利政策的真实性怀疑一下，那末这种情况不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奥地利当局就会十分匆忙地着手恢复林茨和它的40座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林茨现在甚至不算是一个要塞，而萨尔茨堡曾经是一个第一流的堡垒）！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毫无动静，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甚至那些在东部希望夺取胜利桂冠的兵士，回来时愈接近巴伐利亚边境，就愈丧失自己的战斗精神。

事实就是这样一目了然：需要弄清楚的只有一个问题，即谁妨碍了奥地利政策的执行，由于谁的过错而使国家负担大量附加的民族义务，而无论自己或自己预定的同盟者都得不到任何直接的利益？我们知道，维也纳流行着一种在德国得到普遍赞同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奥地利害怕普鲁士成为自己的第二个敌人，同

时还因为没有德国的援助而进行的战争不会有迅速结束的保障，而迅速结束战争又是帝国的特殊地位所需要的，因此奥地利拒绝参与战争。然而我们坚持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如果奥地利敢于进攻俄国军队，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部分即使是缓慢的和勉强的，也会不得不仿效它的榜样。

谁应当对奥地利目前的政策负责呢？是出色的伪君子和爱吹牛的空谈家帕麦斯顿勋爵所领导的英国。为了证明这种推测，我们不得不离开军营而深入外交迷宫。7月23日，迪斯累里先生质问约翰·罗素勋爵，他根据什么声明“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奥地利拒绝越过普鲁特河”。约翰勋爵记不起来了，更确切些说，他表示“他的根据就是一般性的回忆”。于是迪斯累里先生又向帕麦斯顿勋爵提出这个问题，帕麦斯顿

“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涉及女王陛下政府和在某种程度上是女王陛下的同盟者的一个君主政府之间长期谈判中的某些方面。至于他自己，他只能说，他一向认为克里木是一个可以给俄国在黑海的霸权以最沉重打击的地方：假使没有其他的原因的话，这种考虑在他看来就是远征的最充分的根据”。他声称：“我认为，向克里木远征是一个最好的步骤”。

这样，我们就从帕麦斯顿勋爵那里知道，出师克里木的主意不是奥地利出的，也不是波拿巴出的，而是他自己出的。6月26日，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表演说猛烈攻击奥地利，他说，

“6月初奥地利决定要求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要求的词句极其强硬，带有某种类似暗示的口吻：如果要求不予实现，奥地利就要采用武力来实现这一要求。”

高贵的勋爵在作了一些历史性的评语以后继续说道：

“当时奥地利果真对俄国实行了某种进攻吗？它打算把军队开进多瑙河

各公国吗？根本没有。在几个星期以内，一直到锡利斯特里亚解围，俄国军队开始撤退，俄国自己宣布打算再过一些时候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军队调回普鲁特河彼岸的时候，奥地利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因此，林德赫斯特勋爵责难奥地利，说它言行不一。在他之后，克拉伦登勋爵发表了演说。他的演说使我们了解到一些使5月和6月的奥地利变成7月和8月的奥地利的原由。他说：

“当奥地利始终如一地担负了对英法的许多义务并且进行了广泛的开支庞大的战争准备时，以及当它坚决地要求英法派遣军事代表去海斯将军的司令部时，奥地利无疑是打算参与战争并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的。但它也指望在有利于军事行动的季节远未到来以前，联军就能在克里木取得决定性胜利，指望联军能腾出力量，同它的军队配合采取另外的行动。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一旦奥地利应我们的要求宣战，它也许只得单独作战了。”

由此可见，约翰·罗素勋爵所作的解释同克拉伦登勋爵的声明是完全矛盾的。根据约翰勋爵的推断，远征克里木是因为奥地利拒绝越过普鲁特河，即拒绝反对俄国。可是克拉伦登勋爵说，由于克里木远征，奥地利不可能反对俄国。

我们再看一看谁也没有提出反驳的埃伦巴勒勋爵的声明，是会有好处的：

“还在远征克里木以前，奥地利就提议和盟国讨论未来的军事行动问题。但是盟国却根据事先作出的决定行动起来，进行了远征，这时奥地利就立即声明，它不能单独同俄国作战，克里木远征使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在以后一个时期，正好在维也纳会议召开初期，当时特别重要的是要奥地利同我们一起行动，但你们那时仍然只想到怎样保证你们在克里木的行动取得胜利，于是从直接邻接奥地利的领土上撤走了5万名有战斗力的土耳其军队，从而使奥地利失去了在同俄国作战时可以指望的唯一支援。大人们，从这里，以及从伯爵的声明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我们的不明智的克里木远征使奥地利的政策陷于瘫痪，使奥地利处于这样的困难境地：它不得不立

即放弃保证使它获得荣誉、尊严和利益的行动路线。还在恐征克里木之前，我就曾大胆提醒政府注意这一措施所产生的必然后果。我曾向政府指出过这次远征会对奥地利的政策起什么样的影响。”

埃伦伯勒勋爵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正是在远征会迫使奥地利放弃对俄国的初步军事行动这一点已很明显的时候，帕麦斯顿派出了前往塞瓦斯托波尔的远征军。看样子好像帕麦斯顿准备援助英国的最凶恶的敌人，好像他故意使奥地利处于目前它在多瑙河各公国所处的模棱两可的地位，让奥地利受俄国外交的支配，把房地利推进它所必然要面临的绝境。不管帕麦斯顿愿意不愿意，他采取这种行动，也和他在自己漫长而不光彩的生涯中所采取的其他许多措施一样，只是很好地为俄国一个国家效劳罢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8 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9 月 1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9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对英国兵士的惩罚办法

伦敦 8 月 28 日。在不列颠军队中，有一种能充分说明不列颠兵士是从哪些社会阶层招募来的制度。我们说的是用鞭笞来惩罚兵士。不论是法国军队、普鲁士军队或其他规模较小的军队都不再采用体罚。甚至在大部分新兵为半野蛮人的奥地利，也有废除体罚的明显愿望，例如，驱使受罚者穿过棒列的那种体罚，不久前已经从奥地利军队的条例中取消了。相反地，在英国《cat-o'-nine-tails》（“九尾皮鞭”）——类似俄国皮鞭的一种刑具——仍旧继续采用。每当议会里提出军事立法改革问题时，所有老将军总是热烈赞成采用《cat》（“皮鞭”），老头子威灵顿特别显得热心。在他们眼里，没有受过鞭笞的兵士是某种怪物。他们认为，勇敢的精神、高度的纪律性和不可战胜的气概这些素质，只有背上带有伤疤，至少挨过 50 鞭的兵士（像过去侍从武士在他们的盾牌上刻有徽章一样）才会具备。

唯一的改革是把鞭打的数目限制在 50 下以内。这种改革的效果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大约一星期以前，在阿尔德肖特，有一个兵士挨了 30 下皮鞭后就很快死去了。在这次事故中所采用的是惯常的办法——先把《cat-o'-nine-tails》放在尿里浸湿。在用刑时尿随着皮鞭落到赤裸的血迹斑斑的躯体上，这种刑罚是使

受折磨的人精神失常的最好办法。“九尾皮鞭”不仅是一种刑具，它还给人留下永不可磨灭的伤痕——给人终身打上了烙印。甚至在不列颠军队里，这种烙印也等于是一种终身的耻辱。受过鞭笞的兵士在自己的伙伴眼里是可耻的。同时，根据不列颠军队的条例，对在前线的兵士的一切惩罚几乎都是鞭笞；因此，同是这种惩罚，在它的维护者看来是在决定性时刻维护纪律的唯一手段，而实际上它却是破坏纪律、涣散士气和挫伤兵士 *point d'honneur*（荣誉感）的最好手段。这就说明了两件奇特的事实：第一、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有大批英国逃兵。冬季，当不列颠兵士为了在战壕内担任警戒而不得不作出超人的努力时，谁要是不能连续在两个至两个半昼夜内不睡觉，就要受到鞭笞。试想一下吧！受鞭笞的是那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壕里和在因克尔芒会战中英勇奋战的英雄！但是纪律条例的条文未留有选择的余地。军队中最好的兵士因疲劳而受到鞭笞，他们蒙受侮辱后就逃到俄军方面去了。除这些事实外，大概想不出其他比鞭笞制度更为严酷的判决了。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发生过某个国家的兵士大批地逃到俄国人那里去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那里对待他们会比在自己军队里更坏。第一次出现这种大批逃兵现象的荣誉属于不列颠军队。英国人自己证明，正是《*cat-o'-nine-tails*》（“九尾皮鞭”）给俄国军队提供了逃兵。

另一个情况是：英国每当试图成立外籍军团时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早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虽然官方一直认为不列颠军队的条例在外籍军团中也有效，但是实际上在这些部队中体罚已经废除了。在十九世纪初，有些英国将军（包括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在内）受到异教邪说的熏染，曾发表过攻击兵士体罚制度的文章。弗

兰西斯·伯德特爵士十多年来一直在议会中大声疾呼,反对《cat-o'-nine-tails》,并骂英吉利民族是《a flogged nation》(一个挨打的民族)。他在下院得到福克斯顿勋爵和著名的柯克伦勋爵(现在的海军上将丹多纳耳德伯爵)的大力支持。科贝特曾经在报刊上猛烈抨击过《cat》(“皮鞭”),为此他被监禁了二年。在反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几年,有一个时候人民和军队的愤懑情绪高涨到了极点,甚至约克公爵(这位公爵虚伪地崇拜机械练兵,他曾经从法国人那里逃出来,并且同克拉克夫人有暧昧关系,这三件事同样使他出名)也不得不在短时期内发布一道命令通知全体军官说,在他们的部队中多次发生的鞭答事件,将成为他们升级的障碍。

然而,为什么半世纪以来《cat-o'-nine-tails》仍然顺利地经受住了所有这些猛烈的攻击呢?原因很简单。“九尾皮鞭”是这样一种工具,利用它,可以保持不列颠军队的贵族性质,依靠它,从准尉一级开始的所有指挥官职位可以通过封建特权的形式固定由贵族和绅士的年幼子弟来担任。废除《cat-o'-nine-tails》就会消灭目前把兵士和军官分隔开来并把军队分成两个像是不同种族的那种重大差别。同时,由此还会给那些比军队迄今所招募的兵士占有较高地位的居民阶层开辟入伍的途径。不列颠军队里的旧制度必须废除。军队必须彻底革命化。“九尾皮鞭”——这是保护贵族阶级宝物的塞卜洛士。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8月28日

载于1855年8月31日
“新奥得报”第40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1854—1855年论文书
信集”(1924年版)

弗·恩格斯 黑河会战²⁶⁸

与我们的希望相反，在“阿非利加号”轮船星期三夜间带来的邮件中，没有哥尔查科夫公爵关于8月16日黑河会战的报告。但是我们昨天公布的法军和英军的报道，却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使我们能对这次会战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在法军报告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这次竟没有表现出法国武夫所特有的、而且在佩利西埃的头几次公报中显得很突出的那种吹嘘。这一次，这位老将军写得异常清楚、认真和切实，甚至对俄军在这次会战中表现的勇敢精神也给了应有的评价。他的报告比辛普森将军关于参加这次会战的人数的可笑的统计要强一些。根据这些统计，似乎数量不过15000人的法军和撒丁军并不特别费力就打败了6万人的俄军。事实上，情况看来是这样的：

8月16日晨，拂晓前，俄军从梅肯集高地下来，在黑河边的一些山岗上占领了阵地。俄军由哥尔查科夫公爵亲自指挥。隶属于他的有：列阿德将军指挥的第七师和第十二师（为右翼），利普兰迪指挥的第五师（居中央），以及第十七师（为左翼）。第四师和第六师的部分兵力也在这里，大概是担任预备队。第五师以及第四、第六两师的部分兵力是刚刚来克里木的第二军（帕纽亭军）的一部分；其余的都是早先在克里木的部队，显然，它们都已大量减员。

黑河对岸的地形基本上是平坦的，它是一直伸展到黑河的巴拉克拉瓦平原的延伸部分；在紧靠河岸的地方，这一平原被两群小山岗切断。这些小山岗从巴拉克拉瓦方面逐渐隆起，而向黑河方面倾斜，因此是拦阻敌人渡河的良好防御阵地。在这两群山岗之间有一片盆地，在巴拉克拉瓦会战期间英军的轻骑兵曾经在这里进行过攻击。东面的一群山岗，为拉·马尔摩拉指挥的撒丁军两个师占领，构成阵地右翼；西北面的另一群山岗则为法军的3个师占领，构成阵地的中央和左翼。法军由埃尔比昂将军指挥，他把卡穆的1个师配置在左面，把自己的1个师配置在中央，把福舍的1个师配置在右面，使它的阵地同撒丁军的特罗蒂师的阵地相接。阵地的防御力量由于紧靠阵地的前方有两重障碍而得到了加强：第一重障碍是黑河，它在当时无疑是可以徒涉的，但仍然使俄军不得不仅仅在一定的地点和狭窄的地段渡河；第二重障碍是水渠，它在多数地方都是从山岩中开凿出来的，因此，敌人即使渡过了水渠，还得攀登陡峭的岩壁。在山顶上，法军和皮蒙特军构筑了不大的胸墙，只足以掩护他们的火炮。这两群山岗好像是几座能以炮火互相掩护的棱堡。在撒丁军极右翼的乔尔贡附近架有桥梁的黑河对岸以及法军中央阵地对面的小饭店（俄国人叫小饭馆）附近，皮蒙特军派出了两个连担任战斗警戒，而小饭馆桥则由法军占领的一个小桥头堡来掩护。再往远去，便是法军的前哨。

8月16日晨，俄军在黑河以东的高地上架好火炮后，派先遣部队下到盆地。当时尚未破晓，而且和因克尔芒会战时一样，浓雾也有助于突然袭击。联军的前哨当即被击退，在快要破晓的时候，桥头堡和整个东岸都已落入俄军手中；俄军继续与法军两个团进行争夺桥梁的战斗。随后，与法军卡穆师和埃尔比昂师的位置正好

相对的俄军第七师和第十二师，成两路密集纵队下到盆地，在这里变换为强攻纵队，分成两路前进：第七师徒涉和利用临时搭的桥通过了河和水渠，向卡穆师进攻；第十二师（它的部分兵力留作预备队）经过小饭馆桥向埃尔比昂师进攻，该桥的守卫者在一转眼间就被俄军显著优势的兵力击退了。俄军斗志昂扬，以他们从未有过的速度通过水渠，爬上山坡。当俄军第七师差不多到达山顶的时候，展开成一线的茶穆的部队，向俄军齐射，并从翼侧和后方向俄军猛攻，迫使俄军立刻向后转，在猛烈的火力下退过河；如果佩利西埃的话是可信的，那末在这次会战中第七师再也没有在战场上出现过。中央的第十二师登上了高地，楔入了法军几个团的防地。会战一时竟难分胜负，但在这时埃尔比昂命令福舍师的一个旅向俄军纵队的左侧攻击，经过短时间的格斗，俄军被赶下山岗，法军开始追击，并暂时夺回了桥梁。

然而，哥尔查科夫准备了新的攻击。第十二师的部分兵力和第五师下到盆地，掩护退回来的部队调整部署，然后，整个第十二师和第五师发起第二次攻击。他们从桥上过河和在桥的两侧徒涉过河，猛冲联军的中央阵地（埃尔比昂师和福舍师）。但这时法军的全部火炮都已架好，从正面轰击俄军纵队，同时撒丁军的炮兵则从翼侧轰击。尽管火力十分猛烈，俄军还是顽强、迅速地前进，再次登上了高地，在那里遭到在棱线稍后的地方展开成一线的法军的迎击。当纵队的头几列刚刚露出棱线，法军就向他们齐射，并从正面和翼侧向他们进行刺刀冲锋。同第一次一样，格斗的时间很短。俄军在联军的步炮火力的追击下，混乱地退过河。俄军第二次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会战的结局。他们五分之三步兵已参加了攻击，而且已不能指望得到增援的生力军开到战场

上来。联军 5 个师里面也有 3 个师参加了会战，但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派出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援助他们。佩利西埃还召唤了 2 个基干师和 1 个近卫师，这些部队已经开近了。这时大约是早上 8 点钟。

尽管兵力这样悬殊，哥尔查科夫仍决定再进行一次攻击。这次派出的必然是第十七师，由它组成被击溃的部队中那些还能够投入攻击的兵力的核心。攻击的方向又转移到左面；这次俄军向福舍师进行突击，但是没有结果。他们还没有到达山顶，就遭到法军和撒丁军炮兵的交叉火力的严重杀伤；法军又一次冲散了俄军的纵队，把他们赶回对岸，而皮蒙特军（特罗蒂师）则从翼侧来包围他们，从而取得了胜利。只有第四师和第六师的部分兵力还没有动用，他们的人数相当于一个师。把他们投入进攻已无济于事。俄军败局已定，于是把炮兵调到前面，然后就开始退却了。俄军自己的阵地如此坚固，以致连佩利西埃也十分清楚，向它们攻击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阵地仅遭到了火炮和步枪的射击。同联军比较，俄军在这次会战中的损失是巨大的。他们死伤和被俘的共约 5000 人，而联军损失仅 1500 人左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俄军不得不冒着联军的尤其是皮蒙特军的极其猛烈的炮火进行一切攻击；皮蒙特军的十六磅炮搬运困难，但是当它们在阵地上架好后，却能发出异常有效的火力。

这次俄军只采取了正面攻击。在因克尔芒附近从左侧迂回法军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设在因克尔芒对面的山岭支脉上的法军炮台瞰制了那一地区。如果要迂回联军右翼，则俄军的基本兵力就需要下到拜达尔盆地，而那里的地形对于行动如此不灵活的军队来说，是太复杂了。因此俄军选择了正面攻击，并且完全正确

地采取了行动，突然地袭击了敌人。袭击的突然性虽然带来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并没有被十分有效地利用到底。俄军攻占黑河的各个渡口后，本来应当把现有的全部兵力都投入攻击，以便在法军受到第一次打击而尚未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巩固胜利。然而，相反地，他们却让敌人的步兵和炮兵有时间作好战斗准备，因此本来可能使法军所占高地转入俄军之手的突然袭击的效果，在俄军刚刚到达黑河的时候就几乎已经丧失了。这再一次证明，当情况要求军队迅速行动而下级指挥官应当独自作出决定时，要使俄军进行机动有多么困难。

法军对于驻军警戒勤务向来有些轻视。即使他们占领着最好的阵地，积极行动的敌人也总是能够在夜间突然袭击他们的步哨，并且无须特别冒险就能够袭击他们的营地。在这次会战中，法军的做法表明，甚至动作迟缓的俄军也能做到这一点。法军的主要阵地靠黑河太近，因此，他们的前进部队应当大大地向前推进，如果地形不允许这样做，就需要适当地加强前进部队，使他们能支持到营地作好战斗准备时为止。而法军却没有用足够的前卫来保障自己的营地，结果，俄军便能够接近到他们的主要阵地，使他们来不及调动全部兵力进行抵抗。如果是比俄军更积极的敌人，就会非常迅速地投入优势兵力，在法军还来不及进行真正有组织的抵抗的时候，就把他们手中的高地夺过来。但是俄军害怕在夜战中拿一两个师的兵力来冒险，因而失去了突然袭击所赢得的一切优势。

法军在抗击已经登上高地的俄军纵队进攻的时候所以能够那样容易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法军采用了他们在这以前很少采用的战术。这种战法，显然法军是从擅长这一手的英军那里

学来的。在防守连成一线的山岗时，十分有利的做法，就是把部队直接配置在能完全隐蔽起来的棱线后面，并且展开成一线，等待敌人纵队的出现。当纵队的先头一出现在棱线上，展开成一线的防御部队就向他们齐射（而他们却只能用几支枪回击），然后就从正面和翼侧向他们进行刺刀冲锋。英军在布萨库、潘普洛纳、滑铁卢以及其他会战²⁶⁹中都采用过这种战术，而且总是成功的。然而，欧洲大陆各国的军队却似乎完全忘记了这种十分可靠的防守高地的方法。在战术教材中虽然提到了这种方法，可是在实践中它却被人们普遍对散兵线掩护下的纵队的偏爱所排挤了。法军从他们过去的敌人那里学会了这种简单而又有效的战法，是值得特别称赞的。如果他们排成纵队，那末俄军无疑地会占上风，而且可能取得会战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同那些为猛烈炮火所打乱并由于攀登陡坡而疲倦的敌人作战时，展开成一线的步兵的火力具有歼灭性的威力，而强有力的刺刀冲锋就足以打退敌人的纵队，不待闪闪发光的刺刀刺到敌人身上，敌人的士气就已经受挫了。

这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三次正规会战。它和阿尔马河会战及因克尔芒会战一样，也是比较短促的。拿破仑战争期间的会战特点，是预先有一个较长的小战斗阶段；双方在使用主力进入决战以前，都力求探明敌人的兵力；只有在双方大部分兵力都投入战斗以后，才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没有任何拖延，没有任何逐渐消耗敌人兵力的行动；突击是一下子就开始的，会战的命运也就取决于一两次攻击的结果。这看起来比拿破仑的战法要更大胆一些。但是，如果说两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像联军在阿尔马河会战中拥有的优势那样）以及众所周知的俄军

行动笨拙这两点似乎可以作为采取这种直接行动的理由，那末这种行动仍然表明，双方都非常缺乏干练的军事指挥。无论如何，按照这一原则作战的武夫们，如果碰到一位很懂得如何开始战斗、设置一些什么样的圈套以及如何把他们诱入圈套的将军，那末他们就会很快陷于非常不妙的境地。

最后，再重复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兵士的勇敢和将领的平庸是目前战争中交战双方的特点。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8 月 31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9 月 1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94 号，并
载于 1855 年 9 月 3 和 4 日“新奥
得报”第 409 和 41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英国的新揭露材料

亚·白恩士爵士的一些文件是在他死后由他父亲发表的，发表的目的是为了洗刷帕麦斯顿加在他儿子身上的假罪名，即诬指白恩士是那场可耻的和失败的阿富汗战争的主谋，并且也为了清楚地证明，由帕麦斯顿提交给议会的那些轰动一时的亚·白恩士爵士的急电，不仅被歪曲得完全失去了原意，而且实际上是伪造的，里面还插入许多专门为了混淆视听而捏造的文句²⁷⁰。如果不算亚·白恩士爵士的这些文件，那末，一直到现在为止所发表的任何一种文件，大概都没有像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查理·纳皮尔爵士的通信那样严重地败坏了英国政府和把英国国家职务继承权占为已有的那一帮人的声誉。为了给自己恢复名誉，老海军上将不久前发表了这些通信²⁷¹。

在激烈的争论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较之自己的对手具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就是没有那种可能在舆论界更加损害他威信的新揭露材料。正是这个人，公然夸耀他参加了杀害邦迪埃拉兄弟的事件，正是他曾被揭露经常在伦敦邮政总局拆看私人信件，并利用这些信件来为神圣同盟效劳²⁷²，当尼古拉皇帝在英国海岸登陆的时候，他阿谀逢迎地前去亲吻尼古拉皇帝的手；正是他用独特的方法来实行英国新济贫法，使这个本来就厉害的法律变得更为

残酷；最后，仅仅几个月以前，他在挤满了人的议会里枉费心地企图把他自己侮辱不幸的克里斯提上尉的过错推到累亚德先生身上。此人的名声可以说是已确立起来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一种谜一样的东西。他既没有那种可以使帕麦斯顿勋爵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的特殊才能，也没有那种可以使约翰·罗素勋爵不要特殊才能也能过得下去的党内传统威信；然而他却能够在英国国家活动家当中扮演一个显要的角色。揭开这个谜的锁钥不应该到世界史年鉴上去找，而应该到“笨拙”杂志中去。在这本颇有教益的杂志里年年都有一幅写生漫画，画上有言简意赅的题词：“罗伯特·皮尔爵士手下干脏活的小孩”。罗伯特·皮尔爵士虽然不是一个伟人，却是一个正派人物，然而他首先是英国的国家活动家，政党的领袖；地位责成他去干脏活，但他是很不愿意干的。正因为如此，詹姆斯爵士便成了他真正的求之不得的宝贝，正因为如此，詹姆斯爵士便成了一个完全必要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查理·纳皮尔爵士的一家人，无论按他们的天分或他们的古怪性情来说，都同样是与众不同的。在现代温和的人们当中，纳皮尔兄弟使人产生一种仿佛他们是某个原始部落的代表的印象，他们的天分使他们掌握了文明的成果，但是并没有使他们拜倒在文明的陈规俗套面前，并没有使他们拘泥于它的礼节和屈从于它的纪律。一方面纳皮尔兄弟始终忠实地为英国人民服务，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经常同自己的政府争吵，并且起来反对它。一方面他们具有荷马笔下的人物的优点，可是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这些人物的好说大话的特性。

我们举已故将军查理·纳皮尔爵士为例。他无疑是马尔波罗时代以来英国的一个最有才能的军人，但是，他在同东印度公司

的讼争中（他死后这场讼争由他的家族来继续）出了大名，这种名气并不亚于他占领信德省²⁷³时的名声。再拿一个将军威·纳皮尔爵士来说，他是英国的第一流军事著作家，但是，他和英国军事部门经常的争吵也是相当有名的；他很少考虑到自己同胞的狭隘偏见，以致他的著名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²⁷⁴被英国批评界一致辱骂为“关于这次战争所未有过的一份最好的法国报告”。詹·格莱安爵士的对手，老海军上将纳皮尔也是由于他取消了自己上司的命令而著名。至于谈到纳皮尔一家的最后这位强壮的子孙，那末詹·格莱安爵士只是觉得，他就像夹蟒蛇一样地夹住了纳皮尔；然而夹蟒蛇的铁环检查起来不过是一圈普通的蜘蛛网而已。

作为海军首席大臣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查理·纳皮尔回到英国后免去了他的司令职务。他在下院指出纳皮尔要对在波罗的海的失败负责，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从纳皮尔的私人信件中引证了几处。格莱安指责纳皮尔避不执行他从海军部接到的独创性的命令。他希望将来任何一位海军大臣都要慎重行事，不要让查理·纳皮尔爵士的旗帜升起；他还在受他影响的报纸上嘲笑纳皮尔，称他为“好战的查理”，把纳皮尔譬喻成神话中的法兰西国王，“带着2万名兵士攀登一座小山，然后又下山回来”。查理爵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

“曾要求调查他的行动，他遭到了拒绝；他向内阁申诉，但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最后他向下院呼吁。他被拒绝的借口是，讨论有关案件的文件可能危害女王陛下的舰队”。

在炮击斯维阿波尔格以后，这个理由当然不成立了。

詹姆斯爵士相信他的阴谋一定会得逞，因此为了防范起见，他在所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损害他自己的名誉和恢复他所挑选的

牺牲品的名誉的信件上都做了“私人的”[《private》]记号。至于“私人的”这个神圣的字眼的含义，那末詹姆斯爵士本人在向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声称，当不列颠海军首席大臣有充分理由认为必须把官方的指示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甚至对议会保密时，他通常在这些文件上打上“私人的”记号。对于詹姆斯爵士这种认为自己有权公开私人通信的人说来，把官方文件变为私人财产是完全自然的事。但是，这一次他却打错算盘了。查理·纳皮尔爵士大胆地打破了“私人的指示”的束缚，他可能使自己遭到从英国海军军官正式名册中除名的危险，而且还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失去重新升起自己旗帜的权利；但同时，他不仅阻碍了詹姆斯爵士在海军部继续担任职务，而且向英国人民指出，他们的舰队同他们的军队一样腐败透顶了。当克里木战局使不列颠军队失去它昔日的荣誉的时候，ancien régime（旧制度）的维护者们婉言拒绝承认自己的过错，说什么英国从来也没有妄想成为头等军事强国。然而他们却不敢断言，大不列颠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军强国的要求。战争使民族经受考验——这是战争的补偿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作出了最后的判决。

詹姆斯·格莱安和海军上将纳皮尔的通信包括从1854年2月24日到11月6日这段时期，由于它的数量很大，不可能全部拿来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所以只能加以归纳，摘要发表。在8月底以前，大家知道，波罗的海的航行季节结束，一切都相当顺利，虽然在远征一开始查理·纳皮尔爵士就已经向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海军部发给用以装备和补充北海舰队的经费对完成预定的目的是不够

用的，不能为迎击俄军制造有利条件。”

在整个这一时期内，詹姆斯爵士在自己的信中除了表示对自己的“亲爱的查理爵士”的赏识以外，什么也没有表示。3月12日他“祝贺”他的舰队“十分有次序地”驶离英国海岸；4月5日他“对他的向前推进表示满意”；4月10日他“非常满意他的行动”；6月20日他称纳皮尔为“无与伦比的舰队司令”；7月4日他“确信查理爵士将会做出一个人所能够做出的一切事情”。8月22日他“衷心地祝贺他在博马尔松德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而在8月25日他以一种充满诗意的喜悦心情写道：

“我十分满意您的行动，我对您的预见和您的正确思想得到了证明表示钦佩。”

整个这段时间詹姆斯爵士只担心查理爵士

“由于热切地追求树立伟大的功勋和满足迫不及待的人们的野心，会受到一时冲动的影 响，会忘记履行一个最崇高的义务——在精神上有勇气去做你所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不怕受到对不正确的行动的指责”。

早在1854年5月1日，他就在给查理爵士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斯维阿波尔格也好，喀琅施塔得也好，从海上是几乎无法攻下的，特别是斯维阿波尔格，只有大量的军队才能从陆地上顺利地攻击俄国很容易地在直接通往首都的要冲集中的那些兵力。”

6月12日查理爵士写信告诉他：

“经过反复仔细考虑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海军上将查兹也同意这个结论）：占领斯维阿波尔格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装备大量的炮艇。”——

詹姆斯爵士于7月11日给他的回答是：

“有5万人和200艘炮艇，您就很可能在9月底以前获得巨大的和决定

性的胜利。”

但是冬天一到，法国军队和舰队就开回去了，而秋分前后的强大风暴已经开始掀起波罗的海的巨浪，从查理爵士那儿收到了这样的报告：

“我们军舰上的锚链已经开始断裂，‘苍龙号’只剩下一个锚，‘女王号’和‘妖龙号’在昨天深夜也都失去了一个锚；‘女巫号’不得不在雾中抛锚，夜间在纳尔根附近起锚后，又在廉斯卡尔灯塔附近抛了锚，因为风把它吹到暗礁上去了；‘埃弗里阿尔号’触了暗礁，幸好没有沉没。”

这时詹姆斯爵士突然发现，“打仗不能不冒险，不能没有危险”，因此，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艘炮艇和一艘白炮艇，斯维阿波尔格也应该拿下来！的确，我们只能重复老海军上将的话：“假如俄国皇帝是海军首席大臣，他也可能会写出这样的信。”

从这些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海军部里，正如在陆军部里一样，也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詹姆斯爵士同意纳皮尔经过贝耳特向前推进，但是内阁对这一点抱否定态度。在8月间，詹姆斯爵士写信给纳皮尔，要他预先作好离开波罗的海的准备，然而内阁在这个时候却拍给他一个内容相反的电报。詹姆斯爵士对尼耶尔将军的报告有一种看法，而内阁对它却有另一种看法。但是这些通信中最有趣的东西，看来是它们对英法同盟所作的新的说明。法国海军上将把8月13日召回法国军队的命令告诉了查理爵士。法国军队在9月4日启程，而法国舰队的剩余部分也在9月19日启航了。然而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却向查理爵士肯定地说，他只是在9月25日才得知法军离开的消息。因此詹姆斯爵士错误地认为，“这个决定是在取得纳皮尔同意后就地通过的”，但是，正如他强调指出的，“没有向英国政府征求任何意见”。另一方面，尼

耶尔，法国工程部队的将军和路易·波拿巴的密友，仿佛曾经建议过“用战列舰在两小时内击毁斯维阿波尔格”。由此可见，他想促使英国舰队采取盲目攻击，使英军一无所获地在暗礁和俄军的防御工事上碰得头破血流。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9 月 8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9 月 2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02 号

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²⁷⁵

伦敦 9 月 11 日。昨晚 9 时，圣詹姆斯公园和伦敦塔²⁷⁶的炮声向伦敦宣告了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消息。使利塞乌姆、草市和阿德菲剧院的经理们满意的是，这次欢呼“万岁”和高唱《God save the Queen》（“上帝保佑女王”）和《Partant pour la Syrie》（“出征叙利亚”）的赞歌，终于不是像从前那样是由虚假的报道所引起，而是由官方的快报所引起的。

克里木战局终于到了一个转折点。近一星期以来，俄国人在电讯中不得不报道说，联军的火力使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受到很大的破坏，被破坏的地方已“尽可能地”、因而也就是说不是完全地得到修复。昨天我们又得悉，9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联军强攻四个棱堡。联军在攻打一个棱堡时被击退了；有两个棱堡被联军攻占，但其中的一个又不得不放弃；最后，在第四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位于马拉霍夫冈上的一个棱堡（科尔尼洛夫棱堡）上，联军巩固下来了。正是这一棱堡的失守迫使俄军破坏和放弃了南区。^①

① 在弗·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没有这一句话，而有以下一段话：“这一地点的失守，迫使俄军于 9 月 9 日把部队由南区撤至北区，从而放弃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区。临撤走前，俄军炸毁了仓库和建筑物，用炸药破坏了防

黑河会战后大量增援部队的开到，使联军将领不致受到因克尔芒附近俄军的任何进攻的威胁；即使俄军把第四师和第六师剩下的一部分兵力以及两个掷弹兵师都调上来，联军也仍然能够成功地抵抗俄军所能调过黑河来的任何数量的部队，同时还能分派出足够强大的兵力来继续围攻甚至实行强攻。应当承认，法国政府这次异常迅速地调运了部队，用它们同俄国从波兰和沃伦调来的、现在已在行军途中的增援部队相对抗。7月初以来被派往东方的法军，已不下5万人。在这种条件下，由于调到前面的英、法臼炮队有效的行动，联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把堑壕挖到了护城壕边。至于堑壕已挖得多远以及是否已 *secundum artem* (完全按学术规则) 围绕斜堤挖好工事，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对市区的轰击日益带有正规炮击的性质；联军成功地采用了曲射，使俄军在火力控制的区域内无法配置大部队。最后，接到了强攻命令。

在马美朗，俄军在春季构筑了许多带有横墙和避弹所(它们既不怕火烧，也不怕炮击)的独立工事。这些工事は他们的良好的掩蔽所，但是在强攻时发现，它们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集中为防守工事所必需的部队。仅由小群兵士防守的工事一个接一个地落到法军手里，并立即被法军用来配置自己的部队。在构筑马拉霍夫冈上的防御工事时，显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俄军对工事的构造过于热心了，以致法军一攻占该冈的制高点后，就能利用俄军的工事来防避俄军的火力。由于俄军的大凸角堡(第三棱堡)和军港小凸角堡(第一棱堡)设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不能像在

御工事，使它们再不堪使用，并且，用佩利西埃将军的话来说，俄军使整个地区变成了一座烈火熊熊的大火炉；俄军还烧毁了自己的蒸汽舰，凿沉了剩下的军舰，最后，还破坏了巴甫洛夫炮台附近的桥梁。”——编者注

马拉霍夫冈上那样构筑梯阶配置的复杂工事。显然，这里在棱堡内筑有将棱堡的突角隔成两部分的普通二重堡，因此从二重堡能够以猛烈的火力射击突角的内部。由于这一点，防守棱堡的部队就能够更安全地集中在棱堡的深处，而工事的内部，则可以用从二重堡出击的方法来防守。由于俄军按这种场合通常采用的筑城法构筑了工事，因而成横队进攻的英军以及成纵队向这些阵地进攻的法军，能够容易地越过几乎完全被放弃了的外部的垒墙，但是在二重堡跟前就不得不在弹雨下退却和放弃强攻了。

攻占马拉霍夫冈后，法军左翼的德·萨尔将军就立刻试图攻占中央棱堡（即马奇塔棱堡和卡兰亭棱堡之间的第五棱堡），但是被击退了。我们不知道，这次攻击是他个人主动发起的，还是总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也不知道，法军的堑壕是否已经挖到了离棱堡足够近的地方，以致能够证明这次大胆的尝试是正确的。

马拉霍夫冈的攻占，是围攻过程的一个转折点。^①马拉霍夫冈完全瞰制着军港区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市区所在的高地的东坡。它从背后威胁着大湾南岸的岸防炮台，并且使俄国军舰不可能防守整个内港以及外港的大部分。由于马拉霍夫冈被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防线就恰好在整个防御安危所系的那个地点上被突破了。因此，马拉霍夫冈的失守，就意味着军港区被占领，市区毁于炮击，马奇塔棱堡从翼侧和后方被攻占以及坚守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机会已不复存在。在这以前，塞瓦斯托波尔和一切现代的大要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后面还有一段话：“根据这次引人注目的围攻战中所发生的事件来看，完全有理由认为，法军只要好好地执行任务，就根本没有从新阵地上被赶走的风险。”——编者注

塞一样，一直是一支庞大军队的营垒。马拉霍夫冈失守后，它就只起着北区守军的普通桥头堡、而且是没有桥的桥头堡的作用。^①港内的几艘俄国军舰已经被联军炮弹击毁。法军在马拉霍夫冈架设火炮，就使残存的俄国船舰根本再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停泊场所，如果不算紧靠着尼古拉也夫炮台和亚历山大罗夫炮台的那一块地方的话（在那里也只能停泊很少的船舰）。这就是俄军沉没和烧毁自己的战列舰和蒸汽舰的原因。联军完全占领军港区后，就可以开始野战。虽然，由于军港区遭到北区的炮击，联军不能在该地配置大量火炮和大的兵力，但他们还是使俄军至少丧失了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半地区（与9月8日以前的情况相比），而俄军手中还保存着的，是一个只能容纳有限兵力的要塞。守军不仅完全失去了进攻的力量，而且他们的防御能力也显著地削弱了。联军只需用比过去少得多的兵力继续围攻，而腾出来的兵力，加上目前正在途中的以及在马斯拉克兵营的部队，将能够用来向叶夫帕托利亚远征。我们对于联军和俄军在黑河的阵地研究得愈多，就愈相信，目前任何一方如果不预先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和付出巨大的代价，就不能把对方从这些阵地上赶走。因此，在联军兵营中日益普遍地流传着一种意见，即认为有必要向叶夫帕托利亚派出6—7万人，以便从该地开始进攻辛费罗波尔附近的俄军交通线。这样就能迫使俄军在开阔地接战，而开阔地战斗的胜利，从现有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后面还有一段话：“因此，放弃市区是正确的决定。诚然，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在马拉霍夫冈的后坡上已构筑新的工事，以便在该冈失守时还能继续防守军港区。但是，这些工事显然不够坚固，因此哥尔查科夫公爵不能继续在这里进行防御。大概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工事。”——编者注

条件来看，显然是属于联军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联军能否以必要的速度和毅力来利用这一时机。^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9 月 11 日左右
载于 1855 年 9 月 14 日“新奥得报”第 429 号，并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9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0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最后这两句话，而有以下几段话：“假定俄军在克里木有 20 万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末，防守北区各堡垒需要 8 万人，防守黑河的阵地需要 6 万人，对付叶夫帕托利亚的联军需要 6 万人。根据联军目前的士气，可以肯定，在人数相等和阵地同样有利的情况下，联军能打败俄军；既然联军切断俄军交通线后，就可以迫使俄军应战，那末采取这一步骤显然是丝毫不冒险的。况且，俄军所能调来对付这一支远征军的兵力，很可能最多 6 万人。然而，联军采取这一机动愈早就愈有利，如果他们行动坚决，就能收到很大的效果。现在他们在士气和数量方面占着优势，我们并不怀疑，在台地的又一个冬天使他们的人数减少和士气受挫之前，他们会利用这两方面的优势。

果然，据最近的消息称，在 9 月 13 日前，已经向叶夫帕托利亚派出了 25000 人；我们一定很快就会知道，随后派出的还将有更大的一批兵力。暂时我们还只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极简短的电讯，等收到更充分、更详细的信息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题目。”（最后两段是“论坛报”编者加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 奥康瑙尔的葬礼

伦敦 9 月 11 日。宪章派领袖奥康瑙尔的葬礼在昨天下午举行。大约有两万人参加了送殡行列，他们几乎全都是工人。送殡行列从芬斯贝里方场和斯密斯菲尔德出发，向停放灵柩的诺亭山行进，然后再把灵柩护送到肯萨尔—格林公墓（伦敦最美丽的公墓之一）。

送殡马车走在行列的最前面，每辆马车套着四匹马，按照英国的风俗在马头上饰有一束大缨球。马车后面是旗手。黑色的旗帜上镶着白色的字：《He lived and died for us》（“他为我们而生，也为我们而死”）。在一面鲜红的大旗上显现出《Alliance des peuples》（“民族同盟”）的字样。在先头旗帜的旗杆尖端微微摆动着一顶象征自由的红色尖顶帽²⁷⁷。在门前有圆柱的美丽的公墓小教堂里举行了祭祷以后，威廉·琼斯发表了纪念死者的临葬悼词。最后，葬仪在圣歌声中结束。大示威的一切特征都具备了；只是不够尖锐，因为厄内斯特·琼斯由于妻子病重不能前来出席和发表演说。当参加葬礼的人在傍晚五时半左右回到城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五队警察；人群以一种讽刺的得意的口吻叫喊《too late》（“太迟了”）来欢送他们。由于奥康瑙尔死时非常穷困，他是由伦敦工人阶级集资安葬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9 月 11 日

载于 1855 年 9 月 15 日

“新奥得报”第 43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争的前景

“亚美利加号”轮船带来的报纸，我们已很仔细地阅读过，其中除了一份不完全的英军军官伤亡名单外，几乎找不到一点材料可以补充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导致塞瓦斯托波尔南区陷落的情况。固然，这些报纸发表了不少意见，说明了哥尔查科夫从防守得如此长久、如此坚决的阵地突然撤退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这些意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报驻伦敦的和驻巴黎的记者的看法。但是尽管他们的立场不同，对有些观点和见解却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应有的重视。²⁷⁸

克里木事件现在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迫使俄军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原因。十分明显，这个突然的决定决不是出于纯战略或战术的考虑。如果哥尔查科夫认为南区甚至军港区在马拉霍夫冈失守后不可能守住，他就不会在这一带郊区构筑那样多的内围防御工事。虽然，可以认为这个制高点的攻占就已经保证了围攻的最后胜利，但是，如果俄军首先顽强地防守郊区的内围防御工事，然后顽强地防守市区，那末该城的失守仍然可以再推迟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根据最好的地图、平面图和略图来判断，以及从纯战术或战略观点来看，都没有任何必要这样仓卒地退出至今仍在坚守着的阵地。用纯军事理由是不能解释这一

步骤的,就像不能用意外的惨败所引起的惊慌和恐惧来解释它一样。看来,另外性质的一些情况促使哥尔查科夫采取了这个如此严重地损害他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他的整个前途的步骤。

只可能有两种解释。或者是俄军的士气已沮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可能恢复起码的秩序和继续防守内围防线;或者是不仅在塞瓦斯托波尔,而且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外的兵营中都已经开始感到粮食不足。从沃耳特尼察会战和切塔特会战开始,到黑河会战和9月8日强攻为止,俄军几乎连续不断地遭到失败,这不可能不挫伤塞瓦斯托波尔守军的士气,何况他们基本上又是在多瑙河和随后在因克尔芒吃过败仗的那些部队。俄国人不是很容易冲动的,他们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军队更能经得起失败;但是,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受到一个又一个敌人的打击时,除了采取顽强的和长时间的抵抗这样的消极办法以外,除了进行像6月18日会战那样唯一的一次成功的积极防御战以外,再没有什么可用来对付这一连串的失败,那它是不能无限制地支持下去的。在被围的要塞中进行的这种抵抗,时间一久,自然就会起一种使士气沮丧的作用。随着这种抵抗而来的是生活艰苦的考验、休息的不足以及疾病和危险——不是那种锻炼斗志的急性病似的危险,而是那种最后必然使斗志低落的慢性病似的危险。在黑河和马拉霍夫冈接踵而来的失败,必然使士气完全沮丧,而哥尔查科夫在市区内的部队,大概确已不能用来同敌人作积极的斗争了。既然马拉霍夫冈遏制着通往另一区的桥梁,这座桥梁随时都可能被法军炮火击毁,而获得援助又是不可能的,那末退却至少还能挽救部队。守备部队终于发生了士气沮丧的现象,这是丝毫不奇怪的;但奇怪的是,它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发生。

现在还有各种征候表明，哥尔查科夫公爵突然退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整个军队的粮食不足。俄军在阿速夫海的航运的中断，虽然没有像当时那么急于报道胜利消息的英法报纸所期待的那样，立刻表现出它的影响，但一定还是给俄军带来了很大困难，因为他们只剩下一条作战线，输送的物资也因此而减少了。从赫尔松经过人烟稀少的草原运送粮秣和弹药，本来就很难，当这一条路线成为军队唯一的供应线以后，困难就更大。在乌克兰和顿河军区征集来的运输工具已逐渐损坏；大量的马匹和犍牛由于劳累过度和饲料不足而倒毙；随着附近各省物力的枯竭，必要的储备物资的征集已日益困难。显然，最先受到供应间断的影响的，与其说是塞瓦斯托波尔（那里为了防备北区也被封锁，自然储存了各种物资），不如说是因克尔芒兵营、巴赫契萨赖和增援部队所经过的各个地点。联军统帅部的公报已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俄军供应不足的情形，而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同样地证实了这一点。只有用俄军无法保证目前在克里木的部队的粮食这一原因，才能解释，为什么在途中耽搁那么久而现在据说已到达皮列柯普的两个掷弹兵师，没有被允许继续前进和参加黑河会战；用同样的理由也能解释，为什么尽管在开去支援塞瓦斯托波尔的大部分军队还没有到达，俄军仍然决定用兵力过少、不足以完成既定任务的现有部队来进行这一会战。

可见，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即俄军大部分部队的士气沮丧和野战部队的粮食不足使得哥尔查科夫对于暂时延迟退出已经无法守住的要塞的做法，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哥尔查科夫利用最后的机会挽救了守备部队，看来他是做对了。如果不这样做，那末从一切情况来看，他都只好丢下守备部队不管，而集合自己的野战部队，退到克里木腹地去，假如不是一直退到皮

列柯普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南区的守备部队很快就会被迫偷渡到北区或投降；而北区的守备部队在失去一切换防的希望和士气沮丧的情况下，也会迫于饥饿而投降。

只要俄军还有希望不仅能在克里木保持与联军人数大致相等的兵力，而且还能得到增援部队以造成很大的数量优势，那末塞瓦斯托波尔北区就仍然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阵地。用守备部队的兵力坚守北区，同时用野战部队占领我们从最近的报道中所知道的那些阵地，就意味着把联军兵力牵制在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台地。这还意味着阻止联军军舰进入塞瓦斯托波尔湾，并使它不可能在比博斯普鲁斯海峡更近的地方找到一处合适的海军作战基地，因为无论卡梅什或巴拉克拉瓦在这方面都是不合适的。只要俄军还能够在克里木进行野战，那末，正像马拉霍夫冈曾经是南区的锁钥一样，北区就同样是整个克里木的锁钥，它决定着克里木在陆战和海战中的意义。但是，如果俄军不能进行野战，那末北区也就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了。当然，它是相当坚固的筑垒阵地，但是，如果用足够的兵力对它进行正规围攻，那末它势必失守，因为它无从得到援助。

如果想起，北区曾怎样合理地受到极大的重视，那末上述看法就可能使人感到奇怪了。然而，这个看法却是完全有根据的。目前的战争整个来说给人一种筑城战和围攻战的印象，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它似乎使那些由于拿破仑的迅速机动而取得的军事学术上的成就化为乌有，使军事学术又回到了七年战争的水平。实际上却恰好相反。现在，要塞和要塞群的作用，只是作为野战部队在机动过程中所依托的据点。例如，卡拉法特营垒是奥美尔—帕沙借以威胁俄军翼侧的桥头堡；锡利斯特里亚、鲁舒克、瓦尔那和苏姆

拉可以说是一个大营垒的四个突角，奥美尔—帕沙随时可以退到这个大营垒中去，而敌人如果不把四个突角中的至少两个夺下来或封锁住，就无法跟踪追击。而塞瓦斯托波尔则是俄军在克里木的一个据点。每当俄军在数量上少于敌军或在其他方面受到威胁时，塞瓦斯托波尔就能给它喘息的机会，以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对联军来说，塞瓦斯托波尔是必须摧毁的俄国舰队基地，又是必须攻占的海军作战基地；对俄军来说，有塞瓦斯托波尔，就等于有克里木，因为它是能够用比敌人少得多的兵力坚守待援的唯一阵地。可见，最后的胜负总是由野战部队来决定的，而要塞的作用并不是取决于它们天然的或人工赋予的威力，即它们本身固有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们所能给予野战部队以掩护和支援 (appui) 的程度。它们的价值是相对的。它们已不是战争中的独立因素，而只不过是有一些有利的阵地，这些阵地有时应当用一切手段坚守到底，而有时则不必如此。塞瓦斯托波尔战局比其他任何战局都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塞瓦斯托波尔和所有真正的现代要塞一样，起着—个有永备工事掩护的营垒的作用。当现有的兵力还足以防守这种营垒的时候，当补给品尚不缺乏而要塞与主要的作战基地的联络又还可靠的时候，特别是当这种营垒尚为强大的守备部队所扼守，而敌人不冒险就不可能绕过它的时候，这个营垒就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能够打乱敌人在整个作战期间的计划。但是，当所有这些条件已不再存在的时候，当守军一次又一次地被挫败，他们储备的粮食快用完，他们与自己基地的联络有被切断的危险，他们有可能遭到 1805 年乌尔姆会战中奥军的命运²⁷⁹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的，当然不是阵地的抽象价值，而是军队的安全，这时，军队应当尽快地退到另一道比较有利的防线上。

看来，俄军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原有的作战军队的大部分——24个师中的14个师——已经投入战斗，并且其中有一部分在克里木已经被消灭，而他们现有的预备部队、非常后备军和其他新编的部队则根本不能同已经损失的部队相比。俄国人如果今后不再向这个危险的半岛派遣部队，并且尽快地放弃这个半岛，那就做对了。联军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士气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哥尔查科夫用现有的兵力在要塞以外应战，则势必败北。联军沿克里木南部海岸和萨耳吉尔河谷或者在叶夫帕托利亚附近都可以迂回哥尔查科夫。在这两科场合，他和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交通线都会被切断，而且没有任何恢复的希望，因为联军在数量上的优势正日益增大。看来，哥尔查科夫现在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可能坚守战线，以便作好炸毁北部工事的准备，然后比敌人抢先一两天的行程。他到达皮列柯普的时间愈早愈好。据我们从巴黎方面获得的消息称，似乎联军在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后已立即派兵前往叶夫帕托利亚，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那末形势更是如此。如果联军在这个方向上或者在南部海岸和查特尔山的山道上采取相当坚决的行动，那末战局很快就会结束，克里木就将落入联军之手。按我们所能判断的，联军现在可能犯的唯一错误，就是向因克尔芒附近的俄军阵地进行认真的正面攻击，或者在一星期内按兵不动。明晚将驶抵本地的下一艘轮船，大概会带来关于联军最近的意图的确实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9月14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10月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50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克里木事件

伦敦 9 月 14 日。“钟声当当，炮声隆隆”——目前整个英国就处在这样的气氛中。到处一片欢呼声，每一幢稍能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无论公共建筑物也好，私人建筑物也好，都飘扬着英国和法国的国旗。曼彻斯特的情况和伦敦一样，尽管存在着“曼彻斯特学派”，爱丁堡的情况也和曼彻斯特一样，尽管存在着苏格兰哲学。现在什么东西都不能消除这种普遍的因胜利而陶醉的现象，甚至大批阵亡者的名单用电报拍到伦敦来也无济于事。只有英军在大凸角堡遭到失败而法军却占领了重要据点马拉霍夫冈这样一个**对照**才使胜利的欢呼声低沉下来，才略为抑止了一下自夸的情绪。过去由于不加批判地把现代社会制度和古代社会制度以及把许多其他东西混淆在一起而产生了一种偏见，即认为工业和商业似乎会消灭人民的好战性格，凡是同意这种旧偏见的人，现在在英国，甚至在英国工业首府曼彻斯特，也会相信相反的看法了。问题非常简单。在现代世界，即使不是每一个人的财富，无论如何也是国民财富是随着**劳动**的增加而增加的，而在古希腊罗马，民族愈是**游手好闲**，财富愈是增加。苏格兰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以前的十年内就发表过卓越的著作²⁸⁰，发现并发展了这个原理。

同时，群众的热情要在新的电讯中寻找养料，那是徒劳无益

的。它们是那样的贫乏，而最初却是那样的丰富。佩利西埃写道：在塞瓦斯托波尔，*《matériel immense》*（“大批财物”）落到了联军手里。据我们推测，落到它们手里的是许多旧铁，而这些旧铁很快就会不值钱的。

事件现在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迫使俄军如此突然地放弃南区的原因。十分明显，这个决定决不是出于纯战术或战略的考虑。如果哥尔查科夫认为，在马拉霍夫冈失守后，必然要放弃军港区和市区，那末难道他会在这一带郊区构筑那样多的内围防御工事吗？尽管马拉霍夫冈是一个重要的阵地，但是如果首先顽强地防守郊区的内围防御工事，然后顽强地防守市区，那末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仍然可以再推迟五、六个星期。根据最好的地图、平面图和略图判断，以及从纯战术或战略观点来看，都没有任何必要这样仓卒地退出至今仍在坚守着的阵地。只可能有两种解释：或者是俄军的士气已沮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适于在市区的内层工事后面再进行抵抗；或者是不仅在城市里，而且在兵营里都已经开始感到粮食不足。最后，也许这两种原因都存在。

从沃耳特尼察会战和切塔特会战开始，到黑河会战和9月8日强攻为止，俄军几乎连续不断地遭到失败，这不可能不影响到被围部队的士气，何况他们大部分人都亲眼看到在多瑙河和因克尔芒打了败仗。俄国人固然不是很容易冲动的，因此他们比别的军队更能经得起失败。但是一切都有它的限度。在被围困的要塞里进行过于长久的抵抗，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士气沮丧。随着这种情况而来的是生活艰苦的考验、困难、休息的不足以及疾病和危险——不是那种锻炼斗志的急性病似的危险，而是那种使斗志低落的慢性病似的危险。在黑河上打了败仗（去支援守军的那部

分军队中有半数、恰好也就是本来应当去解救南区的那部分增援部队是在这里作战的),以及马拉霍夫冈这个锁钥阵地被占领——这两次失败使军队完全丧失了斗志。既然马拉霍夫冈瞰制着通往另一区的桥梁,这座桥梁随时都可能被法军破坏,任何增援部队的到达都是有问题的,那末退却也就成了拯救军队的唯一办法。至于说到粮食不足,一切迹象表明,缺粮的情况已经开始感觉到了。自从俄军在阿速夫海的航行中断后,他们只剩下一条作战线,运输也就减少了。在只有一条来自赫尔松方面的道路可以通行以后,运送粮食、弹药等等就要通过人烟稀少的草原,因此,本来就很大的困难自然就更为增多。在乌克兰和顿河军区征集来的运输工具已逐渐损坏,而要邻近的本来就被劫掠一空的省份供应新的工具来代替它们,那是越来越困难了。显然,最先受到供应间断的影响的,与其说是有大量储备的塞瓦斯托波尔,不如说是因克尔芒兵营、巴赫契萨赖和增援部队所经过的各个地点。只有这一原因才能解释,为什么在途中耽搁那么久而现在已到达皮列柯普的两个掷弹兵师并没有向前推进和参加黑河会战;用同样的理由也能解释,为什么尽管开去支援的大部分军队还没有到达,俄军仍然决定用兵力过少、不足以完成既定任务的现有部队去进行这一会战。如果这些看法是正确的,那末,哥尔查科夫除了利用马拉霍夫冈的被占领作为挽救他的守军的漂亮借口外,的确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6年9月14日

载于1855年9月18日

“新奥得报”第43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贸易和财政状况

伦敦 9 月 24 日。在目前，不仅是大不列颠的贸易和财政状况，而且特别是法国的贸易和财政状况，几乎像克里木战争一样，吸引着舆论界的注意。大家知道，法兰西银行把国库期票和同它类似的有担保的有价证券的贴现率提高到五厘，而商业票据则按四厘贴现。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非常害怕贵金属从银行的地窖里流失，已决定把商业票据的贴现率也提高到五厘，然而财政大臣却加以干涉，并禁止他们办理这项业务。不言而喻，政府力求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廉价的金融市场和贷款充足的假象，从而使小店铺主维持良好状况。

“曼彻斯特观察家”²⁸¹写道：“最近两年来，对法国财富的贪求是极大的。在两年以内，路易—拿破仑政府消耗了 2 亿英镑；巴黎市政厅把大量借款用来装饰首都；在政府的发起和庇护下制定了需要大量经费才能完成的规划；仅仅 Crédit Mobilier²⁸²就至少创办了六家大公司，每家大公司都提高自己的股票行市，并使它大大高于票面价额；这些公司的资本本来还有待于投进去，可是无数股票却在人们手里转来转去，根本不顾结算日期。政府的财政状况，所有这些企业大部分所带有的纯粹投机性质，法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连年不好的收成对人民群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它对交易所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可能发生足以破坏东方战争的进程和法国的安宁昌盛的灾难。”

上述报纸在谈到**粮食市场**问题时指出：

“毫无疑问，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将成为巨大的粮食进口国家。这里已经向多瑙河地区发出的定货单将促使美国向欧洲运入粮食而不是运入黄金。英国去年的收成比往年好，但是从1854年8月到1855年8月，我们仍然输入了3335000夸特的小麦和1558892公担的面粉，而全年的平均价格仍然高于70先令。今年我们还需要数量更大的进口，以防价格更高的上升。如果不从北美输入，那末从哪里输入呢？德国北部的收成也比平常低，因此美国把面粉运到波罗的海地区，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通常可以从那里进口大量的粮食。根据奥地利政府的通报，奥地利的年景一般，然而它能否有多余的粮食输出，是值得怀疑的，而整个意大利南部严重缺粮，即使从黑海各港口输出粮食也仍然像过去那样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法国在购买粮食时不仅要同英国竞争，而且要同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竞争。这种情况是够使法国政府伤脑筋的了。‘通报’上的一篇半自我安慰、半教训别人的文章在这方面作了最好的说明。”

至于“曼彻斯特观察家”上提到的法国的许多新的股份公司，那末正如不久前巴黎出版的“交易所业务”一书²⁸³所指出的，仅仅是**股份银行**这一部门，从二月革命以来，它们的数目仅仅在巴黎就增加了5倍。1848年以前在巴黎只有两家股份银行，革命以后就创办了12家这样的银行。现在有：Banque de France（法兰西银行）、Caisse Commerciale（商业储金局）、Comptoir d'Escompte（贴现银行）、累迪厄公司所属合资公司银行、Crédit Foncier de France（法兰西土地信贷公司）、马提尼克银行、Banque de Guadeloupe（瓜德罗普银行）、Banque de l'île de la Réunion（留尼汪岛银行）、阿尔及利亚银行、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aritime（海洋信贷总公司）、Caisse et journal des chemins de fer（铁路信贷寄托银行）、Comptoir central（中央贸易银行）、Crédit Industriel

(工业信贷公司) 和 Banque de sénégal (塞内加尔银行)。这些银行的已支付的资本一共只有 15123 万法郎，它们的银行总资本也只有 25248 万法郎，或 1000 万英镑左右——这个数目不及英格兰银行一家的资本。

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写道：“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例如，拥有资本 9125 万法郎的法兰西银行发行了 542589300 法郎的银行券，即超过资本 5 倍多。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有权发行比它的资本多 9 倍的债券。Crédit Foncier de France (法兰西土地信贷公司) 的名义资本只有 3000 万法郎，却发行了为数 2 亿法郎的债券。因此，可以预料，数目这样大的债券所引起的混乱或贬值，一定会在巴黎和法国造成严重的灾难。”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9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5 年 9 月 28 日
“新奥得报”第 453 号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俄国的抵抗力量²⁸⁴

俄国沙皇驾临敖德萨，皇后由彼得堡搬到神圣俄罗斯的心脏——莫斯科，国事暂时交给沙皇最好战的弟弟康斯坦丁，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俄国充满了进行最顽强的抵抗的决心。尼古拉也夫和赫尔松，南俄罗斯的最坚固的两个据点，已经成了目前在塔夫利达省和赫尔松省编成的预备部队的集中地。除了人数无法准确估计的预备部队（即各团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营）以外，在尼古拉也夫大概集中了约4万非常后备军，同时在敖德萨还大约有25000人。现在还不能断定这些材料的准确程度。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南俄罗斯大量的兵力正在集中。

俄军的**战略计划**不仅估计到克里木失守的可能性，甚至还估计到敌人侵入南俄罗斯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把主要防线选择在德涅泊河一线，而把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作为第一线作战基地，把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作为第二线作战基地的原因。由于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位于炮舰甚至轻巡航舰的活动范围之内，因此还必需有一个在内地的基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正是这样的基地。它位于德涅泊河约成75度角的弯曲部，对于退向腹地的军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中心地点，因为在这里能指望首先在德涅泊河下游（即由东北流向西南的一段）、然后在中游（即由西北流向东南的

一段)地区得到掩蔽。从皮列柯普向俄国腹地进攻的军队,首先必须在赫尔松附近强渡德涅泊河,然后向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推进,在该城附近再次强渡德涅泊河。沿德涅泊河左岸前进的任何一支部队,都容易被阻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以南数英里的沃耳契亚河一线(该河在这里流入德涅泊河)。此外还有另一些有利的条件: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以南的整个地区是一片长达 200 英里的大草原,在这里,无论军队的调动或供给都是同样困难的,而位于草原北端的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则靠近富庶的和人口比较稠密的基辅省和波尔塔瓦省,因而不难得到必要数量的粮食。最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能保证与基辅附近中央地区的部队的联络,并能掩护通往莫斯科的道路。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构筑了工事并储备了南方军队所需要的一切补给品。在这里集中着大量的粮食、被服和弹药。所有这些,如果一方面能说明俄军具有战略远见,——那位老将军和逃兵若米尼总算没有白白地长期教导了他们,——那末,另一方面又同样表明,俄军认为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假如联军从皮列柯普向俄国腹地前进,当然就需要攻占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但是,在今年的战局条件下根本谈不到这样的进攻,而且在 1856 年也未必能举行这样的进攻。因为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使俄国完全退出克里木,退出整个南高加索和高加索(直到捷列克河和库班河一线),需要烧毁敖德萨和破坏尼古拉也夫港,以及肃清加拉兹以下的多瑙河流域的俄军。换句话说,联军即使只考虑向俄国腹地进军的问题,也必须首先夺取俄国所有这些边远地区。由此可见,俄军的有远见的战略计划是一个 *de mauvais augure* (不祥之兆) 的计划。

联军正将兵力调往黑河上游盆地,以便在艾托多尔或者在贝

尔贝克河上游地区迂回俄军的极右翼。哥尔查科夫和佩利西埃的报告对这一点的说法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联军的这一机动具有太明显的佯动性质，因此不会是真正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现在联军的任务，显然是把俄军驱逐出梅肯集高地上的筑垒阵地。假如联军能做到这一点，那末俄军将不得不放弃北堡，并从而放弃整个克里木。在梅肯集高地和辛费罗波尔之间没有一处阵地是联军可以迂回的；在辛费罗波尔的另一面则是一片草原，不适于大部队行动，不能提供任何阵地。俄军能否守住克里木，就要看他们能否守住现有的阵地，尤其是梅肯集高地上的阵地。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9 月 25 日

载于 1855 年 9 月 29 日“新奥得报”第 455 号，并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10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2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将军们的报告。——英国的
法庭。——来自法国的消息

伦敦 9 月 27 日。辛普森、佩利西埃和尼耶尔将军的报告，特别是英国报纸驻克里木记者的信件，包含有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批判的研究要花费时间。因此，关于 9 月 7 日和 8 日的事件，我们只能在下一篇通讯中作比较详细的说明。285 而现在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英国报界几乎一致地、有充分根据地在严厉指责辛普森将军和受他指挥的英国高级军官。在强攻大凸角堡时，完全证实了俄国军队中流传的一句俏皮话的正确，这句俏皮话就是：《L'armée anglaise est une armée des lions, com — mandée par des ânes》（“英国军队是一支受驴子指挥的狮子军队”）。一家伦敦报纸要求成立新的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它忘记英国军队领导上的不中用是陈腐的寡头政治统治的必然后果。一切准备工作从一开始就进行得很糟。英国的堑壕距大凸角堡的堑壕沟还很远（250 码），部队必须用一刻钟以上的时间在敌人的火力下跑过开阔地，因而在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法国工程师们曾及时地提醒英国人注意这个缺点，然而却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下面的回答：

“如果我们再推进几码，那末我们的部队在前进时，就要受到马奇塔棱堡

的纵射火力的射击，因而就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首先，这种遭受损失的危险性要比部队在强攻时所遭到的小得多。此外，还可以局部用构筑横墙和锯齿形堑壕的办法，以及局部用建立反炮垒的办法来削弱纵射火力的效果。然而法国人的一切不同意见在冷酷的辛普森的顽固态度上碰碎了。其次，法军的堑壕很宽阔，不仅能够容纳而且能够掩蔽大量部队，而英军的堑壕却很狭窄，而且挖成这个样子：使得每一个体格比较粗壮的英国人一下子就会引起俄军司令部对他的注意。由于英国军队不得不通过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在到达攻击目标后，他们不是立刻就攻击敌人，而是首先想掩蔽起来，然后再开始步骑枪射击，这样就使得俄军有时间重新集结力量。一切战斗准备做得如此之糟，从下面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英国军队在占领垒墙后，甚至没有想到把那里的俄军大炮铆接起来。在攻击部队里既没有带着必要工具的工人，也没有不要专门工具就能完成这个任务的炮手。但是，最出色的是辛普森将军在强攻前和强攻时所发布的战术性的命令。（我们从“每日新闻”的一篇通讯中知道，在进行强攻时，辛普森患着伤风，裹着一件宽大的带风帽的斗篷坐在马美朗炮台的软椅上。）半年以来，英军对大凸角堡的攻击都被粉碎了，为了攻打这个可怕的大凸角堡，他派遣了 200 人的强攻部队，320 人组成的掩护部队和不到 1000 人的主力部队。英军在占领大凸角堡的凸角以后，就处在变成了内堡的多面堡和位于它后侧的穹窿的猛烈火力之下。如果攻击部队的人数充足的话，英军就能迂回多面堡，这样就能很快地决定战斗的结局。然而增援部队没有到达，虽然温德姆上校三次派人要援兵，要求增援部队迅速开到，而且最后他不得不亲自去寻找他们。部队就这样冒着猛烈的炮火在胸墙上呆了三小时；他们两次深

入工事，都毫无意义地被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掉，最后不得不溃乱撤退。像辛普森所做的那样，以数量不多的兵力进行强攻，起初投入战斗的部队还不到他所指挥的兵力的二十分之一，而后方却保持着战斗所必需的后备力量，由于个人的专横使得勇敢的战士遭受无谓的牺牲——所有这一切，是现代战争史上最大的丑事之一。这种情形要是发生在拿破仑第一时代，辛普森无疑就要被提交军事法庭了。

大陆上对**财产继承法院**的专横作了许多公正的批评。然而**不取报酬的英国审判官**²⁸⁶的裁判权却恰恰是现代化了的、得到宪法掩护的领主裁判权。我们从一家英国地方报纸上逐字逐句地摘录了下面一段引文：

“上星期二，一位年迈的农业工人纳萨涅尔·威廉斯出现在伍斯特的治安法官面前。他被处 5 先令的罚金和 13 先令的费用，因为他在 8 月 26 日星期日割了属于他个人所有的一小块地的小麦。威廉斯证明说，他这样做是必需的，假如他不收割小麦，小麦就要毁掉，他在整个星期内从早到晚为租给他土地的地主忙个不停。但这些话毫无用处。坐着 reverends (牧师) 的法庭是哀求不动的。”

工厂主、乡绅和组成不取报酬的审判官的特权阶层的其他代表所采取的做法，也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处理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牧师一样。

我们从一位居住在巴的英国人 (辉格党人) 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摘录如下一段引文：

“今天 (即 9 月 24 日) 在 ‘立宪主义者报’ 上刊登的一篇好战的文章，看来大大地挫伤了巴黎资产阶级的锐气，我在市内三个不同的地点 (都是重要的商业区) 听到了几乎是用一样的词句表达出来的同样意见：请看吧！差不多有整整一年了，人们对我们说拿下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就马上会开始和平谈判。

现在，塞瓦斯托波尔拿下来了，却又对我们说这纯粹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在没有占领整个克里木以前，就根本不要想和平。情况还会这样继续下去，只有上帝才知道，和平何时来临。这些话都是带着最沮丧的神色说出来的。必须公道地承认，抛开民族威信的问题不谈，由于许多原因目前的战争对法国来说也不是个时候。在秋季的报告中，每下一个周都比上一个周所能预料的情况要坏。例如，目前四磅重的面包在卢昂值 26 苏，而在巴黎值 3 法郎或 60 苏。在波尔多，市政委员会已不得不拨出一大笔钱以便在四磅重的面包的价格提高到 1 法郎（这在吉伦特被认为是饥荒时期的价格）时帮助居民。这种情况正在全国逐渐出现。因此，法国的国内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拥护革命的人在全国到处皆是，一旦贫困变得不可忍受时，他们就能把成千上万的人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之下。重新组织各省总委员会和市政委员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错误，因为这套办法会引起致命的后果。目前在很多省份里根本没有总委员会，而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现在也不得不经常解散自己的市政委员会。几乎每天都能读到这样的官方消息：某个城市的地方长官解散了市政委员会或某某行政官解散了总委员会。原因在这里都没有指明，虽然不允许对这种实际情况作正式的评论，但事实本身却使得有这种情况的省的居民十分激怒。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最好把更有经验和更可靠的兵士派到很多地方去。”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写于 1855 年 9 月 27 日
载于 1855 年 10 月 1 日
“新奥得报”第 45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争的的决定性事件²⁸⁷

现在,根据联军各司令官的正式报告以及欧洲报刊的报道(其中最重要的已在本报发表过),我们已经完全了解9月8日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的胜利总强攻的详情。这些引人注目的报道,当然大家都已读过,没有必要再来重复它们所列举的事实。因此,我们想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强攻得以进行的条件,并说明为什么在这次强攻中,联军在各个地段上的战果会有如此的不同。^①

据尼耶尔将军的报告称,法军在所有地段上的堑壕都掘到了距俄军工事相当近的地方。在基连谷的小凸角堡(第一棱堡)和马拉霍夫冈(第二棱堡)的方向上,对壕的前端距俄军的护城壕不超过25码。在马奇塔棱堡(第四棱堡)的方向上,距离为30码,在中央棱堡(第五棱堡)的方向上则为40码。可见,在所有这些地点,强攻纵队距离他们所要攻击的工事都非常近。可是英军在刚靠近大凸角堡(第三棱堡)有240码远的地方就停止了对壕作业。原因在于英国军队里仍然盛行着那种墨守陈规的作风。英军刚把堑壕掘到这个距离时就发觉,如果再继续前进,俄军就能从马奇塔棱堡

① 本文在“新奥得报”上发表时,没有这一段话,而有以下的一段话:“9月8日动用了法军5个师以及英军2个师的部队。联军自称,在总共约45000人当中,损失了1万人,即将近四分之一。俄军的损失无法确定。”——编者注

对他们进行纵射，因为该棱堡比俄军其他工事要突出得多。而围攻学中有一条总的原则，即堑壕不应当掘进到敌人占领的那一线，因为这会使它们遭到纵射火力的威胁。

如果能够避免用这种错误方法来挖掘堑壕，那当然很好。但在当时无法避免纵射火力的情况下（总的围攻计划和地形特点，不允许预先攻占马奇塔棱堡），挖掘这样的堑壕，无疑比根本不挖掘要好些。其实，理论原则规定了许多防止这种不可避免的弊端的方法。在这种场合，可以构筑横墙和复杂的对壕。据说，法国军事工程师曾经同他们的英国同行们争论过，他们向英国人证明，虽然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挖掘堑壕会损失大量的人员，但是为了完成能保证强攻胜利的作业而遭受这些损失，总比在强攻时遭受这些损失要好，因为如果隐蔽的堑壕不够，强攻能否胜利就很成问题。然而英国工程师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强攻的结果表明，他们的意见是绝对错误的。

法国将军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如下：麦克马洪师面对着锁钥阵地——马拉霍夫冈；拉莫特卢日师在他的右方，面对着联结马拉霍夫冈与第一棱堡的中堤；杜拉克师在最右翼，面对着第一棱堡。由于马拉霍夫冈是一个即使在敌人顽强抵抗下也要坚决攻下的唯一工事，麦克马洪配备了一支预备队——梅利奈近卫师。这就是法军用来强攻军港区的兵力。至于市区方面，由于马奇塔棱堡好像是一个向前突出的坚固的卫城，并且有相当强大的内层工事，所以联军没有打算立即对该棱堡进行正面攻击。但是，勒韦昂师必须强攻中央棱堡，如果得手，还将得到德·奥特马尔师的支援；德·奥特马尔师则奉命绕到马奇塔棱堡的背面，为了同时从正面强攻该棱堡，在堑壕内还集中了皮蒙特的查耳迪尼旅。马

拉霍夫冈和马奇塔棱堡之间的阵地由英军占领。他们负责向大凸角堡攻击。

首先打算强攻马拉霍夫冈，占领它以后，其余的纵队应向各自的目标攻击。马拉霍夫冈是指瞰制周围地区的马拉霍夫冈顶上的一个大多面堡。它是各面闭合的，但在背面有几个大出入口，以便增援部队进入。它的右方和左方各有中堤与大、小凸角堡相连。这两个凸角堡也是各面闭合的多面堡，并附设有作为内堡使用的较小的工事；后面的垒墙上，有用来向多面堡内部射击的射孔，因而形成二重堡。这些二重堡的背面，则由第二道中堤即内层中堤与马拉霍夫冈相连，形成第二道防线。在大、小凸角堡内部，障碍物较少，因而完全能以二重堡和内堡的炮火来控制。但在马拉霍夫冈（敌人在攻占马美朗以后已集中火力向这里射击）则沿垒墙筑有许多中空的横墙，用作炮手和战壕内的兵士的防弹掩蔽所；棱堡内部则筑满了带防弹掩盖的大框舍；框舍是作为营房使用的，完全不适于防御。当攻占马拉霍夫冈的第一批消息传来时，我们就说过，俄军无疑地又犯了在构筑马美朗的堪察加多面堡时所犯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力求避开敌人的火力，把棱堡的内部分成了一些小隔间，这样显然就使棱堡的内部不适于抗击强攻。²⁸⁸现在已经完全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马拉霍夫冈的迷宫和马美朗的迷宫一样，根本不适于防御；它在10分钟内就被攻占，以后就再也没有夺回。

法军对强攻马拉霍夫冈的准备是很出色的。考虑周到，并且一切都有保证。他们为了越过护城壕，曾采用了一种新式桥（我们还没有关于这种桥的说明资料）；用不了一分钟就能把这些桥梁好。强攻一开始，工兵即从自己的堑壕向俄军的护城壕挖掘急造

对壕，在俄军的胸墙中开辟了宽阔的出入口，填平了第二道护城壕，构筑了一条通往马拉霍夫冈多面堡内部的道路，使增援部队、预备队以至野炮都能沿着这条方便的道路推进。在攻占整个多面堡以后，法军迅速封闭了背墙的出入口，开筑了射孔，运来了野炮，几个小时以后，当俄军还没法认真地试图夺回堡垒时，堡垒已完全被用来对付俄军，因此俄军的行动就显得迟缓了。法军炮手还做好了在必要时铆住火炮的准备，步兵在腰带上也挂了轻便的土木工具。

攻击是在佩利西埃元帅和尼耶尔将军的直接监督下进行的。我们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攻击是否也做了这样充分的准备；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攻击，尤其是对中央棱堡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德·萨尔将军显然是以数量不足的兵力强攻中央棱堡的，因为法军刚一接近俄军的胸墙，就不得利用它隐蔽起来。强攻变成了互射，当然也就被击退了。辛普森将军在强攻大凸角堡时，曾力图表明这样的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对小凸角堡的攻击是一场特别激烈的血战！俄军出色地防守了这一阵地，仅仅在这一个地方就击溃了法军 5 个旅。

在前几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不列颠军队的荒谬的战法，根据这种战法，为强攻编成的纵队十分薄弱，因此，只要敌人稍作认真的抵抗，它们就可以说是注定要被消灭的。这种错误，在希腊伦勋爵制定的 6 月 18 日的强攻计划中已暴露得很明显，而辛普森将军显然是决心要超过他的已故的老上司。^① 由于大凸角堡的

① 在“新奥得报”上，没有这一句，而有以下一段话：“英军墨守陈规的原因在于：英国人以前在各地（包括威灵顿在西班牙）攻打过的要塞，主要是按意大利—西班牙的陈旧的体系筑成的，因而只有很少的要塞能容纳 500 名以上的兵士。”

突角已遭到英军炮兵的轰击，辛普森便决定，在马拉霍夫冈完全为法军攻占后，即向这一地点攻击。因此，辛普森将军从第二师和轻装师中抽出一部分兵力组成了强攻队，总共约 1800 人，也就是说只有两个旅的编制的一半！这两个师的其余两个旅被指定为增援部队，第三师和第四师则组成预备队；此外，那里还有一个近卫师和一个苏格兰师，总共 25000 人。而从这些部队中派去担任强攻的，实际上大约只有 1800 人（后来又有 2000 人支援）！而且，这 1800 名兵士与法军不同，法军能从自己的堑壕跳进俄军的护城壕，而他们却需要冒着大凸角堡中堤的侧射火力，通过 250 码的开阔地。英军尸积如山，但还是前进，利用梯子越过了护城壕，冲进了突角，遭到了从大凸角堡后方的战壕和内堡的霰弹和步枪的猛烈射击。于是他们就散开，尽力隐蔽在横墙后面，并且开始与俄军互射，就像法军在攻中央棱堡时一样。如果增援部队和预备队开来，从近距离发起攻击以扩张战果，那末这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可是开来的只是很少的增援部队，而且是一小群一小群地、断断续续地开上来的。指挥强攻纵队的温德姆旅长三次派军官回去，请求派出成正规战斗队形的增援部队，但是没有结果。所有这三名军官在通过平原时都受了伤。最后温德姆亲自回去，劝说科德林顿将军再派出一个团，但这时英军却突然退却，放弃了大凸角堡。俄军调上来的增援部队肃清了大凸角堡内的敌人。这时，手里还有 2 万预备兵员的辛普森老头，竟决定在次日清晨再进行强攻！

英国人一切都讲传统，所以他们的强攻法也成了传统，尽管条件早已改变。例如，腊格伦勋爵在 6 月 18 日就曾仿效威灵顿的老方法，大家都知道，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辛普森不但没有从腊格伦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没有必要仿效他，甚至有必要超过他。”——编者注

英军对大凸角堡进行的这一次可怜的攻击，表明了 in 克里木的英军将领十分无能。显然，他们生来就有一种比赛犯错误的爱好。巴拉克拉瓦会战和因克尔芒会战就是明显的例子。但 6 月 18 日和 9 月 8 日的强攻在这方面还大大地超过了它们。强攻组织得这样草率，以致当英军控制住大凸角堡的突角时，竟然没有把火炮铆住，因而当他们退却时，就和进攻时一样，又遭到这些火炮的霰弹和榴霰弹的猛烈轰击。英军是否曾企图占领适当的战壕，我们不知道；辛普森和各报的记者都没有提到这一点。看来连最必要的预防措施也没有采取。

诚然，对大凸角堡、中央棱堡和小凸角堡的攻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过是一种佯攻。然而对大凸角堡的攻击也还有一定的独立的意义。占领这一阵地，能立即使攻占马拉霍夫冈成为定局，因为马拉霍夫冈由于地势高而瞰制着大凸角堡，而大凸角堡又瞰制着马拉霍夫冈的接近地，攻占大凸角堡，就意味着从翼侧包围俄军为了夺回马拉霍夫冈而向该地派出的一切纵队。占领马拉霍夫冈，总使俄军放弃了整个南区；攻占大凸角堡，也许至少能迫使俄军仓卒撤离军港区，并且使俄军来不及用射击和爆破的方法进行有效的系统的破坏工作，而现在却正是这种破坏工作保证了俄军安全的撤退。因而，英军在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未能完成他们的盟军有权期待他们完成的任务。不仅将军不称职，而且兵士也表现得不如往常。兵士大多数是不久前来到克里木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千方百计地想隐蔽起来进行互射，而不去进行白刃战。他们的队伍缺乏纪律和秩序；不同的团队混在一起，军官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几分钟以后，整个机器就失灵了。但是应当承认，尽管如此，英军在没有增援部队的情况下，仍在大凸角堡支持了将

近两小时，进行了顽强的消极抵抗；可是，我们到底不习惯看到，英国步兵下降到了俄军的水平，只在消极的勇敢里面寻找荣誉。

这一天胜利的荣誉属于博斯凯将军和麦克马洪将军。博斯凯指挥法军的整个右翼，麦克马洪则指挥攻占并守住了马拉霍夫冈的那个师。这一天是法军在勇敢方面真正超过英军的少有的日子之一。在其他各方面，法军早已证明自己优越于英军。我们是否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列颠军队已经退步，它的步兵再也不能夸口说他们成密集队形作战时是世界上最好的步兵了呢？得出这种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地，在克里木的英军将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消耗军队的体力和挫伤他们的士气；另一方面，不久前才入伍的新兵比以前补充的兵士要差得多。英国人应为此深思；要知道，在三个月内打了两次败仗，这在英国战史上还是空前的现象。

关于俄军，我们只能说，他们是以他们常有的消极的勇敢精神作战的，但在为夺回马拉霍夫冈而进行的攻击中，也表现了高度的积极的勇敢精神。在俄军的报告公布以前，我们还不能评论他们的战术措施。有一点很清楚：马拉霍夫冈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失守的。当时全部守军都在吃午饭，只有守在火炮旁的炮手作了抵御攻击的战斗准备。

如果我们要看看攻占南区以后的情况，那末从哥尔查科夫的报告中可以知道，2万人的联军部队（国籍未指明）已开往叶夫帕托利亚，并且强大的侦察队也被派去对付拜达尔盆地的俄军左翼，迫使该地的俄军前进部队向乌尔库斯塔，向楚林河（黑河的支流之一）的上游盆地退却。目前在叶夫帕托利亚的一个军（3万人），力量相当薄弱，不能由该城向较远的地方出动。但可能有增援部

弗·恩格斯所写的克里木战争大事记²⁸⁹

队开到。无论如何，野战行动已经开始。最近两个星期将表明，俄军或者能够守住阵地，或者不得不把整个克里木让给联军。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9 月 2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10 月 1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19 号，并
载于 1855 年 10 月 4 日“新奥得报”
第 46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新奥得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官方财政报告

伦敦 10 月 2 日。我们手里现在有一份关于去年全年、半年和季度的国家收入的官方报告（根据格莱斯顿的新办法，英国的财政年度——包括支出和收入——都以 9 月 30 日为结算期）。报告一方面证明了英国预算中的补充来源的伸缩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根据或然率理论进行结算不是英国财政家的 forte（长处）。收入的纯增长额和上一个财政年度比较是 8344781 英镑，和上一个半年比较是 2929699 英镑，和上一个季度比较是 1924124 英镑。如果一方面考虑到在格莱斯顿和路易斯时期税收的增长，另一方面考虑到税收的预定增长额和实际增长额不符，那末，这些数字的意义立刻就会发生变化。了解了各个项目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关税收入全年增加了 1290787 英镑，半年增加了 608444 英镑，一个季度增加了 364423 英镑。这完全应该归功于茶叶、食糖和咖啡的新税收。“每日新闻”的资产阶级乐观主义需要从这些统计数字中作出工人阶级的物质福利在增长的结论。大家知道，格莱斯顿已停止了降低茶叶税和食糖税的做法，而这种做法是在 1854 年下院根据他的提案决定实施的。他的继承人路易斯把每公担食糖再增加 3 先令，按照他的估计，就可以再增加 120 万英镑，每磅茶叶再增加 3 辨士，按照他的计算，就能使关税收入增加 75 万英镑；最

后,每磅咖啡再增加 1 辨士, surplus (补充收入) 的数目就可达到 15 万英镑。然而关税收入增加的总数在最近一个季度却只有 364423 英镑,因而还远没有达到食糖税一项的预定增加数的一半。从税收项目表中可以看出,咖啡的消费比 1853 年大概下降了 2%。烟酒税的收入也大大减少了。

消费税的收入在英国被认为是社会下层阶级 comforts (幸福生活) 的标志。消费税的收入甚至在较好的季度也减少了 266006 英镑,然而乔·康·路易斯爵士的新的酒类税却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充分地实施了。路易斯指望他的附加税会增加到 100 万英镑。与此相反,他在一个季度内就丢了 266006 英镑。至于印花税,全年它增加了 100472 英镑,而在半年内却减少了 48402 英镑,最近一个季度减少了 103344 英镑。如果考虑到格莱斯顿第一次实行的遗产税正在充分实施,这就尤其值得注意了。属于这一类(印花税)的邮政收入全年亏空 206819 英镑,半年亏空 175976 英镑,最近一个季度亏空 812243 英镑。地产税的收入全年增加了 6484147 英镑,半年增加了 2195124 英镑,一个季度增加了 1993590 英镑。然而,不应该忘记,格莱斯顿把原来的税率提高了一倍,由此得到的新税收可达 650 万英镑,此外,乔·康·路易斯爵士还实行了每英镑征收 2 辨士附加税的办法,这样可使税收增加 400 万英镑。由此可见,在地产税的收入方面,收入的增加无论如何也不能和税率的增长相适应。

在这里人们对 Crédit Foncier (土地信贷公司)、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以及其他波拿巴银行的代理机构或注定要破产的代理机构的舞弊行为和未来的命运还颇感兴趣。不妨回想一下艾米尔·贝列拉和这些机构的其他董事们——老圣西门主义

者。这些先生们始终认为可以拯救世界的是**银行**，可能也就是**破产**。总之，他们认为这是自己**拯救自己**的办法。如果不谈圣西门主义创始人的一般的伟大思想，那末圣西门主义在波拿巴时代是以它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实现的。还能希望什么呢？贝列拉波拿巴是在财政方面的主要骗子手，而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则是“辩论日报”²⁹⁰的主编之一和主要的经济学家。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但是伟大的思想也有自己的《fata》（“命运”）。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0 月 2 日

载于 1855 年 10 月 6 日
“新奥得报”第 46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法兰西银行。——克里木的
增援部队。——新元帅

伦敦 10 月 4 日。英格兰银行重新又把贴现率从五厘提高到五厘五。这个措施首先是为了对付 Banque de France (法兰西银行)，因为这家银行在最近六个星期内，利用发给伦敦的并在那里贴现的期票，把 460 万英镑的黄金从英国运到了法国。这里的交易所盛传着一些关于 Banque de France 财政状况的最令人不安的谣言。有些人认为一切硬币支付将要延期，另一些人认为 Banque de France 的银行券“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应当得到稳定的担保。然而这种担保必然会造成银行的《run》（“挤兑”），并使它的银行券迅速贬值。最后，还有人断言，Banque de France 企图用认购的办法发行新股票来把自己的资本提高一倍。不管这些谣言在细节上是怎样传说不一，它们毕竟证明 Banque de France 的处境危急，证明这个从拿破仑第一时代成立起就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稳固的机构，在拿破仑第三时代不过是一个翻倒了信贷金字塔（而这些金字塔应当看成是他的统治时代的特有的纪念碑）。法国社会有一部分人首先要求的是信贷充足和《prospérité toujours croissante》（“日益繁荣昌盛”）的假象，因此，当需要为这个愉快的骗局付出代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是不能抱怨的。总之，财

政业务、交易所诡计和银行投机，虽然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的最后几年造成过真正强烈的印象，并促成了像“高利贷者——当代之王”、“路特希尔德王朝”²⁹¹等等的论战性巨著的出现，但是，同1852年到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个领域内所发生的事情相比较，就算不得什么了。

现在人们正等待着关于把大约6000人用轮船运往克里木去的命令，这6000人中有800名炮兵，900名骑兵，其余的都是步兵。此外，还应该从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伊奥尼亚群岛和比里尤斯抽调4000名左右的步兵送往战区。这些增援部队，甚至加上外籍军团，也远远不能使英国作战部队达到哪怕是它原来的编制人数。布莱特昨天在罗契得尔的群众大会上就这个问题说道：

“如要我拥护战争的话，那末我就要在我们国内的军事设施方面遵循完全另外一种政策。我就要充分地实行征兵制，就像俄国、奥地利和法国所实行的一样，这样就能促使所有阶级的人们都能相应地参与所谓民族事业。”

授予年迈的康伯米尔、斯特腊弗德和哈丁勋爵和伯爵以元帅称号，作为对辛普森将军（顺便说一下，他应该被召回了）在大凸角堡失败的奖励，这不过是帕麦斯顿在上年纪的时候喜欢用来为自己开心的许多平淡无味的俏皮话和玩笑中的一种罢了。头两位将军完全可以认为是死人，因而提升他们的职位不如说带有死后追谥的性质。在他们的尘世生存早已结束后，他们就被列为军事圣者。哈丁勋爵占据着英国军队的Commandeur en chef（总司令）这个太过时的职位，由于对阿尔伯特亲王元帅坚决的一贯的奴颜婢膝和逢迎讨好，他是完全应该得到元帅杖的。用提升那些已被遗忘了的、曾经和俄国人一起打过法国人的军官的官衔来庆祝和法国人一起取得的对俄国人的胜利，这样就使得这件事

情特别耸人听闻。例如，斯特腊弗德勋爵的功劳在于：他在滑铁卢战役时指挥过近卫旅，在进军巴黎时，指挥过英军的前进部队，并且在攻占伯利维尔高地和蒙马特尔高地后占领了巴黎。

卡·马克思写于 1855 年 10 月 4 日

载于 1855 年 10 月 8 日
“新奥得报”第 46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军事行动的进程

从战区传来了很多新消息。星期六开到的轮船带来了关于在叶夫帕托利亚附近的库卢鲁进行的骑兵战斗的公报（关于这次战斗我们以前曾经谈到过），这些公报可以作为对哥尔查科夫的报告补充；关于哥尔查科夫的报告，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评述。此外还收到一些消息说，俄军强攻卡尔斯没有成功，联军破坏塔曼和法纳哥里亚堡，以及联军在金布恩半岛登陆。²⁹²

参加叶夫帕托利亚附近的骑兵战斗的，有法军的12个骑兵连（骠骑兵第四团，龙骑兵第六和第七团）。根据德·阿朗维耳将军的既清楚又令人信服的报告，法军和土军曾沿三条不同的道路——一条由萨塞克湖向南，两条由该湖向北——深入内地进行广泛的侦察。沿后两条道路行进的纵队在多耳沙克村相遇，在那里发现俄军骑兵正向他们接近。从这一点起双方的报告开始有矛盾。德·阿朗维耳将军说，俄军18个骑兵连利用法军下马和喂马的时机，企图从南面迂回他们，切断他们返回叶夫帕托利亚去的退路；于是德·阿朗维耳命令自己的骑兵上马，冲向俄军翼侧，把俄军击溃并追击了2里约。哥尔查科夫却说，俄军仅有1个团（枪骑兵第十八团），即8个骑兵连，正当他们下马把炮兵连的火炮从前车上卸下来的时候，遭到法军的突然攻击，于是只好逃走。他把这一错

误归咎于科尔弗将军。为什么一整团的枪骑兵忽然下马来帮助一个炮兵连从前车上卸下 8 门火炮，以及为什么应当亲自做这件事的炮手班当时却不在场，——这就要由我们自己来猜想了。哥尔查科夫的整个报告写得含糊不清，不像一份军事报告，而且竭力为骑兵的第一次失败辩解，因而很难认为这是一份认真地陈述事实的材料。同时我们看到，哥尔查科夫把这次失败的责任推卸到科尔弗将军身上，就像他把锡利斯特里亚失败的责任推卸到谢耳万身上、把因克尔芒失败的责任推卸到索伊蒙诺夫身上以及把黑河失败的责任推卸到列阿德身上一样。哥尔查科夫本人尽管在每次战斗中都遭到失败，却依然是一位常胜将军。不是他打了败仗，决不是的；每次都是有某一个倒霉的下级指挥官由于某种严重错误而破坏了统帅的英明的计划，并且通常都是罪有应得地死在战斗中了。然而这一次犯了严重错误的将军却不走运，他还活着。可能，这位将军今后会对哥尔查科夫的报告提出些什么意见来，而目前他不得不用这一点安慰自己，就是敌人关于他的行为的说法比他那位永不会犯错误的统帅的说法要好得多。这次战斗以后，为了增援法军，英军一个轻骑兵师已开往叶夫帕托利亚。

另外两次远征是在克里木战区的极东和极西两翼进行的。其中一次是由刻赤和叶尼卡列出发而到达海峡对岸，破坏了塔曼和法纳哥里亚这两个不大的要塞，缴获火炮约 100 门；这样，联军就完全控制了阿速夫海的入口。这一行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它的直接结果并不能产生严重的影响。

另一次远征具有较大的意义。载有约 1 万部队的联军舰队，首先在敖德萨附近进行佯动，但一炮未发，随后就开往金布恩。金布恩位于一个砂咀末端附近，该砂咀从南面环抱着德涅泊河和布

格河所形成的一个大河口湾。河口湾在这里宽约 3 英里，入口处有一浅滩，根据最好的海图标示，该滩水深仅 15 英尺。河口湾入口处的北面是奥查科夫，而南面就是金布恩。这两个要塞都是在 1787 年俄土战争中第一次出名的，那时布格河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界线，所以奥查科夫属土耳其，金布恩则属俄国。在那次战争期间，苏沃洛夫指挥俄军的左翼（俄军总司令是波将金），驻守金布恩。当时在黑海称霸的土耳其人，从奥查科夫横渡河口湾的入口处，最初在金布恩城的东南登陆，企图转移苏沃洛夫的注意力，但确信这一伴动没有能够使苏沃洛夫迷惑以后，就用主力在奥查科夫正对面的砂咀西北端登陆。他们在这里挖掘了战壕，向要塞攻击，但是苏沃洛夫用比土军少得多的兵力出击，打了一仗，在增援部队的协助下把土军赶下了海。后者损失惨重。苏沃洛夫本人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一年以后，即在 1788 年，俄军对奥查科夫进行了强攻。

这一次联军不是在金布恩城的下方，而是在它的上方离城约 4 英里的地点登陆，企图切断该城同赫尔松和俄国内地的陆上交通线。他们的炮舰大概很快也能把海上交通线切断。砂咀在金布恩城以北 6 英里的地方是很窄的；它像阿拉巴特砂咀一样，地势很低，又是砂质土壤，以致战壕只挖到几英尺深就出水。因此在那里要迅速构筑带深壕的强大工事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在 1787 年构筑的工事都是些防栅或沙袋围起来的炮台。由于同样的原因，金布恩的工事也不可能是很坚固的，因为不可能为石质内岸建立牢固的基础；但从俄土战争以来，那里无疑地曾挖掘了一些灌满着水的宽壕。虽然这样，我们仍认为，金布恩如果受到联军强有力的攻击，是不能够坚守多久的。联军攻下金布恩，就有可能向

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方向，也就是向克里木俄军的作战基地的方向采取重要的军事行动。因此，这次登陆可能是很重要的，如果在登陆之后随即采取相应的行动的话。然而，到轮船开出时为止，还没有传来任何关于坚决行动的消息，这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联军是以他们惯有的那种慢条斯理的习性来进行这一次远征的。

俄军在卡尔斯城郊的失败，很可能是结束阿尔明尼亚战局的事件。土军组织很差，缺乏作战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们在这个作战地区担任着一个可怜的角色。他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防守卡尔斯、埃尔斯伦以及这两个要塞附近的一些地方。在土军中服务的威廉斯将军指挥着卡尔斯的守备部队，并领导他们构筑了适当的防御工事。在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战斗行动只限于互射、破坏性的袭击和到山区抢收马秣的进军。总的和主要的结果则是：俄军逐渐前进，包围了卡尔斯，甚至切断了它和埃尔斯伦之间的交通线。卡尔斯的位置是在通往阿腊克斯河上游地区的一个横方向的盆地内；埃尔斯伦位于幼发拉底河发源地附近；巴士姆则位于乔罗赫（巴提斯）河口，该河支流的上游流经卡尔斯和埃尔斯伦附近地区。因此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有一条道路是从埃尔斯伦沿乔罗赫河流域通到沃耳特城，然后经过山区折向卡尔斯。沃耳特是土军的一个中心点，因为来自巴士姆的一条道路同上面谈到的那条道路在这里相交，而巴士姆则是可以指望派出最大量的增援部队的最近的地点。俄军如果能够攻占卡尔斯，他们首先就会在沃耳特巩固自己的阵地，从而切断埃尔斯伦同黑海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最近而且最好的一条交通线。但是土军的斗志已经这样消沉，以至于退到了埃尔斯伦，仅仅控制着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阿腊克斯河发源地之间的一条出道，而沃耳特则完全没有设防。

最后，当卡尔斯周围已形成紧密的包围圈的时候，土军企图在沃耳特组织运粮队，使它在强大兵力的护送下突入卡尔斯。一部分骑兵已由卡尔斯派出，因为骑兵在那里没有用处，他们实际上是且战且走地穿过俄军占领的地区而到达沃耳特的。在这以后不久，就从沃耳特派出了运粮队。可是这次俄军早有戒备。土军全部被击溃，粮食被俄军截获。这时卡尔斯已经感到粮食不足。奥美尔—帕沙被派往亚洲，以便担负起指挥的责任，并且在巴士姆组织一支能进行野战的军队。然而，建立一支新的军队需要很多时间，而且经过沃耳特去解救卡尔斯，并不是奥美尔—帕沙所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援军开到之前，卡尔斯的守军随时都可能由于粮食不足而被迫投降。

这就是土军在9月底所处的困难境地。卡尔斯实际上被认为是已经失守了的，而且俄军并不怀疑，仅仅用封锁的办法就足以迫使该城守军由于已经开始了的饥饿而投降。可是，看来俄军并不打算等到卡尔斯的守军吃完最后一袋面粉和最后的一匹马。他们可能是由于害怕即将来临的冬季，担心道路变坏和粮食不足，也可能是由于接到上级命令，或者由于惧怕奥美尔—帕沙的部队，因而突然决定采取坚决行动。他们从距卡尔斯数里约的边境要塞亚历山大罗波尔运来了攻城炮。在进行了几天的接近壕作业和轰击以后，俄军主力在穆拉维约夫指挥下开始强攻卡尔斯。激烈的战斗继续了8小时。在野战中往往一见俄军就逃跑的巴希布祖克和非正规步兵，这次在比较有利的地形上作战。虽然攻城的兵力看来比守军兵力多3—5倍，但是突入城内的一切企图都没有成功。土军在这次战斗中终于又表现出了勇敢和机智。俄军虽然好几次占领了土军的炮台（大概是些背面敞开并能遭到第二道防线

射击的眼镜堡),可是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巩固下来。据说,他们的损失是惨重的,——土军掩埋了4000具俄国兵的尸体。但我们必须在收到更详细和确实的消息后,才会相信这一点。

至于奥美尔-帕沙的行动,他现在有两种选择:或是沿乔罗赫河经沃耳特进军,给卡尔斯解围,这样,他就有到达过晚而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危险,因为他要率领他的军队在阿尔明尼亚高原上行动,俄军在那里可以凭借坚固的要塞线抵御积极的正面攻击,而奥美尔-帕沙又不可能向俄军翼侧进行攻击;或是沿里昂河进军到库泰依斯,然后翻过山岭进入库拉河盆地,向梯弗里斯方向前进。这里,他不会遇到比较坚固的据点,但却能立刻威胁俄国在高加索南部的统治中心。这是迫使穆拉维约夫退出阿尔明尼亚的最好办法。本报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只有在这一个作战方向上行动,才有可能给俄国在亚洲的势力以有力的打击。这一进军的适当的作战基地可以选在列杜特-卡列,但该地没有安全的港湾,所以奥美尔-帕沙选择了苏胡姆-卡列,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港湾,沿岸地区有比较方便的道路。在目前季节里开始在那里采取重大的行动是否已经太晚,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10月19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11月5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53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俄国军队

在西方列强和俄国之间宣战的时候，英法报刊曾认为，俄国不会感到兵员不足，然而很快就会感到财力不足。他们估计，财政上的困难会削弱军队，使数百万的兵员（据说俄国在任何时候都能拿出这些兵力来对付敌人）难以调动。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虽然俄国在形式上被赶出了欧洲的一切大交易所，但是它却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贷款²⁹³；它虽然一再增发纸币，但是纸币并没有贬值；它的军队在行军期间，以那种只有在纯粹农业国里才可能采用的方式从居民方面得到了粮食和运输工具。尽管它的港口被封锁，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始终能够避开财政上的一切暗礁，而伦敦的聪明人曾断言它会碰上这些暗礁的。至于说到取之不尽的兵员，实际情形则完全不然。当英国采取在国内外招募志愿兵的办法而逐渐使它在克里木的军队增加到近4万人的时候，当法国仅在今年就征召了14万人而不是8万人，并且已经能够向东方派出人数甚至超过佩利西埃作战所需的一支大军的时候，俄国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在所有抽丁地区，已经两次普遍征兵，每次的比例大致是每1000名男丁中征10人，以后又普遍征召非常后备军，每1000名男丁中征23人，现在又颁布了为基干部队重新普遍征兵的法令，每1000名男丁中征召10人。平时的征兵比例，是在帝国的一半地

区内平均每 1000 名男丁中约征 5 人,另一半地区则在下一年度征兵。这样,整个帝国(不抽丁的省份当然除外)每年平均的征兵比例,是在每 1000 名男丁中征 2.5 人。可是,两年来的战争已迫使俄国在每 1000 名男丁中共征召 53 人,约占全国人口(包括男女居民)的 2.5%。可见,近两年来,每年的征兵数等于平时征兵数的 10 倍。假定法国在宣战后的两年中共征兵 30 万人(这无疑是超过实际数目的),这在 3600 万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 $\frac{1}{120}$,每年的比例则为 $\frac{1}{240}$,也就是说,刚好是俄国已经不得不征召入伍的人数的 $\frac{1}{6}$ 。诚然,在平时,俄国每年征兵数约占全国人口的 $\frac{1}{900}$,法国则约占 $\frac{2}{900}$ 。但是由于俄国的现役期比法国的服役期长一倍多,所以就完全抵销了征兵比例上的差异。

我们从各方面听说,俄国已开始感觉到这样不断抽出男劳动力的影响,而法国却几乎还感觉不到这一点。据报道,在波兰尤其感到农业方面人手不足;这一事实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贵族对于不断抽走他们最强壮的农奴一事表示了很大的不满。一位显赫的贵族兰斯科伊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向贵族们发布了一项公告²⁹⁴,宣布亚历山大皇帝已用特别法令保证贵族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这就说明,农奴主中间的这些不满情绪的征兆已经使宫廷感到多么惊慌。

然而,这种接二连三的征兵的最令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军队的实际人数增加得并不多。假定抽丁地区内的男丁总数为 2200 万人(这无疑还是偏低的估计),那末两年来应征编入基干部队的不少于 66 万人,编入非常后备军的不少于 56 万人。诚然,非常后备军只实行了局部动员,大概为 20 万人;这样,实际抽出的男劳动力约为 86 万人。那些在服役期最后 5 年或 10 年归休而在战争爆发

前征召入伍的预备役兵士，也可以加在这个数字内；但是，他们大部分在 1853 年就已征召入伍，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把他们列入计算数字以内。

尽管有组成每个步兵团的第五营和第六营的这些预备兵员，尽管征召了 66 万新兵（其中一部分编入每团的前 4 个基干营，另一部分则分配到新编的第二期后备营，即各团的第七和第八营），但是很多部队还远没有补齐自己的编制名额。这方面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南方军团司令利迭尔斯将军在尼古拉也夫发出的一项命令。他宣布，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附属南方军团的 23 个非常后备军大队^①（23000 人）应即编入基干部队，补充每团的第三营和第四营。但是这一措施仅能表明，南方军团所属的各团已经大量减员，因而需要把第三营和第四营的大部分兵士调到第一营和第二营，而他们空出的位置则由非常后备军的兵士填补。换句话说，在得到非常后备军兵士的补充以前，这些团的 4 个营的人数只勉强相当于 2 个满额的营。大部分人员还从未见过敌人、所有的部队从锡利斯特里亚会战以来一直没有参加过战斗的这样一支军队如果还减员这么多的话，那末，在克里木以及在亚洲的损失又该有多么大！俄国军队的真实景象就突然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使我们能够对俄军的损失作出一个估计，并且使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征召入伍的 66 万多人并没有使军队人数有显著的增加。

但是，这样巨大的、不相称的损失是由于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呢？首先是在于新兵要进行长途行军：他们必须从居住地点走到

^① “大队”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省会，然后走到分配站，最后走到自己的团队，——他们到达团队以后的行军还不算在内。从皮尔姆行军到莫斯科，从莫斯科行军到维尔诺，最后从维尔诺行军到敖德萨或尼古拉也夫，这对于新兵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既然这种迢迢万里的强行军是按照像尼古拉这样一个人的最高旨意来进行的，他准确地规定了到达的时间和出发的时间，并且对任何违背命令的行为都予以惩罚；既然这些旅、师、军都是急如星火地从帝国的一端被赶到另一端，而不顾有多少人由于疾病和疲惫而掉队；既然需要用一般的强行军速度从莫斯科走到皮列柯普，而这种强行军在其他国家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从来不持续到两天以上的，——那末，巨大损失的原因就可以找出来了。除了兵士体力过度紧张以外，还要看到一点，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俄军主管部门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军需部门的管理工作恶劣所必然造成的混乱现象。同时应当注意到兵士在行军期间的给养方法，他们的给养是尽可能依靠沿途各地的居民来解决的。如果组织得好，这种方法在一个纯农业国里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军需部门和指挥官都把从农民那里征来的一部分备用品贪污自肥，这种方法就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极大的困难。最后，还须估计到在下列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严重的计算错误，即军队散布在这样广阔的空间里，它们必须按照中央的统一命令运动，并且需要像钟表一样准确地执行这些命令，而这些命令所依据的一切前提却又都是错误的和没有根据的。1853年的俄军几乎已全部从地面消失，却未能使敌人遭到相当于自己损失的三分之一的损失，造成这一可怕的事实的原因，不在于敌人的刀剑和子弹，不在于南俄罗斯许多地方无法避免的疾病，甚至也不在于使俄军大大减员

的长途行军，而在于俄国兵士应征、受训、行军、操练、饮食、衣着、居住、接受指挥以及作战等所处的那些特殊的条件。

利迭尔斯将军最近的命令在另一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这个命令公开承认，非常后备军的兵士完全没有作好对敌作战的准备。他劝老兵不要嘲笑新兵，不要因为新兵在队列中的动作不灵而轻视他们；这个命令承认新兵几乎没有受过队列训练，并且对操典也作了一些看来完全得到皇帝赞同的修改。不要拿没有用处的阅兵式教练来引起兵士的“反感”；只应当训练兵士做最必需的动作，即：持枪、装弹、瞄准、射击、成纵队运动以及成散开队形运动，——其余的一切都被宣布为没有用处的阅兵式教练。就这样，一位俄国将军在皇帝的直接赞同下，指责整个俄军操典有三分之二是无用的蠢话，这些蠢话只能引起兵士对自己职务的反感。而这部操典却刚好是已故皇帝尼古拉所特别引以自豪的杰作！

每一个姿势和步伐都会引起伙伴们一阵大笑的“年轻的新兵”，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里都不能算作是新兵的。他们入伍 6—10 个月，却依然和刚放下犁耙时一样的不灵敏。不能借口说，长途行军使他们没有时间进行训练。拿破仑在他最后几次战局中，都是把刚经过两个星期训练的新兵编入相应的各个营，随后就把他们派往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他们在行军期间，无论在途中或在宿营地，都受到训练；当他们经过 6 个或 8 个星期的行军而编入部队时，已经被认为是适于执行勤务的兵士了。拿破仑把他的新兵训练成兵士，从来没有用过 3 个月以上的的时间；即使在 1813 年，当他不得不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培养新的军官干部以及建立其他一切的时候，他的新兵从到达分配站后只经过 3 个月的时间，就被他带上了萨克森的战场；而他的敌人很快就知道了，他对这些“粗野的新

兵”已经做了些什么。在法国人的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和俄国人的笨手笨脚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别！这是俄国非常后备军军官无能的一个多么好的证明！而利迭尔斯竟声称，几乎所有这些军官都在军队中服务过，而且其中许多人还闻过火药味呢！

训练仅限于一些最必要的动作的操练这一点还表明，利迭尔斯对他的新增援部队的期望是什么。成散开队形和成纵队运动——这就是兵士受训的全部内容；根本没有正面展开，也根本没有由横队变成纵队的动作。俄国兵的确最不适于成横队运动，正像不适于成散开队形运动一样。他们的长处是成密集纵队进行战斗，在这种战斗队形中，指挥官的严重错误引起的混乱最小，对会战的总进程的影响也不大，同时，勇敢但却被动的人群的合群本能可以弥补指挥官的过失。俄国兵好像草原上被狼追逐的野马一样，混乱地挤成一团，不易机动，无法控制，但却能坚守自己的阵地；敌人要费极大的力气，才能把他们打垮。然而，无论如何，横队在许多场合仍是必需的，甚至俄军也采用它，虽然不太经常。如果一支军队根本不会展开成横队，或者费了很大力气展开成横队以后，却不能再变成纵队而不引起全盘混乱，那末对它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55 年 11 月 2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11 月 1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48 号

卡·马克思 传统的英国政策

关于英国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广泛地流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仿佛他们始终是俄国的誓不两立的敌人。历史清楚地作了相反的证明。在“第一个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的日记和通信集”中（此人过去在辉格党和托利党执政时期当过几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以及在约翰·罗素勋爵出版的“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的回忆录和通信集”²⁹⁵中，我们发现了揭露辉格党政策的令人吃惊的材料。福克斯正是这种政策的鼓舞者和策划者，他一直是辉格党人的最高政治谋士；辉格党人对他的尊敬并不亚于土耳其人对穆罕默德的尊敬。因此，为了了解英国一向是怎样讨好俄国的，我们不妨简略地提一下在福克斯进入内阁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从马姆兹伯里伯爵的日记中我们知道，在美国独立战争²⁹⁶时期，英国就迫不及待地竭力向俄国施加外交压力。英国大使受命无论如何要同俄国订立进攻和防御同盟。女皇的答复一开始就是模棱两可的：叶卡特林娜认为“进攻”这个字眼本身是不受欢迎的；她认为必须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最后，英国的外交家才明白，全部问题在于俄国希望它的反对土耳其的计划事先得到英国的支持；哈里斯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它想在反对美洲殖民地这方面

保证自己能得到俄国的援助，那就要鼓励俄国的野心。

次年，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提出的建议就比较温和了；他不再力求和俄国联盟。英国将对俄国的一个以海军力量为后盾的、可以压制住法国和西班牙的抗议感到满意。女皇在答复时宣称，她没有充分的根据来采取这种步骤。英国大使谄媚地、奴颜婢膝地劝说道：

“只有十七世纪的俄国君主才会这样说，但是从那时起俄国已成为欧洲的领导强国，因而欧洲的利益也就是它的利益。假如彼得大帝看到俄国舰队和英国舰队结成联盟，那他就不再认为自己是第一个俄国君主了”

——如此等等。

女皇对这种奉承表示赏识，但拒绝了大使的建议。过了两个月，即在 1779 年 11 月 5 日，英王乔治用旧式法文给自己的“姐姐夫人”——女皇亲笔写了一封信。他已经不坚持要求正式的抗议，而对于一般地表示一下抗议就感到满意了。

英王写道：“只要帝国的部分舰队出动一下，就足以恢复和保持欧洲的和平；已形成的反英同盟就会立即消失。”

一个大国如此低声下气地请求援助，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形吗？

但是，英国的所有这些谄媚的话，都没有达到目的，在 1780 年俄国宣布了武装中立。英国只得温顺地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为了减轻它的苦味，英国政府预先宣布，俄国商船不会受到英国巡洋舰的阻拦或扣留。这样，英国没有受到任何一点压力就放弃了检查外国船只的权利。在这以后不久，英国外交家又向圣彼得堡内阁保证：不列颠的军舰不会对女皇臣民的商务活动进行阻挠。而在 1781 年，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认为，英国海军部对俄国船只经常给英国的敌人运送造船材料一事佯装不见，以及每当这些船只误

被扣押或阻拦时海军部为这种阻拦付出可观的赔偿费，这是海军部的功劳。为了说服俄国放弃中立，英国内阁使用了一切手段。例如，斯托蒙特勋爵给驻圣彼得堡的英国大使这样写道：

“能不能利用女皇的虚荣心，把某种重要的东西，或某种对她的舰队和贸易有利的东西让她，从而促使她援助我们镇压我们的叛乱的殖民地呢？”

哈里斯回答道，把米诺尔卡岛让出来，可以作为这种诱饵。1781年，确实打算把米诺尔卡岛让给叶卡特林娜，但是这个礼物被她拒绝了。

1782年3月，福克斯进入了内阁，他立刻向驻伦敦的俄国大使声明，英国准备开始和荷兰谈判（上届内阁根据承认航行和贸易自由的1674年条约向荷兰宣了战²⁹⁷），并且打算立即签订停战协定。福克斯指示哈里斯，要他把这个步骤当做英王对女皇的愿望和意见重视的证明。但是福克斯不局限于这一点。在一次大臣们的会议上决定向英王建议，命他向俄国大使（大使的官邸离王宫不远）示意，英王陛下希望更进一步了解女皇的意图，希望和圣彼得堡宫廷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并把中立宣言作为两国间的协议的基础。

在这以后不久，福克斯辞职了。他的继承者格兰瑟姆勋爵证实：圣彼得堡宫廷之所以比较谅解伦敦，是由于福克斯的政策的结果；当福克斯重新进入内阁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和北方的强国结成同盟应该是每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的政策，而且必须一贯遵循这个政策。他在一封给哈里斯的信中提醒哈里斯说，和圣彼得堡宫廷的友谊对大不列颠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并且声称，当他在政府里第一次短期任职时，他就抱着一个崇高的目的，即向女皇证明，英国内阁何等真诚地力求遵循她的意见和博得她的信

任。福克斯竭尽全力争取和俄国结成联盟。他说服英王给女皇写信，请求她谅解英国的事务。

1791年，福克斯（当时他是反对派），在议会里宣称：

“在英国议院里，谈到俄国日益强大，就像谈到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一样，这听起来是很奇怪的。20年前英国把俄国船只引进了地中海。他（福克斯）劝告过英王不要阻碍克里木归并俄国。英国支持了俄国在土耳其废墟上建立它的大业的意图。如果对俄国在黑海的日益强大表示妒嫉，那是不明智的。”

在进行这些辩论的时候，伯克（当时他是辉格党人）指出：

“把土耳其帝国看做是欧洲均势的组成部分，那是很奇怪的。”

伯克——英国各党派公认他为英国国家活动家的榜样——在他的政治生涯快结束的时候，越来越经常而坚决地发表过这类见解；后来这些见解被那位继承了党内领导地位的有名的辉格党领袖所支持。

格雷勋爵在他执政时期（1831年和1832年），曾利用讨论对外政策的机会表示过这样一种信念：俄罗斯帝国并吞土耳其对土耳其本身是有利的，并且能促使欧洲繁荣昌盛。难道那时的俄国不及有人向我们描绘的现时的俄国那样野蛮吗？难道那时候它不是像现代辉格党人所描述的那么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专制国家吗？但是英国自由派的国家活动家仍然不仅向俄国卑躬屈膝，乞求和它结成联盟，而且还鼓动它去实现那些现在为人们所严加斥责的阴谋。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2月28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1856年1月1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597号

弗·恩格斯 亚洲战争

我们逐渐知道了卡尔斯陷落的详情²⁹⁸；而到现在这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们不止一次地谈过的关于土军在小亚细亚处境的估计。现在再也不能否认：这支军队由于土耳其政府的懈怠和土耳其人的极端懒惰、迷信命运和行动笨拙而不断地瓦解了。不仅如此，现在已经暴露的事实完全足以证明，甚至在土耳其是习以为常的这种直接叛变，对于卡尔斯的陷落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还在去年的战局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有机会向读者描述了土军在埃尔斯伦和卡尔斯的绝望处境，并且谈到了造成这种境况的那些大规模的盗窃行为。集中用来防守阿尔明尼亚高原的，有两个军（小亚细亚军和美索不达米亚军）和叙利亚军的一部分。这些军都得到了预备部队（预备营）的加强，它们是人数众多的库尔德和贝都英非正规部队的核心。但是，在 1853 年和 1854 年中，从阿哈尔齐赫会战起到巴雅泽特会战止的四五次失败的会战，已使这支军队的团结精神和士气受到挫伤，而冬季的缺衣缺粮更使它遭到彻底的毁灭。一伙形形色色的匈牙利和波兰流亡者（其中既有冒险家，也有值得尊敬的人物）聚集在这支军队的司令部里，虽然他们并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在无知的、爱嫉妒的和阴险的帕沙们的眼里，这些冒险家被看做是头等专家，而流亡者中真正有用的人

却被看做是冒险家；结果争名夺利和互相倾轧之风大盛，因而使全部流亡者声名狼籍，使他们的威信几乎完全扫地。以后来了英国军官，他们受到了莫大的尊敬，像对待盟国政府的礼节所要求的那样；而在土军指挥官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这些军官曾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在阿尔明尼亚作战的部队的士气，但是也没有成功。他们经过努力之后，有时也能使某一帕沙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暂时振作起来，争取到在卡尔斯构筑最必要的防御工事，并且偶尔也能防止某种令人气愤的贪污行为或者甚至通敌密谋，——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去年春天，威廉斯将军曾竭尽全力为卡尔斯建立最必要的粮食储备，但总是碰到障碍。土耳其的军需部门事先没有考虑到可能被围，没有注意准备马匹运送储备品。等到发现有足够的驴子时，它又认为用驴子运送苏丹的物品有损苏丹的体面，等等；结果，卡尔斯这个距俄军居姆里的要塞只有两天行程的阿尔明尼亚的重镇，没有一点粮食，不得不在附近地区寻取粮食。弹药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围攻实际上并没有进行，——9月29日是整个封锁期间双方真正作战的唯一的一天，——可是在9月29日俄军攻击以后，守军的炮弹就大约只够3天用的了。运给军队的医药箱里装了各种陈旧物品；而为了外科医生查伤和截肢，竟由君士坦丁堡运来了产科器械！

卡尔斯的情况就是这样。由士气沮丧的安那托里亚部队组成的守军，9月29日能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作如此拚命的抵抗，以后又不顾饥饿坚守了那么久，这是土耳其历史上功罪相抵的事例之一，这种事例在目前战争中层出不穷。正是使上层人物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的那种宿命论，在群众中产生了这种顽强抵抗的精神。这是那种曾经使伊斯兰教的旗帜由麦加城插到西班牙、一直

到普瓦提埃才被阻²⁹⁹的尚武精神的最后残余。它的进攻力量虽然消失了,但是残余的防御能力依然存在。依托要塞围墙和垒墙进行抵抗的顽强精神是土军的特色;如果认为所以有这种顽强精神是由于那里有欧洲军官,那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854年和1855年在卡尔斯和锡利斯特里亚曾有过欧洲军官,但是1829年在瓦尔那、布来洛夫和锡利斯特里亚并没有他们,可是土军当时却建立了同样英勇的功绩³⁰⁰。欧洲军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纠正错误,加固多面堡,统一防御体系,预防直接叛变。但是不管有没有欧洲人,兵士个人的勇敢精神总是一样的;在卡尔斯,甚至在几乎完全瓦解的安那托里亚部队里也不缺乏这种勇敢精神。

在这里我们应当对那些曾在卡尔斯防御战中起过显著作用而目前却在梯弗里斯当战俘的英国军官的功绩作一个评价。毫无疑问,他们为准备抵抗做了很多工作;在加强城防并供给一切可能提供的物资方面的全部功劳也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还克服了帕沙们死气沉沉的无所作为的状态,领导了9月29日的防御战。但是,像英国报刊现在所做的那样,硬把9月29日的胜利和整个防御战的光荣完全归于他们,把他们描写成一群英雄,说他们为了土耳其人而牺牲自己,可是在危险的时刻怯懦的土耳其人却抛下他们不管,那是荒谬的。在俄军强攻时,他们位于前几列兵士之间,这一点我们不想否认。英国人生性好斗,因此英国军官在战斗中的最多而且最常见的错误,正是他忘记了自己作为指挥官的职责,而像一个普通兵士那样作战。他这样做时,深信会得到自己同胞们的热烈称赞,可是在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里,军官这样行动却会由于缺乏自制力而有降级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兵士对自己的军官临危逃跑的情形已经司空见惯,以致在战斗正酣的时

候，很少想到还有什么军官或命令，而是碰到哪里，就打到那里；因此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注意到身旁还有几个英国人正在极力表现自己的勇敢，更不会因此而受到鼓舞。此外，卡尔斯工事的平面图是绘制得完全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得到9月29日强攻的消息后的第二天就详细地指出来了，我们当时所作的判断完全为英国政府公布的官方的工事平面图所证实。因此，只能用法国谚语来评价英国军官在卡尔斯的功劳，这就是“瞎子国中，独眼称王”。许多没有真才实学的、并且在法国陆军少尉考试中落第的人，在印度支那就很可能被看做是一员大将；如果英国军官在本国以不通本行而出名，那末他们在土耳其服务时，就未必会突然变成知识渊博而具有军事才干的人物。我们认为，克美蒂应受的称赞不应低于卡尔斯防御战的其他参加者。

卡尔斯的情况就是这样，而这时埃尔斯伦的情况又怎样呢？十来个年迈的帕沙在那里衔着烟管消磨时光，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担负着某种责任，完全没有认识到卡尔斯的困难处境以及敌人就在德韦—博荣山岭的那一面，相距仅数天行程。几千正规部队同为数不多的非正规部队一起徘徊不前，从来不敢攻击敌人，并且一发现敌人前哨就立即退却。他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援救卡尔斯，因此卡尔斯全城都在挨饿，而埃尔斯伦的部队甚至不敢以佯动来支援它。威廉斯将军大概明白，他在这方面是得不到什么援助的。至于他收到了关于奥美尔—帕沙移动顺利的哪些报告，他得到了什么诺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传说威廉斯曾决定在万不得已时率领守军穿过俄军的队伍突围，但是我们怀疑，这样的计划是否认真考虑过。那里的山地只有很少几条出道可以通向埃尔斯伦，这就给俄军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如果俄军坚守那里

的几条隘路，那末这样的计划就不能实现。况且那里海拔 5000—8000 英尺，冬季来得很早，而且长达 6—9 个月，在这样的地区，到 10 月底军队就无法调动了。如果卡尔斯能够支持到冬季，那末守军中正规部队 6000 人的伤亡同长期防御所赢得的时间相比就是微不足道的。集中了土军在阿尔明尼亚的一切储备物资的埃尔斯伦，几乎没有工事，因此如果赢得时间，就可使它在 1856 年 5 月前有安全保障；同时，俄军可能取得的真正的好处，也只限于实际上占领那些位于卡尔斯—查伊河附近和阿腊克斯河上游附近的居民点而已，而这些居民点是不可能从俄军手中夺回的，纵然卡尔斯守军成功地冲往埃尔斯伦也是如此。埃尔斯伦几乎没有设防，因此即使卡尔斯守军在 10 月中旬能到达那里，也仍然没有充分的力量守住它。要守住这个不设防的城市，就只有扼守德韦—博荣山岭，在城市前面的狭谷里进行会战。因此，埃尔斯伦是由于卡尔斯守军的坚守而得救的。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奥美尔—帕沙当时能不能援救卡尔斯。对于这个问题，几乎在东方的每一个欧洲记者的回答都不一样。甚至现在，有些人还企图把卡尔斯的陷落完全归罪于奥美尔—帕沙，然而正是这些人不久前还对他备加赞扬。首先，必须注意到，实际上奥美尔—帕沙并非出自本意地被留在克里木，以致在入冬以前采取较大规模的行动，已为时过晚。以后他为了确定自己的作战计划而来到君士坦丁堡时，又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同各种各样的阴谋作斗争。最后，当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英军答应的运输工具却没有给他；当土军集中在巴士姆附近、以后又集中在苏胡姆—卡列附近的时候，他们没有粮食，没有弹药，也没有运输工具。很难设想，奥美尔—帕沙在这种情况下能直接援

救卡尔斯。我们已经知道：在明格列里亚远征时，他没有一次敢离开海岸超过两三天的行程，而那时他还是沿着很好的俄国军用道路行进的。但是，假如他经埃尔斯伦或阿尔达汉去卡尔斯，他就必须在离开海岸远达 20 天或 12 天行程的地方沿河床和山道行进，而且除用驮马外就无法运送物品。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的商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而他们从来不使用马车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了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地形上行进的。一般说来这就是现在唯一的可以通行的道路；至于所谓由巴士姆通向内地的道路，究竟有没有还是个问题，因为没有大批人马沿这些道路行走过。责备奥美尔—帕沙没有直接向卡尔斯进军的那些聪明的军事评论家，应当先读一下游历过这些地方的人所写的报道，例如柯尔曾或博登施泰特的游记³⁰¹。至于伦敦“泰晤士报”所说的，威廉斯将军曾建议奥美尔—帕沙把巴士姆作为直接向卡尔斯进军的出发点一事，我们只能指出，威廉斯对于他居住多年的阿尔明尼亚知道得非常清楚，他还不致于出这样的主意。

在目前条件下，奥美尔—帕沙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只是威胁俄军通向卡尔斯的交通线。他能怎样顺利地做到这一点，决定于他自己的部队的运动性如何以及它与它对抗的俄军的兵力有多少。我们不谈第一个问题，因为它只能根据已有的事实来判断；我们一开始就说明，对这支进攻部队来说，俄军的兵力很可能太强大了。我们原来对别布托夫现有兵力所作的、现在看来完全正确的估计表明，俄军甚至在库泰依斯稍微变更一下部署，就可以派出优势兵力对付土军。他们也正是这样做了。即使在移动顺利的条件下，奥美尔—帕沙也无法使自己的部队渡过里昂河。况且，供应迟缓而且不正常一开始就使奥美尔—帕沙的全部行动发生困

难。每经过两三天行程，他便不得不几乎停留一个星期来建立最必要的粮食储备；最后当他向内地前进到距列杜特—卡列尚有三三天行程时，他就完全瘫痪了。这时奥美尔—帕沙碰到了比较强大的部队，他只得向沿岸地区退却，俄军尾随于后，不断袭击他的后卫。由于同敌人遭遇和发生疾病而遭到严重困难的土军，曾在沿岸地区露营，现在正前往巴士姆、特拉比曾德等地。明格列里亚除岸防炮台以外又落入了俄军手中。

俄军在亚洲的第三次成功的战局就这样结束了：卡尔斯及其帕沙辖区被攻占了；明格列里亚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了；土军作战军队的最后残余部分——奥美尔—帕沙的军队——在数量和士气方面都大大削弱了。对于像高加索西南部这种由于地形性质和缺少道路而必然使一切战斗行动迟滞的地区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战果。如果把这些胜利和实际战果同联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刻赤、金布恩、叶夫帕托利亚和高加索沿岸地区的几座堡垒等这些战绩加以比较，那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联军的战果实际上并不像英国报纸所吹嘘的那样大。最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立宪主义者报”的一篇在法国宫廷授意下写的文章中，直接指名道姓地说雷德克利夫勋爵是亚洲失利的祸首，指责他不仅妨碍土耳其政府获得盟国所拨给的经费，而且还怂恿它迟迟地不把指定用于这一战区的援军派出去。

弗·恩格斯写于 1856 年 1 月 11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1 月 2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608 号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

西方列强在对俄战争中所采用的作战方法完全失败了。今年的战局，如果要进行的话，也决不能按照过去所执行的那个计划来进行。集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的全部兵力去对付克里木的一个地点，而这个地点本来是可以迂回的办法顺便夺取的；争夺这个地点整整 11 个月之久，而结果仅攻占了它的一半；如此忽视用其他一切可能的方法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以致使俄国能够攻占卡尔斯，从而弥补了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丧失，——在交战双方的要害地区由于中欧的中立而得到屏护的战争中，是可以这样进行一两次战局的。但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刚在巴黎召开过的军事会议³⁰²最清楚地证明：只要战争一般还继续进行，我们立刻就会看到一场真正的战争。

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这一战争，是一种被异常的礼貌所缓和的、官样文章似的敌对行动。我们这里指的不是打着军使旗进行互相交往时所应有的礼貌，而是交战双方的军事会议本身对敌人所表现的礼貌。战争的起因是由于俄皇尼古拉的失算。他绝没有料到，法国和英国会联合起来反对他对土耳其所打的主意；他原打算只同苏丹进行一场小规模平静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能够使自己的军队重抵君士坦丁堡城下³⁰³，使欧洲外交界在为时已晚

的情况下惊动起来，最后，使他自己的外交官像往常一样，可以在各种会议上取得比自己的军队用武力所能夺得的还多一倍的东西。但不幸得很，俄国和西方列强却因此而出乎意外地、事与愿违地、不知不觉地被拖入了战争，尽管它们谁也不愿意打仗，但却不得不这样做。然而双方都希望采用估计不致使对方采取极端手段的作战方法。人们本来期望，这场战争将是维护原则的战争，它多少会带有革命的性质，德国及其附属国——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都会参加这场战争。西方的 *ultima ratio*（极端手段，最后办法），是挑起被压迫民族即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的斗争，并在某种程度上挑起德国内部的斗争。俄国的 *ultima ratio*，则是宣扬泛斯拉夫主义，实现欧洲斯拉夫居民中的狂热分子在近五十年来所梦寐以求的理想。

但是，无论俄国政府或路易·波拿巴政府（更不用说帕麦斯顿）非万不得已都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手段，因此战争便在相互宽容和谦恭的基础上进行，这在旧日王朝正统君主的相互关系中也未必是常见的，而在罗曼诺夫王朝、汉诺威王朝的代表和假波拿巴之流这样一些暴发户和僭位者之间，当然更是不常见的了。战争几乎没有波及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联军从未企图在那里建立坚固的立足点。同白海的情形一样，那里私有财产所受到的威胁要比国家财产受到的大得多；尤其在芬兰沿海一带，英国舰队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使芬兰人顺从俄国的统治。联军在黑海的活动也是这样。联军被派到那里去，似乎就是为了迫使土耳其人期待俄国入侵；根据联军从 1854 年直到今天的所作所为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军在土耳其最无可非难的时期就是他们驻在瓦尔那的那一段时间，那时他们无力做什么有益的事情，除了使自

己受到损失以外，至少没有使任何人受到严重的损害。最后，他们开赴克里木。在那里他们非常巧妙地作战，以致俄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对他们表示十分满意。不久前，剑桥公爵给从克里木归来的法国兵士分发了大量奖章；但是俄国政府无论用任何奖章、十字章、大十字章、星章和绶带，都不能表达出它对 1854—1855 年各次战局的领导者所应有的感激。实际上，到俄国守军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南区的时候，联军已死伤 25 万人，并耗费了数百万金钱。在平地战斗中每次都打败仗的俄军，却以他们的决心、毅力和他们的工程长官^①的技巧胜过了敌人。如果说因克尔芒会战是俄军洗刷不掉的耻辱，那末，俄军在敌人眼前、在萨蓬山和马美朗筑起的多面堡，便是英军和法军的洗刷不掉的耻辱。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塞瓦斯托波尔没有耗尽俄军的兵力就像没有耗尽联军的兵力一样，因为它并没有妨碍俄军攻克卡尔斯。

卡尔斯的陷落的确是联军的最大耻辱。联军在海上拥有巨大的兵力，从 1855 年 6 月起陆军人数也超过了俄国的作战部队，但是却从来没有袭击过俄国最薄弱的地点——南高加索领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听任俄国人在这个地区建立某种像总督管区的独立作战基地，这种基地在遭到优势兵力进攻时，甚至在与俄国本土的交通线被切断时，也还能支持一段时间。但是联军还不以此为满足，并且不从土军 1853—1854 年在亚洲遭到的一连串失败的沉痛经验中吸取教训，却阻挠奥美尔—帕沙的部队去挽回亚洲的局势，把他们留在克里木，而且在克里木也只让他们给自己的部队劈柴和提水。因此，从刻赤海峡到巴土姆的整个沿岸地区的俄军

^① 托特列本。——编者注

据点被完全消灭以后，也就是说，在可以找出 10—15 个据点作为作战基地向高加索和南高加索（我们经常指出，这是俄国最薄弱的地方）采取各种行动的那一线被占领以后，联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发现卡尔斯陷入困境而埃尔斯伦的部队又不能有所作为时为止。到这时才允许奥美尔—帕沙进行他那倒霉的明格列里亚远征，可是要挽回颓势已经晚了。

联军顽固地把全部兵力集中在一个不比长岛大的半岛^①上，这无疑帮助他们避开了一切不愉快的问题。无论民族问题，泛斯拉夫主义问题，中欧所造成的困难问题，或是夺取领土的必要性问题都没有提出来；双方都没有取得会迫使对方同意作出巨大牺牲因而可能使即将举行的谈判发生困难的重大的决定性的战果。可是对于直接参加作战的人来说，这一切远不是那么愉快的。对于他们，至少对于上士以下的人，战争是严峻的现实，是冷酷的事实。自有战争以来，还从来没有像这次克里木战争那样，把如此光辉夺目的勇敢精神滥用在取得极不相称的战果上；还从来没有为了获得如此可疑的胜利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牺牲这么多优秀的兵士。显然，要使军队再忍受这种苦难是不可能的了。他们需要比空虚的“荣誉”更实在的战果。一年只进行两次大会战和四五次总攻，而且老停留在一个地方，像这样的战争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任何一支陆军对此都不能长久忍受。任何一支海军都不能忍受像过去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两次战局那样毫无成就的第三次战局。战争如果继续下去，那就会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联军将攻入芬兰、爱沙尼亚和贝萨拉比亚；瑞典军队会答应帮忙，奥地利方面也会答应助威。

① 指克里木的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半岛。——译者注

但有消息说，俄国已同意把奥地利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³⁰⁴，虽然这远没有解决媾和问题，但总算有了结束战争的可能。

由此可见，新的战局可能不会发生；如果它一定会发生，那末可以预料，它将会有更大的规模和更大的成效。

弗·恩格斯写于 1856 年 1 月 18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2 月 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61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美冲突。——法国的局势³⁰⁵

1856年2月8日星期五于伦敦

除了官方报界中的一些卖身投靠的先生以外，看来，在英国谁也不会相信英美冲突³⁰⁶的严重性。有些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故意用来转移对和平谈判注意力的巧妙手段。另一些人则断言，帕麦斯顿将在辞职后力求做到相互召回大使，就像皮特在签订亚眠和约³⁰⁷前所做的那样，以便在重新用得着真正的英国大臣时，他好东山再起。根据论战进行的情况来看，一些十分有远见的人认为，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通常的总统^①竞选花招而已。民主派报纸认为这是对挑起大西洋两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内战感到满意的波拿巴的幕后活动。然而所有的人完全确信，不论官方的言论何等尖锐，都不会有军事冲突的丝毫危险。显然，建议自己的主子对旧世界、也对新世界作个和事佬的法国官方报纸“立宪主义者报”也持有这样的观点。

在评述这一冲突时不应忽视的一个主要情况，就是英法之间的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实际上几乎完全停止了，英国报界也或多或少地公开承认这一点。例如，伦敦“泰晤士报”，不久

① 皮尔斯。——编者注

前它还宣称现在的波拿巴是一个比真正的拿破仑更伟大的人物，并提出要赶走所有不承认这条教义的心怀恶意的人。可是现在它的一篇社论却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签订和约的唯一障碍是波拿巴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过分的热心。在这篇文章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篇文章，它暗示这位“上帝所选定的工具”，归根到底不过是 pis aller（在最坏场合下）使用的工具，法国社会之所以要使用它，只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国家能给以信任和尊敬的人”。在第三篇文章里，“泰晤士报”把整个大本营包括将军、大臣和大小官员等等痛骂为一群形形色色的交易所强盗。英国地方报纸的言论就更没有分寸了。另一方面，请注意法国报纸已经改变了的腔调，它们对俄国的一味奉承讨好，这同它们对英国抱有矜持的厌恶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请注意一下奥地利、比利时和普鲁士的报纸发表的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大陆同盟的十分明显的威胁。最后，我们来看看俄国的报纸，它在鼓吹和平时故意只谈法国，而几乎没有提到英国。

“北方蜜蜂”写道：“地平线上出现了为文明社会的一切朋友所欢迎的和平长虹……在同四个强国进行战争的这两年内，俄国人民充分地显示了自己崇高的和高贵的性格，甚至博得了敌方人民的尊敬……至于法国，那末可以肯定地说，全体法国人民是热爱和尊敬俄国人的，他们钦佩俄国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在克里木短时的休战期间和俄国俘虏通过法国的时候——都表现了对俄国人的同情。而俄国人对待法国俘虏也就像对待兄弟一样。”³⁰⁸

布鲁塞尔的“北方报”直接指出，波拿巴一开始就鼓励奥地利出面调停，它打算一有机会便放弃和英国的联盟。

因此，既然和法国的联盟很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了和这个国家的破裂，那末显而易见，仍然和俄国处在战争状态的英国就不会

准备同美国打仗，所以这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除了上面已谈过的情况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意义。

欧洲的和平决不能认为是有保证的。至于谈到盟国向俄国提出的条件，那末接受这些条件的事实，也未必能看做是俄国方面让步的表现。对俄军占领卡尔斯（在这以后，彼得堡的一家报纸就可疑地把卡尔斯称为俄国的一个省）所持的顽强的沉默，大大补偿了在贝萨拉比亚的让步：让出某块以一条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神秘山脉作记号的土地。同时，俄国巧妙地利用停战和事态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机会，在一切最重要的地点集中武装力量，很可能是想继续进行战争。然而，对波拿巴说来，无论如何签订和约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事了，这种情况倒是和平的可靠保证。因为，一方面，他缺少继续进行战争的资金，另一方面，“在法国内部”，就像蒙塔郎贝尔所说的进行罗马远征那样³⁰⁹，再进行一次克里木远征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在俄国接受初步的媾和条件前不久，在巴黎非常广泛地流传着波拿巴打算发行强制性公债的说法，这种公债必须按直接税的数目的比例进行分配。法军在克里木的状况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的国库是空虚的。不久前记者们就指出了佩利西埃的军队的凄惨处境。一位不列颠士官于1月5日从塞瓦斯托波尔寄给“北明翰报”一封信，信中作了如下的真实描写：

“今天一早就是一个好天气。三点钟左右刮起了猛烈的北风，天气变得十分寒冷，我们不得不很快地扣上了全部钮扣。我们的兵士并没有因寒冷而受苦，然而可怜的法国人却很令人同情。他们成天从塞瓦斯托波尔给自己搬运燃料，他们穿的衣服很坏，我猜想，他们吃得也比我们坏。白天他们总有人在徘徊着寻找面包干。我们的兵士很可怜他们，对他们也很好。我们的哨兵

曾得到不准放他们进入营地的命令，因为他们有些人喜欢出卖白兰地酒，有时就会引起我们兵士的酗酒行为。但有时候可怜的法国人躲开了哨兵，而潜入到 bono Inglis（善良的英国人）当中来。当然，我们的兵士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从来不让他们空着手回去的。这些可怜的人们甚至没有取暖的手套。从夏天以来，给他们增添的唯一东西就是一项缝在大衣领上的风帽和一付粗呢的、用几条小皮带裹在膝盖上的护腿套。他们不穿袜子，而靴子呢，他们曾经有^过。的确，法国人成了贫穷的化身；他们也感到这一点，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不列颠兵士们戴着暖和的海豹皮的帽子，穿着呢子的皮大衣，颈上和腰部围着宽大的围巾和腰带，脚上穿着坚固的长统牛皮靴的时候。”

由此可见，如果拿破仑使军队（军队对他来说就是一切）处在上面对描写的那种状况，那末他的财政状况确是够惨的了。另一方面，这两年进行战争所花费的代价，比他的伯父在 1800—1815 年期间的全部出征费用还要昂贵，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财政管理状况是怎样的了。据说，甚至从克里木回来的波拿巴的将军们也愤慨地指责莫尔尼之流依靠军队发财的无耻勾当。这些抗议曾经发表在一家半官方的报纸上，其中写道：

“如果将来签订了和约，皇上就会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财政问题上去，特别将注意在投机狂的情况下极其广泛流行的一些营私舞弊行为，例如会注意兼任一些不能兼任的职位和某些十分迅速地得到大量财产的情况。”

同时，在青年大学生中间，在工人阶级中间，在一部分资产阶级中间，以及波拿巴认为最糟糕的是在军队里，都出现了倾向革命的迹象。

关于 Ecole Polytechnique（高等综合技术学校）事件³¹⁰，大家知道，波拿巴起初是考虑同学校妥协的，虽然他对 12 月 29 日大学生们表现的顽强沉默十分恼怒，因为当时他正在对军队扮演

罗马元老院的角色（正像他喜欢对自己的元老院扮演罗马皇帝的角色一样）。他让大学生们知道，如果在给他们机会时他们就表示对他的王朝的好感，那末皇上就会保存他们的学校。然而 Ecole（高等综合技术学校）通过自己的代表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大学生们不仅不会喊《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而且还要从学校里赶走任何一个敢喊这种口号的同学。随着这个答复而来的就是关于封闭这个无政府主义学校的决定。一部分被指定去服兵役的大学生，将被送往文森，那里将建立一所简陋的炮兵学校。另一部分被派给民政部门的大学生，将被送到 Ecole Normale 去。而校舍本身将改成兵营。这所拿破仑皇上所喜爱的学校落得的下场就是这样。

马扎斯监狱挤满了巴黎大学的学生和其他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在雕塑家大卫的葬礼上曾高呼：《Vive la liberté!》（“自由万岁!”）有一个与反对尼扎尔的示威游行事件有关的情况特别使波拿巴感到不愉快。一些大学生由于尼扎尔把提比利乌斯颂扬为罗马社会的救主而对尼扎尔喝倒彩，在警察的袭击下，这些大学生被捕了，没有被捕的大学生就排了队，通过了巴黎全城，来到库尔谢尔大街的尼扎尔家门前，要求他释放他们的同学。在大学生后面派来了一队步兵，他们几乎和大学生同时到达那里。大学生对兵士高喊《Vive la ligne!》（“军队万岁!”），兵士们就立即听任形势“自由”发展并且拒绝采取行动。为了防止兵士和大学生进一步结合起来，就立即把他们调走了，换来了一批 sergents de ville（警察）。大学生的游行队伍直奔奥德昂剧院，他们占了正座并且不停地高声唱着《Sire de Franc Boissy》（“弗兰·布瓦西先生”），当着坐在包厢里的波拿巴和欧仁妮的面高唱最带侮辱性的讽刺歌。

波拿巴的报纸承认，在各省逮捕的人数达 5000 人；根据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数字是 15000 人，看来，这个数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现在查明，工人这次的密谋³¹²也扩展到了军队。因此，不得不完全解散拉弗勒舍的士官学校和全部调换驻扎在法国中心的卫戍部队。为了镇压军队中的叛乱情绪，波拿巴又一次重复王朝复辟时期最冒险的试验，即在军队中普遍建立间谍系统。由于建立这种新的可敬的军队，马尼扬元帅和一些高级军官之间发生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吵，因为这些高级军官认为，这样做是不合军队的口味的。

在严重的事件到来以前，巴黎的工人运动往往是以唱 quod libets（祝愿歌）为标志的，他们最喜爱的是下面一首歌曲：

《Voilà qu' il part, voilà qu' il part
Le petit marchand de moutarde,
Voilà qu' il part pour son pays
Avec tous ses outils》edc.^①

为了不让“卖芥末的小贩”指的是谁这样的疑问存在，警察禁止人们唱这首歌。

根据“北方报”上登载的一件趣事，也可以判断波拿巴的机关是被尊重到何种程度了。有一些参议员毫不犹豫地赞同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拒绝接受参议员称号的行为，然而他们却不认为仿效他的榜样是明智的。有人问莫尔尼，他们中间是否也会

① “他就要走了，他就要走了，
卖芥末的小贩，
他就要回到自己的故乡
带着自己的全部东西”等等。——编者注

有人仿效这个榜样，他回答说，他有充分的根据认为不会这样。“然而这是些什么样的根据呢？”——交谈者又问他。莫尔尼泰然自若地回答道：“我有三万条有力根据，每条值一个法郎。”

还可以指出在法国人民目前处境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没有必要再来谈论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与和平同样是有利的。法国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对以前所一直迷恋的《la gloire》（“光荣”）表现了冷淡。1848年革命的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无可争辩地证明，波拿巴主义的繁荣时代已经过去。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2 月 8 日

载于 1856 年 2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63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小波拿巴法国³¹³

“像偶像那样镀了金的”^①小波拿巴法国为祝贺蒙蒂霍生儿子而大摆喜庆筵席，把国家财富挥霍在令人耻笑的排场上面；这个法国同那个在凯恩受尽折磨，在拉姆别萨吃尽苦头，在贝耳岛要塞里弄得筋疲力尽³¹⁴和饱尝苦役滋味的法国，同那个在克里木遭到饿死威胁的法国，同那个濒于破产境地的法国本土的法国，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对照。

从塔西利埃公民的信中（这封信是根据原文逐字逐句译出来的³¹⁵），读者可以看到被流放到凯恩的法国公民的令人感触极深的真实遭遇。可是，那些以真正英国式的卑躬屈节而著称的报刊，却以夸张的华丽词句向沉寂的世界喋喋不休地宣扬关于萨托里兵营灌肠英雄³¹⁶的宽大无边和简直是超人的仁慈的重大消息，因为他宣布大赦，使数千名获得自由而重返家园的法国人所发出的欢呼声压倒了他自己的任性的婴儿的最初的啼哭声。

然而我们暂且不谈谄媚者卖身投靠的狂喜心情，而来听听那些收买不了的事实的表白吧。布斯特拉巴³¹⁷表示愿意让那些被他

① 莎士比亚“亨利八世”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折磨了 4 年之久的人们得到自由，条件是他们必须同意蒙受洗刷不掉的耻辱，同意穿过没落帝国的 *furcae Caudinae*³¹⁸。如果他们能宣布自己忠顺地服从帝国，即赞同 *coup d'état* (政变) 而放弃共和国，如果他们能出卖自己的灵魂，那末布斯特拉巴愿意把他们的生命卖给他们。

“通报”说：“早在帝国庄严地宣告成立时就发出了这个宽大的号召。”这样一来，“通报”自己就坦率地承认了，目前被吹嘘为惊人消息的大赦，只不过是 4 年前所玩弄的陈腐的无耻把戏的重演而已。善于收买人心的天才满怀着这样的希望而自慰：他的受害者如今被降低到他本人的水平，他们变得十分驯服，以致他们在 1852 年当作侮辱而愤怒地加以弃绝的东西，在 1856 年却把它当作恩典来接受了。

“通报”用巧妙地编造出来的虚假材料来掩饰它对卑鄙行为的“宽大号召”。该报断言，在 1848 年六月事件以后被判远流放阿尔及尔的 11000 人中，由于总统的仁慈，在非洲只留下 306 人。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同一家“通报”的材料，我们断定，在 1848 年 6 月被捕的 11000 人中，到同年 11 月，即在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制宪议会) 讨论流放法令执行情况的时候，只留下 1700 人；其中 1500 人被送到贝耳岛要塞。1849 年 3 月 8 日，在奥·巴罗内阁执政时期，1500 人中间有 700 人被送到非洲的崩港。因此，布斯特拉巴的恩典，就是把这最后的数字 700 名缩减到 306 名，而决不是像它的好撒谎的“通报”所说的，是 11000 人这样一个大数目，而这个微不足道的恩典本身只不过是用来反对制宪议会的一种手腕而已。然而我们应当感谢“通报”，因为它使法国想起了卡芬雅克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干的丑恶的残暴行为。

至于谈到被放逐的十二月受害者，同一家“通报”肯定他们的人数为 11201 人，并断言现在已缩减到 1058 人。然而，仅仅在下阿尔卑斯、埃罗、瓦尔和涅夫勒等省份，就有 11000 多人是 coup d'état (政变) 的受害者，而目前被判处放逐或服苦役的至少还有 12000 人。大家都很清楚，因 coup d'état 而受难的人在 5 万名以上。其次应当指出，“通报”的“宽大号召”仅仅是对那些被送到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海外领地的人发出的，它丝毫没有提到在翁热判罪的人，以及因参加秘密协会而被关入监狱的那些人；它也不涉及 1851 年被巡回军事法庭判服苦役的那些人、贝耳岛的囚犯和因嘲骂布斯特拉巴所豢养的辩护士而被捕的大学生等等。作为弥补不足，“通报”宣布对盗猎者、走私者、伪币制造者、小偷、逃兵、苦役犯以及 id genus omne (类似这些人) 实行完全的绝对的大赦。同没落帝国的性质以及假波拿巴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相适应，儿子的诞生，对于所有同父亲相似的败类来说，应当是一件喜事。

现在我们不谈 coup d'état 的受害者，而来谈谈它的工具，不谈反对它的人，而来谈谈实现它的奴才，不谈自由的兵士，而来谈谈克里木的军队。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征兆是：尽管波拿巴迷醉于新建的王朝和在进入腐败的合法王朝的香气袭人的行列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得到他的不幸的受害者的承认，因此，他假仁假义地力争他们顺从帝国。然而下面的事实也是一个同样显著的历史讽刺的例子：正当十二月十日会³¹⁹的首脑和成员们为庆祝 coup d'état 胜利而在巴黎大摆筵席大肆挥霍的时候，强使法国接受这种令人厌恶的统治的军队，正在克里木遭受贫困、饥饿、作垂死挣扎和以最可怕最痛苦的形式死亡为自己赎罪。

在东方战争初期，即自 1854 年 11 月至 1855 年 3 月，人们把

十二月的爆发户捧为第二圣灵,用种种方式颂扬光荣帝国的了不起的军事管理制度,并把它同因国内的预谋叛变和陈腐制度所产生的必然后果而使不列颠军队遭受的可耻灾难相对照。然而,在这方面以及在没落帝国的其他一切行为中开始着手实现的东西,只不过是直接取得舞台效果而故意弄成的戏剧幻影而已。波拿巴用了两年的时间专门进行备战。他把庞大的中央集权的法国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以便保证自己的军队^①获得初步的胜利。的确,甚至斯特拉斯堡和布伦的这位可怜的冒险家在自己的极恶劣的统治的头两年内也未能摧毁第一次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法国军队的卓越组织,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可是他在这一次战争的头两年却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这应当认为是一个奇迹。他消耗在他的老鼠与青蛙之战³²⁰上的钱财比拿破仑大帝在他15年的伊利亚特中的总开支还多,这样他在第三年初就发现法国已经民穷财尽,它的军事管理制度已经千疮百孔,军队由于贫困而正在缩减。腐蚀法国军队的毒瘤——偷窃财物和盗用公款——是没落帝国的固有原则;只用了两年功夫,它的毁灭性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法国军队的悲惨状况不仅在法国报刊上而且在英国报刊上都被细心地掩饰起来。现在到处都在大谈这个秘密。在波拿巴的私人报纸“通报”辟谣以后,这个秘密就真相大白,用不着再争论了。本文只须从“泰晤士报”驻塞瓦斯托波尔记者的最近一封来信中摘出一段话就足以说明问题:

“法国军队不管在公文上怎样被形容为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但是它的

① 卡·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在这个字的后面还写着:“这支军队在当时是被他篡夺的政权的主要支柱,但它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编者注

人数却在非常可怜地日益减少,因为坏血病和寒热病正在蹂躏着它的队伍。不久以前,我计算了一下,法国军队每天要减少 170 人……现在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的军队每天要死亡 120 人,有时候还多得多。在拜达尔盆地的法军右翼遭受的灾难最大……天气要暖和了,疾病会更加厉害起来……法军病员之多将是骇人听闻的……法军人数减少得十分快,就像在最残酷的围攻时期由于炮弹和射击而造成的伤亡情形一样。”

记者认为,法国人受苦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有顶篷的住房,缺少外衣,给养不足。记者描绘了严酷的寒冷情况,说“在板房里,桶内的水结成的冰有 3 英寸厚”,暴风雪几乎连续不断,“只有少数板房没有遭到大雪的侵袭”,然后记者问道:住在帐篷(不是周密地具有一切必要设备的板房,也不是在周围用土培好的双层帐篷,而是单层的没有遮掩物的帐篷)里的法军怎么能挺得住呢?最后他写道,“碰到法军运送病员时,简直是惨不忍睹”,佩利西埃元帅不努力设法减轻病员的痛苦,却花费更大的力气把他们隐藏起来,不给不列颠军队看见。

此外,我们还要从“晨报”上摘一段话来说明这种情况。这家报纸在祝贺 1851 年波拿巴登台执政这一点上,是同“晨邮报”共享卑鄙的特权的,它至今还赞扬帕麦斯顿勋爵,说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大臣:

“在黑河的法军兵营里有 3000 个病员,行军医院挤满了病人,医务人员的队伍由于疾病和极度愈困而日渐缩小,军需部门完全陷于混乱状态,不能供养军队,人们简直在向前哨兵士讨面包干吃。因缺乏植物性食物而引起的坏血病和因缺乏肉类而引起的伤寒病特别猖獗;两国军队之间的对照是造成法国兵士公开不满的根源。运输工具不足,无法把病员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去(在当地的医院里已经有 12000 多个病员了),流行病是真正的灾难,因此而造成的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从东方驶抵马赛运输船只挤满了寒热病患

者,载着伤寒病人的船只正在开往弗利乌尔检疫所。”

对于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这支军队应当怎么办呢?^①难道用关于阿尔及利亚王“诞生”³²¹的阿拉伯神话,或者对于在谨慎的英雄身旁的娇嫩的近卫军所穿着的绣金制服作一番描绘,来安慰他们吗?应当记住,法国兵士是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容忍侮辱的。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可以举出在拉德茨基那里起“通报”作用的“米兰报”所提到的下列事实:在法国军队里,有人不止一次地图谋枪杀佩利西埃将军。同时也不要以为,法国本土的基干团会是克里木悲剧的冷眼旁观者。巴黎警察已经开始在营房里进行围捕了。被召回到巴黎以外外貌鼓舞群众热情的朱阿夫兵,现在已被当作不可靠分子而调离首都了。其他两个从克里木回来的团也被调往地方上去了。近卫军和基干团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因为波拿巴目前正在建立几个人数相当多的新的近卫团,以便这个享有特权的军团在没有基干部队的情况下也能担当起巴黎的警备勤务。波拿巴收买了军队,从而引起了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对立,他现在企图在军队内部收买军队,这种试验是够危险的了。

如果要全面地描述**财政状况**(我们不想把财政状况说成是这位非凡的阿基里斯的脚后跟,因为这个脚后跟实在太大了),就需要写一篇专门的论文。这里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虽然有价证券最近已经跌价,但是随着宣布缔结和约和新波拿巴的诞生,人们曾经自然而然地预料它们必然又会涨价。但这一点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不仅政府下了命令,可以自由使用现有的国

① 卡·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句话不是这样写的,而是:“对于这些怀有不满情绪的、因军需部的无能、可耻的疏忽大意和公开偷盗行为而造成不断死亡的军队,应当怎么办呢?”——编者注

家资金来收购国家有价证券,而且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以及迅速成立起来的与此类似的波拿巴信贷机关接连两天在加紧收购有价证券。虽然采取了所有这一切手段,但是就在宣告“诞生”的时候,证券没有涨价,反而下跌了,并且一直在往下跌。波拿巴大为恼怒,就禁止在交易所出售一切有价证券,除非按政府牌价买卖,后来又命令警察局传讯交易所的主要经纪人。

据说雅典娜·帕拉斯的雕像在帕德嫩神殿上跌倒这件事,是雅典共和国的不祥之兆。那末波拿巴的半身像在犹太教堂(这里规定着对政府的市场价格和贴现着人民的历史)的台座上摇晃不定,就预示着进行证券投机交易的帝国即将垮台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4 月 1 日
左右

载于 18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报”
第 205 号,署名:卡·马·;并作
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4 月 1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67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卡 · 马克思

卡 尔 斯 的 陷 落³²²

卡 · 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3 月底—4 月

载于 1856 年 4 月 5、12、19 和 26 日
“人民报”第 205、206、207 和 208 号

署名：卡尔 · 马克思

同时发表在 1856 年 4 月 8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467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
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卡尔斯的陷落是虚假的对俄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没有卡尔斯的陷落，就不会有五項條款³²³，就不会召开会议，就不会有巴黎条约³²⁴，一句话，就不会有虚假的和平。此外，假如我们根据政府自己的蓝皮书³²⁵（尽管蓝皮书的内容残缺不全，省略得歪曲了事实并且用捏造来粉饰和修补）能够证明，卡尔斯的陷落一开始就是帕麦斯顿勋爵的内阁所预见到的，而且是它事先所系统安排好了的，——假如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那末幕布将被揭开，充满着各种惊人事件的东方战争的悲剧就会冲破至今还在外交上被用来笼罩着它的那片烟雾而呈现出来。

1855年5月底，威廉斯将军告诉雷德克利夫勋爵，而雷德克利夫勋爵又转告克拉伦登勋爵：

“大量俄国军队，包括步兵 28000 人，骑兵 7500 人，火炮 64 门，正在向居姆里集结。同时，穆希尔也得到了敌人企图进攻卡尔斯的消息。而我们在这个营垒中有步兵 13900 人，骑兵 1500 人，炮兵 1500 人以及野炮 42 门。”

一星期后，即 6 月 3 日，威廉斯告诉克拉伦登：

“目前卡尔斯守军的粮食可以维持四个月，我希望中央政府和盟国尽快向剩下的这些部队表明：没有完全忘记他们。”

这份报告（见卡尔斯文件第 231 号）是在 6 月 25 日送到唐宁街的。因此，英国政府在这一天就已经知道：如果不去援助卡尔斯，卡尔斯就会在 10 月 3 日失守。于是政府就根据这种情况确定了下

一步的行动。

7月11日，克拉伦登勋爵收到了威廉斯将军于6月15、17和19日发出的三份报告。这三份报告接连说明在前哨已发生了小战斗，6月16日俄军对营垒的一次正规攻击已被土军英勇击退；最后，俄军向营垒作了侧敌行军，并且在距离土军最薄弱的阵地只有一小时行军路程的地方驻扎了大批军队（3万人）。威廉斯在最后一份报告的结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很遗憾，我们没有非正规骑兵…… 敌人已经局部地切断了我们与埃尔斯伦之间的交通线。”

当君士坦丁堡收到这些消息时，雷德克利夫勋爵正在博斯普鲁斯应邀出席在总理大臣的宫殿里举行的会议。土耳其大臣们建议支援卡尔斯，从列杜特—卡列派遣远征军取道库泰依斯前往格鲁吉亚，远征军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维维安将军的部队	20000
比特桑将军的部队	3000
巴土姆的一部分守备队	12000
阿尔巴尼亚兵	2000
从保加利亚调来的部队	5000
埃及正规骑兵	800
突尼斯骑兵	600
总 共	43400

土耳其政府同意由英国人指挥这次远征，由维维安将军担任指挥官职务。关于这个建议，克拉伦登勋爵在7月11日就知道了。7月12日，雷德克利夫又给他补发了一封电报：

“可能举行的远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如果您能立即来电告知政府是

否同意这次取道列杜特—卡列和库泰依斯向格鲁吉亚的大规模的牵制行动，那末，就可以节省许多宝贵的时间。”

在6月25日至7月12日这个期间，英国政府是了解卡尔斯岌岌可危的处境的，但是它袖手旁观，没有去支援这个要塞，甚至连一封电报也没有打过。可是，自从决定要打乱土耳其的任何一个支援卡尔斯的计划那天起，英国政府突然表现积极，大肆活动。7月13日（见卡尔斯文件第248号）克拉伦登给雷德克利夫发出一封急电，内容如下：

“女王陛下政府认为，比较明智的是派增援部队去土耳其军队的后方，而不是派远征军去俄国军队的后方。增援部队可以先派到特拉比曾德，然后从那里再开赴埃尔斯伦。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的距离比列杜特—卡列到梯弗里斯的距离要短些，而且所经过的道路在盟国境内而不在敌国境内。在埃尔斯伦，军队将要遇到的是准备给予援助的朋友，而不是对抗的敌人，在那里，军队会得到充足的贮粮，而不会挨饿。假如卡尔斯的军队在同俄军作战中不能坚守这个阵地，那末它应当向埃尔斯伦撤退；土耳其的全部兵力正是应当在那里集中起来。如果说必须击败俄军，那末用联合兵力就要比单独一部分兵力更容易促成这一点。这样，俄国人越深入土耳其境内，他们所遭受的失败就会越彻底。”

在收到雷德克利夫的电报的第二天，克拉伦登显得更加慷慨了。他甚至把埃尔斯伦也列为应当撤退的地点。

电报

克拉伦登伯爵致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

1855年7月14日于外交部

您在6月30日和7月1日（应当是7月12日）发出的急电中谈到的加强卡尔斯兵力的计划没有得到同意。在土耳其部队尚未适于作战之前不得加以利用，这方面的论据将在今天由信使送上。作战基地应当是特拉比曾德，如果卡尔斯和埃尔斯伦的土军无力对抗俄军、不能守住埃尔斯伦，那末就让他们退到特拉比曾德，在那里他们比较容易得到增援。

如果说卡尔斯是埃尔斯伦的门户，那末埃尔斯伦就是君士坦丁堡的门户，也是安那托里亚的战略要道和商业要道的汇合点。卡尔斯和埃尔斯伦一旦落入俄国手里，英国 via (通过) 特拉比曾德到波斯的陆上贸易就会立即中断。英国政府对这一切情况非常了解，但它却在这些地点都还平安无事的时候就冷静地建议土耳其政府交出它在亚洲门户的钥匙，并且请被围的卡尔斯军队撤退到曾被禁止去援助被围部队的援军那里去。“如果说必须击败俄军”，——伯爵阁下这样说(他好像是在问：需要这样做吗?)——那末根据他的意见，俄军越是深入土耳其境内，也就是说，土耳其的要塞和领土落入俄军手里越多，俄军实际上越是接近君士坦丁堡，他们所遭到的失败就越彻底，而且也越容易。

绰号《Take care of Dowb》³²⁶的潘缪尔阁下，这位英国的卡诺，在给维维安中將的下列急电中恰如其分地充实了克拉伦登勋爵的急电中的意见。

潘缪尔勋爵致维维安中將

1855年7月14日于陆军部

先生！

克拉伦登伯爵给女王陛下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发送了一份关于土耳其政府提出的支援卡尔斯土军的计划的急电，现将该电文的副本寄上一阅。我谨通知您，我完全同意这份电文中所谈的意见，即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计划是不能接受的。我非常信赖您的军事经验，因此，我一点也不担心您会接受像土耳其政府所设想的那种轻率而冒险的远征计划。当然，您不仅是部队的司令官，而且是一个得到女王陛下政府信任的英国军官，您的职责就是在可能的时候给予我们的盟友土耳其人以大力的援助，但同时，您应当特别小心谨慎，不要拿不列颠的荣誉和自己个人的声望去冒险，在有关的基地没有建立、交通线没有保证、物资没有贮备以及运输工具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不要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为了威胁敌人的要塞，或者甚至向敌人的要塞进行攻击而采

取军队突然登陆的办法,实行 *coup de main* (大胆突击),这是一回事;为了事先有准备地攻入敌区,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而进行远征,这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冒险;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在采取行动之前就必须有全面的准备。此外,从我所接到的全部情报来看,我有充分根据认为,巴士姆军队的处境很悲惨。我知道部队尚未充分组织好,关于保加利亚部队的情况你们一点消息也没有,至于比特桑的骑兵,我认为正像您自己的部队一样,很难使他们做到服从命令和严守纪律。总之,我确信,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援助威廉斯准将是不明智的。所采取的政策已经使这位勇敢的军官和他的军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现在要后悔也太晚了,但是要实现那些为援助他而提出的计划,就等于走上新的失败道路。您应当抓紧时间,使自己的军队作好战斗准备,一俟您作好了准备,毫无疑问,您就将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采取战斗行动,对于这一点,您显然也是很明白的;对于军队来说,组织就像坚韧不拔和英勇顽强的精神一样同样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前一种特性,单有坚韧不拔和英勇顽强的精神是无济于事的。

帕麦斯顿勋爵的陆军大臣在这份急电中扮演了仅能使自己主人开心的十足的小丑角色。威胁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或者甚至”向俄国 20 年来不断加强防御工事的塞瓦斯托波尔进行攻击,在他看来是一件极其明智的事情,因为这是联军进行的一次轻率的 *coup de main*; 可是,土耳其政府为了使敌人遭到失败而想“事先有准备地攻入”敌区,——这在“多布”看来,却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他完全同意克拉伦登的意见:战略的真正实质是巩固自己军队的后方,而不是在敌人的后方展开活动——我们让他同拿破仑第一、若米尼和其他所有伟大的战略家就这个问题去展开争论吧。他还同意他的朋友这样的意见:在战争时期,军队无论如何不应当通过敌区,而永远只能通过“粮食储备充足、无饥饿之忧”的友军地区——这真是饕餮之徒的哲学。但是,在丑角的自负的蠢话里,我们可以捉摸到他的后台老板的意图!格鲁

吉亚是敌区而不是友区，这并不是可怜的“多布”的发现。格鲁吉亚，这是俄国在高加索的波兰。

“多布”称之为轻率而冒险的土耳其的建议，从它总的意图来看，是一个大胆而正确的建议，我们认为它是这次战争进程中所产生的唯一的战略思想。这个建议就是：占领围攻部队的离开中心的阵地，威胁梯弗里斯这个俄国在亚洲的统治中心，使穆拉维约夫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从而迫使他从卡尔斯城郊撤退。进行这样的明格列里亚远征，不仅可以援助卡尔斯，而且可以在各个地区转入进攻，因而能取得在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的优势——迫使敌人转为防御。但是，危局已经临近；所以，为了使这种计划能够得到顺利的结局，就必须迅速地、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来实现这个计划，并且还要保证自己得到运输工具和粮食供应。因为穆拉维约夫把居姆里（专门用来防御土耳其人的要塞）当做在他的直接后方的第一个作战基地，因此，在没有确信敌人向梯弗里斯的推进确实会对他造成威胁以前，他是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的。要实现这个计划，就至少要有 55000 人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登陆，占领库泰依斯并穿越哥里盆地。后来奥美尔—帕沙率领 36000 人进行了这样的远征，当他快到里昂河时，他的部队只剩下一共不到 18000—20000 人。

毫无疑问，在埃尔斯伦，一支 2 万人的军队比在明格列里亚一支 4 万人的军队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土耳其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时，根据蓝皮书的材料，俄军在梯弗里斯的数量没有超过 15000 人，而别布托夫的增援部队当时还未到达。此外，据奥美尔—帕沙的判断，一支为了执行自己的任务因而相当庞大的军队带着必需的贮粮、弹药和武器，从特拉比

曾德开赴埃尔斯伦，然后再开往卡尔斯，就要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最后，既然土耳其政府提出了正确的计划，而又没有必要的器材，那末它的盟国就有责任保证向它提供足够的器材，而不是自己另提一个错误的计划。当时有 6 万土耳其军队被封锁在克里木，动弹不得，而这是土耳其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

6 月 28 日雷德克利夫勋爵写道：“在巴士姆、苏胡木—卡列以及其他靠近海岸的各地点，要征集 11000 多人是非常困难的……帝国的其他地区（保加利亚除外）也不能再提供什么预备兵员，只有波斯尼亚，也许还能调出几千人，我指的是正规部队；巴希布祖克倒是可以募集一些，但是，阁下，您知道，怎么能指望这种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呢……我不相信保加利亚驻军包括守备部队在内，会超过 5 万人。诚然，奥地利声明它打算把俄军越过多瑙河看做是 *casus belli*（战争的理由），并答应不让俄国侵犯多瑙河各公国。但是未必能指望土耳其政府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在自己的行动中遵循这些保证性的声明，而不考虑到使重要阵地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是多么不明智的事，——尽管这种决定过去和现在都会得到应有的赞赏。”

除了英土部队外，土耳其政府还掌握有什么部队呢？而这部分部队，从克拉伦登和潘缪尔的急电中可以看出也只不过是一种旨在使土耳其政府丧失它所掌握的最后一批兵力的诱饵而已。

然而英国政府提出过自己的什么计划来反对土耳其的计划没有？难道它不准备派英土部队去特拉比曾德，然后再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或卡尔斯去吗？克拉伦登在 7 月 14 日的急电中表示“在土耳其部队尚未适于作战以前，不得加以利用”。但是，既然部队不适于作战，那就是说，它不适于参加明格列里亚的远征，正像不适于参加埃尔斯伦的远征一样。可是就在那一天，小丑潘缪尔在给部队司令官维维安的急电中写道：

“您应当抓紧时间，使自己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一俟您作好了准备，毫无疑问，您就将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采取战斗行动。”

他要求维维安作好准备，不是为了直接采取行动，也不是为了到埃尔斯伦去，而是为了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采取行动，换句话说——什么地方也不采取行动。克拉伦登还在9月7日（见文件第302号）就认为英土部队的训练非常差，不适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筑垒阵地。因此，十分明显，英国政府提出埃尔斯伦方案，不是为了实现这一方案，而是为了打乱土耳其政府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计划。它反对的不是援助卡尔斯的某一个具体计划，而是援助卡尔斯的一切计划。

潘缪尔在给维维安的急电中写道：“企图援助威廉斯准将的军队是荒谬的……所采取的政策（帕麦斯顿的政策）已经使这位勇敢的军官和他的军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现在要后悔也太晚了。”

克拉伦登对雷德克利夫说，除了把卡尔斯再加上埃尔斯伦都交给俄国人以外，采取什么别的措施都已经太晚了。这个计划不仅早在7月13日就被帕麦斯顿的政府所通过，而且在蓝皮书内也得到了承认，而政府，像我们下面要看到的那样，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计划。

雷德克利夫在7月份发出的所有急电（列入卡尔斯文件第254—277号）证明，土耳其政府十分热心地准备着维维安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记得，1855年7月12日，雷德克利夫勋爵给克拉伦登伯爵打了一封电报说：由维维安将军领导的明格列里亚远征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他请求政府回电指示。因此克拉伦登回电表示反对土耳其方案；虽然回电的日期是7月14日，但是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日期却是7月30日，我们看到，这时雷德克利夫勋爵又给克拉伦登写道：

“女王陛下政府对最近提出的支援卡尔斯苏丹军队的计划表示了不赞同的意见，自然这更加加深了土耳其政府的恐慌。当时我的职责是把这个意见传达给土耳其的大臣们，这不仅是反映意见，而且是对利用维维安将军的部队的否决。之后就立刻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僵局。女王陛下政府不仅禁止使用部队，而且宁愿坚决采取另一个计划——派遣增援部队取道特拉比曾德前往埃尔斯伦。这个意见在这里遭到土耳其政府以及简直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人士的反对。土耳其陆军大臣^①、奥美尔—帕沙、盖昂将军和我们自己的军官们全都赞同土耳其政府和法国大使馆的意见：必须首先考虑从列杜特—卡列方面采取牵制行动，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取得巨大的胜利，当然，同时也必须相应地保证供应运输工具、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然而，来自卡尔斯的消息决不是令人快慰的，宝贵的时间正在因怀疑和动摇而必不可免地白白浪费掉。”

从君士坦丁堡到伦敦的路程丝毫不比由伦敦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程远，因此，雷德克利夫在7月12日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急电，在7月14日就到达伦敦，而克拉伦登在7月14日由伦敦发出的急电，君士坦丁堡却在7月30日或30日前后才收到，这种情况就使人感到非常奇怪。雷德克利夫在7月19日的急电中对政府的沉默表示不满，因为他曾恳请政府“立即发表自己的意见”。在7月23日发出的另一份急电中，我们看到，他仍然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早已说过，实际上在7月30日以前并没有得到答复。因此，毫无疑问，克拉伦登从伦敦发出的急电的日期是**伪造的**，实际上这份急电发出的日期要比蓝皮书上所标明的日期晚几个星期。这个伪造日期的事件暴露出英国政府的目的在于拖延时间。本来就是要使土耳其政府失去宝贵的时间，引起它的怀疑和动摇，而最重要的是要迫使它把整个7月份白白浪费在维维安远征的准备工作上面，因为根据英国政府的决定，这次远征是不应当进行的。

^① 卢什迪—帕沙。——编者注

二

英国政府由于在战略上动摇不定，三个月来不能对土耳其政府打算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它最多能做到的是：在当时急速派遣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 via (取道) 埃尔斯伦去负责恢复这个城市和卡尔斯之间的交通线。联军是黑海的主宰，而英国政府又完全掌握着由比特桑将军指挥的 4000 名巴希布祖克——这是土耳其唯一具有战斗力的非正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在特拉比曾德登陆以后，过十天就能到达埃尔斯伦，给卡尔斯护送军粮，从而使要塞能继续抵抗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也就是说，可以坚持到阿尔明尼亚的严冬的来临，到那时候，围攻者将不得不停止进攻。比特桑将军于 7 月 7 日写信给雷德克利夫，请求雷德克利夫利用他的军队来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

他的请求没有受到重视。8 月 14 日部队又呈递了请愿书，请求不要再让他们闲着，而派他们到亚洲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9 月 12 日比特桑第三次冒昧陈述自己的意见。因为英国政府不愿再忍受这种不知轻重的请愿者的纠缠，所以就施展了军事外交的阴谋手段，结果比特桑从军队中被召回。既然比特桑本人已被召回，那末他同政府之间的全部通信也就从蓝皮书中一笔勾销了。

我们已经知道，英国政府是固执地坚持 via 特拉比曾德向埃尔斯伦远征的。可是，在俄军占领了埃尔斯伦和卡尔斯之间可以

通行的大道并切断了一部分给卡尔斯军队准备的军粮的运输线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土耳其政府就背着英国大使馆独自采取行动，企图立即从特拉比曾德进行支援。在 1855 年 7 月 16 日雷德克利夫写的报告中附有一封斯蒂文斯副领事的信，内容如下：

1855 年 7 月 9 日于特拉比曾德

阁下！

我荣幸地通知您，哈菲兹—帕沙昨天带领 300 名炮兵和 20 门野炮动身到埃尔斯伦去了。现在已经组成一支估计能达 1 万人的庞大的非正规部队；这支部队今天也将开往埃尔斯伦。

（署名：斯蒂文斯）

雷德克利夫立即按自己的职分去询问土耳其陆军大臣，请他解释：为什么他避而不谈关于在特拉比曾德集结 1 万名非正规部队和哈菲兹—帕沙到埃尔斯伦去的问题。

他抱怨地说：“我从阁下那里听到关于这方面的全部消息是：土苏姆—帕沙曾接到命令，要他到特拉比曾德去，可能再从特拉比曾德到锡瓦斯，他必须在锡瓦斯招募 4000 名非正规部队，然后再率领他们开往战区去。”

如果在特拉比曾德、锡瓦斯和埃尔斯伦之间划三条线，那末就可以看出，这三条线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底边，正是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的那条线，这条线比每根腰线约短三分之一。因此，把增援部队直接经特拉比曾德派到埃尔斯伦去，而不是把土苏姆—帕沙从君士坦丁堡派到特拉比曾德，经特拉比曾德又“可能”派到锡瓦斯，在锡瓦斯他再花些时间去招募非正规部队，然后又可能率领他们到埃尔斯伦，——这就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太迅速了，因而使英国大使不能不责备土耳其人。雷德克利夫勋爵不想对土耳其陆军大臣说，对被围城市的援助取

决于经过再三考虑的拖延政策，而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样大的一支仓卒而混乱地集合起来的巴希布祖克部队只会对敌人有利，这难道还用怀疑吗？”

可是土耳其陆军大臣公正地反驳了这一点，他说：

“他曾经坚决要求拨出一笔经费来支付巴希布祖克的军饷，因为这是使他们服从命令的基本条件，他甚至还威胁地说过要辞职，假如他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这时候，雷德克利夫勋爵的听觉立刻变得迟钝起来了。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而被它的盟国所破坏的另一个作战计划，那末我们就会陷入错综复杂的迷宫，而难以找到一条出路。

从西蒙斯中校（奥美尔—帕沙兵营中的不列颠代表）7月15日给克拉伦登勋爵的报告以及附在报告里的奥美尔—帕沙的备忘录中，可以肯定以下的事实。6月23日奥美尔—帕沙接到了威廉斯将军的来信，说同埃尔斯伦的交通线已经中断，并且用最坚决的口吻要求立即派遣增援部队到卡尔斯来，或者从列杜特—卡列方面进行大规模牵制行动。7月7日奥美尔—帕沙向联军最高统帅——辛普森和佩利西埃——提出备忘录，坚决要求他们召开联军陆海军的司令官会议，以便立即作出决定。他在备忘录中提出：

“他本人可以率领他的驻在这里（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的一部分军队、叶夫帕托利亚的25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以及相当数量的炮兵开赴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某一个地点；他在那里威胁俄军的交通线，就会迫使俄军撤除对卡尔斯的围攻。”

奥美尔—帕沙在说明自己的建议时指出，土耳其在亚洲的军队有1万人，他们被俄军的优势兵力围困在卡尔斯营垒，现在他们的处境是：由于粮食缺乏而可能被迫投降；卡尔斯的守军实际

上也就是土耳其在亚洲的军队；如果卡尔斯的守军投降了，埃尔斯伦就会落到敌人的手里，由于地理形势关系，这个城市是很难固守的，这样，敌人就会控制通往波斯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交通线；联军如果采纳了他的建议，就能够利用他们所具备的主要优越条件，那就是：海上运输的便利条件和土耳其唯一具有充分战斗力和已经作好出发准备的军队，即奥美尔—帕沙本人的军队。佩利西埃元帅和辛普森将军对这份备忘录的答复是：“由于没有得到补充的情报，因此他们认为召开会议为时尚早。”尽管这样，奥美尔—帕沙还是在7月12日再次写信给他们，信中说：

“这时他已经接到了他的政府拍来的急电，根据急电来看，整个土耳其的亚洲部分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门都处在不设防状态，因为每一个小时都很宝贵，所以政府要求他立即设法动员和利用一切必要的器材和资源来防止那种威胁到土耳其政府因而也威胁到盟国事业的巨大危险。”他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同时由于在克里木的6万名兵士大部分是亚洲人，他们的家庭和财产正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又鉴于这支军队在克里木没有展开行动，而且看来最近不能指望利用它来积极展开行动，因此，根据我对我的国王应尽的义务，并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我再次提出我过去的建议。”

因此，他要求联军将领们在英军大本营开会。他在写信给联军将领的同时，又说服西蒙斯中校给辛普森将军和莱昂斯海军上将发了一封密信，现在我们从这封密信中摘引一段如下：

“土耳其政府建议维维安将军率领土耳其部队到列杜特—卡列去……然而奥美尔—帕沙认为把这些部队派到那里去是很大的冒险行为，因为兵士们还不习惯同自己的军官相处，而军官们又不会说土耳其话，因此不能在战场上指挥他们作战；这支部队虽然可以担当警备勤务，但还不能派他们深入腹地。此外，这支部队在数量上也太少，不能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奥美尔—帕沙还有这样的意见：他得到土耳其人的信任，他已经在亚洲打过几次仗，在亚洲是相当有名的，因此他将比语言不通、国情不明的外国人更容易取得当

地居民的好感，更容易得到必要的粮食和情报。”

7月14日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奥美尔—帕沙、西蒙斯中校、辛普森、佩利西埃和马丹普雷将军以及莱昂斯、布律阿和斯图亚特海军上将。奥美尔—帕沙详细地叙述了俄军在亚洲的兵力以及它们在卡尔斯城郊的军事行动。他详尽地阐述了上面所提到的论据，并坚决主张：

“必须准备进军以阻止俄军继续向亚洲推进，在这方面决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然而，正像西蒙斯中校在给克拉伦登的报告中所说的：

“将军们和海军上将们没有接到本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情报，所以他们还不能相信亚洲的情况确实像奥美尔—帕沙根据他的政府的通知而描述的那样危险”，他们决定“在没有接到有关的情报以前，对这个问题不发表任何意见”。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将领们都拒绝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接到本国政府的情报。后来，盟国政府也拒绝发出必要的指令，因为它们将领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联军司令官的态度冷淡，他们玩弄花招，以不相信事实为理由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又极不妥当地责备土耳其政府撒谎，所有这一切都使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奥美尔—帕沙感到惊讶，他立即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要去君士坦丁堡几天，以便和他的政府商量。”

果真在两天之后，即7月16日，他带着西蒙斯中校动身到君士坦丁堡去了；但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名叫修洛的中校，“这个人是在养病的名义下同去的”（见卡尔斯文件第270号附录1），而

实际上他是接受佩利西埃和辛普森将军的委托，去破坏奥美尔—帕沙的计划的。修洛是辛普森将军司令部的一位军官，他替可怜虫辛普森（伊文思将军把他称为世界上最不走运的败将）带给雷德克利夫一封信；辛普森在这封信里告诉公使的不是他和他的同僚不相信奥美尔—帕沙的话，而是“他们坚决反对现在从克里木召回任何军队”；其次谈到的不是他们认为必须对奥美尔—帕沙隐瞒自己的意见，而是他，辛普森

“坚决请求公使阁下利用自己对土耳其政府的特殊影响，使他们的意见压过奥美尔—帕沙阁下的意见”，因为“国家的重要利益已处在决定性关头了”，而“奥美尔—帕沙的胜利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问题就是这个胜利！奥美尔—帕沙可能获得的胜利使佩利西埃将军睡不着觉，因为到现在为止，除了6月18日的可耻会战以外，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事情。可怜虫辛普森虽然被伊文思将军描绘成一个天生的最不走运的败将，但是他仍然是十分狡猾的，他想利用他的同僚的困难处境，背着奥美尔—帕沙搞阴谋活动——可以说，这是他在整个克里木战局期间所采取的唯一的一机动。

雷德克利夫在7月19日给克拉伦登的急电中写道：

“前天夜里（7月17日）在他知道了奥美尔—帕沙突然从克里木来到这里，并直接去见了土耳其陆军大臣后，他感到十分惊讶。”

他因法纳尔人³²⁷皮札尼带来了以下消息而感到高兴：

“最高统帅未经政府的许可就来到这里，这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并说“他坚信，假如奥美尔—帕沙立即返回克里木去指挥自己的军队，那末联军的利益就能得到最大的保证”。

尽管雷德克利夫坚信这一点，但是奥美尔—帕沙还是在君士

坦丁堡从7月17日一直耽搁到9月初。下面我们将看到，由于什么原因而浪费掉这样一段时间的。

7月23日雷德克利夫告诉克拉伦登：

“奥美尔—帕沙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委任他来实现向格鲁吉亚的进军，这次进军以列杜特—卡列为出发点，同时还要利用一下库泰依斯。”

这个建议在前天（7月22日）夜间总理大臣召开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讨论后决定：

“从叶夫帕托利亚抽调2万人并从保加利亚抽调5000人参加为完成上述任务而由奥美尔—帕沙指挥的部队，叶夫帕托利亚部队的缺额将由以新兵补充的部队增补。万一上述计划遭到反对，那末就建议作这样的修改：从克里木只抽调1万人，而从保加利亚抽调15000人，其中应包括补充部队的新兵。”

这份急电（据说克拉伦登是在8月1日收到的，并且在收到后立即利用它打电报通知了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中有一段具有决定意义的话显然是被歪曲了。我指的是这一段：土耳其政府建议从叶夫帕托利亚抽调2万人交给奥美尔—帕沙指挥，而在叶夫帕托利亚，这些人将由土耳其部队来代替。克拉伦登在给考莱勋爵的电报中引用的正是这一段话，而且他还说，“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一点是谅解的”，表示“希望帝国政府也能同意这一点”。

在急电的这一段话中，故意把巴拉克拉瓦说成是叶夫帕托利亚。从西蒙斯中校7月15日发出的、而克拉伦登在7月30日收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奥美尔—帕沙不论在致联军将领的备忘录中还是在军事会议上，都坚持要率领驻扎在这里（巴拉克拉瓦）的他的那部分军队；这部分军队是他从叶夫帕托利亚抽调出来的，他认为唯一适于在亚洲作战的军队。奥美尔—帕沙来到君士坦丁

堡以后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呢？从西蒙斯 8 月 2 日的报告中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西蒙斯在报告中写道：

“奥美尔—帕沙阁下告诉我，为了补充部队的兵员，他愿意提供他所指挥的任何一部分土耳其军队，但是目前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兵营里的那个师除外；因为这个师是由他的精锐部队组成的，自然，他希望把它留在自己的身边，万一他要向亚洲进军时，他就可以加以使用。”

说土耳其政府在 7 月 21 日夜间的会议上作出了与奥美尔—帕沙的建议相矛盾的决定，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呢？在 7 月 23 日雷德克利夫报告土耳其政府作出了决定的那封急电中，他对克拉伦登说：

“奥美尔—帕沙受到了苏丹极其亲切的接待，并且还得到了大大的奖赏”，同时还补充说：“至于他同陛下大臣们的极其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土耳其陆军大臣—帕沙的良好关系，就不用我多说了。”

因此，在土耳其政府和它的总司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意见分歧。当他们接到伦敦的指示，要把叶夫帕托利亚的军队交给奥美尔—帕沙指挥，并从他那里抽出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和刻赤的军队时，无论土耳其政府或者奥美尔—帕沙都同样感到惊讶。英国政府捏造了急电中的上述那段话，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英国政府竭力要向舆论界隐瞒以下的事实：一方面，它要在法国政府面前显示它是支持奥美尔—帕沙的计划的，同时它又简单地重新编排了一下词句，把土耳其政府原来的建议变成了一种直接与它相反的东西。这样就有新的理由来进行争论了。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整个 8 月和 9 月就都花费在发布命令和取消命令上面了。甚至从蓝皮书中文件的排列次序上也可看出英国

政府的弄虚作假。为了把读者搞糊涂，克拉伦登给考莱的急电竟印在第 248 页上，在急电之后，从第 248 页到 252 页，是雷德克利夫在 7 月 19 日发出的急电的摘录、辛普森在 7 月 16 日写给雷德克利夫的信、奥美尔-帕沙的信件和他提出的备忘录，最后才是雷德克利夫在 7 月 23 日发出的急电，看起来似乎由于这份急电才产生了克拉伦登给考莱发出的指示。

现在我们应当简要地谈谈唐宁街外交部的活动，并仔细地研究一下在那里热心地充当伟大的帕麦斯顿主要办事员角色的克拉伦登伯爵。克拉伦登在给雷德克利夫发出急电之后过了两天，于 7 月 16 日又给他发了一份急电，急电的结尾是几句话：

“女王陛下政府仍然建议派去援助卡尔斯守军的一切部队都开到特拉比曾德去。如果奥美尔-帕沙（我听说他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一定要带领他的某一部分军队以及突尼斯和阿尔巴尼亚部队一起去列杜特-卡列，女王陛下政府也不反对。”

雷德克利夫在 7 月 23 日从君士坦丁堡寄发的急电，于 8 月 1 日到达伦敦，整整用了九天，可是克拉伦登在 7 月 16 日发出的急电却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君士坦丁堡。因此，7 月 30 日，当雷德克利夫说下面这些话时，君士坦丁堡还没有接到这份急电：

“女王陛下政府坚持 via（取道）特拉比曾德派遣增援部队，这会使土耳其政府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

可见，雷德克利夫还没有接到克拉伦登的急电，急电中说女王陛下政府一点也不反对远征列杜特-卡列，如果奥美尔-帕沙本人打算这样做的话。这个奇怪的军事外交悲剧演出前后顺序的特点是：一切旨在拖延时间的急电都到得特别快，而那些似乎主张迅速行动的急电却不知什么缘故到得特别慢。但是，在我们引

证的克拉伦登的最后一份急电中，还有一个同样令人吃惊的地方。雷德克利夫勋爵在7月19日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急电中说，他得悉奥美尔—帕沙突然来到君士坦丁堡后，感到很惊讶；可是克拉伦登早在7月16日，即奥美尔—帕沙离开克里木的那一天，就从伦敦通知雷德克利夫说：“我听说奥美尔—帕沙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我们知道，奥美尔—帕沙自己是在7月14日，即军事会议结束以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从14日到16日这段期间，并没有一只船从塞瓦斯托波尔开往君士坦丁堡，因而奥美尔—帕沙不得不请求莱昂斯海军上将让他调用英国军舰“勇敢号”。外交部从伦敦拍出的电报需要17天才能到达君士坦丁堡，而它从克里木收到报道事件的电报却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这难道是可以相信的吗？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塞瓦斯托波尔和瓦尔那之间的联络是通过海底电报实现的，而瓦尔那和伦敦之间的联络则通过电报；因此，克拉伦登在军事会议开会的当天就能收到消息。但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电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当然，在蓝皮书里是没有的。它干脆被删掉了。但为了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使克拉伦登收到关于奥美尔—帕沙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消息的那条电线又通知他说，奥美尔—帕沙遭到了佩利西埃的反对，也就是遭到了法国政府的反对。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克拉伦登平心静气地从7月16日一直等到8月1日，而不把这方面的消息告诉法国政府，不同法国政府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结局问题进行谈判？为了防止产生这样的问题，上面提到的电讯就被隐藏起来了。但是，既然克拉伦登删去了从克里木拍来的电报，那为什么他又公布自己在7月16日从伦敦发出的急电呢？既然不能肯定这份急电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君士坦丁堡，那末在蓝皮书中的遗漏也就不算什么

大的漏洞了。这里追求的是双重目的。一方面是要表明英国政府不顾波拿巴制造的那些困难，它是准备援助卡尔斯的，这样就可以把拖延时间的全部责任推到波拿巴身上。另一方面则要证明克拉伦登是相信7月23日的假电文的，在他不知道土耳其政府决定硬要奥美尔-帕沙指挥叶夫帕托利亚的军队以前，他就准备让奥美尔-帕沙率领他的任何一部分军队。的确，当他知道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不顾奥美尔-帕沙和土耳其政府的种种抗议而坚决支持它。克拉伦登的一切行为——鼓励土耳其政府在整个7月份内从事研究维维安的远征问题，把同波拿巴的谈判推迟到8月，在给巴黎的急电中用捏造的建议（波拿巴接受这个建议无疑会在这个错误的喜剧中引起一场新的混乱）来代替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建议——所有这一切行为是为了一个目的：消磨时间。

三

1855年8月2日考莱勋爵从巴黎发出电报，说“瓦列夫斯基伯爵预料到”克拉伦登以土耳其政府的名义提出的“方案必将遭到反对”。这样一来，狡猾的克拉伦登伯爵就有机会在8月3日的急电中显示自己的爱国热忱，把卡尔斯和埃尔斯伦一旦落到俄国人手里而可能发生严重后果的责任推到法国政府身上。第二天，即8月4日，克拉伦登接到巴黎如下一份电报：

电报

考莱勋爵致克拉伦登伯爵

1855年8月4日于巴黎

法国政府将不阻挡奥美尔—帕沙计划进行的小亚细亚远征，条件是：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不能减少。

尽管有这个条件限制，电报仍然表明，克拉伦登在8月1日以土耳其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建议完全被接受了，根据这个建议，驻在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应交由奥美尔—帕沙指挥，而代替这些部队的应当是维维安将军的部队。当天，克拉伦登打电报给雷德克利夫：

“8月4日。奥美尔—帕沙可以去援助卡尔斯，条件是他不能减少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并且不能动用叶尼卡列的守备部队。”

法国政府只是反对缩减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又增加了一道障碍，即禁止动用叶尼卡列的土耳其部队。8月8日克拉伦登接到威廉斯将军在7

月 14 日从卡尔斯发出的信，信中报告穆拉维约夫将军于 7 月 11 日和 12 日在要塞附近进行了侦察，7 月 13 日

“他率领自己的全部军队出现在地势高于卡尔斯的南部高地上，这些高地是我们进行防御的咽喉要地，1828 年卡尔斯就是由于这些高地失守而被攻陷的”。

这封信的最后几句是：

“我刚才得到消息说，俄国将军正在等待从巴雅泽特 via (取道) 居姆里来的增援部队，不久前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调出的守备部队也在向格鲁吉亚腹地推进，这些部队将会参加小亚细亚未来的军事行动。”(第 276 号文件)

克拉伦登一听说俄国增援部队的消息，他的减少土耳其部队人数的意图就获得了新的动机。他立即拟就了一份急电，并补充了自己提出的 *index militum prohibitorum* (禁止动用的部队名单)：

电报

克拉伦登伯爵致雷德克利夫勋爵

1855 年 8 月 9 日于外交部

维维安将军的部队应立即开赴叶夫帕托利亚。应把该地的 10000—12000 人的土耳其部队调出来由奥美尔—帕沙率领前往列杜特—卡列。驻在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不得减少。由奥美尔—帕沙率领开赴列杜特—卡列的土耳其部队的人员应由保加利亚或其他地方调出的部队补充，而不是从克里木调出军队来补充。

因此，我们看到，克拉伦登又重新扩大了自己的禁令范围。克拉伦登想起 7 月 15 日西蒙斯中校的急电中谈到，奥美尔—帕沙打算率领“他的一部分驻在这里(即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的军队，率领由叶夫帕托利亚调来的 25000 名步兵和 3000 名骑兵以及炮兵”进行行动，因此他现在就禁止土耳其政府动用刻赤的守备部队；他

把波拿巴反对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撤退军队的意见扩大到整个克里木，只是把叶夫帕托利亚除外，但是在叶夫帕托利亚，把要召回的部队的数量甚至也削减到 10000—12000 人，而不是他在 8 月 1 日给法国政府的急电中所提到的 2 万人。他像小丑那样幽默地授权土耳其政府在“其他任何地方”寻找部队。他在伦敦安装了炸弹，现在他可以静候这枚炸弹在君士坦丁堡爆发。

7 月 16 日在克拉伦登给雷德克利夫的急电中，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下面这段话：

“如果奥美尔—帕沙（我听说他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一定要率领他的某一部分军队到列杜特—卡列去，女王陛下政府并不反对。”

从 7 月 31 日傅阿德—埃芬蒂致雷德克利夫的信件、8 月 4 日雷德克利夫的复信以及 8 月 8 日雷德克利夫的信件（见第 282 号文件 and 附录）中可以看出，克拉伦登 7 月 16 日发出的急电到 8 月 8 日还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傅阿德—帕沙在信中确认，已经开始的准备工作（明格列里亚远征）停顿下来了，“因为还没有收到所期待的（来自伦敦的）官方的明确答复”，他拥护土耳其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计划，而“反对英国急电中的基本论点”，按照这些电文，“增援部队派往特拉比曾德时**必须**经过埃尔斯伦”。雷德克利夫在 8 月 4 日的复信中说：

“不久前，他不得不转达本国政府的意见，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同时痛苦地意识到，土耳其政府正处在极其艰难的境地”，而这种境况由于“他不得不说出的”意见而更加复杂化了；同时他还补充说：

“虽然女王陛下政府声明过，它坚决主张经过特拉比曾德和埃尔斯伦采取比较直接的行动，但是，如果为了从切尔克西亚方面进行牵制行动而利用

的兵力在成分上是单一的而且是可靠的，那末，女王陛下政府反对这种牵制行动的意见就很可能减少。”

雷德克利夫在 8 月 8 日给克拉伦登的急电中表示不满，因为政府

“仍然认为特拉比曾德有重大的意义，把它当做是可以提供实际援助的唯一地点……所有军事权威都坚决主张远征（明格列里亚远征）……尽管有许多理由来大力支持这个唯一可以实现的援助计划，但我还是把我的政府的完全相反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了土耳其政府”。

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克拉伦登（8 月 20 日）对雷德克利夫上述这份急电的答复：一方面要注意雷德克利夫的论断，即他认为英国政府在 8 月 8 日以前是反对明格列里亚远征的；另一方面要注意克拉伦登在 8 月 1 日寄往巴黎的计划，这个计划被冒充为土耳其政府自己提出的计划。关于第一点，克拉伦登声明说（见第 283 号文件）：

“您在发出急电之后想必已经收到了我的许多电报和我在 8 月 4 日发出的急电，从这些电报中您可以看到，女王陛下政府和法皇政府都同意奥美尔—帕沙到亚洲去进行牵制行动以援助卡尔斯；女王陛下政府在这方面不再坚持它最初的看法，即应当通过特拉比曾德来进行援助。”

除了 7 月 14 日的急电（克拉伦登在这份急电中反对明格列里亚远征并要求土耳其部队撤离卡尔斯和埃尔斯伦）和 8 月 9 日的急电（雷德克利夫当然不可能在 8 月 8 日收到这份急电）外，根据蓝皮书，克拉伦登根本没有发出过任何电报。克拉伦登说“在他的许多电报里”都否认英国政府禁止明格列里亚远征，这显然是撒谎。为什么他不提他在 7 月 16 日发出的急电呢？就是因为这份急电只能放在蓝皮书里，只是为蓝皮书写的，它从来没有越出

唐宁街外交部的范围。雷德克利夫显然觉察到给他设下的陷阱，于是在8月13日给克拉伦登写道（第286号文件）：

“阁下，我刚才读到您8月9日的来电。我相信，女王陛下政府同意从列杜特—卡列方面进行牵制行动将会使土耳其政府和奥美尔—帕沙感到极大的满意。上一封电报表示只能通过特拉比曾德向卡尔斯推进，这个意见曾经引起了明显的失望。”

雷德克利夫一点也不知道克拉伦登的许多“电报”。他只知道上一封表示“只能”通过特拉比曾德来进行远征的电报。他指的是7月13日的电报以及7月14日又加以补充说明的电报。他根本不知道有7月16日的急电这回事。我们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很简单。只要翻阅一下卡尔斯文件，每个人都会相信，英国政府是在坚持不懈地力图打乱土耳其政府的计划。然而我们所发现的伪造、歪曲和欺骗行为都证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是在弄虚作假的，同时还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政府早就有一个深思熟虑但又不敢公开讲明的计划。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克拉伦登8月20日的急电。

克拉伦登说：“奥美尔—帕沙作为苏丹部队的司令官，在决定调动自己部队的问题上有完全的自由，他可以通过最好的方式利用自己的部队来为共同事业服务；唯一限制他的行动自由的就是两国政府提出的下列条件：向亚洲的进军不能引起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尼卡列城郊土耳其部队人数的任何缩减，而维维安将军指挥的土耳其部队可以利用来代替奥美尔—帕沙可能从叶夫帕托利亚带走的那部分土耳其部队。”

按照克拉伦登8月1日拍往巴黎的急电，土耳其政府曾经建议把从叶夫帕托利亚调来的部队交给奥美尔—帕沙指挥，而不动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军队。他怎么能把简单地同意土耳其政府自己提出的建议称为“对奥美尔—帕沙行动自由的限制”

呢？但是另一方面，既然雷德克利夫的急电（即他答复的那份急电）已经提醒他：奥美尔—帕沙打算从巴拉克拉瓦调走 17000 人，从刻赤调走 3000 人等等，那末他是否还能采取别的做法呢？因此，他在给巴黎的急电中作为土耳其政府自己的建议而提出的意见，现在又作为土耳其的西方盟国的意见而强迫土耳其政府接受了。

在 8 月 13 日以前——正好是奥美尔—帕沙向联军将领提出他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计划后一个月——土耳其政府受到英国政府反对远征的严重影响，因而停止了为援助卡尔斯而作的全部准备工作。直到 8 月 13 日，土耳其政府才终于摆脱了这种悲惨处境，并且满意地得悉，它的西方盟国同意了它在 7 月 22 日所作的决定。现在它终于有可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对付穆拉维约夫，而不是对付克拉伦登。8 月 15 日召开了奥斯曼帝国会议，讨论和寻求援助卡尔斯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次讨论的结果使人感到十分惊讶，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雷德克利夫在 8 月 16 日给克拉伦登的急电（第 294 号文件）中说道：“奥美尔—帕沙极其坚决地反对伦敦来电中所转达的在叶夫帕托利亚配置部队的计划，他认为，如果不允许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参加远征，他就不可能负起指挥远征的责任。”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把叶夫帕托利亚计划通知伦敦的日期似乎是 7 月 23 日，而现在可以断定，它从伦敦转到君士坦丁堡的日期是 8 月 9 日。

8 月 16 日西蒙斯中校也拍给克拉伦登一封急电（第 297 号文件）：

“阁下，我应当向您报告，土耳其陆军大臣接到了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通知，得悉女王陛下政府决定派遣土耳其部队到叶夫帕托利

亚去，他把这个决定转告了奥美尔—帕沙阁下。奥美尔—帕沙认为，这种调动不能使土耳其政府集中必要的力量来实现旨在解救卡尔斯军队的亚洲进军，于是他就向土耳其陆军大臣打了一个报告……奥美尔—帕沙虽然坚持带走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部队，但是也会从这些部队以及在刻赤的土耳其部队中抽出一部分所需要的兵力来补充英土部队，使这个部队的兵员满额……在我看来，帕沙的建议是唯一有希望能解救卡尔斯军队的建议，当然必须遵守英国和法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帕沙阁下是知道这个条件的），即进行远征不应当引起克里木部队人数的大大缩减。因此，奥美尔—帕沙向联军将领们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我在7月15日的急电中报告过这个建议）不可能付诸实现。帕沙对进行远征现在是否能及时解救卡尔斯守军这一点表示怀疑。但是，即使不能援助卡尔斯，远征无论如何会阻碍敌人在埃尔斯伦的帕沙辖区内修筑防御工事，阻碍他们在下一次战局中向腹地发动新的进攻。”

西蒙斯中校在上述急电中摘引的奥美尔—帕沙致土耳其陆军大臣的备忘录，附在雷德克利夫8月16日给克拉伦登的信中。我们把备忘录中所谈的意见援引如下：

“目前驻在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成分复杂——它们是由突尼斯人和埃及人组成的，他们缺乏陆上运输工具……他们既不能行军，又不能机动……假如习惯于炎热气候的埃及人不得不到亚洲去，在即将来临的冬季气候条件下进行军事行动，那末，他们就不能采取必要的机动，而且成分复杂的军队是很少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如要实现这一计划，那就会破坏土耳其军队和不列颠军队的团结，不应当忘记，在战争时期，军队的战斗力，甚至军队本身的存在，多半取决于它的队伍的团结……帕沙指出，每一个指挥作战的将军都应当预见到他在战争中可能会遇到的最艰难的情况，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防止失败。他指出了以下这种情况，即卡尔斯的军队可能在他到达亚洲之前就被消灭，而俄军在占领这个地点之后可能会继续向前推进，他说，他的军队成分复杂，对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完全信赖的，因此他可能会陷入目前亚洲军队所处的这种困难的境地……”

每一个受委托去采取某次军事行动的将军，对这次行动及其实现的方法应当是同意的，这样他才能被认为是为这次行动的进程负起了责任。英土部

队在得到从保加利亚和刻赤调来的队伍的补充而达到满额后,其人数将同他指挥下的几个师的人数大致相等。至于说到联军部队的人数,如果采纳了他的意见,那就用不着减少了。相反,如果实现伦敦发来的计划,那末土耳其陆军大臣为补充叶夫帕托利亚守备部队而提出的全套既定措施就将遭到破坏,而且必然会造成时间上的拖延,因为不得不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

因此,按照奥美尔-帕沙的意见,实现伦敦的计划就必然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土耳其军队会丧失掉最后一点战斗力,土耳其军队和不列颠军队的团结会遭到破坏,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会故意被派去送死,补充叶夫帕托利亚土耳其部队的全部既定计划会遭到破产;同时也必然会造成时间上的拖延,奥美尔-帕沙在军事上的声望会遭到损害,而明格列里亚的军队也会遭到和卡尔斯守军同样的命运。雷德克利夫在把这个强硬的抗议转告克拉伦登时,甚至没有想到,他自己成了一种工具,正如人们所说的,土耳其政府通过这个工具,似乎把一个与伦敦的计划相同的计划转给了克拉伦登勋爵。

因此,我们有新的无可争辩的根据来证明,7月23日急电中所述的土耳其政府的建议,乃是伦敦的伪造物,而克拉伦登在8月1日的电报中向法国政府提出这个计划时,就已很明显地意识到,他是在进行笨拙的伪造勾当。

克拉伦登的计划准确地按照他的意图实现了。土耳其政府终于得悉:英国政府一般是同意土耳其的远征的,但同时也了解到,英国政府反对实现这次远征所必需的一切细节。在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浪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反对克拉伦登的埃尔斯伦方案之后,现在又不得不浪费更加宝贵的一个月——8月来反对他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

在8月20日雷德克利夫给克拉伦登的急电中，附有奥美尔—帕沙的第二份备忘录，这一份备忘录的内容和前一份一样，但作了如下的补充（见第296号文件）：

“任何一个企图不顾一切军事原则来实现这种战斗行动的将军，都会使自己在军事上的声望遭到损害，此外，还会使联军的整个计划受到威胁。我是既不愿意造成前一种结果，也不愿意造成后一种结果的。

即使我接受了指挥任务，这对事业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他把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形容为“不守纪律、成分复杂和没有经验的部队”。

8月30日（见第298号文件：西蒙斯给克拉伦登的电报），奥美尔—帕沙根据土耳其陆军大臣的副官（他在8月5日离开卡尔斯，8月19日到达君士坦丁堡）带来的消息，把卡尔斯的局势告诉西蒙斯：

“在他离开卡尔斯的时候，卡尔斯城仓库里为守军储备的粮食只够用一个月，或者最多能维持五个星期；守军的弹药供应也不足。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穆拉维约夫将军曾对他的军队（在得到增援后，目前约有5万人）宣布过，他要用围困的方法占领卡尔斯，即不费一枪一弹来夺取这个城市……俄军强迫周围8小时行军路程（28英里）范围内的居民运走一切食物……埃尔斯伦的守军由6000人的正规部队和12000人的非正规部队组成；然而有许多非正规部队正在离开城市并且瓦解了。”西蒙斯说：“从同奥美尔—帕沙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土耳其政府被亚洲的悲惨局势弄得非常苦恼，到本月底或9月初，卡尔斯的守军（16000人和将近200门火炮，其中约70门野炮）将会丧失殆尽，这种十分明显的前景几乎把它弄到绝望的地步……土耳其政府感到非常悲痛和失望的是：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而巴黎和伦敦内阁以及克里木军事当局却未能像土耳其政府那样十分重视事态的发展，只是一味反对旨在改善土耳其政府的处境和防止灾祸而一直提出的那些建议。”

8月21日，在土耳其政府召开的会议上（第299号文件：8月23日西蒙斯给克拉伦登的电报）

“作出决定，要以最大的毅力来采取行动，利用土耳其政府所掌握的一切物资来实现奥美尔—帕沙提出的计划…… 决定向英法大使提出照会，让他们知道土耳其政府的决定，并请求他们政府的舰队协助把土耳其部队、火炮、器材以及陆上运输工具运到亚细亚沿岸地区…… 土耳其政府已经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来组织进军以支援卡尔斯守军和恢复亚洲的局势，如果它（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计划一个也不能实现，那末将来发生灾祸时，它就不负任何责任。为了准备调遣部队，土耳其政府现在正派舰前往西佐波耳，在那里将开始载运部队等等。显然，土耳其政府仍旧有些疑虑：在英土部队已接到伦敦的要它们开往叶夫帕托利亚去的命令后，它是否还要采取这样坚决的步骤”。

8月已经快完了，而土耳其政府仍然感到自己在行动上受到克拉伦登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的束缚。卡尔斯来的消息越坏，它的顾虑也就越大，最后它终于设法使当时已经到达塞瓦斯托波尔的雷德克利夫拍发了如下的一封电报（第290号文件）：

雷德克利夫勋爵致克拉伦登伯爵

8月26日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

我请求立即明确地给予指示：奥美尔—帕沙是否可以从巴拉克拉瓦带走全部或一部分土耳其部队，条件是这些部队将由同等数量的其他部队来代替，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允许让维维安将军的部队去占据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阵地，而不是要它到叶夫帕托利亚去。人们天天在等待着奥美尔—帕沙。而奥美尔—帕沙提出授权他采取上述行动作为进行远征的先决条件。他举出了充足的论据来说明这一点。假如我们能够拨出运输工具，那末一个月之后，部队大概就能在列杜特—卡列登陆。威肋埃尔士伦的俄军已经向卡尔斯方面撤退。据报道，土耳其军队在8月初拥有的存粮大约可以维持两个月。

四

克拉伦登通过他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终于在整个 8 月里阻挠了土耳其政府的一切行动。威廉斯将军曾经说过：“卡尔斯的粮食恐怕吃不到 9 月初”，雷德克利夫的急电证实了他的话。下面我们引证的备忘录（第 315 号文件的附录）表明，卡尔斯的土耳其守军以怎样非凡的自我牺牲精神坚持超过了威廉斯所说的期限。

1855 年 9 月 1 日于卡尔斯

我们用粮非常节省。兵士们只分配到半份面包和肉食或者米饭。有时候没有面包，只有 100 德拉姆的面包干，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没有钱发。3000 名伊斯兰教居民组成的步兵快要饿死了。阿尔明尼亚人接到了在明天撤离城市的命令。没有大麦，几乎没有任何饲料。马匹瘦成一副骨架子，不能再被守军利用了；炮兵用的马匹很快也会变成这副样子。怎么能牵引野炮呢？……采取什么办法来挽救这支军队呢？

署名：威廉斯

克拉伦登刚一确信卡尔斯的粮食最多能吃到 10 月初，而另一方面雷德克利夫又向他证实了，甚至在联军的运输船只的帮助下，奥美尔—帕沙的部队最早也要到 10 月初才能抵达列杜特—卡列，因此他认为促使法国政府采纳土耳其计划就不会再有多大的危险了。此外，克拉伦登知道，他正是在即将对塞瓦斯托波尔实行强攻的时候向法国政府提出要求的，因此，佩利西埃就有极充分的理由不让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部队在人员上有任何变动。为了隐瞒已收到的情报，他摘引了雷德克利夫的急电，并且歪曲了它的

原意。下面就是克拉伦登给考莱勋爵的急电：

1855年8月28日于外交部

女王陛下政府相信，帝国政府是会同意对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在8月26日从巴拉克拉瓦发出的急电作下列答复的。既然如此，就请阁下把这个答复直接通过潘缪尔勋爵转给辛普森将军，假如雷德克利夫子爵还在巴拉克拉瓦，辛普森将军会把这个答复通知他的。答复全文如下：“奥美尔—帕沙可以把他所认为需要的他的部队从巴拉克拉瓦带往亚洲；这些部队应当由从维维安将军的部队中抽出同等数量的部队，或者根据联军将领的决定由从叶夫帕托利亚调来的部队来代替；在取得海軍上将军们的同意后，应当发布一些关于运送他的部队的相应指令。”

署名：克拉伦登

甚至在这份急电中，克拉伦登也忍不住要得罪土耳其政府。尽管他从奥美尔—帕沙的许多备忘录中清楚地知道，从叶夫帕托利亚抽出部队来代替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并且会给整个计划带来极大的害处，然而他还是似乎 *en passant*（顺便）向法国政府建议由维维安的部队或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来代替塞瓦斯托波尔的部队。巴黎的答复是这样的：

电报

考莱勋爵致克拉伦登伯爵

1855年8月29日于巴黎

法皇不反对从巴拉克拉瓦调走土耳其部队和用其他部队来代替它们，如果联军最高统帅们对此表示同意的话；然而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自己没有责任发表什么更多的意见。我拍了一封电报给辛普森将军，在“亚洲”这个词后面加上“如果您和佩利西埃将军不反对的话”。

克拉伦登勋爵迫切地希望在这个危急关头加速实现明格列里亚远征，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9月7日他给西蒙斯中校的急电中，

这份急电是作为普通邮件发出的，因此，西蒙斯在9月23日才收到。克拉伦登在9月5日收到了西蒙斯中校的下列急电（第301号文件）：

“阁下，我应当向您报告，奥美尔—帕沙对我说，他最早也要过5—6天才能离开君士坦丁堡，因为他正忙于进行远征亚洲的一切必要准备工作，为了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他在这里是绝对必要的。”根据土耳其政府采取的措施，“奥美尔—帕沙只能依靠土耳其舰队把不到5万人和3400匹马分两次运往亚洲，而且把部队全部运完可能需要3—4个星期，即每次要用10—14天……奥美尔—帕沙很希望联军帮助他运给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部队及其武器装备，以及西佐波耳的辎重马；他认为，如果准许英国舰队在把指定代替巴拉克拉瓦部队的部队运到以后，再从塞瓦斯托波尔把部队运往亚洲，这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办法。”

克拉伦登对这个急电的答复如下：

克拉伦登伯爵致西蒙斯中校

1855年9月7日于外交部

先生！

您在8月26日的急电中关于奥美尔—帕沙提出的支援亚洲军队的措施的报告，是同女王陛下政府得到的最晚的消息相矛盾的。您在急电中说，奥美尔—帕沙打算从塞瓦斯托波尔带走一部分土耳其军队，并且用维维安将军的部队来代替它们。但是从辛普森将军后来拍发的电报中得悉，奥美尔—帕沙认为，在明年春天以前，维维安将军的部队不适于占据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阵地。根据这个意见，并考虑到辛普森将军反对把部队调到他那里去（他的反对也是以上述意见为根据的），女王陛下政府决定，不把部队派去同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军队会合。

克拉伦登

我们注意到，辛普森这位无能败将的急电在蓝皮书里是被漏掉了，奥美尔—帕沙的“意见”是一种借口，所谓“最晚的日期”，即奥美尔—帕沙提出与他在8月26日的意见相矛盾的新意见的日期是

在7月初,这一点可以从西蒙斯中校的急电的下列摘录中看出来。这个急电是西蒙斯中校在1855年9月23日从卡马累兵营发出的。

“阁下,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奥美尔-帕沙还是在7月初……而且是在他知道亚洲军队处在危急状态之前给辛普森将军的信中就提出了这种看法。当时他已经表示他坚信辛普森将军并不打算在开阔地上(en rase campagne)与敌人发生冲突时就使用维维安的部队…… 腊格伦勋爵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我是否认为有可能利用维维安的部队来占据巴拉克拉瓦城郊的防线,当我问奥美尔-帕沙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对我说,假如腊格伦勋爵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话,他看不出这方面会有什么障碍。”

辛普森转达了奥美尔-帕沙在明格列里亚远征问题提出讨论以前所表示的意见,并且捏造了他的这个意见,然后根据捏造的东西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不言而喻,辛普森是在他“脑筋迟钝”的情况下按照从伦敦收到的秘密指示行动的。可怜虫辛普森是帕麦斯顿的创作之一,是他的哥列姆之一。所谓哥列姆,就是像德国诗人阿尔宁所说的³²⁸,这原是些大土块,奇妙的魔术师把它们变成人的模样,并赋予他们人为的生命。假定辛普森完全是按照克拉伦登急电中所说的那样写的(蓝皮书里漏载了这份急电,说明这也是有问题的),那末,当时克拉伦登无论对日期或对奥美尔-帕沙的意见的实质都不可能产生丝毫怀疑。早在7月15日,西蒙斯就告诉他,奥美尔-帕沙认为,“维维安的部队虽然可以担当警备勤务,但还不能派他们深入腹地”,在后来的急电中,他又说,“在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维维安的部队将被配置在内层防线上”,而不把它们放在“开阔地上”。

奥美尔-帕沙的明格列里亚远征的经过情形在蓝皮书里没有记载,但是已经透露出来的材料足以表明,盟国政府甚至在较晚的时期,即在他们十分勉强地同意远征以及在塞瓦斯托波尔南区

已被占领的时候，还在远征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西蒙斯在9月21日从卡马累兵营给克拉伦登写道：

“9月18日佩利西埃将军同意把三个土耳其猎兵营从这里派往亚洲。过一两天，他们就要经海路到达巴士姆。到目前为止，佩利西埃将军还没有同意把驻在这里的其他土耳其部队派到亚洲去。”

9月26日雷德克利夫说：“土耳其政府对我的询问肯定地答复如下：部队的运送和军粮的运输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很缓慢，因为为这一目的而提供的运输工具的数量很有限。不能不看到，计划的无止境的变动，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刻不容缓的需要，对运输工具的大量需要——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得解救卡尔斯的希望正在减小。”

但是，计划的无止境的变动，这是英国内阁一手造成的；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刻不容缓的需要，这是一个空洞的借口，因为联军在占领这个城市之后，守卫的只是一片废墟，而必要的运输工具之所以缺乏，是因为唐宁街一直在发布一些徒劳无益的命令，把维维安部队从瓦尔那运到叶尼卡列、刻赤、叶夫帕托利亚，又从这些地方运回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些阴暗的预感由于土军9月29日在卡尔斯城郊对俄军强攻纵队的像流星般的光芒一样的胜利而瞬息间消逝了。威廉斯将军在当天写的报告中把这一天称为“土耳其军队的光荣日”。他在10月3日的报告（第342号文件）中告诉克拉伦登说：

“在几乎延续了7个小时之久的战斗中，土耳其步兵同炮兵一样，也表现出了无比的英勇；如果想到兵士们几乎4个月来一直在修筑防御工事，而在夜间又要守卫这些工事，如果想到他们的衣着很差，领到的口粮不足半份，有29个月之久没有领到薪饷，那末我认为，阁下您应当承认他们的表现是值得全欧洲称颂的，他们无疑有权被列为欧洲的第一流军队。”

土耳其政府在接到这则令人兴奋的消息之后，就向卡尔斯的

保卫者拍发了贺电（第 345 号文件），贺电中写道：

“我们对鼓舞阁下的那种大无畏精神和热情，对上帝所赐予的无上恩典深信不疑，在这方面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另一方面，我们日以继夜地在谋求迫使敌人撤除围攻的方法。关于这次胜利的令人兴奋的消息，鼓舞我们更加生气勃勃地工作。”

这则消息在克拉伦登的内心里将激起多么旺盛的新的生命力啊！他日以继夜地寻找一些方法，以阻碍土耳其政府所想出的办法的实现，因此他难道不想慷慨其词地大谈一番至少是假表同情的廉价的漂亮话吗？可是完全不是这样！他自己打错了算盘，于是就在一份简短的带有挑衅性的讽刺急电（第 346 号文件）中把怒气发泄在土耳其政府身上：

“……孤立无援的卡尔斯守军会满意地知道，至少他们的痛苦……打散了土耳其大臣们的宁静，这些大臣们因为缺乏一切通常的援助办法，所以只能始终不停地为守军的安全和顺利祈祷。”

克拉伦登过去是阿伯丁的沉默寡言的朋友，可是在这里却充当帕麦斯顿的可怜的传声筒。

自从 9 月 29 日在卡尔斯城郊击退了俄军的攻击以后，到 11 月 24 日要塞投降为止，又过了将近两个月。英国政府是怎样利用这段时间来改善局势的呢？第一，它迟迟不给奥美尔—帕沙调拨必要的运输工具。10 月 2 日“泰晤士报”记者奥利芬先生从奥美尔—帕沙的兵营报道说：

“土耳其军队将逐渐成为一支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一旦从巴拉克拉瓦调来的 1 万名土军到达这里之后（联军将领们终于勉强同意把它们调来），土耳其军队就将近有 5 万人了。部队迟迟不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克里木的司令部拖延时间，它不给运输工具，所以不能把部队运到这里来，显然，司令部根本没有考虑部队来不来这里的问题。非常遗憾，奥美尔—帕沙对这次远征

感到不安的唯一重大原因也就是已经造成了那么多灾祸的那个原因。”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早在7月份，帕麦斯顿在议会关于给土耳其贷款问题进行辩论时就说过，土耳其政府现在感到资金极端缺乏，它今后的全部行动将取决于它目前是否能得到资金。议会同意给予贷款，而英国政府在1855年8月也宣布了这笔贷款；但是从呈交议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在拨给土耳其政府500万英镑贷款中，到1856年1月29日只支付了200万，甚至这笔款项也是分成数目不大的10万英镑一份寄出的。

还在1855年11月24日，土耳其政府就作过声明（见第353号文件，附录4）：

“最后，阁下（土耳其陆军大臣）来看我并对我说，关于他为援助卡尔斯守军而作的不断努力，我知道的一定不比他少。奥美尔—帕沙是由于种种原因而耽搁下来的，可惜他无权来说明这些原因。这是联军的事情。一开始就很明显：没有留在克里木的军队的协助，土耳其军队所能采取的那些措施，是不足以实现预定目的的……陆军大臣阁下极其坚决地继续向我说明，由于迟迟未付给贷款，土耳其军队绝对不能完成今后作战所必需的一切任务。他们为满足军队需要而采购的100万公斤粮食还没有到手，因为他们付不出钱……他已经写信给总理大臣说，从今天算起，如果在一星期内还不能拿到这笔款项（贷款）他就要辞职了。”（曼斯菲尔德将军致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信）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恰好在卡尔斯投降的那一天，土耳其陆军大臣令人信服地向英国军事顾问说明了这场灾难的真实原因，即由于联军不让土耳其政府调动它自己的部队，所以奥美尔—帕沙的远征就拖延下来了，后来又由于英国政府不让土耳其政府使用它自己的资金，所以在10月和11月，一切战斗行动就都停止了。

当11月24日卡尔斯决定投降的时候，

“兵士们每天成百成百地饿死。他们变得骨瘦如柴，既不能作战，也无力逃跑。妇女们带着孩子到将军家里去要饭吃，并且把孩子扔在那里；满城全是尸体和快要死亡的人”（第 366 号文件）。

在克拉伦登不断打乱土耳其政府的计划、使它的兵力失掉活动能力并迟迟不把它自己的钱交给它的整个时期内，我们看到，他由于劝土耳其政府坚决行动、责怪它动作缓慢而一再使被束缚住手脚的土耳其政府感到讨厌。在世界史上未必能找到比英国政府所干的事情更能引起人们苦笑的事情了。英国政府由于在克里木、波罗的海和太平洋上进行冒险活动并且重赏促成这些失败的肇事人，而把英国变成了欧洲的取笑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同一个英国政府又以古罗马的卡托一般的最严厉口吻责备土耳其政府，说它的军事活动家和民政当局犯了错误。萨德勒之流的政府愤怒地指责帕沙们的卖身投靠；科德林顿和埃利奥特之流的靠山们坚决要求惩办塞里姆—帕沙和塔希尔—帕沙；辛普森的 improvisatori（即席作者们）生气地对奥美尔—帕沙的靠山们皱起眉头；潘缪尔——“请关怀一下多布”——教训土耳其陆军大臣；唐宁街及其斯密斯之流的医生们，以及它的菲耳德之流、艾雷之流和戈登之流甚至在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的会议上，为了在装运洗膛杆和冲子时没有捆扎好，没有用蒲席包装而责骂特拉比曾德的某一位帕沙，——这就是东方战争的真情实况。而首先要看到的是勇敢的克拉伦登用他那扣人心弦的言词在抱怨土耳其政府的冷漠态度！他就像一个正式的瑟息替斯那样，在责备丹纳士诸女，说她们没有把自己的无底桶填满。

卡·马克思
普 鲁 士³²⁹

把法国变成赌场又把拿破仑帝国比作交易所的无法遏止的买空卖空现象，决不局限在这个国家的疆域之内。这个不受政治界限约束的瘟疫越过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莱茵河，并且（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席卷了庄严的德国。在这里，思想领域内的投机已经让位给有价证券的投机，summum bonum（至善美德）让位给奖金^①，辩证法的奥妙的语言让位给交易所的同样奥妙的语言，追求统一的愿望让位给获取股息的强烈欲望。莱茵普鲁士由于靠近法国，也由于它的工商业的高度发达，所以第一个传染上了这种疾病。科伦的银行家们不仅同巴黎的大骗子们结成了形式上的联盟，同他们一起收买了“比利时独立报”³³⁰作为共同的机关报，在卢森堡创设了国际银行之后，他们不仅把德国的整个西南部吸引到《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的漩涡里来，而且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疆域内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以致现在除去工人和小农外，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已卷进大发横财的狂热里了，甚至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也离开了通常的途径，参加到最危险的冒险行径中来，每一个小店主也都变成了炼金术

^① 额外的股息，——编者注

士。普鲁士其他地方也避免不了这种流行病，这从政府报纸“普鲁士通讯”的下列摘录中就可以看出：

“最近对金融市场情况的观察证明着这样一种推测，即一个周期性的可怕的商业危机又在迫近。开始是在国外发生的无法遏止的投机的狂热浪潮，去年以来也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不仅柏林交易所和普鲁士的资本家已被卷入这个漩涡，而且从前竭力避免直接参加证券交易所的危险交易的那些社会阶层也已卷入这个漩涡。”

普鲁士政府用这种对于迫近的金融危机的恐惧，作为说明它不允许成立《Crédit Mobilier》的理由，因为它怀疑银行的光耀夺目的招牌掩藏着骗人的目的。但是，在这一种招牌下被禁止的东西，可以在另一种招牌下创办起来；在柏林不允许的，在莱比锡和汉堡可能准许。战争结束后，尽管出现了通常随着缔结和约而来的商业的虚假繁荣现象（像 1802 年和 1815 年出现过的），投机狂热病的新阶段仍然开始了。这次我们看见了一个特点：普鲁士形式上表示愿意为西方资本和投机买卖开放自己的市场。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其支线通达北京的伊尔库茨克大铁路的消息和其他同样宏伟的计划；问题不在于真正打算实现的是什么事情，而在于什么样的新鲜材料可以利用来维持投机的风气。为了加速普鲁士政府所如此害怕的大崩溃，光是和约是不够的。

如果普鲁士的工业最近几年来没有获得大的成绩，那末它这次破天荒地参加欧洲的投机事业就会是不可能的。从 1840 年到 1854—1855 年间，仅仅投入铁路的资本就从 1900 万普鲁士塔勒增长到 15400 万。现在正在修筑的铁路的成本规定为 5400 万塔勒；此外，政府批准了修筑成本为 5700 万塔勒的新铁路线。从 1849 年起的时期内，出现了 87 个股份公司，资本为 8300 万塔勒。

1854—1856 年间登记注册了 9 家保险公司，资本为 2200 万。在这两年内，拥有 1050 万资本的 6 家股份公司开办了大批纺织工厂。从“关于棉花的报告书”中可以看出，从 1853 到 1856 年期间运到欧洲各个港口的棉花总数是在起着怎样的变化。根据官方报告，上述各年的头 7 个月内棉花的出口捆数为：

	单位：捆			
	1853	1854	1855	1856
向英国出口·····	1100000	840000	963000	1131000
向法国出口·····	255000	229000	249000	354000
向欧洲其他港口出口·····	204000	179000	167000	346000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结论是，如果 1853 年欧洲大陆各国进口的棉花仅占输入英国的棉花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那末 1856 年欧洲各国的进口已达英国进口的八分之五。此外还应当加上英国向欧洲各国转口的棉花数量。向法国大宗出口棉花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其中大部分都从哈佛尔转运到瑞士、巴登、法兰克福和安特卫普去了。因此，上述数字说明的欧洲工业的发展，首先是意味着德国工业、而主要又是普鲁士工业的发展。地主们在战时由于荒年和高价所获得的利润同工业资产阶级近年来所积累的财富不相上下。在德国内部，不要说谷物的价格，就是马、牛、一般家畜都保持了十分高昂的价格，以致用不着外国市场的影响就能使大地主们能够大发其财。正是这种财富——这两个阶级从来没有经历过财富的这样迅速的积累——为目前正在普鲁士猖獗的投机狂打下了基础。

当这个肥皂泡破灭时，普鲁士政府就会经受严重的考验。从 1849 年起，普鲁士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反革命阶段，结果是人数不

多的贵族地主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曾经千方百计地协助加强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普鲁士国王，现在在同这个阶级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正像路易十八在同 *Chambre introuvable*³³¹ 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一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不愿满足于父亲遗留给他的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的政府机器。他一生都在幻想着以某种浪漫主义的哥德式的图案来装饰普鲁士国家的大厦。但是根据他的 *Herrenhaus*（贵族院）活动的经验，他很快就确信，实际上地主们，或者像普鲁士人所称呼的 *Krautjunks*（乡村绅士们），决不认为替官僚制度充当中世纪的装饰品是一种幸福；他们用一切力量竭力贬低这种官僚制度，把它降低到自己阶级利益的单纯工具的地步。这就说明了容克们和政府之间、国王和普鲁士王子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容克们为了向政府表示他们不是在开玩笑，他们刚不久就拒绝了批准和继续征收战时实行的附加税，这是在立宪的普鲁士从未听见过的事情。他们冷静而坚定地宣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着跟普鲁士国王在全国所有的同样充分的权力。他们顽强地力争使宪法成为对其他一切阶级来说是有名无实的东西，而对自己却具有实际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要摆脱官僚制度的任何监督，同时又想要这种官僚制度以双倍的力量压住所有其他的下层阶级。

叛变 1848 年革命的资产阶级不得已而看到，尽管借助于资本的不可遏止的积累而使自己获得了社会上的胜利，但是现在它却丧失了任何政治上的作用。加以 *Krautjunks* 蔑视最基本的礼节，正在兴高采烈地利用一切借口使资产阶级感到自己的卑贱。当资产阶级的演说家企图在众议院发言时，容克们 *en masse*（全体一起）离开自己的座位，当呼吁他们哪怕是听完跟他们的意见不

同的意见时，他们就对左派的先生们嗤之以鼻。当左派抱怨他们在选举时受到阻挠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政府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使群众不受蛊惑。当左派指出贵族报刊所享有的充分自由与自由派的报刊所受的各种限制刚好相反时，人们就提醒他们说，自由在基督教国家里并不意味着满足个人的任性要求，而是意味着满足上帝和最高政权的愿望。人们有时对左派暗示：“荣誉”是贵族的专有物，有时则用哈勒、博纳德和德·梅斯特尔的早已被抛弃了的理论的明显的例证来触动左派的痛处。一个以自己在哲学领域内造诣至深而感到自豪的普鲁士公民，在看到最优秀的学者被赶出大学，教育事业被委托给一帮蒙昧主义者，宗教法庭干预他的家务，而他本人在星期天都要被警察赶进教堂时，觉得受了侮辱。容克们并不以千方百计地摆脱纳税为满足；他们还把资产阶级硬塞进行会、社团，破坏他们的市政机关，废除了他们的法官的独立地位和不能更换的规定，结束了各种宗教派别的平等权利，等等。在极少有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在议院内不再抑制他们胸中所积累的仇恨，而鼓足勇气用将来要进行革命以威胁容克们时，容克们却挖苦地回答他们说：革命同资产阶级算的账并不比同贵族算的账少些。

要大资产阶级像 1848 年那样来重新领导普鲁士革命，的确是不大可能的。在普鲁士东部，农民不仅丧失了 1848 年革命在解放事业中所给予他们的一切，而且他们仍然像从前一样无论在行政方面或司法方面都直接隶属于贵族。在资本主要投于工业企业的莱茵普鲁士，用抵押的方法使农民变成奴隶的过程同债款利息增长的速度一样地飞快。当时奥地利政府虽然采取了某些细小措施来安抚农民，但是普鲁士却仍旧在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考验

着农民的耐性。至于工人阶级，政府对他们的罢工采取猛烈镇压的办法，阻挠他们从主人所得的利益中获取他们应得的那部分，并且经常不断地排斥他们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王朝内部的不和，由于官僚同贵族、贵族同资产阶级的经常争吵而使政府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系，全面的商业危机和备受压迫的阶级对社会一切上层阶级的不断增长的愤恨，——这就是现代的普鲁士。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4 月 1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5 月 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69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从本文起,马克思开始在“新奥得报”上有系统地阐述议会关于 1855 年英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 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以本名出版。

该报是在 1846 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编辑部发生分裂之后于 1849 年 3 月创办的,它采取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方针。在五十年代,该报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受到了政府机关刊物的迫害。

五十年代初,该报的领导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尔斯纳、泰梅和施泰因;从 1855 年 9 月起,摩里茨·埃尔斯纳任“新奥得报”主编;报纸的发行人是斐·拉萨尔的堂兄弟、德国政论家麦克斯·弗里德兰德,马克思是通过拉萨尔参加该报撰稿工作的。从 1854 年 12 月底起,马克思开始以伦敦记者的身分给“新奥得报”撰稿,每周投寄两三篇通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的反动年代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刊物进行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是很重要的;给“新奥得报”撰稿使马克思有可能同德国保持联系,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介绍给德国读者。针对着克里木战争,马克思不断地给“新奥得报”寄去有关战事进程的文章;他在论述战争事件时有时全面地利用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军事评论,把它们译成德文;马克思有时把对恩格斯文章的简述寄给“新奥得报”,在某些情况下还对这些文章作一些修改和补充。——第 3 页。

- 2 马克思在自己的分析议会辩论的文章中利用了“泰晤士报”发表的速记

- 记录,并且参考了汉萨德在伦敦出版的刊物“议会辩论”(《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马克思曾亲自出席过几次下院会议。——第3页。
- 3 指1854年10月25日(13日)巴拉克拉瓦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俄军给英土部队,特别是给英国骑兵以严重打击。恩格斯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页)。——第3页。
- 4 在公元前216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的统帅汉尼拔在坎讷(意大利)会战中击溃了罗马军队。——第3页。
- 5 “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页。
- 6 四项条款是西方列强在1854年8月8日的照会中作为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先决条件向俄国提出的要求。俄国必须放弃对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代之以全欧的保护,容许在多瑙河自由航行,同意1841年伦敦公约关于海峡问题的修订并放弃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沙皇政府起先拒绝接受四项条款,但是在1854年11月被迫同意把这几项条款作为将来和平谈判的基础。——第4页。
- 7 指英国、法国、奥地利在1854年12月2日在维也纳签定的同盟条约。按照条约,三国在没有达成初步协议之前不得同俄国签定任何协议,并且不容许俄军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一旦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英国和法国应当给予奥地利军事援助。四项条款应当成为同俄国进行谈判的基础。条约中规定,如果在1855年1月1日以前经过谈判还没有缔结和约,三国将议定下一步的一致行动。英国和法国力图借助于这个条约把奥地利拖进反俄战争,而奥地利则想利用同西方列强的联盟来加强它在巴尔干的势力,并使多瑙河各公国屈从奥地利的统治。——第5页。
- 8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年于伦敦创办。——第5页。

- 9 殉道派教徒（意即自我牺牲者），这是中世纪在伊朗对伊斯马伊耳派—阿萨辛派的秘密伊斯兰教派（什叶派）的最狂热的信徒的称呼，这个教派在十一世纪末由伊朗封建主创立，它反对在伊朗进行统治的突厥—塞尔柱人和十字军。——第 7 页。
- 10 皮尔派 是拥护罗·皮尔的那一派（即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存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对工商业资产阶级采取经济让步的政策。1846 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并导致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在五十年代，皮尔派是议会中的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不太大的党团，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是“没有军队的军官”；皮尔派参加了阿伯丁的联合政府（1852—1855），占据了包括军职在内的最重要的职位。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第 7 页。
- 11 “新奥得报”编辑部曾根据伦敦的电讯在马克思的文章末尾加上了下面一段话，本版已予删除：“据 1 月 26 日和 27 日伦敦电称，约翰·罗素勋爵在向议会说明自己辞职的原因的同时，还列举了其他有关文件以及他同阿伯丁勋爵的来往信件，他在信中坚决主张在军事领导方面作某些改变。按照他的意见，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军队的凄惨情况是不容置辩的，但是，他却不能根据自己的全部实际经验去判明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帕麦斯顿勋爵批评约翰·罗素勋爵的辞职理由，但同时却同意必须以最大的毅力进行战争。他肯定地说，全部舰只都被适当而有效地使用着，它们正在把部队、制服和粮食运往克里木；他要求进行关于信任或不信任政府的正式投票。罗巴克的演说——虽然可以看出演说人是病了——不断为全体议员的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阿伯丁伯爵在上院声称，虽然大臣们的有权势的同僚辞职了，但是他们仍然把反对关于任命调查委员会的提案看做是自己的职责。”——第 8 页。
- 12 是指罗素出版的“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1854 年伦敦版第 1—3 卷（*Memori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James Fox*）.Vol. 1—3, London, 1853—1854）。这本书的第 4 卷在 1857 年出版。——第 10 页。

- 13 皮由兹教派 是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以它的创始人之一皮由兹的名字得名。皮由兹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神学家，他号召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和天主教的某些教理。皮由兹教派的拥护者们在一些文章和小册子里阐述了他们的教理，这些文章和小册子是由他们以“当代的论著”（《Tracts for the Times》）的总标题出版的，由此产生了他们的第二个称呼：“论著派”。皮由兹教派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当时英国贵族力图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抵制大部分属于各个新教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第 12 页。
- 14 军队中军官官衔证明书的买卖制度在英国产生于十七世纪末。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 1871 年，它保障了英国贵族在军队中的垄断地位。关于这种制度，在卡·马克思的“军衔买卖。——来自澳大利亚的消息”一文中 有详细的说明（见本卷第 118—121 页）。——第 12 页。
- 15 “欧洲战争”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关于克里木战争的许多文章中的一篇。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 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于 1851 年 8 月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直到 1862 年 3 月，继续了 10 年以上；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文章常常随意处理，

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在1855—185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照例是作为社论发表的。在本卷所包括的时期内,只有两篇文章在该报发表时署上了马克思的名字。

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写稿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给该报写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14页。

- 16 见注108。——第14页。
- 17 见注6。——第14页。
- 18 恩格斯指自己的“俄国的兵力”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6—571页)。——第15页。
- 19 阿德里安堡和约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缔结的和约。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和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须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赋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的国家(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把这种自治法定下来。——第19页。
- 20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办;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20页。
- 21 论著派。——见注13。——第21页。
- 22 指第五次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战争期间英国舰队于1809年远征些耳

德河口。英军在占领伐耳赫伦岛以后，没有利用它作为扩展军事行动的基地，4万名登陆部队因饥饿和疾病损失了1万人左右，因而被迫撤离该岛。——第21页。

- 23 “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作合作的许多范例之一。1855年1月30日马克思寄给恩格斯一份论述下台了的阿伯丁联合政府的材料，而在1月31日寄给恩格斯的信中则拟就了这篇文章的详细大纲。根据这个材料，恩格斯于2月1日写成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刊载在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就同一问题为“新奥得报”写了“被推翻的内阁”和“两种危机”两篇文章（见本卷第46—49、53—56页）。——第25页。
- 24 爱尔兰旅是大不列颠议会中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这一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利党和辉格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学派一起，能够动摇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决定政府的命运。——第25页。
- 25 1844年，詹姆斯·格莱安任大不列颠内务大臣，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他曾向英国邮政部门下令允许警察检查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其中包括从1837年起就流亡伦敦的马志尼的信件。——第27页。
- 26 1853年5月31日罗素在下院会议的发言中宣称，英国议会不应当同意国家去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僧侣对英国王室和宪法不够忠诚。——第27页。
- 27 南海公司是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进行贸易的名义下于1712年前后在英国成立的；它的真正目的是从事国家证券的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包括发行国家有价证券的权利，展开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这种活动在1720年以公司破产告终。破产的结果使国债大大增加，1853年格莱斯顿曾企图用收买该公司的贬值股票的办法来偿还一部分国债。——第29页。

- 28 指 1852 年 11 月向英国议会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法案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放宽在爱尔兰租佃土地的条件。1853 年在联合政府的假同意下法案在下院通过了,因为联合政府希望爱尔兰议员主持自己的政策;但是,法案在上院却遭到了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从这届议会转到那届议会,并被一再修改;1855 年 7 月,对这些法案的讨论又被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对这些法案作了分析和评价(见本卷第 403—404、539—540 页)。——第 29 页。
- 29 流放法案 (Transportation Bill) 于 1853 年 8 月 12 日通过,它要求废除用流放到殖民地服苦役的办法来惩罚犯罪行为。被判罪的人在审前羁押期满后,得到一张假释证,证明他可以在警察的监督下在英国居住,并且可以在社会性工作中充当廉价劳动力。马克思在“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278 页)。——第 29 页。
- 30 指英、法、普三国大使和奥地利代表根据奥地利政府的倡议于 1853 年 7 月 24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调解俄土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议拟定了一个调解性的照会(即所谓维也纳照会),规定苏丹应当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 年)和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 年),并且保护奥斯曼帝国的正教教会的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应当先送给沙皇,如果沙皇对它抱肯定态度,那就再送给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同时保留自行解释照会的权利,土耳其苏丹也同意照会,但是对照会提出了许多为沙皇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修正和保留。
- 在英、法、奥、普四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于 1853 年 12 月 12 日签署的并于 1853 年 12 月 15 日递交土耳其的这份照会中,四国向土耳其政府表示愿意进行调停,以恢复俄土两国之间的和平,并提出如下几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恢复俄土之间先前一些条约的效力,以特别敕令来保证在土耳其的基督徒的权利,改变奥斯曼帝国的管理制度。——第 30 页。
- 31 指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勋爵同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和后

来的克拉伦登之间关于西摩尔同尼古拉一世于 1853 年初就土耳其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秘密通信。由于约翰·罗素 1854 年 2 月 17 日在下院发表了反对俄国的好战演说,因此“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用法文出版)于 1854 年 3 月 2 日(2 月 18 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暗示沙皇政府同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问题上有勾结,并引用西摩尔的通信来证明。英国政府被迫公布了上述通信。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函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48—159、160—177 页)两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文件和英国政府在同尼古拉一世谈判过程中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第 30 页。

- 32 根据英国从 1662 年起实施的法律,贫民如果改变住址和向某个教区的济贫所请求救济,可以根据法院的决定强迫他返回原来的住处。1854 年 2 月 10 日,曾经向下院提出了一项法案(Settlement and Removal Bill),要求在英国和威尔士禁止强迫贫民迁移。法案没有被议会通过。——第 31 页。
- 33 根据十八世纪初叶以来英国实行的法律,新选出的议会议员应当宣读“退位誓词”(宣誓他们否认詹姆斯二世的后代有继承王位的权利);誓词全文包括一些效忠基督教的话。议员不宣读誓词就没有权利积极参加议会的工作。在议会中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修改誓词的问题,但只是由于 1866 年的法令才删掉了效忠基督教的话。——第 31 页。
- 34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地暗指赫伯特对历史事实的混淆。赫伯特把 1793 年发生的事件归咎于 1795 年成立的执政内阁。1793 年 4 月 2 日,即在革命的法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和陆军部长被派到杜木里埃将军指挥的北部军队的大本营去传达一项命令,这项命令要求杜木里埃出席国民公会,以便对背叛革命的控告进行审问。杜木里埃拒绝服从国民公会,逮捕了委员和陆军部长,并把他们引渡给奥地利人。此后不久,杜木里埃公开投到奥地利方面去了。——第 33 页。
- 35 马克思显然是指拜伦的讽刺作品“英国的弹唱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

《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第 34 页。

- 36 少数派——马克思指的是阿伯丁联合政府时期英国议会中的各个不同的小派别和集团，它们虽然人数不多，但起的作用却相当大，由于议会里缺少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它们对议会内的斗争的进程有影响。马克思在“政党和集团”一文中对议会里的派别和集团作了评述（见本卷第 50—52 页）。——第 38 页。
- 37 指帕麦斯顿在由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所引起的英希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1847 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焚毁，后来就成了当时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1850 年 6 月 25 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就这次冲突所发表的侵略性演说中为自己的行动辩解，认为必须维护英国臣民的声望并把英国的臣民同古罗马的公民相比。——第 43 页。
- 38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 年在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中叶它是纠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派分子的机关报。——第 44 页。
- 39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从 1846 年到 1930 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 44 页。
- 40 “先驱报”（《The Herald》）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的简称；1780—1869 年在伦敦出版。——第 45 页。
- 41 梅费尔激进派 是假激进派（摩耳斯沃思、奥斯本等）集团的绰号，他们实际上代表向民主派献媚的那一部分英国贵族。“梅费尔派”一词从伦敦豪华区之一的名称梅费尔而来，这个区是贵族的私邸区。——第 46 页。
- 42 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的经验”1835 年巴黎版第 1—2 卷（A. Quételet. 《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Tomes

- I—II, Paris, 1835)。马克思曾引用的是本书的英译本(1842年爱丁堡版)。——第50页。
- 43 曼彻斯特学派 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加入了自由党。——第51页。
- 44 见注31。——第55页。
- 45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中,本文的下面一段话被删掉了。——第56页。
- 46 恩格斯指自己的“阿尔马河会战”一文,该文对克里木战争时期俄军和联军之间在1854年9月20日(8日)进行的一次大会战作了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0—565页)。——第57页。
- 47 指1811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英军在威灵顿指挥下对法军占领的巴达霍斯要塞(西班牙)的围攻。威灵顿曾两度撤围,去迎击前来援救被围的守备部队的法军。——第60页。
- 48 恩格斯大概是指他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72—576页)。——第60页。
- 49 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后,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与法国驻伦敦大使会谈,赞成路易·波拿巴的篡位。帕麦斯顿这样做没有商得辉格党内阁其他阁员的同意,结果使他于1851年12月提出辞职,而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同帕麦斯顿的观点是没有分歧的,它在欧洲首先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权。——第63页。
- 50 指“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61—663页)。——第65页。
- 51 “帕麦斯顿勋爵”是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写的一组有关1855年2月6

日成立帕麦斯顿政府的文章；这组文章基本上是著名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梗概，这篇抨击文是马克思在1853年秋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同时还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全文发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第68页。

- 52 英国议会于1850年6月讨论与所谓帕西菲科事件（见注37）有关的英希冲突问题时，政府（帕麦斯顿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对外政策得到下院的赞同；相反，上院却以37票的多数表示反对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和俄国也通过它们驻伦敦大使对英国的立场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法国大使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伦敦，俄国大使不出席帕麦斯顿举行的宴会。——第70页。

- 53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是为大地主—土地贵族的利益而从181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贸易自由的口号下为反对谷物法而斗争，他们终于使谷物法在1846年废除。——第70页。

- 54 英法舰队在1832年封锁些耳德河和荷兰海岸，其目的是迫使荷兰停止它为反对脱离了荷兰的比利时而于1831年重新开始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于1833年停止。当时由于五大国（英、法、俄、普、奥）的串通，不论是荷兰或是比利时，都被迫接受了大国拟定的和约（1833）的折衷条件。

在葡萄牙内战时期（1828—1834），英国封锁塔霍河口和杜罗河口。这次内战是在以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为首的专制制度拥护者（封建教权派）和立宪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英国政府为了加强它在比利牛斯半岛的势力和破坏支持专制制度拥护者的奥地利在这个地区的地位，把舰队派往葡萄牙海岸，封锁了塔霍河口和杜罗河口，从而促进了立宪主义者的胜利。

英法舰队封锁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在1845年开始的，其目的是迫使阿根廷政府对外国船只开放巴拉那河和其他河流。英法两国迫使阿根廷签订了相应的条约，终于在1852年达到了这一目的。——第71页。

- 55 根据英国政府和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在 1816 年签订的条约,双西西里王国不得给予其他国家以损害英国利益的贸易特权。1838 年那不勒斯国王授予法国公司在西西里岛开采硫磺的专利权,结果引起了英国的强烈抗议。为了迫使那不勒斯国王撤销自己的决定,英国政府于 1840 年命令它的地中海舰队开始军事行动,那不勒斯被迫实现了英国的要求。

关于 因帕西菲科事件而引起的远征 见注 37。

马克思谈到的对波斯湾的远征,是指在 1838—1841 年英伊冲突期间英国舰队的行动;这次冲突是由于伊朗军队围攻阿富汗要塞赫拉特(最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而引起的。1837 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向赫拉特的进军不仅是伊阿矛盾、而且也是英俄矛盾在这一地区尖锐化的结果。为了加强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和削弱俄国当时在伊朗的日益巩固的势力,为了迫使伊朗签订对自己不利的贸易条约,英国政府声称,伊朗国王的行动是敌视英国的行动,并且要求撤除对赫拉特的围攻。由于伊朗国王拒绝执行这项要求,英国政府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以战争相威胁,于 1838 年把一个分舰队派往波斯湾。伊朗国王被迫撤除围攻,随后又同意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第 71 页。

- 56 指英国对西班牙所谓的卡洛斯派战争(1833—1840)的干涉,这次战争是在以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为首的反动的封建天主教势力和支持玛丽亚一克里斯蒂娜摄政女王政府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势力之间进行的。英国以援助西班牙政府为借口把舰队和不列颠志愿军团派往西班牙,这个军团参加了 1835—1837 年的军事行动。英国干涉西班牙事务的真实目的是力图巩固它在比利牛斯半岛的势力。

为输入鸦片而同中国进行的战争(即所谓 1839—1842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这次战争开始,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战争的导火线是中国当局在广州焚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封建落后的中国战败的机会,迫使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南京条约(1842 年 8 月 29 日),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开放五个海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把香港岛割给英国作“永久的属地”,并且要中国偿付巨额赔款。根据 1843 年的补充议定书,中国还

应当让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第 71 页。

- 57 1838 年,由于阿富汗王多斯特—穆罕默德拒绝同英国订立反对伊朗和俄国的同盟,英国没有能够使阿富汗变成自己政策的工具,故决定通过武装干涉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把自己的傀儡沙赫舒扎捧上王位。英国军队侵入了阿富汗,几乎占领和蹂躏了整个国家,俘掳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但是英国人的统治没有维持多久。1841 年 11 月的人民起义粉碎并歼灭了英国军队。1842 年英国人又一次企图侵占阿富汗,结果同样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英奥舰队对叙利亚要塞圣让得阿克的轰击是在 1839—1841 年土埃战争期间发生的。英国所以干预这次冲突是因为害怕俄国单独采取支持土耳其苏丹的行动,同时还竭力想孤立法国(法国在争夺近东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曾指望征服了叙利亚的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由于英国政府坚决主张,四大国(英、俄、奥、普)在 1840 年 7 月 15 日签订了关于给苏丹以军事援助的伦敦协定。根据协定,向穆罕默德—阿利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即要求他服从苏丹并且把全部领地(埃及和叙利亚南部除外)立即归还苏丹。由于穆罕默德—阿利拒绝执行这一要求,英奥军舰遂于 1840 年秋季轰击了位于叙利亚沿岸地区的贝鲁特、圣让得阿克和其他要塞。穆罕默德—阿利被迫让步并接受了大国的最后通牒。——第 71 页。

- 58 关于阿德里安堡条约 见注 19。

巴尔塔利曼尼条约 是俄国和土耳其在派军队进驻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镇压革命运动以后,于 1849 年 5 月 1 日(4 月 19 日)签订的协议。根据这一条约,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危机完全消除的时候(外国军队直到 1851 年才撤出这些公国),并且暂时地实行了由苏丹征得沙皇同意后任命国君的原则;条约还规定,如革命重起,俄国和土耳其应采取包括再一次进行军事占领的许多措施。——第 72 页。

- 59 指 1852 年 5 月 8 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的代表会同丹麦的代表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该条约是以 1850 年 7 月 4 日伦敦会议的上述参加国(普鲁士除外)所通过的

确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的议定书为基础的。伦敦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的名义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给被宣布作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继承人的格吕克斯堡王朝克里斯提安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以后在林吕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觊觎丹麦王位造成了先例。——第 72 页。

- 60 指俄国、英国和尼德兰的代表 1815 年 5 月 19 日(7 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赔偿俄国把拿破仑军队驱逐出荷兰和比利时各省所花的军事费用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英国和尼德兰政府必须以赔偿的形式向霍普公司的荷兰银行家付清俄国的部分债款以及 1816 年 1 月 1 日以前尚未偿还的这笔债款的利息。协定的一项特别条款规定,一旦比利时的一些省脱离尼德兰,就将停止偿清债款。在 1830 年革命和独立的比利时国家成立之后,尼德兰政府便停止了付款。但是帕麦斯顿代表英国政府在 1831 年 11 月 16 日(4 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承认英国过去所担负的财政债务的新协定。——第 73 页。
- 61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 1833 年 7 月 8 日(6 月 26 日)缔结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之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伊布拉希姆—帕沙(反对苏丹的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之子)的军队。1833 年 5 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利缔结了和约,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利。尽管对苏丹的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沙皇的外交还是能够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并且在从法律上固定这个同盟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须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该条约第二条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其他俄土协定。条约的有效期规定为 8 年。——第 73 页。
- 62 根据 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约,多瑙河口附近的群岛划归俄国所有,但

同时必须保证各国商船在多瑙河航行的自由。然而在 1836 年根据政府化了的参议院 3 月 2 日 (2 月 19 日) 的命令, 在多瑙河的支流苏利纳河口设立了俄国检疫所, 这个检疫所实际上起了监督这段航线上船只航行的关卡的作用。1836 年 4 月在英国议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时, 帕麦斯顿声称, 俄国的作法无损于英土贸易, 因此他不认为英国有进行外交干预的理由。——第 74 页。

- 63 “公文集” (《Portfolio》) 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 公文汇编” (《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丛刊在 1835—1837 年出版; 新的丛刊是以“公文集. 外交评论” (《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 的名字在 1843—1845 年出版的。——第 74 页。
- 64 “曼彻斯特卫报”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 是自由贸易维护者 (自由贸易派) 的机关报, 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 1821 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 78 页。
- 65 指麦克尼耳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现状” 1836 年伦敦版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 1836)。——第 81 页。
- 66 “纪事晨报” (《The Morning Chronicle》) 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自 1770 年到 1862 年在伦敦出版; 它是辉格党人的机关报, 在五十年代初, 是皮尔分子的机关报, 后来是保守党人的机关报。——第 84 页。
- 67 “经济学家” (《The Economist》) 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 1843 年于伦敦创办; 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85 页。
- 68 “欧洲面临的战争”一文是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马克思对该文作了删节和不大的修改, 并把它分为两篇通讯稿寄给“新奥得报”: “议会和军事问题” (见本卷第 95—97 页) 和“军队的状况”。“军队的状况” (《Zustand der Armeen》) 一文在 1855 年 2 月 24 日的“新奥得报”上发表 (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 在本版中没有包括该文, 因为该文的内容同“论坛报”上发表的完全一样。——第 87 页。

- 69 Blue Books(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公布的材料和外交部公布的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从十七世纪起在英国出版,它是英国经济和外交史方面的主要官方资料。——第 95 页。
- 70 指威·弗·帕·纳皮尔“1807 年至 1814 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 年伦敦版第 1—6 卷(W.F.P.Napier.《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Vol. I—VI, London, 1828—1840)。——第 97 页。
- 71 指 1845 年英国议会里讨论关于给 1795 年创办的梅努特天主教神学院(在爱尔兰)增加津贴的问题。给神学院增加津贴的目的是要把爱尔兰的天主教僧侣们吸引到英国统治阶级方面来,从而削弱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第 100 页。
- 72 指选举法的改革,关于选举法改革的法案在 1831 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 年 6 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争取改革斗争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 102 页。
- 73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是 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了以下六点:普选权(赋予年满 21 岁的男子),议会每年选举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马克思在本卷的其他文章中也揭示了人民宪章的意义(见第 156—157、268、300—301 页)。——第 102 页。
- 74 小宪章 是一个关于选举改革的法律草案的名称,这个草案是由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首领休谟在 1848—1851 年间不止一次地在英国议会中提出来以与宪章派的人民宪章相对立。休谟的法律草案规定:凡有住房或部分住房(Household Suffrage)的人都有选举权,议会每三年改选一次,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它成了议会和财政改革全国协会的纲

领。

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 由资产阶级激进派在 1849 年建立，其目的就是宣传休谟的小宪章和进行税收改革。资产阶级激进派拿自己的纲领与宪章派的要求相对抗，指望在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失败后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派运动，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受到科布顿、布莱特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的改良主义分子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并没有获得成功。大多数宪章主义者在五十年代仍然忠实于人民宪章。1855 年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瓦解了。—— 第 102 页。

- 75 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把自己喜爱的马封为执政官。—— 第 104 页。
- 76 欧洲人把 1526 年在印度北部建立并于十八世纪开始衰败的帝国的统治者称为大莫卧儿（认为他们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莫卧儿”一词由此而来）。—— 第 104 页。
- 77 暗指根据帕麦斯顿的提议任命罗素为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英国代表，维也纳会议是在 1855 年 3 月召开的（关于这次会议，见注 108）。—— 第 105 页。
- 78 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英国议会在 1829 年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 4 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种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 第 106 页。
- 79 济贫法 是 1834 年通过的法律，它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帮助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狱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济贫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强迫贫民同意在艰苦的劳动条件下到工厂里去做工，从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增加廉价劳动力的数量。—— 第 109 页。
- 80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一次大罢工。1853 年 8 月，普雷斯顿和四郊的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纺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

十；其他行业工人支持了他们。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年9月宣布了同盟歇业。在3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大约有25000人停止工作。由于其他城市工人的支援，普雷斯顿的工人得以坚持了36周之久。宪章派积极参加了为罢工者筹措资金的活动。1854年2月同盟歇业已停止，但罢工还在继续。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联合会开始把爱尔兰和英格兰习艺所的工人运到普雷斯顿。1854年3月，罢工的领导人被捕。工人由于基金耗尽而被迫复工。5月罢工结束了。关于普雷斯顿罢工的具体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和第10卷。——第110页。

- 81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的开头部分，企图使人误认为这些文章是在美国写的。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开头几行，也有该报编辑部所作的类似的修改。——第114页。
- 82 惩治叛乱法案 (Mutiny Act) 是议会从1689年至1881年每年通过一次的法律，这项法律授权国王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和海军，在陆海军中实行各种军事条令和制度，实行军法审判，并制定惩治参加哗变、违抗命令、违反纪律等等行为的制度。颁布第一个这样的法律是由于英国的兵变。——第118页。
- 83 买卖宗教职位是中世纪买卖教会职位的一种制度，宗教改革的拥护者早在十二世纪起就进行了反对这种制度的斗争。——第119页。
- 84 1855年3月9日的“新奥得报”上发表了一则简讯说，著名的英国医生格兰维耳在1853年曾向帕麦斯顿预言沙皇很快要死去，并且建议他在制定自己对俄政策时考虑到这一点。——第123页。
- 85 皮蒂娅格言 是德尔斐城(古希腊)的阿波罗神殿女祭司—预言者皮蒂娅的格言。——第123页。
- 86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机关报。马克思提到的那篇文章发表在1855年2月17日“通报”上。——第125页。

- 87 马克思指的是匿名小册子“论东方战争的进行。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致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短筒”1855年布鲁塞尔版(《De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Expedition de Crimée.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Bruxelles, 1855)。这本激烈批评克里木远征的领导的小册子的发表,在报刊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广泛的反应;这本小册子被认为是出自拿破仑亲王(小日罗姆·波拿巴)的手笔。——第125页。
- 88 指1851年12月到1852年11月期间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英国新闻记者理查兹(署名“一个英国人”)关于路易—拿破仑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反波拿巴的文章。——第125页。
- 89 下面马克思引证的是登载在1855年3月3日“人民报”上的琼斯在圣马丁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发表的演说。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是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同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也给予帮助。“人民报”除了刊载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给该报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在这个时期,“人民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由于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暂时和琼斯断绝关系。1858年6月该报转到资产阶级投机商人手里。——第125页。
- 90 指1839—1841年土埃战争期间英法在近东的矛盾的尖锐化。1840年7月15日,在没有法国的参加下签订了关于给予土耳其苏丹军事援助以反对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的伦敦协定(见注57),这就导致了英法关系的严重恶化和造成了战争的威胁。法国由于害怕列强结成反法同盟,不得不放弃对埃及执政者的支持。——第126页。
- 91 1846年基佐政府为法王路易—菲利浦的小儿子蒙潘西埃公爵订下了同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婚约,破坏了英国所策划的亲

王列奥波特·科堡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婚盟。英法两国政府之间为这些婚约而进行的斗争在 1846 年至 1847 年引起了英法关系的极端尖锐化。——第 126 页。

- 92 1713 年乌得勒支条约 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签订的结束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长期战争(1701 年开始)的一个和约。根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的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波旁,但法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国。

帕麦斯顿在 1846 年和 1847 年谴责法国破坏乌得勒支条约指的是路易·菲力浦又想通过他的小儿子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而合并两个王国。——第 126 页。

- 93 指 1835 年爱尔兰民族运动的自由派首领奥康奈尔(领导议会中的爱尔兰议员团)和辉格党的首领们所签订的协定。由于谈判是在伦敦的利奇菲耳德勋爵的府邸内进行的,所以这个协定被称为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第 134 页。
- 94 指为取消 1801 年英国同爱尔兰的合并而进行的鼓动。英国政府在镇压了 1798 年爱尔兰起义以后强加给爱尔兰的这个合并,彻底消灭了爱尔兰的自治权,取消了爱尔兰议会。取消合并(Repeal of Union)的要求,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在爱尔兰成为最普遍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把取消合并的鼓动仅仅看成是争取使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资产阶级作某些小的让步的手段。1835 年,奥康奈尔同英国辉格党达成了妥协,完全停止了这种鼓动。但是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 1840 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并力图把它引上同英国统治阶级妥协的道路。——第 134 页。
- 95 1848 年在爱尔兰为求得国家的民族解放和建立共和国的人民起义已酝酿成熟。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密契尔、累洛尔和爱尔兰同盟革命派的

其他代表。爱尔兰同盟是由于合并取消派协会（见注 94）的分裂而于 1847 年成立的。由于密契尔和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的被捕，以及由于以斯密斯·奥勃莱恩为首的同盟自由派的妥协的、实质上是叛卖的策略，总起义没有举行。1848 年 7 月只是在各城市内发生了分散的起义，在各省内发生了农民的自发的发动，这些起义和发动都遭到了失败。英政府残酷地镇压了 1848 年爱尔兰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第 137 页。

- 96 “克里木事件”一文是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克里木军事行动的总结”（《The Results in the Crimea》）的译文，“克里木军事行动的总结”一文作为社论于 1855 年 4 月 2 日发表。马克思为“新奥得报”翻译本文时曾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第 138 页。
- 97 指俄土双方军队在 1855 年 2 月 17 日（5 日）在叶夫帕托利亚的会战。——第 140 页。
- 98 本文的开头几行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第 142 页。
- 99 1809 年 5 月 21—22 日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与奥地利卡尔大公的军队在阿斯佩恩地区（在多瑙河左岸，距维也纳不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结果奥地利军队获胜。拿破仑第一为了挽救军队免遭毁灭，把军队撤离多瑙河左岸。——第 144 页。
- 100 指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莱比锡会战，即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的决战，结果同盟国的军队打败了拿破仑第一的军队。——第 144 页。
- 101 暗指路易·波拿巴于 1836 年 10 月 30 日在斯特拉斯堡的不成功的叛乱。——第 145 页。
- 102 雾月十八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是在法国完成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政变；政变的结果，建立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
1800 年 6 月 14 日在 马连峨（意大利北部）会战中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战胜了奥地利的军队。这是政变后波拿巴的第一次大捷，它促使

波拿巴的政权得到了巩固。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雾月十八日的再版是指路易·波拿巴在 1851 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第 148 页。

- 103 “先驱”（《The Lead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50 年创办于伦敦。——第 151 页。
- 104 和平协会 是教友会教派于 1816 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了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第 152 页。
- 105 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是英国议会在 1847 年 6 月 8 日通过的。
- 1850 年 2 月高等控诉院（英国的高等法庭之一）宣判被控告破坏十小时工作日法的厂主无罪。这个判决事实上等于取消这个法律，因此引起了工人的反抗。于是 1850 年 8 月 5 日议会颁布了新的法律，规定女工和童工每日劳动 10 个半小时，并确定了工作日的起止时间。
-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两篇文章中对 1847 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作了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69—275、276—287 页）。——第 153 页。
- 106 关于琼斯发表了演说的这次群众大会的报告载于 1855 年 3 月 19 日“晨邮报”和 3 月 24 日“人民报”。——第 154 页。
- 107 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在克里木的因克尔芒会战发生于 1854 年的 11 月 5 日（10 月 24 日）。会战以俄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俄军的积极行动迫使联军放弃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强攻而转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围攻。在恩格斯的“因克尔芒会战”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的叙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594—599 页）。——第 158 页。
- 108 维也纳会议 是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代表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目的是为了在进行克里木战争的各国之间拟定缔结和约的条

款。会议于 1855 年 3 月 15 日开幕,断断续续一直开到 1855 年 6 月 4 日。所谓的四项条款(见注 6)被列为谈判的基础。俄国带有若干保留条件地同意接受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条款,坚决拒绝第三项条款,即不同意西方各国对限制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力量的解释。英法代表坚持要俄国无条件地接受所有条款。他们还否决了奥地利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折衷的建议。这个建议要求给予俄国和土耳其自行协商解决两国在黑海上能够拥有的海军数量问题的权利。维也纳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而停止了自己的工作。——第 158 页。

- 109 Ceterum censeo 是老卡托通常在罗马元老院结束他的每一次讲演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的开头几个字: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可是,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第 159 页。
- 110 恩格斯写的“拿破仑最近的诡计”一文的片断以及“塞瓦斯托波尔会战”一文,曾由马克思综合缩写成“克里木的最近事件”(《Ueber die letzten Vorgänge in der Krim》),这篇通讯稿发表于 1855 年 3 月 26 日的“新奥得报”上(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166 页。
- 111 拿破仑亲王于 1854 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他因为不赞成克里木远征,加之没有足够的军事才能,在军队中没有声望,因此托病力求解脱军事领导职务,而后便擅自返回巴黎。——第 167 页。
- 112 关于本文的德文稿见注 110。第一段看来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第 170 页。
- 113 “新闻报”(《The Press》)——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机关报;自 1853 年到 1866 年在伦敦出版。——第 175 页。
- 114 看来,马克思指的是前托利党得比内阁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于 1853 年 3 月到巴黎的访问。关于这次访问,正如 1853 年 3 月 23 日“泰晤士报”所报道的:拿破仑第三宴请了马姆兹伯里,并同他进行了秘密会谈。根据马姆兹伯里自己的回忆录来看,在同法国皇帝会谈时强调了巩固英法友好关系的必要性。——第 175 页。

- 115 艾·日拉丹“和平”1855年巴黎版(É. Girardin.《La Paix》Paris, 1855)。——第177页。
- 116 暗指路易·波拿巴的著作“拿破仑的观念”,1839年在巴黎出版(Napoléon—Louis Bonaparte.《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Paris, 1839)。——第178页。
- 117 伦敦 圣詹姆斯宫 是十七世纪末叶英国国王的宫殿,十九世纪成为举行隆重庆典和招待会的地方。——第179页。
- 118 Exeter Hall(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的一座大厦,各宗教团体和慈善事业组织集会的地方。——第184页。
- 119 本文第一段显然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篡改过。——第191页。
- 120 恩格斯指的是他的“克里木军事行动小结”一文,该文的德文稿载于本卷第138—141页。——第191页。
- 121 指“克里木的最近事件”一文,该文的英文稿载于本卷第170—174页。——第197页。
- 122 军队中的代役制在法国广泛地推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它给有产阶级造成了一种特权。每一个应召入伍的有财富的人都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自己雇佣代役人。在十八世纪末叶法国革命时期曾经禁止代役,然而拿破仑第一又重新使它合法化了。在1855年4月军队中的代役制曾作了修改:按照新法,代役人如果不是被征者的近亲,他们就由国家机关选定,代役款项则列入“军队补贴”特别基金。新法的目的是建立一支更加稳固和更加效忠于皇帝的军队。1872年法国的代役制被废除了。——第200页。
- 123 “弗拉·迪亚沃洛”(“魔鬼大哥”)是法国作曲家奥伯采用斯克里巴脚本编的喜歌剧。——第203页。
- 124 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起义,这次起义遭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六月起义的失败是欧洲各国反革命进攻的信号。——第208页。

- 125 本文曾以“拿破仑的辩白”(《Napoleon's apology》)为题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第209页。
- 126 关于阿德里安堡条约 见注19。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 是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俄国战胜后,两国于1774年7月21日(10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阿速夫、刻赤、叶尼卡列,并且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合并克里木造成了方便的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苏丹应给予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第十四款关于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正教教堂的规定。
恩格斯提到的关于尼古拉皇帝的讣闻载于1855年3月27日“通报”上;讣闻中说:俄国对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片面解释是发动克里木战争的借口。其实,在克里木战争前夕就“圣所”问题进行的争论中,俄国所依据的是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中规定正教教会享有特权的条款。——第210页。
- 127 1808年7月20日,在西班牙独立战争时期(1808—1814)的拜兰会战中,由杜邦将军指挥的法军被西班牙军队包围,他们放下了武器。
1813年8月29—30日,在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同盟战争时期,万当将军指挥的法军在库尔姆(捷克)附近被奥地利军队包围,全部被俘。——第210页。
- 128 莫尔特克“1828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eke.《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Berlin, 1845)。——第210页。
- 129 “三月十三日的出击”一文是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于1855年4月30日作为该报社论发表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The Siege of Sevastopol》)一文的译文。马克思在翻译此文时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214页。

- 130 恩格斯的这两篇文章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在“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同时发表而写的。从“新奥得报”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以及1855年4月17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建议继续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泛斯拉夫主义理论的反动实质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后来在报纸上没有看到恩格斯关于这一题目的文章。

“纽约每日论坛报”在1855年5月5日和7日以“欧洲的斗争”(《The European Struggle》)和“奥地利的弱点”(《Austria's Weakness》)为题歪曲地登载了恩格斯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论坛报”编辑部在第二篇文章中加进了一整段话,赞扬了报纸撰稿人之一阿·古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第218页。

- 131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爱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领导者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和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第222页。

- 132 1804年塞尔维亚发生了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塞尔维亚人民世代反对土耳其封建统治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近卫军对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1804年2月,塞尔维亚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做过海杜克的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格奥尔基·车尔尼)的领导下群起投入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时期,俄国军队在巴尔干的顺利挺进给塞尔维亚人的运动以重大的支持。在这次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人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之后,于1811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管理机构。按照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土耳其应该让塞尔维亚享有内政自治权。但是,苏丹乘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际撕毁条约,于1813年

- 征讨塞尔维亚，并在那里暂时恢复了自己的统治。由于 1815 年塞尔维亚人又一次实行了胜利的起义，以及俄国在外交上的援助，土耳其的枷锁终被打碎。在 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后，土耳其在 1830 年苏丹的特别敕令中被迫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事实上的独立）。——第 223 页。
- 133 指沙皇俄国参与镇压 1849 年匈牙利的革命。——第 224 页。
- 134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他在“俄国和德国”（1853）、“俄国和英国”（1854）等许多小册子中实质上发展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第 225 页。
- 135 1797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银行券的强制性的行价，废除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办法。到 1819 年才恢复了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制度。——第 226 页。
- 136 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52 年柏林版第 3 册第 526 页（A.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sslands》. Dritter Theil, Berlin, 1852, S. 526）。——第 226 页。
- 137 行政改革协会根据商业金融资产阶级（西蒂区“实业界”）自由派领袖的倡议于 1855 年 5 月在伦敦成立。在报刊和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英军在克里木遭受灾难的报道的影响下，国内的不满情绪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改革协会指望依靠群众集会来给议会施加压力并使商业金融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能更广泛地从英国贵族手中得到国家职位。协会的领袖们企图和宪章派达成协议，以便在自己的反对寡头政治的斗争中能预先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宪章派在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和自己的群众大会上依据人民宪章（见注 73）提出了议会改革的要求来与温和的资产阶级的行政改革要求相对抗。行政改革协会的鼓动宣传没有取得成就，于是不久协会便垮台了。关于协会和关于宪章派对协会的关系的比较详细的说明见本卷第 252—255、267—269、298—301 页。——第 227 页。

- 138 马克思指的是十八世纪德国作家维兰特的讽刺小说“阿布德拉人”，在这本小说里叙述了由于微不足道的小事争吵，这个古色雷斯城市阿布德拉的居民被分为两派，两派间的斗争几乎把整个城市给毁灭掉。小说的第1版于1776年在魏玛出版。——第228页。
- 139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整个欧洲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度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随后战争又演化为封建的天主教阵营（罗马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的天主教公爵）和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资产阶级的荷兰和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之间的战争，新教国家曾得到法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在第一阶段带有反抗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性质，但后来，特别是从1635年起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外国掠夺者对德意志一系列的入侵行为。战争于1648年以签订使德国在政治上的分散性更加巩固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告终。——第228页。
- 140 马克思指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庇护九世于1846—1848年初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发展的条件下在教皇国内进行了对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有利的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以防止革命的发展。——第229页。
- 141 指奥迪隆·巴罗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于1848年二月革命的前夜在法国所进行的争取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与资产阶级反对派右翼接近的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法国议员团（所谓王朝反对派）参加了这个运动的组织，并竭力使整个运动对七月王朝不带有危险的性质。王朝反对派在提出温和的选举改革的同时，认为这是预防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一种手段。——第229页。
- 142 恩格斯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一文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Die Belagerung von Sebastopol》）为题刊登于1855年5月11日“新奥得报”上。该文的德文稿有显著的删节。——第230页。

- 143 指维也纳会议的暂时中断,原因是参加谈判的代表在对俄国提出的第三项条款问题上意见有分歧(见注 108)。俄国拒绝了西方国家关于限制它在黑海的海军力量的要求,于是 1855 年 4 月 26 日维也纳会议就暂时中断。维也纳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在 1855 年 6 月 4 日举行。——第 230 页。
- 144 这个消息是错误的。恩格斯根据核实的材料在“克里木战争”(见本卷第 259—266 页)一文中谈到这一点。所列举的俄军要塞在 1855 年 6 月 7 日(5 月 26 日)才被联军占领。——第 230 页。
- 145 本文原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它以“克里木的新攻势”(《The new move in the Crimea》)为题作为社论于 1855 年 5 月 29 日在该报发表。由于“论坛报”编辑部对英文稿显然作了修改,特别是关于联军在克里木的军队数量,该报根据驻伦敦记者普尔斯基的报道列出了不同的统计数字,因此俄译文是按“新奥得报”刊出的原文翻译的。——第 240 页。
- 146 反谷物法同盟 是曼彻斯特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关于谷物法见注 53),其目的是降低工人工资和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已经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在 1846 年谷物法废除后,同盟就不再存在了。由于同盟开展运动的结果,托利党的皮尔政府废除了谷物法,这就引起了托利党的分裂,为辉格党人在 1846 年取得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第 245 页。
- 147 指 1716 年的议会法令(Septennial Act),这个法令从辉格党寡头政治的利益出发,把议会任期从 3 年增加到 7 年。——第 246 页。
- 148 关于 习艺所见注 79。——第 246 页。
- 149 关于 伐耳赫伦远征 见注 22。——第 248 页。
- 150 本文曾以“议会外的风潮”(《Die Aufregung außerhalb des Parlaments》)为题刊载在“新奥得报”上。本版保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1版的标题。——第252页。
- 151 指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欢迎和抗议委员会”改组后于1855年2月成立的。(欢迎和抗议委员会是根据厄·琼斯的倡议于1854年10月建立的,其目的是在伦敦组织隆重的欢迎会,欢迎被释出狱的1848年法国革命参加者巴尔贝斯,并准备示威游行,抗议拿破仑第三拟在这个时候前来伦敦。)伦敦组织委员会与宪章派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行动,并给自己提出如下的任务:在伦敦恢复群众性的宪章运动,并加强民主力量的国际协作。委员会的成员有:琼斯、哈里逊、泰勒和其他人;由委员会选出的七人小组执行建立国际联系的任务,这个小组同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在伦敦的流亡者代表共同组成国际委员会。1855年年底伦敦组织委员会宣告解散,国际委员会便成了独立的组织。它在1856年改名为国际协会,一直存在到1859年。——第253页。
- 152 马克思指1855年5月12日“人民报”的社论,这篇社论揭露了行政改革协会的阴谋和它向宪章派献媚的意图。——第255页。
- 153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自己的文章“克里木的新攻势”,该文的德文稿译载于本卷第240—243页。——第259页。
- 154 普军和法军的耶拿会战发生于1806年10月14日,以普军的溃败而结束。——第263页。
- 155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267页。
- 156 指一本匿名的小册子“西蒂区或伦敦实业界的生理现象以及对交易所和咖啡馆的短评”1845年伦敦版(《The City, or the Physiology of London Business; with Sketches on'Change and at the Coffee House》.London, 184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援引了这本书。——第268页。
- 157 1855年4月11日在“通报”上刊载了一篇社论“东方远征”,在这篇社论里引用了拿破仑第三给圣阿尔诺元帅的指令。恩格斯在“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一文中对这篇社论作了详尽的分析(见本卷第209—

213 页)。——第 270 页。

- 158 1854 年 7 月,法军在埃斯潘纳斯指挥下向多布鲁甲进行了远征,这次远征由于大量兵士患霍乱和其他疾病而死亡,所以遭到了失败。——第 271 页。
- 159 1851 年 12 月 1 日夜,由埃斯潘纳斯指挥的团里面的一个营奉命守卫国民议会;被波拿巴分子所收买的埃斯潘纳斯在 12 月 2 日率领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大厦,从而促进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胜利。——第 271 页。
- 160 指 1855 年 5 月 22 日迪斯累里在下院会议上的声明,他说在最近几天将把致女王的方案提交议会讨论,在方案中对帕麦斯顿政府在和平和战争问题上所采取的摇摆政策表示不满。这项提案于 1855 年 5 月 24 日提交给议会,并引起了热烈的辩论。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对这些辩论作了分析(见本卷第 283—294、304—307、316—319 页)。——第 272 页。
- 161 本文谈到克里木最近事件的那一部分(即一直谈到任命佩利西埃的情况的那一段)是恩格斯写的“新的法国总司令”(《The new French Commander》)一文的译文,该文作为社论在 1855 年 6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第 274 页。
- 162 从 1547 年起,下院的会议在圣斯蒂凡教堂(韦斯明斯特宫)内举行。——第 280 页。
- 163 1848 年二月革命之后的法国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失败,使得波拿巴集团有可能利用普选权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总统选举中把路易·波拿巴推上共和国总统的位置;1851 年,在实现十二月二日政变时,路易·波拿巴阴险地利用了恢复 1850 年 5 月 31 日被法国立法议会废除了的普选权的口号。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中对这些事件作了分析。——第 300 页。

- 164 1842年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以及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派曾多次企图使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运动来进行废除谷物法和资产阶级改革的鼓动。他们提出了含糊不清的可以有各种解释的所谓“完全选举权”的要求,以便使工人们离开争取实现宪章派的社会和政治纲领的斗争。资产阶级激进派依靠宪章派的某些具有妥协情绪的领袖(洛维特和其他人等),于1842年在北明翰召开了两次资产阶级和宪章派的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共同鼓动选举改革的问题。但是,以新的“权利法案”和“完全选举权”的要求来代替人民宪章的建议被代表会议的宪章派大多数坚决否决了。人民宪章从这时起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唯一的要求。——第301页。
- 165 指摩耳斯沃思在1839—1845年出版的“托马斯·霍布斯全集”,其中有11卷是英文版,5卷是拉丁文版。——第305页。
- 166 马克思指的是哈姆雷特的一段独白(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在这段独白中哈姆雷特在教导演员,要求他们在表演时要有节制。——第305页。
- 167 指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2年伦敦版(Ch. Bab-
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第305页。
- 168 指布尔韦尔·利顿的小说“最后一个男爵”和“尤金·阿拉姆”。前部小说塑造了十五世纪英国封建内讧主要参加者之一沃里克伯爵(绰号“国王制造者”)的形象。——第305页。
- 169 本文第一、三两段开头谈到从“亚细亚号”轮船和从哈里法克斯城获得消息的那几行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第308页。
- 170 本文经恩格斯压缩并由马克思稍加文字上的修改后,另以“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Kritik der Krimischen Unternehmungen》)为题发表于1856年6月15日“新奥得报”上。“纽约每日论坛报”刊出的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是该报编辑部加的。——第320页。
- 171 恩格斯指的是自己的文章“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该文的德文稿译

载于本卷(见第 214—217 页)。——第 321 页。

- 172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 年至 1870 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派的机关报;它在 1848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 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326 页。
- 173 指 1849 年 7 月,由于法国政府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被推翻和教皇的世俗权力得到恢复一事。作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是这次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第 326 页。
- 174 提尔西特和约 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 1807 年 7 月 7 日和 9 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中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第 329 页。
- 175 指 1854 年 4 月 20 日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订立的同盟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两国有义务在俄国拒绝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而继续在巴尔干进军时共同对俄作战。——第 331 页。
- 176 Lower Empire (原文是法文 Bas-Empire) 是历史著作中使用的拜占庭帝国的称号;这个名词变成了表示处于没落和腐朽阶段上的国家的普通名词。——第 331 页。
- 177 查·纳皮尔的信发表于 1855 年 6 月 15 日“晨报”上。——第 333 页。
- 178 马克思答应“新奥得报”的一篇文章并没有发表。——第 324 页。
- 179 领港公会 是伦敦的一座大厦,十六世纪成立的旨在促进贸易和航海的 不列颠海员团体的理事会就设在这里。——第 334 页。

- 180 “雷诺新闻”（《Reynolds' s Newspaper》）是英国的激进派的周报；从1850年起由雷诺在伦敦出版；在五十年代初支持过宪章派。——第340页。
- 181 普腊德“维也纳会议”1815年巴黎版第1卷第262页（Pradt. 《Du Congrès de Vienne》. Paris, 1815, t. I, p. 262）。——第343页。
- 182 Knesebeck 《Denkschrift betreffend die Gleichgewichtslage Europa' s beim Zusammentritte des Wiener Congresses verfaßt》. Berlin, 1845, S. 11—14. ——第344页。
- 183 大概是指亚·格·邓洛普“哥萨克的统治和俄国在欧洲并对德国的影响”1855年伦敦版（A. G. Dunlop. 《Cossack Rule, and Russian Influence in Europe and over Germany, London, 1855》）。——第346页。
- 184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报道）是以单独通讯的形式刊登在“新奥得报”上，该报编辑部作了相应的修改。本文的这一部分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353页。
- 185 “梦行者”是意大利作曲家文琴佐·贝利尼的歌剧。——第353页。
- 186 《God save the Queen》（“上帝，保佑女王”）是英国国歌；
《Rule Britannia》（“统治吧，不列颠”）是英国民族颂歌；
《Partant pour la Syrie》（“向叙利亚出发”）是第二帝国国时期在拿破仑第三的庆祝会上演唱的正式歌曲。——第353页。
- 187 1854年9月底拿破仑第三在布伦举行阅兵的时候，他曾根据谣言宣布：塞瓦斯托波尔被联军占领了。——第353页。
- 188 “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是陆军部机关报，从1813年至191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从1816年起改为日报。
1855年6月1日该报登载了汉格事件的消息（指的是1855年5月对在汉格岛登陆的英国巡航舰的小艇上的船员的袭击，俄国驻防军把他们当成了侦察部队）。——第354页。

- 189 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的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仑第一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鲁赫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所击溃。——第 358 页。
- 190 马克思指的是英国流传的一句话：《It' s Hamlet without the Prince》（“这是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意即在这件或那件事情中缺少了主要的东西。——第 358 页。
- 191 “地球报”（《The Globe》）是英国一家日报“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 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报纸；1866 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 359 页。
- 192 在这里和这一段的前面部分，马克思引用“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一文（该文的英文稿译载在本卷第 320—325 页），以及“帕麦斯顿勋爵官邸演出的喜剧序幕。——克里木最近事件的经过”一文（见第 274—277 页）。——第 359 页。
- 193 关于 安吉阿尔- 斯凯莱西条约 见注 61。
达达尼尔海峡条约 是指 1841 年 7 月 13 日俄、英、法、奥、普同土耳其签订的关于海峡的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强国的军舰通行。公约未涉及战时海峡的制度，从而在形式上承认土耳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有权决定关于外国军舰通航的问题。——第 361 页。
- 194 高教会派 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
低教会派 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它主要是传播在资产阶级和下层牧师中间；它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着重宣扬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
非国教徒 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 363 页。
- 195 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某些重要问题时，下院即宣布作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开会；由下院议长

在主席名单中指定一人担任全院委员会主席 (Chairman of Committees) 主持会议。——第 364 页。

- 196 指 1840 年 7 月在伦敦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会员达到 4 万人。协会的活动表明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领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1848 年宪章派失败后，革命宪章运动的先进的、倾向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厄·琼斯试图在五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组宪章运动。这一点在宪章主义公会 1851 年通过的纲领中得到了反映。1855 年，在当权的寡头政治家的政策在国内引起了广泛不满的条件下，革命的宪章派又企图恢复争取人民宪章（见注 73）的群众运动，并重新提出了改组宪章派、从组织上巩固宪章派协会的口号。1855 年夏季举行了一系列的宪章派地方委员会的选举，8 月举行了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被选入执行委员会的有：厄·琼斯、罗宾逊和苏伦。

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上层人物的收买，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增长了机会主义倾向，这就导致了宪章运动的低潮，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活动也实际上停止了。——第 366 页。

- 197 见注 33。——第 373 页。
- 198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简写稿以“论克里木事件”（《Über die Ereignisse in der Krim》）为题发表于 1855 年 7 月 2 日“新奥得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登载的文章的第一段显然被该报编辑部改动过。——第 375 页。
- 199 本文有关军事事件的这一部分以及下面发表的一篇文章“六月十八日的强攻”（见本卷第 394—397 页）是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并于 1855 年 7 月 21 日在该报上作为社论发表的“联军的最近一次失败”（《The late repulse of the Allies》）一文的译文。——第 390 页。
- 200 派尔·麦尔 是伦敦的一条大街，许多贵族俱乐部都设在这里。——第 390 页。

-
- 201 Treadmill 是一种阶梯式的笨重轮子，由人踩踏而转动。在英国监狱内强迫犯人转动这种轮子作为一种惩罚。——第 391 页。
- 202 Court of Chancery (大法官法庭)是英国的高等法庭之一，在 1873 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庭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大法官法庭在审理案件时以其故意刁难和拖延而著名。——第 401 页。
- 203 Committee of Supply (拨款委员会)——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有关弥补国家开支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下院向王室宣布作为拨款委员会开会。这是下院作为全院委员会开全体会议的一种场合(见注 195)。——第 402 页。
- 204 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克里木事件)就是恩格斯写的“在克里木所犯的巨大错误”(《The great Crimean biunder》)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 1855 年 7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在“新奥得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时，马克思删去了某些细节。——第 405 页。
- 205 但丁“神曲”第一部“地狱”第三篇。——第 412 页。
- 206 先决问题(previous question)是英国议会中的一种议事程序，通常想回避作出这一或那一问题的决定时，就采用这种程序。在辩论某一提案的过程中，把“先决问题”提付表决：是否可以“现在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表决”(《that this question be now put》)。议院如果作出否定的回答，那末对基本问题的处理就要延缓进行。如果提出肯定的回答，表决就立即进行，无须再作辩论。——第 412 页。
- 207 Impeachment 是下院向上院法庭控告个别大臣或议员的违法行为的起诉。保证下院有权监督大臣行为的这种惯常做法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经常采用，在十九世纪实际上已从议会的实践中消失了。——第 414 页。
- 208 1855 年 6 月 27 日英、法和土耳其签订了关于英法政府保证给土耳其贷款 500 万英镑的协定。因此英国政府于 1855 年 7 月向下院提出了关于保证给土耳其贷款的法案，法案遭到了大多数议员的反对。辩论结

- 果，法案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并在 8 月得到了国王的批准。——第 424 页。
- 209 马克思后来把威克菲尔德殖民地化理论的评论收入“资本论”第 1 卷第 25 章内。——第 425 页。
- 21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4 章的注 51 内利用了这个议会委员会的材料。——第 426 页。
- 211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截至 1855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工作报告” 1855 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5》. London, 185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7 章的注 32 内利用了这份报告。——第 426 页。
- 212 卡·马克思的抨击文“约翰·罗素勋爵”的简写稿以同一标题于 1855 年 8 月 28 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第 429 页。
- 213 “尊敬的艾德蒙·伯克就培德福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 1796 年伦敦版第 37 页（《A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to a Noble Lord, on the Attacks made upon him and his pension, in the House of Lords, by the Duke of Bedford and the Earl of Lauderdale, Early in the present Sessions of Parliament》. London, 1796, p. 37）。——第 431 页。
- 214 马克思列举了罗素的一些著作：《Don Carlos, or Persecution》. London, 1822。《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from the Reign of Henry VII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821。《Memoirs of the Affairs of Europe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Vol. 1 — 2, London, 1824—1829。——第 432 页。

- 215 约翰·阿·罗巴克“改革法案通过前1830年的辉格党内阁的历史”1852年伦敦版第2卷第67页(J.A. Roebuck.《History of the Whig Ministry of 1830, to the Passing of the Reform Bill》. Vol. 1. 2, London, 1852, p. 67)。——第432页。
- 216 1819年, 在对集合于曼彻斯特附近举行群众大会讨论关于普选权的请愿书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之后, 英国议会根据卡斯尔里勋爵的提议通过了废除人身不受侵犯、废除出版和集会自由的六条反动法令(“禁口律”)。——第436页。
- 217 官册农 是英国农民的一种, 即根据官册(记录摘要)在向大地主交纳封建地租的条件下占用土地的人。
契约农 即根据租佃权占用土地的人。租种的期限和条件由大地主和佃农之间订立的契约来确定。——第436页。
- 218 指1830年底到1831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 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日益增长引起的。运动得到了一个“斯温”的称号(英文《swing》的拼音, 指用手操作的 枷的敲打部分)。起义的雇农和加入他们队伍的贫苦佃农烧毁了大地主和农场主的庄园、庄稼垛和仓库, 打碎了他们的脱谷机。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 对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起义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第436页。
- 219 自由农 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 这种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所有者。——第438页。
- 220 根据英国议会的传统, 上院议长(大法官)的座位用一个羊毛口袋作为座垫, 它曾经是英国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象征。——第438页。
- 221 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 见注93。——第444页。
- 222 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 1679年规定英国审判程序的法令, 根据这个程序, 被捕者可以要求公布Habeas Corpus, 即公布把他送交法庭的命令, 以检查逮捕是否合法。法庭根据对逮捕原因的审查, 或者是释放被捕者, 或者是把他送回监狱, 或者是在缴纳保释金或

保证书的情况下把他释放。Habeas Corpus Act 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特别经常采取这种措施。——第446页。

- 223 Corporation Act (市镇机关法) 是英国议会于1661年通过的，它要求担任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

1673年的 Test Act (宣誓法) 同样要求一切公职人员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

这些法令本来是用来对付天主教反动派的，但后来变成了对付官方的英国国教会的任何反动派的武器和维护英国国教会的特权的工具。——第452页。

- 224 Ecclesiastical Titles Bill (教会圣职法案) 1851年8月成为法律它宣布罗马教皇1850年颁布的关于任命英国的天主教主教和大主教的敕命无效。——第452页。

- 225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英文稿（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发表在1855年8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最近一次北明翰代表会议”（《The late Birmingham conference》）。——第456页。

- 226 国家改革协会 是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激进左派代表于1855年7月成立的。它提出了在普选权基础上实行议会改革的要求来同行政改革协会（见注137）相对立。领导国家改革协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力求同宪章派达成协议，同时指望工人运动接受他们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宪章派的领袖厄·琼斯和芬伦等人起初参加了这个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但是在大多数宪章派分子（他们认识到宪章派协会有在组织上从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危险，因而反对加入资产阶级组织）的压力下，他们很快就是出了这个组织。琼斯的动摇反映出他不了解丧失无产阶级独立路线的危险性，这种动摇使他在后来离开了宪章主义的革命原则。——第456页。

- 227 马克思在本文中利用了下列两个关于1855年7月北明翰代表会议各次会议的报告：“北明翰代表会议。关于所提出的和约基础，即众所周知的‘四项条款’的委员会的报告” 1855年伦敦版（《Birmingham Confer-

ence 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Proposed Bases of Pacification known as 《The Four Points》. London, 1855)。

“北明翰代表会议。关于丹麦条约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855年伦敦版(《Birmingham Conference. 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Danish Treaty》. London, 1855)。——第457页。

- 228 “欧洲军队”这一著作是由于“普特南氏月刊”通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向马克思约稿,而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曾帮助恩格斯在英国博物馆搜集了欧洲各国军队的材料,其中包括关于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中关于英国军队一节,马克思曾在给“新奥得报”写的通讯稿中转载过,这些通讯稿于1855年8月28日、8月31日和9月1日在该报发表,题目是:“不列颠军队”(《Die britische Armee》),“对英国兵士的惩罚办法”(《Züchtigung der Soldaten》),“英国兵士的服装和装备”(《Uniformirung und Equipirung des britischen Soldaten》)。本卷仅刊登了上述文章的第二篇,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许多个人的补充,因而具有独立的意义(见第572—574页);在“新奥得报”上发表的其他两篇论文与纽约杂志“普特南氏月刊”上登载的原文完全一致。——第463页。
- 229 布伦兵营是拿破仑第一在1803—1805年建造的军事基地,其目的是经过拉芒什海峡进犯英国。
1805年12月2日(11月20日)在奥斯特利茨附近发生了俄奥军队同法军的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获胜而告终。——第467页。
- 230 所谓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或西班牙战争,是英国和法国1808—1814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同时,在整个半岛上展开了西班牙人民和葡萄牙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法国占领的战争。——第467页。
- 231 英军和美军的新奥尔良(美国)会战是在1815年1月8日发生的。——第467页。
- 232 指1812年9月7日(8月26日)博罗迪诺会战(在莫斯科附近),即1812年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俄国军队在这次会战中表现了高度的战

- 斗素质并使法军遭到重大损失；会战的结果为战争向有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 and 拿破仑军队失败准备了条件，尽管俄军当时被迫放弃了莫斯科（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做法是适宜的）。——第469页。
- 233 七年战争（1756—1763）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战争的基本原因是英法之间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的竞争，以及普鲁士的侵略政策触犯了奥、法、俄的利益。在战争过程中，屡胜法、奥军队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军队，在同俄军作战时遭到了一系列的惨重失败。战争的结果是法国殖民地削弱了，而不列颠殖民帝国却因此增强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疆界。俄国在欧洲却大大地提高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威信。——第478页。
- 234 指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全套13册），在这一著作中说明了古希腊罗马的数学原理。——第485页。
- 235 切斯尼“简评火器及它的过去和现在”1852年伦敦版（Chesney.《Observation on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Fire-Arms》. London, 1852）。——第486页。
- 236 霍·道格拉斯“海军炮兵论”1820年伦敦版（H. Douglas.《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London 1820）。——第487页。
- 237 居斯丁“1839年的俄罗斯”1843年巴黎版第1—4卷（Custine.《La Russie en 1839》. T. 1—4. Paris, 1843）。——第508页。
- 238 托特列本之死的谣传是由于欧洲报纸的不正确的报道而来的。托特列本在1855年6月20日（8日）负伤，被迫立即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去进行治疗。——第509页。
- 239 指乔·卡瑟克特“简评1812年和1813年俄国和德国的战争”1850年伦敦版（G.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 London, 1850）。——第510页。
- 240 恩格斯在“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和“多瑙河战争”三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9—42、289—302、334—339页）中叙述了1854年1月6日（1853年12月25

- 日)的切塔特会战和1854年5—6月的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第511页。
- 241 德意志联邦 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没有中央政府,德意志分成36个邦,它们各自保持着封建专制制度,这就加深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第515页。
- 242 指土耳其苏丹马茂德二世于1826年残酷镇压了发动叛乱的土耳其近卫军,后者反对在土耳其军队中实行旨在以正规部队代替封建的近卫军的改革。——第517页。
- 243 土耳其军队在1529年和1683年两次围攻维也纳,均未成功。——第519页。
- 244 阿尔纳乌特人 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520页。
- 245 恩格斯在“多瑙河战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80—587页)中详细地分析了1853年11月4日(10月23日)的沃耳特尼察会战。——第522页。
- 246 指1855年1月26日英法和撒丁王国(皮蒙特)签订的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撒丁所担负的义务是在对俄战争中提供兵力为15000人的一个军,而英法则保证撒丁王国领土的完整。撒丁的统治集团为了要把奥地利管辖下的意大利领地并入皮蒙特,就以参加克里木战争为代价换取了拿破仑第三对今后这一斗争的支持。——第524页。
- 247 恩格斯援引卡·雪恩哈耳斯匿名发表的“一个奥地利老兵对1848—1849年意大利战争的回忆”1852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卷第166、167、223页;第2卷第239页(《Erinnerungen eines öster-reichischen Veteranen aus dem italienischen Kriege der Jahre 1848 und 1849》. Bd. I, S. 166, 167, 223; Bd. II, S. 239,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52)。——第527页。
- 248 1799年,在法国反对欧洲同盟的战争时期,那不勒斯(双西西里王国)

参加了战争，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的军队被法军击溃。那不勒斯被法军占领。

1820年7月资产阶级革命家——烧炭党人——在军队的参加下在那不勒斯发动了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并制定了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宪法。但是，在1821年奥地利根据神圣同盟的莱巴赫会议的决定对那不勒斯进行了武装干涉；奥地利军队击败了那不勒斯军队，并占领了那不勒斯。专制制度又重新恢复了。——第527页。

- 249 指那不勒斯王国在1849年5—7月参加法奥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共和国的部队在加里波第的指挥下采取了两次神速的进攻，并击退了那不勒斯军队。——第528页。
- 250 宗得崩德 是由瑞士7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为了抗拒瑞士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而组成的分离派联盟。瑞士联邦议会在1847年7月通过的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是宗得崩德在11月初对其余各州发起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大部分由民兵组成的宗得崩德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529页。
- 251 指1798年春季瑞士军队的失败和法军占领瑞士。——第529页。
- 252 三十年战争——见注139。——第531页。
- 253 下面是恩格斯引证休斯的匿名书：1845年西班牙真相。一个久居西班牙的英国人的作品”1845年伦敦版第1卷第326、329页（《Revelations of Spain in 1845, By an English resident》. London, 1845, vol. I, pp. 326, 329）；同时参见该书的第313—314页。——第537页。
- 254 指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次革命于1823年被神圣同盟根据维罗那会议的决议派往西班牙的军队镇压了，以及1833—1840年的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见注56），这个战争引起了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一直延续到1843年。——第538页。
- 255 普腊德“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年巴黎版第189页（Pradt.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Paris, 1816, P. 189)。——第538页。

- 256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是表示1830年七月革命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好的一种用语。尽管是《entente cordiale》，但是在三十年代和以后的时期，英法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却一再尖锐化。

这里指的是英国政府，特别是帕麦斯顿在1839—1841年土埃冲突问题（见注90）上所采取的反法立场。——第539页。

- 257 关于1854年12月2日条约 见注7。——第545页。

- 258 1855年8月8日在圣马丁大厅召开群众集会；关于这次群众集会的报告刊登在1855年8月11日“人民报”上。——第546页。

- 259 波兰之友文学协会 是按照以亚当·查尔托雷斯基为首的波兰流亡者的君主贵族保守派于1832年在巴黎成立的文学协会的形式于同年在伦敦成立。——第546页。

- 260 集中 是1836年成立的波兰民主协会的领导执行机关。民主协会于1832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的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组织。协会的纲领中规定取消封建义务和等级的不平等，规定将份地无偿地转归农民，以及一系列其他的进步措施。民主协会积极地参加了1846年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1849年夏波兰民主协会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集中便迁至伦敦，但是协会的大部分会员仍旧留在法国。在五十年代，民主协会内部发生了思想上的分裂。1862年，由于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民主协会便决定解散。——第546页。

- 261 约·鲍·奥斯特罗夫斯基“波兰史”1841年伦敦版第1—2卷（J. B. Ostrowsky. 《The History of Poland》. Vol. I—II, London, 1841）。——第546页。

- 262 1846年2月在波兰的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叛变以及

起义的领导者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仅仅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1815年起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同管制的克拉科夫共和国，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成立了民族政府，颁布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克拉科夫的起义在1846年3月被镇压下去了，随后，奥地利政府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1846年11月签订了条约，把克拉科夫归并奥地利帝国。

1848年革命运动又在波兰的许多地方，其中包括波兹南、西里西亚以及加里西亚的乌克兰农民中间爆发了。在1848—1849年，波兰的革命者积极地参加了一系列欧洲国家（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法兰西和意大利）的革命斗争。——第547页。

- 263 马克思指的是罗·皮尔于1854年12月12日在下院会议上的演说，皮尔在演说中呼吁英国政府对流亡者采取镇压措施，禁止流亡者首先是维·雨果的反波拿巴的行动。——第549页。
- 264 本文第二部分的简写稿，曾以“战争”（*The War*）为题作为社论发表于1855年9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第555页。
- 265 查·纳皮尔的信刊登在1855年8月24日“泰晤士报”上。——第564页。
- 266 本文的第一段显然经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改动。——第566页。
- 267 奉奥地利皇帝的命令从1855年6月24日起开始缩减驻防在加里西亚边境的奥军人数，这实质上是奥地利公开拒绝站在联军方面参加战争。——第566页。
- 268 本文第一段显然经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改动。该文的德文稿曾以同样的标题刊登在1855年9月3日和4日“新奥得报”上。——第575页。
- 269 这里列举的是英军同它的盟军在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中战胜法军的那些军事行动的例子，如1810年9月27日布萨库（葡萄牙）会战，1813年

对潘普洛纳（西班牙）堡垒的围攻，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第580页。

270 1839年英国议会公布了包括有关波斯和阿富汗问题的外交文件的蓝皮书。收在蓝皮书里的当时英国驻喀布尔代表亚·白恩士关于同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57）有关的事件的通信被外交部别有用心地选择和伪造过，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英国在发动这次战争中的煽风点火作用。亚·白恩士在他死前不久把他的通信的副本寄到伦敦，蓝皮书中未收入的一部分由他的家属发表了。英国政府的伪造勾当于是被揭露。——第582页。

271 格莱安和查·纳皮尔之间从1854年2月24日到11月6日这段时间的通信，发表在1855年9月3、4、6和8日“泰晤士报”上。——第582页。

272 关于根据格莱安的指示对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进行秘密检查的事情见注25。

在其他的一些信件中发现有邦迪埃拉兄弟写给马志尼的信，他们在信中说明了自己的远征卡拉布利亚的计划，目的是在意大利发动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统治的起义。1844年6月在实行这次远征时它的参加者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也被枪杀。——第582页。

273 1843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接壤的信德省。在1838—1842年英国阿富汗战争时期，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暴力使信德省的封建统治者同意让英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英国人又利用这个机会，于1843年要求当地的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英国军队在查·纳皮尔的指挥下对起义的俾路支各部落（信德省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后，英国人就宣布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属印度。——第584页。

274 见注70。——第584页。

275 本文是恩格斯的“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The Fall of Sevastopol》）一文的德文稿，“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9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本版俄译文是根据“新奥得报”上的较可

- 靠的原文翻译的。从马克思9月11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曾根据后来收到的电讯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作了某些修改。——第589页。
- 276 伦敦塔 是伦敦的一座城堡,在中世纪时曾是王宫和政治监狱,在十九世纪改作军械库。——第589页。
- 277 红色尖顶帽,即弗利基亚帽,是古弗利基亚人的头饰,后来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的样式,从此它就成了自由的象征。——第594页。
- 278 在本文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里“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了一些话。编辑部提到的驻伦敦记者系指普尔斯基。——第595页。
- 279 在第三次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同盟战争期间,被法军围于乌尔姆地区的、由马克将军指挥的奥地利军队于1805年10月被迫投降。——第599页。
- 280 指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第1卷第1分册第7章;1767年第一次在伦敦出版,共分两卷。——第601页。
- 281 “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是英国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的简称。该报是1848年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并而成的。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它用各种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第604页。
- 282 指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是贝列拉兄弟在1852年开办的一家大股份银行。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它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在其他许多国家里,仿效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的榜样,也创办了类似的机构。该银行于1867年破产,1871年倒闭。——第604页。
- 283 指阿·库尔图瓦“交易所业务,或巴黎开盘的法国和外国国家有价证券、法国和外国股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指南”1855年巴黎版(A .Cour-

tois.《Des opérations de Bourse ou Manuel des fonds publics français et étrangers et des actions et obligations de sociétés françaises et étrangères négociés a Paris》. Paris, 1855)。——第605页。

- 284 本文的英文稿曾以“军事状况”(《The State of the War》)为题,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英文稿显然经过该报编辑部的改动。——第607页。
- 285 指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恩格斯在“论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英文稿载于本卷第614—623页。——第610页。
- 286 财产继承法院 是在地主有权审判和惩罚自己的农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法庭。
英国的 不取报酬的审判官 是指从有产阶级代表中任命的治安法官。——第612页。
- 287 本文的简短的德文稿(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内),曾以“论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Zur Erstürmung Sebastopols》)为题载于1855年10月4日“新奥得报”上。“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该文第一段曾被该报编辑部改动过。——第614页。
- 288 指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一文,该文德文稿载于本卷第589—593页。——第616页。
- 289 下面是恩格斯所写的克里木战争大事记的译文(手稿中有许多字是简写的):

克里木战争:

1854年

9月

14日 旧堡登陆。

20日 阿尔马河会战。

25日 联军向塞瓦斯托波尔南区推进。

26日 攻占巴拉克拉瓦。

28日 封锁南区(当时在南区除水兵外只有8个营)。

10月

1日 进行侦察和决定在强攻前进行炮击。

9—10日 第一道平行壕距要塞400—600俄丈。

17日 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在陆地上俄军的火力占优势,以200门重炮对付进攻者的126门炮),舰队同时射击。俄军迫使法军炮兵停止射击。现在强攻已晚了。

25日 巴拉克拉瓦会战。

26日 俄军以9个营的兵力向英军阵地出击。

11月

4日 俄军比联军的兵力占优势。进攻。

5日 因克尔芒会战。英军的围攻作业现在几乎完全中止。只有阻援线在继续加强,以防止解围军队突破。

12月

11日 奥斯坦—萨肯任城防司令。出击日益频繁并日益顺利。

(1855年)

1月初 英军在距要塞400俄丈处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出击继续进行。

27日 尼耶尔来到。法军对马拉霍夫冈的坚决的强攻决定延期进行。英军让出了自己的二分之一的堑壕——总共一英里长!

2月

22—23日 色楞格多面堡建成,23日对该堡的攻击被击退。距主墙1100码。

2月28日— 沃伦多面堡建成——距主墙1450码。

3月1日

3月

11—12日 堪察加眼镜堡——770码;这样在距要塞470俄丈处敌人被迫悄悄地进行了转土对壕作业。在这些工事前还筑有战壕。

- 22—23日 对这些战壕的攻击被击退,这些战壕已被塹壕连成一个整体;第三棱堡前也是这样——距主墙430码处有采石场。
- 4月 向第四至第六棱堡前200步处的俄军战壕攻击。
- 19—20日 英军攻击采石场。
- 20—21日 被击退。
- 5月 联军的增援部队(法军和撒丁军)开到,佩利西埃也来到。重新组织兵力进攻。
- 23日 第五棱堡前俄军为防守反接近壕而展开了战斗,俄军获胜。
- 6月
- 7日 攻击堪察加眼镜堡、采石场、色楞格多面堡和沃伦多面堡。
- 18日 第一次强攻,被击退。
- 8月
- 16日 黑河
- 9月
- 8日 强攻。——第621页。
- 290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它是政府的报纸,是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它反映着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在1851年政变后,它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626页。
- 291 马克思指阿·杜桑涅尔的抨击性著作“高利贷者——当代之王。金融贵族的历史”1845年巴黎版(《Les juifs rois de l'époque Historie de la féodalité financière》.Paris, 1845)和若·玛·马蒂约—德恩威尔的抨击性著作“高利贷者大王路特希尔德第一的富有教益和有趣的事件”1846年巴黎版(《Histoire édifiante et curieuse de Rothschild I er, roi des juifs》.Paris, 1846)和“路特希尔德第一,他

的奴仆和他的人民”1846年巴黎版《Rothschild I — er, ses valets et son peuple》.Paris, 1846)。——第628页。

- 292 本文第一段显然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改动过。——第630页。
- 293 1854年6月俄国通过圣彼得堡的施蒂格利茨银行从国外获得了利率5厘的5000万银卢布的贷款。这笔贷款主要用来抵补进行克里木战争的开支。——第636页。
- 294 这个公告是在1855年8月28日颁布的。——第637页。
- 295 “第一个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的日记和通信集,包括了有关他的驻马德里宫廷、弗里德里希大帝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以及在海牙的公使馆的工作报告,他派往柏林、不伦瑞克和法兰西共和国的特别使团的工作报告”1845年伦敦第2版第1卷第166、217、218、228、299、454、510、515页(《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his Missions at the Courts of Madrid, Frederick the Great, Catherine the Second, and at the Hague; and of his special Missions to Berlin, Brunswick,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2nd ed. London, 1845, vol. I, pp. 166, 217, 218, 228, 299, 454, 510, 515)。
- 关于福克斯回忆录和通信集见注12。——第642页。
- 296 指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这次战争的结果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欧洲列强在这次战争中的立场是由他们和英国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的竞争决定的。法国、西班牙力图削弱英国的势力,于是参加了反英战争,后来又发生了同荷兰的战争。英国政府竭力想求得俄国的帮助,但俄国却在1780年宣布武装保护那些同英国的敌人进行贸易的中立国家的商船的原则。武装中立政策得到一系列国家(荷兰、丹麦、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它影响了战争的结局。1781年,英国军队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之后不久,英国被迫签订了和约(和约最后是在1783年在凡尔赛签字的),承认了自己以前的殖民地的独立。——第642页。

- 297 1780年12月英国借口荷兰破坏1674年的韦斯明斯特和约而向荷兰宣战。这个和约是1672—1674年英荷战争后签订的。英国当时引证了1674年条约的秘密条文,按照秘密条文,两国不得给予任何一方的敌国以帮助,然而对保障航行和贸易自由的另一条文却故意避而不提。
- 英国在1780年向荷兰宣战,当时因为荷兰同法国、西班牙以及北美殖民地进行贸易(而这些国家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英国政府打算破坏荷兰的贸易并夺取它的殖民地。1780—1784年的战争以英国获胜而告终,根据1784年5月在巴黎签订的条约,荷兰应让给英国讷加帕塔姆港口(在印度南部)并允许它在荷属东印度领水中自由航行。——第644页。
- 298 卡尔斯于1855年11月28日(16日)被俄军攻占。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把这一要塞变成入侵外高加索的据点,俄军攻占了这一要塞,因而就完成了它在克里木战争的高加索战区的一系列成功的行动。土军于1853—1854年企图侵入阿尔明尼亚和格鲁吉亚而遭到失败(1853年11月26日(14日)在阿哈尔齐赫,1853年12月1日(11月19日)在巴什—卡得克拉尔,1854年6月15日(3日)在乔洛克,1854年7月29日(17日)在巴雅泽特,1854年8月5日(7月24日)在丘留克—达尔),因而士气沮丧。奥美尔—帕沙的军队于1855年10月从克里木调往高加索后,由苏胡姆—卡列向明格列里亚进军,前去营救在卡尔斯被围的土耳其守军,但是没有成功。卡尔斯的占领是克里木战争中最后一次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战争的结束。——第646页。
- 299 在公元732年的普瓦提埃(在法国西部)会战中,由卡尔·马尔泰尔指挥的法军使阿拉伯人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阻止了他们继续向欧洲推进。——第648页。
- 300 恩格斯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期俄军对巴尔干半岛上的瓦尔那、布来洛夫和锡利斯特里亚等要塞的围攻,尽管土军在防守这些要塞时表现很顽强,但是这些要塞仍被俄军攻占了。——第648页。
- 301 指弗·博登施泰特“高加索的民族及其反对俄国人的解放斗争”1848年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F. Bodenstedt. 《Die Völker des Kaukasus und ihre Freiheitskämpfe gegen die Russen》. Frankfurt am Main, 1848); 罗·柯尔曾“阿尔明尼亚: 在埃尔斯伦和俄、土、波斯边境的一年”(R. Curzon, 《Armenia: a year at Erzeroom, and on the frontiers of Russia, Turkey, and Persia》), 1854年在伦敦出了本书的三个版本。——第651页。

- 302 指1856年1月在路易·波拿巴主持下在巴黎召开的、有英、法、撒丁三国代表和外交官员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据报刊报道, 在军事会议上曾讨论了关于联军在对俄作战的新战局中配合行动的问题。——第653页。
- 303 暗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期俄军的前进部队于1829年夏季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一事。——第653页。
- 304 指奥地利代表盟国于1855年12月中旬向俄国提出的作为和谈条件的五项条款。这些条件是原先讨论过的四项条款(见注6)的进一步具体化。其内容如下: 取消俄国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 改由各缔约国共同保护, 俄国同意修改贝萨拉比亚的疆界, 即让出靠近多瑙河的一片领土; 允许在多瑙河及其河口自由通航; 使黑海中立化, 禁止军舰通过海峡, 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规定数量的小型舰船例外); 各大国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第五项条款规定, 各参战国保留在和谈过程中除上述四项外再向俄国提出新条件的权利。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这五项条款, 为沙皇政府所接受, 并成为以后的巴黎和谈的基础。——第657页。
- 305 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 马克思利用了1856年2月7日恩格斯的来信, 信中谈到了法国的局势。——第658页。
- 306 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冲突是在1855年年底发生的, 它反映了英美为争夺中美洲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也表现在解释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韦尔条约时所发生的尖锐的意见分歧上。根据这个条约, 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有责任保证计划在尼加拉瓜修建的沟通两大洋之间的动河的中立, 并且不对尼加拉瓜、莫斯科托海岸以及中美洲的其他地

区强加侵占和统治。然而，英国违反条约继续霸占莫斯基托海岸和它在四十年代夺得的其他领土。美国力求巩固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因而就支持在1855年夺取了尼加拉瓜政权的美国冒险家沃克。英国企图在美国领土上为克里木的英国军队招募雇佣兵一事也促使英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尖锐化。两国政府相互指责破坏1850年条约，因而都提出抗议，并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英国在1855年10月还向美国海岸派遣了自己的军舰。然而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这个冲突由于1856年10月签订的协定而得到调解，协定确立了莫斯基托海岸和紧连着海岸的沿海地区的中立。——第658页。

- 307 亚眠和约 签订于1802年3月27日，签订国的一方为法国以及它的盟国西班牙和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另一方为英国。第二次反法同盟由于这个条约的签订而解散了。条约只是保证了军事行动上的暂时的喘息时机，到了1803年，英法之间的战争重新开始进行。——第658页。

- 308 马克思的这段引文出处是1856年1月14日“北方蜜蜂”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是俄国的一家政治和文艺报纸，1825年至186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1860年前由布尔加林和格列奇主编）；是沙皇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659页。

- 309 在1850年5月22日立法会议的一次会议上蒙塔郎贝尔要求法国政府采取像在1849年对罗马共和国采取的那种军事远征来反对国内的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关于对罗马共和国的远征见注173）。——第660页。

- 310 1855年12月29日在巴黎为从克里木归来的法国军队举行隆重的欢迎会时，École Polytechnique（高等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拒绝欢迎军队和皇帝，因而引起了政府方面对他们的镇压。

路易·波拿巴在他对军队的欢迎词中把自己比作罗马元老院，罗马元老院通常是以全体成员在罗马城门口来迎接凯旋的军队。——第661页。

- 311 École Normale 是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第662页。
- 312 1855年8月底在翁热城（法国西北部）有数百个工人企图举行起义，目的是在法国建立共和国，这个企图遭到了失败。起义工人的领导者和在1850年建立的秘密的共和团体“玛丽安娜”有联系。由于这次骚动，在1855年底至1856年初发生了无数次逮捕和诉讼案件。——第663页。
- 313 除了“人民报”以外，马克思还把本文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以“波拿巴的牺牲者和工具”（《Bonapartean Victims and Tools》）为题作为社论发表于1856年4月14日的该报上。——第665页。
- 314 凯恩 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政治犯流放的地方，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而常常造成大量死亡，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是在北非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法国的感化移民区；1851年至1860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贝耳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1857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665页。
- 315 法国的政治流放犯塔西利埃的信件译文，由马克思寄给了“人民报”，于1856年4月12日在该报发表。——第665页。
- 316 马克思讥讽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所利用的方法，他们依靠这种方法在军队官兵中搜罗自己的追随者，准备1851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路易·波拿巴以共和国总统的身分在萨托里和其他地方举行招待会和军事检阅时，以香肠、冷盘野味、香槟酒等广泛地宴请军官和兵士。——第665页。
- 317 布斯特拉巴 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联合构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曾试图举行叛乱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了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665页。
- 318 卡夫丁峡谷（Furcae Caudinae）在卡夫丁城（古罗马）附近。公元前

- 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那里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负着“牛轭”通过峡谷。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666页。
- 319 十二月十日会 是1849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第667页。
- 320 “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是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荷马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668页。
- 321 指1856年3月16日拿破仑第三的儿子——得到阿尔及利亚国王封号的欧仁的生日。——第670页。
- 322 “卡尔斯的陷落”这一著作是按1856年4月“人民报”发表的全文登载的，全文共分四篇。最初马克思曾以同样的标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过一篇比较简短的文章，这篇文章登载在1856年4月8日的该报上。1856年5月3日马克思曾将一篇由自己署名的题为“卡尔斯文件中的趣闻”（《Kars Papers Curiosities》）的文章刊登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和“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上；该文基本上是“人民报”上发表的第二和第三篇的摘要。——第673页。
- 323 关于五项条款 见注304。——第675页。
- 324 巴黎条约 是1856年3月30日由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会议上所签订的和约，也就是结束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约。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俄国应当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贝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和对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同意黑海中立化，即禁止外国的军舰通过海峡，同意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来换回联军在克里木所占

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媾和条件纵然对俄国说来是苛刻的,但是西方的外交政策(英国的和奥地利的)仍然不能完全实现其侵略的意图。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保卫战,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战场上的失败,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以及俄国的外交利用了英法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情况都对和平谈判的结果发生一定的影响。

巴黎条约并没有解决东方问题,因而成为七十年代欧洲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达到新的尖锐化的原因之一。——第675页。

- 325 马克思指的是蓝皮书:“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1856年伦敦版(《Papers Relative to Military Affairs in Asiatic Turkey, and the Defence and Capitulation of Kars》.London, 1856)。——第675页。
- 326 《Take care of Dowb》(“请照顾一下多布”)——陆军大臣潘缪尔拍给辛普森将军的关于任命他为总司令的正式电文中,请求他照顾一下自己的侄子、年轻的军官多比金,从此他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被嘲笑的绰号。——第678页。
- 327 法纳尔人 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法纳尔区有钱有势的希腊人,他们大部分是拜占庭贵族世系的后裔。他们依仗钱财和政治联系,在土耳其帝国的行政机关中高居要职。——第689页。
- 328 马克思指的是阿尔宁的幻想故事“埃及的伊萨伯拉”。——第708页。
- 329 马克思在本文内利用了关于普鲁士经济状况的某些资料,这些资料是恩格斯在1856年4月14日的信中告诉他的。——第713页。
- 330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713页。
- 331 《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第716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5年1月——1856年4月)

1855

- 1月底—2月初 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为了使材料系统化，便于今后进行工作，他翻阅了他的关于经济问题摘录的大批笔记本。
- 1月24—27日 马克思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写文章，从1854年12月底起他就是该报的撰稿人。他为这家报纸写了三篇关于英国议会辩论和内阁危机的文章。马克思的“议会常会开幕”、“论内阁的危机”和“议会状况”三篇文章发表在1月27、29和30日的“新奥得报”上。
- 1月29日左右 恩格斯继续注视克里木军事行动的进展，他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欧洲战争”一文，分析了克里木战争变为全欧战争的前景。马克思把这篇文章的德文稿和他写的关于议会辩论的补充寄给“新奥得报”，文章以“议会新闻。——战区消息”为题于2月1日在该报发表。恩格斯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2月1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月31日—2月1日 由于阿伯丁联合内阁的垮台，马克思给恩格斯寄去一份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的材料——对联合内阁活动的详细评述。恩格斯在“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中利用了这份材料，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2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2月1日 马克思应宪章派领袖厄·琼斯的邀请,出席流亡者国际委员会会议,目的是去了解这个组织的性质;在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纪念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问题。
- 不迟于2月2日 马克思收到拉萨尔的来信,信中阐述了德国的内部政治状况;马克思把这封信寄给了恩格斯。
- 2月2日 马克思把关于根据宪章派领袖们的倡议而成立由琼斯担任主席的流亡者国际委员会的消息告诉恩格斯,同时批评了这个委员会的活动,他着重指出,除宪章派外,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还有同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背道而驰的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代表。
- 2月2—6日 马克思写关于英国政府危机的文章:“阿伯丁内阁的倒台”,发表在2月1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以及“论内阁危机”、“被推翻的内阁”、“政党和集团”以及“两种危机”,分别发表在2月5、7、8和9日的“新奥得报”上。
- 2月9日左右 恩格斯写“克里木的斗争”一文,对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修筑的防御工事体系给予很高的评价。文章的德文稿和马克思所写的补充以“帕麦斯顿。——军队”为题发表在2月12日的“新奥得报”上。恩格斯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2月26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2月9日—3月3日左右 由于翻阅经济学笔记,进行紧张的工作,马克思的两眼感到疼痛,马克思因为身体很不舒服,只得在床上躺了几天;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穆希)和不久前刚诞生的女儿爱琳娜也都病了;医生建议马克思搬离他居住的那个对身体不利的伦敦索荷区。
- 2月12—14日 由于帕麦斯顿内阁的组成,马克思给“新奥得报”寄去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是他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

- 的简写稿,这篇抨击文发表在1853年底—1854年初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马克思揭露英国执政阶级寡头政治的文章发表在2月16和19日的“新奥得报”上。
- 不迟于2月13日 马克思接到流亡者国际委员会邀请他出席纪念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群众大会的请帖;由于这种大会没有成效,所以马克思在同恩格斯商量后,决定拒绝参加群众大会。
- 2月17和19日 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写“议会”和“托利党人同激进派的联合”两篇文章,指出英国经济状况和政治局势的尖锐化。文章分别发表在2月22和24日的“新奥得报”上。
- 2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写“欧洲面临的战争”一文,分析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篇文章的德文稿连同马克思关于议会辩论的补充发表在2月23和24日的“新奥得报”上,标题是“议会和军事问题”和“军队的状况”。恩格斯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3月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2月24日 由于皮尔分子退出帕麦斯顿内阁,马克思写了“论新的内阁危机”一文。该文发表在2月27日的“新奥得报”上。
- 2月27日 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写“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一文,揭露执政党政策的反动实质。该文发表在3月3日的“新奥得报”上。
- 2月底 马克思研究古罗马的历史;他从巴·格·尼布尔的著作“罗马史”三卷本中作摘录。
- 3月2日 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写“不列颠宪法”一文,同时还把这篇文章的英文稿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妥协构成英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这种妥协阻碍国家的进步发展。文章发表在3月6日的“新奥得报”上,3月24日又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英国的危机”。

- 3月3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必须休息,因而打算到曼彻斯特去一个时期。
- 3月6和7日 马克思写“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调查委员会”和“布鲁塞尔回忆录”等三篇文章,揭露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两面性,并指出英法同盟的不稳固性。文章分别发表在3月9、10和11日的“新奥得报”上。
- 3月13日 马克思写“爱尔兰的复仇”一文,内容是对英国议会中的爱尔兰议员团的妥协政策提出批评。该文发表在3月16日的“新奥得报”上。
- 3月中旬—4月6日 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病危,马克思夫人为儿子的病耽忧也病倒了。马克思照料着病人,由于长期彻夜不眠,他的身体十分衰弱。恩格斯像往常一样,对极度贫困的马克思一家给以物质上的帮助。
- 3月16日左右 恩格斯写关于军事行动的定期评论,这篇评论以“克里木事件”为题发表在3月19日的“新奥得报”上,并作为社论发表在4月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克里木军事行动的总结”。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大冒险家的命运”一文,揭露波拿巴法国对外政策的冒险性。马克思同时把这篇文章的德文稿寄给“新奥得报”,3月20日以“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为题在该报发表。这篇文章还作为社论登载在4月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3月18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必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揭穿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文章。
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在伦敦将要出版赫尔岑主编的俄国革命流亡者的杂志“北极星”。

- 3月20日 马克思写关于在伦敦饭店举行的群众大会的文章,这次大会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在3月16日召集的,目的是想引诱宪章派参加资产阶级反对贵族政治的反对派运动,使工人运动屈从于它的影响。在文章中马克思引用厄·琼斯和宪章派其他领袖在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利用工人运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企图。“伦敦饭店中的群众大会”一文发表在3月24日的“新奥得报”上。
- 3月20—27日 马克思注视着英国议会中和报刊上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言论,并就这方面的问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马克思的文章“英国报刊的消息”、“议会新闻:上院关于普鲁士的辩论”、“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拿破仑和巴尔贝斯。——报纸印花税”分别发表在3月23、24、27和30日的“新奥得报”上。
- 3月23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拿破仑最近的诡计”和“塞瓦斯托波尔会战”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是揭露拿破仑第三在克里木战争中所抱的王朝目的,后一篇文章是叙述联军企图占领色楞格多面堡的失败。马克思同时把第二篇文章的德文简写稿寄给“新奥得报”,3月26日该报以“论克里木最近事件”为题发表。恩格斯的两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4月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3月28日 马克思写关于议会委员会调查克里木的不列颠军队处境悲惨的原因的文章,对英国的军事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文章以“调查委员会的揭露”为题发表在3月31日的“新奥得报”上,该文的英文稿又作为社论发表在4月1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不列颠军队”。

- 3月30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战争的进程”一文，对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军事工程艺术作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把这篇文章的德文稿寄给“新奥得报”，4月2日该报以“论克里木局势”为题发表。文章还作为社论刊登在4月1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3月30日 马克思把儿子病势严重的情况告诉恩格斯，感谢恩格斯对马克思一家的关怀，并感谢他在马克思的这种困难时期担负了写文章的工作。
- 4月6日 马克思的八岁的儿子埃德加尔逝世。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带着妻子到曼彻斯特去住一个时期。
- 4月10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一文，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利用由于战争而造成的复杂形势来发展革命斗争的想法。在最近一个时期把马克思的通讯作为社论刊登的“论坛报”编辑部，这一次用马克思的署名在4月27日发表了这篇文章。
- 4月14日左右 恩格斯写文章指出拿破仑第三和他的将军们作为军事领导人来说是无能的。文章以“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为题发表在4月17日的“新奥得报”上，并作为社论发表在4月30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拿破仑的辩白”。
- 4月15日左右 恩格斯写军事评论，批评联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方式。评论以“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为题发表在4月18日的“新奥得报”上，并作为社论发表在4月30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
- 4月17日左右 恩格斯为“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揭穿了在沙皇俄国统治下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那种思想的反动性。文章以“德国和泛斯拉

- 夫主义”为题刊登在4月21和24日的“新奥得报”上。“纽约每日论坛报”把恩格斯的文章加以歪曲后,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5和7日的报纸上。
- 4月18日—5月6日左右
马克思和妻子一起住在曼彻斯特。
- 5月7—21日
由于资产阶级商业金融界代表加紧鼓吹行政改革;马克思就这个题目为“新奥得报”写了五篇文章:“论鼓动运动的历史”、“‘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上院会议”、“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关于改革运动”。这些文章揭穿了西蒂区改革派的真正目的,指出他们害怕工人阶级,准备同贵族妥协。文章分别发表在5月10、18、19和24日的“新奥得报”上。
- 5月6日左右和11日左右
恩格斯写了两篇关于战争进程的文章。文章以“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和“克里木战争”为题刊登在5月11和14日的“新奥得报”上,并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28和2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和“克里木的新攻势”。
- 不迟于5月16日
马克思写信给“新奥得报”的编辑之一埃尔斯纳,请求他为恩格斯的一本论泛斯拉夫主义的小册子找一个出版商,因为恩格斯打算在德国写成和发表这本小册子。埃尔斯纳没有找到出版商,因为出版商都“害怕落得革命的名声”,拒绝承担出版这本小册子。
由塔克尔出版的“政治评论集”问世,其中收入了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上的“帕麦斯顿勋爵”这一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
- 5月19日
马克思写“金融市场”一文,文中引用了一些说明英国金融危机加深的材料。文章发表在5月22日的“新奥得报”上。
- 5月21日左右
恩格斯写军事评论,这篇评论作为社论发表在6月8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克里木战争”。

- 5月24日 马克思把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军事评论列入自己定期为“新奥得报”写的文章中。文章以“帕麦斯顿勋爵官邸演出的喜剧序幕。——克里木最近事件的经过”为题发表在5月29日的报纸上。恩格斯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6月1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新的法国总司令”。
- 5月26日—6月1日 马克思就议会关于帕麦斯顿政府对外政策的辩论为“新奥得报”写了四篇文章，分析了英国议会中各个党派和集团对克里木战争所采取的立场。马克思的“议会改革。——维也纳会议的中断和恢复。——所谓歼灭性战争”、“迪斯累里的提案”、“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对帕麦斯顿最近一次演说的批评”等四篇文章分别发表在5月30、31日以及6月1和4日的“新奥得报”上。
- 6月5日 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写“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一文；他指出宪章派提出的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纲领的意义，并着重指出，实现这一纲领，就有可能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开辟前景。该文发表在6月8日的“新奥得报”上。
- 6月6—9日 马克思继续注视英国议会对战争问题的辩论，并就这方面的问题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发表在6月9和12日的“新奥得报”上。
- 6月8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克里木的消息”一文。该文的德文稿刊登在6月11日的“新奥得报”上，标题是“评克里木事件”，并作为社论发表在6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6月12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塞瓦斯托波尔”一文，

对筑城学的发展作了概述。该文的德文稿以“评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为题发表在6月15日的“新奥得报”上，并作为社论发表在6月2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6月15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拿破仑的军事计划”一文，证明联军提出的“为局部目的进行局部战争”的计划所追求的目的是不让克里木战争变为各国人民反对欧洲反动制度的战争。马克思把这篇文章的材料也收入自己的通讯：“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和“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评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这两篇通讯发表在6月19和23日的“新奥得报”上。恩格斯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7月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不迟于6月15日 马克思接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德纳的建议，要他为纽约的进步杂志“普特南氏月刊”撰写论述欧洲军队的文章；根据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担负了写这些文章的工作。
- 6月19日 马克思写“奇怪的政策”一文，揭露英法执政阶级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7月10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6月19日以后 马克思接到过去参加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席利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转达了马克思的许多熟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必须尽快出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 6月24日 马克思和威·李卜克内西一起参加了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性示威，反对有损人民群众利益的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马克思在“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一文中叙述了自己对这次示威的印象，同时着

- 重指出这次运动的群众性以及宪章派在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文章发表在6月28日的“新奥得报”上。
- 6月27日—7月3日左右 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为恩格斯收集有关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恩格斯在他的“欧洲军队”一文中利用了这些材料。
- 6月29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一文。该文的德文稿以“论克里木事件”为题发表在7月2日的“新奥得报”上，并作为社论发表在7月1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6月底—7月初 恩格斯写“欧洲军队”一书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刊登在“普特南氏月刊”的8月号上。
- 7月1日 马克思参加了在海德公园举行的反对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第二次示威；他只是由于偶然的的机会才逃脱了逮捕。马克思在“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法案所引起的风潮”一文中坚决反对伦敦警察当局残酷镇压示威参加者的行为。文章发表在7月5日的“新奥得报”上。
- 7月6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6月18日联军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失败的文章。马克思把该文的德文稿寄给了“新奥得报”，同时把它分成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里，他补述了在7月1日镇压海德公园示威者以后所发生的伦敦人民同警察的冲突。“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论克里木事件”和“六月十八日的强攻”这两篇文章发表在7月9日和11日的“新奥得报”上。恩格斯的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7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联军的最近一次失败”。
- 7月11—20日 由于新的内阁危机和罗素辞职，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有关议会辩论的文章，揭露了英国议会的反民主性质。

- 马克思把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军事评论列入其中的某些文章中。“议会新闻：罗巴克和布尔韦尔的提案”、“议会新闻：布尔韦尔提案，爱尔兰问题”、“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罗素的辞职”、“在议会内”和“议会新闻。——战区消息”等文章发表在7月14、16、17、20、21和23日的“新奥得报”上。
- 7月17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告诉他有关流亡到美国的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和德国的其他一些革命流亡者的消息。
- 7月17日以后 马克思带着由于儿子死亡悲痛过度而仍未复原的妻子和女儿们搬到坎伯威尔（在伦敦近郊）的一个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伊曼特那里；伊曼特到苏格兰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住宅让给马克思一家使用。
- 7月25日—8月12日 马克思写抨击文“约翰·罗素勋爵”，揭露了罗素——辉格党的典型代表——所体现的英国执政的寡头政治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所奉行的政策。这篇抨击文发表在从7月28日到8月15日的“新奥得报”上，它的简写稿发表在8月2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7月底 恩格斯写“欧洲军队”一书的第二部分，这部分刊登在“普特南氏月刊”的9月号上。
- 8月13日 马克思写“波兰集会”一文，揭露帕麦斯顿政府对波兰民族运动的政策的挑衅性质，也谴责了波兰流亡者中保守的贵族君主派的立场，并且拿它同民主派进行对照。该文发表在8月16日的“新奥得报”上。
- 8月15日 马克思写“对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的批判”一文，阐述了英国议会中关于奥地利拒绝参加反俄战争的原因的辩论。文章发表在8月18日的“新奥得报”上，该文增补后的稿子在8月底写成，作为社论发表在

- 9月1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奥地利和战争”。
- 8月17和18日 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写“英法对俄战争”一文，在文章中利用了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军事评论。该文发表在8月20和21日的“新奥得报”上。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9月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战争”。
- 8月31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黑河会战”一文，该文的德文稿发表在9月3和4日的“新奥得报”上，并作为社论发表在9月1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9月 恩格斯写“欧洲军队”一书的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发表在“普特南氏月刊”的12月号上。
- 9月1日 马克思把德纳提出的为“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篇论述改进现代作战方法的文章的新建议告诉恩格斯。
- 9月6日 马克思得悉罗·丹尼尔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科伦案件的被告之一）逝世后，写信给在科伦的死者的妻子，向她表示慰问。
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打算刊登悼念丹尼尔斯逝世的讣闻，并在报刊上发表由他自己、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和威·沃尔弗签署的关于丹尼尔斯逝世的通告。
- 9月8日左右 由于英国报刊发表了英国海军上将查·纳皮尔和海军大臣詹姆斯·格莱安之间关于1854年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军事行动的通信，马克思写了“英国的新揭露材料”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9月2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9月8日以后 恩格斯编写克里木战争大事记。

- 9月11日 马克思根据最近的电讯,校正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一文,并将该文的德文稿寄给“新奥得报”,于9月14日以“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为题在该报发表,该文还作为社论刊登在9月2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马克思接到埃尔斯纳关于“新奥得报”财政困难的来信后,复信表示愿意不取稿费为该报撰稿。
- 由于宪章派前领导人奥康瑙尔逝世,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伦敦工人为奥康瑙尔举行的葬仪,“奥康瑙尔的葬礼”一文发表在9月15日的报纸上。
- 9月12日 马克思离开坎伯威尔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去。
- 9月14日左右 恩格斯写“克里木战争的前景”一文,指出要塞和野战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马克思将该文的德文稿寄给“新奥得报”,以“关于克里木事件”为题在9月18日发表。恩格斯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0月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9月24日和10月4日 马克思写“贸易和财政状况”和“法兰西银行。——克里木的增援部队。——新元帅”两篇文章,指出法国财政危机成熟的征兆。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9月28日和10月8日的“新奥得报”上。
- 9月28日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强攻和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文章,该文的德文稿以“论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为题发表在10月4日的“新奥得报”上。文章还作为社论发表在10月1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战争的决定性事件”。
- 10月2日 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写“官方财政报告”一文,批评英国政府的税收政策,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英

- 国劳动者福利增长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文章发表在10月6日的报纸上。
- 10月6—10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埃尔斯纳的两封来信，信中请他不要再把通讯稿寄给“新奥得报”，因为该报即将停止出版。马克思收到第一封信后就停止寄通讯稿。
- 10月19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定期军事评论。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1月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标题是“军事行动的进程”。
- 11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见他们的朋友——从欧洲大陆旅行归来的德国无产阶级诗人格·维尔特。
- 11月初 马克思写信给德纳，坚决要求改变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条件。德纳复信表示同意马克思的建议：每星期给该报寄两篇文章，每篇文章的稿酬为10美元。
- 11月2日左右 恩格斯写“俄国军队”一文，指出沙皇俄国的经济落后性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对它的军队所起的影响。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1月16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1月8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埃尔斯纳，说他的来信已经收到，得悉“新奥得报”即将停止出版，因而他不再给报纸寄稿。在信中马克思对于又继续出版了一个时期的“新奥得报”的活动表示称赞，并且指出，在德国政治反动的条件下，报纸应尽最大可能来争取出版。马克思还告诉他关于英国当局迫害泽稷岛上的政治流亡者的情况。
- 1855年11月17日和
1856年1月5日 反对帕麦斯顿的乌尔卡尔特分子的报纸“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Sheffie Free Press》）转载了马克思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帕麦斯顿勋爵”一组文章中的两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在设菲尔德出版的“‘自由新闻’小丛书”（《Free Press Serials》）的第4期（A）上单独刊印出版。

- 12月初 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
- 12月12日 恩格斯把曼彻斯特纺织工厂工人继续罢工的情况告诉马克思。
- 1855年12月12日—
1856年1月 马克思几次会见埃德加尔·鲍威尔和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把他同鲍威尔兄弟谈话的情况写信告诉恩格斯,并对他们的思想观点作了批判性的评价,特别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蔑视工人运动的傲慢态度提出尖锐的批评。
- 1855年12月24日左
右—1856年1月初 恩格斯在伦敦的亲戚家里作客,经常和马克思会面。
- 12月28日左右 马克思写“传统的英国政策”一文,用历史实例揭穿了辉格党的对外政策的反革命实质。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1856年1月1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855年12月29日—
1856年2月16日 乌尔卡尔特分子在伦敦的机关报“自由新闻”(《Free Press》)转载了马克思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帕麦斯顿勋爵”一组文章,同时还以“帕麦斯顿勋爵传记”为题,在“‘自由新闻’小丛书”的第5期上单独刊印出版。

1856

- 1—4月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一组文章;他研究了有关斯拉夫人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书籍;恩格斯的文章由马克思寄往纽约,但没有发表。
- 1月上半月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论述多瑙河各公国和瑞典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发表。
- 1月11日左右 由于1855年11月俄军攻占卡尔斯要塞,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亚洲战争”一文,分析了土耳其军队在南高加索失败的原因,并指出了俄国人的巨大成

就。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1月25日的报纸上。

- 1月18日左右 恩格斯写“欧洲战争”一文,对克里木战争作出几点总结,同时指出,事件的进展并不能实现使这一战争变成争取欧洲的民主改革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战争的愿望。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2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月18日 马克思把戴·乌尔卡尔特的“宪章运动通讯”一文寄给恩格斯,作者在文章中对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大肆诬蔑。马克思在信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乌尔卡尔特客观上作了“英国警察的走狗”。
- 2—4月 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研究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外交文件和抨击性文章,以及有关英俄关系的历史著作。他从詹·威廉斯、休斯、马洪、施洛塞尔和其他许多作者的著作中作了摘录,还从彼得一世的日记和俄国驻英国大使韦谢洛夫斯基的札记中作了摘录。他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发表他所发现的有关十八世纪外交史方面的材料。
- 2月7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法国内部政治状况作了详细的评述:指出在无产阶级、大学生和军队中的反波拿巴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
- 2月8日 马克思利用恩格斯2月7日来信中的材料,写了“英美冲突。——法国的局势”一文,预言法国波拿巴制度复灭的必然性,文章也涉及到英美之间的矛盾。这篇文章刊登在2月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2月25—28日左右 古·勒维作为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代表到伦敦去找马克思,向马克思报告了莱茵省工人运动的状况,叙述了佐林根、伊塞隆、爱北斐特和其他准备举行起义的地区的工厂工人革命情绪的高潮情况。马克思警告勒维,不

要采取冒险的措施,并向他说明在现有条件下在莱茵省举行起义为时过早,同时还指出,如果“巴黎发出信号,那末在任何情况下,大家都会进行冒险”。勒维还告诉马克思许多有关拉萨尔的活动和私生活中的不光彩的事实,这些事实引起了杜塞尔多夫工人对他的仇视;马克思建议继续观察拉萨尔的行动,暂时不要对他作公开的揭露。

- 2月底—3月上半月 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里研究斯拉夫民族历史方面的书籍。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斯拉夫学方面的某些著作,其中包括多勃罗夫斯基、赫弗特、艾希霍夫等人的作品,作了批判性的评价。马克思对斯拉夫人的文化史以及对古代俄罗斯的文化感到兴趣,马克思读了“伊戈远征记”一书的法译本,并答应恩格斯为他找到这部作品的版本。
- 3月5—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就勒维报告的莱茵省工人运动状况交换意见。他们还讨论了从勒维那里了解到的关于拉萨尔的品行的情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品行提供了对他更加不可信任的理由。
- 3月底—4月 马克思读了刚刚在蓝皮书上发表的关于放弃卡尔斯的外交文件后,写了“卡尔斯的陷落”一文,目的是为了揭露英法外交对“联盟的”土耳其的背信弃义行为。马克思最初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这一著作的,4月8日在该报发表,马克思后来又作了大量补充,把它寄给了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分成四篇文章分别发表在4月5、12、19和26日的报纸上,署名是马克思。马克思在他给“自由新闻”和“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写的并于5月3日发表的通讯中利用了“人民报”上的某些文章。
- 不迟于3月29日 马克思向“人民报”编辑厄·琼斯介绍原定为“纽约每

- 日论坛报”写的“卡尔斯的陷落”一文的手稿。琼斯打算在圣马丁大厅向工人听众作公开讲演时利用文章的材料，并在3月29日的“人民报”上登出广告：即将在这家报纸上发表马克思关于卡尔斯的一组文章。
- 4月1日左右** 马克思写“小波拿巴法国”一文，揭露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该文刊登在4月5日的“人民报”上，并作为社论刊登在4月1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4月上半月** 马克思几次会见卡·沙佩尔，沙佩尔承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自己采取宗派冒险主义立场的错误，并对他和维利希一起参加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的派别斗争表示后悔。
- 不迟于4月10日** 马克思收到勒维从杜塞尔多夫的来信，勒维在信中谈到他同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米凯尔的会面，还谈到他同米凯尔在关于无产阶级在面临的革命中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勒维不同意米凯尔的妥协立场，因而请马克思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 4月15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普鲁士经济和内部政治状况的文章，文章利用了4月14日恩格斯给他的信中所列举的实际材料。马克思的“普鲁士”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5月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人名索引

三 画

万当, 多米尼克·勒奈 (Vandamme, Dominique René 1770—1830) —— 法国将军, 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各次战争, 1813年在库尔马附近率全军投降。——第210页。

大卫·丹热, 比埃尔·让 (David d'Angers, Pierre Jean 1788—1856) —— 著名的法国雕塑家, 左派共和主义者, 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被驱逐出法国, 但不久又回到国内。——第662页。

土苏姆-帕沙 (Tusum Pasha) —— 土耳其将军, 1855年任高加索土军指挥官。——第685页。

四 画

戈登, 约翰·威廉 (Gordon, John William 1814—1870) —— 英国军官, 军事工程师, 后为将军; 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工程长官。——第712页。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e de 1808—1881) —— 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继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177页。

文迪施格雷茨, 阿尔弗勒德 (W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 —— 公爵

奥地利元帅; 1848年指挥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起义; 1848—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224、489页。

尤维纳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一世纪六十年代——死于127年后) —— 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318页。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拉夫 (Zamojski, Wladyslaw) —— 伯爵, 波兰大地主, 曾参加1890—1831年起义, 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 克里木战争时期, 企图组织波兰军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74页。

丹多纳耳德——见柯克伦, 托马斯。

切斯尼, 弗丝西斯·罗当 (Chesney, Francis Rodon 1789—1872) —— 英国上校, 1855年起为将军。——第486页。

切奥达也夫,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Чеодаевъ,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死于1859年) —— 俄国将军, 曾参加1812年战争, 克里木战争时任军长和后备步兵指挥官。——第16、24页。

比佐, 米歇尔·布里斯 (Bizot, Michel Bris 1795—1855) —— 法国将军, 军事工程师; 1854—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工程长

- 官。——第170页。
- 比耳斯, 艾德蒙 (Beales, Edmond 1803—1881) ——英国法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55年为主张通过议会改革来扩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宣传家之一, 1865—1869年为改革同盟主席。——第155页。
- 比特桑, 威廉·弗格森 (Beatson, William Ferguson) ——英国将军; 1854年任多瑙河土军骑兵指挥官, 后任克里木土军骑兵指挥官 (至1855年9月)。——第676、684页。
- 韦克利, 托马斯 (Wakley, Thomas 1795—1862) ——英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55年主张通过议会改革扩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第154页。
- 韦德尔, 列奥波特·亨利希 (Wedell, Leopold Henrich 1784—1861) ——普鲁士将军; 1855年负外交使命驻巴黎。——第150页。
- 韦斯明斯特侯爵, 理查·格娄弗诺 (Westminster, Richard Grosvenor 1795—1869) ——英国贵族, 大土地占有者, 辉格党人。——第385页。
- 邓斯·司各脱, 约翰 (Duns Scotus, John 1265左右—1308)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 唯名论 (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 的代表人物, 著有“牛津文集”这一内容丰富的杰作。——第66页。
- 邓达斯, 理查·桑德斯 (Dundas, Richard Sanders 1802—1861) ——英国海军上将, 1855年任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第354、370、559、561页。
- 邓达斯, 詹姆斯·威特利·迪恩斯 (Dundas, 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 ——英国海军上将, 1852年至1855年1月为参加克里木战争的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306页。
- 邓洛普, 亚历山大·格莱安 (Dunlop, Alexander Graham) ——英国政论家。——第346页。
- 邓科布, 托马斯·斯令斯比 (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 ——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四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 议会议员。——第79、82、373、390页。
- 巴勒, 德——见克兰里卡德侯爵, 乌利克·约翰。
- 巴罗, 奥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2月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首领; 1848年12月—1849年10月领导以保皇派反革命集团为支柱的内阁。——第229、666页。
- 巴兰坦, 威廉 (Ballantine, William 1812—1887) ——英国法学家。——第391页。
- 巴林顿, 威廉, 魏耳德曼 (Barrington, William Wildman 1717—1793) ——子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陆军大臣 (1755—1761、1765—1778)。——第119页。
- 巴克豪斯, 约翰 (Backhouse, John 1772—1845) ——英国官员; 1827—1842年任外交副大臣。——第75页。
- 巴拉盖·狄利埃, 阿希尔 (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 ——法国将军, 1854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3—1854), 1854年为波罗的海法国远征军指挥官。——第277页。
- 巴特, 伊萨克 (Butt, Isaac 1813—1879)

——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在七十年代是爱尔兰自治（Home-Rule）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第84页。

巴特勒詹姆斯·阿默尔（Butler, James Armar 1827—1854）——英国军官，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组织者之一。——第521页。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85页。

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被释后侨居国外，不久就脱离政治活动。——第179页。

五 画

汉卡，瓦茨拉夫（Hanka, Václav 1791—1861）——捷克的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对捷克人实行日耳曼化；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一个反动分子，沙皇专制制度的辩护人；在发表历史文件时有严重的伪造现象。——第221页。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男爵，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家和神学家；曾任驻伦敦大使（1842—1854）。——第161、163、393页。

白恩士，亚历山大（Burns, Alexander 1805—1841）——英国军官；1839—1841年任喀布尔英军司令部政治顾

问。——第582页。

包法利，爱德华·普莱得尔（Bouvier, Edward Plvdell 1818—1889）——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贸易副大臣（1855），济贫法问题委员会主席（1855—1858）。——第383、405、409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年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中，率领志愿军站在皮蒙特军队一边奋勇作战；1849年4—6月为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而斗争。——第528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160、642—645页。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olf 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和统帅；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对丹麦、波兰和俄国宣战；曾参加三十年战争，领导新教国家同盟。——第531页。

兰斯科伊，谢尔盖·斯切潘诺维奇（Ланской, Сергій Сергі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781—1862）——1861年受封为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5—1861）。——第637页。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一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e 1780—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06—1807），枢密院院长（1830—1841，1846—1852），不管部大臣（1852—1863）。——第62、362页。

- 卢肯伯爵, 乔治·查理·宾加姆 (Lucan, George Charles Bingham 1800—1888)——英国将军, 托利党人, 1854—1855年初任克里木英军骑兵师长。——第158页。
- 卢什迪—帕沙 (Rushdi Pasha 1809—1879)——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五十至六十年代委任陆军大臣。——第683、685、686、700、701、703、711、712页。
-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625、626页。
- 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 (Saint—Arnaud, Arman—Jacques—Leroy de 1801—1854)——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陆军大臣 (1851—1854), 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132、142、146、167、189、209、210—212、271、277、474、555页。
- 瓦扬, 让·巴蒂斯特·菲利贝尔 (Vailant, Jean Baptiste Philibert 1790—1872)——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陆军大臣 (1854—1859)。——第142、146、310页。
- 瓦特耳, 艾梅尔 (Vattel, Emmeric 1714—1767)——瑞士法学家, 在萨克森当外交官, 为国际法专家。——第218页。
-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伦纳 (Walewski, Alexander—Florian—Joseph Colonna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 曾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 曾任外交大臣 (1855—1860); 曾主持巴黎会议 (1856)。——第695页。
- 弗兰茨—约瑟夫 (Franz—Joseph 1830—1916)——奥地利皇帝 (1848—1918)。——第489、566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 (1740—1786)。——第162、467、478、498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 (1797—1840)。——第343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4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716页。
- 尼扎尔, 让·玛丽·拿破仑·德吉烈 (Nisard, Jean Marie Napoléon Désiré 1806—1888)——法国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 五十年代任索尔邦大学教授, 在讲课中企图证明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是理所当然的。——第662页。
- 尼耶尔, 阿道夫 (Niel, Adolphe 1802—1869)——法国将军, 后为元帅; 1854年任波罗的海法国远征军工程长官, 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工程长官。——第143、147、170、587、610、614、617页。
- 尼科莱, 詹·阿·(Nicholay, J. A.)——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55年为主张通过议会改革扩大工业资产阶级政治权利的宣传家之一, 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165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 (1826—1855)。——第4、14、17、19、30、55、92—94、109、114、122、123、160、209、285、293、335、349、

- 555、582、639、640、653页。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11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第105、226、246、248、373、658页。
- 皮扎尼,埃蒂耶纳(Pisani, Etienne)——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翻译(1854—1855)。——第689页。
- 皮阿诺里,卓万尼(Pianori, Giovanni 1827—1855)——意大利革命家,曾参加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和抗击法国武装干涉者的罗马共和国保卫战;革命失败后流亡皮蒙特,后迁法国,1855年5月谋刺拿破仑第三未遂被处死。——第237页。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人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73、77、100、106、126、184、189、246、257、306、414、434、444—446、448—451、453、454、583页。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822—189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副大臣(1855—1857);罗伯特·皮尔的儿子。——第150、164、548、549页。
- 皮尔,卓纳森(Peel, Jonathan 1799—1879)——英国将军,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第412—414页。
- 皮尔,弗雷德里克(Peel, Frederick 1823—1980)——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陆军副大臣(1855—1857);罗伯特·皮尔的兄弟。——第77、113、563页。
- 皮尔斯,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总统(1853—1857)。——第658页。
-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贵族特权的维护者;公元前184年被选为监察官,他监察之严格是人所共知的。——第712页。
- 卡穆,雅克(Camou, Jacques 生于1792年)——法国将军,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第576、577页。
-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 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雅各宾党人,1794年参加热月9日的反革命政变。——第322、678页。
- 卡利古拉(Caligula 12—41)——罗马皇帝(37—41)。——第104页。
- 卡德威尔,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1813—1886)——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领袖之一,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第98、115、189页。
- 卡特赖特,约翰(Cartwright, John 1740—1824)——英国政论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在报刊上发表意见要求采用普选权进行议会改革。——第301页。
- 卡瑟克特,乔治(Cathcart, George 1794—1854)——英国将军,1854年任克里

- 木英军师长。——第158、510页。
-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三十五至四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 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第277、666页。
- 卡斯特朗, 艾斯普里·维克多·伊丽莎白·博尼法斯 (Castellane, Esprit Victor Elizabeth Boniface 1788—1862)——伯爵,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积极参加者之一。——第Z77页。
- 卡斯尔里子爵, 罗伯特·斯图亚特 (Castleragh, Robert Stewart 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1807—1809), 外交大臣(1812—1822)。——第160、343、436页。
- 布朗, 乔治 (Brown, George 1790—1865)——英国将军; 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276页。
- 布律阿, 阿尔芒·约瑟夫 (Bruat, Armand—Joseph 1796—1855)——法国海军上将, 1855年任黑海舰队总司令。——第688页。
- 布隆诺夫, 菲力浦·伊万诺维奇 (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 俄国外交家; 曾任驻伦敦公使(1840—1854、1858—1860), 后为驻伦敦大使(1860—1874)。——第458页。
- 布兰西昂, 阿道夫·厄内斯特·德 (Brançion, Adolphe Ernest de 1803—1855)——法国军官, 1855年任克里木
- 法军团长。——第394页。
- 布奥尔—绍恩斯坦, 卡尔·斐迪南 (Bou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1797—1865)——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 后为驻伦敦公使(1851—1852), 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第5、204、286、411页。
- 布莱, 詹姆斯 (Bligh, James)——五十年代宪章运动的积极活动家之一。——第366页。
- 布莱特, 约翰 (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自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派领袖之一; 历任自由党内阁各部大臣。——第98—100、206、228、268、273、274、317、318、413、437、441、541、628页。
- 布鲁姆, 亨利·彼得 (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男爵, 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著名活动家, 曾任大法官(1830—1834); 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不起重大作用。——第356、438、440、454页。
- 布鲁土斯 (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左右—42)——罗马政治活动家, 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贵族共和派阴谋的发起人之一。——第12、399页。
- 布腊默耳, 乔治·布莱恩 (Brummel, George Bryan 1778—1840)——英国贵族, 由于讲究穿戴, 得外号“美男子布腊默耳”。——第549页。
- 布腊提昂诺, 季米特卢 (Bratiano, Dimitru 1818—1892)——罗马尼亚政治活

动家和政论家,曾参加瓦拉几亚1848年革命,革命失败后侨居国外。——第551页。

布尔克奈,弗朗斯瓦·阿道夫 (Bourque-Dey, Francois Adolphe 1799—1869) ——男爵,法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41—1844),后为大使(1844—1848),又任驻维也纳公使(1853—1856),后为大使(1856—1869)。——第5页。

布尔韦尔—利顿,爱德华·乔治·利顿 (Bulwer-Lytton, Edward George 1803—1873) ——英国资产阶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期为辉格党人,1852年起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305、351、398、400—402、405、409、410、424页。

六 画

安 (Anne 1665—1741) ——英国女王(1702—1714)。——第118页。

伍德,查理 (Wood, Charles 1800—1885)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1846—1852年任财政大臣,后为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1855—1858年任海军首席大臣,后为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第27、47、79、104、175、370、373、413、414页。

迈尔斯,威廉 (Miles, William 生于1797年) ——英国议会议员,托利党人。——第84页。

列阿德,尼古拉·安得列也维奇 (рсад,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793左右—1855) ——俄国将军,1855年任克里木驻军军长。——第575、631页。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 (Г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 ——伯爵,俄国

元帅,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为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第512页。

托特列本,埃杜阿尔德·伊万诺维奇 (Тотлебен, Эдуард Иванович 1818—1884) ——杰出的俄国军事工程师,上校,1855年4月起为将军,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组织者之一。——第194、235、509、513、555、655页。

多勃罗夫斯基,约瑟夫 (Dobrowski, Joseph 1753—1829) ——杰出的捷克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语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捷克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第221页。

达朗—贝里戈,沙尔·莫里斯 (Таллейран—Pe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 ——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外交部长(1797—1799、1799—1807、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1814—1815)、驻伦大使(1830—1834),其特点是在政治上毫无原则和唯利是图。——第203、343页。

考莱男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 (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1804—1884) ——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巴黎大使(1852—1867)。——第690—692、695、706页。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 ——俄国皇帝(1801—1825)。——第160、343页。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俄国皇帝(1855—1881)。——第160、169、218、329、349、607、637页。

乔治三世 (Georg III 1738—1820) ——英国国王(1760—1820)。——第443、

- 643—645页。
- 乔治四世 (Georg IV 1762—1830) ——摄政王 (1811—1820) 和英国国王 (1820—1830)。——第364、443页。
- 休斯, 特·姆· (Hughes, T. M.)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作家, 长期侨居西班牙。——第537页。
- 休谟, 约瑟夫 (Hume, Joseph 1777—1855) ——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首领之一, 议会议员。——第72、102、103、268、301、436、440页。
- 华德, 威廉 (Ward, William 生于1817年) ——男爵, 英国贵族, 托利党人。——第412页。
- 华姆斯莱, 乔舒阿 (Walmesley, Joshua 1794—1871) ——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议会议员; 五十年代为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组织者之一和主席。——第268页。
- 伏尔特, 约翰 (Volter, Johann 1789—1857) ——奥地利将军, 军事工程师; 1853—1857年任克拉科夫要塞司令。——第568页。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 (Voltaire, Francois—Marie (本姓阿鲁埃 Arouette 1694—1778) ——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 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第364、391页。
- 艾雷, 理查 (Airey, Richard 1803—1881) ——英国将军, 1854—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兵站总监。——第712页。艾克兰, 詹姆斯 (Acland, James 1798—1876) ——英国社会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 1855年为资产阶级财贸界争取行政改革运动组织者之一。——第253、254页。
- 艾布纳尔 (Ebner) ——奥地利将军, 克里木战争期间任普泽米希尔要塞司令。——第568页。
- 米涅, 克劳德·埃蒂耶纳 (Minie, Claude Étienne 1804—1879) ——法国军官, 新式步枪的发明者。——第475、484、490、500、525、530页。
- 米尔纳·基卜生——见基卜生, 托马斯·米尔纳。
-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2—1909) ——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的第四个儿子。——第122页。
- 米克洛希奇, 弗兰蒂舍克 (Miklosich, Frantsek 1813—1891) ——著名的学者, 斯拉夫语文学的代表人物, 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 斯洛文尼亚人。——第221页。
- 伊文思, 乔治·德·雷希 (Evans, Georgede Lacy 1787—1870) ——英国将军, 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77、129、130、154、689页。
- 伊斯甘德—贝伊 (亚历山大·伊林斯基) (Iskender Beg (Alexander Ilinski) 1810—1861) ——土耳其将军, 波兰人; 三十至四十年代先后在西班牙、葡萄牙、波斯和法国的军队中供职, 曾参加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加入土耳其国籍; 曾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 (1853—1854), 克里木土军指挥官 (1855) 和高加索土军指挥官 (1855—1856)。——第196、197、521页。
- 伊斯马伊耳—帕沙 (乔治·克美蒂) (Ismail Pasha (György Kmety) 1810—1865) ——土耳其将军, 匈牙利人; 曾

- 参加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加入土耳其国籍;曾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1853—1854),高加索土军指挥官(1854—1855)。——第649页。
- 伊布拉希姆—帕沙 (Ibrahim Pasha 1789—1848) ——埃及的统帅,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嗣子;在埃及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任埃及军总司令(1831—1833和1839—1841);1844年起是埃及的共同摄政者。——第73页。
- 西哀士,艾曼纽尔·约瑟夫 (Sieyès, Emmanuel Joseph 1748—1836) ——法国天主教神甫,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355页。
-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 (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 ——英国外交家,1851—1854年为驻彼得堡公使。——第29、293页。
- 西蒙斯,约翰·林托恩·阿腊宾 (Simmons, John Lintorn Arabin 1821—1903) ——英国中校,军事工程师,后为元帅;克里木战争期间为驻克里木土军司令部代表。——第686—688、690、691、696、701、703、704、706—709页。
- 西顿男爵,约翰·科耳伯恩 (Seaton, John Colborne 1778—1803) ——英国将军,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和1815),爱尔兰英军司令(1855—1860)。——第77页。
- 西韦尔斯,弗拉基米尔·卡尔洛维奇 (Сиверс, Владимир карлович 1790—1862) ——伯爵,俄国将军,1854—1855年任波罗的海沿岸驻军司令。——第16、23、418页。
-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 ——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第34页。
-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顿 (Sidmouth, Henry Addinton 1757—1844)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任内务大臣时(1812—1821)对工人运动实施镇压措施。——第70、246页。

七 画

-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 ——古希腊卓越的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党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133页。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 ——罗马教皇(1846—1878)。——第452—454页。
-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412页。
- 辛普森,詹姆斯 (Simpson, James 1792—1868) ——英国将军,1855年(2—6月)为陆军参谋长,后任克里木英军总司令(6—11月)。——第77、81、539、575、610—612、617—619、628、686—689、692、707、708、712页。
- 怀特塞德,詹姆斯 (W hiteside, James 1804—1876) ——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高级司法职务。——第84页。
- 希斯科特,威廉 (Heathcote, William 1801—1881) ——英国议会议员。——第283、284、303页。
-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奥(1810—1844)和

- 埃米利奥 (1819—1844) (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第333、582页。
- 劳勒,弗兰西斯·查理 (Lawley, Francis Charles 1825—1901) ——英国记者,格莱斯顿的私人秘书(1852—1854);1854—1856年为“泰晤士报”驻美国记者。——第30、117页。
- 沙法里克,巴维尔·约瑟夫 (Safařik, Pavel Josef 1795—1861) ——杰出的斯洛伐克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自由派代表、曾参加1848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会,拥护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纲领。——第221页。
- 别布托夫,瓦西里·奥西波维奇 (Бѣбутовъ, вѣсильнй Осиповичъ 1791—1858) ——公爵,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期间任高加索驻军指挥官。——第651、680页。
-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Суворовъ,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ъ 1730—1800) ——伟大的俄国统帅。——第632页。
- 麦克唐纳 (Macdonal)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第182页。
- 麦克尼耳,约翰 (McNeill, John 1795—1883) ——英国外交家,驻德黑兰公使(1836—1839和1841—1842);1855年为调查克里木军需工作的政府全权代表之一。——第81页。
-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 (MacMahon, Marie-Edme- Patrice-Maurice de 1808—1893) ——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曾参加第二帝国的各次战争,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第615、620页。
- 里德,约瑟夫·海托恩 (Reed, Joseph Heitorn) ——英国军官,议会议员。——第504页。
- 里迪格尔,费多尔·瓦西里也维奇 (Ридигеръ, Ф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ъ 1784—1856) ——伯爵,俄国将军,1854年为波兰王国副总督和俄国西部边境驻军司令,1855年任近卫军和掷弹兵军总司令。——第418页。
- 里士满公爵,查理·伦诺克斯-戈登 (Richmond, Charles Lennox-Gordon 1791—1860) ——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第3页。
- 伯克,艾德蒙 (Burke, Edmund 1729—1797) ——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初期倾向自由主义,后来成为反动分子,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凶恶敌人之一。——第431、645页。
- 伯德特,弗兰西斯 (Burdett, Francis 1770—1844) ——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228、301、574页。
- 伯戈因,约翰·福克斯 (Burgoyne, John Fox 1782—1871) ——英国将军,军事工程师,1868年起为元帅;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军事顾问和工程长官。——第81页。
- 杜克,詹姆斯 (Duke, James 生于1792年) ——英国议会议员,自由贸易论者。——第154页。
- 杜拉克 (Dulac) ——法国将军;1855年任

- 克里木法军师长。——第615页。
- 杜木里埃, 纱尔·弗朗斯瓦 (Dumouriez, Charles Francois 1739—1823) ——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吉伦特党人; 1792—1793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 1793年3月背叛革命事业。——第33、40页。
- 杜邦·德·勒坦, 比埃尔·安都昂 (Du-pont de l' Etang, Pierre-Antoine 1765—1840) ——法国将军, 1808年在西班牙作战时率本师在拜兰附近投降。——第210页。
- 坎提昂 (Cantillon) ——法国下级军官, 在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中服役, 1818年被控谋刺威灵顿 (在法国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 后宣告无罪。——第237页。
- 坎特布里大主教——见萨姆纳, 约翰。坎宁, 乔治 (Canning George 1770—1827)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07—1809、1822—1827), 首相 (1827)。——第69、70、246、435页。
- 坎宁, 查理·约翰 (Canning, Charles John 1812—1862)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邮政大臣 (1853—1855), 印度总督 (1856—1862)。——第99页。
-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 (Vauban, Sébastien le Prestre 1633—1707) ——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有许多有关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第321—323页。
- 沃克曼 (Worckman) ——五十年代宪章运动积极参加者之一。——第254页。
- 沃里克伯爵, 理查·尼维尔 (Warwick, Richard Neville 1428—1471) ——英国封建主, 在红白蔷薇战争 (1455—1485) 中起巨大作用; 他操纵了立王事宜, 因此得外号“国王制造者”。——第102、399页。
- 沃尔波尔, 霍雷修 (Walpole, Horatio 1717—1797) ——英国贵族, 作家和艺术理论家。——第436页。
- 沃尔波尔, 斯宾塞·霍雷修 (Walpole, Spenser Horatio 1860—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7)。——第43、318页。
- 利文, 达丽娅 (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夫娜 (Ливень, Дарья (Дорогея) Христиановна 1785—1857) ——公爵夫人, 俄国外交家赫·安·利文之妻; 她在欧洲外交生活中, 作为伦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龙的女主人起着显著的作用。——第361页。
- 利奈公爵, 卡尔·约瑟夫 (Ligne, Karl Joseph 1735—1814) ——奥地利将军, 外交家和作家, 1809年起为元帅。——第343页。
- 利迭尔斯,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Лидере,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 ——俄国将军; 1853—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军长, 1855年任南方军司令, 1856年初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第418、638、640、641页。
- 利普兰迪,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 (Липранди,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796—1864) ——俄国将军, 1853—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师长, 1854—1855年在克里木任师长, 在黑河战役中任军长。——第558、575页。
- 利物浦伯爵,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 1770—1828)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历任各部大臣, 首相 (1812—1827)。—— 第70、83、160、248、373页。
- 克奥, 威廉·尼古拉斯 (Keogh, William Nicolas 1817—1878) —— 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皮尔派, 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 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高级司法职务。—— 第46、135、136页。
- 克雷兹 (Krösus) —— 吕底亚的皇帝 (公元前560—546)。—— 第166页。
- 克美蒂—— 见伊斯马伊耳·帕沙。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 —— 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第499页。
- 克奈泽贝克, 卡尔·弗里德里希 (Knebeck, Karl Friedrich 1768—1848) —— 男爵, 普鲁士元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各次战争, 曾出席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 1831年任普鲁士驻波兹南监视军总司令。—— 第344、346页。
-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爱尔兰总督 (1847—1852), 残酷镇压了1848年的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 (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 第11、26、33、35、62、80、104、162—164、285、355、356、362、411、446、453、551、553、570、675—679、681—683、686、688—710、712页。
- 克兰里卡德侯爵, 乌利克·约翰·德·巴勒 (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1802—1874) ——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辉格党人;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38—1841), 邮政大臣 (1846—1852)。—— 德85、117、372页。
- 贝林, 弗兰西斯 (Baring, Francis 1796—1866)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1839—1841年任财政大臣, 1849—1852年任海军首席大臣。—— 第77、283、284、303、316页。
- 贝利, 亨利·詹姆斯 (Baillie, Henry James 生于1804年) —— 英国议会议员, 托利党人。—— 第272页。
- 贝茨, 罗伯特·梅金 (Bates, Robert Makin 生于1791年左右) —— 英国银行家。—— 第372页。
- 贝多, 玛丽·阿尔丰斯 (Bedeau, Marie Alphonse 1804—1863) —— 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 第143页。
- 贝列拉, 艾米尔 (Péire, Emile 1800—1875) —— 法国银行家, 1825—1831年为圣西门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 股份银行的创办人和董事之一。—— 第625页。
- 贝尔格,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Берг,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1793—1874) —— 俄国将军, 后为元帅; 1853—1863年为驻芬兰俄军总司令和芬兰总督。—— 第418页。
- 贝尔纳多特, 让·巴蒂斯特·茹尔 (Bernadotte, Jean Baptiste Jules 1763—1844) —— 法国元帅, 1810年瑞

- 典国王查理十三世收为义子,成为王位继承者,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18—1844年为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第531页。
-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 (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 ——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属于所谓梅费尔激进派),议会议员,海军部秘书长(1852—1858)。——第4、41、46页。
- 贝克莱,莫里斯·弗雷德里克·菲茨哈丁 (Berkeley, Maurice Frederick Fitzhardinge 1788—1867) ——英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海军部部务委员(1833—1839和1846—1857)。——第41页。
- 贝克莱,弗兰西斯·亨利·菲茨哈丁 (Berkeley, Francis Henry Fitzhardinge 1794—1870) ——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426页。
- 贝克韦耳,霍尔 (Bakewell, R. Hold) ——英国军医;1855年在克里木的野战医院工作。——第563页。
- ## 八 画
- 金,彼得·约翰·洛克 (King, Peter John Locke 1811—1885) ——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440、454页。
- 门茨,乔治·弗雷德里克 (Muntz, George Frederick 1794—1857) ——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135页。
- 奈特,查理 (Knight, Charles 1791—1873) ——英国政论家和发行人。——第341页。
- 雨果,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伟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第549页。
- 芬伦,詹姆斯 (Finlen, James) ——宪章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52—1858年为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366页。
- 帖木儿 (塔梅尔兰) (1336—1405) ——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东方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奠基者。——第122页。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 ——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19、160页。
- 孟德斯鸠,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 ——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家。——第361页。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 (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éodule 1793—1877) ——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第143、277、421页。
- 居斯丁侯爵,阿斯托尔夫 (Custine, Astolpho 1790—1857) ——法国旅行家和作家。——第508页。
- 杰弗雷斯,乔治 (Jeffreys, George 1648—1689) ——男爵,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皇家法庭大法官(1683—1885);他对政治案件的判决极为严酷。——第248页。
- 林赛,威廉·肖 (Lindsay, William Shaw 1861—1877) ——英国船主和

- 商人，自由贸易论者，议会议员。——第373页。
- 林德赫斯特男爵，约翰·辛格顿·柯普利 (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1772—1863) ——英国政治活动家、法学家，托利党人；曾任大法官 (1827—1830、1834—1535和1841—1846)。——第8、160—162、285、552、569、570页。
- 舍伐利埃，米歇尔 (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 ——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后为自由贸易论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积极支持和宣传拿破仑第三的经济政策，曾长期为“辩论日报”的编辑。——第626页。
-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艾释黎·库伯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1801—1885) ——英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第363、562页。
- 佩诺，沙尔 (Penaud, Charles 1800—1864) ——法国海军上将，1855年任波罗的海舰队指挥官。——第561页。
- 佩拉特，阿普斯利 (Pellatt, Apsley 1791—1863) ——英国企业主，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155页。
- 佩利西埃，让·雅克 (Pélissier, Jean-Jacques 1794—1864) ——法国将军，1855年9月起为元帅；三十到五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5年初任克里木法军军长，后为总司令 (1855年5月—1856年7月)。——第259、264、271、272、275—277、308—310、312—314、320、324—326、354、359、375、377、379、380、392—396、406、408、558、575、577、578、590、602、609、610、617、636、660、669、670、686—689、693、705页。
- 拉·马尔摩拉，阿尔丰梭·费勒罗 (LaMarmorata, Alfonso Ferrero 1804—1878) ——意大利将军和国家活动家，皮蒙特陆军大臣 (1848、1849—1855、1856—1859)，1855年任克里木撒丁军队军长，后为首相。——第576页。
- 拉德茨基，约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的奥军司令官，1848—1849年曾残酷镇压意大利革命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6年为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224、489、670页。
- 拉莫特卢日，约瑟夫·爱德华·德 (LaMotte-rouge, Joseph Eduard de 1804—1883) ——法国将军，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第615页。
-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 (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 Léon 1806—1865) ——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 (6—12月)，对路易·波拿巴政府采取反对立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国。——第143、167、277页。
- 帕纽亭，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 (Панюти́н, Фёдо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0—1865) ——俄国将军，在克里木战争初期任军长，1855—1856年为俄国西南部后备军指挥官。——第16、23、311、575页。
- 帕西菲科，大卫 (Pacífico, David 1784—

- 1854) —— 英国的臣民, 雅典商人; 葡萄牙人。——第43、71页。
- 帕克斯顿, 约瑟夫 (Paxton, Joseph 1801—1865) —— 英国建筑学家, 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 (1851) 展览馆设计者, 议会议员。——第84页。
- 帕拉茨基, 弗兰蒂舍克 (Palacký, František 1798—1876) —— 杰出的捷克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1848年为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 实行旨在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 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之一。——第221页。
- 帕斯凯维奇, 伊万·费多罗维奇 (Паско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 —— 公爵, 俄国元帅, 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 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的总督, 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 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边境的驻军总司令, 4—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第512页。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874—1865) ——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依仗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支持, 成为该党领袖之一; 曾任军务大臣 (1809—1828), 外交大臣 (1830—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 (1852—1856) 和首相 (1855—1858和1859—1865)。——第4、8、11、12、20、25、26、29、30、33、35、39、40、43—45、59—51、54、55、62、63、68—75、79—83、95、96、98—101、104、105、113、115、118、122、126、127、132、135、136、150、158、159、164、188、196、201、204、227、228、237、244、249、250、252、272—274、278—280、295—297、303、304、316—318、329、335—338、340、351、352、359、361、362、370—372、391、398、400—405、409、410、413、414、420、424、425、448、458、539、540、542—544、546、547、549、550、552、560、569、571、582、583、628、654、658、669、675、679、682、692、708、710、711页。
- 波将金, 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Пете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39—1791) —— 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元帅, 1787—1791年俄土战争时期任总司令。——第632页。
- 波特兰公爵, 威廉·亨利·本廷克 (Pottland, William Henry Bentinck 1738—1809)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首领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 (1794—1801), 内阁首相 (1783和1807—1809)。——第70页。
- 波尔切斯特尔, 亨利·赫伯特 (Porchester, Henry Herbert 1741—1811) —— 英国议会活动家, 辉格党人。——第21、248页。
-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奥西波维奇 (Пот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 —— 伯爵, 俄国外交家, 科西嘉人, 1814—1821年驻巴黎公使, 1821—1835年为大使, 后任驻伦敦大使 (1835—1839)。——第160页。
- 波拿巴, 日罗姆 (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 —— 拿破仑第一之弟, 威斯特伐利亚国王 (1807—1813), 1850年起为元帅。——第167页。
- 波拿巴, 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Bonaparte, Napoléon Joseph Charles Paul 1822—1891) —— 日罗姆·波拿巴之子, 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在

- 长兄死后(1847年)改名为日罗姆;1854年以将军衔任克里木法军师长。——第132、133、138、143、145、146、167页。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40—1814、1851和1852—1870)。——第143、146、211、318页。
- 罗素,约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为英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和殖民大臣。——第4、5、7—13、26、27、30、32、34—39、41、43、50、51、53—55、63、81—83、85、99、100、102、105、106、112、113、115、188、190、203、204、279—282、284—286、291—294、296、304—307、317、335、337、362、373、400、402、403、405、409—411、430、431—442、444—446、448—455、541—544、552、553、569、570、583、642页。
- 罗格,克利斯托夫·米歇尔(Rogue, Christoph Michel 1800—1877)——伯爵,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277页。
- 罗巴克,约翰·阿瑟(Roebeck, 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第5—12、20、31、33、36、38—40、42、50、51、80、82—84、98—100、184、190、279、280、317、333—335、348、352、357、360—362、382、398—400、409—414、420、424、447、432、549页。
- 罗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爵(Robison, Frederick John,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23—1827年任财政大臣,首相(1827—1828)。——第70、118页。
- 罗克比男爵,亨利·罗宾逊—蒙台居(Ro-Keby, Henry Robinson — Montagu 1798—1883)——英国将军,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师长。——第77页。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党人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84页。
- 罗曼诺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俄国皇朝(1613—1917)。——第654页。
- 阿丁顿——见西德默思,亨利。
- 阿德尔,罗伯特·亚历山大·舍夫托(A dair, Robert Alexander Shefto)——英国上校,议会议员。——第412、413页。
- 阿斯特,恩斯特·路德维希(A ster, Ernst Ludwig 1778—1855)——普鲁士将军,军事工程师。——第322、499、500页。
- 阿基米得(Archimedes 公元前287左右—212)——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机械学家。——第366页。
- 阿朗维尔,阿尔芒·奥斯塔夫·玛丽·德(A llorville, Armand Oktav Marie d' 1800—1867)——法国将军;1854—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指挥官。——第630页。
- 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A 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

- 皮尔派首领；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1841—1846）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第7、8、10—13、25、27、29、33—36、38、49、50、62、72、82、83、96、98、99、105、158、280、285、295、317、351、410、411、413、420、710页。
- 阿盖尔公爵，乔治·道格拉斯·坎贝尔（Argyll, George Douglas Campbell 1823—1900）——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掌璽大臣（1853—1855、1859—1860、1860—1866、1880—1881），邮政大臣（1855—1858、1860），印度事务大臣（1868—1874）。——第104页。
- 阿尔宁，路德维希·约阿希姆（Arnim, Ludwig Achim 1781—1831）——德国反动浪漫派诗人。——第708页。
- 阿尔伯特（Albert 1819—1861）——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第334—336、340、360—362、382、628页。
- 阿尔贝罗尼，朱利奥（Alberoni, Giulio 1664—1752）——西班牙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1717—1719年任国王菲力浦五世首相。——第79页。
- ## 九 画
- 品得（Pindaros 公元前约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曾写了许多庄严的颂诗。——第70、248页。
- 柏姆（Böhm）——奥地利将军；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奥里缪茨要塞司令。——第568页。
- 耶伊，雷希（Yea, Lysi 1808—1855）——英国军官，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团长。——第396页。
- 娄，罗伯特（Lowe, Robert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贸易副大臣（1855—1858），财政大臣（1868—1873），内务大臣（1873—1874）。——第84、274、283、284、303、304、414页。
- 洛维特，威廉（Lovett, William 1800—1877）——英国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三十年代宪章运动领袖之一，拥护“道德力量”并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第301页。
- 派西沃，斯宾塞（Perceval, Spencer 1762—181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7—1809年任财政大臣，内阁首相（1809—1812）。——第70、246、248、249、373、453页。
- 若米尼，昂利（Jomini, Henri 1779—1869）——将军，初在法军中供职，后在俄军中供职，资产阶级军事学家，著有许多有关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瑞士人。——第499、608、679页。
- 南丁格尔，弗洛伦斯（Nightingale, Florence 1820—1910）——英国女社会活动家，克里木战争期间在组织英军医疗方面杰出作用。——第183、187页。
- 保罗，约翰·第恩（Paul, John Dean 1802—1868）——英国银行家。——第372页。
- 奥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1871年受封）（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后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和首相（1868和1874—1880）。——第3、12、25、28、30、43、46、47、50、51、79

- 、81、82、84、105、175、246、272—274、278—281、283—288、292、293、296、304、351、402、409—411、413、552、569页。
- 约克, 查理·菲利浦 (York, Charles Philipp 1764—1834)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军务大臣 (1801—1803), 内务大臣 (1803—1804), 海军大臣 (1801—1811)。——第248、249页。
- 约克公爵, 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 (York, Frederick August 1763—1827) ——英王乔治三世次子, 1795年起为元帅, 曾任英军总司令 (1798—1809、1811—1827); 在他指挥下的军队在十八世纪末的历次对法战争中屡遭败北。——第574页。
- 施, 威廉 (Shee, William 1804—1868) ——爱尔兰法学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第136、403页。
- 施尔德尔, 卡尔·安德列也维奇 (Пильдер, Карл Андреевич 1785—1854) ——俄国将军, 卓越的军事工程师和发明家, 1828—1829年和1854年俄土战争时, 在多瑙河领导俄军进行围攻作业。——第194页。
- 拜伦, 乔治 (Byron, George 1788—1824) ——杰出的英国诗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34页。
- 拜比吉, 查理 (Babbage, Charles 1792—1871) ——英国数学家和机械学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305页。
- 欧仁妮——见蒙蒂霍, 欧仁妮。
- 欧几里得 (Eukleides 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 ——古希腊杰出的数学家。——第485页。
- 柯尔曾, 罗伯特 (Curzon, Robert 1810—1873) ——英国旅行家和作家; 1843—1844年在爱尔斯伦确定土伊边界的全权代表之一。——第651页。
- 柯克伦, 托马斯, 丹多纳耳德伯爵 (Cochrane, Thomas, Earl of Dundonald 1775—1860) ——英国海军上将,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各次战争, 议会议员。——第574页。
- 查耳迪尼, 恩利科 (Cialdini, Enrico 1811—1892) ——意大利将军, 1855年为克里木撒丁军旅长。——第615页。
- 查尔托雷斯基, 亚当·埃日伊 (Czartoryski, Adam Jerzy 1770—1861) ——公爵, 波兰大地主, 十九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 曾任俄国外交大臣 (1804—1806); 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 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巴黎, 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第74、546、547页。
-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742左右—814) ——法国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166页。
- 查理三世 (Charles III 1760—1788) ——西班牙国王 (1759—1788)。——第537页。
- 查理十二 (Charles XII 1682—1718) ——瑞典国王 (1697—1718)。——第531页。
- 查理—阿尔伯特 (Charles—Albert 1798—1849) ——撒丁国王 (1831—1849)。——第526页。
- 威克菲尔德, 爱德华·吉本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 ——英国国家活动家, 经济学家, 制定了资产阶级的殖民理论。——第425页。
- 威灵顿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 ——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托

- 利党人；1808—1814和1815年率领军队和拿破仑第一作战；曾任陆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第59、60、65、70、106、188、189、237、358、436、467、478、482、572、617页。
- 威斯特摩兰伯爵，约翰·范恩 (Westmorland, John Fane 1784—1859——英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1841—1851），后为驻维也纳公使（1851—1855）。——第5、280页。
- 威尔逊，詹姆斯 (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1853—1858年任财政部秘书长。——第85页。
- 威尔逊，罗伯特·托马斯 (Wilson, Robert Thomae 1777—1849)——英国将军，军事作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573页。
- 威廉四世 (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第74、75页。
-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 (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1800—1883)——英国将军，1854—1855年为驻高加索土军司令部代表，卡尔斯保卫战领导人之一。——第633、647、649、651、675、676、686、695、705、709页。
- 哈丁，亨利 (Hardinge, Henry 1785—1856)——子爵，英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55年起为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各次战争，曾任军务大臣（1828—1830和1841—1844），印度总督（1844年—1848年1月），英军总司令（1852—1856）。——第41、158、189、628页。
-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 (Haller, Karl Ludwig 1768—1854)——瑞士的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辩护人。——第717页。
- 哈耳福德，亨利 (Halford, Henry)——英国议会议员。——第152页。
- 哈菲兹—帕沙 (Hafiz Pasha)——土耳其将军，1855年任高加索土军指挥官。——第685页。
- 哈林顿伯爵，莱斯特·菲兹吉拉德·查理，斯坦诺普 (Harrington, Lester Fitzgerald Charles Stanhope 1784—1862)——英国上校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第548页。
- 哈克斯特毫森，奥古斯特 (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写过一本专门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村社制度残余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一个反动的农奴主。——第226页。
- 哈桑卜—萨巴赫 (Hasan—Ben—Sabah 1056—1124)——伊斯兰教阿萨辛派创始人，该教派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曾抗御突厥—塞尔柱人和十字军。——第7页。
- 哈德威克伯爵，查理·菲利浦·约克 (Hardwicke, Charles Philip York 1799—1873)——英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第3、247、248页。
- 哈里逊，乔治 (Harrison, George)——英国工人，宪章运动积极参加者之一。——第155页。
- 哈里斯——见马姆兹伯里，詹姆斯。
- 科勒，杨 (Collar, Jan 1793—1852)——杰出的捷克诗人和语文学家；为争取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鼓吹

- 者之一；斯洛伐克人。——第221页。
- 科勒特，科勒特·多布森 (Collet, Collet-Dohson) ——英国激进派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第547、548页。
- 科布顿，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228、268、306、317、318、441页。
- 科苏特，拉约什 (路德维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人，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革命失败逃离匈牙利。——第26、49页。
- 科皮塔尔，瓦尔弗洛梅 (Kopitar, Bartolomeo 1780—1844) ——斯拉夫语文学的杰出代表，斯洛文尼亚人，著有许多有关斯拉夫各民族语言、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第221页。
- 科德林顿，威廉·约翰 (Codrington, William John 1804—1884) ——英国将军，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后为总司令 (1855年11月—1856年7月)。——第618、712页。
- 科贝特，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37、102、153、227、301、435、574页。
- 科贝特，约翰·摩根 (Cobbett, John Morgan 1800—1877) ——英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威廉·科贝特的儿子。——第153页。
- 科尔弗，费多尔·赫里斯托佛罗维奇 (科尔夫, Федо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男爵，俄国将军，1855年任克里木骑兵师师长。——第631页。
- 科尔尼洛夫，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也维奇 (Кор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А.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6—1854) ——杰出的俄国海军活动家，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参谋长 (1849—1853)，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鼓舞者和组织者之一。——第193、194、197、589页。
- 科尔蒙太涅，路易·德 (Cormontaigne, Louis de 1696左右—1752) ——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著有许多有关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第322页。
- 科尔彻斯特男爵，查理·艾波特 (Colchester, Charles Abbot 1798—1867) ——英国海军上将，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356页。

十 画

- 修洛 (Suleau) ——法国中校，1855年为驻克里木英军司令部代表。——第688、689页。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传记材料)。——第87、170、192、195、196、256、276、312、313、380页。
- 爱里斯，爱德华 (Ellice, Edward 1781—1863)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第84页。
- 乌尔卡尔特，戴维 (Urquhart, David 1805—1877) ——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1847—1852年为议会议员。——第74、75、123、301—303、306、334、405、456、

- 475页。
- 夏恩霍斯特, 格尔哈特 (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活动家; 1806年普鲁士军队为拿破仑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订委员会主席; 曾任陆军大臣 (1807—1810) 和总参谋长 (1807—1813); 在1813年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起卓越的作用。——第500页。
- 索伊蒙诺夫,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Соймон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 1800—1854) ——俄国将军,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 在因克尔芒战斗中阵亡。——第631页。
- 涅谢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维奇 (Неселе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 ——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总理大臣, 外交大臣 (1816—1865)。——第160、285—287、292页。
- 纽卡斯尔公爵, 亨利·佩勒姆·费恩斯·佩勒姆·克林顿 (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nnes Pelham Clinton 1811—1864)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分子,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 (1852—1854), 陆军大臣 (1854—1855) 和殖民大臣 (1859—1864)。——第3、8、10、11、33—37、39、41、50、53、55、83、98、99、158、184、189、410、411、413、414页。
- 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1854—1856), 外交大臣 (1856—1882)。——第5、204、281、292页。
-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 ——公爵, 俄国将军, 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 (1853—1854), 南部军队总司令 (1854年9月—1855年2月), 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 (1855年2—12月); 波兰王国总督 (1856—1861)。——第23、263、314、555、575、577、578、592、595—597、600、602、603、609、620、630、631页。
- 特罗蒂 (Trotti) ——撒丁将军, 1855年为克里木撒丁军师长。——第576、578页。
- 特罗洛普, 约翰 (Trollope, John 生于1800年) ——英国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第52页。
- 特腊弗斯, 英格列海姆 (Travers, Ingraham) ——英国政治活动家; 1855年为资产阶级财贸界争取行政改革运动的领袖。——第254页。
- 拿骚的摩里茨, 拿骚伯爵 (奥伦治亲王) (Maurice of Nassau, Prince of Orange and Count of Nassau 1567—1625) ——尼德兰总督 (1858—1625); 军事活动家, 尼德兰独立战争时期的统帅。——第500页。
-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 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和1815)。——第90、105、144、148、149、167、169、181、209、237、263、271、306、321、332、346、347、350、394、467、469—471、478、538、545、548、574、598、612、627、640、659、661、668、679页。
-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 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33、62、85、105、125、126、129、132、142—144、146—149、166、167、169、174、175、179、196、204、207、209—213、237、264、270、276、306、310、326—329、331、332、338、339、346、348、350、354、358、379、391、404、408、416、421、425、475、476、479、544、647、549、555、569、588、625—627、654、658—663、665—671、694、697页。
- 泰特,威廉(Tite, William 1798—1873)——英国建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5年为行政改革协会副主席。——第298、549页。
- 泰勒,瓦特(Tyler, W at 死于1381年)——1381年英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第80、95页。
- 泰勒,汤姆(Taylor, 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记者,五十年代为“笨拙”杂志的撰稿人,1874—1880年为编辑;1854年被任命为保健委员会秘书长。——第4页。
- 泰勒,詹姆斯(Taylor, James)——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1855年支持工业资产阶级的议会改革运动。——第154、156页。
- 海斯,亨利希(Heß, Heinrich 1788—1870)——男爵,奥地利将军,后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1854—1855年任驻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多瑙河各公国奥军总司令。——第567页。
- 海瑙,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kob 1786—1853)——奥地利将军,曾残酷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311页。
- 海华德,阿伯拉罕(Hayward, Abraham 1801—1884)——英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初期为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854年被委任为济贫委员会秘书长。——第30页。
- 海特,威廉·古迪纳夫(Hayter, William Goodenough 1792—1878)——英国法学家和议会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第8页。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317页。
- 纳皮尔,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第306、333、372、564、565、582—587页。
- 纳皮尔,查理·詹姆斯(Napier, Charles James 1782—1853)——英国将军,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1842—1843年率领军队占领信德,1843—1847年为信德执政者。——第583、584页。
- 纳皮尔,约瑟夫(Napier, Joseph 1804—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52年以爱尔兰总检察长身分进入得比内阁;1858—1859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第29页。
- 纳皮尔,爱德华·艾勒斯(Napier, Edward Alers 1808—1870)——英国军官;1854—1855年参加筹划克里木英军军需工作。——第60页。
-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1804—1814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89、97、476—478、484、486、498、584页。
- 纳尔瓦艾斯,拉蒙·马利阿(Narvaez Rom

- on Maria 1800—1868)——西班牙将军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莫迪腊多斯派(温和派)领袖,政府首脑(1844—1846、1847—1851、1856—1857、1864—1865和1866—1868),曾残酷镇压群众的革命行动。——第536、537页。
- 埃布林顿,休(Ebrington, Hugh 1818—1905)——子爵,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第297、548、549页。
- 埃尔比昂,艾米尔(Herbillon, Emil 1794—1866)——法国将军,1855年为克里木法军师长。——第576、577页。
- 埃利奥特,乔治·奥加斯特斯(Elliott, George Augustes 1813—1901)——英国海军军官,1858年起为海军上将;1854—1855年为波罗的海舰队一战列舰指挥官。——第712页。
- 埃克塞特侯爵,布劳恩劳·塞西耳(Exeter, Braunlou Cecil 1795—1867)——英国贵族,托利党人。——第412页。
- 埃伦伯勒男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50—1818)——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初期为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皇家法庭大法官(1802—1818)。——第247、248页。
-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90—1871)——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3);爱德华·罗·埃伦伯勒男爵的儿子。——第3、245、247、249、251—253、553、570页。
- 埃斯基涅斯(Æschines 公元前389—314)——著名的雅典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雅典马其顿党的领袖,奴隶占有制寡头政体的拥护者。——第133页。
-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领袖,西班牙摄政(1841—1843),政府首脑(1854—1856)。——第536页。
- 埃斯潘纳斯,沙尔·玛丽·埃斯普里(Espinasse, Charles-Matie-Esprit 1815—1859)——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1854年为多布鲁甲英军师长,后为克里木英军旅长(1854和1855)。——第167、271页。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105、151、245、251、271、276、364、365、390页。
- 马林斯,理查(Malins, Richard 1805—1882)——英国法学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373页。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首脑,1850年为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第27页。
- 马尼扬,贝尔纳·比埃尔(Magnan, Bernard Pierre 1791—1865)——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第277、663页。
- 马丹普雷,爱德华·沙尔·德(Martimprey, Edouard Charles de 1808—1883)——法国将军,1854—1855年为

- 克里木法军参谋长。——第688页。
- 马茂德二世 (Mahmoud II 1785—1839) ——土耳其苏丹 (1808—1839)。——第73、517页。
- 马尔波罗公爵, 约翰·丘吉尔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1650—1722) ——英国统帅, 1702—1711年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期间任英军总司令。——第583页。
- 马克西米利安·德斯特 (Maximilian d'Este 1782—1863) ——奥地利大公, 将军, 特种形式要塞建筑“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发明者。——第568页。
-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arris 1746—1820) ——英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777—1782)。——第642—644页。
-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著名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52、1858—1859), 掌璽大臣 (1866—1868、1874—1876)。——第175、355—357、457、458页。
- 马其顿的菲力浦二世 (Philipp II Make-donien 公元前382左右—336) ——马其顿王 (公元前359—336)。——第133页。
- 格拉赫, 弗里德里希 (Grach, Friedrich 1812—约1856) ——普鲁士军官, 1841年起在土耳其供职, 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第521页。
- 格累泽尔 (Gläser) ——奥地利将军, 克里木战争期间任扎列锡基要塞司令。——第568页。
- 格娄弗诺, 罗伯特勋爵 (Grosvenor, Robert 1801—1893) ——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第274、297、365、369、370、382、385页。
- 格雷, 乔治 (Grey, George 1799—1882)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 和殖民大臣 (1854—1855)。——第11、104、406、426页。
- 格雷, 查理 (Grey, Charles 1764—1845) ——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之一, 曾任海军首席大臣 (1806), 内阁首相 (1830—1834)。——第436、645页。
- 格雷, 亨利·乔治 (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 ——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军务大臣 (1835—1839), 陆军和殖民大臣 (1846—1852), 查理·格雷的儿子。——第31、54、56、104、453页。
- 格莱安, 蒙台居·威廉 (Graham, Montagu William) ——英国议会议员。——第164页。
- 格莱安, 詹姆斯·罗伯特·乔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9)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为辉格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内务大臣 (1841—1846), 海军首席大臣 (1830—1834、1852—1855)。——第27、33、54、62、80、98、99、124、175、274、281、305、306、317、337、410、411、413、414、528—587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

- 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内阁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 11、12、28—30、33、41、42、47、48、50、53—56、62、63、66、67、80、98、100、115、125、159、184、189、206、273、281、283、284、288、291、295、297、305、317、318、337、338、351、410、411、413、541、542、544、624、625 页。
- 格兰比侯爵, 查理·塞西尔·约翰·曼诺斯 (Granby, Charles Cecil John Manners 生于 1815 年) —— 英国贵族,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第 283 页。
- 格兰维耳, 奥加斯特斯·博威 (Granville, Augustes Bozzy 1783—1872) —— 英国医生, 著有许多医学著作; 意大利人。——第 123 页。
- 格兰维耳伯爵, 乔治·鲁森·高尔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1815—1891)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51—1852、1870—1874 和 1880—1885), 殖民大臣 (1868—1870、1886), 枢密院院长 (1852—1854、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104、112、356、362、367 页。
- 格兰瑟姆男爵, 托马斯·罗宾逊 (Grantham, Thomas Robinson 1738—1786) ——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辉格党人; 曾任驻马德里大使 (1771—1779), 外交大臣 (1782—1788)。——第 644 页。
- 十 一 画
- 梭伦 (Solon 公元前 638 左右—558) —— 闻名的雅典立法家, 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世袭贵族的法律。——第 549 页。
- 盖伊, 路德维特 (Gai, Liudevít 1809—1872) —— 克罗地亚记者, 语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 年为克罗地亚临时政府委员; 在自己的政治观点中赞成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纲领。——第 221 页。
- 勒韦昂 (Levaillant) —— 法国将军, 1854—1855 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第 615 页。
- 累亚德, 奥斯丁·亨利 (Layard, Austin-Henry 1817—1894) —— 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1885 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第 4、9、41、79、84、95、112、113、154、190、227、245、250、273、274、297、317、333、334、337、360、402、583 页。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39、66、104、549、550、665 页。
- 敏托伯爵, 吉伯特·埃利奥特 (Minto, Gilbert Elliot 1782—1859) ——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辉格党人; 曾任海军首席大臣 (1835—1841), 掌玺大臣 (1846—1852), 1847—1848 年负外交使命驻意大利。——第 453 页。
- 得比伯爵 (1851 年受封),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ery Smith-Stanley 1799—1869) ——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为托利党人, 曾为托利党领袖, 后为保守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第 25、29、34、43、46、50、62、84、112、135、201、246、250、253、351、406、441、

- 450、453、457页。
- 培德福德公爵，约翰·罗素 (Bedford, John Russell 1766—1839) ——英国贵族，约翰·罗素之父。——第431、438页。
- 雪莱，约翰 (Shelley, John 1808—1867) ——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议会议员。——第154页。
- 雪恩哈耳斯，卡尔 (Schönhals, Karl 1788—1857) ——奥地利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积极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第526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从1840年起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一期间实际上操纵了内政和外交，他所代表的是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200、207页。
-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 (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 ——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 (1859—1865和1865—1866)。——第273、279、280、305、402页。
- 莫尔特克，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 ——普鲁士军官，后为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1835—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 (1857—1871) 和帝国总参谋长 (1871—1888)。——第210页。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 (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1811—1865) ——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 (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 (1851年12月—1852年1月)，立法团议长 (1854—1856、1857—1865)。——第661、663、664页。
-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 (Mantouffier,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制度的代表，曾任内政大臣 (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 (1850—1858)。——第161页。
- 曼斯菲尔德，威廉·劳兹 (Mansfield, William Rous 1819—1876) ——英国将军，1855—1856年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军事参赞。——第711页。
-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倍特 (Richards, Alfred Bate 1820—1876) ——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第125页。
- 理查二世 (Richard II 1367—1400) ——英国国王 (1377—1399)。——第80、95页。
- 理查三世 (Richard III 1452—1485) ——英国国王 (1483—1485)。——第104页。
- 梅恩，理查 (Mayne, Richard 1796—1868) ——伦敦警察局局长 (1850年起)。——第385、386、390页。
- 梅特涅，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221、223、224、305、343页。
- 梅利奈，艾米尔 (Millinet, Emile 1798—1894) ——法国将军，1855年为克里木

- 法军近卫师指挥官。——第615页。
- 梅利克—沙赫 (Melik Shah 1055—1092) —— 塞尔柱人国家的执政者 (苏丹) (1072—1092)。——第7页。
- 梅塔斯塔西奥, 彼得罗 (Metastasio, Pietro 1698—1782) —— 意大利诗人, 歌剧作家。——第442页。
- 康威, 亨利·西摩尔 (Conway, Henry Seymour 1721—1795) —— 英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1793年起为元帅;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第436页。
- 康格里弗, 威廉 (Congreve, William 1772—1828) —— 英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 1808年发明火箭, 被命名为康格里弗火箭。——第466页。
- 康罗贝尔, 弗朗斯瓦·塞尔坦 (Canrobert, François - Certain 1809—1895) —— 法国将军, 1856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 (1854年9月—1855年5月), 后为克里木法军军长。——第143、146、171、173、192、194、197、198、212、216、231、233、240、259、264、271、275—277、308、324、480页。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 —— 俄国大公, 1814年起任波兰陆军总司令, 实际上是波兰总督 (1814—1831)。——第74页。
-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 —— 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次子, 海军上将, 曾领导海军部门 (1853—1881) 和舰队 (1855—1881)。——第607页。
- 康伯米尔子爵, 斯泰普顿·柯顿 (Combermere, Stapleton Cotton 1773—1865) —— 英国将军, 1855年起为元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各次战争, 曾任爱尔兰英军总司令 (1822—1825), 后为驻印度英军总司令 (1825)。——第628页。

十二画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 —— 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第528、544页。
- 舒尔舍夫斯基 (Szulzewski) —— 波兰上校, 流亡者, 1855年为伦敦波兰之友文学协会的秘书。——第548页。
- 黑耳, 威廉 (Hale, William) —— 伦敦郊区火箭工厂的厂主。——第26、27、466页。
- 汤普逊, 乔治 (Thompson, George 1804—1878) —— 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五十年代为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第268、548页。
- 傅阿德—埃芬蒂 (Fuad-E fendi 1814—1869) —— 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五十至六十年代屡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第676、690、697页。
- 温德姆, 查理·阿什 (Windham, Charles Ash 1810—1870) —— 英国上校, 1855年10月起为将军; 1855年秋为克里木英军旅长, 后任克里木英军陆军参谋长 (1855年11月—1856年7月)。——第611、618页。
- 腊格伦男爵, 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索美塞特 (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1788—1855) —— 英国元帅, 以威灵顿的参谋官身分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 (1808—1814和1815),

- 曾任总司令办公室军事秘书 (1827—1852), 克里木英军总司令 (1854—1855)。——第33、35、58—60、64、65、81、142、143、146、147、158、173、185、188、189、194、198、207、212、216、276、310、320、358、392、396、555、617页。
- 凯利 (Kelly) —— 英国军官, 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团长。——第216页。
- 凯特勒, 阿道夫 (Quetelet, Adolph 1796—1874) —— 杰出的比利时资产阶级学者; 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第50页。
- 提托夫,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 (Тит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05—1891) —— 俄国外交家,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 (1843—1853); 1855年为俄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第281、292页。
- 提比利乌斯 (Tiberius 公元前42年—公元37年) —— 罗马皇帝 (14—37)。——第662页。
- 莱特, 纳坦 (Wright, Nathan 1654—1721) —— 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掌玺大臣和枢密院议员 (1700—1705)。——第118页。
- 莱昂斯, 艾德蒙 (Lyons, Edmund 1790—1858) —— 英国海军上将; 1855年任黑海舰队总司令。——第276、688、693页。
- 菲耳德 (Filder) —— 英国将军, 1854—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军需长官。——第712页。
- 菲利莫尔, 约翰·乔治 (Phillimore, John George 1808—1865) —— 英国法学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第414页。
- 菲兹吉拉德, 约翰·戴维 (Fitzgerald, John David 1816—1889) —— 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的高级司法职务。——第135、136页。
- 普腊德, 多米尼克·杜福尔·德 (Pradt, Dominique Dufour de 1759—1837) —— 法国神甫, 外交家, 政论家和历史学家。——第343、538页。
- 普拉兰, 沙尔, 舒阿泽尔公爵 (Praslin, Charles, Duc de Choiseul 1805—1847) —— 法国贵族; 1847年关于他谋杀妻子的案件有政治反应。——第85、117页。
- 普芬多夫, 赛米尔 (Pufendorf, Samuel 1632—1694) —— 男爵, 德国学者, 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的“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第218页。
- 普里契特, 罗伯特·泰勒 (Pritchett, Robert Taylor 1828—1907) —— 英国枪炮工匠, 改良过米涅式步枪。——第484页。
- 琼斯, 威廉 (Jones, William) —— 宪章主义者, 菲·奥康瑙尔治丧委员会秘书 (1855年9月)。——第594页。
- 琼斯, 约翰·盖耳 (Jones, John Gale 1769—1838) —— 英国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医生。——第249页。
- 琼斯, 哈利·大卫 (Jones, Harry David 1791—1866) —— 英国将军, 军事工程师; 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工兵长官。——第81、170页。
-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 —— 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编辑之一, “寄语人民”和“人

- 民报”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55、228、253—255、299、456、594页。
- 博宁，爱德华 (Bonin, Eduard 1793—1865) ——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陆军大臣 (1852—1854、1858—1859)；克里木战争时期主张普鲁士和西方强国结成同盟。——第161页。
- 博克塞，爱德华 (Boxer, Edward 1784—1855) ——英国海军上将，1855年为巴拉克拉瓦港口司令。——第78页。
- 博斯凯，比埃尔·约瑟夫·弗朗斯瓦 (Bosquet, 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 ——法国将军，1856年起为元帅；三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后任军长 (1854—1855)。——第620页。
- 博纳德子爵，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勃鲁阿兹 (Bonald, Louis Gabriel Ambroise 1754—1840)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君主主义者，复辟时期的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第717页。
- 博林布罗克，亨利 (Bolingbroke, Henry 1678—1751) ——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第246页。
- 博登施泰特，弗里德里希 (Bodenstedt, Friedrich 1819—1892) ——德国诗人和翻译家；四十年代曾游历高加索和小亚细亚。——第651页。
- 斯卡利，文森特 (Scully, Vincent 1810—1871) ——爱尔兰律师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549页。
- 斯泰福，奥加斯特斯 (Stafford, Augustes 1811—1857) ——英国议会活动家，托利党人。——第41、190页。
- 斯蒂文斯 (Stevens) ——克里木战争时期为英国驻特拉比曾德副领事。——第685页。
- 斯洛克姆，威廉 (Slocombe, William) ——五十年代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254、255页。
- 斯托蒙特子爵，戴维·马里 (Stormont, David Marrie 1727—1796)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人；曾任驻维也纳公使 (1763—1772) 和巴黎公使 (1772—1778)，外交大臣 (1779—1782)。——第644页。
- 斯科菲尔德，威廉 (Scholefield, William 1809—1867) ——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426、427页。
- 斯坦利——见得比伯爵，爱德华。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 (1869年受封) (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外交副大臣 (1852)，印度事务大臣 (1858—1859)，外交大臣 (1866—1868 和 1874—1878)；殖民大臣 (1882—1885)，爱得华·得比的儿子。——第84、112、283页。
-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第3、601页。
- 斯密斯，安德鲁 (Smith, Andrew 1797—1872) ——英国军医，曾领导英军医务部门的工作 (1846—1858)。——第183、184、187、712页。
- 斯密斯，罗伯特·维农 (Smith, Robert

- Vernon 1800—187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军务大臣(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5—1858)。——第21、104、541页。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苏格兰人。——第601页。
- 斯图亚特,胡斯顿(Steuart, Huston 1791—1875)——英国海军上将,辉格党人,海军部部务委员(1850—1852);1855年为黑海舰队副总司令。——第688页。
- 斯图亚特,达德利·库茨(Steuart, Dudley Couetts 1803—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第72、546页。
- 斯特兰,威廉(Strahan, William 约生于1808年)——英国银行家。——第372、393页。
- 斯特腊特,爱德华(Strutt, Edward 1801—1880)——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郎卡斯特公国正卿(1852—1854)。——第442页。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坎宁(Stratford de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英国外交家,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1825—1828、1841—1858)。——第74、652、675—677、681—685、689—693、695—704、705、709、711页。
- 斯特腊弗德伯爵,约翰·宾恩(Strafford, John Bing 1772—1860)——英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和1815)。——第628、629页。

十三画

- 杨格,约翰(Young, John 1807—187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爱尔兰事务大臣(1852—1855)。——第47页。
- 道金斯,爱德华(Dawkins, Edward)——英国外交家,1827—1834年为驻希腊驻办公使。——第73页。
- 道格拉斯,霍华德(Douglas, Howard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炮兵和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20、486页。
- 葛尼,赛米尔(Gurney, Samuel 1786—1856)——英国银行家,是伦敦大贴现银行经理。——第393页。
- 葛德里奇——见罗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
- 塔西利埃(Tassilier)——法国印制工人,从1848年起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在凯恩。——第665页。
- 塔希尔-帕沙(Tachil Pasha)——土耳其将军,1855年为高加索土军指挥官。——第712页。
- 塞西耳,罗伯特·阿瑟·塔波特·盖斯康,索耳斯贝里侯爵(1868年受封)(Cecil,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Marquis of Salisbury 1830—1903)——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议会议员;屡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和外交大臣。——第414页。
- 塞里姆-帕沙(Selim Pasha)——土耳其将军,1855年为高加索战场土军指挥官。——第712页。
- 塞拉诺-伊-多敏格斯,弗朗西斯科(Ser-rano y Dominguez, Francisco

- 1810—1885)——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陆军大臣(1843),1856年政变的参加者,曾任外交大臣(1862—1863),政府首脑(1868—1869、1871、1874),王国摄政(1869—1871)。——第537页。
- 雷丁顿,托马斯·尼古拉斯(Redington, Thomas Nicolas 1815—1862)——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爱尔兰事务副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副主席(1852—1856)。——第112页。
-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
- 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奥古斯特·米其林·埃蒂耶纳(Regnaultde Saint-Jean d'Angély, AugusteMichel Etienne 1794—1870)——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曾任陆军部长(1851),近卫军指挥官(1854—1869);1855年为克里木法军后备军军长。——第416、421页。
- 福舍(Fauchoux)——法国将军,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第576—578页。
- 福雷,埃利·弗雷德里克(Forey, Elie Frédéric 1804—1872)——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1854—1855年初为克里木法军指挥官,1855年4月被任命为奥兰省(北非)总督。——第173、271页。
-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782、1783和1806)。——第10、642、644、645页。
- 福克斯顿(Folkestone)——英国会议员,资产阶级激进派。——第574页。
- 路易斯,乔治·康瓦尔(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部秘书长(1850—1852),1852—1855年为“爱丁堡评论”编辑,1855—1858年任财政大臣,后任内务大臣(1859—1861)和陆军大臣(1861—1863)。——第104、159、624、625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467页。
- 路易十八(Louis XV 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第716页。
- 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117、126、127、203、248、272、373、628页。
- 路特希尔德,莱昂涅尔(Rothschild, Lionel 1808—1879)——男爵,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的经理,辉格党人,1858年起为议会议员。——第373、454页。
- 奥利芬,劳伦斯(Oliphant, Lawrence 1829—1888)——英国旅行家和记者;1855年以“泰晤士报”在奥美尔-帕沙远征军中的随军记者身分在高加索活动。——第710页。
- 奥勃莱恩,威廉·斯密斯(O'Brien, William Smith 1803—1864)——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青年爱尔兰”社右翼领袖;1848年筹划起义未成被英国当局逮捕并判处死刑,而以终身放逐代替;1856年被赦免。——第446页。
- 奥美尔-帕沙(米哈伊尔·拉塔斯)

- (Omer Pasha (Michail Latas) 1806—1871)——土耳其将军, 克罗地亚人, 克里木战争中任土军总司令。——第60、64、88、129、191、194、196—198、240—243、263、276、309、313、325、406、425、520、522、557、598、599、634、635、649—652、655、656、680、686—697、699—703、705—712页。
- 奥弗拉赫蒂, 艾德蒙 (O Flaherty, Edmond)——英国官员, 1854年任财政部在爱尔兰征税的特派员。——第30页。
-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 (1672—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79、106页。
- 奥斯本——见贝尔纳·奥斯本, 拉尔夫。
- 奥斯特罗夫斯基, 约瑟夫·鲍列斯拉夫 (Ostrowski, Joseph Boleslaw 1805—1871)——波兰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著有许多有关波兰历史的著作。——第546页。
- 奥康奈尔, 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第102、134、135、301、404、443—446页。
- 奥康瑙尔, 菲格斯 (O'Connor, Fea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102、594页。
- 奥特韦, 阿瑟·约翰 (O'tway, Arthur John 1822—1912)——英国议会活动家, 五十年代是托利党人。——第337、370页。
- 奥特马尔, 德 (d'Autemarre)——法国将军, 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第615页。
- 奥马腊, 巴里·爱德华 (O'Meara, Barrie Edward 1786—1836)——英国军医和政论家, 1815—1818年为放逐在圣海伦岛上的拿破仑第一的私人医生; 爱尔兰人。——第181页。
- 奥马尔公爵, 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浦·路易 (Aumale, Henri Eugène Philippe Louis d'Orléans, duc d'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子, 四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167页。
- 奥尔西 (Orsi 死于1899年)——伯爵, 交易所经纪人, 拿破仑第三的代理人; 科西嘉人。——第354页。
- 奥尔良王朝 (Orléans)——法国王朝 (1830—1848)。——第167页。
- 奥尔梭普子爵, 约翰·查理·斯宾塞 (Athorp, John Charles Spencer 1782—1845)——英国国家活动家, 议会议员, 1832年争取议会改革时期辉格党领袖之一; 财政大臣 (1830—1834)。——第437、438页。

十四画

-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1页。
- 赫伯特, 悉尼 (Herbert, 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是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军务大臣 (1845—1846和1852—1855) 和陆军大臣 (1859—1860)。——第9、21、33、40—42、50、54、62、76、77、98—100、124、125、184、189、273、410、411、413、

414页。

赫鲁别夫,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Хруц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806—1875) ——俄国将军, 1853—1856年任克里木驻军指挥官, 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积极参加者之一。——第172页。

维利森, 威廉 (Willisen, Wilhelm 1790—1879)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1848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 1848—1849年在镇压意大利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奥军中供职。——第527页。

维维安, 罗伯特·约翰·哈西 (Vivian, Robert John Hassi 1802—1887) ——英国将军, 1855—1856年任刻赤半岛土军指挥官。——第676、678、681—683、694—696、706—709页。

维多利亚 (Victoria 1819—1901) ——英国女王 (1837—1901)。——第8、45、50、335、360、362、382、405、440、450页。

蒙奈, 德 (Monet, de) ——法国将军, 1854—1855年初为克里木法军旅长。——第172页。

蒙塞耳, 威廉 (Monsell, William 1812—1894)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 1852—1857年为军械局秘书。——第46、113、135页。

蒙蒂霍, 欧仁妮 (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 ——法国皇后,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662、665页。

蒙塔郎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天主教派的首领。——第660页。

蒙塔郎贝尔, 马尔克·勒奈 (Montalembert, Marc-René 1714—1800) ——法国将军, 军事工程师, 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 在十九世纪被广泛采用。——第322、500页。

十五画

摩耳斯沃思, 威廉 (Molesworth, William 1810—1855) ——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属于所谓梅费尔激进派), 议会议员; 曾任公共工程部长官 (1853—1855) 和殖民大臣 (1855)。——第4、46、278、305、425页。

潘缪尔男爵, 福克斯·莫尔 (Panmure, Fox Maule 1801—1874)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军务大臣 (1846—1852), 陆军大臣 (1855—1858)。——第77、80、83、99、158、201、250、382、678—682、712页。

墨尔本子爵, 威廉·拉姆 (Melbourne, William Lamb 1779—1848)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30—1834), 首相 (1834和1835—1841)。——第77、85、134、444、448页。

缅施科夫, 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 (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 ——公爵, 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派大使, 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 (1853年—1855年2月)。——第16、23页。

剑桥公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 (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1819—1904) ——英国将军, 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 后为英国陆军总司令 (1856—1895)。——第

182、184、186、655页。

德兰恩, 约翰·塔杰乌斯 (Delane, John Thadeus 1817—1879) ——英国新闻记者, “泰晤士报”编辑 (1841—1877)。——第45页。

德拉蒙德, 亨利 (Drummond, Henry 1786—1860) ——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第21、84、180、372页。

德·梅斯特尔, 约瑟夫 (De Maistre, Joseph 1753—1821) ——法国作家, 保皇党人, 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死敌。——第717页。

德鲁安·德·路易斯, 爱德华 (Drouyde Lhuys, Edouard 1805—1881) ——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党人; 1851年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 (1848—1849、1851、1852—1855、1862—1866); 1855年为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第200、201、203、204、663页。

十六画

赖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 — 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 “改革报”编辑; 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 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 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84页。

泽德耳迈尔 (Sedlmayer) ——奥地利将军, 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卡尔斯堡要塞司令。——第568页。

默娄, 约翰·帕特里克 (Murrugh, John Patrick) ——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第155页。

穆拉维约夫,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Муравье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4—1866) ——俄国将军, 1854—1856年任高加索俄军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328、349、634、635、680、696、700页。

穆罕默德—沙赫 (Muhammed Shah 1810—1848) ——波斯沙赫 (1834—1848)。——第74页。

霍桑, 查理 (Hotham, Charles 1806—1855) ——英国军官, 1854—1855年任维多利亚 (澳洲) 总督。——第120、121页。

霍纳, 莱昂纳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 ——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工厂视察员 (1833—1856), 主张保护工人利益。——第152、427页。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倾向。——第305页。

霍斯曼, 爱德华 (Horsman, Edward 1807—1876) ——英国自由派国家活动家; 1855—1857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第79页。

霍尔, 约翰 (Hall, John 1795—1866) ——英国军医, 1854—1856年任克里木英军军医主任。——第66页。

霍尔, 本杰明 (Hall, Benjamin 1802—1867) ——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属于所谓的梅费尔激进派); 1854—1855年任保健大臣, 公共工程部长官 (1855—1858)。——第3、4、425页。

十七画

谢耳万 (Сейраш 死于1854年) —— 俄国将军, 1854年为锡利斯特里亚俄军指挥官, 在一次攻打要塞时阵亡。—— 第631页。

十八画

魏恩, 哈利·乔治 (Vane, Harry George)

—— 英国议会议员。—— 第273页。

魏科夫, 亨利 (Wikoff, Henry) —— 美国记者, 五十年代初代表帕麦斯顿在报刊上发表意见。—— 第44页。

魏兹, 约翰·埃什弗德 (Wise, John Ashford) —— 英国议会议员。—— 第272页。

魏兹曼, 尼古拉斯 (Wiseman, Nicolas 1802—1865) —— 英国天主教神甫; 1850年起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和红衣主教。—— 第453页。

萨德勒, 约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 —— 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首领之一, 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 第30、46、117、404、712页。

萨姆纳, 约翰·伯德 (Sumner, John Bird 1780—1862) —— 英国教士, 坎特布里大主教 (1848—1862)。—— 第151页。

萨格登, 爱德华, 圣莱昂纳兹男爵 (Sugden, Edward, Baron St. Leonards 1781—1875) —— 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2年为大法官。—— 第455页。

萨特伦德, 约翰 (Sutherland, John 1808—1891) —— 英国医生, 1855年领导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 第562、563页。

萨美塞特, 亨利 (Somerset, Henry 1794—1862) —— 英国将军, 1855年被任为孟买东印度公司英军总司令。—— 第77页。

萨瓦亲王奥伊根 (Eugen, Prinz von Savoyen 1663—1736) —— 奥地利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第467页。

萨尔, 沙尔·玛丽·德 (Salles, Charles Marie de 1803—1858) —— 法国将军, 1855年为克里木法军军长。—— 第591、617页。

萨尔托里乌斯, 费南多·路易斯·霍赛, 圣路易斯伯爵 (Sartorius, Fernando Luis Jose, primer conde de San Luis 1820—1871) —— 西班牙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莫迪腊多斯派 (温和派) 领袖之一, 曾任内政大臣 (1847—1851), 政府首脑 (1853—1854)。—— 第537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画

以萨迦—— 据圣经说他是犹太人十二支系之一的祖先; 他异常驯服顺从, 并特

别能吃苦耐劳, 因此他的父亲雅各把他比做“强壮的驴”。—— 第340页。

丹纳士诸女—— 古希腊神话中国王丹纳士的女儿们, 由于杀害自己的丈夫, 被

罚死后提水灌满无底水桶。——第712页。

尤金·阿拉姆——布尔韦尔·利顿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与学术界隔绝、最后在周围现实冲突中牺牲的学者典型。——第305页。

五 画

史赖，克里斯多弗——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记”中的人物。——第442页。

本丢·彼拉多——罗马驻犹太总督(26—36)，他的名字成了伪善和残酷的别名。——第371页。

六 画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之一；据传说她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第123页。

亚加米农——右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阿尔哥斯国王，“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之一，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领袖；传说为了消除阻拦，使希腊舰队得以开往特洛伊，他用自己的女儿伊菲姬妮亚作为牺牲祭祀女神阿尔蒂米斯。——第441页。

伊菲姬妮亚——古希腊神话中国王亚加米农的女儿。——第441页。

齐格弗里特——古代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中世纪叙事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齐格弗里特杀死了巨龙之后在龙血流成的湖里沐浴，因而刀枪不入。——第281页。

七 画

沃里克——布尔韦尔·利顿的小说“最后一个男爵”中的主人公，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十五世纪封建内乱的参加者的典型人物。——第305页。

八 画

参孙——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力气和胆量。——第77页。

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阿基里斯是由于箭镞射中了他的脚跟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而死去的。——第670页。

九 画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31、38、43、44、89、203、205、270、328、510页。

哈巴谷——圣经中的先知。——第391页。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第305、358页。

十 画

夏禄——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眼光短浅，目空一切和自私自利的乡村法官，讼棍。——第549页。

哥列姆——据犹太传说，他是一个用粘土塑造出来的人，供役使做各种粗重杂活；阿尔宁在自己的幻想小说“埃及的伊萨伯拉”中第一次把哥列姆这个人物

引进文坛。——第708页。

乌利斯,或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之一,以大胆、机智和善辩著称。——第6页。

特洛米奥(爱非斯的特洛米奥和叙拉古的特洛米奥)——孪生弟兄,长相一样,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中的人物。——第82页。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第70、249页。

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因侮辱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每当他想掬取身周的水解渴或采摘悬在头上的果子解饿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第183、187页。

库尔威乌斯(马可·库尔威乌斯)——传说中的古罗马少年,他投身深渊以拯救罗马。——第12页。

航海家辛伯达——阿拉伯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第400页。

十一画

朗普金,汤尼——奥利弗·哥德斯密的喜剧“欲擒故纵”(“错误之夜”)中的人物;妄自尊大、矫揉造作、不学无术、粗鲁无礼的贵公子。——第549页。

十二画

雅典娜·帕拉斯——古希腊神话中主要神祇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第671页。

十三画

瑟息替斯——“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腊战士,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一个乘凉而又尖酸刻薄的驼背瘸子,叙事诗第二章中说到他遭到了奥德赛的痛打,因为他诋毁了希腊军队的领袖。——第6、362、712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一些著作(“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第66、549页。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亡灵在此受苦)大门的三头犬。——第574页。

十四画

赫斯贝里德姊妹——古希腊神话中狄坦神阿特拉斯的女儿们,看守长在生命树上的金苹果。——第373页。

十五画

摩拏——传说中的古印度立法者;“摩祇法典”是婆罗门僧侣在一至五世纪内编篡的。——第541页。

摩洛赫——古代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太阳神,以活人献祭;后来摩洛赫的名字成了残忍凶狠、恣意杀戮的暴力的代名词。——第151页。

十九画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368页。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伦敦出版。——第125、341、671、673页。

四 画

“公文集”《The Portfolio》——伦敦出版。——第74、75页。

“手术刀”《The Lancet》——伦敦出版。——第372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鲁塞尔出版。——第713页。

“韦斯明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伦敦出版。——第441页。

五 画

“北方报”《Le Nord》——巴黎—布鲁塞尔出版。——第659、663页。

“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圣彼得堡出版。——第659页。

“北明翰每日新闻”《The Birmingham Daily Press》——第456页。

“北明翰报和商报”《The Birmingham Journal and Commercial Advertiser》——第660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326、338、348、415、421、652、658页。

六 画

“地球报”《Le Globe》——巴黎出版。——第200页。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er》——伦敦出版。——第359、391页。

“先驱”《The Leader》——伦敦出版。——第151、359页。

“先驱报”《Herald》——见“先驱晨报”。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第45、124、128、150、175、252、270、318、341、359页。

“米兰官报”《Gazzetta Ufficiale di Milano》——第670页。

七 画

“邮报”《Post》——见“晨邮报”。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出版。——第44、85、122、227、237、340、372、551、611、624页。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341页。

八 画

“罗马日报”《Gazzetta di Roma》——第453页。

“官报”《Gazette》——见“伦敦官报”。

“阿尔古斯报”《The Argus》——墨尔本

本出版。——第120页。

九 画

“纪事报”（《Chronicle》）——见“纪事晨报”。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伦敦出版。——第84、85、95、200、227、237、238、352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125、209、213、237、270、416、421、559、666—668、670页。

“城乡新闻”（《Town and Country Newspaper》）——伦敦出版。——第341页。

“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ие инвалиды》）——圣彼得堡出版。——第354、355页。

“信使电报”（《Courier and Telegraph》）——伦敦出版。——第341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626页。

十 画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5、20、21、25、26、38、44—46、48、60、65、75—78、84、85、108、114、122、158、159、180—182、190、193—195、197、198、213、217、238、254、272、340、341、355、356、370、373、386、399、403、414、561、563、651、658、659、668、710页。

“泰晤士画报”（《Illustrated Times》）——伦敦出版。——第341页。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第4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19、28、32、45、61、94、

117、141、145、169、174、190、195、203、208、211、213、217、236、243、263、266、277、311、325、332、347、381、393、397、408、419、430、437、457、458、462、560、571、581、588、589、591—593、600、609、623、635、641、645、652、657、664、668、670、671、673、718页。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伦敦出版。——第159页。

十一 画

“舵手”（《The Pilot》）——伦敦出版。——第341页。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伦敦出版。——第20、96、104、122、123、125、128、154、227、237、403、669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伦敦出版。——第44、54、95、122、132、133、150、196、244、273、369、539、669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78页。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第604、605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4、71、272、583页。

十二 画

“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纽约出版。——第463页。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ssische Lit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714页。

十三画

“新闻报”（《The Press》）——伦敦出版。——第175—177页。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第6、8、13、24、37、49、52、56、65、67、75、78、86、92、94、97、101、103、107、111、113、121、123、127、131、133、137、141、149、153、157、159、165、174、178、181、185、199、202、213、217、225、229、230、236、239、243、246、251、255、258、269、273、277、282、287、294、297、302、307、313、315、319、325、336、339、342、352、357、362、369、374、381、384、389、393、397、400、404、408、411、414、423、428、429、462、540、544、545、550、554、560、563、565、

574、581、593、594、603、606、609、613、614、617、623、626、629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出版。——第85、606页。

“雷诺新闻”（《Reynold's Newspaper》）——伦敦出版。——第340、341页。

十五画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墨尔本阿尔古斯报”（《Melbourne Argus》）——见“阿尔古斯报”。

十六画

“辨士时报”（《Penny Times》）——伦敦出版。——第342页。

地名索引*

三 画

- 土伦——第168、381、417、422页。
 大湾——第171、242、259、413、591、598页。
 大西洋——第465、535页。
 大贝耳特海峡——第587页。
 士麦那(伊斯密尔)——第81页。
 小亚细亚——第557、646、687页。
 干地亚(克里特)岛——第518页。
 下阿尔卑斯——法国的省。——第667页。

四 画

- 文森——第526、662页。
 牛津——第31、56页。
 长岛——在大西洋。——第656页。
 扎列施基——第567页。
 不伦瑞克——第515页。
 什列斯维希——第484、532页。
 切塔特——第511、522、596、602页。
 切尔克西亚——第74页。
 太平洋——第71、355、712页。
 太恩河畔新堡(新堡)——第54、334、360、398、456、457页。
 比里尤斯——第628页。

- 比利牛斯山脉——第713页。
 比利牛斯半岛——第97、467、584页。
 巴黎——第145、150、163、200、211、213、230、234、235、260、264、271、276、290、310、322、327、346、354、358、359、379、390、398、408、423、555、559、600、605、613、629、653、660、662、663、667、670、675、690、694、695、698—700、706页。
 巴登——第515、715页。
 巴特——第298、549页。
 巴格达——第518页。
 巴士姆(巴士米)——第557、633、650—652、665、676页。
 巴伐利亚——第514—516、567页。
 巴达霍斯——第60、65页。
 巴雅泽特(多古巴雅西特)——第646页。
 巴拉腊特——第119—121页。
 巴拉克拉瓦——第3、41、42、57、60、65、66、78、95、125、126、139、142、143、146、158、174、182、186、189、207、230、241、259—263、325、327、348、378、393、407、417、419、423、481、484、487、511、523、576、598、619、686、690、696、700、708页。
 巴赫契萨赖——第18、139、276、597、603页。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编者注

巴扎尔吉克,又名道布里奇(托耳布欣)。——第166页。
巴尔干山脉——第209、210、331、350页。
巴尔塔利曼尼——第72页。

五 画

白海——第556、654页。
古巴岛——第536页。
卢森堡——第713页。
弗吉尼亚——第107页。
尼古拉也夫——第328—330、348—350、381、558、607、608、633、638、639页。
幼发拉底河——第633页。
印度——第27、28、47、48、56、104、110、112、116、360、481、541页。
印度河——第28、48页。
东印度——第27、76—78、541页。
皮蒙特——第33、524—527、545页。
皮尔姆——第639页。
皮列柯普——第139、168、314、328、348、407、597、600、603、608、639页。
北京——第714页。
北明翰——第135、226、298、299、398、399、436、456、457、460页。
叶尼卡列——十九世纪刻赤附近的堡垒。——第314、631、695、709页。
叶夫帕托利亚——第139—141、168、191、192、195—197、241、242、260、263、271、309、313、327、348、523、558、592、593、600、620、630、631、652、690、691、695—697、699、702、703、706、709页。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德涅泊彼得罗夫斯克)——第407、607、608页。
汉堡——第714页。
汉格(汉科)——第352—354、370页。
汉诺威——第515、516页。
瓦尔——第667页。

瓦尔那——第41、42、129、130、142、146、166、209、210、598、648、654、698、709页。
瓦拉几亚——第16、23、29、49、161、289、519、521、542、551、571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55、85、284、285、289、293、355、418、506、555、566、607、644页。
圣让得阿克(阿卡)——第71页。
布伦——第467、668页。
布拉格——第222页。
布萨库——葡萄牙的一个居民点。——第580页。
布格河(西布格河)——第17、24页。
布格河(南布格河)——第14、16、17、22、23、558、631、632页。
布达佩斯——第222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499页。
布来洛夫(布来拉)——第648页。
布莱克本——第78页。
布莱得弗德——第456、457页。
布宜诺斯艾利斯——第71页。
卡法——见费奥多西亚。
卡查河——第240、261、262页。
卡利希——第15、16、22、23页。
卡梅什——第407、598页。
卡马累,又名科马累——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708、709页。
卡尔斯——第521、557、630、633—635、646—652、655、656、660、672、675—677、680—682、684—688、694—696、698、700、702—705、709—711页。
卡尔斯—查伊河(卡尔斯河)——第650页。
卡尔斯堡(阿尔巴—尤利亚)——第568页。
卡拉法特——第139、140、196、598页。

卡麦涅茨(卡麦涅茨—波多尔斯克)——第16、23页。
 卡兰亭湾——第171、308、309、313页。
 加拉兹——第608页。
 加尔各答——第78页。
 加里西亚——第16、18、23、92、219、566—568页。
 加利波利(格利博卢)——第42、209页。
 加利斯河(克孜尔—伊尔马克河)——第166页。
 加利福尼亚——第110、116页。

六 画

休达——第535页。
 华沙——第17、24、568页。
 匈牙利——第17、94、164、219、222、223、225、311、469、489、491、5页。
 列杜特—卡列——第635、652、676、686、692、705页。
 朴次茅斯——第77、360页。
 因克尔芒——第139、143、158、170、174、184、207、241、259—261、308、312、378、380、388、406、415、417、420、423、483、484、487、513、533、573、576、578、580、590、596、597、600、602、603、619、631、655页。
 伐耳赫伦岛——第21、248页。
 米诺尔卡岛,又名梅诺尔卡岛——在地中海。——第644页。
 西诺普——第29、54、55页。
 西伯利亚——第335页。
 西佐波耳(索佐波耳)——第704页。
 伊兹马伊耳——第15、22、329页。
 伊奥尼亚群岛——第360、628页。
 安特卫普——第715页。
 安那托里亚——第407、678页。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第73、361页。
 艾托多尔(哥里斯托耶)——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378、608页。
 艾尔斯贝里——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112页。
 乔尔贡——第276、308、378、576页。
 乔罗赫河——第633、635页。
 达尔马威亚——第489页。
 达达尼尔海峡——第73、205、361页。
 多瑙河——第24、49、74、88、92、129、139、205、209、327、331、348、350、522、556、596、602、608页。
 多瑙河各公国——见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
 多布鲁甲——第271页。
 托斯卡纳——第527、543页。
 托利—莫纳斯特尔(比托耳)——第517页。
 亚眠——第658页。
 亚得利亚海——第223页。
 亚历山大罗波尔(列宁纳坎)——第634、647、680页。

七 画

里子——第456、457页。
 里昂——第93页。
 里昂河(里奥尼河)——在高加索。——第635、651、680页。
 里沃夫——第568页。
 别里斯拉夫——第314页。
 别尔疆斯克(奥西片科)——第314页。
 贝耳岛——在比斯开湾。——第665—667页。
 贝耳特——见大贝耳特海峡。
 贝萨拉比亚——第16、17、23、169、331、418、504、656、660页。

- 贝尔贝河——第243、259、261—263、378、608页。
 沃伦——第14、17、22、169、310、381、418、590页。
 沃耳特(沃耳士)——第633、635页。
 沃耳特尼察——第522、596、602页。
 沃耳契亚河——第608页。
 坎纳(坎涅)——第3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321、323页。
 利物浦——第288、342、360、406、426页。
 麦加城——第647页。
 杜罗河——在比利牛斯半岛。——第71页。
 吕宋岛——在太平洋。——第536页。
 那不勒斯——第71、398、543页。
 辛费罗波尔——第139、168、211、242、259、260、262、381、407、592、609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29、54、73、77、81、90、142、146、148、161、168、182、183、186、198、209、210、218、241、292、327、348、424、517、521、557、633、647、650、663、676、678、682、683、685、688—690、692、693、697、700、703页。
 苏格兰——第10、30、31、55、56、625页。
 苏姆拉(科拉罗夫格勒)——第58、64、209、517、598页。
 苏利纳河口,又名苏利纳支流——在多瑙河三角洲。——第49页。
 苏茹克—卡列——高加索海岸要塞。——第74、315页。
 苏胡姆—卡列——第635、650页。
 克里木——第3、4、11、14、16—20、22、23、31、33—35、38、40、41、53、57、58、61、63、65、66、77、81、87—92、95、96、115、124、125、130、132、133、138、141—148、158、159、166—169、183、184、186、188、191、192、194、196—198、210、230、240—242、248、259、260、270、271、274、285、286、293、308、310—312、314、315、325、326、328、329、337、338、348、349、354、358、361、365、375、380—382、386、390、391、404—408、412、415、417—420、422、425、427、470、474、475、479、481、484、486、501、510、514、522、526、542、547、552、553、556—558、562、570、575、589、593、595、597—601、607—610、619、620、623、627、628、633、636、638、650、653、655、660、661、665、667、670、681、689、693、696、712页。
 克亚索——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528页。
 克莱德——在苏格兰。——第360页。
 克莱纳——第219页。
 克拉科夫——第93、567页。
 克罗地亚——第219页。
 克伦地亚——第219、221页。
- ## 八 画
- 林茨——第568页。
 明乔河——在意大利。——第224页。
 帕尔马——第527页。
 居姆里——见亚历山大罗波尔。
 金布恩——第558、631、632、652页。
 易北河,又名拉巴河。——第223页。
 些耳德河——第71页。
 直布罗陀——第88、96、177页。
 的黎波里——第518、519页。
 明格列里亚——第652、656、680—682、697、698、700、706、708页。
 法纳哥里亚堡——第630、631页。
 芬兰——第17、23、418、425、656页。
 芬兰湾——第318页。
 罗马——第90、148、354、453、528、542、

- 544页。
 罗契得尔——第628页。
 孟买——第78页。
 孟加拉——第28、48页。
 刻赤——第240、260、270、275、298、314、315、325、327、406、631、652、691、696、700、708、709页。
 刻赤海峡——第655页。
 拉弗勒舍——第663页。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第665页。
 拉芒什海峡——第124、138、543页。
 波河——第59、64、525页。
 波斯湾——第71、74页。
 波兹南——第322、500页。
 波尔顿——第78页。
 波列西耶——第17、24页。
 波多黎各——第536页。
 波多利亚——第14、17、22、24、310页。
 波罗的海——第16、23、87、143、147、148、296、306、329、418、425、505、542、556、557、559、584、585、587、656、712页。
 波斯尼亚——第519、520页。
 波尔塔瓦——第407页。
 波尔塔瓦省——第330、350、608页。
 波希米亚——见捷克。
 波希米亚(捷克)森林——山脉。——第219页。
 波多尔斯克(赫梅里尼茨克)省——第330、350页。
 阿纳帕——第315、327页。
 阿思隆——第136页。
 阿勒颇(哈勒布)——第518页。
 阿速夫——第314页。
 阿速夫海——第298、314、328、348、381、406、419、558、597、603、631页。
 阿尔及尔——第90、168、666页。
 阿尔马河——第57、59、207、240、242、243、261、263、474、510、513、580页。
 阿尔达汉——第651页。
 阿卢什塔——第260、261页。
 阿卢普卡——第261、262页。
 阿斯佩恩——第144、149、491页。
 阿拉木特——中世纪伊期的堡垒。——第7页。
 阿拉巴特——第314页。
 阿拉巴特砂咀——第632页。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纳)——第19、72、210、517页。
 阿腊克斯河——第633、650页。
 阿哈尔齐赫——第646页。
 阿尔巴尼亚——第519、520页。
 阿尔德肖特——第572页。
 阿尔明尼亚——第556、633、635、647、650、651页。
 阿尔明尼亚高原——第635、646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219、713页。
 阿尔汉格尔斯克——第556页。

九 画

- 耶拿——第263、467页。
 柏林——第161、238、499、714页。
 军港——第591页。
 信德——巴基斯坦的省。——第584页。
 叙利亚——第519页。
 突尼斯——第518、520页。
 保加利亚——第425、676页。
 查特山——第260、600页。
 施梯里亚——第219页。
 美因兹——第322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715页。
 威尔特郡——第76页。
 威斯特伐里亚——第713页。
 拜兰——第210页。

- 拜达尔(奥尔利诺耶)——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378页。
- 拜达尔盆地——第261、262、308、312、406、562、578、620页。
- 南湾——第143、147、320页。
- 南威克——第253、278页。
- 南高加索——第328、608、656页。
- 科伦——第322、500、713页。
- 科布伦茨——第322、500页。
-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322、499、500页。
- 科尔富岛——第88、96、360、480页。
- 科尔贝克(科洛布热克)——第321页。
- 哈佛尔——第715页。
- 哈尔科夫——第331、350、407页。
- 哈尔科夫省——第330、350页。
- 哈里法克斯——在英国。——第456、457页。
- 哈里法克斯——在加拿大。——第309页。
- 哈得兹菲尔德——第456、457页。

十 画

- 翁热——第667页。
- 拿骚——第515页。
- 敖德萨——第210、306、328—331、348—350、352、381、407、607、608、631、639页。
- 高加索——第16、23、74、328、329、349、418、505、556、608、635、652、656、680页。
- 涅夫勒——法国的省。——第667页。
- 臭水海(锡瓦什)——湖泊。——第314页。
-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152、480页。
- 索美塞特——英国的郡。——第201页。
- 纳尔根(奈萨尔)岛——在塔林附近。——第587页。
- 伦敦——第4、27、41、48、49、85、124、158、161、163、179、204、206、228、230、247、249、278、290、297—299、341、342、354、358、359、364、365、382、385、386、390、391、393、398、406、408、423、426、436、449、456、457、546、547、589、594、627、644、683、691—693、697、700、708页。
- 伦巴第——第222、491、528页。
- 特拉比曾德(特拉布松)——第205、651、652、677、680、684、685、697—699、712页。
- 特兰西瓦尼亚——第489、568页。
- 哥特兰岛——在波罗的海。——第531页。
- 哥本哈根——第355页。
- 埃及——第113、519、520页。
- 埃罗——法国的省。——第667页。
- 埃尔斯伦(埃尔祖鲁姆)——第518、521、557、633、646、649—651、677、678、680—682、684—687、695、697、698页。
- 爱尔兰——第29、30、47、48、55、70、77、134—137、443—446、449、450、453、539、625页。
- 爱丁堡——第450、601页。
- 爱沙尼亚——第656页。
- 马赛——第360、381、417、422页。
- 马连峨——第148页。
- 马尔他岛——第88、96、129、360、480、628页。
- 马斯拉克——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592页。
- 乌克兰——第597、603页。
- 马尔姆——第599页。
- 乌里治——第360页。

乌得勒支——第126页。
 乌尔摩斯塔——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620页。
 格鲁吉亚——第328、349、677、679、680页。
 格拉斯哥——第342页。
 格尼切斯克——第314页。
 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第18、58、63、139、141、168、174、198、242、263、275、309、312、313、379、598页。
 库拉河——第635页。
 库卢鲁——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630页。
 库班河——第329、349、504、608页。
 库尔姆(赫鲁美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居民点。——第210页。
 库泰依斯(库泰依西)——第635、651、676、680页。
 库尔迪斯坦——第519页。
 库楚克-凯纳吉(凯纳吉)——第180、210、285、293页。

十一画

第戎——第93页。
 崩港——第666页。
 得比——第456、457页。
 教皇国——第542页。
 曼都亚——第321页。
 曼彻斯特——第78、110、116、226、228、305、342、406、426、427、436、601页。
 设菲尔德——第362、398、399、456、457页。
 朗卡斯特公国——第77页。
 梯维尔顿——第272页。
 梯弗里斯(梯比里斯)——第635、648、680页。
 捷克——第17、24、92、219—222页。

捷列克河——第329、349、504、608页。
 梅努特——第100页。
 梅克伦堡——第515页。
 梅肯集高地——在克里木。——第575、609页。
 莫斯科——第94、182、186、330、331、350、607、608、639页。
 莫拉维亚——第17、24、220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16、17、23、29、49、161、289、519、542、551、571页。
 基辅——第17、24、608页。
 基辅省——第330、350、608页。
 基连湾——第171页。
 基连谷——第321、377、392、614页。

十二画

凯恩——第665页。
 温莎——第8页。
 都柏林——第446页。
 菲律宾群岛——第536页。
 费奥多西亚——第194、198、211、240、260、327、328、348页。
 提罗耳——第222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329、349页。
 雅典——第35、90、148页。
 雅尔达——第260页。
 雅伊拉(克里木山脉)——第261页。
 博罗迪诺——第469页。
 博马尔松德——第586页。
 博斯普鲁斯海峡——第42、73、598、676、709页。
 莱比锡——第144、149、531、714页。
 莱茵河——第327、713页。
 莱斯特——英国的郡。——第202页。
 普雷斯顿——第78、110页。

- 普鲁特河——第17、24、552、553、569、570页。
- 普瓦提埃——第648页。
- 普泽米希尔——第567、568页。
- 黑河——第139、143、192、194、197、198、240、242、243、259、262—264、271、276、308、312、324、354、378、407、408、525、558、561、562、575—577、579、590、592、593、596、597、602、603、608、620、631页。
- 黑海——第3、5、19、87、88、108、114、140、211、212、221、289、296、304、306、327、330、331、338、339、348、350、407、465、505、542、558、632、633、654、656、684页。
- 黑森——第515页。
- 黑森—达姆斯塔特——第515页。
- 黑塞哥维那——第519页。
- 斯泰福——第302、306页。
- 斯库塔里(乌斯库达尔)——第42、81、129、182、183、187、563页。
- 斯特劳德——第437、440页。
- 斯特拉斯堡——第145、148、668页。
- 斯摩棱斯克——第94页。
- 斯维阿波尔格(苏奥缅林纳)——第559—561、564、584、586、587页。
- 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第530页。
- ### 十三画
- 滑铁卢——第358、379、580、629页。
- 新奥尔良——第467页。
- 蒙瓦勒里安——第235页。
- 顿河——第381页。
- 顿河军区——第597页。
- 奥登堡——第515页。
- 奥查科夫——第558、632页。
-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568页。
-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162、467页。
- 塔曼——第630、631页。
- 塔霍河——在比利牛斯半岛。——第71页。
- 塔姆沃思——在英国。——第549页。
- 塔干罗格——第314、328、348页。
- 塔夫利达省——第607页。
- 塞尔维亚——第220、519页。
- 塞瓦斯托波尔湾,又名塞瓦斯托波尔停泊场。——见大湾。
- 塞瓦斯托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第4、10、19、53、58、60、63、65、66、99、122、123、130、132、138、141—147、159、167—171、173、177、191、194—198、209、211—217、230、233、235、241、242、259—261、264—266、270、285、308、310、312、314、315、320、323、324、327、328、335、348、352—354、358、359、375、380、381、406、408、412、415、416、419、421、483、509、512、513、595—600、602、603、614、652、653、655、660、679、682、691、693、695、697、699、704—706、709页。
- 大凸角堡(第三棱堡)——第232、353、375—377、379、392、396、557、590、601、610、611、614、616—619、628页。
- 小凸角堡(第一棱堡)——第614、616、617、619页。
- 中央棱堡(第五棱堡)——第231、232、308、313、591、614、615、617—619页。
- 巴甫洛夫炮垒,又名巴甫洛夫炮台。——第590页。
- 市区——第265、320、615页。
- 北区——第141、169、197、232、250、

261、263、264、276、324、325、406、416、421、589、592、593、597、598、600页。

北堡，又名北炮台。——第138、192、242、609页。

卡兰亭棱堡(第六棱堡)——第265、375、591页。

尼古拉也夫炮垒，又名尼古拉也夫炮台。——第592页。

色楞格多面堡——第171、193、216、217、230、231、265、309、320、321、324、377页。

亚历山大罗夫炮垒，又名亚历山大罗夫炮台。——第592页。

沃伦多面堡——第230、231、265、309、320、321、324、277页。

南区——第60、141、168、232、264、324、325、354、359、380、408、415、421、562、589、595、598、602、619、620、652、653、655、708页。

军港区——第320、379、380、396、591、592、595、602、615、619页。

马奇塔棱堡(第四棱堡)——第230—232、236、265、308、313、375、591、614—616页。

马拉霍夫冈(科尔尼洛夫棱堡)——第170—172、193、194、197、217、231、236、324、353、377、379、392、394、395、415、420、557、562、589—592、595、596、598、601—603、614—618、619、620页。

堪察加眼镜堡，又名马美朗。——第217、230、231、265、309、320、321、324、375—377、394、415、420、590、611、616、655页。

雅佐诺夫多面堡，又名花园炮台。——第266页。

十四画

维也纳——第5、14、29、33、54、55、81、83、87、96、100、129、148、158、160—164、191、203、204、222、224、230、234、238、273、278—281、283—287、289、292、294、303、304、306、317、335、337、343、344、346、347、402、424、492、519、543、567、568页。

维尔诺(维尔纽斯)——第639页。

维尔腾堡——第515页。

维斯拉河——第17、94、326、338、506页。

维多利亚——在澳大利亚。——第119—121页。

赫拉特——第74页。

赫尔松——第17、314、328—330、348—350、381、407、558、597、603、607、608、632页。

赫尔松省——第607页。

赫尔松涅斯——见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

赫尔幸福斯(赫尔辛基)——第370、560页。

十五画

剑桥——第248、249页。

墨尔本——第119、120页。

摩地那——第527页。

慕尼黑——第567页。

鲁舒克(鲁塞)——第209、598页。

鲁美利亚——第407页。

潘普洛纳——第580页。

撒丁——见皮蒙特。

撒丁岛——第523、524、527页。

德勒穆——第202页。

德涅泊河——第17、24、314、337、381、558、607、608、631页。

德普弗德——第360页。

德韦-博荣——高加索的山岭。——第649、650页。

德涅斯特河——第14、16、17、22—24、331页。

十六画

诺定昂——第152、155、456、457页。

默麦尔(克莱彼达)——第244页。

霍亨——第568页。

霍尔施坦——第515、532、533页。

锡兰岛——第360页。

锡瓦斯——第685页。

锡利斯特里亚(锡利斯特腊)——第130、

194、210、511、521、598、631、638、648页。

十八画

萨瓦——第327页。

萨克森——第515、640页。

萨蓬山——第197、216、217、231、275、375、376、655页。

萨福克——英国的郡。——第202页。

萨尔茨堡——第568页。

萨塞克斯——英国的郡。——第107页。

萨塞克湖——第140、630页。

萨耳吉尔河——第260、600页。